柳湜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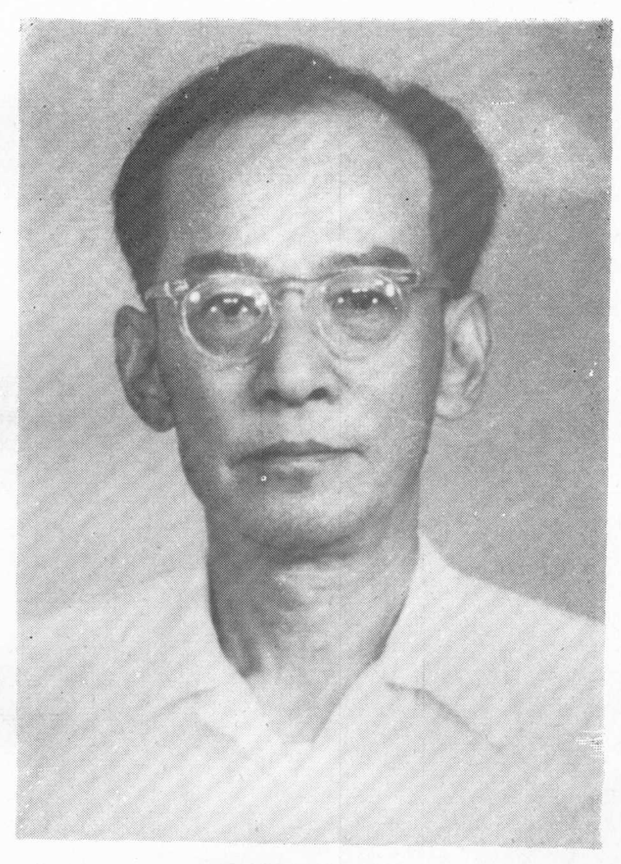
柳湜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秦人路
封面设计：王师颉

柳湜文集
LIUSHI WENJI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9印张 615,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300
定价 9.00 元
ISBN 7-108-00117-0/G·15



柳湜

（1903—1968）

悼健公　柳湜

元旦日从报纸上得到健公逝世的消息。在今日这般残酷的战斗中，一个战斗员的牺牲，原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健公之死，自然也无例外。然而，健公是我的一位战友，并有着八九年的历史，这不能不使我神经上，一时受到很强烈的刺激。因为我们间既有这样长久的历史，最近我的案头还置有他自山西和县发出的信件，这不能不使我回忆过去的一切，不能不因为眼前这些案头信件而更引起我无限的悲念。

健公不仅是一个青年战士，而同时是一个青年学者，哲学家。我很觉得报纸上对于他的死耗的标题，恰合他的身份。"青年哲学家温健公被难了"。

的确，健公在学术上的成功并不在我们以下，虽然因为他的实践使他失去深造的机会，生活的不定，斗争的激烈，不能让他作深刻的研究与写作，否则，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一定更大。不过，这在我并不觉得可惜，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著译中很有几种可以作为他的纪念，同时他的工作影响在华北今日抗战的伟业上也可以使他瞑目的。

近九年来，尤其是抗战后，健公没有著作了，并且长篇大论的东西亦不多见。前岁太原聚首时，他告诉我现在他

作者手迹之一

写的是计划、方案、讲义、宣传品，他已没有时间写别的了，并且他也已换了戎装，生活在最前线的兵营中。我说，"这时候用不着写别的，但现在所写的还是你最应该写的。"

在汉口时，我们有了长期的聚首。可是，这是他最不愉快的时代。充满了青年精力与魄力的他，这时反被强迫的闲置着。这一段时光，我知道他天天在读书。"是的，我还得学习，藉这机会多读点书也好"。

不久他因母丧回粤了。又不久，我忽得到他自山西来信，知道他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负宣传责任，并电我为山西物色各级军政干部。我们因为彼此多忙，除在工作帮助上彼此间常写了寥寥数字以外，是没有工夫长谈的。不想，我介绍去晋工作的友人郭君返桂过到宜川，健公却死于敌机的毒弹中，大概是第一个且是末与健公见过面吧！

健公死后，他的夫人维静仍在前方作游击战，我祝维静健康，不要因健公之死而过于悲伤！

抄自《全民抗战》第四十七号

民国廿八年十月十日

作者手迹之二

柳湜同志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柳湜文集》前言

柳湜同志是中国人民优秀的文化战士和教育活动家。在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中，撰写了二百余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他的毕生事业和著述活动主要包括两个阶段和两个方面：(1)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主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撰写了大量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有关社会科学、时事政治等内容的论著；(2)从一九四一年到延安之后直到解放初期被错划为“右派”之前，主要从事教育领导工作，撰写过不少教育学理论和教育方针政策的文章。由于教育部门已决定编辑整理《柳湜教育文集》，故本文集不收入他写的教育方面的论著，他在三十年代所写的有关学生运动、国难教育和自学论等方面的文章基本上也不收入。我们谨以这部文集和将要出版的《柳湜教育文集》，保存柳湜同志为人民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使之留传下去，启迪后人，并以此纪念惨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柳湜同志。

一

柳湜同志出生在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和奋起斗争的时代。

他原名柳克立，一九〇三年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白马嘴，一个已经贫穷没落的封建家庭。当时，他的直系亲属只有四人：祖母、父亲、母亲和姐姐。直系亲属中，自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都只生一个儿子，没有伯、叔和兄弟等近亲属，而他们又都在三十岁左右即去世了。到了他这一代，多了一个姐姐。父亲在他三岁时即去世，不久祖母也去世了。一九二二年，母亲又去世，姐姐早已出嫁到曹家。因此，他在一九二二年后，已经没有家庭，到一九三七年结婚这一段时期，是孑然一身。

他的这个家庭建基在高祖。高祖系科举出身，中过进士，曾做过清朝府、县一级的官，成为长沙长桥柳氏宗族中的显要人物。曾祖也是举人。父亲柳舜阶，读过一点书，后在一个刑名师爷门下学幕（即那个时代的司法），未成即去世，此后家庭在经济上完全破落。祖母在世时，家庭尚维持"诗书门第"的空架子，实际上是靠借贷、典当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祖母相继去世后，家庭即陷入赤贫。在白马嘴时，即系寄人篱下。母亲邹志柏，娘家也已破落。

他的母亲是一个极为坚强的人。三十岁左右即决志守寡。为了子女教育，她带了姐姐克勤和他，毅然离开家乡，搬到长沙省城，住进了保节堂。这是一个收容无依无靠的寡妇的封建性慈善机构，生活降到了人间地狱的底层。到一九二二年母亲去世以前，家庭生活除靠社会和家族少量救济以外，主要靠母亲劳动。她粗活细活都会做，为湘绣店绣花，也做针线、鞋子、洗衣服等劳动。姐姐从小就同母亲一起劳动，维持家计。柳湜除帮母亲跑腿、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外，在困苦中发愤学习，终于从小学读到五年制师范毕业。

柳湜在长沙第一高等小学打好了初步的语文、算术基础，以后所进长沙师范是由徐特立同志首创的，徐老在那里播下了进步的革命的种子。柳湜在长沙师范学得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比较一般中学要深广得多的历史知识。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和当时青年一样，阅读了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的许多文献，研读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开始产生初步的爱国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他从军阀混战带给国家人民无穷灾难的惨痛现实中受到生动的反面教育。学校时常驻兵，南来北往的军队，常常迫使学校停课。这使他和同学们一样，非常关心时局。教师中有很多关心学生、且富爱国和民主思想的人，经常给学生谈时事，使他们眼界大开，知道军阀的罪恶，知道军阀都有外国背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要求民主、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五四运动的爆发，犹如迅雷闪电一般，在长沙师范内得到强烈的反响。

五四运动给柳湜同志的最初的影响，是唤起了他的求知欲，他饥不择食地要求了解一切新鲜事物。在长沙师范毕业前两年中，他阅读当时进步书刊比正课所占时间还多。他还受到本家兄弟柳直旬、进步同学曹伯韩、廖庶谦的影响。他们都是很早接近革命组织的人，引导他读了许多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的书。在一九二一年以后，湖南有了党的活动，开设了新文化书店，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些活动引导他开始接触有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经廖、曹的介绍，他在师范毕业后一年和自修大学有了联系，认识了许多参加共产党、青年团的同志，其中包括我党早期活动家李维汉同志。他自愿地、基本上是义务地为自修大学附设的外文补习班担任英语教员。这时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自然更前进了一步。

当时的柳湜同志站在同情革命的立场，在学生运动中参加了一些活动，但还没有达到立即要求参加党、投身革命斗争的程度，他想先争取进大学，准备将来搞文学。早在师范毕业前两年，他就着重学习英文，为学习文学作准备。师范毕业以后即在本校附属小学教英语，一面准备升大学。一九二四年，以半工半读赴北京学习了两年多。在北京大学自由听课，以作家庭教师、替人抄写文稿、讲义，并以短时期在平政院当书记生等方式维持生活。这样听完了中国文学系几门主要的课，也听了西洋文学一些课程，通过英文阅读了许多俄国文学大师们的名著。

这已是大革命的前夜，在革命洪流的影响下，又由于生病、咯血，便于一九二六年秋回到长沙。在大革命高潮中，在王季范任校长的长沙第一中学和由前自修大学创办的湘江中学教语文，同时做一些革命的宣传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白色恐怖达到顶点。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群众。柳湜最亲近的朋友、同学以及认识的人中，被杀者无数，激起他精神上的异常震动。马日事变后数日，他便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朋友奔走营救，传递消息，为死难烈士收殓遗体，安排后事。这时党组织已转入地下，又处于党、团员中有人自首叛变，工作十分困难的时期。党正通过一切能利用的社会关系，吸收新的血液，坚持工作。他因一向和党内许多同志接近，党组织知道他的政治立场，又看到他在大革命中没有明显出头露面，没有担负过什么重要工作，不易引起别人怀疑，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于是有人和他接头，要他接受党领导的互济会工作，他自

党、自动地答应了。半年左右的互济会工作，使他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与考验。开始为朋友收尸，以后为一切死难烈士收尸，跳出个人友谊的范围，升华到阶级的爱，他的觉悟在步步提高。同时，他的行动也一步步引起反革命的注意，社会上有了“流言蜚语”，学校不敢聘他教书了，也没有学校敢留他住宿。他开始失业，生活都发生了问题，一切个人打算的幻想都被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打破了。这一切促使他由一个慨慷悲歌的义士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一九二八年初，柳湜同志经当时长沙县委书记吴本德和县委秘书沈绍藩介绍，在长沙城外朱家花园一个群众积极分子秘密会上，提出了庄严的入党申请。随后即被批准入党，并免除后补期，参加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前后，由于长沙的党组织相继被破坏，吴本德、沈绍藩等都离长沙赴沪，柳湜在长沙也站不住脚了，随后便也到了上海。沈那时住南国艺术学院，已参加中央某一部门工作。柳湜到上海即和组织接上了头，和吴本德同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并和中央一些同志谈过话，其中有李维汉同志、熊瑾玎同志。不久，中央即决定派柳湜到安徽工作。

柳到芜湖，安徽省委即留下他在秘书处工作。他以纸烟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往返沪皖，机智勇敢地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八月，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在审讯中，他激昂慷慨，痛斥敌人。后经任弼时同志指示，要他利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避免采取过左做法，争取无罪释放。他遵照这个指示，同敌人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在敌人已经截获物证、有叛徒当面对质和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沉着镇静，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最后被钉上十斤脚镣，投入牢狱。在狱中，他经受了种种折磨，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赢得了同狱难友的信任和爱戴。他在狱中被选为党支部书记，领导同志们进行了英勇斗争，争得了读书学习的条件。先期获释的任弼时等同志通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和各种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向狱中送进不少中外文的政治理论、文化科学书籍，指导和帮助狱中同志开展有组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把敌人的牢房变成了革命的学校。

由于柳湜入狱前已经打好较深的文学、历史、外语基础，加上生死关头对于革命真理的渴望和同狱难友学习情绪的鼓舞，他进步很快，不仅第一次精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广泛地阅读了各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书籍，而且系统地讲授了好几门课程，这奠定了他出狱后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四月底，由于亲友的援救，柳湜同志获释。此时他已没有回湖南或安徽的可能，便先到上海，得到一位本家的帮助，在下等旅馆住了约半个月。后又经他介绍给《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经黎介绍到《申报》老板史量才那里，史又委托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李公朴设法安排，李热情地介绍他去报考自由农场。这个自由农场就是上海有名的第二牛奶公司，那时正招考卫生员，柳考取了，做了一个时期为奶牛测体温、检查消毒、装瓶、洗瓶等卫生工作和广告宣传工作，解决了生活问题。两个月后即通过温健公同志找到社联，和金则人、马纯古、陈依非等同志谈了话，旋即参加社联工作，并经过社联党组织的批准，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久，他就离开自由农场，到了申报流通图书

馆，由此开始了公开的党的文化工作。

申报流通图书馆拥有三万读者，并附设各种外文、文化、技术夜校，学生也有几千人，很有群众基础。内设读书指导部，是组织广大读者学习的中心，对社联其他群众学习的组织，也起了一定作用。指导部负责回答读者在学习上、生活上提出的问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等方面，采取直接通信的方法，并在《申报》第七版，辟了"读书指导"专栏，选择带有共同性质的问题，公开回答、讨论。利用这个小小的地盘作社会科学通俗的传播、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主义等政治宣传。这项工作很快引起了群众注意，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其结果是，"经过一番指导，低级趣味的读物，在借书统计上垂直的下降，高尚的文艺书籍笔直的上涨，同时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栏上也有巨大的增长。"① 工作发展很快，指导部也一天天扩大。社联将艾思奇、夏征农同志介绍进来，于是由艾思奇主持哲学问题，夏征农主持文学问题，柳湜除原任指导部主任外，还主持社会科学。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申报》"读书指导"专栏被国民党禁止，史量才先生被特务暗杀，柳湜等同志即被解职。于是，由李公朴、柳湜、艾思奇和夏征农另组《读书生活》半月刊，他们都任主编，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以后又由杂志扩大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同时，柳湜和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关系也很密切，为生活书店出版的许多进步刊物，如《大众生活》、《新生》、《永生》、《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撰稿；还为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撰稿。一九三六年他参加邹韬奋在香港主办的

① 《读书生活》第1卷第10期，1935年3月25日。

《生活日报》的编辑工作，主编《生活日报》的《星期增刊》(第九期起改为《生活日报周刊》)，并为《生活日报》的"前进"专栏写过不少文章。

这一时期，柳湜先后担任过社联内部的宣传工作，给工人讲课、作报告，而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则是与上海文化界广泛地接触和联系，做上层文化界统战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以前，上海曾有各种以抗日救国为中心活动的聚餐会、编辑人会等等组织，柳湜是受党的派遣到其中进行工作的党员之一。他和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史量才、杜重远、章乃器等人保持经常联系，并帮助他们工作。以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救国会上层领导工作，并参加救国会在"七七"事变以前各种活动。其中最重大的有声援"一二九"运动，沈、邹、陶、章四人宣言，抗议"七君子"被捕等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柳湜同志受救国会委托，陪同李公朴赴山西、山东等战区前线劳军。过南京时和党在南京的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和叶剑英等同志见面。到太原时，通过太原党的办事处和延安取得联系，同意柳到汉口创办《全民日报》。后来日报未办成，改办《全民周刊》，他任主编，胡绳、林默涵同志参加编辑工作。此时救国会改组，柳湜同志任救国会中央执委，兼文化部负责人，协助沈钧儒领导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和汉口文化界活动，又在汉口主编了"战时社会科学丛书"，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版了曹伯韩、张仲实、廖庶谦、许涤新和史枚等同志撰写的五本书。一九三八年七月，《全民周刊》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邹韬奋和柳湜任编委，由邹韬奋、柳湜任主编。武汉撤退后，《全民抗

战》移重庆出版，并由三日刊改为五日刊。重庆被敌机轰炸后，又改为周刊。这个刊物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从一九三四年出狱到主编《全民抗战》的七、八年间，柳湜同志以他特有的风格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在进步的文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柳湜同志在这几年中所写的文章的精华，集中在《社会相》、《街头讲话》等十一本论文集或小册子中，它们曾刊登在《读书生活》、《全民抗战》等十几种进步报刊上。在他出狱一年后（一九三四年五月），以柳辰夫的笔名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怎样自学社会科学》。作为李公朴主编的"自学丛书"的第一种，经章乃器校阅，并由李公朴写了编者序言。李公朴赞扬此书能够从群众实际的日常生活问题出发，用真实的话谆谆鼓励他们去自学社会科学，并对于读社会科学这类"硬性书"的顺序和方法提出了一个光辉的实例。这本书对于提高广大群众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将社会科学通俗化，把它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起了开拓的作用。柳湜在"自序"中表示："关于社会科学大众化，目下实在还差得甚远，作者今后甚愿在这方面更加努力，从事通俗编著。"后来的事实表明，柳湜同志认真地、卓越地实践了这个志向，在向广大群众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面作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街头讲话》一书，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当时在

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① 除了这本书以外，本文集中选载的《社会相》、《柳湜论文选》等六本书，本文集中未选入的《怎样自学社会科学》、《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常识》和《世界现势的故事》② 四本书，和散见于各进步报刊上的其他文章③，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通俗而又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读物，从内容、形式和风格上有如下六个特点：

（一）"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

柳湜在《怎样自学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出的这个原则贯穿他的一切论著。邹韬奋在谈到柳湜的《街头讲话》时指出："柳湜先生的文章有个最大的优点，那便是文章的内容充满着实际的'生活经验'。"韬奋认为："解释社会科学的人往往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满篇文章里堆满新名词，而内容却很贫乏，尤其是和现实离得十万八千里，使读者感到研究社会科学是硬着头皮多记些和现实不相干的名词原则，是所谓学者的专利品，不是一般人的事情，甚至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神秘的东西。柳先生这本书可以打破这个误会，是研究社会科学入门的一本好书。"④

关于理论和实际的生活经验应当联系起来这点，柳湜在《街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80 页。

② 以允一的笔名为少年写的一本社会科学书，属凡容主编的'少年的书"丛书中的一种，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出版。

③ 本文集选收二十四篇文章，辑为"《回乡杂记》及其他"。

④ 见1936年6月14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二号，以落霞的笔名写的"书报评述"。

头讲话》的"前记"中说得很明白。他说："在中国社会科学还未能变为街头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同时街头人一天天急切的要求着它，也同样的是一件事实。《街头讲话》就是想按着目前的街头的人的需要，对于街头人应当知道的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方面，作一点随随便便的讲话。"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柳湜的文章总是同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的放矢，满腔热情地回答"街头人"提出的种种实际问题，启发、诱导读者为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而读书、学习。《读书生活》杂志的宗旨就是如此：从生活的需要出发读书，通过读书解答生活中的问题。《读书生活》杂志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发行量达数万份，这和刊物认真贯彻其预定宗旨是分不开的。柳湜在该刊"读者问答"栏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答读者问"，大多收集在《如何生活》这本书中。李公朴先生特意为该书写了序，他指出："他的文章是在说他要说的话，所以明白易解，不带任何方巾味，读起来，平淡自然，……与实践融成了一片，只见热情奔放。"说他"那样热情，那样细致、浅明的文字，在现在是很少的"，"这样方足以指导青年"。柳湜就是以这种感人肺腑的真实热情，为千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青年指明了方向。他从工人失业、学生失学、封建家庭悲剧、婚姻悲剧等具体社会问题入手，引导青年从个人的苦难而体验阶级的、民族的苦难；从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洞察其社会根源；从求个人解放升华到争阶级的、民族的解放，从而一步一步地树立起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最最主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一种为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战术的哲学。""针对大家正感到的是什么，就给他们什么，通过他们迫切要知道的东西，而达到说

明我们正确的国策。”他就是本着这条根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广大群众的实践多方面地、多层次地、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挂起钩来，生动地体现了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辩证法。

（二）“从针鼻孔去窥世界”

柳湜说过：“我是惯会从针鼻孔去窥世界的。”也就是说，他善于从具体的小事情入手使群众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例如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深奥的道理，以及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劳动、资本等科学概念，他便是通过人人拿三个铜板就能买来享用而且天天离不开的一盒火柴揭示出来的，那样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文字就是念给不识字的老百姓听，也能引起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理解和强烈兴趣。

有人指责这种文章“浅薄”，不入“大雅之堂”，柳湜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正是适应中国人民当前的实际需要。李公朴说得好：“题材越小，写得越细致，就越动人、可爱。”“也许作者的最长处，还是在写小题材的方面吧。”

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适应群众的接受水平，他不仅对所谓小事加以“一事一议”，而且往往对同一件小事“一议再议”。他把这看作是“思想理论上多方面的游击战”，通过这种游击战，才能把一件事情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揭示清楚，从多方面肃清反动宣传的影响，如对“科学小品文”一论再论，对“绿色小书房”的茶会一谈再谈，对“亡国论”、“速胜论”、“投降主义”、“关门主义”一批再批，都有其深刻的用意。他还深深懂得，要把那些受反动宣传毒害的人们，从一种错误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宣传的真理，就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反复

地做工作，不厌其烦地就同一题材写许多小文章。

这样做是不是就带有片面性呢？其实不然，柳湜在一事一议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议绝对化，而是把所议的事、理都放在事物普遍联系与不断发展的适当位置上，这就避免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而且，若干篇谈同一问题的小文章自成一组，便带有某种系统性；若干组文章汇集在一起，更带有某种整体性，给人们提供比较系统、完整的社会科学知识，如《社会相》、《街头讲话》、《柳湜论文选》等书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他说过："我们从日常思想的碎片中，是可以发现哲学的踪迹的"，"哲学是一片打开认识之门的钥匙。"他就是从一点一滴的生活经验、从日常思想的碎片入手，把群众一步一步地引入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辉煌殿堂的。

（三）"正确地把握客观实践当前的一环"

为了使理论切实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柳湜特别重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链条"和"环子"，尤其是正确认识和紧紧"把握客观实践当前的一环"，即客观事物发展的现实的因果关系和当前所应当做的事情。

在《如何生活》一书中，柳湜诚恳地指出一些人的"青年病"、"幼稚病"，说他们"对于理想的实行过于激情，但对于实践中的环子不能抓着"，他们"不是陷入悲观绝望的幻想，就是变魔术似地一味蛮干，结果碰伤在一个个大钉子上"。在论述提倡大众语而不应忽视方言土语的问题时，他主张多元地发展方言土语，作为把握中国语言发展"现阶段的一环"，把中国语的拉丁化看作是未来的一环；他在谈到人的自信心的客观根据时，强调要"正确地把捉住客观实践当前的一环……并创造一切可能性，创造

下一环子的顺利发展的条件”；他在谈到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时，强调“为了达到总的目标，在客观的过程中，每一环有每一环的实践和具体的方略”；他在谈到思想工作时，强调“要切切实实的注意实际社会生活的开展的每一环子、多面的活泼的去加以研究”，而在实践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每一时代的环，并往下推移下一环”。总之，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能忽视这艰难路程中每一个链和环，在各个瞬间，为要维持链的全体，并且坚决准备推移到下一个环，就不能不用重力去抓住那个链子的特定的环”。

只有循着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才能把握柳湜每一篇文章的真谛，才能理解柳湜的文章何以有那样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战斗气息，何以能够推动实践并且真的推动了实践。

(四)“松树的坚定性和柳树的灵活性”

柳湜同志在和人谈话中，常常把他所喜爱的两种美德比之于松树和柳树。要象松树一样坚定，永远保持革命的气节；要象柳树一样灵活，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生长。这两种美德既体现在他的人格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又看到，他十分注重获取这种胜利所需要的灵活机动的策略、方法和步骤。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很有说服力地批判了党内严重存在的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对于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论持久战的方针和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证。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救亡的基本认识》、《实践论》和《国难与文化》这三本书中。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系统地论述了全民抗战的

任务、联合战线的政策和深入大众的工作方式；第二本写于一九三六年，它从理论上回答了抗日救国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挖掘了关门主义的认识根源，即认识上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幼稚病"，强调把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结合各种活动的特点渗入到广泛的实践活动中去；第三本则把以上两书的中心思想在文化问题上作了十分精辟透彻的发挥。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柳湜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文化运动的特点作了分析，指出以往中国文化运动的弱点，在于它的早熟性，它是"一种远跳，中间一段一段跳过去，现出许多早熟的不健全的现象"，只是极少数人往前走，脱离了人民大众，形成超文化运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空喊口号，作政治的尾巴；第二，由于这种远跳，中国的文化出现不正常的两极分化，只有"左"的文化和右的文化，而没有"中间文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今日的思想文化运动要总结过去文化上的一切阶段，补充过去未完成的工事，发展过去的工事。"这个运动不仅应比"五四"运动有更大的范围，而且比"五四"运动有更大的自由，"从横的方面扩大我们的范围，从纵的方面深化我们的工作"。柳湜的这些见解不但切中那时的积弊，而且对我们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科学小品文"和"科学大品文"

柳湜的文章不仅在事实和立论上力求科学性，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而且还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赛先生"，强调学习近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为了使科学知识尽可能为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众所接受，他同陈望道、夏征农等同志一起，大力倡导"科学小品文"。"科学小品"一词最早出现在《太白》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时间是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这是指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

一种文体。柳湜的《论科学小品文》是我国第一篇专门论述这种文体的文章。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看到这篇文章以后，深受启发，从此走上专业科普作家的道路；在每期《太白》和《读书生活》的"科学小品"栏内发表文章的还有周建人、贾祖璋、顾均正等专写自然科学小品的作家，有以写哲学小品为主的艾思奇、胡绳等同志，有以写社会科学小品为主的曹伯韩、廖庶谦等同志。柳湜的绝大多数短篇都是以这种文体写出的，内容涉及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

"科学小品"用文学的趣味的笔调，以"片断的文字传达一点一滴的科学知识"，并没有因此而贬低高深的科学理论即所谓"科学大品文"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除了单篇论文的总和带有某种系统性以外，柳湜还写了《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常识》这样通俗而又系统地讲述社会科学的读物。前者以"半瓶醋对毛丫头"写信谈心的形式，系统地讲解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后者则是一本系统完整的社会学自学读本。这两本书都正确地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综合方法，即"对于社会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构造，先从简单的东西开始，然后在这简单的东西上一层层加上较复杂的东西，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这复杂的整体"。

(六)使理论"中国化"、"大众化"、"形象化"

柳湜的文章发挥了那样大的社会影响，是同他特有的见解、风格分不开的。

他努力使外来的先进理论"中国化"，他认为"真理是具体的，一切外来的优秀的思想、学术，要通过与自己民族、与民众的血肉相联结，才能发扬光大，变为自己的文化，不是抽象的教条，

它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变为中国革命需要的东西”。他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他善于使艰深的理论大众化、通俗化，真正做到了李公朴所要求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通俗而不庸俗，易解而无妨理解”。他“处处在求写得好懂些，有时宁可减少一些文字上的美，却不想使意思朦胧、晦涩”。

他也力求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他说：“我在和一些知识大概不相上下的朋友们讨论一个什么理论上的问题时，总觉得抽象的理论不容易了解，在大家聚谈中，越说得具体些，越说得好懂，越博得大家会心的微笑，越说得抽象，越说得象‘煞有介事’，面孔上登时就减少笑容，认识的门对于大家好象是高不可攀的，这是我的生活经验。”这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

柳湜在使理论“中国化”、“大众化”、“形象化”的努力中，十分重视表达的趣味性，探求“旧的形式中抓住观众的所在是在哪里？”他甚至主张：“我们要研究一切低级趣味的艺术，分析它们构成的要素，批判的去吸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去诱导群众。当然，这种趣味性不是迎合低级趣味，而是注意用艺术的手腕、生活的情调去调和枯燥艰涩的知识。”

此外，柳湜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文体，他“向十个不同程度的人讨论读同样的书时”，“可以说出几种不同的话来”，结果是“正中下怀”，皆大欢喜。他总能根据对象的特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文，或引人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一笑，很帮助了他对于真理的接近”；或引人流下伤痛的泪水，这一哭，更帮助了他对于真理的体验。

列宁说过：“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

写作"①，柳湜实践了列宁的这个思想，在为人民大众写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列宁还说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条道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② 柳湜也很好地记取了列宁的这个教导，为使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灌输到千百万群众的心坎中去，他作出了许多创造。收集在本书中的所有著作和文章，至今仍然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巨大启示。

当然，收入本集中的文章，并非所有的提法都是完美无缺的。有些提法受当时政策的影响，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未免有简单化和不确切之处。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三

正当柳湜同志在抗日救亡的理论宣传和文化运动中达到光辉的顶点时，由于新的工作环境的新的需要，他的工作领域一下子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几乎全部转向教育事业。

柳湜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离开重庆，于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前数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由于上层统战工作的需要，党没有让他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救国会中央执委的面目出现，党的任务直接由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同志个别下达。开头几个月，以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名义，代管在延安开设的华北书店。一九四二年春到马列学院思想研究室任指导员。同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被选为边区参议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05 页。

员，边区政府委员，主要工作是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直到一九四六年止。

柳湜到延安后，毛主席曾指示他：知识分子缺乏实际，要到实际中去。你最好做一两年厅长，再做做粮食局副局长、副专员、副县长。毛主席风趣地说："为什么要做副的呢？做正局长恐怕弄得大家没有小米吃了。"毛主席的具体建议虽然后来没有实现，但毛主席的亲切教诲却使他深受感动。他意识到自己过去长期在白区从事文化界上层工作，接触工、农、兵群众比较少，是一大缺陷。他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基层群众的实践中，在各根据地严酷的斗争中，进一步锻炼和改造自己，努力做好党交给他的教育工作。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柳湜随边区政府撤退到冀中，次年任冀中教育厅厅长。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柳湜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一九五三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和《人民教育》杂志的主编，担起了具体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重任。他以废寝忘食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就在党需要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也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来为之奋斗的时刻，正在他为贯彻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通过的路线而辛勤工作的时刻，一个无从想象、无法预防的沉重打击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这位具有渊博的学识，难得的党内专家，这位胸襟坦白、可亲可敬的同志，竟于一九五八年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划成了"右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他在经受了无情的批斗之后，被送到园林队劳动改造。同那些勤劳朴实的劳动者生活在一起，使他的头脑从痛苦的深渊

中得到暂时的解脱。大自然的温暖，普通群众的同情，劳动后出了一身汗的轻松，各种农活的劳累和技巧，都给了他一种少有的"清明无染的境界"。他把自己对党的永恒的爱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就算是在战场上无意中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了吧"，他这样想着。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党的四十周年大庆的前夕，他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他说："在物质上，一切废旧物品尚可加以利用，制成新的物品。象我这样一个人，也不应自暴自弃，应完完全全地理清身上尚可供社会主义建设的素材，使它在将来发挥作用。""我希望将有一天我能够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担负起更为艰难的任务。如此而已，别无它求。"不久以后，党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在教育科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他带着深深的创伤和多年的疾病，又顽强地工作起来。他一心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系统地总结、研究和撰写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史，并打算撰写教育学理论专著，为党的教育事业竭尽余力。

可是，在一条不断"反右"的左倾路线之下，在这条路线掩护着一伙凶恶的野心家的时候，等待着他的又能是什么呢？难道一个本来有功无罪、被迫"低头认罪"而又表示"戴罪立功"的人，也容不得吗？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对这场大风暴的来临，柳湜同志似乎抱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十多年来，他亲身体验到，在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它象病菌一样，吞食着民族的精华，侵蚀着党的肌体，也许现在是应当彻底清理一番的时候了吧！他已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但仍坚持上班学习，看大字

报，参加允许他参加的各种会议。他的身体本来虚弱。幼年家境贫寒，青年苦学无度，十七、八岁就得肺病，经常咯血。狱中备受摧残，几乎致死。解放后，体质有所增强，但终因积劳，又添了心血管硬化、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特别是美尼尔氏症加剧，身体常失平衡，多次摔倒街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尽最大努力上班。每天吃晕海宁片，由家人伴送上公共汽车，中午又由家人到车站把他接回。后来实在坚持不了，才留在家里写材料，接待全国各地的来访者。为了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他把自己刚上完初中二年级的女儿柳芳送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经常去信鼓励她正确地对待各种困难，过好生活关、劳动关，虚心向农场职工学习，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贡献力量。

可是，林彪、"四人帮"这伙"文化大革命"的暴发户，伙同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凶残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康生和江青亲自出马，掀起了"揪叛徒集团"的妖风，阴谋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而株连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扫清他们公开复辟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最大障碍。在这股妖风之下，一个善良多病的老人也不能幸免。

柳湜同志被敌人逮捕、刑讯、关押的一切情况，已如上述，早就如实地向党作过汇报，经过中央组织部的严格审查，已经作出没有任何问题的正式结论。但在康生、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柳湜同志被一些人突然抓走。他们无视党纪国法，私设公堂，逼柳湜同志承认是叛徒，并逼他把狱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一概说成叛徒。但是，柳湜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尚且未曾低下高昂的头颅，现在岂能从他的嘴里捞

到半根稻草！暴徒们一方面继续施加压力、进行逼供，一方面抛出所谓“宣布把长期隐藏的大叛徒、老右派柳湜揪出来隔离审查”的大字报，声称“一九五八年，在康生同志的指示下，柳湜终于被揪了出来，被划为右派分子”，为更加残酷的暴行制造舆论。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动摇他的信念。

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日夜思念敬爱的周总理。他曾经在周总理的领导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和文教工作，对总理的崇高人格十分敬重。现在必须尽快让总理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他趁小女儿柳霞送饭的机会暗示，赶快报告总理，火速向总理告急！！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把持大权的情况下，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声音，是很难到达总理耳边的。告急电还没有来得及送上去，审讯突然升级了。柳湜同志预感到毒打随时有使他丧生的危险。四月二十一日早晨，他趁小儿子柳健来送饭取暖水瓶的机会，用糖纸包着一封短信塞在暖水瓶内带给爱人于立修同志，信中说：

> 十日不见，有如隔世，每逢送饭，想到把你捆在做饭，如何是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自愧没有做事，未受到锻炼，对不起党。现在算是下一点毛毛雨，算不了什么。但我要向你坚决表示，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的黑秀才、后台，在科研所没搞什么鬼。我相信党和群众，总有一天，会搞清白。我坚决接受一切考验（包括皮肉）……
>
> 由于近日血压一定很高（未量），恐有意外，我怕未留一字，将成永恨，特写这封短信。万一出了事（我不会自杀），你一定要更坚强……注意身体，心情开朗，忘记我。儿女一定要走工农道路，过艰苦生活。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凶残的毒打落到了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身上！几条身强力壮的汉子轮番用木棍狠狠抽打，柳湜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发出一阵阵惨厉的嚎叫，直到午夜以后，才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第二天凌晨六时五十分，人们看到柳湜同志的遗体脑浆迸裂，大腿骨折，臀部青紫，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接着，又有人抛出柳湜同志"畏罪自杀"的大标语、大字报，更加阴狠地鞭打柳湜同志高尚的灵魂。

柳湜同志惨死后，在清理遗物时，在棉被的角里，发现一个小小的纸条，是从小语录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空白页，上面字迹颤抖，字不成形，赫然写着十六个字：

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为我申冤。

这张记载着林彪、康生、"四人帮"滔天罪行的纸条，显然是在柳湜同志英勇悲壮、坎坷惨痛的一生行将终结时写下的。在那些最黑暗的岁月里，他深知被株连、被歧视的家属不可能翻此血案，但他坚信党一定能够坚持真理、坚持光明，人民终归能战胜邪恶、战胜黑暗。他怀着这种崇高的信念，为真理、为光明、为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四人帮"倒台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柳湜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八宝山灵堂为柳湜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词中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

柳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文化知识；他对敌斗

争坚定，对工作勤勤恳恳；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善于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热心培养干部，十分关心青少年的进步和成长；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四十多年来，柳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懈，献出一生。

柳湜同志的著作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共产主义精神。

柳树滋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柳湜同志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 柳树滋 1

——《柳湜文集》前言

如何生活(节选)

本书的特点(代序) …………………… 李公朴 3

如何生活 …………………… 5

青年病 …………………… 11

小雀子要认识世界了 …………………… 18

怎样认识人 …………………… 26

做事的态度 …………………… 33

不能跟阮玲玉走 …………………… 41

论所谓“桃色惨案” …………………… 50

人和环境 …………………… 55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 61

叶青先生的方法论 …………………… 67

李权时所处理的实际问题 …………………… 76

阿Q的精神胜利 …………………… 85

七分经济三分文化吗? …………………… 92

投河殉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98
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104

社会相(节选)

前记 ……………………………………………………………113
浅薄 ……………………………………………………………116
开卷有益辩 …………………………………………………118
最大的布施 …………………………………………………122
“亮”……………………………………………………………124
新年巡礼………………………………………………………126
实用主义的破产 ……………………………………………131
总结算…………………………………………………………133
既成事实 ……………………………………………………135
痴子赞…………………………………………………………137
响炮酒…………………………………………………………139
一件惊人的拍卖消息 ………………………………………141
吃鱼运动………………………………………………………143
服侍不易………………………………………………………145
反对地图上“满洲国”………………………………………147
诡辩论…………………………………………………………149
冤狱赔偿………………………………………………………151
威尔逊主义……………………………………………………153
隐 ………………………………………………………………155
学字 ……………………………………………………………158
低级趣味 ……………………………………………………160

捡糖果吃……163
卫生臭豆腐……166
同归于尽……169
逃……171
国货城……173
灾荒的年代性……175
侨乐不乐……177
新出版法与杂志年……179
永庆里惨剧……181
航空奖券宣传飞行……183
急惊风遇着慢郎中……185
集团出家……187
历史的教训……189
自动减租……191
看救命去！……193
拒用“她”字……195
一天的日记……197
介绍白朗女士……200
同情和谅解……202
流亡图……204
沉默新义解……206
摸·射·捧跤……208
孩子的愚问……210
民变……212
行动中才能有团结……214

算旧账加新股……………………………………………………216
捉与逃 ……………………………………………………………218
暗杀 ………………………………………………………………220
集团主义 …………………………………………………………222
愧汗 ………………………………………………………………224
妇女在非常时……………………………………………………226
第三条路 …………………………………………………………228
庆祝·期望和要求 ………………………………………………230
丑剧 ………………………………………………………………233
理想的小型报……………………………………………………235
是学潮吗？呸！ …………………………………………………238
教训 ………………………………………………………………240
警告《大公报》…………………………………………………242
中日这时还有交情谈吗？ ………………………………………244
不要夸大外交技术 ………………………………………………246
惊人的统计………………………………………………………248
狸猫换太子………………………………………………………251
侵略者的作风 ……………………………………………………253
拆毁人造的墙壁 …………………………………………………255

街头讲话

前记 ………………………………………………………………259
关于街头讲话……………………………………………………263
生活经是什么 ……………………………………………………267
生物的家 …………………………………………………………271

愿不愿由你……275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279
如果人类停止了劳动……284
从这里拆穿西洋镜……289
一盒火柴内藏着的秘密……293
它的身分……297
为啥一盒火柴会有钱赚……302
"你要装给我看"……306
仅有小聪明造表……310
常百万的故事……314
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虫"……318
从离地较近的谈起……322
由"国际大饭店"说起……327
三大悲剧……331
总算是进了一步……335
毁掉那把交椅以后……340
不是垃圾不成堆……345
政治上的狸猫换太子……350
巴力门……355
闲话衙门……359
冷门……365
解一个谜……370
又在另一种人口里喊出了……376
扫台戏……382
新的时代的序幕……387

再向上一步……392
行为的标准……397
力量和勇敢……402
十七世纪贵妇的恋爱……406
可尊贵的傻气……411
巷堂内的风波……415
吮啥神奇……420
人造的神……425
神秘都是从赌场中来的……431
怎样去说服他们的成见……437
少见多怪……443
把戏弄穿了……449
艺术是什么……455
什么时候就有"绮雅海"……460
私家花园和将来人类的花园……466
怎样使它成为教育的工具……472
哲学的踪迹……477
她的气量……482
最大的"口舌"……487
作为解放自己的战术……493
赛恩斯先生……498
赛恩斯先生在苏联……503

柳湜论文选(节选)

《布赖斯特条约》的教训……511

《土地公有案大纲》探讨……522
胡适的话不能代表中国大众的公意……529
如何通俗化……535
论科学小品文……543
我对于科学小品的一点浅薄的认识……547
能不能再写的好懂些……559
汉奸论……563
施剑翘女士的愚孝……570

救亡的基本认识(节选)

前言……577
把千万颗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579
民族联合战线发展过程的私见……584
联合战线下的理论斗争……593
联合战线在文化界……598
再论联合战线在文化界……604
当前文化运动的工作方式的问题……611
一个特殊环境的救亡运动……618

实践论

前言……627
实践论……629
幼稚病……634
"清一色的公式主义"……641
"太狭隘了"……649

用新的尺度看人……654
关于态度……658
杂志论……665

国难与文化

几月来的感想……683
什么是思想运动与文化运动……687
从五四运动到今日……694
当前文化运动中的病症……708
中国文化运动新阶段的浅见……715

《回乡杂记》及其他

《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自序……727
认识论……731
"狗口里吐不出象牙来"……735
怎样自学经济学……739
《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弁言……744
回乡杂记……747
小百姓怎样救国呢？……788
乡村宣传工作方式之一例……791
在抗战中怎样学习中山先生的全部遗教……798
长期抗战中关于学术研究诸问题……808
关于政治研究……814
评林语堂《日本必败论》……820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824

不可忽视的汪派叛逆的卖国理论 ……………………830
高尔基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838
寄战斗中的老乡 …………………………………………841
吊蔡孑民先生 ……………………………………………843
牢记先烈遗言 ……………………………………………845
——为纪念黄花岗革命先烈
从鲁迅先生论章太炎忽而想到 …………………………848
论中国化 …………………………………………………851
《社会学常识》序 …………………………………………859
我们这一代正需要的精神 ………………………………861
韬奋逝世十周年 …………………………………………867
"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 …………………………872
——学习韬奋的编辑工作经验

写在《柳湜文集》的后面……………………………胡　绳 882

如何生活

李公朴主编，读书生活丛书：《如何生活》（读书问答第一集），一九三五年上海读书生活社出版，收文章十七篇，本书选印十五篇。

本书的特点(代序)

李公朴

我爱读本书作者写的文章，因为他不是文章家，他的文章是在说他要说的话，所以明白易解，不带任何方巾气味，读起来，平淡自然，虽不在卖弄学问，但理论的深厚自然可见；虽是纸上的文章，却因与实践融成了一片，只见热情奔放，这是本书作者的文章的特点。

至于“读书问答”呢？那更是他的文章中最可读的一部分。“读书问答”开始在《申报》发表，每日有文章一段，本书作者就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许多人都爱读它，用不着在这里赘述。

本书内的文字，却是《读书生活》第一、二卷上发表过的选集。全书计十七篇。这些文章都是按照读者的来信，选择有一般性质的，先经过编辑部同人的讨论，凡是关于实际生活的问题，就归本书作者主撰。所以这本小册子的特性，就是集中在讨论生活，虽然讨论的范围有个人的，有民族的，有实际生活的处理的，有偏于意识形态的，总之，是以认识生活为中心，要达到用理论去指导生活，改善生活的目的。

这十几篇文章，有几篇文章是曾经轰动过一时的。如《不能跟阮玲玉走》的那一篇，曾经引起了广大的注意，我们收到的来信就不少。那确是一篇对于认识阮玲玉自杀这一社会现象写得

最深刻动人的文字。《青年病》那一篇在我看原稿时，就很受感动，觉得要这样诚恳的态度，那么热情，同时认识又正确，是不容易的，要这样方足以指导青年。果然，人同此心，读者写信来告诉我们，说读了这篇文章感动得流泪的就不少。其次，如《怎样认识人》、《做事的态度》二篇象这样科学的指导处世的文章，我敢说，是很不容易见的。

《如何生活》、《小雀子要认识世界了》、《人和环境》诸篇，我都高兴读，都是值得介绍的文章，以外的许多篇涉及的范围较大，有的关于民族出路，有的谈认识的方法，有的论及中学生的生活，都是深刻有力的作品。不过，就我个人说，我总觉得题材越小，写得越细致，就越动人，可爱。凡是说大道理，谈学问，就对人有些肃然的感觉，虽然我同样看重这些篇文章，可是我最爱的倒是前面举出的那许多篇，也许作者的最长处，还是在写小题材的方面吧！

我与本书作者共事已两年多，素来是没有客气的，以前我对他的文章，常常表示不满，觉得写得太生硬，欧化，也常常替他改稿，引起过小小争议的事，也是有的。可是两年来，他一天天地作风在改变，通俗与流畅的程度，我们可以在他先后写的文章中看出来，到现在，我感觉到象他那样热情，那样细致、浅明的文字，在现在是很少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两年来，不断地与上万的读者层的接触的结果罢！"读书问答"在《读书生活》中是被人认作最满意的一栏，果尔，我要谢谢本书作者，同时并把这本小册子介绍在没有读过这些文章的人的面前。

如何生活

——答烧饼迷，萧强君等

最近有许多朋友对《读书生活》提出了一些批评，关于生活方面的，我们可以拿这位署名烧饼迷的及萧强二君为代表。烧饼迷君说："我没有见到《读书生活》上有生活的介绍；我没有见到《读书生活》上有生活的指导；我只见到一些读书与生活的记述，诉苦，甚至于夸耀"，最后他希望我们将"所提几点，提出讨论"，"能为介绍工作，可请代为谋一维持生活之位置"。萧强君则因生活无法维持，又不肯做自己不愿做的"生活"，觉得人生甚无兴趣，但同时又"无勇气去自杀"。萧君说"我怎么办呢"？《读书生活》上并未给他解决的方法。他要我们给他明确的答复。

以外，我们还常常接到有些更不幸的朋友，在预备自杀前写给我们带血的信。这一概可以归并到"如何生活"这一问题里去。

烧饼迷君对本刊的批评，在原则上，我们应接受，因为《读书生活》共出了九期，对于活鲜鲜的生活指示似乎是太少了点。但是，烧饼迷君对于本刊的认识，却完全与我们两样，却不可不为之辨别清楚。《读书生活》对于生活的指导不是极狭义的介绍职业，解决某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就更广大更一般的认识生活，确立正当的生活态度。我们指导的方法，不是从自己的荷包内拿出

几个洋钿，或代为找一个职业，而是指示一些生活的逻辑，即一方面指示读者从读书去认识生活，一方面从生活中去展开认识。所谓生活指导，即在引导大家一面学习生活的知识，一面如何去从事生活奋斗，所谓“生活的介绍”，我们当然只能做到目前“生活记录”的限度，使各种不同职业生活的人，多认识一点生活相，不能是介绍职业。因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困苦，大家感着生活难，因此“生活记录”中，不觉好象是“诉苦”，没有笑嘻嘻的面相。但我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何必要装作苦笑说快乐呢？这一点，与某报说我们要把这些店员学徒，喊出店铺，犯了同一的错误。

所以，“读书生活”四字不能分开来了解。专门了解上面“读书”两字，或者专门注意下面“生活”两字，都是不够的。整个的说，无论是读书或生活都是为的了解生活，加强生活奋斗的能力与毅力。

不能做到介绍职业，《读书生活》中的生活指导就真的没有实际的意义了吗？不见得吧！象萧君及许多其他朋友的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很关重要。这些在烧饼迷君的眼中看来，好象是太空洞了，但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恐怕要比解决一个个人的饭碗还要来得大些。因此，本刊对于生活指导，决不会因不能解决某几个人的饭碗就认为是空谈，无意义。恰恰相反，我们觉得要做得应该比烧饼迷君所希望的大一点，因为对于这些穷朋友个人的帮忙，虽然，千万的应该，可是个人的力量终是有限，你能满足几个人呢？即令对于少数人一时的失业解决了，但是，是否这一问题真的解决了呢？真的解决得了呢？这种态度对于大家生活的认识是否就算正当呢？

我们以为这完全是实用主义对于生活看法，不能说是最合

理的。

书归正传吧！现在要来同萧君讨论“我怎么办”了。按来信，萧君是中产家庭破落下的青年，学历是毕业过中等学校了。以前的生活是完全依靠父母，对于世事是从来不大关心的，到了现在，家庭不能维持了，不得不将大家庭分开，兄嫂归兄嫂，母亲回娘家，小妹妹跟姨母去，自己呢，是带着老婆“不知怎样办”。但是萧君真的就没有生路了么？不！他说，“有些生活我不想干，如家庭教师，店铺管账之类”，“有些生活我干不来，如要吹牛拍马的差使”，“铤而走险，我又受道德、法律、身体等限制不能干”。这里的几条路中，至少家庭教师，管账这条路也还是萧君的生路。为什么萧君不能干呢？萧君告诉我们，他最怕同阔人和商人见面，他还说：“放下自己十一岁的小妹妹不教，忍心把她送到姨母家去过‘大姐’一样的生活，自己去教人家的少爷小姐，心里怎能放得下！”他又说：“父亲在世时，自己开了许多大店，现在都归了人家了，反去向他们要饭吃，你说死脸不死脸？”这就是萧君不想干的理由。

是的，萧君对于自己这种生活态度，也自知是死路。他还想活，所以他并未绝望，他告诉了我们，这一两年来他读的社会科学书已不少，他总觉得书上说的总不过是书，对于他的生活，很少裨益，就是看了“六七期的《读书生活》以后”，也依然得不到“解决的方法”。

萧君，我们对你万分同情，因为象你这种生之苦闷的人，现在真不知有多少，但可惜的是你一两年的读书，并不能转移你那根深蒂固的小所有者的生活态度。你不能把书中指示你的一些认识，拿来去分析你的过去生活，去分析你为什么这样悲哀，

这般颓废，去找求你的将来。家产荡尽了，岂能尽“归长兄不善治理”？一个人是否一定非有家产就不能过活？你那般的自尊夸大，那般鄙弃他人，那般的不肯屈尊去鼓起生之奋斗的雄心，这一切，你知道是根据什么呢？有了这些否定生之要素存在，萧君！萧君！你对人世对自己就不能不都是灰色的了。你不能不显得是一个“孤独者”，你不能不与人世隔开了。

萧君！我们不是要来指摘你个人，而是要追寻你的这种生活态度的根据，告诉你在这种态度下生活，不独是悲哀，并且绝没有生路的。

我们万分诚挚的告诉你，这一副灰色眼镜是你那小所有的“家庭”传给你的，你现在要赶快连同那破落的家产一起丢到爪哇国去。过去的安乐，不要留恋，目前的痛苦不要徒作悲哀了。你应更进一步的去吸取新鲜的生活要素，增强自己生活奋斗的毅力。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这一二年来的读书，是没有收到读书的益处的。因为它没有变化你的“意识”。仍使你安然于这种个人主义的破落的小所有的气氛里，度你那“无可如何”的岁月。你现在应该怎样丢掉这件“长衫”呢：

一方面是要从观念方面下手。就是你应认明目前中国的社会，你要把小所有的破落在时代上去求解释；不，不仅如此，连整个的你的思想和气氛，都要找出社会的根据，再从社会着眼，去谋个人的出路。这样一来，你对于今日的“世态炎凉”，就不会只带破落贵族的悲愤，一点无反抗和忍受的力量。阔人“摆起那一种牛肉面孔”，“商人那狡猾眼睛”，你何必害怕！你认清了社会的出路，认清了个人的出路应与它相一致、于是你确定下你的人生态度了。那末，至于个人的私生活，我想，只要不违背你的生

活主张，你所认为的生活意义，不鬼混，不偷安，不苟且，你为了小我的存在，有什么事不可做，有家庭教师，管账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想去！现在一面教中学生，自己的儿子进不起中学的事有的是，你何必那样女子般软弱，动不动就想起自己的妹子来了。人家的势派管我鸟事！至于到父亲手下的店内去管账，这事在今日欧美许多中等资本家破产后，在以前是自己的经理，现在是大资本家的厂内当经理相同，在外国有的是，"十年兴败几多人"，算得什么！以外，在什么机关供差使，甚至于贩报，当夫役都有什么侮辱？你看见过《桃李劫》没有呢？平日很用功的大学生，结果也不得不卖气力过活。时至今日，什么身份的臭架子还要它何用？

萧君，脱下你的长衫或混身在一群龌龊人群中并与你无什么羞愧，不洁，最怕的是自己龌龊了，或者自己一无目的，对于人生是无兴趣，只是"得过且过"的慢性的自杀。你有了生活的目的，对于个人的私生活委屈一点，又值得什么！

倘若你有了以上的认识，投身生活奋斗，即令就个人说，你会没有生路吗？是的！首先你要活，要养活自己同老婆。我为你设想，你自然不能同社会孤立起来，你不能不保持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还得展开你的社会关系，降低生活标准，抱什么事都干的主张，一有机会，即不放过。有了事做后，能养活老婆自然更好，否则，也可以使老婆去做事，一时找不到事也可以暂时将她送到娘家去住几时，你慢慢的去想方法，使你们最低限度生活费用有着。在做事中，不必怨天怨地，你应咬着牙关干去，去尝人世上的甜酸苦辣。

这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在这种生活狂潮中打一个

滚，不被恶浪打击，沉沦下去，你要有生活奋斗的知识，这知识一方面可由书本上来，一方面要到苦难的实生活中去磨炼。有些人以为在目前谈读书是迂阔，只有到实生活中去，这与专读书不顾实践一同陷于形式的、机械的看法。须知无认识、无意义的生活是受难，会经不起打击，专读书也只会变为书痴子。所以《读书生活》的创刊，我们要与大家交通的，不仅象今日这样正面的谈“如何生活”方是生活的指示，即平日谈“意志自由不自由”及什么问题等又何尝不是生活的教育呢！

总之，象萧君这类的人现在正不知有多少，我们觉得与这同类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本栏以后希望多登载一些血鲜鲜的生活讨论，不陷入离生活太远的理论的探讨。想来在目前的客观上还是很需要的。以后的《读书生活》，除去各栏多充实生活记录、认识的启示外，就将本栏公开的作为将“认识”用到实生活中去，及从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吧！

青 年 病

——答邱玉铭，何楚，余桂山君

最近我们接到三封在实生活奋斗中败北者的来信。他们都是十分有为的青年，他们都对于所遭遇的失败，并不灰心，他们一样的虚心，想探讨出他们失败的根源来。因此来信都写的十分诚恳，详尽，并都对自己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有两位还是学生。他们这次撞的祸，是关于文字的。因“文字不慎都被学校开除了”。

其中的一位，是邱玉铭君。他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学校的文字，题目叫做《同学为什么对于时事的不注意？》是针对着教务主任在前一期上发表的《怎样引起同学对时事的注意》而写的。里面因为宣露了一点学校的丑恶，用了“帝国主义”以及“我们要做人，要认识真理”等词句，而被认做捣乱，无理地被学校开除了。

另一位是何楚君，她是一位女性，在高中念书。因为她的私人的信件被学校训育主任拆看，向学校提出质问，学校对她早生了仇视。最近因为她参加反对禁止男女同学运动，反对禁止蓄发运动等被学校查出，并拿了他在学级壁报上的文字作理由，宣布开除学籍。

这两桩公案，性质是差不多的，所以先摆在一起。

另外一封信是余桂山君等七个人合写的。他们是一家大染坊的店友。内里有作坊工人，学徒，站柜台的“先生”，跑街的等等。他们被开除的缘因是这样的：

近因：是店内紧缩，店中减少工钱百分之二十，并在柜台上裁减店友，总店分店共二十人之多，均代用“练习生”，他们这七个人，聚在澡堂子内商量对付的办法，被一位同事报告了，于是激起经理大怒，将他们当夜逐出店门。

远因：是他们“平日爱读书，尤其是新的文学和社会科学书，读了，口里也喜欢说几句”，“新名词是常常在口头上滑来滑去的”。同时“对于同事，凡是怕事的，一概看他们不起”，他们七个人，“有人目为七大金刚之名”，所以经理早就怀恨在心，遇了这一个机会就先下手了。

这是第三桩公案的事实和经过的大路。

邱君在失败后，他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一点也不诧异，也不怨恨任何个人，我只想从这痛苦的经验中学得些什么。”他对自我的批评，是“浅薄，深切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欠充实”，“不曾认识学校当局和学生间的对立严肃”，“我没任何防备，无准备”，“我对当局的心估计得太宽”，“我没有看见我以外还有全体同学”。

何君自己也感觉，“锋芒太露”，“有了事一点不能忍耐”，“自己的思想不能沉潜隐藏”，“爱骂人”。

余君等七人的缺项，在远因中也大概的说过了。

总括一句说：他们的行为都十分可爱，都还有一些毛病。这毛病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所谓青年病罢！如果站在教育者的见地看来，除开应该随时热忱的加以指正外，是不能加以深责的；

这种病症不是危害生理的恶疾，而是青春期、短速时期中的微恙，只要善为指导，这种微恙的经历反可以助长他将来的生长，达到壮健的前途去。我们现在接受这几位朋友的要求，来在这里讨论，虽然好象是他们的私事，实则我们是不认为这是私事的。

如果分开来考察，先就邱君说，我们对于邱君那节文章（感谢邱君将双方的文章寄给我们）在原则上，除开非常表示敬佩外，实在找不出他有罪过。他是在说真话，句句都是真话。那位教务主任如果真的要想“怎样引起同学对时事的注意”，读了邱君这篇文章，将如何受到感动呢！然而，那篇文章在形式上，确实有毛病，就是过于“心直口快”，在这样的年头，目前的环境，是有妨碍的。如果那位教务主任，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应该将邱君叫到教务室里，谆谆的解释，这种青年的直爽，将会妨害自己的前途，要他以后的发言，行事，一方面固然不要屈服黑暗、掩盖真实、歪曲真理，但同时不能不顾到实际，不能不顾到客观上许可实现我们理想的限度；尤其在词句方面，应该教给他，少用不需要的新名词、新术语，免得无谓的惹出口舌。这一来，方可说不失人师的态度。那位先生，不能出此，诚然是一件憾事。

至于文责问题呢，我以为这应由校刊编者负责，不能归罪作者；并且校刊的性质与普通刊物不同，是偏对内部的，即令发出一篇失检的文字，最大限度掉换一位编者尽够了，再追究作者负文责，实在可以不必。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学校当局多说话了。我们要详说的是查出邱君在这次“失败”中的主观上的缺点。可惜我读了邱君供给我的全部材料后，实在除开都是青年一般容易犯的毛病外，找不

出它的特别症疾。

何君给我们研究的材料很少，壁报上的文字也没有方法看见，不知到底说了些什么。至于何君的行动，我们能有什么异议呢？个人的私信是不应外人拆阅的，她向学校质问，能说没有理由么？反对禁止男女同学和蓄发，我们也觉得完全是何君的个人的自由，学校无理由干涉到这种合法的行动。现在问题就在何君在壁报上发表的文字一项了。如果所说的话不是大谎谬的，我觉得何君在一般上是无罪过的。假若是因为她平日“喜欢说话”、“做事”、“骂人”而即加以罪名，那还是教育的目的么？不过，在何君方面，我们也感觉何君自己指出的几项，就是青年一般的病症。我们对于何君也寻不出这共通病以外的别疾。

至于余君等，也完全与以上邱何二君一样，我们认为都是无过错的，难道为了自己的生存起而挣扎的行为也是过错么？不过，余君指出的远因，那到确是自己的缺项，是青年一般的病症。

现在我们要作一总的进言了。我们万分寄与充分的同情于邱、何、余君等。我们对于你们的行为虽然在原则上都认作无过，但不能否认你们在奋斗上是失败了。不能否认你们的奋斗，在认识方面，技术方面还有欠缺。朋友！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并不认为失败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并珍贵这种经验，并且这也是青年走到成年这一过程中不可免的。我们难道还要青年都要“少年老成”起来，大家来做驯服的绵羊么？不！

但是，现实是太残酷了。青年现在所遭受的残害，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统计数字记载出来是会令人颤栗的。即就你们九个人说，不能说不是过于重大的处分了吧！

我万分心平气和的告诉诸位，也极希望诸君虚心坦怀来听我的话。这种青年病，如果说得不客气一点，也可说是幼稚病，在今日青年要作成人用的时代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希望大家自为医治。

青年急进勇为、无所顾忌的精神是可敬佩的。但有时主观太强，不肯细心去观察现实。我常常看见好多青年，他们对于世界的大体的轮廓容易抽象的把握，但不能具体的看见这个世界；对于改造的理论容易无条件的接受，但对于实行的方法未免机械的运用；对于理想中的堂皇的轮廓含着微笑，但对于现实的丑恶不敢正视；对于理想的实行过于激情，但对于实践中的环子不能抓着。他们容易把实践所经过的弯曲险阻的道途，看成康庄的直道；他们容易把改造事业看成传奇的英雄的故事；他们容易过于信赖一切的人都是英雄，也同时容易否认周围一切的人，看不起他们，自己变为孤独者。他们富于理想，同时也容易幻灭。

由此，我们自己来反省自己一下，自己只要能百分之百的虚心，我们怎能否认这些不是缺点呢？

所以，我常碰见社会科学还只读过概论之类的人，竟是新名词满口，开口这样，闭口那样，对于国内的实际情形，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到处的玩弄词句，随便就乱开口，参加各种讨论，敢于乱下结论。这无疑是容易惹起人家的不快的。

对于人，也喜下机械的论断，因为自己学得的抽象的理论，没有通过中国的实践的，不仅不能认识事，也同时不能认识人，只看见别人的外表，有时对人作过度的恭维，有时则作不适当的攻击。团结不到朋友，打击不了仇敌。

至于在生活奋斗中，姑无论对事对人，均不能有正确的估

计，那是不足怪的。他们太把一般扩大了，忘了一般中的特殊；他们太把抽象的理论扩大了，忘了抽象到具体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为热情超过理智，蛮干超过认识，弄得对于每一件事，在原则上都可同情，在行事上都不敢领教，弄得“成事不能，败事有余”，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种现象，我真不知道经过多少。

虽然，以上这些幼稚病，不见得邱、何、余君等都有的。但是你们既然不耻下问问到我，我也老实说，你们多少是有一些关系的，你们自己也是承认的。

我们要知道，做今日的中国人难，做青年更难，譬如就邱何二君说，本来还是学生时代，就理讲，学校内哪里还会有什么对立呢？偏偏中国有。对于师长哪里还要防备呢？偏偏不见得。学校本来要自己改进，使学生进步的，学校本来要提倡学生课外活动，参加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而在中国偏偏要学生自己来争取，来进行死活的争，这些为光明的孩子，因为处世不深，某些方面没有看到，于是就被残酷的虐待，或作时代的牺牲。本来，在这一时期显出些孩子气是没有什么的，但时代的严肃，不许可你了。至于余君等，虽然是进到本来更严肃的生存竞争的场面，但在其他国度，这种集会也是为法律所许可的，可是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老板是超法律制裁的。所以，在行为方面，偶一不到处，就供了牺牲。

总之：我要对一切青年朋友作最后的进言，我们以后要极力避免以上的幼稚病。这要怎样获得呢？一是，不怕碰钉子，钉子碰得越多，只要都能象这次一样不灰心，又虚心，那是供你的经验不少的；二是，多读书，加深你的认识的工具；三是，少开口、慎开口，把一切要做的事放在心上，脚踏实地的做去，不要先挂在

嘴里；四是，把自己的思想藏在你的脑里，不要太露锋芒；五是，不要把自己弄得与社会分离孤立，要接近你的朋友，和可作朋友的一切人，也不必怕你的敌人。总之，把以上总括起来，你在行动前应正确的认识环境，和自己的力量，不能象赌博一样，孤注一掷，一个中国现代青年，他要负起成人的职责，所以他要赶快去掉本来不足责的孩子们的气习。

然而，这样平凡的话也明明还是客观上需要的，请青年朋友们勿笑这是老生常谈罢！

小雀子要认识世界了

——答周君

连日报纸上登载的两桩全家自杀的消息，想来因此而引起内心不安的人，不只我一个傻子罢！我的妻子为了这不关己的新闻哭过两次了。第一次是不知不觉的流泪，至于放声大哭；第二次是避开我一个人偷偷的在挥泪。我也流过眼泪，心更是冷冷的。先生，不要笑话吧！我肯定说这决不能用浅薄的一点同情心，或是什么妇人心软的缘故来解释它的。

我们在这两件惨剧中，明明看出了我们自己的命运。不是的么？岳张两悲剧的主人不都是属于小所有社会阶层中的人么？张家原来还是相当富有的，岳家呢？以前一月收入也有过一百多元，并且也曾有过一些积蓄的，他们在以前都能过着较平安的生活，谁能梦想到自己的末路会如此。啊啊！他们到了不得不自杀了，并且把自己的孩子们一同残杀了。

这不是明明白白在讽刺我们，暗示我们的命运么？

我颤栗了！我的妻子颤栗了！哭了！伤心的哭了！但是在这一时的情感退落后，我的妻子就对我说："襄！你今后脾气更要放好一点，不能失业呢！你要想到我们也是有

三个孩子的人了。在我呢，自然更省俭，下月一定就不用娘姨了，我想以后要有一点储蓄，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拿用，我尽力帮助你，不使你过于为家庭操心，好不好！不过，你也不能不时时刻刻记着家庭，你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父亲呢！”

我听了她的话，我不能说出什么。因为我找不出比她说的更有理由的反驳，我看着摇篮内卧着的孩子，在地下玩着的孩子，在灯下温书的孩子，我能不忠谨的接受妻的善言么？

但是，我在另一场面中又会遇到另一个与妻的看法完全相反的人，那是我的同事张胖子。他听了我告诉他上面的心思后，不觉大笑起来，他带着嘲笑的口吻，向我道：

“你真是婆婆妈妈的，你未免在‘杞人忧天’了。在这样的时势，有了今日，你还能肯定有明朝么？得过且过罢！一切都要‘马马虎虎’，何必这样认真呢？人生是求快乐的，能快乐一天，就是一天，不要快乐中去想愁苦事，一切就快乐。哈哈！节俭，连娘姨都不用省几个钱存到银行去吧！中国人开的银行倒了好多家，外国人开的也一样倒了啊？辛辛苦苦储蓄的几个钱，送到那里去，那才不值得呢！并且，现在的金融方面变动得太厉害，我们都是生意场中人，难道还不明白吗？今朝你存在银行里明明是一千元，你能保明朝不变为五百吗？哈哈！老弟！你还是不要想心事，‘得快乐时且快乐！’

“啊啊，还有：嫂嫂要你的脾气放好一些，如果对于嫂嫂个人自然应该遵命才对。假若说脾气好，就不会失业，那也

完全是说谎。失业不失业，现在连‘本事’都不能决定的，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一样要被老板撵出门，因为老板生意要关门，你有‘本事’，你对人和气，那有什么用处？所以，象我们这类小雀子，饿死就饿死，能吃得饱一点，就不要想心思，还是穷开心的唱它一只歌吧！”

啊啊！先生！这一番话不也是十分真实的话么？他不是把我那妻子的好梦轰得粉碎了么？

是的，朋友中，也有生活过得很严肃，不抱张胖子这种态度的人，同时对于家庭也不象我这样的担心。我是被许多朋友认为最无用，或者最可怜，最自私的人吧！

先生！我陷在这种矛盾中生活着，我不能自主了。我已明明白白看见自己的前途可危，但又没有自救的办法。果然，我们就只有听天由命吗？不！我不能学张胖子的乐观，我学不来，我又不能过其他朋友理智而又严肃的生活，能忍心的舍家不顾，同时又不能安于这种不生不死，不饿不饱，生活在这狭小的家庭之内，并且这种苟安，明明也知道不允许我能保得住的。

这怎样办呢？想来世间上象我这类无用的人还多着啊！不知先生们能给我详细的解释否？

周　兆

我们在十二分的感动中，读完了周君这通来信。我们极端希望，《读书生活》上能讨论到这样实际的问题。这里，又使我们想到另有一位朋友的来信了。他对于本刊的“生活纪录”虽然相当的表示赞成，却认为非常的不够，就是光止记述了生活的各种

形态，并没有加以生活的指示。这个意思，在后一意义上是对的。所以本栏能遇到周君提出的这类新鲜的问题来，就可以补足这不足，这不是就两全了么？

言归正传吧！

周君这封来信，我想，对于本刊的读者是会特别引起关心的，因为这里触到的问题，大致都与自己有关的。本刊在目下到底也还是我们这些“小雀子”读物吧！因此周君的心情，苦恼，矛盾，也大致常在我们自己的脑中旋转，我们对于周君的每一句话，也是觉得熟悉，容易体会的。

我敢于说，陷于周君这样矛盾生活的人，在我们这些“小雀子”中，是要占着大多数的。“小雀子”的生活基础，现在不独动摇了，并且趋于片片的瓦解，于是，在旧的生活基础上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不能不随之变化，连我们的思想、气氛也变得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土地堂，这是一点不足怪的。

周君！所谓“小雀子”的生活基础是什么呢？用一个比喻说，它本来就是一堆不高不低，不能安定的土壤，它不能变成高山，同时也暂时不是幽谷。但是地震是不能免的，只要这社会的地震一动摇，陷落为深谷的机会总要多，能变为高山的总是少的。在你们生意场中又有几个爬上老板、经理的地位，而不是“忙到老，饥不饱”的呢？这种生活基础，一向是造成了对于个人生活的特别关心，小气，弄小心眼，徘徊，自大，傲岸等气质。在平常的时候，“小雀子”惯会唱太平歌，也装着高贵的鸟儿一样，在那儿做黄金梦，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小雀子。等到自己的生活基础不安定了，这时，他们有最敏的感觉，接受这实践给与他们的刺激，但是，他们对于这五花八门的现象，因为处处以个人利

害的打算不易认明它的真实，只是觉得他们有着两面性。个人生活在事实上是不能太顾虑了，但又不能放弃已过惯的小康生活，浪漫的气氛是不对的，但自己又理智不起来。为了民族而牺牲自己的人觉得可敬，但自己却不能照他一样。

即拿周君对于岳张两自杀案说罢！这种刺激很快的使周君及他的夫人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这种非常的敏感不是偶然的。

周君夫人那一段话，真正可以代表一切小所有阶层的女性，所谓能体会时难的“贤妻良母”的心理。自然，我们无理由去责备她，但从她的话中，可以看出在这没落中可悲的消极的挣扎。她想用驯服节俭去挽回时代的命运。可惜，她的幻梦竟经不起张胖子的一击就粉碎了。

现在再看张胖子吧。张胖子的话，实在有些是“真理”。他的透澈世情比周君高。但是，因为他仍是在个人主义的观念内兜圈子，所以他虽能看出“小雀子”真正的命运，却不能跳出“如来”的法掌，他估量估量自己小小翅膀的力量后，觉得一点也没有办法，好了，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好了。管他娘的，得过一日是一日的主义就诞生了。“饿死就饿死，能吃得饱一点，就不要想心思”或者“还唱一只歌”，这种乐天并不是真正的乐天，只是哭里带笑，绝望中的自欺罢了。说一句真心话，张胖子的话又何尝不带几分伤感。

是的，无论是周夫人的消极的挣扎也好，张胖子的乐天自欺也好，都是无补于自救的。

周君呢，面对他的贤妻稚子，他不能不接受他妻的善言，可是他内心又明明知道这苟安也仍然是幻梦，张胖子的话虽然有些“真理”，但他又不能听从，在这两种生活态度之外，周君说，他

还有生活严肃的朋友，但他的理智又办不到，这怎么办呢？在孤零零的周君，自然是也一样没办法，所以周君对舒张两自杀事件也只有陪着夫人流泪，伤心，哭自己的命运。

真的就没有办法么？

不！决不！办法是有的，那就是要把眼睛突过个人看得更远一点，你应把你个人、家庭的生活放在更大的生活斗争中去解决。单单把一己的生活作为孤立的解决是没有解决的可 能 的。这首先要你放弃你过去抱着的个人主义狭隘的观念，以及一切徘徊，多疑等气质。伤感是没用的，绝望的乐天，也同样是一种自杀。你应对爬上高枝的幻想绝望，你应不求苟安，你应该过着理智而又严肃的生活，不惯吧！你应学习，这就是放弃“小雀子”的生活圈，而另求你的新生活。

这要求你换一个新的人生观。

这里我不是要你就脱离家庭，舍弃妻子，叫你到关外去抗战，去作民族斗争的英雄，固然，能够这样做的人，我们自然也万分敬意，宽恕他对妻子的忍心，但这不能希求于每一个人的，并且，在一般生活指引中，也不应是这样机械的公式的唱高调，我们觉得最最主要的指示是一般的平凡的生活形态，不应强调那特殊的生活型。

“小雀子”现在先要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认识当前的一切现象，以及民族和世界发展的前途。渺小的个人，不过是这大潮流中一只蚂蚁。你应参加这伟大的争取大众生存的前提条件的阵营中去，是的，你可以不站在最前线，但你不能离开这整个的阵线，至少你的个人生活要配合这一时代的客观的实践。

你有了这一点认识，不把个人问题过于夸大，你就会换了一

种眼光，不会看无论什么是怀疑，伤感；你会理智的考察一切。譬如，就你个人生活而论吧！家庭生活弄的简单，所谓“节俭”虽不能挽回“小雀子”没落的命运，但你要能够吃得住在这时代转变辰光的客观的残酷，奋斗过程中的艰辛，你就不能不早日把自己那种脆弱的身体，不习体力劳动等习惯，加一番锻炼。我们敢说，凡能打过这时代的难关的人，一定是能吃得痛苦勇于奋斗的人。不用娘姨，自己操作，这一意味上我是同意尊夫人的主张的。

至于讲到储蓄（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有储蓄），我觉别有一点意见。我们以为你与其省得连书报都不看，到不如把省下来的钱，多买点书报看看，我们认为你和家庭目前需要储蓄的还不是几个钱，而是时代的知识。穷不打紧。你再穷，失业了，只要你不摆“小雀子”的身份，什么体力劳动，“下贱的”生活都可以干的.问题只在你认识多少。人生目标确定后，你会小视个人些许享乐，你会看不起它，你会欣然接受一切苦难。至于甚或在奋斗中也要饿死，穷死，你也会在另一种心情中安然闭眼的。你不会再伤感了。

我敢于说最近岳张两自杀事件，我们对于岳张二家不能不表示遗恨。因为他们的行为，虽然是社会造成的，社会要负重要责任，但是他们的主观方面就可说不负责任么？不能的。他们的死明明是不能放弃旧日的生活架子，才觉得无路可走了，并且不想自己、子女降落到低级人群中去，索性由自己的手残酷的杀死吧！这一来，虽然同归于尽了，但的确维持了那“不上不下”的“可尊贵的体面”。周君！这一悲剧的最惨痛处，就是在此，能值得我们警惕的也就在此。

总之，你应看清你的命运，不是一己的，真的这种饥饿和不幸降临到你的家庭来了的时候，也不必过于伤感，更不必惧怕它。俗话一句言，万事到了头上，装傻装软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挺身而起去抗战一切困难，我们才能求得生存。

是的，在今日要吃得住这痛苦才能获得生存，今日中国的环境，比岳张两家更苦的人，不是正多着么？他们为什么不自杀呢？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意识不同，他们能吃苦，但不是无条件的作牛马的驯服，他们并不满足这牛马生活，他们在这牛马生活中，明明看出前途有的还是光明，不过这光明是要由自己去争取才能到手的。他们沉潜的在努力，为了自己，为了儿孙，为了大众，至于个人眼前一点痛苦能值得什么呢？

周君！我们对于这两出悲剧，不应伤感，应如何来自勉呢！

怎样认识人

——答郭宜浚君

“世界是不易认识的，其实人也是同样不易认识。人之心各如其面，我倒觉得还不足以形容，我的经验告诉我：人的秘密有时会超过你的意料以外，我平日最为尊敬的人，只要一日我们相处一块，不几天就会觉得平凡了。甚至心中现出鄙视的心思来。因此，我对人就根本起了怀疑了。

“我觉得奇怪：对于世界的启示，认识的方法，书上常是读到，并且用起来，也无不验应，但是对于人的认识，我们好象只能凭自己的一点经验，书上说的‘待人接物’，‘观其言行’，我看都是废话，我们拿来应用，是不见灵效的。难道真的是‘人心不可测’么？”

这一段话，是郭君来信中的最末一段。象这样提到人的认识问题的，我们也常常碰到，只没有把它单独当做一个问题解释过。现在有了郭君提出的这一个机会，我们倒要和郭君及其有同感的朋友们大家来谈一谈人这东西到底应该如何去认识吧！是的，宇宙的现象是繁杂得很，巧的是认识的方法只有一个，郭君对于书上指示认识世界的方法，不怀疑，而对于人的认识则觉得有些两样，这也许还是郭君对于认识法还没有十分到工的地方吧！

郭君！首先我告诉你，“人心并非不可测”，人也并不是不可

认识的。人，不要把他神秘化了，人虽视作“万物之灵”，其实他仍不过是万物之一，宇宙中的一个构成的分子。宇宙能想法子认识，这一小块碎片难道还不可认识么？

对于宇宙，我们反对那“不可知”论者，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是一天天在扩大了。至于人，其容易认清他是不能与宇宙成比例。但是人还觉得奇怪的，只不过没有获得认识他的正确的方法罢了。我们更要反对人的“不可知”论啊！

郭君怀疑的基础，据上一段话说，我们看出郭君说话的笼统，没有把这一个问题说得清楚，并且在郭君的眼光内，还带有不少的世俗的成见，这成见无疑的还在障碍郭君透视一切呢！

这怎样说呢？下面就要详细解释了。现在首先应提出对于人的看法的几个层次来，以后再好一层一层的谈到中心的认识上去。

我们要知道：人是宇宙的一分子，是生物的一员，是属于动物这一类的，所以在分析一个人的生活时，不要忘了“人”，无论“圣贤”，总都带有这动物属性的许多性质。这是第一点。

第二，人是生长在社会中的，他的思想，行为，习惯，嗜好，以及各种生活形态，都要受他所处的那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规定，限制。所以要了解一个人，譬如一个中国现在的人，你的朋友，你不能仅从他本人身上，从头到脚去找他的好处与错处。你不要把他当作孤立的东西来秤量他的轻重，你应把他放在社会内，今日中国眼前的社会内来秤量。离开了社会的意义，可以说就没有个人的斤两了。

因此，在认识个人前，你应：

先对宇宙有过大量的认识；

对当时的社会有较深的认识，把这作前提。

再去检查这社会的一分子的他，在这一时间这一地域的言行。或者就整个说，他的生活，是否是有价值的，或没有价值的。对于古人的估量，就要顾到当时的一切，要这样才不会在枝枝节节的方面，同情他这样，反对他那样，其实都是未着边际，未触到痒处。

把以上这一点粗浅的原则了解了后，我们再来回顾郭君说的“我平日最为尊敬的人，只要一日我们相处一块，不几天就会觉得平凡了”的话，有什么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

这毛病自然在说得不明白，不具体，但也还能表达出一部分意思。这正合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英雄日见亦常人”的意思。平常人，对于一个在言论界能说几句公正话的人，在文坛上能出一部杰作的人，在讲堂上能解释一种深奥的学问的人，在政治上能领导某一行动的人，总容易给与过度的恭维和尊敬。世间上的人，因为听了某人一篇演说流下泪来的事很多；读了他一本小说，自己就对这位作者发生了恋爱情绪的少女也不少；对公正的舆论因而“五体投地”的更比比皆是；对政治家发狂喊万岁的事，也是人的常情。但是，他的这样狂热，也许会使这些“英雄”们的左右的人，太太、秘书、打字生、茶房觉得稀奇古怪。为什么这些痴子要对我的丈夫、主人这样敬意呢？他不是天下第一个好吃的大王，终年都不洗澡的怪人么？他虽然写出了一部好小说，但你真的以为他是八小时工作的，勤勤恳恳在写吗？真是天晓得，他的懒是古今不二无双的，他那本书就是在许多大醉后随便写出的。

熟知这些先生们的私生活的人，自然是太太和雇用人及少

数亲密的朋友，他们看惯了这些先生们的公私的生活觉得平常得很，并不见得在台上受人喝彩的人，一定是天天洗澡，整洁，一天做十四小时的工，不喝酒，或者简直是独身主义者，不仅独身，连对女人或男人想也不一想的圣人。因为不如此，所以觉得不稀奇，因为也和自己并没有差异，所以觉得人家捧场的好笑。

至于台下的人呢？因为听演讲入迷了，把他当作了超人，于是忘了他还是人，有人必有的一切属性，连动物性的性生活也毫不能少，胃比别人大，要多吃一些东西，也是不能免的。所以，一旦这些台下人，听见这位先生的茶房说，他是吃的大王，懒的混君时，自然就不免吐出舌头，大为惊异。平日与他在什么事上不快意的人，就把这作为人身攻击的理由，宣布你十大罪状，这一切在今日人的秤量中，常常就作为秤的砝码。

这是公正的么？不！这完全是不公正的。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应把他的私生活方面扩大得太过火，我们要问他的行为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不应把他作为抽象的超人，应把他当作是有血有肉的人，你需要的物质的欲求，他也同时需要的。

举例来说罢！譬如节俭艰苦，我们在私生活上原是奉为"金科玉律"的。我们常常同情某人布衣蔬食，剃光头，着布袜，不坐黄包车，每日步行五十里，不看梅兰芳，每夜读书八小时等等"嘉行"，但是，这就可以作为其人的秤量上的砝码么？

不能的。因为我们要问这节俭、艰苦与他的行为的结果是否有社会价值。譬如他完全为了守财，那节俭、艰苦与社会有何好处？不看梅兰芳，如果每晚读八小时《太上感应篇》不是比看梅兰芳还无益么？世人拿节俭艰苦来卖弄人，来沽名钓誉就多得很，他们想在这些小节上博人同情，要别人忘记他在社会

上造的罪恶，这本是不坏的“嘉行”，这时反成了恶人的工具，欺骗的法码。我们常常看见，自己刮了五六千万的地皮，杀了好多万老百姓以后，于是身上换老布大衫，手里拿佛珠，满口阿弥陀佛，或者开办一两个善堂，施几瓶痧药、救济水，你就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吗？

自然，我们并不反对观察一个人，不要忘了私生活，我们更不会反对节俭、艰苦这些“嘉行”。但我们只把它与这人的行为的社会意义合起来看。譬如这一个人是一个为大众利益的政治家，他的言论，行为处处是为公的，但是他为了工作，不得不坐汽车，不得不有一身礼服，不得不每天多吃一两块带肉的面包，不得不有一个秘书、一个“勤务”，早上有时不得不睡到九点钟才起身，这一切我们都应该原谅他，即令比人多消费一点不能认为是“缺德”。一个“天才”的文学者，他要吃得好一点才能写文章，他要睡得足一点才能够休养，有时不能不喝几杯酒，多交几个女朋友，但是只要他写的东西是有社会价值，关于他的私生活上的小节，在今日的社会上是可以原谅的。

但这决不是容忍私生活的腐化，恰恰相反，我们是在社会意义上来估量它的轻重，我们不过不想把这一部分过为夸大罢了。

观察一个人过去及现在，我们只应注意他的社会价值，他的行为对社会有益，还是有害。

至于观察一个人的发展呢？就不可不对于他的私生活看重一点。私生活不用说是要影响公生活的。譬如奢华成了习惯，它会造成这人贪污的条件；懒堕会使人消沉下去；酒精会使精神萎靡不振；不择交游，不读书会变为愚昧落伍，会引人没有主张或

失节；生活无规律，会使你不能成大事，对人无信，不负责任，会使社会的人怕你，远你，这一切都可影响你的思想、行为，都可减杀你的行为对社会的价值，或者变为社会的妨碍。

所以一个前进的人，不论他是平凡的，或是一个学者，事业家，政治家，他不能不随时检查自己的私生活，时时对于私生活方面消毒。因为私生活的不善，也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某一方面促成的，某种社会意识，某一思想，习惯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常常要受到许多不好的影响，形成生活上的矛盾。这在今日，无论你如何前进，都不能说一点没有影响到。所以在我们的私生活常常现出与公生活的矛盾。诸君！这里特别值得注意。这一主观上的努力，乍看起来，好象带点说教的意味，其实这是一个前进落后人的分水界，不可不注意。

我们对于一切朋友，凡是在公生活上觉得满意，而于私生活还看出有不善的地方，应该尽批评纠正的职责，却不应拿此作为评价他的社会价值的法码，不应攻击他，而是社会地，善意地纠正他。

不要把人的一切习惯、嗜好、思想、行为弄到神秘的迷雾中去，应该正确的运用社会学的解释去解释一切，求出他的根源，在社会意义下去批判一切。

公生活要超过私生活的估价，但同时不要忘记私生活可以影响公生活。

这样看法就够正确了么？这就是正确的人的认识法么？

还不很充足。因为这里还不能忽视生活是变动的这一点。人的生活决不是停止在那里不动。进步的人，不见得不在某一时期忽然站住，或者向后转，漫步走，落后的人也许因为生活的

变化使他大开快步，追赶上来。所以估量一个人，不能仅从他的现在的行为如此，就断定他将来一定也如此，小时候偷过人家的糖，长大了就一定会作贼。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时代的大变动中，常常可以看见许多人在那里开快步走，许多人落后了。

但是，这里也有一种限制，就是属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层，常常是一个人转变的界碑，因为生活层的限制，常常只能在这一界限中转。中间层在没落时代中是可以走过这界碑的；下级层可以由“自在”到“自为”；高贵的人们要他往下跑，即令他的生活不得不如此，但有些人说大话，就是穷光了，也还是要带着贵族气的。所以，我们也不应对于某些高贵而不善良的人们而作过高的希望，也不应对胡里胡涂的人生出灰心。

总之：认识人虽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不可能。这里包括的知识太多，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对人应多看重公生活，看重社会的价值，对己却不能不在注重公生活外，同时使私生活保持公生活的步调，并要使私生活的合理，加强公生活的社会价值。

做事的态度

——答张惟一君

自贵刊发刊以来，我即是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对它比自己心爱的爱人还喜欢，时常都把它带在一起，最近看了答烧饼迷、萧强君等《如何生活》一文，还有几个疑点要请教诸先生，可否替我解答或提出公开讨论。

在我的生活内容中，曾尝尽了学校的浪漫、感伤、消沉的种种生活，我又曾当过大学的运动选手、学生会干事，在失业时，又曾见过牛肉般的面孔，狡猾的眼睛，我又曾到过别国，见到许多欺诈的情形，但我遇到一件事跑到自己的头上，仍找不出适当的方法去解决，这不能不使我感觉发恼。

（一）做事态度的问题：我为了生活有意义，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为了认识现实的社会，我虽不是学体育，但我曾当过一度的中学体育教员，我在教学上并未失败，我不但教他们操场上的各种技术，并教他们怎么去做人，代他们治疗病痛。平常的体育教员，多半只和几位选手感情很好，但在我，除了选手而外，一切想进步的青年都和我要好，正因了我的努力，同学和我要好。刚做了半年的事，饭碗就打破了，临走时，为我事悲愤而送别的人很多，但担心我今后蹈覆辙，而劝告我的也不少。他们的忠言是："一个人不要太

认真、太努力了。社会上就是只要自己装痴、呆、蠢，才能过活，所以今后你不要多管闲事，你这种热情是没有用的。”编辑先生！我确因了自己的热情，而牺牲学业，追放！失业到了现在，热情虽然还有一些，但总觉得硬碰钉子是有些不好，你能告诉我，“怎么才可以免少碰钉子？”“怎么才可使自己的热情日益增加？”“对社会服务应抱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实我们对人对事的技术？”

（二）如何能在忙中求静，能有时间看自己所要看的书？……我现在的生活，确是忙得厉害，从早到晚，大半都在动的当中过活，有时连到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因此，我常感到危险，老是这样的忙，“自己所存底货无几，以后怎办？”“自己不有镇静批判的机会，不有自修的时间，怎能有进步？”我自己现在才二十二岁，照理是应采花，不该急着酿蜜，但现在适得其反。编辑先生，你能够治疗我知识恐慌的病吗？

（三）要自己有专门知识，要自己对人对事有巧妙的技术，要自己的认识增强，我是需要看些什么书？怎么样去看书？书的来源是何处？现在中国的刊物，有哪几种可代解决这些问题？

读完张君这封来信后，使我们更感觉读几本书本子易，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难，指示人从书本子上去认识人生固然重要，但切切实实，诚诚恳恳的去讨论人生实际的各种问题，则其重要性当超过指示人去读书本子。我们常常看见许多青年，在学校时他抱着如何高尚的理想，如何积极的人生观，如何热心的去从

事各种学校活动，这时，书本在指示他，他真的以为学校就是社会的全体，读了几本教科书，听了师长平日一些教训，阅读了一些书报杂志，常常自以为了不得，以为只要我肯干，世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不能做呢？但是，一旦出了学校，深入到社会中去，眼前现着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书本子教给你们，这时有许多不能应用了。以前自己以为多才多能的人，现在"遇到一件事跑到自己的头上，仍找不出适当的方法去解决"。不仅如此，你有时眼睛会放出可怕的惊异的眼光来。譬如，就拿张君说，张君要做一个很认真的体育教员，这难道也还有什么不应该么？是的，一个体育教员除教学生"操场上的各种技术"外，代学生"治疗病痛"，"并教他们怎样去做人"，难道还有什么非议处？除了同选手要好外，也还同"一切想进步的青年"要好，这也是更应该的。但是，张君"刚做了半年的事，饭碗就打破了"。

但是，这时候，张君受到朋友的忠告是："一个人不要太认真，太努力了，社会上就是只要自己装痴、呆、蠢，才能过活，所以今后你不要多管闲事，你这种热情是没有用的。"

不仅如此，我们也常常听见社会上的人对刚出学校头门的人说："要完全学过，书痴子！"这并不完全是恶意的，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记者在初出学校时，就亲自受到自己的叔父教训过，他说："你读了几年文科有什么用？还是来跟我做生意罢！"我说："我又没学商科。"他反驳我："你真是傻子！学十年商科也同样没有用。商业技术，在你我这样的人，不必学，这些事，可以用人。你跟我走，要学的只是商场上的奸巧利弊，应酬管人等。"我当时，几乎被他这一席话把头弄昏了。

这与学校当日的教训，书本子上说的，刚刚是相反的一个对照。

自然，一半是今日学校教育与社会太隔离了，它变为孤独的东西，使学生所学的不免是学非所用，一半是社会的封建残余的习气还太大，使学校教育不得不与它处于绝对的对立，但学校教育的力量太薄弱，不能克服这旧势力，目前青年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在张君提出的“对社会服务应抱什么态度”这一问题。

自然，我们不能要张君放弃他过去的态度，反过来接受他的朋友们的忠告，去过那种“老于世故”，“混世”的生活，也不能让张君继续盲目的去碰钉子，多多受到“失业”，“追放”等等袭击。这也绝不是对张君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今日最普遍的一个青年处世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向来又都少被人提及，现在把它作为理论与实践配合来加以讨论，谅来是本栏最有意义的一种讨论吧！

首先，我要告诉张君的，“对社会服务应抱什么态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回答的问题。这里面是复杂错综，曲折多姿的。自然这要看你认识社会的程度的深浅，人生经验的深浅，运用你的认识到实际中去的程度如何，是否是机械的运用？是否是观念的、幻想的？是否是了解不足？对客观或主观方面估计不足？这一切对于你的态度的决定的正确性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一个勇敢的热情的青年，初入社会，不要把自己主观的力量看得过于夸大，看不起其他的一切，也不应过于夸大客观，把自己变为旧势力的俘虏。要冷静一些，不要遇着什么不如意的事

就愤怒懊恼。对你周围的人，也不要对个人加以蔑视。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怕自己犯着错误。怕的是你“急流勇退”，碰了一回就退缩，不想知道自己的错误。只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抱有做人应有的、切合时代的奋斗的目标。至于如何达到你的目的，就不能性急，不能不看现实，不能瞎碰，有时也许还不能不兜一个圈子，弯弯曲曲的去达到。否则，一鼓气的蛮干，不握着实践中的一环一环去进行，要想变魔术似的一会儿变成，必然要碰一个大钉子，自己也就碰伤在这一个大钉子上。

现在且就张君这次打破饭碗的例子来解说吧！我们虽不能十分了解张君所教的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但就张君来信中说，似乎那间学校的主持人不喜欢教员同学生“要好”接近，是能够看出的。张君这次打掉饭碗，在张君主观方面，能够认真，努力，勤勉，友爱，许多方面都无错误。张君的那种热情，尤为感佩。但是，我们要怀疑的，是张君对学校当局及同事的认识与态度的问题了。

我们决不想凭空武断张君这次打破饭碗是张君对于客观认识不足或不善应付，但这种例子，在一般是很多的。姑不妨就一般说吧！

如果学校当局是过于守旧的，一个好的教师，虽有无限对教育改革的热心，却不能将这热情随便应用。你应利用客观上的可能，先造出一些改革的条件，不能过于急进的。一般教师不愿同学生接近，你同学生接近是可以，但不能不有顾忌，不能一个人孤行。你至少应该找几个与你见解略同的同事，大家去打破这种风气，使守旧者只有暗中叹气，没有办法说你。即令在开始之前，你得不到一个同情人，自己又不能装痴，装呆，但对学生的

接近就得有一个限度，至少要多多避免个人感情的结合。免得别人怀疑你抱有什么目的，要利用学生。我以为，如果你能在职务上充分的尽其职责，又能避免一些带着个人感情联络等色彩，主持人怎能说你呢？

其次，就是你对你的周围人的态度。有些刚入社会的青年，他能“特立独行”，可是，他同时看不起周围人的愚行、保守。时时对他们放出轻蔑的冷光。这种过于夸大自己的英雄态度，固然是一种错误，但尤其错误的是在增强反对者的力量，对自己的改革事业增加阻力。这一点，不知张君感觉到没有？

还有，即是对于私生活方面的。这不单就一个学校，一个教师说，一般职业生活都可应用的。在今日的社会内，别人总特别注意你的私生活。本来个人的私生活应该保有相当的自由，别人是管不了的。但是你也得特别留意。一种不好的私生活，在积极方面说，本来有影响所谓公生活，即你的事业的作用，二来，在消极方面，确也有增长人家许多误解，轻视，烦言。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是责己要严，对人要宽。这样一来，就可减少许多阻力，使你在事业改进上无形中增长了力量。这话自然不是对张君个人说的，这一点对于一般的处世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括的说，做事的态度，应该在做事中去体验。这里应先有对社会对人生的最基本的认识与理解。这一方面在读书，一方面在碰钉子中去获得。自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学得了的。俗话一句言：“学到老，学不了”，就是这个意思。在做事中，不能仅凭主观怎样，不顾客观实际。只看见自己，不看见别人，只想凭感情的狂热，一朝把理想弄成功，不看见实际上可把握住的可能性

有没有。除此以外，就是上面说的人对人的态度，你不应看不起你的周围的人，你不能唾弃他们，离开他们，因为在今日他们也许还不是少数，你离开他们，就是把自己孤立了，你应该在小事件上，对他们放让，你应宽待他们，甚或可怜他们，在主要事件上，设法说服他们。这里，你应在私人生活上树立人家的模范，取得他们的信用，敬仰，然后你才有感化人家说服人家的效力。

等到你在他们中有了相当信仰了，你自然说话和行动都可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情，支持。你的饭碗也不致这样轻易的被打破吧！

但是，这种态度如何养成呢？就是不怕碰钉子，咬着牙关去经历，你多碰一次钉子，多见一个坏人，多遭一次失败，你就多打开一次你的认识之门，你这样不断的迈进，你就可获得处理一切实际问题的宝贵的、天才的能力。你就可获得科学的处世哲学。

"不要太认真、太努力，装痴装呆"，"不要多管闲事"，这些教言，如果不是愤激后的言辞，是至不足取的，因为这是退让，"马马虎虎"主义者消极哲学，结果是变为庸俗的晋绅先生所谓"世故"，是把人的生命力消蚀，把青年拉到坟墓里去。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就暂时谈到此处为止吧！

其他张君对于读书的见解，我也还觉得有商量的余地。张君说"我自己现在才二十二岁，照理是应采花，不该急着酿蜜"，这种看法是不甚正确的。因为张君把"学"、"用"完全绝然的分开，把书本子过为重视了，忽视了做事亦是获得认识的来源，这一点，几乎是一般人的共通的错误。忙中求静，读一点最实际有用处的书是应该的。这并不是说不读书就一定不能有进步；尤其

在我们一面为生活挣扎，一面由自学想得到一点什么东西的人，不能抱张君这种态度的。

至于“要自己的认识增强”，需要读些什么书？如果概括答复一句，似乎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书的来源除自己购买外，可利用图书馆借阅，譬如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就可供给本外埠的人相当的读物。“怎么样去看书”那问题太笼统，此处不能说它。

“现在中国的刊物，有哪几种可代解决这些问题”，这也说得不明白，我可告诉张君的，你不要希望在某一本书，或一册杂志上得到你所要了解的一切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多多少少可以供给你一些知识，启示你如何去求了解，问题的解决，却还是你自己的事。关于刊物，对于我们这类忙人，我觉得比整本的书还重要，因为这些刊物供给我们的东西比起整本书要实际，要概括，我们也容易摄取它。这是值得特别一说的。我们选择的问题，本刊第一卷中随时都有介绍，这里也恕不重述。

不能跟阮玲玉走

——答叶小秋女士

一

自杀服毒的消息，每天报纸上都有，并不算什么稀奇；因为大家看惯了，即令是如何悲惨动人的悲剧，也变得平淡了，在一般看报的人的眼里，大致不过浮现着一层轻烟似的感喟吧！然而，这类新闻对于与那些悲剧中的主人处境相似的人，却有些两样，他们特别注意看这些记载，甚或暗暗的在替这些不幸者在流泪，无疑的，这些灰色消息是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的。

至若象这次阮玲玉的自杀，因为阮的声名很大，阮的职业的与人不同，她与无数人平日在银幕上发生了一种关系了，自然，它要哄动一时，变为街谈巷议的材料。这半月来，上海的空气被这悲剧的成分所浸透，自然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它的影响力自然也越大。

在这众口“谈阮”中，我们知道有许多人不过是在无事闲谈，或者还是在求开心，或者作为“一代艺人”而兴叹罢了。但是在这热烘烘的空气中，也同时有一种另有伤心怀抱的人，格外的感觉对她亲切，在那里为阮玲玉流泪，自然这都是女子，她们真是为阮流泪吗？不！这很难分别，因为

在自己的命运中也看出同样悲剧的可能性，她们哭了。

但是她们也同样用哭脸去听人家对阮玲玉死的批评，她们不知道阮玲玉所走的路是否正当，说一句更明白的话，她们在考虑自己的生命应如何去处置。

先生！我还亲自听见几个生活象阮玲玉的姊妹们说："她有了那样的地位，也还只能一死了之，她舍得死，我们还能活，还要活吗？"

这是如何有力的暗示啊！我敢相信今日怀抱着自杀之念，尚无自杀决心的人，一定还多而又多，她们想活，但实践是太残酷，让她们生存的机会是如何少啊！这一严重的暗示，谁能敢担保不会引起许多无路可走的弱者继阮后尘呢？

因此，我十分看重舆论了，我觉得舆论是对阮应有一番正确的检讨与评判。可惜得很，现在报纸杂志都只登些短评、杂感，没有一篇可称得负起这任务的文字；在《中华日报》《电影艺术》内，虽然出了"专辑"，也还只追问"谁杀了阮玲玉"，对于生者并未有明确的指示；就是在这"谁杀了阮玲玉"中，也还没有问出最正确的答案来，先生！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吗？

至于在投机家方面，正在把死人做幌子在招摇行骗呢！《阮玲玉自杀记》之类的小册子，阮玲玉的文明戏，阮玲玉照像展览以及由阮主演或参加的影片都在做广告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一剪梅》、《桃花泣血记》、《玉堂春》、《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的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归来》、《人生》、《神女》、《新女性》等影片都会把阮的死的消息带到全国去，从这许多影片上，都能引人想到

阮的自杀了！所以，这一自杀的宣传力与舆论批评的对比是何等的大啊！

我于是想到贵刊了。以指导如何生活为任务的《读书生活》，大概对于这一问题不会作为一个优伶的死的私事而小视吧！我迫切要求你们对于这次自杀案正确而又严肃的检讨与批判，对于生者有具体的指示。

二

我们把叶女士给我们的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摘要如上面的了。我们非常珍重叶女士的意见。阮玲玉的死，本刊虽然也只略略的写过一篇短文，载在"社会相"内，但并不是把她作为一个优伶的死的小事看待的；我们在那篇文章中，完全是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妇女问题提出；不过，只仅作为一个警号而提出罢了，对于阮的这桩公案，当时没有去详细检讨它。

是的，一直到记者撰复此文时止，据记者眼界所及处，似乎这类工作还有再做的必要；因此，对于叶女士要求的解答，我们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来检阅叶女士所指的舆论吧！不错，舆论是"热烘烘的"。大家都在"谈阮"了，日报，期刊，街谈巷议都在谈阮了。"谈阮"中，固然因为各人的看法不同，对阮说了许多相干和不相干的话，但也仍然有一致在，那就是对阮的悲痛哀吊，对阮的电影艺术的叹息，同时有人在追问"谁杀了阮玲玉"。大家都为阮家的丧事弄得有点昏昏然了，却很少象叶女士这样冷静的人，在热闹中，偏偏看出悲剧以外的悲剧的影子，发出救救活人的信号。就是在追问"谁杀了阮玲玉"这一问话中，也大多仅仅是站在为

这“艺人”个人复仇的观念上，他们多数只看见阮玲玉这一个女子，看不见这是一个妇女问题；即令看出这是一个妇女问题，最多也只象本刊第十期“三八悲剧”所发出的那样的一个警号，甚或还更模糊不清，抽象的说教而已。

所以在“谁杀了阮玲玉”这一问话下，答案就有：

一，“三瓶安眠药！”——一位小报记者说。

二，“你不杀伯仁，伯仁因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这是一般报上引用阮女士的遗书。

三，“都是你们报馆里人，把事情胡言乱语登了出来，害死了我的小女。”——阮母对新闻记者说。

四，“市侩唐季珊的欺诱和玩弄。”——许多报纸皆同。

五，“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崇拜金钱压迫女性的社会，这是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杀人的凶手。”——《新生》。

六，“阮女士本身的缺点，知识不够。”“不正确的意识杀害了她自己。”——《电影艺术》。

七，“生活与意志的矛盾”，“毁灭于这矛盾中。”——《申报·影专》。

八，新女性影片的教唆。

自然，还有许多，都可归并到这八项中去。如我们还听到她家庭中日常生活中许多悲剧：为唐季珊另有所欢，她被唐季珊冷遇，虐待等，这可归入第四项。目前的复古的空气，封建势力的猖狂，这也可归到第五项社会里。什么“名誉”“殉讼”等自然可以包括第六项。以外也还有人说她在影坛上，已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了；据记者亲自探问的结果，又据说这不确实；即会是真的，也可以包括第六项里。

我们对于上面这许多答案，除第一项我们觉得太朴素了，有点象小孩子说的，现在不去管它。第八项，这明明是不懂悲剧的人过为夸大的外行话，也不多赘以外，其他各项我们认为都对，也都有缺点。这怎么说呢？就是以上的估计阮玲玉的自杀，或是太偏于一面了，或者就是太抽象不具体。是的，我们应具体的研究阮玲玉的自杀，但不能把它看做偶然一个刺激，一个什么敌人，一种什么舆论那样简单，也不能空空洞洞用一个社会来包括一切。用一个"无知"或"不正确的意识"归罪她自己，就可说尽其能事了。

我们知道，自杀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阮玲玉的死，明明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综合起来，在她的意识上起了质的变化，形成突变时才发生的。所以以上各项都成为她死的因素之一，但单独某一项都不会使她吃安眠药。

把许多因素综合起来是否就能了解阮玲玉的死呢？仍不能的。我们还要追问阮玲玉是属于哪一个社会层的，不然就会成为空洞不着实际的考察了。

"阮玲玉是小有产者群中的一分子。"不错，她出生、成长、死亡于第五项所指出的社会内小所有阶层中。那末，她的自杀过程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

"她的生活决定她的意识。"她的行为通过她的意识，她对于世界的事物的认识也是通过她的意识的。虽然她所出生的社会层的意识已随着这阶层的没落而日趋瓦解了，这一群中对于新的意识已有不少的先觉毅然接受了，至于她，虽然做了《新女性》的主角，接触了这一面，却并未了解"新女性"；在艺术上(就《新女性》一片说)仅仅成功了韦明型的颓废面，却对不起这一悲剧，

她这一死把她在艺术上的成功变为虚伪了。她变成了导演的一个傀儡，不能与她所具形化了的艺术融合为一。因此，以上许多因素，对她才会发生巨大的压迫威力，置她于死地。

她会害怕社会揭穿她的私生活，才会那般看重贞操观念，才会那样对恋爱不了解，才会那样担心自己的地位，才会那样受不住舆论对她的冷嘲暗讽，不敢到公庭上为自己人格与权利辩护，不敢解除唐季珊的虐待，不用奋斗来维持、增高自己的艺术的地位，不用奋斗去开辟自己的生路，只是抱着一个薄弱的意志，看看现实不对，看看自己是如何可怜，无办法，于是，只有一死了之了。

你不要以为那个小报说出孩子的话就完全一点意思 没 有。不！安眠药在她的自杀中，仍然尽过刽子手里的刀的作用的。因为拿着这刀的人，是她自己，所以很容易被人蒙混谁是真正的刽子手，这一公案就变得更危险了，更可怕了。

这正凶是谁呢？我们虽然可以这样问。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某一个人。把责任要某一个人去负，都是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就归责社会吧！对是对的，它的本身是社会造成的，可是未免太笼统了。我们可以分析出：阮玲玉死的客观的原因，是以第五项所举的社会基础为其基础；而以目前复古的气氛，市侩流氓的依仗金钱，男性的权威，玩弄女性的无赖，舆论利用所谓软性新闻以推广营业及替流氓侵害弱者，以及其他等等，纵横交织构成了阮玲玉自杀过程的整体的客观原因。自然，没有这种基础，自然不会发生张达民这些派生物，没有张达民这类人及事也就不会有这悲剧看了。但是，在考察这一公案的客观原因之余，不能对死者以一掬同情之泪了事；因为自杀到底不比被杀，如果阮

玲玉不是她那没落社会层的意识的支持者，她是不会采这条路走的。我们不能因为她是一个弱女子，而且是被人逼死了，我们就不深责她，就认为有伤恕道，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爱护阮女士，同情阮女士，同时我们亦应找出她自已应负的严重的错误的这一面。

同一样客观的环境下，不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女子在生活着么？在血的、泪的生活中抗争么？

只有检查出了她死的客观原因，我们才知道我们应向什么方面去努力。现代中国的妇女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它应如何去运动呢？

只有检查出她的主观的原因，她的严重的错误，才是对千千万万与阮玲玉同一生活内容的姊妹们当前的一付清醒剂，使她们在同情之泪中，觉悟过来，从这一刺激中，先救出自已。

为了尊重阮玲玉，我们应把她的死作为一幕有价值的悲剧。它嘲笑、讽刺社会了，我们大家应负起奋斗、改造社会的责任；它唤醒了无数的姊妹们，我们姊妹们就得大家走上用血与力去争妇女解放的胜利的道路。

否则，阮玲玉之死，一定要生出消极的作用来，叶女士的担心，决不能说是神经过敏。这是可能的，因为生在今日这般阴险艰辛的社会里的姊妹们，无路可走的是太多了，谁能保障她们不会在无可如何认识不足中误步阮女士的后尘呢？

三

以上对于阮玲玉的自杀，大略的检讨与批评过了。我们对于自杀是极端反对的，我们同时也不满舆论界持什么“为了生活

的严肃，为了自己对人生的正视，觉得自杀反比许多人的苟且偷生是更加勇敢”这类消极道德的说教，这种死的清高，在现时代是不值钱了的。

姊妹们！再不要柔懦的不肯打开眼睛啊！在闺房中做的春梦，在学校、电影、运动、商店等等领域做的皇后梦，大学教授、达官、贵人、买办的太太梦，以及一切享乐虚荣的幻梦，与目前社会实践是相违不止十万八千里的。这种幻梦的结果，阮玲玉代你们说明了，有人对阮玲玉一生的幸福估计说，“做了两个买办的太太以后，她真的得到的幸福是死后睡了一口玻璃棺材。”这话虽然说得过于刻毒，但你也不能指出他的错误呀！

至于如何奋斗呢？这问题太大了，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本刊对于这类实际生活问题，常常都有讨论，我希望读本文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多多的加以注意。现在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一个人无论到了什么田地，我们应该把握着“死是可以的，但不能由自己动手杀自己”。有了一口气总要干一番。社会无论如何险恶，我们一面要冷静的对它观察，认清为什么会有这样险恶的原因，如何铲除这一个原因；不是对它害怕，退让，或屈服。新女性要赶快丢掉传统下来一切过于看重贞操的观念，及性的方面许多封建的意识，赶快吸取新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教你认识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自己不要以为是女子，什么事都不能做；你要大胆出来，什么事都同男子一路去干，负起你在这一时代你应做的事。

是的！要更坚定你的新意识，不要从战场上败下来，一面要吸取新知识，一面要在生活中去磨练。不要怕碰钉子，不要太怕钉子，钉子太多，自然是社会不好，所以我们要改造它，我们更应

看得很平常，一个一个去打掉。我们宁可以把这短小的一生做些开荆斩棘的开路工作，让后代人有好路走，我们不应看了荆棘就害怕得自杀，让荆棘存在，毒蛇猛兽猖狂。

论所谓“桃色惨案”

——答陆伯翔君

自从上海闹过阮玲玉自杀惨案后，接着北平又闹出什么“桃色惨案”了。

案情大致是这样的：一位名叫逯明的，是一位运动家，家中据说本有一位旧式老婆，后来离婚了，遇到滕爽女士，发生了恋爱。其间他们又发生冲突，逯明转而爱上一位刘景桂女士，并由爱而订婚。可是订了婚之后，逯明复与滕爽结婚，因此刘含恨逯、滕，刘起了杀人报仇的心，结果她枪杀了滕爽。刘在《告国人书》中，说她认为滕爽是破坏他们爱情的人，故“发誓杀她报复”。但以后，她又说“本想杀逯明，因为自已系一弱女子，而逯明则一勇武男子，恐力不从心，故杀滕爽以泄其恨”。在审讯时，刘又云：“购手枪后，原欲杀死逯，因百元用完，无旅费赴下花园，故打死滕爽，而使逯明精神痛苦。”

案情的性质是情杀，这是用不着更详细叙述的。

不过，自从刘案发生以来，几乎无日不在各报上可以读到这件案情的新闻，报纸利用了“小姐杀人”这种软性的所谓桃色的消息，夸大的记载，曲折细腻的描写，引动青年男女的好奇心，以推广他们的销数。因此，这桃色惨案就骚动

了故都了。致使地方法院门前聚集了五六千男女，演出空前未有的热闹，街谈巷议，也大家都在谈这位杀人的刘小姐了。

我也是这热闹场中的一位观众。我极关心舆论界，妇女界对这桩大案有一个正确的批判。但我要声明的，我不袒刘或某方；我老实说，我不过于注重这案子的判决与他们当事人的得失；我的注意却是这案子给与广大的青年的影响。可惜现在的舆论界尚没有一篇象《读书生活》清算阮玲玉（《读书生活》第一卷第十期《不能跟阮玲玉走》）一样的文字出现。因此，我特地要请教你们，是否也能象清算阮玲玉一样，给无数青年男女对这一公案有一番正确的批判与指导呢？

骚乱故都的所谓桃色惨案，的确也传遍了全国了。我们也与陆君一样，不过对于这案本身的发展特别感着兴趣；因为就这案子的内容说，简单得很，北平地方法院既然开庭审理，自然法院可以根据《刑法》作成判决，似乎无容我们多说闲话。至于对于案中人呢？就犯罪行为说，既然都是属于个人的，社会意义自然很少，也觉得没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对于这一公案的观感，颇与陆君之见相合。我们只觉得这是一幕悲剧，而剧中人是中国中产社会的青年，这幕悲剧至少透露一些中国中产社会青年们对于性爱问题的见解，这见解是正确与否，却不能不认为是一个较严肃的问题。这一悲剧我们看过后，我们还是叹口冷气默然无语呢？抑或对于这幕悲剧还要说几句话，使这成千成万被这新闻所迷惑的青年，借这悲剧来认识认识这一面（性爱）的人生呢？

现在姑就这一悲剧的意义，来与陆君及对这一问题关心的朋友们一商権罢！

我们首先要认清造成这一悲剧的是什么。不错，它发生在今日的社会，自然是因为有它出生的土壤。不过，我们却不可这样空洞地把它归到社会制度上去，就算说明了它。不！这种说法是不够的，我们虽然不否认在这种土壤中有发生这一幕悲剧的可能性；但决不能说，这种悲剧就一定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并且这种可能性在今日的我们看来，是可以不让它成长的。

因为这一悲剧的暴发是通过了一种不正确的性爱的见解的。这种错误的性爱观，却是造成这一幕悲剧的根源。

现在我们来检阅这一悲剧中的人对于性爱的见解罢！这里面有三个人物，滕爽女士被杀死了，她的性爱观我们无法知道，这里表现的最明白的是逯明与刘景桂。逯明对于性爱至少已明白的表现出无餍的欲望，是夸大的，浪漫的，享乐的，我们不必说他什么"没道德的男子，对女子用情不专，又具玩弄女性的性质"（见《独立评论》一四六号俞大经《论刘景桂杀人案》）等话。刘景桂的杀人行为以及她的《告国人书》和口供，都充分表现是恋爱至上主义的人物，她那妒焰、怒火，都是把性爱过为夸大，视它高于一切；因此才肯以"复仇"来毁灭人，同时也毁灭自己的整个的人生。

他们俩，姑无论对于恋爱谁是真诚，谁是虚伪，但总为了它而牺牲了人生的其他，人生中更重要的部分。他们俩都是把这性爱的碎片，代替了整个的人生，毁坏了他俩的人生。

是的，现在的中国青年，尤其是目前中国实践下的青年，他们应该认识他们所负的时代使命之巨大；恋爱问题，对于前进的

青年应该是不甚重要的问题。

过于把性爱夸大，所谓性爱至上主义是危险的。青年男女沉溺于性爱生活，把爱情过度的高昂，疯狂的爱的行为，都是浪费青年的健康和力量，甚至毁灭自己。

由刘景桂主演的这一幕悲剧，明明白白是一种浪费，是时代不需要的排演。

然而，我们并不是禁欲主义者，并不主张青年男女都去过和尚尼姑的生活。我们也不主张那些禁止男女同行同校以及禁止男女在一个池子里游泳，不准男医生检验女学生的身体等这些奇怪主张。我们不过不想把性爱过为夸大，我们要把它作一个适当的估价。

我们很想化神秘为平凡，因此我们觉得有人把性爱比作口渴了要喝水，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平凡，再适当没有。

青年男女无论在身心两方面都须要异性的安慰和满足，但不可超过一定的限度。太多喝水，多吃饭是有害卫生的，太沉溺于性爱，其危险就比太多吃东西还来得大。

在饮食男女以外，人还有其他更丰富的生活。

我们又同意有人劝青年人运动，研究学问，或从事社会活动等去减低性爱的欲求的比重。不用说这是最正确不过的佳言。

这种观念，无疑问的，在今日的中国青年的脑中尚未造成一种普遍的观念。不！恰恰相反，恋爱至上主义，在今日中等社会的青年男女间还有绝对的势力。它在五四以后，首先以反封建的姿态而跃出，颇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可是现在确是陈旧的东西了。它变了时代的浪费的悲剧。

所以刘景桂杀人案并不能看作偶然的，我们虽不敢说这是

某一部分青年的堕落，却可说是一种不幸的现象。倘若逯、刘对于性爱有了正确的观念，逯明不会要过这样浪漫的生活，刘景桂又何至因与逯离，而要怀恨杀人报仇呢？不是逯、刘都有更重大的事业在眼前，使得他们终生奋斗的么？

我们觉得严肃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的认识上，对于性爱的见解的错误上。

这是读这一幕悲剧的人所应了解的。

我们还希望与逯、刘同一生活内容的青年男女们，读完这一幕悲剧后，自己起来撕碎你们心头的腹稿吧！这悲剧是不应再演下去的。

阮玲玉的自杀，我们曾经高喊着："不能跟阮玲玉走"，已引起了许多青年的同情。我们现在又向更广大的青年男女朋友发出这信号了："我们更不能跟逯明、刘景桂走。"

如果从这次悲剧中，大家能得一点认识，那这幕悲剧虽然是浪费了，却在意外仍有它的收获，这就作为滕爽女士的牺牲的代价吧！

我们对于这一公案里的死者生者虽然都抱有一点惋惜的同情，不过这是用不着再三致意的，我们希望的却是千千万万的生者，赶快起来洗涤自己对于性爱见解上的沉淀。

把你的一切精力安放在时代课于你的肩上，陆君！这一点意见，暂时作为你的参考吧！

人和环境

——答周鹏、邹杰、方叔平三君

近来有许多朋友因为在生活的挣扎中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常常发生绝对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人看了当前的环境的恶劣，觉得无法去改造它，生出对于“人可以克服环境”这种话的怀疑，同时觉得：“环境支配人是千真万确，人改造环境可是一件难事，或者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想着：“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能转移时世是事实，但他能成其伟大，也还是由于他有较好的环境。”这样一来就更觉得眼前包围了自己的这黑漆一团糟的环境咄咄逼人，只好让它去逞魔力，玩弄自己，自己除叹气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邹君把自己过去奋斗失败的一切责任都委之于环境不好；周君呢，也轻淡的发出“人可能单独改造环境么”的感喟之声来。这是属于环境的悲观论者的一面。

另外，有位方女士，她与我们一连通过四五次的信了。她的见解完全与以上的相反。她否认环境可以支配人，她说“一切失败都是由于自己没有力量，不好”，“人定可以胜天”，“人是万物的主宰”，“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为所欲为”，“一切不幸的人都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不能错怪环境不好”。这是属于主观努力绝对乐观论者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对于这三位朋友的意见应该如何来加以批评呢？是的，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一面，却也不是那种折中之论，一方面承认一半。因为周、方二君只把眼睛看看环境，或是专看自己的一方面，是一种形式的，静态的看法；至于那折中论者，也不过将人和环境作两方面的看法，再作一种凡俗的持中之见，都不是正确的看法。

这一点，我们要首先不客气的指出。

先就周、邹二君说。他们是太把环境的势力夸大，把环境同人分开，把人的力量看得几乎没有了。同时把人类整个的力量或者大多数人的力量与个人的力量混同了。所谓"人可以克服环境"，自然不是说人可以离开环境，为所欲为，纯凭一己的幻想，就能创造出一个美丽的世界来的。这句话同时没有否认人是环境的产物，时时刻刻要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不是人就被环境束缚得一动也不能一动呢？不，决不！人一面是环境的产物，要受到它的支配与影响，但人仍能自动的改变环境，使环境更适于人类，或个人的生存。这我们只要打开人类进化史来看，它就告诉了我们人类如何的与自然抗争，与人抗争。人类社会是如何的一天天变得更适于人类的生活了。

同时，我们又看见，无论人类如何努力，"燧人氏"（假定上古时代有这样一个人）那样的发明家，在当时也只能钻木取火，却不能马上运用电光。中国目前喊复兴农村，却不能象苏联一样，全国登时改造电犁机，成立集体农场，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是说，改造环境也仍不能离开现实的环境，不管现实的环境的物质的发展力（即社会生产力）。在"燧人氏"的时代，克服自然，改造环境只能做到钻木取火，只能生出"燧人氏"这类人物，却不能产

生爱迪生，发明电气的用途，利用电气。中国倡“复兴农村”不能马上主张集体化，电气化，就是因为中国工业太不发达，没有使农业机械化、集体化的条件。这就是说明了人类可以克服环境，但不是任凭人类的幻想的，它仍然要受实践的环境所限制。

这是就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国家共同努力克服环境说的。

讲到个人或一部分，“可以克服环境”，不全屈伏于环境，也不是假话。围绕着个人的环境，是已先存在的大社会，及包含在这大社会中的小世界。譬如就邹君说，他的生活的环境是中国大社会和他的职业小世界，即百货商店，这里邹君个人的利害，几乎是与一般店员相同的。邹君对于他的小环境自然是万分不满意的，工作时间太长，没有自己读书的时间，工钱太低不够一个人的生活，店内进东洋货，不爱国，一般同事的醉生梦死，不足与谈。这一切在邹君看来是黑漆的一团，说要改造这样的环境，试问如何去改造呢？反抗老板的虐待吗？一个人出头要求增加薪金，减少工作时间吗？反对老板进东洋货吗？哼！这都是鬼话，这年头儿，除非你不打算混饭吃就罢，否则还是安分些好，这不是明明白白环境支配着个人，不准你一动也不准你动吗？

这种情形，确容易拉人向悲观方面走的。不过，其实仍是自己观念上犯着错误。这里把个人与他人同一的利害将它分离开来，以一个人来代替大家，所以乍看起来是不能不悲观的。譬如邹君的职业环境的改造，明明不是一个人可能成功的。但又不能不去作个人的努力，这是怎样说的呢？就是说要彻底的谋得生活的改善，几乎就是整个民族解放，社会制度改善的问题；即就小焉者说，要加一点工钱，减少半小时工作，不进东洋货，不仅不是邹君一人之力可以转移，也几乎不是一个公司的人协力行

动可以做得到的；这应该由同业低级职员共同奋斗长期努力去争取。邹君看不见这力量，只看见一个渺小的自己，自然，不能不觉得当前是黑漆的一团了。这没有什么足怪的地方。

或者邹君要说，我虽然知道应该如此，无奈大家不明白，都怕掉饭碗，要等待大家觉悟，恐怕中国早亡了，我们早已饿死了。索性不管它吧！当亡国奴，做饿死鬼，不仅我邹某一人！这就是大错特错！

何以故？所谓改造环境，自然不会一帆风顺的。改造原是在黑暗中，是一种长期的抗争；不然就不叫改造了。能够克服环境的人，是在艰难困苦中把握住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努力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例如就邹君的环境说，要达到以上的目的，虽然不易，可能性却是有的。店员无论如何头脑昏乱，他在生活鞭笞中，总不能说没有清白的一天，说服他们的醉生梦死，是有机会的；稍微改善一点生活待遇，只要店员行动齐一，也不见得办不到；反对进东洋货，更以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去影响，造成一种社会的裁制力，这一切的条件，如果在一个百货公司造成了，自然登时可以影响，推动你的同业；等到大家的情形都达到某一共同点了，说不定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的。不过，这里我要加重说一句，所谓个人对于环境的改造，却不能眼睛只看见自己，或自己同一职业几个个人，你依然要看远一点；须知没有大社会（或国家）安全，这些合理的条件，个人或少数职业集团的生活是不会好的。所以，关于个人从下爬上树枝的成功，这里不想去多说它。

我们在奋斗中，也许自己一无所得，反而破坏了个人较好的私生活，或者遭到失败，但这失败并非没有所获。一个人闭着眼

睛，只看见自己个人一时的利害，以巴结老板，讨好老板奶奶，或者用什么取巧的手段讨人欢心，以图个人往上爬者，虽然偶然也有成功的，改变了个人的环境的，但这种牺牲他人，侥幸的得到改善，不能算是我们所谓克服环境，那只能算是真正的屈伏环境，甘心做阿猫阿狗去适应环境。譬如，东北有个汉奸，他在张学良时代还是一个无赖的穷措大，但是他做了日本的顺民后登时就富贵起来了。这不能说他善于改造环境，就是一个好例子。这种凡俗的，只顾当前个人利害，不足语“克服环境改造环境”的。

邹君大概错把自己过去许多生活，在奋斗上的失败，都看做没有什么收获了吧？邹君！你把个人力量作成大众力量固然是错误了，你把个人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失败，看作是全无收获，也是错误了的。改造之事的确是不容易的，但你如果明白改造的过程，把握住了实践的过程，以及看清了个人是社会的一小单位等，就不会徒然喊难的。

至于俗语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两句话的真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要有了东北事变，才会产生民族抗日的英雄，这就是指时势造成的。但为什么不能人人成为抗日英雄呢？英雄为什么有时也不能保持晚节呢？这就说明光止有了这样的环境，或称作“时势”，如果不自动的去握住这“时势”，去引领大众站在民族危机的最前线，为民族去抗战，却只坐在家内，这民族英雄的头衔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东北事变后，有许多人成为大家崇拜的人物，有许多人在被人唾骂的缘故。反过来，英雄造时势，这句话一向被人看作真的只是英雄个人造出的时势来了；其实不然，英雄之成功，仍然是要归功于大众的。一个名将“战必胜，攻必克”，是他的军队集体之力，不能专看做是

他个人的力量。所谓英雄也者，也不过在某一个时代，把握住了大众的要求，最勇敢的站在前线去执行大众的意志，比别人或者做得更重要，更多一点事罢了。并不是不管一切环境，不要一切条件，英雄可以从空想中造出一个世界来的。但也决不是由于他自己有较好的环境（这里是指他个人的，不是指时代）。

所以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环境固然决定个人，但个人也可以影响环境、改变环境，这两者的关系，是不能抽象的专从人或环境一方面去看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于个人或环境，某一方面作过于夸大，或过于轻视的估计；因此不会对于某一方面畏缩或夸大。

现在要反过来对方女士请教了。方女士那种否认环境说，看了以上的话，大概可以不攻自破了吧！方女士是大学生，根据几次来信，我们知道女士的生活是非常富裕并且自由的，女士的家庭环境及目前不良的教育，造成了女士对于人的夸大病。我们不能专责女士。至于"一切不幸的人都是由自己的不努力，不能错怪环境"这句话，存有几分真理，我想，是用不着我来赘述的吧！

自然，我们不是环境论者，一切都委诸环境不好，把人看成了完全被动的东西，但我们不能象方女士那般在空中说话，忘记了自己是生在地下，生在今日的中国社会，是中国今日的社会的产物。

中国民族目前的环境是到了非常的危机与困难的，但克服这危机与困难，是我们努力改变这不利于我们的现实，而成为利于我们的条件，不是完全无希望的绝望。因为改变环境，造成时势到底还是人类。这么一说，我想，这一个平凡的问答或者倒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一通回信吧！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

最近有几种刊物上都谈到哲学的重要，说明了哲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是不务实际的人出世的或消闲的玄谈，研究哲学的人不一定要是文雅幽深的哲人，而每一个为衣食奔走的人也一样应该有正确的做人的态度。个人需要有哲学思想，一个国家在某一时代要有一种共同的哲学，这无疑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

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三期上，我更发现了张季同先生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文章。这真引起我的兴趣不浅。因为研究哲学的风气现在虽然被人提起，但象张先生这样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实在比抽象的论哲学要来得更为具体，因此张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也就可知了。

不过，在读完张先生这篇文章后，我仍不能不怀疑，仍不能认明张先生给我们的所谓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哲学。现在为求彻底明了起见，特将张先生那篇文章的要点，摘录如后，并列出我的疑问，请你们给我一个明白解释。

张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要具以下四个条

件：

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点以为一大系统。

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

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的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

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

因此，张先生认为，在内容方面，就应该具下面的性质：

一，在一意味上是唯物的。

二，在一意味上是理想的。

三，是对理的。

四，是批评的。

这是全文的纲要，我的怀疑处：

一，中国目下哲学所需要的条件不知张先生是根据什么确立下的？是根据中国客观的实践呢；还是凭张先生觉得怎样就随便定下了这四个条件呢？

二，因此，对于第一条件，我不知道所谓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点，是如何的融会法？“精粹”是以怎样标准拔出；优点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如何使这二种东西融会呢？

三，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又如何运用这力量，对谁运用这力量呢？

四，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真的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方法么？

至于在性质方面，我也认为太不明白，并没有具着中国

的特殊性，他指出的四点，可以说一般的时代都是可以应用的。

我有了以上的怀疑，但我却没有批评他，说服他的力量，谅来也不仅我一个人的罢！？务望对这问题公开答复。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什么呢？这不仅金君对它生出兴趣，我们也是抱着金君一样的热心在研究张季同先生的文章的。金君以上所提出的怀疑，我们也同样的感到，张先生那篇文章，无疑的是有毛病的；是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示出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哲学。现在且就我们所看到的逐一将金君的疑问加以解答吧！同时，我们也诚恳的希望张季同先生对我们的意见给予指教！

金君怀疑张先生最基本的一点是不知道张先生根据什么作成那四个条件，那怀疑是完全需要并且是应该有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张先生这篇文章的价值。

张先生说"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这是对的，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客观实践的需要，但中国的客观实践需要什么？张先生并未告诉我们。张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大系统"、"精神"、"力量"、"原则"、"方法"、"科学知识"等东西，是从哲学出发而谈哲学，是离开中国社会客观实践而言需要，而谈适应，所以金君觉得张先生只是凭着自己主观在定下什么条件，这不是金君的粗心，而是实在的事实。

中国现在需要什么哲学？这要由中国社会客观实践的需要而决定。哲学的思想是社会心理的结晶，社会心理是社会层间心理的集中的表现。而这心理的形成又由于社会经济关系，与

政治制度所决定。哲学思想如果与下面的基础不调和，则这种思想就不是需要的，反之，它能作用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成为行动的指针，是需要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中国今日需要什么哲学，首先，我们就应本此原则去认明中国社会今日的实况。

不要回避现实啊！不要惧怕真实啊！中国目前的实践是一个极端复杂多样的构成体，在急速度的动荡中要求新的存在，新的发展。这里成为这复杂的动态的主张，和民族行动的总标志的，是要求民族领土的完整，及争得民族解放终局的胜利。这里自然包括政治的独立，经济的解放，文化的更新各方面的胜利的意思，不应是狭隘的某一方面。

但是如何方能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如何争得民族解放终局的胜利呢？那是不能靠上帝的，这里是要用血与力去换得它。维持领土完整，不仅是要保持现有的，还得收复失地，这就意味着突破当前民族危机的意思，要突破当前国难，才能讲到取得将来解放的胜利。这一切客观的要求，无疑的都集中到力的战斗上。只有这一民族生存的斗争，才是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标志。这才是实践的真实，一切上层构造的基础。

从这种实践，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

需要能作为这伟大民族的指针的，能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的。凡妨害这种战斗，不论在哪一领域中，都不是需要的，要唾弃的。

如果依据这实践，关于张季同先生所定下的四个条件才不是空话，才可以有实际内容的回答。金君第二疑问，我就可以回答，中国先哲思想之保存与弃置，西洋哲学之吸取与坚拒一概以

是否有利于我们当前的奋斗，能成为我们的行动的指导为取舍，这不是明白而又简单的么？所谓“融会”也就变为平常，脱下了神秘的外衣了。“融会”只有在实践的奋斗中，才可以谈到啊！不是想象的合作呀！

关于金君的第三个疑问，那也要有了实践的基础后，才能说“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是民族战斗的精神，“力量”是民族集体的力量，是运用这力量去完成我们解放的目的。

至于金君第四个疑问，我们也认为金君疑问是应该有的。中国的新哲学，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学体系中，用不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夸大，否认了一般性啊！

总之，在张季同先生的文章内是交代不出以上的回答的。我们对于张先生所谓“最少须能满足”的条件，可惜完全是张先生头脑中的产物。

由张先生所臆造的条件而规定出来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内容，怎能不是“没有具着现在中国的特殊性”的东西呢？

不错，新的哲学的内容应是“唯物的”、辩证的（dialectical），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唯物、辩证的，自然就包含着理想、批评。张先生！新的哲学是战斗的，它应是行动的指针，它要指挥着残酷的战争啊！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都不能例外，难道还会忽视批评的、理想的么？

自然，张季同先生的这篇文章，明明是在半空中说话。没有实践的基础，所以也就缺乏针对性，虽然张先生在主观方面或者不自觉，而实际则变为哲学者客室内的谈玄，并未有触着“现代

中国”，所以也就说不到它的实际意义了。

我们所见如此，写了这一点以供金君研究的参考，同时敬候张季同先生的赐教。

叶青先生的方法论

——答左光华、刘士骥二君

一　问题的提起

近来有不少的朋友由研究逻辑（指动的逻辑，下仿此），注意到逻辑的运用，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本来逻辑这东西，不在实践中去理解是不能获得真正的了解的。一个研究者要了解当代的逻辑家，也只有从他的对于现实各种重要的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中去理解，才有认识他的可能；一个逻辑学者的真正面目也常常无情的被这实践所表白了，他无法逃避这一试金石的，因为他是一个过着现实生活的人，他不能对当前的现实生活终生的沉默不说一句话吧！所以专门的卖弄逻辑辞句的学者，只能成其为"学者"，他并不能真正的懂得逻辑，所以，一个学逻辑的学生，在开始研究之时，一方面固然应该虚心的去读那些不折不扣的逻辑家的逻辑著作，及其他对于现实问题的言论去学习理论与运用，同时，也应该虚心的去博览许多冒牌逻辑家之言论，从反的方面去辩证真理，这自然不是无益的事。

左、刘二君已能把握这种意义，精细的去读杂志上的论文，是非常可喜的事。左、刘二君的来信都是为读了《世界文学》第一卷第二号叶青先生的《语文论战清算》以后而生出了许多怀疑，不耻下问的问到我们了。因为二君的着重点不在语文论战

的本身，而在叶青先生的方法论，这倒使我们更加高兴。因为我们这里爱谈的也多半是方法论这类理论的东西，至于语文论战呢，我们因为在战野中不是什么战斗的角色，不想胡乱开口。

谈到叶青先生这篇文章，也许不久要惹出“语”“文”那一方面的人的再战的，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篇东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处，至于专谈这篇文章所用的方法呢，那确是有兴趣而又有重要意义的。叶青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上就说“要想问题有正确的解决，在文化上也同政治上一样，必须于新而高的方法论有充分的理解，公式的一知半解是无用的。”是的，叶青先生自己的这篇大文，无疑的是在“新而高的方法论有充分的理解”(?)后写出来的，所以拿这一篇文章中所用的方法论而研究叶青先生的方法论，不能算是断章取义了。我们很以左君的话为然：“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一篇文章中，叶青的方法论是什么，他的其他的著作中所用的方法论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因为这是叶青先生最近的论文，比较是更可靠的。”好吧！我们接受了左、刘二君的质疑，并求教于叶青先生之前。

二　内容与形式

左、刘二君的疑问，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第一点，就是内容与形式问题。左君说：“叶青把文字的内容与形式截然分开来看，是不是犯着形式的看法呢？叶青说过，‘在这里把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是不对的’，这我就不懂解。”不错，这不懂解，岂独左君吗？就是记者如果认为叶青先生是用的“新而高的方法”的，也确同样是不懂解的。因为我们对于文字的内容与形式也只能

在对立的统一的法则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离开内容谈形式是不可能的。我们虽然承认文字是一种工具，但不是说这工具与内容是分开的，无关联的，而这工具要为内容所决定。反之，这“工具”同时也要影响内容，有时竟会束缚内容。内容自然是“有一定的社会属性”，而代表什么意识而言，但在形式上也不能不与它相应。它们同是在一种流动的过程上，变，变。他们永常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统一的。这只要用社会学的眼光观察世界语言进化过程就可得着明证了。如果一定要把它分开，认“文言白话、大众语只是工具”，分别在“容易普遍不容易普遍”，而这又是“工具底社会属性之所在，一点也用不着内容来显示它”，这真是主观的静态逻辑的看法了。第一，我们要问，“容易普遍不容易普遍”果真是仅仅一个形式的问题么？不见得吧！几十年前中国就有官话翻译的《圣经》了，为什么《圣经》的道理现在并不普遍？这难道不是因为《圣经》的内容不是中国大众所需要的，虽有较易普遍的形式也仍不能普遍吗？第二，我们要问普遍的要求是从谁人口中喊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大多数的人口中喊出，这要求不免是一种幻想，如果是大众提出来的呢？那才合社会的实践。为什么他们要求普遍呢？他们是多数，他们要求发言了。因此，他们要求着自己群团的发言工具了。这种发言工具是采着什么形式呢？自然他们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仍不能不是既有的工具中生长出来的，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是抛弃其旧形式，一方面在创造新形式，这完全是由于这新的要求者代表的意识为内容而决定的。这里不应该仅仅看做“容易不容易”，这“容易普遍”，虽然是新的语言一个重要条件，但这新形式包括的比这条件要更大，这种新的发言工具还要能有表达大众的语言最大可

能的活泼性,现实性,积极性。一切主张改良白话的人，都只抽象的看到“容易普遍不容易普遍”这一点，忽略了后者。目前提出大众语,扬弃白话,不仅为白话“不容易普遍”而在白话的社会属性不是代表最大多数的群团所用的语言的活泼性，现实性，积极性的。至于同时代的社会层，如“五卅以后别的进步的社会层也同样地使用白话，封建分子用的也不少。”这有什么奇怪呢?新的文字不是一天可长成的,反文言的时代,胡适也用文言反文言，现在提倡大众语的诸先生们也同样用白话在反对白话了。这虽然是新的内容利用旧形式，但这是新的言语未长成的过程上必然的现象，不能拿来作为掩护形式与内容完全无关的,何况,如果更仔细的分析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也并不能笼统说是一种形式,它有五四时代的老调子,也有带着日本或欧化气味很浓厚的腔调,也有近于大众化的崭新的文字诸要素。进步的社会层所用的语言，也每每是这旧形式中一种最新的。再说到封建分子用白话的也不少,我不反对,但即令他们的外表上接受了这形式，因为他们的意识是封建的，所以他们运用这形式也有一定的限度。总不免是一双解放得不天然的脚，眼前的例子就明明白白,当前玩弄白话文的人,不已经有的在文言化，有的在学语录么?这不是无缘故的。所以我们把叶先生所举的这些现象认为是一种特殊而又偶然的,不是出于他们的本心的。这冒牌货色,总有一点象劣货,他自然不能不在某些地方现出原身来。封建分子回到私家的住宅时,还是会焚香念《太上感应篇》的呀!

叶先生又说“如果把内容弄进去，那末问题就多。”那不见得吧?“前进意识中发生了派别时又怎样呢?”对于“新而高的方

法论有充分理解”的人说出这话来，诚有点可惜。前进意识中发生了派别了，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不过说明这一意识中有的仍在前进，有的败退了。前进意识仍是一个在活泼泼的前进啊！叶先生难道相信真理同时会有两个存在吗？“这种分裂，还不仅一次呢？”是的，如果前进意识就是没有分裂，这又是形式论者否认了内在的矛盾，把前进意识固定在没有发展的看法了，自然不会被真正对于“新而高的方法论有充分理解”的人所许可的。

三　白话与大众语的关系

关于白话与大众语的关系，左、刘二君对于叶青先生的“不能同意”，也疑心是在叶青先生所用的方法的问题上，这也是对的。叶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很明显的不是把语言发展作为一个过程而考察的，他把中国语停止在白话的阶段，并将它永久化。“白话不彻底，夹杂一些文言是对的”，“反对白话显然是谬误”，最好怎样呢？是把“流行的现成的白话文拿来改善一下”，“使白话文成话”，所以他看不清在现阶段上有划时代的大众语运动。叶青先生在这里却忘记了“世间没有永久存在的东西，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因为不从过程去理解大众语问题的提出，因为把形式与内容截然割开，所以大众语与白话的关系只看见对立，看不见大众语是白话的发展，是中国语言的内在的矛盾的长成的结果。自然，他也看不见大众语的前途，只认作是“标新立异”，“完全是一种名词的把戏”。

叶先生的了解语言，因为只是形式的，所以他会起来替白话辩护，他首先提出“说”“写”绝对统一是本来没有的，白话不能统一“说”“写”，不能责备白话，大众语要求“说”“写”统一不是幻想

吗？其实这是废辞，大众语并不要求说的人开口一定要文法井然，修辞美丽，象文章一样，大众语主张“说”“写”的辞汇语气统一，是“写”尽可能的与“说”同一，不用说，大众语与白话在“写”出与“说”出的同一上，前者是具有较后者的可能性多，因为白话本来就不是现实的口语，更不是大多数人的口语的缘故。

第二，他说“大众底程度太差，在文盲充斥今日，就用大众语写，他们也读不懂”。他这意见是从否认内容决定形式，把形式作孤立而来的。文盲不能读文字写的东西是一件事实，但如果有种大众语文写的东西，虽然文盲不能看，若果有人念给他听，只要内容与他的生活不很隔离，他依然会懂得，至于白话呢，我们就念给他听，他也难听懂的。这一点，就是大众要求自己的言语工具，要求白话发展的所在了。至于叶先生提出的第三，“讲到政治经济及其他，就用大众语说，他们也听不懂。”这却不然。这因为叶先生以为只有从文字上才可以摄得知识，看不见从实生活上给我们的认识，今日大众虽不能运用白话，读政治经济书，但这些理论他们都容易接受，想来这是叶先生所未梦想得到的吧！可惜，我们现在还有人要反对大众的语文，要他们在形式上永远多受一层隔阂，我想，如果将来真的“换了大众语”，叶先生一定不会作“无济于事”的兴叹吧！

因此，大众语与白话的关系，是全语言运动的过程中一个阶段，它一面是扬弃白话，自然一面也吸收白话中可作大众语的要素为新语言的要素，仍然是从白话出发，所以前途虽然朝着音符化，但目前并不就要倡言一朝废弃方块字，所谓手头字，白字等提倡，仍为必要，是实践过程上必要的。所以这决不是改良白话的问题，因为中国语言的发展是要求既成的言语，意识的使它适

合口语，不是把千亿万人的口语置之度外，叫人鹦鹉似的去学习死的语言的呀！因为这是反发展的，我们只应就大多数人的要求来创造新的语文，不应再幻想用“义务教育”来宣传以前倡导的“国语”了，因为这是无远大目的的运动，是没有抓住实践的。

四　方言土语是封建的产物

叶先生对于方言土语与大众语的关系，真如左君的怀疑，是“太观念论”、“太机械论了”的。为什么是太观念论太机械论呢？叶先生说，“因为事实上，只有方言土语而没有通行全国的大众语”，不错，大众语现在可说刚在创造的途中，可说并没有现成的货色，又确确实实在万亿人的口头上在流传，大众语的创造自然不是观念上的把戏，而是要把这活在万亿人的口头上活用的言语统一起来，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语言的发展。中国目前方言土语占着绝大的势力，他们都是生活上的语言，是构成统一大众的原料，却不就是大众语。大众语运动不忽视方言土语，并且主张多元的发展方言土语，是握住这一运动现阶段的一环，是合于逻辑的。但大众语运动决不就是方言土语运动，以发展方言土语为满足，为最高目的。这里又是要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了。发展方言土语同时就是要消灭方言土语。方言土语文学的提出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需要的。不错，方言土语的社会基础不免是封建的，同时是一种语言上的割据。站在大众语主张的人是承认要消灭它的，可是要消灭它却不是仅仅用“左的辞句”，空空地说几句话就做得到的。我们先得造成消灭它的条件。但这里又不能用机械的观点去作抽象说明。这要先得把握住中国民族解放（它包括国民经济及社会改造）根本问题，大众语完成的过

程无疑的与中国民族解放过程相适应的。但也不是等待中国民族解放完成了，大众语就会天然的成长起来。这是要作一种意识的促成运动，使语言自然发展的过程缩短。同时，这种意识的运动，本身又是促成民族解放主体的。因着现在有了这一主体作为中国文化的背景了，在语言方面，动向是要求大众化。实践呢？是通过各种方言土语，用同一的实践内容，使各种的地方的形式渐渐融和而成一种丰富的共通体。所以，方言的封建性，同时在今日又可利用它作反封建的工具，利用今日的方言土语，不是维持封建的割据，而恰相反，正是弃除封建性，造成语言的统一。叶先生明明犯了观念论的机械主义的错误。

五　大众语的音符

语言进到音符是一种必然的阶段。左君似乎还不很了解。叶先生“以为汉字改革是必然”的，总算是他在这一篇文章中最进步的说话。关于这一点，我在本文第三段已略略提过了。中国语进化成一种什么样的音符是一个问题，但朝着音符化是必然的。目前提出什么化也不仅不能认为空想而是必要的。因为语言在今日也再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了。叶先生否认拉丁化土语文字，是由于根本否认土语而来的，更深一层说是由于否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一点而来的，所以叶先生对于这一段的分析，也不免是观念上的一种游戏。

六　总　括

因为我们是讨论叶先生的方法论，所以我们的话也只想止于方法方面，关于叶先生那篇大文各个方面却不想更详细的谈

了。至于结论呢？那是他的方法论必然达到的结果，是一点也不足怪异。我们自然不能同意的。因为我们不是要替大众语来辩护，所以也似乎没有加以批评的必要。我想，还是让语文双方阵线上的人们去再“清算”去吧！我们书痴子暂时就谈谈叶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所用的方法论为止，以免见笑文语双方的“方家”吧！

最后，我很负责的告诉左、刘二君的是“新而高的方法论”在叶先生的文章内是没有的。

李权时所处理的实际问题

——对李权时的《中日经济提携运动我见》之批判致答陆伯渊君

一

关于中日经济提携确又是一种时论了。但它比“敌乎友乎”不同些，因为提出这问题的人是日本，但也并不是正式向中国官方提出的，起初还不过是放一种空气，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大纲最初见于上月十三日电通社露布的消息。在日本的舆论方面，虽然有许多捧场的意见，但发言都谨慎得很，因为这种消息起初还只能作为一种试探中国政府人民，和国际间，尤其英美的态度之用的，将来实施时到底怎样，还不能就说确定。

至于在中国方面呢？虽然这是一种空气，却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如果它是危害中国国民经济及主权，哪怕它是空气，也不该让它在国际间存在，不然就有失我国国体。

不过，在发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前，我们却应该特别慎重，其慎重的限度，我想，比起日本舆论所持的态度来还应严紧些。我们应该深沉的去研究它，却不该浮躁的轻于说话，尤其是“领导中国国民经济的银行界的机关报”，不应轻于登载对这一问题没有深刻认识的文字；尤其是捧场的文

字！一个几乎有了二十种大小著作的"经济学家"(?)在发表文章前，最低的限度不应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自己以外还有大众，自己死后还有子孙，一句话说完，总要说出来的话不象日本的臣仆说的才好。不然，就会使人怀疑这篇文章是一篇译稿，是日本人写的。

可惜得很，对于这样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在国内刊物上大致也都提起了，但代表中国银行界喉舌的《银行周报》在第十九卷第七期中日经济提携讨论专号内，却登载了有"二十种大小著作"的"经济学家"李权时的《中日经济提携运动我见》的大文，这真使我大吃一惊，我几乎疑心这本杂志是在东京出版的。

但为了忠挚的想了解这一问题起见，所以我压下一时的愤激，平心静气的来向先生们请教。我第一不知道李先生这篇大文是否代表中国银行界整个意见，如果是的，这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殖民地的"金融资本"必然的结论呢？第二，我想先生对于李先生的谬误深刻给与批判，使我和我以外广大的大众，不致会被他那番话骗过。第三，从李权时这种处理实际问题，我想到他的经济学说了，我想要求先生们指示出这谬误的根源来；即对他的学说，下一个概括的结论，使千百大学经济学系的同学抱着他的"经济学原理"执迷不悟的人，因此打开眼睛吧！

以上陆君来信的摘要。

这里我们要说，陆君这封来信，有点出了我们意料以外，因为陆君方不过是一个平常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能这般的注意

当前的实践问题，而又有以上那样正确的见解，丰富的热情，冷静而又谦虚的态度，以及把理论与实践融成一体的作学问的方法，这一切都使我们对他十分敬意，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今日的大学生虽说象陆君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的，也还觉得有一些儿希望，因此，也就乐得来同陆君讨论各项问题了。

二

关于中日经济提携这一问题，在本刊上一期(第九期)本栏内有一篇答吴致和君的通信，在原则上，要算发表过我们的意见了。不过，在吴君那封通信的时候，国内对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还不多，并且还没有看到《银行周报》李权时先生那样重要文章。所以在那封回信中，只说自己的见解，没有提到别人的意见，至于陆君看到李先生的文章觉得骇怪的，我们也几乎有着同感，不应该看完了，不加以一点自己的意见。至于这篇文章是否是代表中国银行界的意见呢？这可不是我们敢于随便妄断的。不过，既然能登在《银行周报》上，多少是很有代表言论的嫌疑的，这一个疑问，我想暂时还是存疑，让银行界以后发表的意见去定夺吧！

这一意见所代表的意义是否有点殖民地民族资产者的味道，我们的感觉也有些同调，不过这倒不是本问题最重要的部分，不去详谈它，现在且来检查李权时先生的高论吧！

三

先看李先生的对于经济提携的解释。

李先生把国际经济合作分为三种：(一)国际经济分工，(二)国际经济提携，和(三)国际经济集团式同盟。关于第一种，就是

今日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展到世界经济的阶段必然的事实，这种关系有的是根据于地理的不同，有的由经济发展的阶段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互助，自然没有加以反对的理由，也不是随便可以由你加以迎拒的。这种广泛的话，实在与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是风马牛不相及。第二种国际经济提携的意义不甚明显，大概是指甲乙二平等国家间，在经济上有着共同利害的一种结合，其性质大概也是偏于一时的。中日经济既然发展得不平衡，自然说不上。第三种，也就是李先生所谓“其意义最为狭窄，其范围最为局部”的，大概是指由一首脑国为主体，而领导一群卫星（殖民地）的所谓布洛克经济吧！不过，李先生故意说得不明不白，使人不明真相，这种布洛克的结合，中国诚然有资格，即作为这种经济主体的一种补充，其结合不是纯经济的，它是运用暴力结成的，这里谈不上什么“平等，互惠，独立，自尊”的鬼话，干干脆脆是做殖民地。日本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的基础，明明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变为完全殖民地，在日本布洛克经济体系内构成一分子。我们在上一次答吴君信中已经就说过了。

李先生这一段话诚象陆君说的是“放了一种烟幕”，“读了李先生这段大文的人不觉就有点昏昏然了”。然而，书归正传，现在且来看看这位著了二十部大著的经济学者对于中日经济提携大纲那六条的认识吧！

李先生对于第一条日本拟由民间组织中国实业视察团是“吾人将一本修睦精神以待之”。这一句话，初看起来好象没有毛病，但经不起细玩。这就是李先生把这视察团所负的使命，及其侵略的重要性抽去了，不然的话，诚如陆君所说，这“修睦精

神”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知道，这种视察团与美国派往苏联，苏联派往英国等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不能将它混同。

李先生对于第二条中国应先重定经济政策，只认为“其意义甚为含混”，不觉得这话不应该由日本人说。它对中国是一种侮辱。中国的经济政策，照理只应由中国去定，用不着邻家来代谋，代谋已经糟糕，然而还要弄出中国人去揣测自己应建立的经济政策，这真是在闹天大的笑话。邻家要我们建立什么政策呢？“似欲采行重农政策”，并且据说，这已经是国货，“吾国金融家”“早已有所主张矣”。这是什么话，即就重农政策说，这已是腐朽之论。中国目前要求的明明是国民经济的解放，中国生产方法现代化。我们要振兴农业，但不是采什么“重农政策”，而应是将封建性的目前农业生产方法与关系，飞跃达到最进步的新农业形式的前途去。这就得在国民经济改造中，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先应占更大的比重，先造出农业发展的条件才行，不是单独提出重农政策，我们应当知道，没有工业，也就没有农业，否则就是无意自甘于殖民地经济性质的保持。再不然，就是一句不懂经济学的人的笑话。

关于第三条中国应改革米麦粮食品输入之变态的现状，诚然不错，但改革的进程决不是先于农业技术方面，要技术改良，上面已经说过，要自己有相当发展的工业作前提，才有可能，至于与帝国主义国家谋技术合作，那完全是梦想。技术合作四个字不过是一个烟幕弹，它只有和缓国民的情绪、扰乱国民的视听的作用，用它掩护帝国主义者对于农村更进一步的侵略，对于中国农业经济不会有好处。不仅如此，甚至“借重客卿”要想不“喧宾夺主”亦都会谈不到。这不要说半殖民的国家无此抵抗力，就

是苏联那样顽强的国家当其进行经济复兴中，亦曾放弃利用外资的政策，也不能随便的与人“技术合作”、“借重客卿”，否则就会“喧宾夺主”无疑。是的，在自己经济力、政治力都有支持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力量了，在某种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利用外国进步的技术和专门家都属应该，但这谈何容易，人家实行一个五年计划后，才培植了这一种条件呀！然而，在那样铁掌中，那些“客卿”，还要参加实业党、暗杀党等的阴谋，弄得几乎把已成功的经济建设都破坏。这不是人家的榜样就在眼前吗？

第四条，以“促进中国生产大宗农产物，以便日本工业之应用”，李先生认为是“合理的蕲望”这一点，前面已经批评过了，这是自甘于殖民地经济性的人的蕲望，李先生有点象同他的善邻在唱双簧，一言一语，都好象是先套过板的。他把中日的将来关系比作英美，是何等不伦不类的比例。英美的关系，在美国方面果真只是生产了大宗的农产物以便英国工业之应用吗？我想，李先生虽欲自圆其说，恐怕没有那样的胆子来否认美国不是高度的工业国吧！美国有多余的农产物供他之用，故然是事实，这一方面是美国天然经济力比任何国厚，但最最主要的还是美国有了高度发展的工业，才能有高度农业技术，高度的农业生产呀！他卖农产品与任何国家不过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不会有什么条件的呀！李先生，你虽欲掩蔽事实，恐怕你再写二十本“名著”也还不能说服天下人吧！

至于第五条明明是日本要统治中国棉花生产，消灭中国方兴的纺织业、抵制印棉两种作用上。李先生是“极端赞成”，因为有了三千万华棉出口，吾国对外贸易出超可以减少，白银流出的威胁亦得减轻了。这诚然是经济家的话，他的脑子里的算盘上

哪里能忘了这三千万的银子呢？可惜的是他忘了目前中国纺织业自己还在购外棉，近年来初培植的一点国棉生产，还不够自己之用，他却替日本纺织业担起心来，这是何等的善邻啊！但是，这三千万生意也不容易兜着呀！条件是要"彻底取缔排日货运动"。李先生却一口答应了"自动的"来扫除。这真使我们不测高深了。若说东北四省亡了，李先生已不能记忆，我们无甚骇异，因为一个专家，不免有时眼睛只能射在"专业"上，是不大以管天下大事的，但李先生是经济学者，他不应忘记，在今日，抵制日货有助长国货生长的作用，日货倾销的结果是国产的沦亡，破灭等等，这在经济学上，即令是流俗的经济学原理的ABC上，都是说过的，李先生能否认吗？

最后，第六条，日本拟在上海设立二万万元之信用基金，李先生也欢迎。是的，日本人说的，李先生总欢迎，这一点也正如陆君所说"这是日本谋在中国金融统治的开始，想在上海先取得汇丰的地位"。不独中国国民经济更沦为日本银行仓库中物，亦将引起英美战争。李先生眼睛只放在"此巨额的信用"上，他忘了就是流俗经济学上也是承认的，今日金融资本统治产业这一事实。日本金融统治了上海，中国产业还有希望吗？就退一步，让日本来统治，英美也不说话，中国金融也不见稳定，国际间的贸易也不见得能圆滑，何以故，因为日本所谓二万万的信用是说大话，日本除举空头支票外，是不会拿出二万万现银来，因为他的国库存银的底子就不过四万万几千万。他拿不出这么多白银来呀！

总之，李先生这篇大文要引起国人的怀疑愤怒是必然的；所谓"知己知彼，能屈能伸"，李先生真正做到的恐怕只可说"能屈""能屈"，第三个还是"能屈"吧！我们看不见"能伸"的是什么。

四

至于从李先生这一个处理实际问题的辉煌的例子去回顾李先生之经济学说，在一个正在读李先生《经济学原论》的人，是非常的必要的。因为这正是他的学说的应用方面，一点也不容他自己去掩盖他的。陆君并怀着去考察他的二十部大小著作的志愿，虽然在陆君读完他那些东西后，不免会感觉得时间是白花费，但为了使世人认识李权时先生的经济学说，那到不是完全无益的事。

这里因为限于篇幅，不能将李先生的学说作详细检讨，姑且略为替他作一点提示吧！

李权时是一位"博士"，他的著作中文的有十六种，英文的有三种，散见杂志上的还不在内。其中《经济学原论》是最重要的一本，复旦大学丛书之一，是今日中国许多大学采为教本的。其他还有几种ABC的通俗小册子，也传得颇广。他是中国经济学社的主干，编辑《经济学季刊》，在今日的中国，有人称他作"大经济学家"。

他的学说的内容，大致是由所谓"劳力价值论，经济心理学，经济伦理学，相对均产主义论"所构成，实则并无一贯之系统可言，有人说它是一种"杂炊"式的，倒很相象。不过，他很会舞文弄墨，"巧言代辩"的，他的学说的来源是什么呢？是一方面袭取了欧美流俗经济学者，特别是搬运了美国教授们流俗之见作为他的学说的基础，一方面融会了中国流俗经济学者的理论与古先圣贤的传说的腐烂的学说，装饰了成为"国货"。

他的方法论呢？自然不是科学的，是十足的混乱的玄学法。

他在《经济学原论》中，是用了简单的，落后的演绎法和归纳法，把消费、生产、交易、分配等无次序的说了一大通，把书写得厚厚的就算大著了。

所以，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他就可以作为新兴的中国产业阶级的辩护人而出现，但是到了今日，他又几乎成了日本的代言者。这都与他的学说中，美国式的实利主义的流俗之见的要素有关，使他的眼睛只看到目前的现象的表面，忘了有中国，同时也与中国固有传统的要素有关，弄得他只会翻古，唱什么"重农"的老腐调子。结果，他的学说变成了非民族的流俗论了。它成功了殖民地的流俗经济学。

关于对他学说详细的批判，以后遇有机会时，再谈吧！

阿Q的精神胜利

——答方涤尘并批判吴景超《自信心的根据》

好久以前就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内读到一篇叫做《自信心的根据》的妙文了。作者是吴景超先生。说一句老实话，我对这种东西是不大重视的，这犹如我对这一栏其他文字一样，浏览过就算了。至于浏览的心情也不过想知道一点所谓"学者名流"的"高深"而已。

不想，我在同学间竟又听见有人在那里引用这位吴先生的话，而且好象大家都觉得有了一种新的希望，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的根据，这一回真的被吴先生找回了，中国也就因此得救了似的。在北方今日这样严肃沉默的空气下，在万分屈辱与羞愧之余，居然大家放出了笑颜，彼此无形的在那里庆幸什么，这不能不令我吃惊了。

是的，这篇东西仍有影响人的力量！尤其在今日有一种使人忘记屈辱，羞愧，而自甘于满足的阿Q的精神作用。由此，我想到以前对于许多名人的时论，抱着随便浏览、不关心的态度，有点姑容谬误的存在的罪过，很不自安。所以再从报纸堆里检出这篇大文来读一遍，我看见了阿Q的面貌，但是也觉得这位吴先生狡猾得很，他的话总带着"似是"

的面貌，要对付他倒不是很容易的。因此，我觉得实在自己先还有加以一番研究的必要，然后才能有力的批判的说服别人。

现在将吴先生的文章主要的两段，剪贴于后：

第一，中华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黑人在热带中很服水土，但到温带或寒带中，死亡率便加增起来了。白人与黑人恰好相反，他们在热带中过日子是不大过得来的。印度的英人，南洋群岛的荷人，每隔几年便要回家休息一次，否则健康上便发生危险。我们中国人便不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成家立业。若干年前，伍廷芳公使曾向美国人说：中国人服水土的本领最大，白熊住的地方，中国人可以去；产生鳄鱼的区域，中国人也可以去。这决不是夸大，只看中国侨民的分布，便可知道这是合乎事实的。中国人既有这种力量，所以在生存竞争上，不但是不会被淘汰，而且向各处发展的潜势力，也是很大的。

第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任何民族比较都无愧色，这也有好些事实可以证明的。根据伦敦大学靳世保教授(Ginsber)所引的统计，欧洲人头颅的平均容量，男子为一，四五〇立方厘米，女子为一，三〇〇立方厘米。中国人头颅的平均容量，为一，四五六立方厘米。如与德人比较，德人头颅的平均容量，在一，二〇〇立方厘米以下的，占百分之八，中国人只有百分之二。在一，三〇〇立方厘米以上的，德人有百分之七五，中国人有百分之九二。再拿脑的重量来说，根据托比兰(Topinard)的研究，欧人平均为一，三六一克，中国人为一，四二八克，此处我们要替欧人说一句

话，就是欧人脑重的平均数，是根据一万以上的个案而得到的；中国人的平均数，只根据少数个案，根据太小，也许不能目为定论。不过我们可以说的，就是现在的研究，证明我们的脑经，是并不弱于白人的。最后，我们再看智慧测量的成绩，虽然欧美有许多学者，举出许多研究，证明黑人的成绩，远在白人之下，但他们并不能举出统计来，证明中国人不如白人。隔斯(Garth)先生，在他的种族心理学中说，白人的平均“智慧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为一百，中国人与日本人为九九，黑人为七五。所以即如此公所说，白人与中国人的智慧，相差也不过毫厘之间。此外还有人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商数，在白人之上的，如古得益诺佛(Goodenough)，根据他的研究，谓中国人的平均智慧商数在一〇四左右，圣帝弗(Sandford)研究加拿大华侨的儿童，说中国男孩的智慧商数为一〇七·七，女孩智慧商数为一〇七·〇，远在西方儿童平均智慧商数上。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华民族的智慧，在世界的各色民族中，是位居前列的。

最后，我归纳了我的疑点于后，希望先生能作科学的通俗的解说：

“个人的自信心与民族的自信心到底应根据什么？中国人服水土的本领最大，是否即可说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最大？头颅的容量，脑的重量，及智慧商数的优越，是否可拿来作自信心的根据？”

方涤尘于北平

对于吴景超先生那篇文章，如果是稍微有点科学头脑的人，

即令是随便浏览一遍，虽然吴先生引用下许多科学数字，装饰得很科学似的，那也完全无用，其不科学处，马上就可以使人感到。方君读后所感，以及对于时论的态度，对自己研究心的紧严，对谬误疾恶如仇的心理等等，我们都完全同意和钦敬。不过，为了节省字数计，这一切都想从省少说。

在批判吴先生的“高论”和答复方君提出的各点以前，我们对于所谓“自信心”三个字却不得不先加以一点解释。

什么叫做自信心呢？

这三个字被常识的滥用得太广了。我们常听见人说，某甲自信心很强，即指主观见地强，或带有一点高傲、顽固之意。某乙一点自信心也没有了。即指其人屈伏环境，没有主见，小视主观力，略带怯懦萎靡之意。就一个民族说，例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把自己看做是天国，人家都是夷狄，这是充分表示了民族自信力的，现在呢？人家随便放一个屁，有些人也不敢不听命唯谨，无论人家如何欺凌，连反抗的心理也没有了。这大概可以说是民族失了自信力。通常一般人总对有自信心的人表示钦佩，对失了自信心的表示轻蔑，对一个民族也一样。如象一个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完全是在有不有自信心，意志以战胜一切，支配一切。

自信心是这般可贵么？有了一个这样的心，就可以为所欲为，成所欲成么？

并不如此。这种常识的说法，完全是观念论的。一个个人如果自信心夸大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客观的现实，他的自信心不过变为夸大狂，顽固，玄想，幻梦，他并不能成就什么。

反之，一个人如果把客观的现实夸大，以为只要有了好的环

境，什么事都自然会成功的，他完全否认了主观能动的力量，他不能把一切的可能性把捉住，将它变为现实性，必然性，结果无非让一切良好的机会跑掉，他仍会一无所成的。

这些都是形式逻辑必然达到的结果。

自信心要在什么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了解呢？

它是要正确的把捉住客观实践当前的一环，同时不是客观的宿命论者，而不忽视主观的能动的作用，主观力有推移变化客观的作用，但主观的力却有一定的限制，他不能越过客观的实践所许可的条件以外。

因此我们不反对一个人有自信心，但反对把这自信心过为夸大变为夸大狂，顽固，玄想，幻梦。同时我们也反对客观主义者，失了生存奋斗的热力的颓废者。

在生存奋斗中的胜利者，绝对是有自信心的人，但一定是正确认识客观存在的人。

那末，这一自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

是认识，不是由于生理的先天的条件。

一个民族，尤其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弱小民族，要想争得自己的生存的权利，要想获得解放，自然不能不有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在这里，大概可以解作民族的自觉心，民族的意识，或民族的意志，不是民族的夸大，象中国过去一样。

这种民族自信心应如何获得呢？这无疑的也是从民族所处的地位的客观的实践，这里包含着社会发展的阶段，及当前世界变动中的条件，从这实践中去把捉一切利于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并创造一切可能性，创造下一环子的顺利发展的条件。这里依然是认识客观，和能动的运用主观的力。从此认识

中凝结民族的意志、意识，发展而为民族的自信心。

同样这一自信心的根据，不是由于民族生理上的，或先天的优越性。

既然如此，那末，对于吴先生以生理的立场，去解释自信心的不正确，也就几乎不待辩白了。

然而，正如方君所说的吴先生的说法也是很狡猾的。天下真正的谬误，自然它也不见得就不能幻作似是而非的“真理”。所以，吴先生的高论，倒还不能就是这样放手。

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根据的第一点，是“中华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怎么不及呢？据说是“中国人服水土的本领最大”，无论寒温热带中国人都可“成家立业”，可惜的是吴先生把适应自然仅仅解作动物性被动的适应，是这样浅薄的。人类适应自然不要忘了是改变自然、克服自然啊！如果把它所作是中国人制御自然的力量大，那就应该拿中华民族目前社会的生产力去做标尺，木犁，手车，耕牛，天然肥料这一切是足傲谁人呢？

哈哈，中国人有一种受苦的“天性”。“印度的英人，南洋群岛的荷人，每隔几年便要回家休息一次”，那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的主人。他们有安乐的家可归，中国的侨民要老死于“白熊鳄鱼之乡”，中国人是在做苦力，他们从饥饿的故乡，无法生存的祖国逃出，他们“远适异域”，何尝“健康上”不“发生危险”，但是不能不求生存的，只得把八十斤肉去冒严寒酷热呀！这种本领是不值得作为民族的自信心的。至于说有了这种力量就不会被淘汰，这真是闭煞眼睛在说鬼，年来侨胞不是一批批送回国，被残杀、驱逐么？各地侨胞的生存不是都到不能保了么？那八十斤铁

骨还能完全未改变么？

这是何等的谎言啊！

吴先生第二个证据，是说我们生来有一个好的脑袋，这已够无聊了。何况这种统计就是吴先生也自认是“此处我们要替欧人说一句话，就是欧人脑重的平均数，是根据一万以上的个案而得到的；中国人的平均数，只根据少数个案，根据太小，也许不能目为定论”呢？这明明是无价值的。即退一万步说，我们天幸生了这样一个脑袋，可是我们的生活，现在处在这可悲的现状下，我们生存救死方不暇，我们优越的智慧，大好的头脑能有什么用处，我们的智慧能发挥出来吗？

可惜，吴先生看不到，这好的头颅现在正在被其他“劣等”民族所残杀，被水旱天灾人祸所毁灭！一味的夸示自己的皮肉，以求精神上的慰安，这真如方君所言，是阿Q的精神胜利，这足以构成民族自信心的根据吗？

如果说，我们民族有了这种特质，就可以发生自信，因此也可以发生民族的力量，我真不知这话是如何说的。

总之，这是完全的说谎。这种破落贵族式的夸耀自己血管里有尊贵的血液是可耻的。在今日民族的屈辱中，竟有这种妖言，我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识的在混乱国人民族意识正确的发展。是的，这是应该迎头痛击的。

自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正确的科学的认识，把握当前的实践，改进自己生存的条件，发展自己民族的生存。

七分经济三分文化吗？

——答伍润莲君

最近《大公报》"社评"提出了一篇关于"救国大计之商榷"的文章，主张用"七分经济三分文化"来挽救中国。

现在中国民族的危机，真是到了"国破家亡"的现象了。说到救国，总没有人反对这是多事吧！但如何救法呢？这问题实在老早就提出来了，答案也就多得很，不过，所谓用"七分经济三分文化"之说，到今日止，确是闻所未闻的。

是的，"救国大计"是应该大家来"商榷"的。一人的思虑有限，一部分人或一个特殊社会层的人的看法也未必就一定周到。这是一个大多数人求生存的问题，所以应该很普遍的在各级人民中活泼的讨论，各人的意见不必尽同，尽可就其所见，公开于世，让人家来批评或拥护。好在真理只有一个，真理的获得是在争辩中，真金不怕火烧，代表真理的意见自然不怕人反驳，她不会因人声沸沸而失去其意义的。

"七分经济三分文化"的救国论，既然是一种新的意见，作者又用了"商榷"的态度，在作者方面自然是希望有人来注意这种意见，在读者的我们，对这一种新的意见出现，也应该不管是真理或谬误，一样用着公正的科学的态度去加一番考察，正确的给它一个批判，如果是真理，就应让它发

扬，展开，如果是谬误就应早些使它归天，不要让它流传惑世。

浅学的我，在读完这篇大文后，作何感想呢？

首先我觉得这与现在高唱着的外国与中国经济提携文化合作的声浪有些关系，不是什么出自胸臆的高见，并且我感着一种说不出的不快，好象这样的主张，失掉了民族的独立性了似的。

我为了认识真理，我压下一时感情的恼怒，我仔细地来研究这篇文章中所含的真实和伪谬。

第一，我认为"七分经济三分文化"的救国论仍然不过是"经济救国论"的老调了，虽然他把文化连在一起，又是文化不过占三分，经济总是主体的了。

第二，经济救国论，政治救国论，文化救国论，教育救国论，道德救国论，航空救国论，都是对中国的病症开的一个方子，自然都包含有些真理，但都只把握住一部分，即只看到树，没有看见树林的全体，经济救国，即令果然是一个好方子，因为中国的病症复杂，也不见得能奏神效。

第三，我觉得这仍是一服"神药"，是抽象的，玄想的，不能有现实性。

以上是我的读后感，不知对与不对？请你们给我一个正确的解答；并将《大公报》社论一纸剪贴如后。

（上为伍润莲来信，"社论"从略。）

我们对于伍君要求认识真理的态度，以及他对于"七分经济三分文化"的救国论的大概认识，我们认为都很不错，不过，同时也还觉得伍君指出的还很不足，伍君的话只是消极的"破"，却没

有积极的“立”，就是“破”的方面，也还没有把那篇文章漏洞具体的指出，还不免空洞笼统之感。这样自然还不能说服该文作者，及代表这一类意见的人了。

这篇文章与目下外国和中国经济提携文化合作的声浪有关，我们完全同意，就是该文作者自己也承认了的。这种议论发生在目前的中国，自然不是偶然，尤其是因为如此，对于这种意见，实在不应轻轻让它放过。

“七分经济三分文化”是对于所谓“救国大计”的提案，也就是所谓“救国大计”的内容了。但是在检讨这一对策是否正确以前，我们先要问问什么是“救国大计”。

首先应该把中国总的形势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估计。认清自己的地位，危险的程度到怎样，知道自己的地位了，然后才可以言救，如何救法。这说来惭愧，中国人知道要救国，高喊救国已经是几十年了，理应对于中国的总的形势，救国的总的目标，早该认清和确立了。随着危机的进展，国策自然也应与之相针对，在总的方面却并不是时时要更改，它有一定的固定性。但为了达到总的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每一环有每一环的实践，和具体的方略，这是一定的。忠于谋国者，他应能看见大者远者，我们奋斗的目标，但同时，他也能看见当前在演变中的现实，并不畏惧、慌张去打开当前的难关。这时，在总的原则上无变动，探讨和执行者，只不过制定具体的对策，合于这一阶段，能打击敌人，有利于己的实际的办法。不是事到临头专讲原则，把总的目标，和某一阶段的战术混同起来。

中国的救国大计，在总的方面是要求民族的独立解放。它的内容是包括政治的独立，国民经济的解放与发展，如何使这一内

容变为实践呢？要达到这目标是反帝反国内经济的落后性，及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救国大计在总的方面不能离开这目标的，失了这一意义，在枝枝节节上兜圈子，那是口头救国论者，抽象的玩弄辞句的骗子。

至于最最当前的战略呢？那只有从这一总的前提下，再根据当前客观的现实，定下战斗的方略。不能专说原则的话，要说出就能行，行可以使形势改变，适合于自己的生存。

这是我们对于救国大计在原则上要认清的前提。

拿了这原则来看所谓"七分经济三分文化"论，那就失望得很，这种文章仍然是把总的目标，当前方略混合起来，使人觉得"是是非非"，令你摸不清头绪。

不错，救国就是为了求民族的生存。求生存的中心关键在经济的解放与改造。这原是千真万确，但是如何才能达到经济的解放与改造呢？

这要先求得这种解放的先决条件。就是先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和肃清国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残余势力。这就是先要有起码的政治解放与独立。"救国大计"主要根据在经济是不错的，但决不是"姑置政治关系问题于考虑之外"。所谓"七分经济三分文化"，那实在与当前短视的经济改良家，想用医头医脚的方法挽救中国危亡一样，是同在那里说梦话。

我们请问，这"七分经济"从何做起呢？所谓"前与资本主义经济追逐，后与社会主义经济抗衡，能使生产向上，民生日裕之经济"从何达到？我们有这种条件么？帝国主义准许我们的经济这样飞速的发展么？

明显的，这只能认作是我们解放运动总目标内的中心关键，

不是当前急迫的救国大计。

当前是要争求这种解放的条件。

这里应具体的指出，眼前我们要在这总的目标下，最先争得领土的完整，国防的牢固，文化的独立。在经济方面，自然也应加强自己的抵抗力，不过，这一阶段，一切都是政治的。现在无论谈到领土、文化或经济的自卫力等都非与敌人作殊死战不成，不论在外表上现出是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骨子内都是政治的、军事的。如果连这一些前提都不存在，在这样危急存亡之秋，来高唱几分经济几分文化，这不是回避实践、玩弄实践么？

这有什么实际的效用？

再就文化来说，文化二字本来应解作代表人类各方面生活的总称，人类劳动所创造一切事物的综合。中国文化就是具有中国民族特殊性的生活的综合的意思。不要单看做是指学术思想。一国文化的进步或停滞，就是这一国民各方面生活向上或落后，尤其是成为国民最基本生活的经济生活向上或落后。中国文化当前不及别人，我们不必讳言，这只要回顾自己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就明白得很。文化的建设是急务，但不能不顾到这建筑的基础。文化建设也要先争得文化建设可能的一切条件。

所以，"救国大计"在总的原则上是以经济作中心，同时也可以说是以文化作中心。这里把它分作几分之几的经济，几分之几的文化，完全是不明白文化是什么的一种形式论理的看法。实际这不独不能把它分成几分之几，连二者也是分不开的。要发展经济才有文化可言，为了文化的进展，就得发展经济。

但我并不否认成为"各方面生活"之一部分的社会意识或学术思想对于当前民族的抗争上有着战斗的作用。但不能象这位

社评作者一样只抽象的提出“文化”来，并且分量还只“三分”。

在一般习用上，一国有一国的所谓文化阵线，在今日中国民族眼前与民族敌人的对立的壁垒，虽然在总的方面是政治的，但这一“政治的”自然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一种统一和综合。如果分开来说，中国文化阵线，在民族与民族敌人抗争时，自然是配合着政治动员的，并且它有着相当的决定的作用。

可惜，那位社评作者实在不足以语此。

总之，这篇文章与当前救国之道无关，不过是因着别人在那里要与中国作经济的提携（实在是侵略）、文化的合作（实在是征服）而有意无意的在那里唱双簧罢了。它是没有积极的效用的，却有坏的影响，因为它提高别人的调子，在这一“七分”“三分”的斤两中断送掉中国的“经济”与“文化”。

这就算对于这篇“社论”的批评吧！

伍君！你提出的三项意见，以上的话也可以说是答复你了。不过，最后我觉得还要加几句蛇足。

你的看法，大概是对的，但还觉得不精细，也嫌有些笼统。譬如你说：“经济救国论，政治救国论……航空救国论，都是对中国的病症开的一个方子，自然都包含有些真理”，这固然不错，但是你没有指出哪一个包含真理最多，哪一个是主导的。你又说：“经济救国，即令果然是一个好方子，因为中国的病症复杂，也不见得能奏神效”，这里十分不明白，这一点我在前文中说得很多，这也不多说了。请你自己去体会吧！

真的，我们希望这种“商榷”能够扩大开来，成为广大人群间的互相辩论的问题。

投河殉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答江敬棠君

编者先生：

我最近很被报上的一段新闻感动了。我认为在今日全国人民均沉于醉生梦死，不敢谈国事，不愿谈国事的空气下，能有一个这样的人，为了亡国之祸，甘愿投河殉国，这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报纸上，也只有作一则普通自杀的新闻，排在不大令人注意的报幅上，我是何等的愤慨啊！难道这种忠义之气在今日就不值得一提倡么？现在先将这则新闻照录于后：

(宁夏通信)本省宁朔县县长牟凤鸣，早年服务甘肃教育界，颇负时誉。旋以矢志革命，北伐军兴，遂投笔从戎，备著勋劳。比年以来，痛心国难，深受刺激，时与人慨谈国事，辄高歌岳武穆《满江红》词，声泪俱下。今岁奉命出长宁朔，甫经半载，而勤政爱民，成绩卓著。近以时局日非，竟愤不欲生，遂绝食数日，复于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投入县府附近惠农渠中，幸为公役所见，竭力营救，始庆更生。省府马主席闻讯，殊为感动，特令牟氏晋省调养，面加劝慰，牟意始稍转。旋因宁朔绅民，纷纷来省，迎其回任，主席马鸿逵以民意所归，不便强留，乃嘱其回宁朔安心服务。不料牟氏

前念未泯，死心已决，归后又于七月二日午刻潜赴县南龙王庙前，脱去衣帽，纵身入河，及县府人员发觉县长失踪，派人四出寻觅，果在龙王庙前发见牟氏遗物。旋于衣袋中检得绝命书一纸，始知已投河；惟水流迅急，尸体已漂没无踪，迄未捞获。牟氏为官清廉，身后萧条，其夫人现在任中，公子及侄，尚留省垣。闻省府当局及牟氏生前友好，以其志可壮，而其情可悯，拟代据情呈请中央，优予抚恤，并将于日内举行追悼大会。兹将牟氏所遗绝命辞，节录于下："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鸣不忍视吾黄帝子孙沦为他人之奴隶牛马，甘愿投河殉国，唤醒国人。宁为刀头鬼，不作亡国奴，庶有力图挽救收复山河之一日。牟凤鸣遗笔。（三日）"

先生！我想这位牟凤鸣的壮烈是值得表扬的。他的生活的伟大处，就在他无我、忘我，只知有民族国家，这一点，不是我们这些怯懦的小百姓所正需要的么？

也许有人要把自杀看做是消极。我完全不承认牟凤鸣的自杀是消极的；在"唤醒国人"的意义上，我只看见充分的积极的意义。

不知指导生活的《读书生活》亦肯花点篇幅来介绍这一位有骨有血，为民族争取人格的典型生活否？

江敬棠

我们是在一种惊惧的情绪下读毕了江君以上的通信。我们颤栗了。我们感觉非常惭愧，象江君这样有热情的青年，脑中充满的竟是这样朴素过时的思想，这不能说，凡负有社会教育职责的人，不该负责任的。我们是一向把青年界看得太理想了，所以

对于凡是认为太过时了的东西，不想拿来再谈，谁知我们自己反犯了把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错误，看不见当面的现实，这是不能否认的。因此，我们以后到要注意更平凡的谬误的纠正的这一方面了。同时我要顺便告诉一切进步的青年，也请你们了解这一点，如果你们也碰巧读到这封复信，因此引起你们想到自己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遭遇，就请你们更平心静气一点，不要厌弃那些认识不如你的人，苦口婆心的与他们细谈吧！你要做到说服他们为止，这是不白花费时光的。

江君，请你千万不要见怪我们说话的爽直，不要以我们这里所进的忠言为逆耳吧！江君，你来信中全篇的话几乎句句都犯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对于你的意见是完全反对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真诚，你是一个东北的有为的青年，不过因为你的生活的环境，你所接触的那一些人物实在太落后了，所以给与你的影响，也不能不同一的落后，这样纯朴的青年，在你们东北，我看得特别多。不错，这不能专责你们不上进，恰恰相反，这是目前你们那里，可悲的实践所赐的结果。你们那里对国内的实践实在太隔膜，你们看不见国内的新闻，杂志，新出的科学和文学的著作。你们完全与世界隔绝了。自然，你们不满意你们的生活的实践，有时甚过我们，但是对于实践是如何看法呢？如何去打破你们当前的困难呢？你们的社会阶层的生活限制了你，你不能看见反抗的力量的所在，你们与真正的战士隔绝了，你们自己只有热情、孤愤、牢骚、眼泪。进得关来，你能看见的也只能是外表，你只看见国内升平气象，洋场上的高歌甜舞，“高等华人”的醉心富贵，老百姓受罪受苦，不高谈国事，于是就断定人心全死，“全国人民均沉于醉生梦死”。所以你看了一个知事老爷说了两句大话

去自杀，就这般同情起来，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忠义之气”，足为世人效法的一种生活典型了。

江君！在我们批评自杀殉国这一问题以前，我们不得不先指出你的眼睛上是遮盖了一层如何可怕的眼障。如果不先将它除去，我们是不会能说服你的。

外界的现象完全与你看的不同。中国全国人民除极少数外，并没有醉生梦死，他们恰恰是相反的在艰苦中挣扎，在为自己为民族争生存。他们更没有忘记国家，更不是不敢谈，不愿谈国事，他们留心每一件国事的发展，比任何高等人更仔细，他们真的是“无我”“忘我”；因为他们都是一无所有，不会把自己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还重要，他们在万死一生中求生存，在死亡线上作困斗，所以也不会怯懦、退缩、灰心、绝望。他们因为人众，所以也不会感到孤独、悲哀；他们有的是公愤与公斗。自然，这一切是不能从外表看见的。这要有相当的认识工具，突过了个人利害的圈子，站在民族全体的利益的立场，混进大众群中去，你才能看得清楚。江君，可惜你与大众离开远了，你不知不觉的，受了那些仅知个人利益的人口头上常说的那几句谎话，反把它当作真实。

谬误朦障了你的眼睛，使你看不清一切，这才是你犯着谬误的根源，对于牟凤鸣的喝彩这种朴素的错误，我以为这不过是病眼中一个例子罢了。

江君，我希望你过细体会我以上的妄言吧！

现在要进一步来批评这位宁朔县长牟凤鸣的投河殉国了。

我们以万分的善意来分析这件事。细读这一则新闻，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位牟君的思想是一种什么思想：“比年以来，痛心国难，深受刺激”。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醉生梦死者，但他对

国难及民族解放的认识，我们可以说他是摸不着头绪的。我们看他"时与人慨谈国事，辄高歌岳武穆《满江红》词，声泪俱下。"就可知他满腔里装着的不过是一位亡国大夫的悲愤，这一般怒气是不能发挥力量的。

再看所遗的绝命辞吧。我们实在感觉得这种老调子唱得太多了：在清朝末年，它却是最时髦的东西。因为自杀殉国比较专制时代自杀殉君、自杀谏君是一种新鲜的玩意儿，虽然它确是这种封建的死节的遗物，不免带着一点封建的气氛。到民国以来，因为国难的层出不穷，青年们也常玩这一套，我记得我们湖南曾经特别爱出这类人物，一经自杀，万人欢呼钦佩，称为烈士、英雄，当时湖南人甚至自傲的说出"别无出产，唯有英雄"的妄语，绝命辞也就成为一种文体了。

时代的进步，这一现象在我们湖南早看不见了。这是因为青年们已认识自杀是一种愚行，自杀徒损耗了自己的力量，并不能给与什么象江君说的积极意义。专制时代一个忠臣死谏，有时确能感动一个贤君，可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要想用自杀自己"唤醒国人"，这明明是把个人的死夸大得太大，同时也是把热情夸张得太大。"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不愿"沦为奴隶牛马"，是大家起来抵抗。有人不清醒，你要去唤醒他，说服他。自己清白了，就应该用英勇的抗战的行为去唤醒广大的国人。"宁为刀头鬼，不作亡国奴"是对的，但刀头鬼应该是指死在同敌人作战被杀的意思，不是国未亡先把脑袋取下。我们要知道，唤醒国人，不是死一两个人这样就被唤醒了，它的本身是一种很艰难的意识的斗争过程，这里包括两方面，一为肃清帝国主义意识、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意识，一为形成新的民族解放的意识。而这过程

的形成，虽然一方面是教育与宣传，但最最有力的还是实践的战争，真的同民族敌人开火了，就是酣睡的人也要被大炮轰醒啊！

牟君是士大夫阶层的人，他看不见这一些，不能了解这样深刻，他是一个孤独者，他看见国要亡了，他也象江君一样只望到表面上的现象，“人心全死”了，自己又无力出去抵抗，又不愿为奴为仆，三十六计，只有逃脱人间的一法，这样到落得保一个抽象的清洁的美名。不问牟君在自杀前意识到不意识到这个，那都不打紧，其自杀过程确是如此。

这种行为，因为与汉奸比较起来确是高尚万倍，就是比起醉生梦死的人，也要高过百倍吧！于是与牟君同一社会层的人，就象江君一样，好象煞有介事的给人以过度的同情与夸大，舆论亦只评其“其志可壮”，不欲严责死者的自杀的错误，所以对这类批评，一般人是轻易不肯下的，这种错误也一向在同情下隐藏，很少严肃的将它清算。

江君！现在中国民族危机严肃到了什么程度，你是亲身尝受着的，我不想再在这里来说废话，但是知道了危机又怎样呢？我希望你从正确的去认识现实中求解答。在使你走到正确认识以先，我对于你脑中那些有害于你的观念，不能不作这样不客气的批评，对于牟君个人，虽然也觉得清洁可敬，但在真理方面说，实在难于同情他的行为，所以也深刻地指责他了。

是的，我们对于江君的忠告，不仅把江君当作个人，我们是在劝告和说服与江君同一观念的人，对牟君的死的批评，自然不是着重牟君其人，而是着重于这种错误的行为，在今日，投河殉国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

——答高倩君并批判衡哲先生

一个人到了生死的关头，只要他尚有生存的意志，他总要张着眼睛更认真的去找他的生路的。这大概就是所谓死中求活吧！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遇到存亡危岌，凡不愿为奴为仆的国民，总不能不有所计议，在万分艰险中，去求民族的生路，去争得民族最后的胜利的。

这里最关重要的是我们认取的路是一条什么路。如果我们把死巷认作生路，我们个人或民族社会因而死亡，如果我们认取的果是一条康庄大道，则“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转瞬间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并不是一种幻想。

现在我们个人和民族也都走到最严重的关头来了。我们都张着眼睛在望，我们要找一条路走，到底何处是我们的生路呢？

《独立评论》第一五七号衡哲先生，替我们开出一张路单来了。她问我们：“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最后她也暗示了她看出的是一条什么路。但是她所指出的是死巷，还是康庄？我们不能盲目的依从啊！

据她说：“依我看来，横在我们眼前的道路，有四条。第

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拚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活路。"

自然，她之认为生路的，是从这四条路中选择出来的。我非常的怀疑，展在我们民族当前的果真就是这四条路么？

我极希望你们对这样当前严肃的问题有无顾忌的批判。先生！《独立》在华北是有相当的读者的，在大家都在死的沉默中，虽然是一种微弱的蚊声，也许要被人认作是洪钟啊！

高倩

"展在我们民族当前的果真就是这四条路么？"高君这种怀疑令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手头也正握着一份《独立》在看，也正读着衡哲先生那篇大文，我所感觉的也竟与高君一样，觉得我们当前的路不见得就止这四条了。

是的，我们在这严肃的沉默的时候，固然我们希望有人肯出来说话，替中华民族开出一张生路的路单来，但同时也完全同意高君的意见，觉得要有人"无顾忌的批判"才好，不然随便开口乱道，等于庸医误投药剂，他是可以断送民族的生命的，或者他的原意是在救国，而事实上反在替丧心病狂者在辩护也未可知。所以凡自己有不同的意见，也应"不顾忌"的写出，至于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那也仍望有人出来指正。

现在就老实的接受高君的建议来进行衡哲先生的"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的考察吧！

首先来看衡哲先生的路单吧。

到亡国辱身方面去的有两条。第一条“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这一条路走的人是谁呢？衡哲先生的意见是：“向来缺乏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是：“没有受过高度训练的人”；“一是愚，愚则不能分别友与仇；二是穷，穷则管不到口腹以外的事”；所以“大多数人民缺乏敌忾”。照这样的说法，中华民族是无望了，因为穷与受不到高度训练的既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众”，而这些“大众”都走上“行尸走肉”的路了，那还有什么“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要问呢？

这无疑的是在说谎，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的并不是没有受过高度训练的人，而恰恰相反，正是一些身受过高等教育者。没有教养的人，虽然比起吃过海水的博士学士来要“愚”吧！可是他们却反易于认识“友与敌”，现在一切充当汉奸的，不有的是留学生大学士，至少也是认识几个字的么？中国工人农民充当汉奸的就没有过。再说穷吧，“穷则管不到口腹以外的事”也是假的。穷了，更要求生存，这才是事实。只有有了百万资财才会想到“把那已经枯竭的中国银钱，汇兑到某一个强国去，存在那里，等着，等到这里不争气的社稷发生了根本上的摇动时，他们便携了妻儿，带上细软避难去。”我们只看见穷得精光的人，也是最敢管“口腹以外的事的人”。是的，他们也不能不管口腹，可是他们知道先要求得大我的生存，个人的口腹才能得救，不是象富家儿只看见自己的家和细软的。

总之，“行尸走肉”的路确实是有的，不过走这一条路的人却不是中国多数的人民。走这一条路的人是谁呢？是走第二条路人的阿哥阿妹，以及他们的亲属。这一种人比起在“刀头上舐血

吃"的人来，胆子要小点，脸皮要薄些，心中也还有些温热。可是他们不敢看现实，又无胆子吃人血。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极端矛盾中，不生不死的生活，"行尸走肉"就恰好说明了它。因为他们看不起奴隶，却又不想打断颈上的锁链，于是生出"得过且过""马马虎虎""装死"等思想，自己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奴隶，自己虽然也在和他的阿弟表兄分吃刀头上的血，却故意装做不知不觉，这种人才可以算是行尸走肉。他们在外表上虽然带点浑浑噩噩，却是装的。真正"浑浑噩噩"的穷小子，虽然也有少数在以上的主人家充当奴仆时，一时也染有主人的气习，可是那是不足数的几个，真正"浑浑噩噩"深山穷谷中的人民，并不会走"行尸走肉"的路，他们虽然不认识今日的世界，但一旦有人侵到他们的村庄，夺取他们的田舍时，他们是会以血还血的。东北不是有无数浑浑噩噩的人民，到死方止的在与他们的敌人抗战么？

这一点，不能不首先辨正，不然，我们会看不到我们真正的出路。

第二条路，衡哲先生已说得尽够了，我不想再去说它。走这一条路的人正是衡哲先生说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是穷人"，是"拥有财产"，把"家私细软"搬到外国作富翁的人，是"种种式式的道地汉奸"。这类模特儿现在很多，真用不着细表，这条路现在确是有的，是一条通达到亡国的路。但它与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无关，因为这条路是向来不被大多数的人注视的。

亡国辱身的路我们自然不能走，并且在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走，因为我们没有具备往那方去的条件；但是，求生的路呢？

第三条，衡哲先生说，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拚命的

路。据说："走第三条路的，有时是用抵抗的方式，有时也用自毁的方式，有时两式并用。"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并且衡哲先生还用了一六七二年荷兰人民决堤灌城以杜法王的进占，一八一二年俄国人民焚毁莫斯科以延拿破仑的侵寇做例子，表明有书为证。这条路是否是生路呢？据说"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这种说法，在当今的中国颇时髦，动听，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

确定民族的出路不能是孤注一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在鼓励个人奋斗，虽然可以加强一个人的进取力，但对于民族那就变为冒险了。何以故？因为个人到了没有办法时，逼得你孤注一掷，失败也不过一身的问题，不会影响再远些；民族国家就非如此，我们不能把全国民力在力的对比绝对悬殊中，来自毁自己。荷俄的例子，只能看作是战术，方是正确的，不能认为是最后对付敌人的善策。

但是，难道我们主张不可为就不为么？不是的。我不过指出这不是引导我们往活处走，这只不过是痛快一时的投机冒险的行径，不能认为就是生路。中国今日的出路并不能往这方走，虽然这条路是比以前两条是光荣的。但我们要求的是生存抗争胜利的光荣，不是民族死节的光荣呀！至于我们求生的出路是什么呢，我想，检讨了衡哲先生指出的第四条路以后，再做肯定的指示。

第四条路"是那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这乍看起来也是对的。这就是"充实国力，长期抵抗"，"五十年后再谈恢复失地"等等的理论的基础。这在今日已一天天被人怀疑了。这问题简单

得很，就是在今日的亡国之下是否允许你作“三年之艾”的准备呢？这完全是幻想；因为今日亡人国者的残酷的压迫是超过任何时代的，我们绝不能在未亡国前作此打算。这是一。

其次，所谓“在这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智识弄得充充实实，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这是否就是准备“三年之艾”呢？中国现在受人侵辱是否是国家没有专门人才征用呢？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替无耻的忍辱偷生的人辩护的话。须知要磨练个人成为民族斗士，只有在民族战斗中，不是个别的在书斋、实验室受训的。至于“组织力”、“合作精神”、“忘私仇”、“牺牲小我”等等，都只有在共同统一的一个阵线上，在坚苦的抗争中才会产生，不然，“尽是痴人说梦”。这样空洞不着边际的“有计划的忍受”，我不知道“计划什么”，一九三一年以后时时谈它，现在的“艾”呢，在哪里？这与无耻的偷生，有什么分别呢？

是的，这四条路都是不明不白的，我们只看见死路，痛快一时的路，“漫漫就没”的路，中华民族的生路在他的文章中是看不见的。

“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还要我们自己去找。

我们还有什么路走呢？往那里走才是生路呢？

我以为我们走的那一条路，是在下面正确的认识与估量下而被确定的。

第一，我们应该认识自己的力量的所在，是在大多数国民身上，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主力。不是在少数知识者及其一部分军事力量。

第二，在以上的力量集中下、组织下，中国物质力量足够打击任何野心者的侵略，保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连军用的东西都在内，我们敢说如果全国的枪尖都能一致对外，虽然是落后的武器，在作战上仍可以发挥惊人的自卫的作用。

第三，我们应充分认识国际的变化，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中，他们国内社会的分化中去估计侵略者的力量，不要过于夸大敌人的势力，精密的去计算敌人作战的能力和支持力。不要盲然的拜倒在一个坦克车下。

第四，我们的民族抗争同时要顾到一切弱小民族解放运动，去看自己的力量。

第五，要明了准备是在抗争中，力量的正确的认识亦是在行动中，要动员了，“组织力”、“团结力”、“牺牲精神”、“私仇携手”才有可能，不是等“三年之艾”从天上掉下的。

第六，要先有以上的认识，由这认识造成我们的信念，我们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不能在烽烟中看出最后的胜利，以及将来堂皇的轮廓的，就不能胜任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下伟大的解放抗争的职责。所以我们的前路，不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而要是“知其可为”，“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的为”，才是我们走的道路。

难道“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还不明白吗？

社 会 相

李公朴主编，读书生活丛书：《社会相》（小评论选集），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读书生活社出版，收文章八十篇，本书选印六十五篇。

前　　记

我过去不是写文章的人，靠着笔杆子混饭吃，那确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才有的事。因为自己没有专门研究，所以写的东西就不能专属于哪一方面，只是自己觉得有什么话要说，自己又能够说的，随便的说出来。自己知道，把这些话移到纸上来，是不能入文学家或科学家之目的。但自己也很以此自安，因为我是在生活中说话，是在说老实话，我没有装腔作势过。

这一本小书，便是从《申报·自由谈》、《新语林》、《新生》、《漫画漫话》、《妇女大众》、《生存线》、《通俗文化》、《中国农村》、《读书生活》几种刊物上剪贴下来的东西的一种选集。因为这里面的文章有百分之八十是在《读书生活》“社会相”这一栏发表的，所以我就把这本书送给《读书生活》，作为它的丛书的一种，书名也就用“社会相”这三个字吧！

这里面谈的是些什么呢？

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由于社会发生事件的刺激，有的是对于某些“高论”、“妙论”之类的不满而发出的辩证，有的是有意在拆穿西洋镜，揭露我所发现了的骗局。所谈的问题，真可以说是杂了。但对于个人身边的事却少道及，这是因为自己的渺小、平凡，个人身边的事，实在没有什么可说，值得去动笔的。如果说一本书，一定有一个特点，这一点就作为本书的特点吧！

关于文体方面，也就写得很不一致。这大致是因为发表的刊物性质不同，不得不迁就些。譬如《新生》、《读书生活》这种刊物，读者既然多是一些店员、学徒、工人，我的写法就得尽可能的避免古今中外的典故，少用引语，话的说法也常常取正面的，在其他刊物，却有些弯弯曲曲，多带了一点讽刺，往往把要说的意思从侧面或反面表出。就全体说，我处处在求写得好懂点，有时宁肯减少一些文字上的美，却不想使意思朦胧、晦涩。自然，因为自己到底不是会运用文字的人，这些方面便是做得不成功的。

对于这本书所收的文章也许还应该说明几句吧！为什么对实用主义的攻击要这么多篇？谈民族危机、妇女问题、自杀等同一性质的文章要收这许多篇呢？

理由是这些小评论是好比在作游击战，是针对着当前发生的具体事件而写的，敌人并不是因你割了他一块肉就倒毙下去了。不的！我二次，甚至三次、四次的又碰到他们，于是就变为长期和他们周旋了。在许多事件上去暴露某一种人的面貌，在多方面的去解说一事物的本质与发展，我并不觉得同一谈妇女问题，就一定不能重复。

至于讲到这些东西的价值，我一点不会夸张，它在发表的时候，自然是有一些用处的，印成书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我并不想在文学方面求什么成功，所以一向不在乎它。为什么现在要白费许多纸张与工友们的劳力呢？那是因为这类短文章现在还有人要看，在广西、河南许多小学，把它选作教材的也还有，现在替大家把散在许多杂志上的文章收在一起，略为加一番选择，印成一本小书，也许对于某些人是一种方便吧！

我的笨笔画出的社会相是很有限的，这些文字如果对于千

千万万在生存斗争中的人们，可能说是提供了大家看看世情的一种参考，那就算是文章以外的成功了。

柳　湜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夜记于上海

浅　薄

平常不大谈女人的人，偶然听说他在闹恋爱，就惹起熟识的人一时的哗噪，这是一种好奇心，本不足为怪。譬如，最近几月来，我也偶然的动动笔管了，就居然远劳某教授在某宴会中荣幸的被提及着。据另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说某教授看了我给某某等刊物上写的东西，十分表示不满，理由是："象他那样好读书的人，不该写那样浅薄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的写点正路的东西呢？"

我接到转来的教授之言后，自然觉得很是荣幸，同时又是汗透外套。记起十年以前，当教授还同我这浅薄的东西一样浅薄地在公寓中煮牛肉吃时，谁能想到，时间不过十年而我们两人相隔的距离，会有如此的天渊呢！教授现在是文化界的权威了，虽然我从未曾拜读过他的"高深"的大作，而我呢，现在流落海上，靠写一点浅薄的东西，养活孤零零的一个小生命。自然，我是够愧死了。

"浅薄"，这两个字用到批评我写的东西上，我不表示反感，同时也无一点自愧之心。因为我写东西的初衷，就是没有预备"高深"的，我虽然吃饱饭后也爱翻翻书本，却不曾到过外国，从过名师，肚内就没有东西，自然吐不出高论。这我不惭愧。其次，收我的文章的刊物，原本不是什么大学的年刊，却是供给所谓浅

薄的人读的东西，编辑先生屡次叮咛又叮咛的是要写得通俗，否则会影响他们的销路，大家会都无饭吃。所以，我每次属稿时，在文字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总故意求它浅显明白，不尚高雅，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类的刊物，我那样的文章，会有教授这类的高人去看的。所以，浅薄二字在我并不侮辱。如果太高雅了，反有敲碎自己同别人的饭碗的忧虑。

再其次，就是关于浅薄二字的解释了。教授对我的批评不知所指的是那些文章的哪一些方面。我写的"科学小品"，一些关于社会批评的短小的文章，我不承认它的内容是如何幼稚可笑，它并不违反科学的真理，也从未有过常识的错误，我紧守着科学者应有的态度。至于表现的方式，我只感觉太不通俗，太不"浅薄"，太洋八股气味了。至于说，你有学问，你就应说话说得人家都断不懂，即令这话是真理，在我未当大学教授以前，我无理由要接受它。

最后，还得声明一句，我自从离开××以后，并不"那样好读书"了。这因为忙于衣食故，不能不使我一天天懒了下来。但同时也一天天看不起书本子，我想，如果也有一天，坐在什么学府上，专门卖弄书本子，终年看不见着西装以外的俗人，那到不如一面在街头混混，一面在树荫下偷看几张破报，到流通图书馆借一二册书来念念，说几句浅薄的话，那不比没有人懂，个人坐在讲台上独白更有趣味么？

开卷有益辩

近来常常有人问到读书的问题，我总感到一种内心的不安。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在烟纸店当学徒的朋友拿了他店里允许读的书目来访我，要我替他圈定几本，我当时就拒绝了。一来是，凡圈定的事，我想，这一定要是要人才可，我哪里配呢？一来呢，我觉得这位青年太迷信书了，每天做上十四小时的生活，为什么还一定要读什么书？

因此，我将书目退还他，很想在他提出抗议时，顺便向他解释一两句，读书并不是一件人人必要的事，尤其在今日的中国是如此。

他却发怒的走了，并没有提出抗议。留存在我的脑中的印象，到现在为止，并不是他的怒容，因为那怒容是一种反抗，是很可爱的，现在仍然感到新鲜的却是我自己的惭愧及由他那一句"开卷有益"所引起的许多感慨。这感慨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好好的发泄过。

那位学徒为什么会说出"开卷有益"这四个风雅的字呢？我不用想象，就知道那是他的老板告诉他的。因为我在七岁时就听熟了这四个字，一直到十八岁，仍然在这四个字的教训下生活，很知道这四个字中所隐藏的神秘。幼年向我说这话的人是伯父，但幼小时就怀疑着这四个字的人不仅我，还有四妹和建

弟。因为那时乡间还没有小学，自然我们的学塾是设在家里。我们三位小将，当时是如何的不“幼年老成”，是可想象的，有时，在大人眼里实在闹得有点“家神不安”了。但是，如何使这些孩子驯服呢？伯父伯母的政策是教育与体罚并用。每每在伯母的鞭子不生效力时，总是由伯父出来说一篇大道理了事。因为伯父是读书人，所以也知道如何防患未然、先教后杀等道理。我因为在孩子中是最大的，所以听伯父说“开卷有益”的话就特别多。我当时心中觉得不平的是，你们自己又从不见“开卷”，为什么偏要我们“开卷”，难道只有孩子们“开卷”才有益吗？有时故意顽皮假装着“开卷”的样子，或者由我高声朗诵，派四妹去偷看伯父在做什么。七岁的四妹自然是属于我党的，她不会说谎。她的报告：不是说伯父在六姨太房里打架顽呢？就是说正陪着七大人在吃酒、吃落花生呀！在那里喂八哥、黄莺呀！我们听了，怎能心服！原来要我们“开卷”为的是你自己好安闲的陪姨太太，吃酒，吃落花生，玩雀子呀！不过，我们最不平的是吃落花生，因为落花生是自己家里种的，伯母和母亲炒的，照理应该让孩子们多吃，而事实却相反，说是要留着待客。我们在平日是从不能好好的吃到，只在客人来时，我们偷偷的站在客人旁边，用冷眼射到茶食盒子上，有时才由伯父用长指甲夹一二颗给你，或者在客人走了，还要受一顿教训。现在听得四妹说，落花生是用作待客固不假，但伯父吃的就比客人还多。怎能使我们心甘呢？因此，我们已感觉到伯父要我们“开卷”，不过是骗我们不要打扰你写意的吃喝、顽要罢了。

到了十七岁时，劝我们“开卷”的已是先生了。这时因为自己已养成了一点读书的习惯，到并不因他的劝勉生出反感。不

过我总觉得是多事，做先生的不必去劝人"开卷"的，有了好的书，学生也会自动的读起来，现在的讲堂上不是已经有人在讲义夹下夹着一本自己心爱的书在偷读吗？但到十八岁的那年，我却又受到"开卷有益"又一次教训了。这次给教训的人不是先生，而是湖南都督张敬尧大帅的令弟张四帅。当时湖南学生好管闲事，是有名的，那一次大概是因为大帅要将湖南在湖北的官产鹦鹉洲的地皮出卖，学生起来反对的缘故吧！于是有所谓群众运动了，我们都"关"了"卷"来在街头，高喊"打倒张敬尧"。后来我们被大帅的兵包围住，要我们来听四帅的教训，四帅就说了几千个"妈的巴子"，但最后也劝我们读书，捧出了"开卷有益"四个字，要我们以后不要管闲事，只许在书斋里翻翻书页子，这一次，我更深刻的了解这四个字的妙用，到死不忘。同时，对于书本子颇生了不敬之感。

后来，到了北平，自己是颇有些成见了。每每看见官绅、将军、学者、名流捧出这四个字来时，我总要头痛几天，十日不开书本子，表示我的反抗。这类教训自然对我连一点效用也没有了的。

我一点也没遗忘，那位学徒先生拿给我圈的书目，是一些什么样的书。他告诉我别的店里是不许学徒看书的。但他们的老板则不然，晚上关门后是准读一小时的书的，并且他替店友们预备了好几十本书，随自己去读的。他又告诉我，他的老板，对店友是严厉的，晚上不准出外憩宿，不准上游艺场，不准抽烟打牌，还不准晏起晏睡，一切都有一定的时间，起初大家有点感觉不自由，后来有书读了，也就安然下去了。最后他也略带惊异的说，老板为人是最好的，不过可惜的是他劝人读书，却不能随便自己

买书读，一定要得他的许可，不然就没收了书，以后就不许你再读，并且派你一个人数铜板数到天亮。

这本来也是不足惊异的，大凡劝你“开卷”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就是不合他们口胃的书不在此例，因为如此，我对于学徒先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想，我最好让他忿怒，不然，他这时也许泪汪汪的一个人在数铜板了吧?！

最大的布施

这次“急赈普捐”运动的成绩，据说很是不差，除开募得了一万多块钱捐款外，顺带还窥探了一次各种社会层的人的同情心了。依据《大晚报·星期屑谈》的记载：“慷慨解囊的，以步行者为最多数，坐人力车者次之，而坐汽车的人反多一毛不拔。”“本市工界都以一天的血汗的代价去赈济死亡线上的同胞。”但我觉得，成绩还不止此，就是这种运动明明的也是一种教育运动，这事固然对于一般人都有一些印象了，恐怕对于这五千多运动的学生更要来得深刻吧！社会上对于这次的运动，只有赞美，对于学生是钦佩，对于一毛不拔的大老是讥评，这就算够了么？不见得吧！

我到想起了一个故事了。这是日本秋田雨雀的童话《三个孩子》。这故事正是叙述以前印度大荒灾，每天死人无数，国王无力拯救百姓，因此感动了三个女孩子，各人背着一把壶，急急地到灾区去布施。他们在路上遇着了释迦，释迦忙问她们到什么地方去，于是，第一个孩子说：“我们是去布施那一群不幸的人们，我带着一把壶，盛着新鲜的牛奶。”

“我带的是一壶有香料的汁。”第二个孩子说。

“我……我……我因为贫穷，没有什么可以布施的东西，所以只带了些泉水。”第三个孩子显出了一点悲哀的脸色了。

释迦听了他们的话后，就道：

“孩子们！布施给别人，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一群不幸的人们，对于你们的布施，将怎样的觉得愉快啊！可是，孩子们啊！最大的布施，还是创造一个没有布施也没有被布施的世界。孩子们！布施别人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那种布施并不是最大的布施。孩子们！人世间唯有最贫穷的人，才能从事最大的布施啊！”

我想，可惜这五千余男女童子军，在他们的劝募的道路上，没有碰着一位这样的释迦。他们在寒风凛冽中的工作，钦佩是诚然值得钦佩的，但我们在称赞之余似乎还应给他们一点认识才好，不要把这一点肤面的同情心过为夸大了，反为遮住了他们去看现实的眼睛。

“亮”

三十年前，故乡还有械斗的习惯。据说那时村与村间，彼此都是有些武备的。可惜得很，到我出世时，真的斗已就很少看见了，残存的大概只有偶然双方“亮亮”自己方面的武艺的一种玩意；不过“老子也不是好欺的”那一种气概也还保存着。

时至今日，“亮亮”武艺的事在故乡是久不存在了。但国与国间，现在却正盛行着。你来一次海军大操，我也要一套调动舰队，你演防空，我习巷战，与昔日不同的是：现在的“亮”是准备战，昔日的“亮”不过是有点带着空头威吓而止的意思，并不真的想打。

生在今日的中国孩子，说起三十年前的械斗，听了自然要好笑了。但近代国家的新式武艺，也大半只听得人家说，杀人的器具，有坦克车、铁甲炮、轰炸机之类的东西，并不见得亲眼看见过，因为中国自己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上海市民目前的眼界，大半也还是“一二八”打开的。

可是，本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两天，上海市民却再饱尝了一次空前的眼福了，这就是十四那天的日军的大操演和十六那天的万国商团的防卫演习。这两次演习中双方都“亮”过各自所有的器械和武艺了，双方都有假想敌X在心中，一方面学习进袭南京路，一方面也未忘记狄思威路、北四川路的。这幕武剧在上海又

据说除开“一二八”外，连老上海也是未看过的。这就想见它的排演一定含了一种很深的意味在。

这次，真是我生何幸！我又恰好在上海，并且住在日兵防区以内，我的弄堂门口就架上一个小钢炮，有一排日兵把守，使我能于这假的巷战中，回想到“一二八”之夜来。我是与英日这些大国民一样饱尝了这些武艺的眼福了，不过我奇怪的是荷枪牵炮的人都不是中国人，日、英、白俄他们要“亮亮”武艺为啥要在中国领土内？中国为啥让这些人在家内如此吵闹呢？这就不得不令人有些回味了。

新年巡礼

一

新年，原有欢天喜地的意思，这话我不能抬杠。我知道，这日子大家总是看得很宝贵的，一年三百六十天，过年顶多只能过半个月，这还是照“夏历”说法。如果改用阳历年计算，那就只能过一个星期或三天。这多么重要！自己就是有点什么不顺心，也得藏起眼泪，装点笑容，不要使人家没趣，这一切我全知道，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我都年年装过，并且都装得挺象。新年有新年的面孔，就是不能把面皮向下拉长，要把面皮向上耸做一团，把面孔改扁，象书摊上印着的“和和”。这一向不假，新年总是新年，有些新的现象，新的希望；就是平日不喜欢你的人，也分外对你宽容，世间最吝啬的人，也对自己解放一天，从肋排骨内拿出几个温暖暖的钱来，吃一餐肉，喝四两酒，这是为什么？是欢喜。

所以，新年，如果要把它画成图画，就应该喜气冲冲，是一张快乐图；改做一本戏唱，就应该是一出喜剧；写成文章，也应该不是乌鸦体的。

然而，今年却不知怎的有些两样。这世界真是变得古怪了。

二

不是我的心绪不好，去年卅夜里就没在睡熟。元旦早上在街上遇到了约汉，他就忘记向我说“恭贺新禧！”马丽太太虽然怪声的向我说出“恭喜，恭喜！”她的面色太勉强了，并且她的声音明明还有点想哭。分别时，握手都握错了，她伸出的是左手。他们夫妇俩一个忘了新年，一个失了常态，一定有什么心事。这还了得！这是什么一回事？这还象过新年么！

不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隔壁十岁的福儿就对我说过了，我问她：“新年怎样？”她圆着眼睛说，“一点也不象新年！”孩子无欺，十岁的孩子有多大的经验，她竟觉得今年变了，说出这样灰心的话来。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怎能不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了。

三

我恐怕自己的不好，我走到南京路，在一家玻璃店门口照了照自己，故意把脸装圆，不想恰巧店内的秦先生跑出来了。

“啊啊！恭喜恭喜！忙了一年可以休息几天吧！为什么还不回府去陪太太？”我说。

他半天没说话，最后他冷冷的道：“今年有着休息了。”

“啊啊！今年假期定得长点，大概不过夏历年了。”

“那倒不是！要停业了。”

“停业了？”

“是的，这倒不是我们一家，去年年底倒闭的，绸业就有二十多家，南货业十余家，钱庄十余家，其他范围小的不下数十家，今

年不开门的还不在内，大概总是两三百家吧！哈哈(冷笑)！这一两天人家或者还以为我们在过年呢！”

“啊啊！……”我知道自己触霉头了。我急忙的退出他的店门，我痛骂自己不该选在这一家门口照照自己，我改向吉利的方向进行了。

四

我到了C先生的家里，我想在这里大概可以嗅到一点新年的气味了。

走进会客室，屋内是冷清清的，壁炉上有着一层厚灰，C太太懒洋洋的走出了。“进门看脸色”，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淡淡的只用英语说了一句：A happy new year！意思是敷衍敷衍，不想她连回也不想回我一句同样的冷话，就叹了一口沉重的气。我不知道是走好，还是坐下，坐下又说什么好呢？

她大概看了我的狼狈，她自己坐下来，慢慢的说：“久不来我家，我家发生的事恐怕你还不知道吧！我家银行的存款被倒了。汉口的店也因此关门，C先生弄得被汉口的债权人……现在押了。”

“啊啊”我的天，我几乎喊出来。她又继续告诉我，上海在年关前就有五华银行、中国兴业银行、俭德银行、永安银公司先后停业，还有几家什么信托公司倒闭了。不仅自己的存款提不出，亲戚朋友也一同遭殃。她说：“以前你困难，我可以帮助你，现在到了六亲同运了。”她还告诉我，还有什么什么工厂今年也不开门了。

五

我不知道我怎样的走出他家的大门，但我明明的又走到老西门了，我在路上遇到了我以前的二房东太太，她是一个五十而无子孙的善良的女人。她走路走得非常的性急，我觉得有点奇怪。她向我点了一下头，笑笑，好象不想停足似的，我却故意把她拦住。

“新年忙什么呢？”我笑说。

“真是忙呢！这忙你是想不到的。我在找奶妈？”

“找奶妈干什么？你家又没有小娃娃。”

“是的，这是天意。我昨晚以前也未想到的，今天我家有一个小娃娃了。”

“怎么？你一夜就养出了一个小娃娃？”

“你总还爱说笑话，说起来伤心，昨夜三更半夜里我们弄堂口有人在喊‘卖孩子’，是山东人，遭了水灾逃荒的，父母都饿了三四天，孩子饿得快死了，只求有人肯要，并不一定要多少钱。你说伤心不伤心，三十夜里卖孩子，这是我五十年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一时发了慈善心，将他收下了，今天一早起来就找奶妈，至今没有找到。”

“啊啊！我不耽误你了。你去找奶妈去吧！那孩子落在你手里是太幸福了。”

六

我又巡礼到一个纱厂的女工家里。我心境一横，就想今年恐怕当真是倒霉年，就率性多听一点人间的悲惨剧吧！他们的

工房内照例是有些新闻采取的。一走进那张板门，就看见她们六个人都象绵羊一样拥着破絮坐在板床上。

“你又来访什么新闻了。”

“不是！来拜年！”

“说得乖！看我们饿死了。”

“哼！你们还不知道上海有人在卖孩子呢！”

“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工厂内早就有养成工了。”

“什么养成工？”

“你们新闻记者哪里知道人间的痛苦，你们访着的新闻，只是肤浅的。”

“所以今日要访不肤浅的了。”

她们之中有个年长的说：“我告诉你。厂里现在在灾区买了八九岁到十六岁的女孩子，他们都是因为快要饿死了，出来逃生的。据说现在有一种人贩子，花六七块钱就可买到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十岁以上每多一岁可多卖一块钱。厂里从他们手里买到，每个要花上二三十元，买来就把她们送进工厂工作。我们厂里已有六七十了，他们有工头监督着，出入车间都要点名站队，待遇自然连我们这点身体自由都没有了。工钱当然是没有的。这种工人，厂里就叫做养成工，这新名词想必外边还不知道吧！据说，在厂方还是应许多慈善家的请求，才允许的呀！”

“啊啊”，我又只能“啊啊”一声了。

我在巡礼的归途中，我看见我脑中所摄的社会相是这样的几幅不成画面的图画，它就是一九三五年第一日给我的印象，在风驰电掣的电车中，我闭了我的双眼，我幻出世界是已走入萧条期，而这萧条是正在向前发展。

实用主义的破产

好久以前，就听说香港总督送了胡适博士一顶帽子，胡适博士十分高兴，预备专程去接收。他什么时候到香港，如何的接收那顶荣冠，这完全是他们间私人的事，实在无关大众，不值得注意的。不过，近几天的报纸上，忽然传出博士为了这顶帽子竟不幸惹出不小的祸事了。这到不能不再关心似的。

于是，我也现出有闲的模样，来检阅平日不大爱看的博士在港的演说辞及国立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古直、李沧萍等电西南政会总部、省府、宪兵部、公安局等机关声讨胡适的檄电。公正的看过“两造”的言论后，我觉得，古、李教授等的古文做得不坏，比胡适作少正卯，在用典方面够有趣，可入《论语》“古香斋”无疑。至于博士演辞呢？也实无可非议的地方，应该宣告无罪。理由是，博士是个实用主义者，那篇演辞恰恰不过是实用主义的香港观、文化观罢了。这不能怪胡适！这是实用主义的鬼在胡适脑中作祟，古、李两教授不该请诛“少正卯”，应该打这外国鬼，今不出此，可惜可惜！

博士赞美香港风景美丽，从没有过，香港本够美，比上海要美，这是肉眼可以看见的。至于看了这美的山河必定要想起，这原是中国的土地，而伤起心来，因此无心赏玩风景，或忍不住要流下眼泪，那还成实用主义么？何况，博士到香港为什么的，古、

李两先生也不知道么？

说到博士开罪广东，誉香港为南方文化的中心，也不过是实用主义的见解。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胡适是考据家，大致不会弄错的。现在香港抖起来了，谁说广东不能再作香港的殖民地？事实上广东不已经是以前的东北么？离变成香港第二恐怕也不远吧？何况，广东变成香港后，说不定博士也会一样公正的来赞美呢？

博士指出香港可为南方文化的中心是挺对的。香港有钱，有汇丰银行，治安好，没有"日本飞机天天在校顶飞过"，"不危险"；还有"接近外人"，总督都是外人，"可以借镜的地方很多"。要发展文化，在"东亚大陆上"实在没有这样一块好地方。这谁能抬杠。哪一件是博士造的谣，你能指出来么？

至于汇丰银行为什么这样发财，这财是发自谁人的，为啥中国的领土要英国人代作总督，这些香港的最高当局为啥要来代中国人提倡中国文化，授博士学位，请博士来设计；博士参加这种提倡中国文化工作，比起赵欣伯之流来高过多少，香港真的成了南方文化中心后，就是中国完全变成印度第二，这些问题在香港的外表上是看不见的。并且有的是过去了，有的还未来，这一切哪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可以看到的呢？

有人骂胡博士的人格破产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破产的话，倒不必去注意人格，真正破产的恐怕到是实用主义吧！

总 结 算

一位乡下朋友到了上海，因为恰当废历新年，我就请他上影戏院去看戏。元旦，我跑了三家剧院，都买不到门票，初二，早一点钟就去，大的戏院还是宣告"客满"，我就只得迁就一点，改到二三流的戏院去。到时虽然买到了座位，但不久也宣告客满了，于是乎我这位朋友向我道："上海并没有不景气，去岁年关上海人那样大惊小怪，把面皮张得紧紧的象面鼓，实在是多事，商业界年关的总结算不是已经安然的度过了么？报上预言今年市面将如何冷落，好些大店将开不得门，都已经证明是多事，南京路的生意不还是热烘烘的么？我就看不出上海的不景气在哪里？"他这番话使我同时记起了另一位新从欧洲看过世界回国的朋友，他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方的繁华街市上都兜过一个圈儿的；他也对我说"欧洲人好夸大，其实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就看不见什么叫做不景气"。对的，他们的话都不假。在戏院，和繁华街上是"看不见什么叫做不景气的"。岂独看不见"不景气"。上海各大戏院不是明明景气得很么？三公司的生意也不坏，是事实。上海人还是有钱，伦敦、巴黎、维也纳是富裕，都说得对。但可惜的只看到一部分，只看见繁华奢侈享乐的一部分，而这奢侈享乐的部分就是世界要沉沦的一天，也还是要通宵达旦幻出景气的色相的，"一二八"炮火中，上海的舞场的爵士音乐不是没有

停奏么？

至若说到去岁年关结算，难关虽然度过了，并不是我那位朋友看做是那样和平无事的，过去的年关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中。以斗争的胜负结算的。有许多商店本来要关门，现在不是又开张了么？这不是奇迹，请注意那招牌吧！以前是“福记”，不是改为“寿记”了么？以前不是没有什么“记”的，现在不又加上“合记”了么？这就是说明了年关战的血迹，这中间许多老板没落了，又另有一些人特别肥大起来。虽然就这一兴一败是老板一群中间的事，但也决不是和和平平，象我那两位朋友所想象的。谁人去管这些战迹呢！牺牲者照例是在人们的记忆以外的。沪淞战区“复兴”的地方，谁还记得当日的炮火呢！

这不过就上海一面说的，至于内地这总结算是如何度过去的，这其实也就不难想象到。我们姑且剪下《大晚报》元旦淮阴电讯一则，贴在这里，就作为总结算中的一点影子吧。

> 本报今日淮阴电讯：昨废历除夕，炮竹声彻夜未绝。此间王管镇，属民王亦韩因被债户逼迫，昨夜合家三口悬梁自尽。今晨全市停业。

既成事实

隔壁王姥姥的女儿香贞跟人逃跑了。姥姥天天晚上在屋内呜呜的哭。

王妈告诉我，这全是王姥姥自己的错。

"一年以前，香贞就被同弄堂内的一位包打听诱奸了。王姥姥要顾全自己的名誉，不肯家丑外扬，同那个东西理论一下，就闷闷的设法搬到这里来，想图一个一刀两断，从此无事。不想，那东西每天早上总在小菜场等香贞，香贞一早出门总要到十时以后方才回家。姥姥心中虽然雪亮，只是有苦说不出。不久，香贞肚子大起来了。姥姥到了这时，更是无可如何。因为那东西已造成夫妇的'既成事实'了。他不怕你不愿意，你的女儿总算是他的事实的老婆了。

姥姥这时为了自己的面子，只得来同包打听说好话。她告诉他不能把女儿正式嫁给他的苦衷，因为一个包打听，做一个知事的女儿的丈夫，是要被族人笑话的。所以，她向他提议：'你们的关系我可不管，不过我的女儿不能正式同你同住，有了孩子就要设法打胎，不能丢我的脸，在名义上，我们不要有关系。'

那东西在以前自然也是承认这话的。可是，因此也就长了他的威风，他渐渐竟无法无天在姥姥家出入了。姥姥为了这个，真受了多少苦楚，她越想使族人不讲闲话，越是有人在那里物

议，那东西在这半年来，不仅得寸进尺，骗了老婆，而且吃姥姥的，穿姥姥的，用什么干儿湿儿的名义，快要把姥姥名誉家财荡尽了。

本来姥姥是可以告状的，但她没有那种勇气。不想那东西同那小娼妇太没良心了，竟不顾这老太婆私奔了，那东西有了事实的老婆的享受还不够，现在竟非把这小娼妇娶到家中去不可，可见人太懦弱了，也是要吃亏的。”

这是王妈的议论。

我听了这话后，觉得最有趣的是王妈口中说出的这“既成事实”四个字。真的，这四个字确是流氓无赖侮辱女子惯用的手段，软弱一点的父母，往往饮恨屈服了。这事在今日的风化新闻内，天天还可以看到。不过，如果遇到了勇敢的父兄，那流氓可也会触到大霉头的，因为那不怕造成“既成事实”的人，他敢于打破这既成事实，那你纵然无赖，也就无所施其毒计了。

这一席话，又使我想到一个强国的欺凌弱国的政策上来，不是造成“既成事实”也是强国的政策么？

这到使我有点替弱国中的姥姥担心了。如果再象王姥姥一样，自铸成错，那本国的疆土大概也将同香贞一样的命运，名义上的闺女也会保不住的吧！这已经成为一种铁则了。

痴 子 赞

我在《回春之曲》中看到一个痴子，又使我想到其他许多痴子，他们要比自己高明，所以想来赞美他们几句。

《回春之曲》是上海舞台协会最近公演中的一个剧本。这出戏演得怎样，这里不是要来评剧，恕不来啰嗦，我要赞美的是这剧中主角的痴子。痴子原是一个记忆力甚强的少年人。因为参加"一二八"战争，受了敌人过高度炮弹轰炸的震动，忽然将过去一切记忆统统丧失尽了，竟连自己的爱人也不能认识，完全变成了白痴。但他的脑中，也还留有一种记忆，就是战场的杀敌。所以他在每隔五分必要高喊一句，"杀呀前进呀！"的口号。

旁人听了这口号作何感想呢？有的人认为是疯话没啥意思，有的人觉得好笑，他的爱人，同参加过"一二八"的战友是哭泣，是叹气，但很少看见谁背上流着冷汗，脸上羞得发红，认为痴子是在讥讽我们，只有痴子方算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说的话方才不是假话。痴子到是我们这些人，会说疯话的就是我们。

有人说《回春之曲》中的痴子是在做戏，他喊的口号是在白痴中喊出的，他醒了后，他自己也会认为再喊"杀呀前进呀！"是不合套儿的，所以他醒了以后那戏就不能再做了。

是的，他醒了后，那口号是再不能在卧室中，会客室中喊了

的。但继续喊这口号就不可能了吗？并不！不过，那不是在神经错乱中喊出而是在头脑清醒中喊出。不是在卧室会客室内，而是在血鲜鲜的战野上，不仅是口里喊，而且是手上有枪，装着子弹，上有枪刺，对着敌人的胸膛，真的在“杀”呀！“前进”呀！

不过，这种由清醒中喊出的口号，送到汉奸的耳内又何尝不认为是痴子呢？不信，请问赵欣伯之流去吧！

我在《回春之曲》中，看到神经错乱中的痴子，使我幻出东北的冰天雪地上，染着千千万万痴子的血，有一队队在与民族敌人作战，真的喊着“杀呀！前进呀！”的口号。那就是义勇军！

这戏剧给与我们的是什么呢！恐怕要超过讥刺以上吧！所以我不能不赞美痴子，作痴子赞。

响 炮 酒

喝酒，自已不要花"大"，有人请你白喝，并且还备了一桌筵席将你请到上头，替你满满的盛上一杯，将杯子举起，说一声"请"，大家把杯子碰了一下，干了一杯，将杯底……亮一下，这时候，桌上的佳肴正冒着香气。你猜宾主间这时的脸是圆的还是长的；是微笑还是铁青？这不用说，大家的答案一定是"脸是圆的，并带微笑，不然，那就叫做不识趣"。

但我可不能保证你的答案有时不失效。我六岁读《昔时贤文》，读到"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我觉得挺对。但一看到店中做伙计吃响炮酒，就觉得这句老于世故的话，也不能以一概千，在这响炮酒中，偏偏对于以上的答案同《昔时贤文》，都要翻案。

响炮酒中宾主的脸子都是拉得长长的，颜色是铁青，没有微笑。"杯杯先劝"的不是有钱人，而是决定辞退的穷伙计。

这是一种反常。反常就是反常，横竖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是旧的商店的一种惯例。大概旧的商店中，辞退一个伙计，老板总有点心软，不好意思轻于开口的。所以，在一年终了，老板要决意辞退某人时，以前是一声不响，到了正月初五或初十，老板特为办一桌席请伙计吃，由老板指定你坐某一个位子，就是指明要辞退你，如果今年只辞退一个人，照例老板请了那一个人

坐首席外，就对其他的人说："大家请便吧，四方为大的。"

又照例，以酒过三杯后，老板就半吞半吐的向着首席说出去年的年成如何如何的不好，店内如何如何亏蚀，他如何如何承大家帮忙，心中十分感激，现在可是生意是不能做了，但又不能收歇，没得法子，只好暂时减少几个人，由自己来站柜台子，以后他就祝大家高就。

这里一点没有难为人或幽默的意味，老板大都是诚心诚意的。吃这餐席的人，也都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大家有一种共同气氛，就是紧张、失望，没有法子吃饭，照例大家的舌条是不大能辨别菜肴的味口和酒力过火不过火的。

据尝过这味道的人告诉我，难受的到不是在坐到首席以上，因为既然坐上去了，就无所谓了，装软也没有用处，所以凡是坐上首席的也故意装做没有什么的样子，虽然脸上早已现出青白色了，但是，在未上筵席前，真有点象待罪的囚徒，脸上总是时青时白的，那真是使你哭笑不得。

一件惊人的拍卖消息

不久两天前，我们听说申新纺织总公司的第二第五两厂关厂了。

今日(二月廿六日)我还在床上。打开报纸一看第一眼跳入我的眼内的，是“市商会等三团体电请制止拍卖申新九厂”两行大字。我登时吃了一惊，接着去查这拍卖的日期，我又看到这大标题下原来还有两附句，就是“该厂财产共值五百万元，汇丰银行欲于今日拍卖”，我才记起了久传要破产了的中国棉纱大王荣宗敬氏到底要倒下来了。第九厂抵押汇丰的日期，现在已经到期，却是“无力取赎”，汇丰竟委托鲁意师摩洋行发出下面的“公告”：

> 本行受有关系之第一受押人之委托，准于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路本行前间拍卖坐落本埠东区贵重地产六十八亩，兼该地上所建房屋，以及屋内机器……系属于申新纺织公司第九厂，此项产业，限价银洋二百二十五万元。……

再看下去，是市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电行政院实业部等“迅予电令制止”，因为他们都在“群情惶骇”中，知道，这一拍卖不仅是荣宗敬氏的破产，确是“事关棉业前途”了。其实，又“岂独棉业前途”而已，这不就是中国民族工业写上拍卖场的拍卖单

上了么？

这一拍卖消息是否会因市商会等这一反对而谋得救济呢？这我们不管它。但这里所表现出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我们把以上停工关厂的消息合在一起时，我们能不为之颤栗吗？

是的，这拍卖单上同时说明了申新九厂四千工人的命运也在拍卖了。

由这关厂、拍卖而失了生存依据的工人，据说已超过八千，如果把这八千工人的家属也算在内，上海一埠近日来将增添两三万无衣无食的人群。再将申新其他各厂每周减工到两日或一日的各种现象都加入考察，上海工人生活是陷入如何的绝望呢！

我在这一消息中又看出了我们的命运迟早将要被列到这张拍卖单上去。岂独是这四千工人的命运呢！

这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危机，中国民族的真正的危机，中国社会的全面相的总影啊！

吃 鱼 运 动

二十一日哈瓦斯华盛顿电：罗斯福总统顷为鼓励人民多吃鱼类，增多鱼类消费量起见，特别从事全国宣传吃鱼运动。据说，将“率领大批美貌妇女周游全国，俾使内地人民目睹艳色，得以领略食鱼之实效，于卫生与美化上均有裨益”。

这真是一段佳话。我们读了这一段新闻后，闭目沉思，想到一长列袅袅娜娜的美人，每一只玉手中提上一尾乖巧的鲤鱼，在许多被铲除的麦田的农村中，劝农民“目睹艳色”，“口尝珍味”，这真增加“蓝鹰运动”的趣味不小。商人的推货运动，在这经济恐慌的年头，真是无孔不入。鱼这时忽然发觉它是一种卫生的食品，并且世界食鱼量也被“商部”统计出那样明明白白。“美国人每年食鱼平均十五磅，日本人瑞典人则多至五十磅”，如果你的肚子要爱国，不落人后的话，你应该每年再加三十五磅，但不知那些被工厂老板撵出厂门，或麦田被铲除的饥饿的人口，见了这妖艳的宣传行列，还能把那区区失业救济金来向这些美人手中购买那一尾鲤否？

我又想到，如果另有一位商人又发明了羊毛内衫比麻布袋要更保暖，全国再来一次穿衣运动，那时，美国的消费者，究竟吃鱼呢？还是买一件羊毛内衫呢？要两者全备，明明是一天天变得不可能了。

中国什么事到底都落后，到今日，商人还只晓得整年挂着大廉价的布旗，呜呜的吹着十八摩的小调，象老九和那样的绸庄，也仅能平凡的在店门前大书“买一尺送一尺”，如此而已。一个美人拿一匹“真毛葛”，一列列的到灾荒后的农村，或顷近毁炸过的“匪区”，去宣传穿绸运动，使内地人民“目睹艳色”，并领略“美服之实效”，在中国就不能实现；也未见中国的商部，统计出美国人、英国人一年对于衣着消费多少，中国人消费多少，以鼓励其爱国心。真的，做中国人才倒霉，连“过屠门而大嚼”的眼福也没有，这怕就是所谓半殖民地的缘故吧！

服侍不易

最近有一位朋友新从傀儡国来到上海，传出了傀儡国官场中不少的佳话，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傀儡官僚间现在流行一句互相感喟的话，叫做“服侍不易”。

据说，现在无论在傀儡国什么政府和文化机关做事的人，最痛苦的是受不住日本顾问或日本同事的压迫。上至于郑孝胥之流，也还常常挨日本顾问的辱骂，而这些顾问又大概不过是一些中佐、上尉之类的东西，他们的不讲情理，有时甚过于关东军上级官佐，因此，他们常常避地里埋怨这些小主人，但因为自己本是一个小奴才，也只得忍气吞声下去，只有退到私家屋子里，才能互相叹喟几声，“服侍不易”，以泄泄胸中的奴气。

至于高级的傀儡呢，就连吐吐这奴气也要谨慎些，据说傀儡国各部大臣及上级官佐，多有一位东洋太太跟随着。而这些太太的来历，在名义上是由主子赏赐的，实则就是一名随身侦探。日本女人军国民教育观念很深，她们做了人家的太太却并未忘记自己的任务。所以她们常常以主人自居支配她的丈夫的一行一动，这一来，这些大奴才的私生活也奴化了。所以连这句“服侍不易”的空叹，也得特为留心，不能象小奴才到了私家的屋子里还可以随便的叹几声鸟气的。

自然这种叹喟一点也不会引人同情的，不过这种“奴才恨”，

这般天真的表现出来到也可供世人对于奴才心理的一种了解，说不定也跟着叹喟一声道："原来为奴也不易呀！"

在《红楼梦》中，我们读到元妃省亲这一段，元妃发出悔不当初嫁给小户人家还可享些天伦乐事的话，那种不甘君妾之苦，我想大概也是属于"服侍不易"之类的感喟吧！这又哪里是贾政那种奴才的心所能了解的呢？怪不得，有人看了《傀儡之家》后，不懂为什么娜拉要出走，曾经师法过娜拉的人也还要回到傀儡之家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畏服侍之难呢，或者竟连这一点奴才的自省也没有了。

我又不知道，世间的准傀儡听了这消息后又作如何的感想呢！

反对地图上"满洲国"

《申报》十四日新声社消息："工部局格致公学，初中三年级及高中一二三各级学生，因该校所用地图 Wheatons Modern Teaching Atlas 第四十一页亚洲全图上竟有'满洲国'字样，认为与国联议决否认伪满之旨不符，特各自会议，陈请学校当局，将该项用图掉换，一面并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核办云"，这项消息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它告诉了我们这种特殊教育的殖民地的性质。这原不足怪的，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下，尝过教会学校教育味道的人，千奇百怪的事多得很，岂独教本的腐旧与荒谬！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亚洲全图上，竟发现"满洲国"的字样，而编这地图的人是英人 C. Midgley，并不是木屐朋友，用这地图的学校是英人势力下的工部局的学校，不是日本人校长的伪国中学。这是不是觉得奇怪呢？

学生们提出反抗了。这反抗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表现，是可慰的。学生们提出理由，"认为与国联议决否认伪满之旨不符"，拿来去难英人，使其无词狡辩，原也可以。不过，我觉得这种理由太不正面了。学生们不应该真的以为这是反对的理由的中心，不！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目前到底还不是哪一国的殖民地，我们要求解放，我们要恢复已失的土地，我们不承认

由强暴造成的"既成事实"的侵占。反对地图上"满洲国"，不是打高调，是反对强权，是表示我们有"光复故物"的决心，这才是我们正面的文章。

学生们还不应把地图问题看得太单纯了。我们不仅要掉换这张图，还应保证以后能享受中国人的教育，应该反抗一切带殖民地性的麻醉剂。

这是我要对格致公学学生诸君说的话。

但是华人教育处将如何"核办"呢？这就不得不看社会的舆论了。我们似乎不能轻易放过。我们知道，在教会之类的学校的学生，素来是保守的，与社会一向保有了一种很长的距离，现在格致公学的学生竟被实践打破了这一防篱了，这是何等值得奖誉的事！因此，我更希望一切教会之类学校的学生，都能象格致公学学生这样，把眼睛望远一点，把自己的学校生活与中国实践的动荡的社会连结起来。

诡 辩 论

记得在女子开始剪发的时候，在许多反对的意见中，有一位学者的持论，最令人动听，他不从维护旧习惯、美观、男女有别等方面来反对，却转了一个大弯子，说剪发有碍女子卫生。乍听起来，要使你发笑，但是也有他的理由，不由得你不听下去。他说，梳头就是中国女子唯一的早操。每天早上一个女子梳头的时间不是要占去一两小时么？当梳头时不是两臂左右开，前后的摇动吗？这不就是最自然的胸部运动吗？中国女子习于娴静，唯一的运动就只于此，试想临窗对镜、披发弄梳的时候，眼睛望着的是窗外的青山、白云，胸部大张，肺在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何等自然而美丽的运动啊！现在把发剪去，就失掉这种运动了。这明明是一种诡辩，但是很令一些人半信半疑的。

最近我又听到一位天才的实业家的磕头的运动论了。据说某公司有练习生及中下级职员百余人，在每星期日上午半日休业中，特召集全体"同人"拜佛，念经，并听一小时的说经。对于拜佛，自然要磕头，起先，有些"同人"是不高兴的。但他的理由也很动听。他说，星期拜佛，也似外国人的做礼拜，并不是迷信；磕头，在天主教就实行，也不只是中国有的，并且磕头是一种全身运动，比跳跃运动要和缓，比八段锦容易记忆，动作也更简单。做这种运动时，不必记一二三四，心中只默念着"阿弥陀佛"即是，

做多少次数呢？也不必一定，能多磕就多磕，但最少每人要磕四个头。

他又说，这就叫做“寓休息于拜佛之中，寓运动于拜佛之中”。

这明明是在扯天大的谎，自然也是一种诡辩论。

诡辩论虽然经不起逻辑的批判。但是它仍有欺骗的作用，它用言辞的游戏，把一切说得似是而非，使一些头脑较为单纯的人有些昏昏然，不知何从，所以要比正面的反对论还值得注意。

我以为，舆论应负揭穿这些诡辩论的职责的。

冤狱赔偿

幼小时，我的家就邻近县衙门的监房，所以对于监狱以及犯人的故事就听得特别多。大概因为这环境太阴森的缘故吧，母亲就时常讲述包公案给我们听，我们真的也一时忘记那些穿红衣红裤子的人的不幸的遭遇，而在那里梦想一个包公这样的青天爷出现，替他们来伸冤。但是，事实上我们只听见堂上大老爷在那里打人家的屁股，被打的人是一面在地下滚，一面在喊"冤枉"。同时，我们也常看见有人背上挂着"冤单"，有人在地下写"冤告"，有许多老母娇妻孤儿在含泪饮血哭诉他们的儿子、丈夫、父母的"冤狱"、"冤死"。这真是"堂上一笔朱，堂下千滴血"。在过去司法采"报应主义"，这一点也不足怪，是太家常便饭了。大家的希望只是能出一个包老爷，对于司法官吏假其职权的机会而行其不法行为，除诅咒他们的来世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到如今也还依然存在的，就是一个案子摆上十年以上的事，并不能算奇怪。我就有一个朋友，坐了十二年监牢，结果宣布无罪。据说，政治犯每每延长两年不判的事很多。这些羁押的囚徒，即令结果宣告无罪，重见"青天"，我真不知他们对于这长年监狱中所受的痛苦，到何处去找补偿？这冤枉要谁来负责任？

自然，这也是照例无人注意到的。

最近律师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却注意到这一问题了。大会中通过了“组织冤狱赔偿运动”一案，并且发布了一个维护正义与人权的宣言，要求国家赔偿制度的实现，以洗封建残余的野蛮的“报应主义”的渣子，这可说是一种光荣运动，不独我们寄以同情，也是值得起来拥护，并促它早日实现的。

是的，在二十世纪的今日，我们是再不能将冤屈诉之于空想，我们要保障个人的生命及一切权利的安全，不受何等损害；我们不怕吃官司，但我们应该要求国家对于司法枉法的行为所造成的冤屈负起赔偿的责任来。这不独是一新司法之精神，同时也是解千万人的倒悬啊！

这样的进步运动，难道舆论界不应起来响应么？不！我们要求大家援助，但是我们最后希望律师协会者，这一运动不要仅仅是一纸上的运动，要把它作为一种行动，具体的定出实行的办法来，去促它实现。同时对于目下因时局不静中所陷入犯罪的囚徒，提出重审的主张来，使他们得一个昭雪沉冤的机会。对于嫌疑犯、未决犯，应公正的迅速的审理，早给予无罪的开释，取消一切特别法，实行冤狱的赔偿！

威尔逊主义

胡适先生在《独立评论》第一四九号写了一篇《纪念五四》，是一篇占七页篇幅的大文章。胡先生写纪念五四的文章，如同胡先生演讲“五四”一样，应该是最适合没有的。因为胡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谈到“五四”总不能不令人想到胡先生，想看和听胡先生对于五四所写的文章，说的话。这是当然的。

但是，我在胡先生这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中，获得的是什么呢？除胡先生忠实的记出一部分事实外，我并不能得到什么。如果一定要我说出我的读后感，可只能指出胡先生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浅薄的实用主义的自招。他说：“我们（指他同蔡孑民）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他又记出五四那天北平学生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大美国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的现象，并肯定“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这是够玩味的。

“五四”时代的学生，这般天真纯朴是不能严责的。因为那时代一般社会科学的知识实在还太幼稚，他们认不清自己奋斗的途径、民族解放的方向。竟被一个国际政治的骗子所麻醉，一时高兴得跳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虽说幼稚可笑，却也还觉得朴素可

爱，我觉得有趣的，是胡先生那时也还是同一个孩子一样，同入了迷。不过，当日的孩子现在是长大了，他们知道以前受了骗，而胡先生到今日似乎仍没有什么变化，他反认威尔逊主义是构成“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这样的来扰乱历史的真实，这能随便原恕的么？

是的，威尔逊主义到现在虽然连美国人也忘记了，可是，在中国却还有胡先生这类人在纪念它；并且“五四”时代那种盲目的依靠他人的心理，现在也仍然存在，不过，它不是威尔逊主义而是换为李顿主义或广田主义了。

同时，这些被麻醉者，却不再是纯朴的孩子了，而是堂堂的大人，他们甜蜜蜜的在喝人家给他酌上的香槟，却不承认自己会中酒精毒。他们自己喝过了，就把毒液送给自己的孩子。这种实验的精神是了不起的，此之谓实验主义。

威尔逊主义的崇拜就是实验主义的应用。实验主义在半殖民地中国的今日，它是怯懦的精神最后找到的逃避所，也就是一切敷衍主义，极庸俗的得过一日是一日的化装，它将把自己的青春虚度，不知不觉走到衰老死亡去。

我不承认威尔逊主义是构成“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我反对“五四”运动这种外力说，但我同时反对今日的威尔逊主义。

隐

一向就不大爱到大舞台之类的地方去的，所以对于那里面的风景同人物，知道的就很少。在幼小时，故乡有汉班，也有京戏，间或同大人一同去玩这些地方，我总看不到扫台戏就溜着跑了。我不要看戏子脸上画着的那鬼脸，也讨厌他们在台上走八字路，我觉得太不近情理；但大人们一定要对我说，这有道理，画鬼脸叫做脸谱，走八字步是台步，都是京戏汉戏里的门槛。真正的品剧家，是最注意它的。听说曾经有一个京班子到了C城，刚上舞台就被观众一阵"通"打走了，为的不过是一个大花脸额上少画了一条黑线，花旦出台没有把眼睛扫场子，正生的八字路多走了两步。据说从此以后，京班子知道C城人有眼力，在入境前就得默起火神的。

不过，我在十五岁时，就把这扮鬼脸的秘密拆穿了，发觉了真正的门槛。那就是有一晚上我同四哥走到了后台看见那扮大花脸的大汉的面相，活象一只猪猡，满面黑麻子上长着许多肉瘤，还丛生着脏而又讨厌的胡子，我顿时心中一亮，啊！原来这就是脸谱的作用了。他要隐藏那丑恶的鬼脸，怎能不用一个面具呢！同时我还看见花旦小生，在台前出现时好象有点可爱可敬的，但是一到后台，卸了装，就同捧她或他的"绅商"动手动脚的胡调起来，这还有什么可爱可敬呢？

以后，我大抵就不到这些地方了，同时，有点失敬得很，我看不大起中国的旧戏，虽然现在仍有人与江亢虎唱对台的在那里发扬国粹，喊出什么“正戏”的鬼话。

至于在“人行道上，四五十人密集在一起”的所谓“民众娱乐”，无论是卖解、把戏，或唱一两段京腔、两三句小调，甚或同时来一个“毛毛雨”，虽然演出的是“没有一定的范围”，象做戏又不能象大舞台能“演出整本”的，并且没有排场，没有台，不能走台步，没有那红红紫紫的颜料画脸谱，嘴里发出的又只是带一些沙的声音，但我却从未讨厌过它。在故乡，我心爱的娱乐场所是火官殿、水风井、教育会坪等地带。我常常夹在许多污秽的群众间去欣赏这“民众娱乐”。

到了北平，梅兰芳博士的男扮女相只看过一次，我常到的地方却是天桥，天桥，第三个地方还是天桥。到了上海“西藏路泥城桥附近”，爱多亚路以及城隍庙等处也是我最欢喜玩的。是的，这有点“低级趣味”、“下流”，但我也觉得这些低级的“艺人”，虽然或是道地的“饭桶”，有些唱得四不象，女的不会弄媚眼，男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疤，我反而以为比舞台上那样藏藏隐隐、“欲盖弥彰”的丑态要直爽得多，因为我在街头“艺人”面上看出的只有饥容，并无淫态，只在用简单的技术行乞，却没有后台上隐藏着丑恶而在前台行骗，他们虽或是无能，但不至比后台上的摸大腿还“硬滑稽”。

自然，行乞的卖艺，不会是一种高尚艺术，这犹如行乞不是一种正当的职业一样。迷于这种“街头艺术”的人，自然他的生活内容也比这些“艺人”差不离了。至于象我们还有一套旧西装可穿的人，虽然不把这些“低级”的“民众娱乐”看得如何下贱，但

对他的趣味是有一定限度的。

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求改善大众的生活，方能谈到提高他们的娱乐，却不是嘲笑，尤其在“民众”尚在过一种这样的生活，沉于这样的趣味的形式中时，我们要废弃旧型，却不可不研究旧型，我们反对低级趣味，却不能把双眼闭着梦想天堂，何况新的趣味要达到大众时，利用旧型也是一种法门呢？

至于用嘲笑谩骂的态度去诅咒正在生长中的通俗文，把它比作街上的滑稽戏，而自己以为是批评，那就只显得它的浅薄了。我觉得脸谱在中国的势力真大，有点害怕太阳，不敢面迎真理的人，都需要一具去隐藏自己。

学　字

因为自己编的杂志马上要改用手头字，没事时，就拿出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来练习。练习方法是先把自己会用的除外，再把其余的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变化很小，容易记忆或理解的，一类是变化很大，“素昧平生”的，不易记牢的。我在一张写坏了的稿纸上象孩子学字时一般的练习。

等到在纸上练习的熟了。我于是随便在杂志架上抽出一本杂志，我想来应用，我一句一句的细读，一字一字的查检，我想把有手头字的原字一一用手头字去代替它，但是成绩怎样呢？只能列入劣等，因为文章中就是同一个字，有的改换了，没有改动的依然还不少，不要说那些较新鲜的手头字，能运用的自然更少。

这不足怪，是用得太少，还不熟悉。

可是在这练习中，倒使我想到十多年前开始学字的时代。那中等学校照例都有文字学一科，当时有点身份的文人，也还习于要写几个别人不易认识的古字，以示自己的渊博的。我记得，那时C城教文字学最有名的人是易培基氏，易氏身价最高，一到学校来上课时，是坐三人抬的轿子，气焰凌人，也几乎使你不能想象，对学校其他教员，概给与渺视的眼光。在教员休息室内，并不同任何人对话，给会计下一个条子要薪水，也要写几个古字，

使那只会管钱、打算盘的会计叫苦。自然，学生是佩服得他五体投地的，学生中受他的影响也着实造出不少会写古字、翻白眼、目空一切、疯疯癫癫的青年来。

回想起来，我感觉最怪的是，我们从未怀想过学这些古字除开同会计开开玩笑外有什么用处。

后来到了北平，一时迷入故纸堆中，我才发觉以前学的几个古字也还有它的用处。于是自己更往深造，也多看了一些在故乡不能看到的古书、破铜器、铁器、骨片、砖头这类东西了。不久，易培基氏到了北平，做了故宫博物馆的馆长，我又发觉，易氏学古字除吓人外，也还有他的实用，就是藉文字方面，可以赏鉴古物，他做博物馆长是很相宜的。不过，当时却未想到，他的认识古字还有一个用处，就是为了鉴别国宝的真伪，以便将来选择几件自己用用的。

又不久，我丢了古书，自然与那些古字又生疏起来。但偶然接到几个旧师友的来信，也还故意开开玩笑，写几个古字。我每每对着这些玩笑，总要引起当时学习时的艰辛的情绪来，沉重的叹一口气。但不想到，中国文字的进步如此飞速，现在已达到大众语的阶段了。在我这短短的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再来一遍学习手头字，这是很可贺的。我相信这种字形方面的变化，还不过是文字变化的开始，在我的生命期限内，一定还有一次学习字母的时期到来，因为中国文字不能就停留在这手头字的阶段的，文字不会止于形的变化，一定要发展到音符的，这日子想来不久了吧！我微笑的在等待我再来做一次孩子，双手伏在桌子上练习中国新文字的字母。

低级趣味

新搬的家内没有浴室的设备，所以现在变为一星期要上两次澡堂子了。中国澡堂子里据说同中国一样是有一些神秘的，但在我却还未感到，我在上澡堂子所感到的，与到大世界、天韵楼或坐统舱、三四等车等处相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风味儿的地方，实在是有一些儿讨厌得可爱的，虽然它与我的生活实在有点离得太远了。

我有一种脾气，就是对于讨厌的东西，也常常想赏玩它。譬如坐船吧，明明知道统舱是不大卫生的，并且手中有时也不见得没有买房舱的钞，自己却非统舱不坐，洗澡则也爱洗池子，看戏听书也常常找到世人认为是下等的地方去，在北平一定到天桥，端午节一定要上一次什刹海，在上海自然对于游艺场、城隍庙这类地方，也是高兴去的，虽然我一年去的次数并不多！

对于上澡堂子呢，自然比看戏、听书要多，何况目前一周就有两次呢。是的，我在统舱、三四等车上，游艺场、澡堂子内都是有些收获的，这大概就是所谓低级趣味吧！

不错，在这些地方，确实寻不出“高级趣味”来，这不足怪，这是被一种生活圈子所限制定了的。这里是属于低级社会层的世界。他们穷困，失教养，但他们仍然在万重压力下，弯弯曲曲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他们的意识，他们有他们的嗜好、习

惯、语言、趣味，许多与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人有些两样，这犹如我们的趣味，又比站在我们头上的那些高贵的人们有些不同似的，一样平凡得很。

自然，这些地方也只能表现这一等级的人气氛的一部分，并不能在这里窥测他们的生活的全体，因为来到这些地方的人，在相对数方面，到底还是他们那广大的人口的最小的几个。虽然如此，但绝对数仍是不可忽视的。今日上海游艺场的人数就比任何高级电影院要多过许多倍，所以这低级趣味，虽然我们看不起它，可是客观上仍是支配的力量啊！

是的，低级趣味是应该设法代以高级的。虽然这一变动的主要动力是在生活的改善，似乎枝枝节节的去做是没大用处的。其实完全伸着颈子去等待生活改善的奇迹，那也完全是幻想，是完全忽视主观的力量的。我以为在这“奇迹”未实现以前，对于这一世界的趣味应该有人严肃的出来作批判，不应高洁的站在远远的唾弃它，应和它亲近，知道它的，揭穿它的一切丑恶与毒素，去说服那些被这趣味所麻醉者。

意识的前进虽然可以改变他的趣味，但旧的趣味并不十分容易丢掉。我就亲自看见一些思想似乎很进步的青年，因为他识字不多，不能接受高级的趣味，仍然一个月要看一两次“方朔精神团”的玩意，这不是旧趣味、旧形式也还能作用人的明证么？

低级趣味的批判，现在至少可以首先说服这一部分人，这同时不就是意味着我们用人力的去促成这一趣味的没落么？

我重复说，从这些地方，实在是有所获得的。你可以认识许多人，许多生活习惯，趣味的秘密。同时便可以看看中国封建势

力在中国低级人层中保持的巨力。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这些地方，你仍然可以获得趣味，虽然我是不赞成的，却也仍是新鲜的。如果你想扩大一点认识的话，你怎能把自己束缚在一种生活型中呢？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闲工夫，也不妨留心到这些低级趣味的各种型象方面去，不必惧怕走进了游艺场，或在池子里洗澡之类，就会有损你尊贵的人格。

捡糖果吃

——教孩子的方法

皇帝喜欢把人民比作他的儿子，他自己就是万民之父。但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虽也同样居于一国元首的地位，却谦虚一点，自称公仆。舆论界把一般读者当作孩子教育的，以前似乎没有听见过，有之，大概是从《独立评论》开始吧！

好的，我们这些孩子也希望有一位贤明的父亲来教育啊！但是，这位自称父辈的教育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把孩子"教养它成为一个有度量、有君子之风的男子大丈夫"。

如何把这些顽皮的小东西，都变成"年少老成"、彬彬有礼呢？

据说"只有把冲突的、矛盾的，以及折衷的、调和的学说摆在孩子面前，让它去选好的信服，才是唯一教孩子的方法"。这也就是孩子"试周"的老办法。每一个母亲，在孩子的周岁时，预备了书、画、算盘、金钱、花、笔、刀、尺、印、鞭子，等等东西，摆在孩子的面前，让他去选好的拿。他要做官，就拿印、刀和鞭子，想做阔人就拿算盘，想办《独立评论》之类大概就只能拿笔与拿钱等等的东西了。

这就是所谓"自由思想的精神"。"我们为孩子着想，总希望他天生一副脑筋能够充分利用，练习它来养成选择判断的能

力。"哈哈，不抄了，这就是《独立》教我们这些孩子的方法，并且已教过三年了。

孩子是否都爱吃糖果，都想成为"有君子之风，有容人之量的男子大丈夫"，我可不能代答，至于我自己，平日也是看《独立》的，却并不找甜的吃，因为恐怕裹着糖衣的东西，内中正是装的毒药。

在学术上真正自由思想的精神，在近世欧洲史上所谓"思想解放时期"确曾现出过一点影子，但这不是偶然的，是市民阶级刚刚起来反抗封建主人时代的一股朝气，他们需要这样来闹一下。这与经济上采自由竞争、政治上取民主主义是相适的。等到经济上需要取独占的形式，政治上也只能服从"我们的领袖"时，自由思想的精神自然要遭殃起来。我们要晓得"焚书坑儒"、"残害异端"都是这些市民阶级灭亡前必然会有的那么一回事。不要大惊小怪呀！

但你反对思想的自由吗？哈哈！老兄！不的，我双手赞成思想自由，但不要仅仅是幻想啊！思想自由不是回到"思想解放时期"那年代去，而是进入一新的更高级的自由的时代，这不只是征引历史，而要创造历史呀！

在孩子面前摆上五花八门的东西，让他去摸你以为就是最公正的方法吗？小孩子如果是无知的，那不就是等于不教育或者反要杀害他吗？哈哈！好一个客观主义者，你既承认一切都应该存在，你不就是连腐烂、丑恶，也一并在维持么？在客观上不就变为恶势力的卑劣的牧师么？这是练习孩子的判断的能力呢？还是引孩子进入迷魂阵去，杀害孩子？

甜的东西，有时是有毒的，拐子手的荷包内据说常常带有糖

果，小朋友们还是多吃一些酸苦辣的东西吧！捡糖果却要小心些！

卫生臭豆腐

也许是嗜好有些下流吧，记得到过“平湖秋月”的人，总爱夸张那里出卖的五香豆腐干可口，但在我却并不如此。我吃不出它那所谓“可口”来。这大概是我吃它时没有配上一杯真的龙井，没有开上一壶“九溪十八涧”的水，没有一个古瓷的杯子盛着的缘故吧！不！不仅没有这些，大概也还缺乏一个窗明几净象知堂先生那样的“苦雨斋”，那样的一颗闲适的田园的心，以及二三能品茗辨味的高士吧！吃，在我们这类俗人，大半就是饱肚皮，舌条的辨味力以及嗅觉，也许都比高人要低能一些的。所以我爱吃的豆腐干却反是一种天天在街头可以买到的臭豆腐。花了两个铜子，站在油锅边，用丝竹篾往锅内签它一块，加上一点辣酱，热辣辣往口内送，我到感觉十分开味儿。若荷包内能有一两个银角，买它十块八块回到家内下夜饭，那不就是穷人无上的肴馔么？至于卫生与否，那到从未考校过，因为吃了半生，却从来没有得过什么恶疾，就不科学的权当它不妨害卫生吧！是的，在没有到“平湖秋月”的幸运，没有闲适的心情细嚼五香卫生豆腐干的福气以前，暂时不要打倒这些卖臭豆腐的担子吧！我个人是这般的想。

不过，这些卖臭豆腐的担子却会触犯“高级嗜味”的人的鼻孔，这是无足怪的。

知堂先生对“现今嚷嚷的科学小品”，就比作“所谓卫生臭豆腐”。这是说臭豆腐是本不卫生的，现在加上“卫生”二字，这不是矛盾得幽默么？但你不要以为知堂先生就反对科学小品，这犹如知堂先生不反对豆腐干一样。知堂先生反对的只是“现今嚷嚷的”，他对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汤木生的《动物生活的秘密》，都爱慕得很，并慨叹“却又不是《四库》的哪一部文选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难能稀有也”。“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难道说知堂先生还反对科学小品么？是的，同一豆腐干有的可以供雅人品茗，有的亦能给街头人饱腹，知堂先生反对的明明是不能供“苦雨斋”座谈的那种科学小品，那明白得很。

“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虽然这在大体上象说明了什么，其实是朦胧的。科学小品在今日的意义上，不能是这样抽象的东西，它应是用科学的法则解释当前实践现象的科学的片断的文字，自然，要将科学的真理表达得充分，文字要是大众的，有诱惑力的文艺性作品。所以，虽然法布耳、汤木生的杰作值得尊为五香卫生豆腐干，但在今日的中国，客观的要求上，却只是供学者座谈或作者研究的东西，并不能饱街头的空肚子。目前需要的科学小品，不能是借人家的光，而是运用科学法则去解释压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现象，这些现象最压迫我们紧的是属社会的，所以专写昆虫动物生活的东西，纵令如何优美，在现在也只是茶食，不是正餐。“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为什么一定“要去模拟文艺复兴的名画”呢？中国科学小品就不能依存于自己的实践去创造么？

至于说不象法布尔那样的科学家，没有那样的文字手段的

人，就“应该免动尊手”，这不是明明的取消人们的努力么？这在我是不敢领教的。说来可怜，所谓“现今嚷嚷的科学小品”，还只在孩童时期，没有好的货色，却也是事实，但是在趋势上明明看出是在生长中的。因为生活的实践已决定它的发展，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不能成为雅人学士“苦雨斋”中品茗的五香豆腐干，所以只能权当作“臭豆腐”而在街头叫卖吧！所以知堂先生这种讽刺，我们一点也不认为刻毒、难受，倒是把科学小品那种高贵的外衣脱下了。

在街头贩卖的东西就可以不讲卫生么？那倒不然，臭豆腐到底是一个讽刺的比喻，科学小品最要严防的是带有毒素，不仅对于臭的要留心，就是香甜的也得注意啊！香的东西也一样能有毒的。所以，臭豆腐加了卫生二字，实在妙不可“酱油”了。

同归于尽

早两天，有天津人岳霖全家八口服毒自杀的一幕惨剧，很使人看了不安。虽然在这年头儿，个人的自杀是太平常了，天天的社会新闻内总不缺乏这类材料的。但举家自尽，并且是出于计划的“同归于尽”的人间惨剧，却是以前闻所未闻的。譬如岳霖所主演的这幕悲剧中，除岳与其妻王氏是五十一岁和三十五岁的人，能了解生之悲痛，在这悲剧中演着主动的角色外，其他的陪演者都是孩子：是十四岁、十二岁、十一岁、九岁、五岁、四岁六位不知世情的孩子。试想岳霖失业后，到了没有法子生活和妻商量自尽，及自杀过程中，从典当、告贷、购烟，到“当夜将烟和糖冲水全家吞服”时，已令人颤栗了，但不想悲剧发展到这样的顶点，偏偏有岳霖“服毒较轻”，没有死，使他再到黄浦投水，投水又偏偏被探捕瞥见，致以“教唆自杀罪”入狱，如果这不是报纸上的的确确记录的事实，我真不相信人间会有如此悲惨的事！

不想这种不安的心绪还未轻松下去，接着又来了举家跳楼自杀的消息，并且是发生在“万人欢乐”的端午节夜。在大世界六层灯塔上，站着一个不幸的家庭，据报纸记载，首先跳下的是一位年约五旬以外的老妪，继之，则为三旬的少妇，七八岁的女孩，十岁上下的男孩，三十的中年男子，十三四岁的青年，五位一齐堕地，在脑浆迸裂中毕命。这一幕悲剧除形式不同外，与岳霖

全家的死，是完全同一意味的。

"太可怕了!"不错，确实太可怕了，这是他们两个不幸的家庭的私事么?是的。虽然在今日的社会里，一个家庭自杀，谁还认为与别人有关呢!但是这"私事"同时不是告诉我们了，这社会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使得他们没有存在的地位了。

我们对于死者的境遇自然不能不抱十分的悲恸与同情，但对于自杀却是不能加以消极的默许的。个人的自杀已经是怯懦的表示，对于社会的罪恶、魔鬼，给与宽容;更何况举家自尽，竟连孩子们也由自己的手先杀死，使后代中减少一个斗士，使这不幸的社会存在延长呢!

自然他们的自杀也不是偶然的，细考他们的家庭生活，都是中级社会层的破落者，他们物质生活破产，他们的意识颓废，他们没有路走了，却不想另找路走，他们于是生出生之疲惫来，自灭吧!是的，为了保持他们社会层的虚伪的自尊，所以连孩子也不让他活着，他们竟以为这是没有办法中唯一清高的"出路"。

是的，这种悲剧的暗示力是很大的。今日不得过活的家庭，即就上海论，哪里只有这一两家呢?我要警告具有与这两家庭一同命运的人们，当你们走到这生死关头时，赶快脱下旧日思想的衣裳，来更向前迈进一步吧!能有死的决心，也是能求得生存的。

我在这悲剧里更看出了一幕更大的悲剧，它是由千千万万的家庭组成的，那就是我们民族的目前走到的生死的关头，我们还是集团的跳楼呢?还是另求一条生路?

逃

报上时时载着国外的侨胞一批批的往国内逃，日来又听到我们旅沪的湖南同乡也一群群偷偷地往省里逃了。国外排华，我们的侨胞不得活了，逼得走了“死也死到故国去的路”；在上海我们的老乡呢，除开我们这些无出息的人们外，以前在贩酒业上据说确也称得有一点势力的，虽然生意都做得那么小，不能同粤、徽各帮比一比肩头，但是，不景气也袭击到这些小酒店来了。失了业，虽然人们的脾气也许变得更坏，荷包内却无买醉之资，也只得在家内打骂儿女寻黄脸婆出气去，于是酒店就变成了阎王老子的饭店，上门的人只是一些阎王老子的亲友了。

上海既不易居，也就生出“死也死到祖宗坟墓的草堆前去”。他们也逃了。他们因为要逃避债户，有的更因着筹不到川资，在关店逃跑前，还在其他大店里赊进了一批货，暗中对折贩卖给自己几个亲信的朋友，才能逃得动的。因此，他们的逃比起国外侨胞来，更是惨然，他们就连明目张胆的权利也没有了。在今日的社会秩序内，他们这样逃，也是犯罪的。

在好多年来，闽、粤、鲁、直许多人不能活了，一批批往国外逃，我们内地的蛮子，一群一群向上海逃，现在大家又折归了。是的！走尽天涯无生路，前进不能了，就只有逃，向祖宗坟墓逃。

在这里，我想起了文明的白种人征服美洲时，红色人从海边向森林的腹地逃，山上逃，中国的苗民不也是被汉人赶上山的么？近年来，关外人往关内逃，河北人往华中逃；在别一方面，我们看见人家武装的把国内饥饿的人民安置到国外肥沃的土壤上去。这是何等严重的生与死的对照啊！

我们就只有逃了。但是我们还能上山吗？

国 货 城

好多天前，车过横浜桥的时候，就看见那块荒旷的场子上搭了一个棚，这棚是用篾席子架的，有点象玩把戏或落势了的阔人办丧事之类。在平日，我是不注意这类东西的，但当车经过这棚子的门口时，忽然出了什么乱子，车停住了，我看见棚口上的一条已被雨溅得污黑的布片上写着"国货城"三个大字。啊啊！原来是有人在这里做买卖，不是玩把戏或办丧事。

"'国货城！'真幽默极了！"一位乘客说。

"哼！可惜里面有日货！"又一位答着。

"那就更幽默了。'国货城'本没有指明是中国外国啊！这地带东洋货的势力不是本来很大么？这城也许是东洋人'建筑'的。"

"那也太刻毒了。'城'总还是指中国人的。"

听了这段对话，我就想下车去访问这被暴风雨打着的那寂寞的城，但车早开过横浜桥，这事也就忘了。

不想，不知从什么人的口中，又提到国货城的一些话，使我复回忆到我对于这城的第一个印象，于是我决定去访问这城。

进得城来，我就接到一张《国货周报》的"国货城专号"，我确确实实明白这城的主权还是属于自己方面的，也就放下心了。我

的两眼尖锐的注射到棚子内陈列的货色上，我不愿在这里真的找出一件日货或嫌疑品来。结果，我除对于儿童玩具及两三处妇女日用品，我不知为了什么故意把眼睛闭煞不想过细看它外，其他的品名上都挂着中国厂家的招纸，是一点没有错的。

游遍一周后，我的两脚被“城”内的泥泞污集得不能行动起来。我只得坐在一家卖冷食的棚子内，来一瓶国货汽水，同时打开《国货周报》来读。

我又明白这城的创办人是“中华国货产销协进会”，参加的厂家有一三五家。它的目的是推进国货，“解决目前经济的畸形”。据说，城内的东西是比城外便宜的，这是一种展览的性质。

我在归途中，不知怎的总有一种哀感。我觉得城内太寂寞，国货展览就只这几个破碗，几对长统人造丝袜么？上海国货公司要关门，中国国货就只能缩到一个可怜的棚子中来叫卖么？这有点象市集的性质，是将历史拉回到二十年前的时代去了。中国大商店被外货占住了，中国国货就只有摆在草棚子内，且只是摆着，没有看见一个人走上去问价，在半个钟头内，只有我喝了一瓶汽水。

灾荒的年代性

一年一度的灾荒，去年闹了大旱，今年再来洪水，在这灾荒成了年代性的国度里，本来没有什么奇突。不过，人到底是人，见了连日报纸的记载。你真能无动于心么？

长江水位盛涨，沿江圩堤在震动，这已早就风传了。据说长江下游的水位竟超过二十年来的记录，其中受害最烈的是上游各地，汉口桥口沿河丹水池等地都在江水淹没之中，沙市传闻被淹没，樊城城墙竟遭灭顶，即长江下游皖、赣沿江各县镇街道，亦多已淹水，京市大小黄州已全覆没，沿途圩堤溃决已不计其数，人畜死伤那更无法统计了。

不仅长江沿岸如此，黄河、永定河亦同时大汛，平汉南段路轨已被淹没。洛、伊二水更因山洪暴发，溢岸横流，将整个偃师县城陆沉。全城民众尽付漂流，连县长大人都没有跑得急，也只得委屈的抱木随波逐流一次。

中国整个水道系统都在怒吼了。

这里我们不表"苦命的老百姓"的生命在今年如何的悲惨，他们的哭声如何的震动郊野，因为实践的悲惨凄绝恐怕更远超过几通赈灾会诸公的通电，几篇无用的文字了。我们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这年代性，是这可怕的一年一次的灾害。啊啊！去年苦过了，今年又来，明年呢？不是这灾祸永无休止的要降临吗？

这是天祸呢？还是人祸？

中国经济是建立在这大规模的水道系统上的，现在这一系统被破坏了，也就是说明中国经济到了万劫不复的时候。年来的灾祸的救济，都是等到了祸已成了才手忙脚乱一回的。中国的防汛机关，好象是开殡仪馆，要希望有人“寿终正寝”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似的，他们也以抢堤发粥为一种永生的新职业了。这是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水道系统好好的整理，使这自然的怒吼安然就道，我们还说得上“复兴农村”吗？

我们不怕有偶然的天灾，但最可怕的是这年代性，我们不怕自然对我们的残酷，但最可怕的是不去用人力制服自然。

我们还能让这年代性永远存在吗？

侨乐不乐

好久以前，就听说中央侨务委员会有救济失业归国侨胞从事垦殖的计划，据说这也就是“复兴农村”之意，但计划虽闻，下文是照例不大容易找到的。

然而，这回却有一个例外。侨务委员会的的确确在皖南宣城水阳镇附近设有一个侨乐村，领地在慈溪乡的，有七千七百余亩，在西团的，有三千余亩。共计万余亩，而到这极乐世界来的垦民仅六十一人。就领地与人口对比言，是不可谓不大的。这总算是侨委会对侨胞曾经对得起祖国，又对世界有贡献的一种相当的报酬吧！

然而，——又是一个然而，据报载，这极乐世界由某夫人的玉手揭幕以后方不过半月，就被慈溪乡的农民捣毁了。

原因是：那一万亩土地上面不是没有人的。其中“有数处已经乡民开辟，且植有棉花杂粮”，如果就劳力的酬偿说，这地带就算是熟地，也应该归那些乡民有了。以外，在侨乐村所在的山上，本来“树木森森”，这是谁的劳力所培植，已经是弄不明白了，但乡民拾木叶柴火而过活的人就不少。自从官厅把这些地方作为“官荒”，三角一亩卖出去后，于是上千的乡民的生路断绝，所以当这极乐世界开幕前，乡民就将山上的树木“一律伐尽，以示决绝”，后来大家饿得没法了，就“鸣锣聚众至数百人，负耜荷锄，

杀向侨乐村来，遇物即摧，遇人即殴”，于是这极乐世界，又变成了“官荒”，只博得《大晚报》记者发出“无限的感喟”，撰一篇“痛言”了。大概一切完事了罢，虽然侨委会还在那里“请兵”、“查办”、“严究乡民中的主使者”。

再下文是什么呢？我幻出两个人头，一片荒野，极乐世界只能是这般昙花一现而已。因为宣城没有土地的乡民正不知有多少，他们现在要求建造的是救死村，不是人间乐园，大概人间乐园的地基，在目下的中国还不存在吧！

侨胞们！故国已是如此，你们不用悲伤，你们要求生存，是不能不与国内最苦的同胞共生死的，你们混在乡民中去吧！不能依靠“当地军警的指挥刀的”。

新出版法与杂志年

近两年来一谈到中国出版界，大家都不免同声叹气，只拿图书方面说，因为书店受不住社会的萧条，内地的不静以及说话的不容易等等打击，已弄得无书可出。我们知道，现在几家略具资本的书店，也只能印点古书，或标点章回小说混混门面，其他小书店就连新文艺书都不敢出了，只能在一年内出一两本象胡蝶欧游什么的投机书在那里苟延它的残喘，否则就是关门大吉。

点缀这萧条的气象，象脂粉一般的涂在麻脸上的虚假的荣繁是杂志。书店老板，目下真是可怜，他不能不用这花花绿绿的东西去装饰门面，来获得那百分之十的微利。

于是，市场上贼出杂志年了。不错，什么图书都不能印出的辰光，而竟印出了七八百种定期杂志，这不能不显出是一种神奇。其实，这也没大了不起，这不过说明作家满肚子乌气无处发泄，大家饿着肚子来弄一点小玩意，书店就利用了这些牢骚虫可以少要或不要稿费，把它印出，藉以取得几个余利，去开销门市。于是，在文化市场上这虚假的荣繁就出现了。四马路各家书店，居然有一两家挤破了门，其他各家也不致“门可罗雀”的寂寞了。

这荣繁也是看着日趋衰老的。一方面是读者购买力可惊的减退，四五万万人的中国，要找两三万个读者的杂志已没有几个了。一方面是苦于说话的不容易，大家都不过在那里“今天天气哈哈哈”，也觉得乏味起来。

我们看见一个刊物出了一期或两期就寿终正寝了，但是可喜的还有新的又诞生出来，虽然这时代的产儿不免有短命鬼之嫌，到底比没有一个活人的世界要热闹。不过，目下又有人在那里喊节制生育，连这种短命的孩子也许就要在娘肚内归天，世界恐怕再要寂寞些吧！

这就是新出版法对于新闻杂志由“呈报主义变为核准主义”这一变法。依现行法，发行杂志，尽可一面先行出版，慢慢呈请登记。依新法则须先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在省为县市政府，在行政院直辖市为社会局）于十五日内核定准许之后方许发行，违者要罚两百块大洋。关于呈请登记手续也比旧法严格，对于社务组织，经费来源，收支预算及编辑发行计划，都要列入，我们不问现在县市政府的组织与人才是否能够胜任这审核的任务，即令胜任愉快，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今日发行杂志人有几个够资格。新出版法已于七月十二日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这真是这杂志年当头的一声霹雳。

我很赞成程中行先生在立法院讨论该法时说的话。他说：“过去如刑法、破产法等重要法规，为慎重起见都是先期公布征求意见，不只征求国人的意见，而且连外国人的意见都征集到了，出版法实行后，它的影响一定不小，何妨先规定一个时间，征集意见，再付讨论，免得将来走不通时再修改。”可惜这意见没见采纳，就三读通过了。

现在是只剩下办杂志的人的说话了，程委员是稍有远见的，我们要维持文化市场上这虚假的荣繁，似乎不能不起来争取生育自由，现在新出版法既然没有经过“征求意见”，那我们要求从缓公布。

永庆里惨剧

沪西小沙渡路大中华赛璐珞制造厂，于上月二十八日晚八时四十五分，原料货房，忽告火警，一时轰然巨声，火焰四射，把厂后永庆里一带贫民窟，一概遭了火洗，据报载火烧达四点钟，死伤居民达百余人，其惨剧可以说是空前了。

自从这惨剧发生后，这一带变成了悲惨世界，哭声震动了数里。一时陷于无家可归的难民数百人，即组织大中华被灾家属后援助会，提出这灾害的责任问题来，要求大中华主事者给与赔偿及抚恤，这是完全正当的。本来厂方对于这种容易引起火警的化学类的制造，在平日就该特别有防火的设备，厂房更应有高厚的封火墙的建筑，以防万一失慎，不致牵累别人。大中华早日忽视这一点，就工厂法而言，已经是要负刑责了。更何况所烧的是附近贫民窟，而这些贫民中有大半还是大中华的工人及其家属呢！不想，厂方竟一概置之不理，反一再利用警探武力的弹压，以图逃避一切责任。

被难人在无可如何时，只有要求法院主持公道，但被告当事者也抗不到案，致这一惨案一再延审，致死者沉冤不白，生者无法以善其后。不仅如此，厂方更狡猾的在这调解中，忽派人连续的将厂内物件搬移，想利用迁厂，以图不了了之，被难家属出而劝阻，竟饱受了一场殴打，我不知大中华竟凭了什么竟敢如此不

视法律，一味横暴至此！

我们看了昨日法官宣告延期退庭时，原告均不约而同，嚎啕大哭起来，死坐法庭内，抵死不肯离庭，那一片惨呼冤枉，凄绝的声浪，我觉得舆论和社会公正的人士再不能不出来说话了。

舆论应督促法院持公的制裁大中华以伤害人之罪，从优赔偿抚恤被难者家属，舆论更应督促立法者及与主持工厂调查者和执行劳动法的人，对于工厂安全的设备应该加以注意，不要使永庆里的惨剧再发生才好。

航空奖券宣传飞行

在"曹总统"的时代，我就看见北平的天空间常也有中国飞机在嗡嗡地发声了。自然，那时代似乎还没有航空部，成队的飞行是可以担保没有的。人民对于飞机的观念也与现在是两样，只觉得新奇可爱，并想不到它的实用。所谓航空救国、空防、商运和个人自备飞机这些观念，大概那时都不存在吧！

记得有一次，还是七月的时候，一个黄沙天气的日子，北平天空中嗡嗡有声，忽然翩翩的飞满着一片片的东西，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只是出奇，老太婆念起阿弥陀佛来，以为天老爷又在那里作什么怪了。后来那些一片片的东西渐渐落在街道上来了，是纸片，一个字也没有的纸片，是一种烧给死人作为流通券用的钱纸。据后来一再打听，才知道是有一个阔老太太出丧，曹三爷特为命令那一驾宝贝飞机去丢买路钱的。

这大概是中国飞机最早的和平的实用吧！

后来，奉直发生战争了，奉军飞机那时就成队的飞到北平来，一天要下三十几个炸弹，确实的杀人不少，这时人民对于飞机的观念就以为它只是同枪一样是杀人的东西，连老太婆也一听到嗡嗡之声，就要往地底层跑，也知道多念几句阿弥陀佛那也是没有用的。

到了空运开通以来，飞机可以带信、运物，也可以旅行，自然

人民对飞机的观念也要改变，有自备汽车的人，登时也觉得自己寒酸了，于是要来一驾自备飞机，第二等的阔人，也可以坐“公用”机旅行，穷人也可以偶然写一封航空信，以示不落人后，以快慰快慰自己的“灵魂”的。

不过，现在世界闹着空军的准备，实在容易把人吓成白痴，这些飞机好处，几乎令人忘了。就中国说吧！飞机的厉害上至通都大邑的老上海，下及穷乡僻壤的老农，哪一个不提到轰炸机而吐舌呢，因为大家都是吃过毒弹的苦头的。

但是中国航空公司这次宣传航空奖券的飞行，确是值得宣传的，因为它给人是欢笑的福音，不仅不是下弹，还是给人发财，这大概可以和缓人们紧张的情绪和饥饿的肚肠不小吧！据报载，“中国航空公司以奖券改章实行伊始，为协助宣传起见，特派飞机携带传单，飞往各埠，广为散发，本月廿九日，先在上海飞翔一周，再依次飞往南京、安庆、九江、汉口，三十一日飞往沙市、宜昌、万县、重庆、成都，八月一日飞往青岛、天津、北平，八月二日飞往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我想沿途万里洪涛上的灾民，亦当放出微笑也。

这使我记起了西洋人曾经夸耀过中国曾发明火药，但只把它作花爆用，不用来杀人，是真正的聪明。现在人家用飞机去攻击敌人、防御敌人，而我们只用它来丢买路钱，推销奖券，我想也是可以获得同样夸奖的，你还能否认中国高等人士不爱好和平吗？

不知群众对于航空奖券的购买，“益形踊跃”不？

急惊风遇着慢郎中

在一封“汉口通信”中，看到这样几句话：“这次湖北所受水灾的损害，决不是数字可以说明的，灾区五十县，伤亡十余万，灾民三百万，这些多不足以形容灾情的严重”，这里告诉了我们，这些数字都不大可靠，实际的灾情要大过这些。中国本是一个无统计的国家，缺乏数字观念的国民，人家问你府上多少人口，答案是七八个，五十县灾区的人口至少有二千万了，但灾民偏偏会只有三百万，至于伤亡人数呢？那真的只有天知道，所谓“十余万”已经是成了笼统无价值的数字了，那估计的标准是什么呢？大概也还是几个慈善家们的好心肠，希望只有这样几个不幸者吧！

固然，这位记者要外人多明白湖北的灾情的真相，除举出数字外，还声明“这些多不足以形容灾情的严重”，但是，我们退一步，就在这些数字中去设想这幕悲剧的图影时，你的身上能不立时起栗么？

三百万嗷嗷待哺的不幸者现在是如何的景况呢？“天门汉川一带，大部分灾民，还在屋顶、树顶、山顶哀哀求救。”但所谓“救灾”，据这位记者说：“真是令人气短。‘救灾应如救火’，但今年湖北的三百多万灾民，却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一批一批到灾区去的尽是些调查、视察、勘查的什么团，什么组。其实灾情

的严重，几次飞机的低飞视察，早已证明万分严重。”

再据所收的赈款说，只有许世英带来的三万元，胡文虎兄弟捐寄一万元，省府筹拨十万元，零星捐款，“二十日来所得总数不及千元”，这些数字却是确确实实的。但是这二十多万是否已煮成粥水送到树顶、屋顶、山顶上那些饿瘪了的饥腹中去了呢？那位记者又告诉了我们，“目下还没有发到灾区去”，大概这时还在“开会设法分配”，调查、视察、勘查尚未终结吧！

这里的数字又用得着打折扣了。就是等到这些助赈机关组织完善时，这些捐款变成粥水又是几分之几呢？

可惜暂时那位关心灾民的记者恐怕还无法探得那个数字，但是他已经一口道出了，“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下文还要说么？说出来是——是什么呀！不得救！

这自然不是湖北一个地方的悲剧。黄灾不是还在那里“方兴未艾”吗？全国老百姓已百分之六十患着急惊风了，天下的快郎中呢？

集团出家

福州通信："近年社会不安，闽省变态愈甚，一部分妇女，竞尚时髦，日趋堕落，一部分妇女厌世消极持斋奉佛，以求超脱苦海。故各处寺观庵堂，所谓带发修行之茶婆，日见增多，本市水部门外海潮寺，向住有茶婆三十余人，多属少妇，因持斋日久，信佛愈虔，乃决意削发为尼，于二十八日全体前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其他各处茶婆闻讯，认为盛举，相约同赴鼓山念经祝赞，此举为省垣空前所未有云。"

大概个人主义的时代真的快过去了吧！从别的国度里，我们常常流传着什么集团农场、集体研究，那是说，个别小农经济，个人独守寒窗，那时代是过去了。新的前进的时代是集团的前进，大家的共进，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他人的不幸，正是自己的发胖的条件，那不合理的时代是快要过去了。

这是向生长的方面发展。

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近来我们也常看见，自杀的是全家，饥饿的是全县、全省或全国，现在又看见三十余少妇全体削发为尼了。这自然也是一种集体的行动，不过其目的是消极的。

向着生的方面发展的集体行动，是因为个人主义已不适应当前大家的生存了，于是代以大家合力，共求生路，使人类生活向上。

向着消极方面的集体的行动，是个人不能生存了，联合许多不能生存的个人，共同去求自灭或“解脱”，于是有“全家服毒”、“跳楼”或“集团出家”。

这是向死灭的方面发展。

而这正是中国妇女当前一条陷阱。中国妇女一部分“竞尚时髦”，一部分“消极”，不仅福州如此，是整个中国的现象。竞尚时髦，绝不能解作是“爱美”或“享乐”那样简单，而是在那里集团的要求商品化，集体的在人肉市场上求着主顾。这不能以堕落二字去概括它，它的本身更有更严重的意义，一样是妇女的陷阱。

这是整个民族不能生存的辰光必然的现象。但是这种行动与意识是有害的，舆论不能不把它纠正。

主持妇运及关心妇女问题的人，应切实注意这些“小事”，是的，我们各个妇女都不能生存了，但不应手牵着手去做姑子，我们应手牵着手去求生存，参进男子队伍中去争取大家的生存，造成自已解放的条件。

我们要纠正消极的集团行动。

历史的教训

——纪念"九一八"四周年

"不堪回忆，不能忘记！"日历又翻到这一个日子了。虽然今日的中国人在"忍"字上做的工夫不小，一切火性似乎都被压得贴贴服服了，大家也确想抱着亲仁善邻，泱泱大国民的风度，不想过去的一切。不知怎的，对着这日历，总有些心跳、心怯，面颜上总不能不有些发热，遍身也不由你不起粟。是的，这一个日子对我们这些小百姓是太沉痛了，我们不能忘记它。

我为了要装出自己的镇静，也学了知堂先生一样从儒释道中去学习"忍"，不仅想"吃得三斗酽醋"，还愿意学那"被刑残而不恨"，"受割截而无瞋"。但是，一个人要作"宰相"，或是成仙，自己甘愿吃这苦头，这没有什么话说，如果要大家，一个民族都去这样做，那怎么可以！我想到这里，觉得儒释之言，也不能使我安静。何况《论语》中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明明的说这"忍"不是不附带条件的，要有"大谋"，这"忍"才有价值，否则，"忍"不是变为"奴才哲学"吗？而"九一八"到今日四周年了，我们的"大谋"在哪里？

我从儒释道中，得不到安慰我"心灵"的解说。

于是，我去翻着贴分类的报纸簿，想从这里，得到一点什么，使我心境和平下去。

我首先找到了七月十日的睦邻令，我读了三遍。

我又把《上海协定》、《塘沽协定》到最近冀察事件，中日经济文化援助、提携、开发等等消息，一片一片的新闻旧闻读了两遍三遍。

我重新闭煞双眼，去推敲这些消息以外的消息，言辞以内的意义，笑容内带着的森冷，糖果中所含的苦味。

我从这一本贴报簿中，得不到安慰我心灵的解说。

我烦躁，我更不安！

我不能无耻的去曲解历史，否定历史的事实。

我不能瞎眼的装作看不见这一历史的发展，新的正在演变中的“可怕的一切”。

“不堪回忆，不能忘记！”

要想忘记，除非我们把这一页历史从悲剧的场面，变成喜剧，“小忍”达到“大谋”，从“奴才”的地位，升到主子。

“不能忘记”，也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就是改变历史的武器，在沉痛中我们应沉着的展读这活的历史的演变，增强改变历史的动力！

自动减租

上海市第一特区减低房租委员会决定自本月二十五日起至月终止为减租运动周。“以一年来减租工作，虽有少数业主自动减租，而尚未达到统一减租的目的，为此举行减租运动周，促醒业主一致自动减租。”我们站在小市民的立场，对于这一种运动，自然双手赞成，但觉得“自动”有些是幻想，不见得能达到目的。

一年来“减租”、“减租”之声，并不是没有热闹过一时，但说一句实在话，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广泛的有组织的运动。这一大半是上了聪明业主所谓“自动”减低了一点的当，于是破坏了“统一减租目的”而形成的运动。我们亲自听见业主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房客减租委员会，我们可以从下月起减租百分之五，但是要将欠租先付清的，才有减。”在这欺骗下，许多只贪小利的房客退出运动了，接着连这运动的雏形也解体了。

同时，还有大地产主人兼大房业所有者，暗中派人参加减租运动，在这运动内来作破坏工作，使组织不能坚固。更因运动做得不普遍，减租叫得最响的是大店面及新造的房子，中下的房子，尤其是一般贫民居屋及工房等，都未组织减租分会，加入运动。这样一来，真正苦于房租的压迫，无力负担的贫民，既在运动之外，那末，运动内的人物就不得不是稍微“上流”的，业主对付这些“上流”人那颇容易，是“自动”的减低一点，使这运动解

体。

要不是不景气这样深入，空房子一天天加多，恐怕连减租二字的呼声也不会听到了吧！然而，现在跑遍上海，到处都是召租贴子，报纸上的广告也几乎要代替电影广告。学校商店付不起房租，因而关门、停业已到处发生。二房东受不住空房子的负担，只好白赔顶费，将房子送交大房东去，已成了普遍的现象。以前住后楼、阁楼的人，现在就在弄堂口内睡起“卫生觉”来。房租压迫的严重性，在今日确是上海中小市民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的，要减租，但不是再走希望“业主自动”的道路。各路各弄的房客应本当地段的房租及房客负担的能力，制出适当的租率来，由房客自动的实行新率的交租。

宣传周是需要的，如果减租不成，应一周又一周的继续宣传。要造成一个全上海房客的运动，用贫苦房客作为这一运动的基础。但不是假什么地方开一个会，发贴一篇宣言，请电影明星来一篇演说，唱一只歌，到会场去还要买门票，这样宣传可以奏效的。

“要减租”！但房客先要有健全的组织，不希望“业主自动”。

看救命去！

“天堂的人们！不要忘了浸在水中的灾民，他们正号呼着救命！”

天堂的人们听到了没有呢？

听到了吧！不然哪里会有人喊“看救命去”！哪里还有人去“看救命”呢！

不过，这是文字上这样说。事实上“看救命去”并不见得真的要你到灾区，去看那些浮肿的死尸，瘦死的枯骨，和那半生不死尚在抢粥水吃的悲惨的图画，以及那些吃的胖胖的慈善大家的油脸。你尽可以不离“天堂”，只看喜剧，而在文字上仍可以说是“看救命去！”这与店家用“关店大拍卖”、“亏折大变卖”的字眼，并不真的减低价码一样，白布上写的话，是话，但事实却又是事实。

“看救命去！”此地是解作玩新世界，不，现在是改为国货世界，又名水灾游艺会。这里看的是什么呢？名票会串，舞女大腿，名花清音，武士奇术。不！这里还在举行“花选”，大庆升平。丝竹歌声，不绝于耳。天堂的人们听见什么呢？你能在丝竹管弦中听到救命之声，舞女大腿上幻出灾民的枯骨吗？

这种闲话明明是不智的。我早说过，说是这样说，写是这样写，你不能太认真的。

然而，游艺会用这四个字来号召，虽然有点颜色不调和，在鼓励人为善，却也费尽苦心。要人家出五毛钱玩一晚，却大书“化洋五角救人一命，化洋一元救人二命”。这也是说话与事实的矛盾。是的，去“看救命去”的，应该是大发慈悲心肠的人们了，然而又不尽然，因为还得声明，“场内不另募捐”，好多去看救命的人，就是因为这一个声明，才放下跳动的心，含着雪茄，大摇大摆走进“世界”的。

“看救命去”既然看的不是救命，那么号称去救人命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在救人命，不是每一次筹赈后，许多大善士，不一朝就在大连青岛有了别墅了吗？

文字这东西就有这样的妙用，同时正也是文字的虚假。所以汉奸标榜“爱国”，侵略反日“提携”，天下是非，每被颠倒。“看救命去”不过是开一次文字上的玩笑，虽曰名实不符，却无大害。

拒用“她”字

偶而在《妇女共鸣》第四卷第八期上，我读到这样的一则启事：

“本刊对于女性第三身的代名词，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因为女性第三身用‘她’，男性第三身用‘他’，物件第三身用‘牠’，以‘人旁’、‘女旁’、‘牛旁’相比衬，男性是‘人’，女性是‘女’，物件是‘牛’，岂非是含着点女性非‘人’的意思吗？这个问题在‘五四’运动后，‘她’字初被新文学派创出来时，颇引起舆界的争执，到现在大概只有《申报》的‘自由谈’和‘春秋’还偶而沿用伊字。本刊于十八年春出版以来，即沿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尚祈投稿诸君，注意及之。”

对不起得很，我把这一则新闻照样录出，却不是“共鸣”，自然更不是替该刊登义务广告，怕投稿该刊的人再写上“她”字，我却在这“小事”上，要挑拨一下，恐怕正是所谓“异鸣”吧！但我要声明的，我却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女性，或不同情女性争取人的地位而来同女性对立。

我觉得今日进步的女性，不应该再这样短视了。在一个字眼上去争取一个“人”旁的地位是太浅薄得可笑的。“他”“她”“牠”三个字，代表性的分别，确是在“五四”以后才发生的现象，在当时，它带着一种进步性；虽然它的意义是微弱的，可是它总

是中国文字在文法上更进一步接近严密。至于"人旁"、"女旁"，原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意思。

是的，"伊"字在文言中本是一个第三身女性代名词，在口语中，却不是普遍通用的，在一般说话上不管是"男""女""物"，只要是第三称，总是发出"他"音，现在在形的方面略为加一点区别，造出一个新字，不是比用"伊"字更切合口头么？

中国四方块字本身带有封建性，我们是承认的。"她"字的造出，我们虽不感觉有辱女性，却不以这种变形为满足，现在中国文字在要求拉丁化的声浪中，我们希望的是将文字一切封建性除去，譬如"奸""妒""奴""嫖""婪"这类真正有辱女性的字眼，如果完全拉丁化了，那时，只有音，没有形，那才是根本字上求得男女的平等。所以进步的女性，即令要玩这一套小玩意，那就应该起来拥护中国文写法拉丁化不可，不是在形的方面求一个"人旁"就认为增高了自己的地位，可说这种要求不仅是幼稚可笑，并且是站在文字进化反动的场合呢！

这是退一步的说法。

真正进步的女性，代表新女性的言论，应该把女人是"人"的奋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与中国民族解放不可分开的问题，与男子共同去争取，不是这样有闲的去玩弄一个名词，白费精力，分散抗争的力量。

一天的日记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晴。早起，气氛有些不好。因为恐怕别人碰见，要说自己"忍的哲学"还不到家，于是决定一天足不出门，但是整天老坐在家里干什么呢？这却不能不是一个难题了。

于是又想到中国并不真的如十教授所言，中国除了"孤家"，或咱们十个人以外就没有中国人了，在咱以外既然还有无数的同胞，他们今日又是怎样过的呢？要把全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去查考一遍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一部分，那最出风头的一部分，却并不见得不可能。那就是读报。于是就决定整天读报，并且预备一面读一面做点拔萃，拔出来有什么用？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譬如看第四个"九一八"国人的照相吧！

《申报》第一版整幅华章毛绒纺织公司标准国产呢绒的广告：大廉价三十天。用红色套版印出，美丽鲜艳。"时评"是劝国际联盟自觉，"自由谈"在谈"多和少"，"谈言"则言"天气的转变"，均与"九一八"无关，不算拔萃。

《新闻报》："第一个周年给我们的是愤，第二个周年是恨，第三个周年是忍，第四个……"他没有说出。——见本埠附刊：《忍的四周年》

《中华日报》：×××（无萃）

《时报》：×××

《时事新报》："以集团意识武装全民族之思想。"——见评坛：《国人如何自救》

《民报》：×××

《晨报》："欲弭外患，惟有永息内争。"——见评论：《悲惨之教训》

《大晚报》："前进的民族，需要前进的意识。"——见《民族心理的振拔》

"不为奴隶，要作主人！"——见"火炬"《今天的感想》

"塞外严冬战未停，松花江畔血风腥，枕戈壮士犹饥馁，绝塞孤军事死生，满地白霜堆白骨，弥天流弹似流星，请君侧目长城外，细听敌机轰轰声。"塞外漂泊生作。——见"火炬"《四个年头》

《大美晚报》："准于九月廿三日出'九一八'的纪念言论与仪节的汇集专页。"——见"夜夜谈"启事

《世界晨报》："我们不能永远在沉默中度我们的生活。"——见"瞭望台"《伟大的沉默》

"要认识现在的中国占了什么地位，不是屈辱，不是顺从，要寻我们中国应走的道路。"——见致读者第三十九封信：《永远不要忘记的日子》

《时代日报》：《河山破碎四周年了》，"破碎"不成篇，"评论"是一张白纸。

《中央日报》：×××

我家内的中国报纸就只这些份，但是这也代表第四周年中

国报纸的大部分了。

再来看这几天印出的杂志吧。

新创刊的《宇宙风》第一篇是《孤崖的梅花》，《论语》在"论报手"，《申报月刊》虽感觉九月苦闷，想发一点"感慨"，但据说"纪念九月的话我们于过去三年中的九月号本刊(《申报月刊》)里已经说得很多，而现实却和希望日趋日远"，"目前却无从再作进一步的说法。"《新中华》提出："'九一八'的第四周年，又比'九一八'时代更不知严重若干倍"，又说："假使从前的敌人的铁骑是蹂躏边地，现在却老老实实的控制中原了。"他们反对"某种博士放弃东北，某名学者放弃华北、长江，大家准备到堪察加(指云贵)去"，他们还指出真理只有一个，"在民族生死关头，除了有血性的中国人一致反对积极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外，决无第二条路可走"。《读书生活》告诉了什么是"九一八"的历史的教训。

这一点就是"九一八"第四周年中国的舆论的点缀吧！

但是在"友邦"的报纸呢，他们自然热闹的多，他们在那里庆祝满洲事变纪念日，夸耀"王道乐土"下的日满官民的努力建树，满洲国的独立，事实的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等，同时他们在宣传满洲国新京纪念的盛典。这刚刚与中国方面今年的纪念连仪式都是简单的成了一个对照。北平连官的集会都被禁止了，上海南京方面据说也只有要人行了一个礼，以外除各电台停止播送娱乐一天外，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据说都在表示"埋头苦干"，并未停止工作。

介绍白朗女士

一个月以前，报纸上就喧嚷林公子在美“遇艳”了。这种“艳讯”虽然颇替中国男子争光不少，但到底不过是“偷香”的鸟事，在正经场面上，是谈不上口的。何况这类英雄在中国又多而又多呢！

真正值得介绍国人的，到是这位白朗女士，女士与林公子相遇，欢爱，结婚都平常得很，这是她一个人平凡的私事，也不值得一说，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她一闻“使君有妇”，就决心同他离婚，一点也不犹疑。这就颇不平凡了。

我们在林公子重婚的喧嚷中，就听到林公子在家内还有两位尊夫人，即银岩、少华两女士，又听见这两位女士对于她们的丈夫的重婚的意见是一面替丈夫辩护，说“我们相信那是谣传，与美女结婚决不是事实”，一面说“一切均让父亲作主，我们没有意见”。把这和白朗女士对照起来，美、中女儿的思想、行为，竟有这样区别，这不能不使我们注意。

是的，银岩、少华两女士的行为是会使白朗女士惊异的。林京再娶少华，银岩不提出离婚，少华明知林京是自己的姊丈而竟把自己嫁给他，都要使白朗不解吧！不仅如此，这次丈夫明明又把自己丢弃另有所欢，而两人竟那般温顺，还要替这位丈夫一再否认，否认不了，还把一切自己的事交给父亲作主，反装作与己

无大关系似的。

这一个对照不是对中国女儿一大讥刺吗？

是的，但同时也给了中国女性一大教训。银岩、少华两女士明明自己放弃了独立人格，她们不过是时代的一个落伍者，男性玩弄的肉偶罢了，新的女性，要想不做林公子之类的英雄的俘虏，第一自己要觉得自己是人，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第二，对于婚姻观念还要解放一步，不要因"木已成舟"，就"将错就错"，以长那些"英雄"的气焰。要学这位异国女郎，尊重自己独立的人格，勇于反抗的精神，固然要消灭这些男性的英雄，须得消灭这些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基础，不过，新的女性在答复这些英雄的行径时，白朗女士至少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回答了。

我极盼望中国的女性认识这位白色的姊妹。

同情和谅解

同情和谅解在人与人相互关系间，似乎是无可非难的嘉行。我们对于弱者，受压迫者，遭灾难者应该同情，对于没有坏的动机的过错，也应该加以谅解，人同人在今日虽然被利害分割的太明显，绝对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但在人情上，却总不必不论大小事件，都出以红脸对白脸，弄得人情冷到冰点以下去。

但，同时，同情和谅解是不能强求的。

在主人鞭笞的皮鞭下，奴隶虽呻吟低泣，欲博主人同情，陪笑辩解，希求主人谅解，但主人并不会因为这些奴颜奴泪而减轻鞭笞的万一。因为在主人看来，奴才的皮肉原是天生成给主子解闷的。这里没有人情可言，只有力的支配与隶属，这里没有同情和谅解。

同情和谅解，只能在平等的人们间是存在的。在不平等的人们间，如果强者寄与弱者以同情那同情是施与，弱者是不应希望强者的给与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妄想，这种希望和行径素来为人所不齿，因这种在皮鞭下求同情的行为是自己失了自尊和自重，完全是奴才没骨头的献丑。

在这里，逻辑的只允许有反抗，以眼还眼的反抗，不能再有和平的方法。

个人与个人间是如此，一个强国与一个弱国间，也没有两

样。

读最近中央社的辟谣电讯后，也使我们感觉我们政府对“友邦”所求的同情和谅解的为难了。照中央社说，政府对于“友邦”却真的尽了友邦之道。“友邦”心里高兴的事，无不体会入微，忠谨奉行，友邦不悦的事，生恐惹起疑念，多多顾忌。但是“友邦”仍不能谅解，不具同情，谣言仍一天一天多，形势更一天一天恶。这真不能不令人叫苦了。

但是，中央社仍本善邻之意，虽曰辟谣，实在仍不过是继续的在求人之同情和谅解，这辟谣会生出如何的后果呢？

那只有天晓得，说不定还是谣言继续增长，因为在皮鞭下，主人不会听见你的低泣、轻诉。中国今日连同别人讲同情和谅解的资格都没有了。你要自己能站得住，象一个国家时，人家才会重视你。在皮鞭下，我们也只有先夺得鞭子，解开束缚，给鞭笞者以鞭笞，那时我们才真的能获得举世的同情，这不是幻想，阿比西尼亚不就是一个先例么！

倔强的人不受人同情，更不求人谅解，一个独立的国家至低限度也应做到如此。

流亡图

由车站向四周一看，济宁可说是整个的浸在汪洋大水里了。不错，我们还看见树梢、屋顶，但屋顶旁边却可以航行丈长的大船。用这银色亮亮的作背影，栖在站台上，栖在铁轨旁、田塍上，郊池坟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任你向哪处走，地上都免不了肮脏的屎渍。在那上面，就铺着草卷、席头、破被，蜷伏着无精打采的人们，饥饿夺去了他们奕奕的目光，也夺去了他们生存的活力。大头瘦脸的婴儿，抓着松软无乳的奶头，非等绿豆蝇叮得太厉害才哭叫一声。苍老妇人扶着拐杖，阖目想念着他几代创建的家园，八十岁的老翁，仰头只是"天哪天哪"的叹息。

又一批"家亡人散"的流民挤上台了。

"车啥时候来呀！"一阵阵嘈杂无力的声音。

"你们可不准把我们卖给洋人呀！"

"……"

这是《大公报》特派水灾视察记者在济宁车站旁边的速写的一段。自然，它只是鲁西流民画图中的一小小画图，在整个今年的水灾中，恐怕只能算是极平凡的一点一线吧！由这点线构成的画面恐怕还是属于较为幸运的一面吧！这一小小画面，我们知道，它与事实还相差很远，但它给我们的印象的深刻，不由得

不令你栗然了。

啊啊！最令人难忘的是“你们可不准把我们卖给洋人呀”的呼声。人到饥饿死亡的瞬间了，尚还顾到自己被人出卖，还记得世间上有出卖自己的另种人存在。这是多么悲惨、可怕的言词啊！我忿怒了，我忿怒这世间有受难的人，以外还有出卖受难的人。

由这一画图使我沉入了另一幻境。我好象看见另一幅巨大的流民图，它的背影不是银色亮亮的水面，而是熊熊的战火。它的范围，不是车站的一角而是全部秋海棠叶的中国，流亡的群不是二十五万的鲁人，而是全中国民族。但我同时听到有人在呻吟，“你们可不准把我们卖给洋人呀！”

啊啊！依然，这里有受难的人，也有出卖受难的人。我一样忿怒了。

这是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民族的命运的预感。虽然这预感不完全是偶然的幻想，但我希望不要这样悲惨才好。我们不怕战争的残酷，我们怕的是自己站在战斗以外，只是流亡，只是怕人出卖自己，同时还让出卖自己的人存在，自己连制服出卖自己的人的气力都没有了。

沉默新义解

“沉默”以代“欢欣”，是沉默的一种新解释，在旧解中，沉默总是用以代悲痛、恐怖之类的。五月在中国叫做“多难之月”，照例并无多大麻烦，不过是在沉默中度过。“九一八”、“一二八”为了睦邻也只得用沉默以代悲痛，人死了，沉默三分钟，在大恐怖中，沉默以代忿怒，藉沉默以保其身。这是代表一种恐惧，都不含有欢欣之义。

沉默以代欢欣，是从今年双十节才发生的新义。国庆本来是应该欢欣的，但今年却在沉默中度过，用沉默去代替欢欣。这是怎样说的呢？自然因为今年还有国难在，好比儿子居丧，虽有喜事，哪里还可以铺扬快活呢？所以各地都只简单的举行纪念，国府也不招待外宾，那几十块彩玉勋章也是悄悄的分赠“友邦人士”的。

这里的沉默，明明藏着欢欣在，它不过是为了某种关系，把快活隐藏在心，不敢发露在外，比起代表悲痛的沉默，真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完全不同。这大概与新嫁娘，因为娇羞而沉默不言一样，是用它隐藏快乐的。

沉默既有两种解释，那末，我们对于喜欢沉默的人倒不容易判别他的悲喜了。

你以为他在悲哀什么？也许他正在藏着一肚子的笑料，只

是不便笑出就是了。你以为他在欢欣吗？那你无证据，他是沉默无声。主人出卖奴隶，在进行出卖契约上，主人的面孔上是可以现出一层沉默的表情的。作奴隶的人，就不容易认识这一种脸色是在惜别而有所恋恋呢？还是在高兴卖得一笔大身价呢？

然而此中妙用甚多，都非奴才所能领悟，这就正是，主人所要求的治人哲学，如果翻成大众语，大概就是所谓“官话”吧！官话深奥难解之处甚多，不独“沉默”两字具有新旧二义，所以也不必大惊小怪。

但在披阅报纸时，没有经验的读者，却不能忽视这种奥妙，因作沉默新义解。

摸·射·摔跤

孩子们没有看见过打拳，就称太极拳叫做“摸”，这是因为太极拳的打法，有些象空中摸索什么似的，这个“摸”字，到也下的切当，比什么“太极”这类玄奥的字却大众得多，也易于了解了。

据说这“摸”在六全运中，与射箭、摔跤成了最重要的三个节目，是完全国粹的拿手好戏，已博得国际的令誉了(?)。全运开幕那一天，据说，——又是据说，最精彩的节目是三千小学生“摸”，我闭着双眼一想，那确是洋洋大观。这一种运动，确代表了一种人的生活态，在黑漆一团中，运动是只能取“摸”或爬的，至于说在光明下同人决斗，我总觉得那……是有些难受的。然而它却博得万人喝彩了。

射箭是近年来重新提倡的一种武艺，孩子们以前除开在连环画图上看见一些画相外，完全是生疏的，这次也饱了眼福了。并且在大会中，还出现有“头束发髻”，“淡装俭服”，打扮得“好不英雄气概”的马氏姊妹，“双目怒瞋，雄视眈眈”，一矢飞出百余公尺。你真疑心十三妹重生出世。这怎得不使孩子们高兴，生出看不起枪炮的心理呢！

摔跤这是每一个孩子熟习的，他们间在吵嘴时，轻容易不懂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不能“为了战术关系”一时躲避，他们总是爽直的“以眼报眼”，因为除了双手，既无武器，那战术自然

就是摔跤了。但这次大会摔跤的角色，可不是孩子，而是身穿盔甲，足着长统皮靴，头上戴着结子的瓜皮帽儿的戈壁的骑士，据说还是成吉斯汗的后裔。摔法是开首来一套"古代原始的舞蹈"，然后跨开八字脚，两手伸开，看着颈脖，相互弯腰作礼：然后你揪住我，我搂住你，一个扑来，一个扑去，摔到数十回合，到一个倒地为止，于是"据说"看台上就轰起一阵痛快的掌声。影片公司马上摄成了有声影片，这节目也就被人认为是最精彩的，因为它与"摸"一样，用不着武器，又比"摸"好象战斗，勇武多姿……

孩子们在看完运动会归来，什么都忘了，但不会忘记的是这"摸"、射箭与摔跤，并且他们就避着大人在庭前自己练习了。

在这样扰嚷的世界中，人家的孩子摹仿成人玩的是用积木堆小型飞机、战舰与坦克，而中国孩子在偷着"摸"，那不是偶然的。

这种武艺的提倡是中国某一部分人爱好和平的心理表现呢，还是在对事实绝望之余，求一种阿Q式的精神安慰呢？然而，可怜的是我们的孩子们！

孩子的愚问

——《××园地》停刊的舆论

孩子：今晚为什么不写文章了。我不吵你，你写吧！

妈：　不写了。妈投稿的《××园地》停刊了。

孩子：停刊了！妈！为什么停刊了？

妈：　孩子，妈也不知道，就连你见过的×姨，她也不知道呢！

孩子：啊啊！难怪昨天×姨来，她还要妈写稿子。

妈：　乖乖是的。要是×姨先知道了，一定不会昨天还跑到各处要稿子，并且她一定要在报上登一篇告别读者的文章呢！

孩子：啊啊！这真怪事，《××园地》停刊难道是《×报》要停的？《×报》那样多的张数，为什么要吝惜这一小块篇幅？《×报》那样的阔气，为什么还吝惜花这几个钱呢？

妈：　孩子，妈不知道。

孩子：我不信妈不知道，一定是妈以为我是孩子，不说给你的宝宝听。

妈：　不！孩子！你不要问它！

孩子：《××园地》就不办了吗？人家不要我们办，我们就不办了吗？妈！这真好象叔叔租田种一样，人家不要他种，他就只有当兵去，他找不到田种了。

妈：你真是个聪明孩子。你的话说得顶好，中国妇女现在本是没有“园地”的，是在替人家种花园呢！

孩子：啊啊！妈！我懂得了，《××园地》停刊是不是种花种得不好呢！

妈：这妈也不知道。

孩子：啊啊！妈！我又记起了，叔父被主人辞退是因为他的主人要种鸦片，不种稻了。也许《××园地》停刊，是主人不要种×姨花了。你说我猜得对不对。

妈：妈也不知道。

孩子：怎么都不知道？好妈妈！你一定是在伤心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租园种，不自己开辟自己的“园地”呢？

妈：哈哈！好孩子！妈这一辈子的人并没有忘记要开辟自己的“园地”，但是这工程交关大呢！你快快长大吧！你是一个好女孩子，开辟“园地”的责任也在你这一辈子的人身上呢！

孩子：妈！你现在不要难过，我将来一定长得同你一样能干，我这一辈子的人长大了，一定有自己的园地耕种了，我们是不再会做佃农的。你说好不好！

妈：好孩子！我不难过，你快快长大吧！（流泪）

孩子：（哭）妈不要难过，我知道妈难过，象叔叔失了租地一样难过。妈！我们以后不要再订《×报》了。父亲也说《××谈》也停刊了，以后的《×报》还有什么可看呢！

妈：不要说孩子话。你还是好好预备明天的功课呀！

民　变

"民变"在中国历史上是表示统治的一种反常，大的民变每每就是换朝换帝，小的也有闹掉几个地方官的脑袋的。过去的统治者，对于民变从未忽视过。就是以"帮闲"吃饭的士大夫，在人民"疯狂"的起来"作乱"时，虽然一面主张用刀去削平，但同时也就特别看得起人民来，说这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似乎这些乱民也是应该原谅的。照例乱事平定时，除开杀掉几个为首的"暴头"外，以下的附从的人是不追咎的，照例也减低一点田赋，办一两个污吏。这就是所谓怀柔政策。

实际说来，中国历史也几乎可说是这些"民变"的连续史。农民在中国这些民变中，都占着重要的角色，但都被"英雄"、"好汉"所利用了，民变成功之后，自己并没有解放，只是从一个旧主人让渡到另一新主人手里，颈项上的锁链，依然如故。这也大概说明了农民这一阶级层缺乏独立负起改造历史的领导的任务的性质。

但是，农民在所谓"民变"中所演的角色，仍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它仍是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不同的历史阶级，这一阶层受着比它前进的阶层的引领，他们同盟起来，在历史上也就发生过决定的作用，这有俄国革命为证，俄国革命中工农二个社会层所演出的拿手好戏是挺值得

称赞的。

在今日的中国，民变的事，也还是迭出。农民在这些“变”中，也还是主要的角色。同时，虽然在这大多数的人口中，已有前进的分子了，可是原始的朴素的行动也一样可以看见，这不足怪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譬如近来迭出的华北农民“暴动”，及最近香河民变，都是反赋税苛征为口号，但抗争的目标却常常不明白，甚至被土豪、汉奸、侵略者所利用，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将事变的关系弄得更复杂，使我们哭笑不得。

但是，我们不能把华北这些“民变”，都看做是汉奸的运动，其中已有的是为不堪某方统治者苛税压迫而激起的，运动的形态虽仍是朴素的，但它的性质已明确的带着反帝的民族斗争。华北农民近年特别多事，也明显的是直接间接受了某方侵略的反映。

应付这些民变的方法，似乎不能是用刀了，也自然不能是所谓怀柔政策，今日唯一适当的方策，只有引导这一部分怒民作民族生存的殊死战，对侵略者及家内汉奸肉搏。那末，农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又可演出一手拿手好戏了。

行动中才能有团结

在意阿争议未发生前，一般人几乎不知道地球上有一国阿比西尼亚国家的存在。

在意阿战争未发动以前，我们也几乎不知道有一个阿比西尼亚这样英勇的民族的存在。

我们是在这次他们反抗侵略的战争中，认识了东非这一个黑兄弟的民族及这一可敬的国度。

同时这一个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又使我们得了一些新的觉悟，新的自信，认识了民族阵线的组成是在行动中，动员令下，全国民众自然共同走到一条路上来了，此时没有私仇，没有旧怨，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全国人铸成了一道钢铁的长城了。这不是因为阿比西尼亚的国民，先讲了若干年组织，受了多少年训练，才“精神团结”起来的；更不是阿比西尼亚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程度高过哪一个国家；更不是他们的国家内没有矛盾，社会没有阶级。

不！完全不是！他们全国的团结是在这一伟大的战争上，这一神圣的战争，统一了他们的矛盾，因为他们当前个人的利害比起民族的来是微小多了。争取民族生存是目前大家共同的任务，所以，他们能结成钢铁般的民族阵线。

这一点不足怪。在这大的斗争未发生前这团结的力量是看

不到的。在这大的斗争未发生前，一切社会的国家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动员令下，一切都沉潜下去了。

反之，在撤兵令下，不抵抗令下，我们看见的是：社会国家的矛盾加激，民族力量的瓦解，“精诚团结”变为空洞无实质的口号，民族意识的消沉枯萎，民族自信力的减退，汉奸的蜂起，民族耻辱增长。这一切我们亲眼从我们这方面看见了。

中国民族不能统一吗？

不！但不能统一在空头辞句中。现在千千万万的矛盾是由这不抵抗令而来，要统一这些矛盾，也除非有一个统一的行动不可。

这一切矛盾在动员令以前是无法消除的，不是先消灭了矛盾，才开始斗争，是用斗争消灭矛盾。

中国民族的团结力也将在动员令后才能表现出来，中国民族及国家也只有蜂起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才能够给世界认识，一切民族的耻辱、汉奸的行动，也只有在决斗中才能消灭。

现在等候的是动员令了。

枪声响了，所谓“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就将熔成钢铁的民族阵线。

算旧账加新股

梁实秋教授的爱自由似乎是早已闻名的了。不过，在过去总有许多人要怀疑梁教授还有什么事不自由：要这样不怕麻烦的呼唤呢？据梁教授说，他是为了国人争自由，不是自己个人的自由不自由。如果这话是真的，那我们倒不能看轻梁教授的言论了。

据云"五全大会"又是争自由的最好的时机了。感谢许多自由论者，我们可以有许多文章可读。梁教授的自由的文章，自然是其中挺括括的。

梁教授说："今后政府对于人民之言论思想是否将给以真正之自由？""今后政府是否将予人民以真正之结社自由？"

动听极了。

不过！且慢一会儿。

梁教授将以怎样的手段获得这种"真正的"自由呢？似乎还要查查。

他说，他不爱说空话。他主张对今日的政府"算旧账"，好象商店"逢年逢节"清理盈亏似的算一遍，亏了就应该整理店的内部，"加添新股"。对于店内旧管事的人呢？他却"没有闲情逸致再对任何人斤斤计较"，他要责任者自己去"受良心上的谴责"，"反省"。这一点又与商店"算旧账"不同。商店中，亏了，管事的是

要负重大的责任的，并且也是个人的进退问题。梁教授比较要宽些，到底因为他是一个文学家吧！

那也未免太书生气。梁教授注意的是在“加添新股”啊！“算旧账”不过是吓吓旧管事罢了，“加股”就是梁教授的真心话，具体的条件。

因此，梁教授多年的不自由，要自由，为的什么，也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了，——梁教授原来也想当老板。

我们这些“阿斗”呢？（这是梁教授说的）自然没“加股”作“新股东”的资格的，这一家“中华公司”，自然分得股东以外的人还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

这就是梁教授的自由论。

至于我们这些“阿斗”呢？是的，自由是要的，并且知道这要自己去争取，如果也把国事比作开店，那末，我们不主张个人买得新股票。我们主张改个人们的私营为合作社，我们不反对“算旧账”，我们却不主张敷衍任何人，更不拿这个作恐吓的手段，达到个人作股东的目的。

捉与逃

在前年，我们就听见东北的朋友说，东北的青年，稍微进步一点的，不是被日本人捉去了，就是逃出了东北，要想不逃，不被捉，除开甘心作奴才外，是不可能的。语气中含有浓厚的亡国恨。大家当时听过也就只有默然了。

不想，这现象现在也发展到平津来。近一月来，传闻平津的学生、旅客、居民被日本宪兵、警察逮捕的就有多起，不过因为这些人是小百姓，外间虽知道有这回事，但被捕的到底若干人，姓甚名谁，报上是从不批露的，一般人也把它作为偶然发生的事件看，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恐怖。一直等到逮捕到商会委员年光尧、新闻检查员王一凡等五人及社会局主任李铭、前豫督署军需处长李锡庆等这类大人先生时，报纸上再不能不登出姓名来，于是这传闻一被证实，华北现在的局势严重到了如何程度，也就立刻可以想象得到。

平津现在也有许多人在逃了。

不过，这里被逮捕的人与出逃的人，到不一定都是进步的青年，其中也带着几个官吏、商人，尤其在出逃的方面，大概也还是稍微有钱的人占着多数。

同样，上海这几日来，因了日本水兵的无头公案，一时“谣言”蜂起，闸北虹口一带的居民也饱受了日本宪兵的搜索、侵扰，

那一带的住民也纷纷地往租界“逃”了。

这一切日本的暴行，中国报纸上现在虽然也认为“非法”了，外部也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这种“擅捕我官民”是不合理的。但报纸上对于“逃”的斥责明明比“捉”看得更严重。他们认为这是“自相惊扰”，是“怯懦”，是“不爱国”，是“轻信谣言，无知之尤”，却看不见我那位东北朋友谈到“逃”时那一股悲愤之情。

这大概是非常“爱国”的舆论吧！敌人的来侵，本来只听见有官军的撤逃，哪里有老百姓出逃的理呢？

我们并不主张“逃”，小百姓在事实上也无处“逃”，闸北虹口逃入租界的人，也大半是中产阶级，就连东北逃入关来的人也算在内吧！那也是稍微有几个钱的。东北劳苦的老百姓，进步的被杀了，或者走入了义勇军去，他们在为民族生存决斗。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更不忍骂出“逃”的人。我们不能让他们等死。谁造成人民出逃的条件呢？为什么不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呢？这是谁人的责任呀！

真的舆论，不应专责人民畏死，应指示人民如何图生。我们不要逃，但同时要起来消灭人家的“捉”与“轰炸”，不然，我们要政府做什么？

暗 杀

暗杀虽然比起决斗来有点不大光明，但如果杀的是恶人，也常常能取得人的同情的。在专制时代，人民受的压迫过深，人民在万分忿怒中，也常走入暗杀权贵的一途，杀人者不独不使人觉得可怕，反以英雄相待了。荆轲的故事能够流传得这样久，不是没有缘故的。写十九世纪俄国的虚无党暗杀沙皇时代权贵的戏曲、小说，也就特别流传得远。辛亥革命中，民间最喜谈的是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徐锡麟刺杀恩铭、熊成基谋刺戴泽、温才生枪毙孚琦这些人，一时说成神话了。

其实，暗杀几个坏人并不就是革命，革命是不能靠暗杀成功的。暗杀不过是表示最大压力下，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的反抗。

俄国革命的成功是成功于另一道路的，俄国虚无党远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前就消灭了。

但暗杀的事，仍然在今日还是流行的。由于个人的恩怨而相杀，那几乎是属于个人的私事，不说它。就有政治意义的说，暗杀却是今日的一种政治的阴谋。

它所表现的意义是什么呢？

暗杀绝不是表示自己的权力，暗杀的计划者，不论有权无权，他都是属于没落和走入绝境的一种社会层，至少也表示自己的权力的脆弱。否则，政治的斗争是可以在公开场面进行的，

成功和失败则决定于群众的拥护或摈弃，却绝不会阴谋危害个人的生命为满足。

这不是姑息恶人，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是根诛恶人存在的基础，杀了一个恶人，还有第二第三个出来，根诛了，就没有恶人继续出生了。

所以革命注意的是在制度的改变。

但一个已没落的社会层，在它完全绝望时，每出以痛快的一击，如苏联反革命党之暗杀基洛夫，就是一个好例子。同时在权力者取这种手段去谋杀他的政敌，也还是说明了他的权力之脆弱。

这里却要注意，在被杀者如果是一个好人，如去岁史量才先生之被杀，大家很同情死者，这种意义很容易被人了解，觉得谋杀者出以这种卑劣手段，无异暴露了自己是处于何等绝望的境地，竟不能采公开的斗争了。但是，如果被杀者本是一个坏人呢，大家因为称快一时，这一意义就被矇蔽，转而同情这一暗杀，由是，这一不光明的阴谋，反被人看做是诛奸唯一的正道，很容易把人引入歪路上去。

自然，杀去了一个恶人，也仍是对于恶的方面一个打击，恶人在某制度下，他是可以发挥个人的力量的，杀了他，也许可以减杀一点恶的为害，所以同情这一暗杀者似乎也不无理由，不过，那总是过于肤面的看法，不足取法的。因为真正恶的憎恶者不要忘了比杀一个恶人更重大的使命。

集团主义

工厂经理对工人说："你们中哪一位有困难可以同我说，我可以帮助你们，但你们联合起来要求什么是不可以的。"大房东对房客说："减租，我本来是要减的，我不认识什么减租委员会，你们哪一位觉得房租贵了，来同我商量就是。"他们同一样不承认多数，不承认集团，只认识个人。

资本主义各国要反苏联，向苏联挑战，也无非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古怪，什么都是讲集体，不讲个人主义，弄得连我们中国的名教授们如胡适者流，也说这制度有妨害人们的个性的发展，也跟人家屁股后面喊打倒。

但是，一旦世界战事要爆发了，工厂经理就另换了一副面孔，向工人说："现在是国民总动员的时候了。凡未被征发到前线去的国民，都有集体劳动服务的义务。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切都要是集体的，你们的国家需要你们集体的力量去发挥它的光荣，这集团生活先要有集团意识。所以，今后你们就不准有个人主义的要求提出了。那不是集团主义时代所许可的。"

同时，资本主义的学者辱骂苏联时，也再不采用集团主义做例子了。

集团主义好象也很合这些老板和学者们的胃口似的。

糊涂的只是在工人方面。

譬如在埃及造金字塔时所用的奴隶劳动与中国修长城时代的“徭役”，自然人数是众多的，也可以说是“集体劳动”吧！这与今日中国所提倡的“国民劳动服务”所拟议的利用灾民“造林筑堤”、“平除废城”等而名曰集体劳动，是否有什么区别呢？这只有天晓得。

集体主义果然就是这样的涵义么？

决不是的。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是市侩们的一种诡辩的说法。真正的集团主义，那集团的行动是与集团中各个人的意志相一致的，不是只取了集体的形式，以供个人主义的利用，集团的行动反与集体中各个分子，利害完全相反。所以这里不同的是两种社会关系。一种是兄弟情睦为背影的，一种是你的不幸正是我的肥胖的条件为背影的。

我们要反对这种虚伪的集体主义，我们更要具体的反对以奴隶劳动为内容的集体劳动，以愚民政策为内容的集体意识。

愧　汗

阿比西尼亚的反侵略战争，对于中国国民意识上，总多少发生了一点作用了。

对门的阿三同小六这两个孩子，就为了阿比西尼亚是不是黑种人，抬起杠来，结果互打了。阿三的姊姊骂他的弟弟道："小鬼，你这样有劲，为啥不打东洋人去，要来欺侮自家人！"有趣，这话惹得许多看热闹的人拍手。阿三羞得红脸不敢见人。

街谈巷议中谈到意阿战争的事，更是普遍，由这谈话，又扯到"一二八"的回忆上去，于是越谈越有劲，竟忘记了一切，我也曾在僻巷口，弄堂前听到过。这是时事对于上海低级市民生活的影响。

他们都不觉得阿比西尼亚的反抗战争有啥新奇，这使我吃了一惊，过后仔细想来，原来是他们自己也曾参加过这样的抵抗的。人家欺侮我，自己起来反抗，这不是"天经地义"的逻辑么？有啥新奇可说呢？不同的，是我们反抗战争是一隅的，一开始就有人出来讲和了，并且留下了一张卖身契，而阿比西尼亚呢，是全国国民的，是顽强不屈的，准备流他们最后的一滴血。但是，在参加过的人的眼里，仍会生出熟识的情绪来，不会觉得是他们不曾了解的事。

所以，这一战争虽然远在东非，可是地理的距离，并不能使

他们生疏的。

至于对于不大熟识这一种反抗战争的人们呢，一般的说，大家也都为它兴奋，在双十的前夜，罗家伦先生就流下了一身“愧汗”，其他自责自惭的言论到处都可以看到了。

大家都觉得伸手给敌人望他“提携”，巧笑对强盗博他“亲善”，总太难为“当家人”了。何况谣言辟不胜辟，承欢终有尽时，虽然每一个月来一次运动会，恐怕也遮不过强邻天天在中国造成的“既成事实”吧！

人心都在浮动中，黑人的血也在黄人的血管中跳跃起了。

阿比西尼亚的反抗战争对于中国国民意识上的作用，是燃烧了中国国民民族生存斗争的热情，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我们就流了一身“愧汗”而止么？

继奔放的热情而起的是什么呢？不要都只学着阿三羞得红脸不敢见人而已。

妇女在非常时

我们听惯了，在生活中也感到了，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所谓“非常”的时代。在这“非常”时中，看见“非常”的事，一般人情上，却也呒啥奇特。因为时代既号“非常”，生活总得“非常”一点才是；譬如，目前听见别人谈营业不振、失业、自杀之类的倒霉话，觉得这是“非常”时的现象，近人情。饿着肚子穷开心，觉得总有些做作，不必。这一个时代，既然是倒霉的时代，就似乎应该说老实话，摆老实面孔，脸上没有笑容，我不笑好了，不要装笑脸，你装腔作态，就容易被人疑心你另作奸谋。

譬如不久以前我们看了一则柏林电讯，说一个少妇因为肚子内有了儿子，不知怎的把其他三个儿子饿死了，被德国官厅杀了头，这种我们就听了不痛快。因为德国现在饿死壮年的事也不是没有，这样为了三个儿子而杀一个母亲，总觉得不近人情，不免露出马脚，这是故意把小事夸大，向世界宣传：“咱们政府是如何保护人民生命，德国没有饿死人”，这是在扯天大的谎，实有另外的作用。

在中国，各地闹取缔女子奇装异服，男女同学同行，提倡母德母教，保育婴儿，节妇宴，集团婚，美人鱼等等，闹得都市不安，这也有使熟知中国实情的人，不高兴听。因为国难一天天严重如此，洪水泛滥十八九省，饿死的人以千万计，这一些事实，总不

能不说是“非常”时吧！而偏偏有人出来谈女人，捧女人，骂女人，这不是有点不合调儿么！

不！在我们这些傻子看来，的确觉得他们这样嬉皮笑脸，有些“那个”，但是在他们“那个”，却并非没有理由在。

我们知道，别人的不幸，正是自己幸运的人们，他们是敏感着“非常”时的，但他们最怕的是被不幸的人群感觉到，为了和缓饥饿人民的紧张，于是想法子把注意引到不关大体的小事上去。谈女人，就变为帝国主义阶段的统治者及其仆从们，在“非常”时共有的题材了。他们自装风雅，骨子里同商人一样，拿女人照片做广告画。

所以在这“非常”时的妇女，及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因为各国当前实践不同，不免有些相异，但也有它的共同点，就是反这种商标运动。新的妇女一定要冲破这种欺骗，因为说服妇女，是帝国主义战争全组织过程中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我们冲破它，就是毁去了全阵线的一个角，何况我们还可造成新阵线呢！

实践的新妇女在“非常”时中，不论大小范围，也应有“非常”的行为，这行为的姿态是雄武的斗争。

第三条路

在国策上，今日也还有人在那里找第三条路。即主张不用武力战争，收回失地，也不要签什么字，承认屈服，想在“和”与“战”之间另找一条出路。

这条路是什么呢？

胡适博士经过“在四个整年的惨痛经验的训练”后，现在找到了。他说：“我们的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了‘战’与‘和’两条路，而没有充分认识那更重要的‘守’的一条路。”据博士说，这也还不是他的发明，在两年半以前，就有一位叫做翁詠霓的先知在《独立》上说过，可惜始终没有引起政府与人民的充分注意。所以才有今日的国难。

博士是自以为自己进步了的。他说：“我是当年曾替华北停战协定辩护的人。当时我的主要理由是：‘华北停战是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博士这时是主张和的路的。现在怎样觉得“我是错了”呢？因为博士根据“实验”的结果，“塘沽协定成立以来，两年半之中，我们完全忽略了守御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禁止别人得寸进尺的野心。”“必须能守，然后能战；也必须能守，然后能和。”博士今日果然放弃了“华北协定辩护人”的言论，而说出要“守卫国土”的话，真的不能不

说博士进步了。

但是，要怎样“守”卫国土呢？“守”是否与战是可以分开的呢？在“自己领土内筑炮台，安高射炮”虽然是“我们最低自卫的权利”，但这权利在目前是否不受限制，不用战争可以办到呢？我们固有的炮台，不是都在卖身契内规定不许重建了么？

不说这一些。你有了高射炮，炮台，你会守，人家也一样会来攻的，这时战不？如果不抵抗，那就走到“屈辱签字”的路上去了，要抵抗，你就不免要走战的道路了。“守”是离开“战”可以单独存在的么？

就近代军事技术说，最安全的“守”，是“进攻”。我们今日虽谈不到进攻人家的国土，也不想做那样的侵略者，但向敌人的阵线反攻，向我们失去的国土反攻是可能的。我们的“守”应解作防卫我们整个的疆土，一寸不能与人，不是失去了东四省，我们不管东四省了，我们来“守”华北，失去了华北，我们不管华北了，我们来“守”长江流域，使敌人“不得在华北以外多占一尺一寸土地”。

这里的“守”，是包含在战争中，只有战争中才能谈到“守”，离开了战争，“守”会变为一个抽象，一种逃避抵抗，掩饰屈辱的烟幕弹。

不幸得很，在国策上，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胡博士所谓“快要走上一条比较有希望的大路”，那也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庆祝·期望和要求

《中国农村》在理论与调查方面都很使人满意，前者继承了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研究，可以说一声理论的深化，后者是提供了许多现实的材料，给与了研究者理论的实际的印证。在当前中国实践的阶段，在理论领域内，可以说是尽了相当的任务的。

然而一个爱护《中国农村》的读者，对她的期望并不止于目前达到的成绩。第一，《中国农村》在理论领域内，除了继承过去论战并略有发展外，并未能将社会性质的论战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到中国土地问题，"匪区"经济问题，农村近年来的改良主义，以及对于梁漱溟等理论的清算。这一点，我认为还是与实践有多少隔离的。

第二，《中国农村》还不免是一个学术刊物，因为太学术气了，使很多真的关心《中国农村》的人，或者在实践中运动的人，因为文化水准较低的缘故，不能参加论战，对各种问题贡献更实践的意见，同时也是使论战不能更加扩大和更深刻的缘因。

第三，《中国农村》对于农村经济基本理论，如土地问题的理论实践的介绍，一般政治经济原理以及方法论的通俗化大众化，均还缺乏；因此《中国农村》还不能成为一册教育的定期课本，不能诱导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人来学习理论。

因此，《中国农村》还不为一般人所熟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我熟识《中国农村》并且她还是我一个好朋友。但我同时看见许多朋友对她冷视，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不服，我想请这位可敬的朋友改变风格，她要成为大众的。

第一，赶快的将“经济性质”这一论战结束，我们来讨论更当前的问题吧！譬如晋阎提出来的土地公有案大纲，不就是我们的好题材吗？同时来分析现在农村发现的每一特殊现象，批判每一派对于农村问题上所发的言论吧！不要轻视别人言论，不要让谬论获得存在和发展。

第二，增加农村经济基本理论一栏吧！至少要有一个土地问题讲话。

第三，还要增加世界各国农村巡礼之类的一栏，介绍各国农村经济近况，特别是苏联的集团农场，来和中国农村对照，来和中国的改良主义对照。

第四，多多注意一些农村生活吧！多多重视农村间一切大小斗争，一切争议吧！多多登载这些被忘了的人们生活的悲喜剧及一切的抗争吧！

第五，把眼睛望出农村啊！中国农村以外发生的问题，只要它会直接间接影响中国农村的，不要再不过问了呀！稍稍管些农村以外的事吧！拿些篇幅来登载一般有关“民族大事”的问题吧！

最后就要说到大众化了。是的，大众化第一就要实践化，使《中国农村》内容更接近现实生活，第二是文章的形式的通俗和艺术化，使艰难的内容变为平凡易解，同时每篇文字在数量上减少，每篇文字编置上的活泼等，都是达到大众化的条件。

我读了一年《中国农村》后，我庆祝她已有成绩，我期望她向前发展，但同时我要求她为创造前途更易于生长的条件，要改变作风。

丑　剧

人物：某国某中将

汉奸殷汝耕

地址：通县北门内文庙

中将：我要华北，你说我怎样向你们政府要？

殷：再来一出傀儡戏就是。

中将：那不妥，现在华北再不容易找出一个汉族以外的皇室的人物来了。华北过去确确实实是汉人的疆土。

殷：那有什么关系，傀儡戏一定要皇室才可唱吗？

中将：哈哈，你说的很对。那就让你们来自治罢！你想，×××，×××，×××他们都同意么？

殷：他们迟早也要跟我老殷一样的侍候天皇的，如果他们暂时不同意，就让我先在“非战区”干起来再说吧！

中将：不过，你想你们的政府会怎样？

殷：大概也会把它作为地方事件解决吧？如果解决不了，就变成“悬案”了。政府大概在名义上决不会承认这种组织的，也许他们要称我伪组织呢！

中将：哈哈！哈哈！总之，我们先造成既成事实再说。

殷：是的。（沉思）

中将：喂！你为什么现出着急的脸色呢？

殷：　不！我托天皇的福，并不着急什么！

中将：忘八蛋！亡国奴，你还不死心侍奉天皇吗？

殷：　（哭）不！我早死心了。不过，我觉得这回的戏不大容易唱，怕是不怕什么的，难道别人吊膀子，亲善，睦邻就不算卖国吗？我殷汝耕，就是说卖国，也只卖二十二县，比起一个协定来，要少多了，你卖整的，我卖零的，有什么香臭！我不安心的是人民，这回，他们恐怕要起来同我们拚命呢！

中将：你怎么这样胆小呢？奴才！

殷：　不！不是奴才胆小。只因做我们这类的买卖如果一旦做穿了，真的怒恼了老百姓，那可不是玩的。他们会知道你们是贪欲无厌，自己的政府，官员，又都是我老殷这样的好人。说不定他们一气，自己动手来干，那也是可能的。阿比西尼亚那样的戏也是人做出来的呀！

中将：你不要管得这样远，做买卖的人，把货交出了，还管什么鸟事！

殷：　（嘻笑鞠躬退，一会换出一身和服，坐上大成殿内已经预备好的防共委员会首席。）

理想的小型报

据说今年是小报年了。

但我对于已经出版的几种小报，没有一种有五分以上的满意。

小报与大报不仅在量的方面有差别，并且主要的，是在质的差异上。

小报办得象大报，那好比孩子学成人，不象样。小报小得没有内容了，那不是新的小报，那是属于过去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新的小报的质，是由新的读者层的要求决定的。

新的小报不抢大报的生意，不抢消闲解闷的人看的小报的生意，它要开辟另一条新路，另找一个广大的读者层。

这就是店员，学徒，工人，农民，小职员，以及看不起大报，又认得几个方块字的小市民。这些人，生活很忙，现在也看报，但目下的大报，不合他们的时间与兴趣，小报又觉得太无聊，不严肃。他们需要另一种新型的小报，为了他们时间的经济，与生活知识的要求。

这种小报的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以为在总的原则上，是一种报纸和杂志的综合。在新闻方面，不仅是报道，还要注意系统的说明与细致的解说，在知识方面，不仅象杂志一样注意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还要更进一步利

用活的新闻事件，更活泼的把理论融化在说明现象上，要做到一切都是说新闻，不是搬理论，这里虽可说是报纸杂志化，但“化”要“化”到不现痕迹。

因此，在新闻的编制上，要打破大报的式样，要改写通讯社的稿子，要注意新闻的“来龙去脉”，注意新闻的发展，暗示事态发展的本质。

在知识的贯输上，不仅不能带学究的气氛，并且也切忌杂志的呆板的腔调，要切切实实的注意实际社会生活的开展的每一环子，多面的活泼的去加以解说。这里不能拿长篇大套的理论，和与当时生活上没有关联性的东西出来，知识的给与，在这里是注意实际，在形式方面是主张片断的。这里，要打破什么论理的系统和完整等学究的高调。

在文体方面，要放弃杂志文章的腔调，也不能抄大报的口吻，不仅完全用白话，还要比大报精练，不要有一句废话、一个不必用的字。这里特别要顾到经济，要用小的篇幅登出比大的篇幅更多的材料，更充实的内容。

在编制与排印方面，我倒多少主张保留今日许多低级小报的式样，因为这些小报，在习惯上已取得许多人爱好了，并且也确实比大报经济、活泼。自然，我们更主张渐渐创造一种新形式。不过，我不主张这种小报兜广告，至少不要无选择的登出许多无聊的广告。

这是我对小报一点意见，我要有钱，一定要来试试看。但我没有钱，终于不过是理想罢了。现在听说《生存线》要出版了，所以也不妨大胆的说出来，也许可以供《生存线》的参考也说不定。

但我希望《生存线》第一不要走别人已走过的路，再来办当

前这种不象样的小报，第二也不要完全与杂志无异，变为一种单张的杂志。能做到这一步，也许可以在今日的小报界开出一块新天地来。

是学潮吗？呸！

自从北平学生在国难第一线上现出民族反抗的雄姿后，全国学生大众已形成一种新的阵容来了。

但是，在舆论上，在有一些人们的脑子里，对于这次运动的认识，明明还有的是不够，有的竟陷于谬误中，对于这次运动的性质还有指明的必要。

天津《大公报》在十一日的“社评”、十二日的“短论”所表现的，就可以作为认识不够和谬误的例子。

《大公报》的“社评”把这次运动的原因，归到是“两三年来学生埋头读书的反动”，“教育界对于政府应付时局方针的不满”，“受了埃及大学生反英运动的刺激”。我们虽然并不完全否认他们指出的与这运动有些关联，但他们并未认识这次运动的性质，不免是认识不足的。

十二日的“短论”，那就更达到谬误的结论了。

它把这次运动看做“学潮”，主张“学潮应速收束”，说：“北平的学潮，似乎还没有完全收束下去，还不止于教育界本身不利而且可以成为北平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北平是文化都城，不容长期纷扰。在今天北平情形之下，学生空言请愿或自行罢课，实非其时，非其地，所以我们终希望青年要自重自爱。”

这完全是谬论。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呢？

它决不是简单的“学潮”，决不是静久了，要动一下，决不仅是所谓教育界对政府应付时局的不满，如果这样看法，会把这运动的性质弄歪曲，意义缩小，范围缩小，另引导到破灭的前途去。

我们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民族斗争，在敌人新的进攻下，站在国难第一线上的知识者自发的民族反抗运动，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运动的人，身上穿着的是学生装，就把这一运动的性质改变，认为是学生的私事。

为什么首先发现在学生间呢？

这是因为北平是国难的第一线，北平的学生是较有组织，易于组织，而且是对于民族危机感觉更敏的市民，他们自自然然走上前线，成为中坚分子了。

但这一运动决不会停止在这种狭小的范围的，它不过是广大的民族阵线之一分队，这次运动先把学生大众的阵容整齐了。同时，它自然还带着激发和加速整个民族阵线的强化的作用。

我们拥护这一运动，我们反对有人喊出“收束”；我们更要高声喊道，目前的学生运动“正是其时”，“正是其地”，只有汉奸才会发出象《大公报》这样的言论。

教训

教训的可贵处，就在它是发生在行动中，认识通过行动的过程得到了高一级的认识，虽然它常常是只具一面性，但是比理论却具体。因此它比理论更可以打动人，因为理论是一种综合的东西，它是带着抽象性的，它本身是正确的指示了行为的必然性。但因客观现实的复杂性，每每在估量一种行动时，不免有时对客观看得不够，或错误，把客观或主观估量过小或过大。理论虽然包括了一切行动中所得到的教训，但因它是高级的认识，不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教训则不然，它是认识发展中具体的经验，在行动中不断产生出来的，它本身带着残酷的血的经历，容易打动人的情感。每一种行动，每一个参加者，并不都是先有了认识，才从事行动的，实则每一行动，除开大概的原则外，有深刻的认识的都只有领袖，大队的人马，他们的认识每每是参差不齐，但行动中的教训，却给与他们新的认识，这就是说，认识从实践方面得来的要比书本上多的缘故。

教训更可贵的地方，自然是在它能把过去的经验武装自己，展开新的运动，所以它虽付过相当的代价，却是值得的。

譬如最近北平上海学生的请愿运动，据参加这运动中的人说，虽然目的并未达到什么，却得了不少的新教训。许多学生在这运动的开始时，纯粹是出于爱国热诚，以为他们的主张，立刻

可以见诸实行的。在行动中，他们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物了。

想不到，喜峰口外曾为民族吐过一口气的那口大刀，现在正用在残杀自己的兄弟身上，救火的水管，也变为扑灭爱国热情的利器了。上海到南京本来是只有几小时的行程的，他们走了四五天，还不能走到。学生自己动手开火车，接铁轨，用饼干盒子，作提水桶，打上两三吨水，放在锅炉内，这不都是奇事奇闻么？但都是许多学生亲自在这次请愿中备尝的。不仅如此，他们平生没有下跪过，这次也下过了。肚子从未一餐不吃饭的，这次也饿过四五天了。以外还吃过雪，睡过潮湿的草地、铁板，挨过打、骂、恐吓、嘲笑，同时也受过千万人的同情。这一些谁也在当初想象不到的。经过这一次请愿后，他们清醒的说："我们不是没有收获，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宝贵的，我们总算认清一切了。"

我希望这种教训，成为大家的教训。教训要付代价是不足惜的，但不能滥费精力，教训并不是要每个人都亲身去受一次，是拿了前人的经验，作自己走路的指南或参考的，不然，教训还有什么价值呢？

警告《大公报》

据报载天津的《大公报》在废历新年后就要在上海发行了。所谓"站在国难最前线的报纸"，到底巧言抵不过敌人的枪刺，也要逃到国难后防(?)来了。

一家略有声名的报纸采取了这种不抵抗主义，不肯英勇的死在国难的最前线，有人说，这是中国舆论家的耻辱，是一件非常有失国格的事，但是，在整个不抵抗主义的国策下，记者却不想单独来责备一家报纸，我想要说的，倒是《大公报》南迁后，它的态度和内容等问题，《大公报》是否想站在中国舆论的前线，站在中国大众一起呢?

过去的《大公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它是太使人失望了。它在舆论界确实比人家"努"过更大的"力"，技巧做得比人家要高明，可是它隔大众的立场也就越远。《大公报》可说是全国报纸中最狡猾的狐狸，它在外表上好象真的是大众的喉舌，在骨子里呢?它是全国报纸中，最有意识的欺矇大众，担当可怕的恶势力的说教者。

具体的说罢！《大公报》是以"社论"、"星期论文"等出名的，人家订《大公报》也无非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真的值得一读么?不！这些东西是在系统的说谎，拿最近事实的为证吧！你只要读了它那几篇关于学生爱国运动的大文，你看他们怎么的

歪曲这次北平学生运动的意义，怎样的在企图扑灭民族反抗的巨火，怎样无耻的在替汉奸说话！全国大众已经喊出对敌作战了，它却故意喊出“国民节操运动”去对抗，要大家都去自杀殉节，让敌人不费一矢的占领全国。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要详细举出来，真是说不胜说。

那末，它的博得小小名声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文人的“舞文弄墨”。我们不得不惊佩那几位写“社论”、“星期论文”等的先生们，他们那样“挖空心思”，那样熟练的巧技，真使我们这些笨记者“出于意表之外”。他们明明是替恶势力说话，明明是代敌人打主意，明明是主张投降，明明是赞成自杀，他们却会装出与恶势力无关，并未通敌，痛恨投降，反对自杀，真是“巧言令色”，认不出他的真假。所以读这些文章的人，一部分自然心中雪亮，高兴诵读，一部分受了麻醉，“莫名其妙”，这就是魔术真的做到了家的缘故。

现在它南迁了，我们固然希望它能改变昔日狡猾的伎俩，能站在大众方面来，把努力用在另一方面，领导上海今日颓废的报界，但是，上海的市民，却也应打开眼睛，须知甜的东西，往往是有毒的，在外表上敢于说话的，也往往正是汉奸。清白的大众，更应起来监督舆论界，我们不能让离开大众的意志的言论存在。

中日这时还有交情谈吗？

好久就传说中日两国要来一个什么会议，当时我们以为那不过是出于我们这位“善邻”的主意，我们这方面，总是被动的。因为华北现在闹到如此的地步，还有什么交情可谈呢！

往后知道这不是出于日本的主意。他们的外务省还在“考虑”，在华日军人也以为“时机尚早”，这会议确是出于“我们”这方的要求。

这真是一件怪事，“九一八”以后，中国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现在国耻重重，比“九一八”受到的“屈辱”不知更增了多少倍，现在反求开一个什么会议也似乎不易了，这是何等矛盾的事！

为什么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呢？

据说要把这几年来中日不痛快的旧账，作一次清算，两国的关系走上正轨。也有人说，近日华北新的事件叠出，中国政府不胜麻烦，到底要问我们的“善邻”，你要的是什么？老老实实说出来好了。有什么事，到中枢来说，不要零零碎碎，同地方当局要，弄得我们中枢没办法。

这些传说也使我们骇怪！

因为我们那位“善邻”，到底要的是什么，实在用不着再问了。旧账也决不能由我方提出来算，至于不要零零碎碎麻烦，那

更是不可能，他们对于这一个会议就表示，不谈华北问题，对于零零碎碎的“既成事实”，只许在中日会议中加以“追认”，或“预认”，对于全盘的问题，也以与日本有利益的为限，至于对于南京“中枢”与地方当局呢？他们就根本否认地方的事要问“中枢”；要“调整”两国关系吧！那就除非一切拱手给他，否则是没有生意谈的。这一切可怜的希望，也终于是一种单相思。

这种会议还有什么开头呢？

站在大众方面说，自然是觉得没有需要，人家要求我，我还要反对，何况我们反去求人呢？

要清算过去的旧账，要改变两国的交情，站在两国人民的立场，都万分需要，但不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双方出台的人物，也不能是目前的角色，应该是真正两国人民的代表。

如果是目前的角色登场呢？

那除非日本停止侵略，交还东北，取消一切傀儡组织，取消“九一八”以后的一切条约，赔偿“九一八”以后中国国家及人民的一切损失，严惩日本侵略的主持者，交出参加出卖活动的中国汉奸，否则有什么交情可谈呢！

自然，这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反对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一个会议！如果真的不顾“民意”，那么，民众就不得不注意会议席上的一切活动了。

不要夸大外交技术

胡适先生也出来喊“外交公开”了，这是非常可喜的，可见“秘密外交”在今日不独是大众反对它，就是象胡先生这样的学者，也不能忍受了。

不过，胡先生所喊出的“外交公开”，并要求公布以前的外交文件，他的看法却与我们有些两样。

胡先生太看重文字，太重视外交的技术方面。他说，“公布外交文件可以使此后的外交，有一个条文字句的根据。外交的依据全在条文，条文的争执全靠定本，所以正式的条约必须一字一句都不放松，又必须在最后声明：如有争执均依某种文字的定本。如果外间传说可信，这两年的中日交涉，全是一班门外汉的急就章，字句可作各种解释，范围可伸可缩，甚至于无人能明白指定其所签定，有无条约的拘束力，这简直是一本烂账，任凭强者占便宜，而弱者竟不敢持出账簿来争一点未曾签送掉的利益！”

这一段话，即令是书生之见，其中有些真实，却仍是一种有害的话。因为把外交技术过于夸大，这外交的责任就巧妙的转移到技术上来，过去真正外交的主持人，就可减轻责任了。这不有点替“丧权辱国”的人说话的嫌疑么？

实在，过去外交的失败，决不在于“一班门外汉的急就章”，

而是在主持的少数人，个人的利益超过民族的利益，离开了大众的意志，偷偷摸摸的失身与敌人了。你既破了贞操，人家奸污的行为，那有什么奇怪呢？

如果那签定的东西，是一张出卖女儿的契约，即令用一个专家来写，恐怕与“一班门外汉”没有什么高低吧！

何况事实并不是胡先生所想象的。过去外交上并不是没有“能手”，技术的讲求，恐怕“挖空心思”，空前无比。譬如两年来中国出现的外交的名词，可以数出一两打来，如“亲善”，“提携”，“睦邻”，“共存”，“和平”，“互助”，“自治”，“防共”，这些辞汇不都是“善于辞令”外交界能手想出的么？

过去的“烂账”是要清算的，但不能把责任转移到别的方面去。

大众要求“外交公开”，但要求的是大众的外交，革命的外交，不是在“咬文嚼字”上。粗人的手，一样会在外交文件上签字，但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断送民族的利益，至于条文上的几个字要写得慎重，那不过是附带应注意的小节。胡先生不要故意来扰乱视线。

惊人的统计

国难一天天严重，但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很不容易具体的说出。严重两个字虽够严肃，但还过于抽象，中国近百年来，都在国难中，清朝统治下，国难也不是不严重；民国以来到"九一八"止，比清朝时自然严重得多；"九一八"到现在四年间，自然严重的程度更加深了。但在一般的说话，仍只用严重两字去形容，所以在一般人的脑里，对于国难仍只有一个朦胧的轮廓，只要国难不达到自己的门口，也就觉得这是百年以来听惯了的警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主持国政的人，更利用了这朦胧的概念去掩饰自己的责任，自然更是于己大利。他们更不知羞耻的说："中国弄到现在，我们没有责任，目前亡国惨祸，是祖宗丢下来的遗产，国难并不是我们上台才发生的呀！"

果然是真的么？

狗屁！如果把这朦胧的概念，用图画表出，用数字表出，那就不得不令人惊绝，使这些责任者无可逃避他们的责任。

先请诸位打开本期所载的国难地图吧！旧账不必算它，只说"九一八"到今日这四年来，地图上改变的颜色有多少广大。你不吃惊么？

不！这还不够。请再听听王造时先生报告的国难统计吧！

国难地图上那一大块改变了颜色的土地有多大呢？

八百余万方里！比近百年来清政府历次共失的国土还超过一百五十万方里！

四年来每年失地平均约有两百万方里！

若拿丧失的这些土地和我们的省份比较（请各省的读者注意！）等于：

七个四川！

十二个广东！

十三个湖南！

十四个陕西！

十五个湖北！

十六个河南！

十七个山西！

十八个山东！

十九个安徽！

二十三个福建！

二十七个江苏！

二十八个浙江！

若拿丧失的土地和外国比较（请各国大众注意！）那就等于：

日，英，法，德，意，奥，匈，比，荷，丹，瑞士十一国本国面积之和！

换句话说，等于：

四个法国！

五个德国！

六个日本！

十个英国！

六十个瑞士！

七十个荷兰！

八十个比利时！

这是国难严重具体的说明，但是严重的程度就止此么？并不！因为这还不过仅就已失去的土地说，如果把汉奸的阴谋一概加进去，这一个统计数字，一张国难地图，还不能真确的表出国难严重的程度啊！

宣传国难的爱国同胞们！请注意具体的说明吧！请注意国难的发展吧！揭开朦胧的烟幕啊！使大众和国难的真实见面吧！

狸猫换太子

不上不下的这一个社会层，常常的多幻想。他们不满意黑暗，但他们也怕见太阳。他们对于银色的月光，总怀着过度的依恋。他们想把那动摇不静的心灵，寄托在这“月白清风”的夜里。

因为不满意黑暗，他们反对恶人，因为他们依恋的是微光，所以他们容易忘记人家的罪恶，他们对于政治上的人物的看法，就有两种眼光。对于台上唱不出好戏的人，他们要喝倒彩，对于走下台来的人呢，只要这角色会做出一个反台上人的鬼脸，他们立刻就同情他来，忘记了他以前在台上正是一个无能的丑角、作恶的魔鬼。

他们对于政治上，就是今日幻想这一位上台，明日又幻想那一位上台，幻想狗穿了礼服，就真的变成了人，象牙真的可以从狗口里长出来。

他们永远是这样可怜的在幻想中，死于幻想中。

至于那狡猾如狐狸的政客呢？

在台下是会装出和善的颜面，穿上民众的衣裳，说出讨好民众的话的，因为他有社会地位，台上人无可奈何他，他就越发撒野、招摇，他利用了这一部分不上不下的民众的善变的心理，去洗涤他过去的罪恶，用空头支票去作重新上台的资本。

许多落后的群众，就跟着喝彩，许多带着“歇斯底里”的男

女，就对他放出“希望”的眼光来。

等到他上台的日子近了，他的态度却渐渐朦胧，也变得不大发言了。

新闻记者追着他，他会装出病来，拒不见客。不得已时，他说出的话，就不容易听懂，他故意在民众希望他说的话以外，兜圈子，他完全变了另一副面相，忘记了自己发出了无数的空头支票。

等到他在台上重新出现时，第一幕拿手好戏就是对于持这空头支票来兑现的人，一出武生戏，这就算是支票的兑现。

然而，他却踏着万人的血肉枯骨上了台。

这是中国近二十年和“狸猫换太子”一般平凡的把戏，实在骗人骗的够受了。

时至今日，这种骗局也仍然在演，实在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人们的一种愚昧、落后。这种老调子，实在应该早结束了。

我们不要再幻想这样那样，自己要有理想，要用自己的手去实现理想，现在不是幻想阿猫阿狗的时候了。

侵略者的作风

四年以来，我们的敌人的侵略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小百姓注意的。

敌人用鹰的眼力，看出了中国社会在激急的分化，看出了有一大群快要垂亡的人们无路可走，看出了中国大众抗敌的决心与沉着的雄姿，他们在一面发抖、一面微笑中，确定了“以华制华”的作风。

这一作风的最高艺术是在它最合经济原则，最可以欺世、惑人。所以他们把直接由自己动刀动枪的事缩小到最大限度，这些傻事一概交给他们的代理人，只须派几个少将拿着手枪侍候着亨利·溥仪先生，殷汝耕先生，什么将军们，叫他们勇敢的干去。自己呢？只躲在后面牵线、发号、施令就得了。

这样做法，侵略者在四年中，没有费过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六个本国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并奠下了侵吞整个中国及进攻苏联、称霸世界的基础。

“以华制华”的作风的运用也是很巧妙的。

在满洲，是现出了急情的丑态，建立了“满洲国”，因为自己动手的地方太多，很惹起了世界的喧哗。

走进关来，作法就更艺术了。改用了自治，并且是为的“防共”。自己动手的地方确实比以前要少，顾忌要多一点。华北全

部自治运动不成，也只好一步一步做，先让“殷汝耕先生”暂时偏安一隅，在那冷清清的文庙中，多坐几天水晶板凳。冀察呢，在外表上也容忍了一个什么委员会，对于尚在徘徊的“将军们”，什么“们”呢？也只好用甘言劝驾，最好是脱离中枢，否则呢，就再成立一个阴阳怪气的什么委员会也好。对全国，一面在暗中尽最大可能的利用矛盾去瓦解整体，同时对整体则提出了三个原则，明白要你自动的解除一切民族武器，一切尽由摆布。

不管他们的手法如何变换，骨子里是一致的，是动员一切中国反大众的力量，去消灭中国民族的反抗的力量，使中国民族的反抗成为不可能。

是的，我们对于当前敌人玩出的把戏的每一节目都是要注意的；并且还要注意它的发展。

就冀察政委会说吧！这种组织的名实，以前固然也不能深究，但是到了现在，它的“实”的发展，已经要否定它的“名”了。我们即令把隐藏在暗中的一切不谈，单就近日见于电讯的，就有自行处理外交的决定，破坏整个的外交系统，发行冀察赈灾奖券，事实上收截了一切应解中枢的财政收入，也明明确立了另一个财政系统。何况在传说中，土肥原有被聘为高等顾问，华北各重要机关都将聘用日本顾问的拟定呢？

这种亡人国家的阴谋是比敌人自己直接用刀用枪来干更为可怕的，因为直接来屠杀中国人的确实是中国人，一切侵略都在合法的名义下进行，中国一块一块的亡了，这一块一块地上的人民还不知道自己如何的变为人家奴隶，这不是最可痛心的事么？

我们痛恨敌人，我们不要忽视了我们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研究敌人侵略的艺术啊！

拆毁人造的墙壁

同在一个上海，我们不能不承认上海有几个世界，人与人间的隔阂，是有着使你想象不到的距离的。隔断人与人间的了解的，固然是不同种类的生活类型，天堂的人们是不会了解地狱的。但是除了这种生活的墙壁外，也还有人造的墙壁，在地狱的内部间隔着，在地狱与非天堂的人们间隔离着。

譬如上海工人的生活，我们这类穷困的市民，就一向是隔膜的。去年，中外各工厂中，发生了所谓养成工，外间并不知道。近来学生救亡运动起来了，好多人觉得上海工人全是死的，因此怀疑到工人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而不知道目前上海工人生活残酷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热情，愤怒又是如何的被那铁的巨力镇压着。我们读了《读书生活》第三卷第六期《工人不晓得爱国吗?》那一封通讯，就知道一个大概了。最近梅世钧的事件，更明白得很，敌人直接用枪屠杀中国工人，不独没有看见什么抗议，就连新闻上也是轻易不肯记载一字的。伟大的工人义气会的反抗，也被各种力量镇压住了，使它不能表面化出来。梅世钧的死，忽然变成了什么"神经病"，是这样的阴消下去。

是的，在这里，新闻的封锁是尽了人与人间铜墙铁壁的任务的。

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现象啊!

这种种人造的墙壁，无疑的是在分散民众的团结，消灭民众的巨力，自毁民族反抗的力量的。在这种种自杀的堡垒上，现出的是什么呢？是民族意识的消沉的外象，是敌人无顾忌的猖狂，是汉奸乘机活跃，在国际上现出的现象是民族的怯懦、无耻。

从梅世钧的事件中，我们更认识了在当前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艰苦、残酷是超过人类历史的记录，表现在工人方面更要严肃。但这决不是说，用巨力可以消灭民族解放运动，消灭工人的斗争，排斥工人部队在民族解放斗争以外，否认它是民族解放中主导的巨力。一切压力是有它的一定限度的，它决不能杀灭运动的发展、社会史的发展！

对于一切人造的墙壁我们不能不用各种的力量将它毁去，对于梅世钧的事件，不能只看见表面，就作出悲观的判断来。我们要互相了解，我们要结成一条阵线。上海真是无声的上海吗？中国真是无声的中国吗？

街头讲话

《街头讲话》，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前　记

远在一年七个月以前，《新生》编者曾经屡次和我商量，要我替《新生》写点什么，照他的意思，最好辟社会科学讲座一栏，让我每期“讲”一次。我记得，我当时颇不赞成设什么讲座，因为“讲座”似乎太堂皇、严肃，不适合《新生》读者的要求，同时象我这样“半瓶醋”的人，站在“讲座”上去，实在也觉得有些羞愧。后来他同意我“爱谈什么就谈什么”，于是从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新生》第一卷第二十九期起，到《新生》停刊止，除开稿子被图书杂志审查会抽去外，每一个星期都替《新生》写过一篇“街头讲话”。《新生》停刊了，虽然我预备说的话还未说完，可是我的笔也同时搁下。但是《新生》的读者中，也还有些人并未忘记“街头讲话”，特意写信告诉我，希望我能把它写完，在别的刊物上登出，或赶快印成一本书。这些建议，我都未曾“赶快”照办，现在想来，很对不起这些求知的朋友们。

“一二·一六”以后，因为从许多到过“民间”的朋友们的口中，喊出大众需要适当的读物，但社会的供给却没有，很引起了许多关心大众教育的人注意。我有几个好友又想到我写的“街头讲话”了，他们劝我抽些时间，把没有说完的部分补写出来，权且补补这缺项。在我自然也是同意的。但是几次的决定，总被别的杂志的定货所破坏，我非常的感觉遗恨，到最近我才下了一

个最大的决心，在三个星期内将全部讲话续完，并且将《新生》上发表过的三十五篇，也一一加以校正。现在这本书总算是可以印出了。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说什么，一切都让读者批评者去说吧！不过我对于这本书的编制以及写作态度上，却还想说几句话。

在编制上，有人主张按文章的性质分作若干部分，并且挂上“政治”，“经济”的小标题，使读者知道，这些“谈天”，也原是按照社会科学一定的系统的。但我却未这样做。

我觉得那会变为“四不象”，这里谈的是信口扯来，最多也不过做到象乡巴老谈上海一样，能引起读者对社会科学的一种景慕，已经是成功了。哪敢冒挂着社会科学的牌子，自己一点不知羞愧呢！所以我竭力保有本书原来比较轻松的形式，以切合“街头讲话”的意义。

但是在这篇“前记”中，我却要把这些“街谈”按照社会科学的分类加以指点指点，这与以上的意见不是矛盾的么？不！这不是严格的分类，说我某几篇是谈“经济”，某几篇是谈“政治”。这里的指点，是说某几篇乃介绍“经济”，某几篇乃推销“政治”，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推销员口中的话，那还是需要的。

那末，本书五十篇文章中，一——二两篇就算作“总论”吧；三——六是“社会”；七——十四是“经济”；十五——二十八是“政治”；二十九——三十三是“道德”；三十四——三十八是“宗教”；三十九——四十是“风俗”；四十一——四十四是“艺术”；四十五——四十八是“哲学”；四十九——五十就算是“科学”吧！

至于所谓写作的态度呢？那不是对读者说的，本来在这里

不必多嘴。但为了恐怕这样一本东西，偶然也落到某一位真正不折不扣的科学家或文学家的手里去，因此而引起双方对我夹攻起见，所以也须得在事先就有一点交代。我写文章本来是近三年才有的事，自己不仅不懂科学、文学，就连“文章的作法”，也是从来没有研究过的。也许因为自己没有专门，也就不受专门的束缚吧！我在和一些知识大概不相上下的朋友们讨论一个什么理论上的问题时，总觉得抽象的理论不容易了解，在大家聚谈中，越说得具体些，就越好懂，越博得大家的会心的微笑，越说得抽象，越说得象“煞有介事”，面孔上登时就减少笑容，认识的门对于大家好象是高不可攀的，这是我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正与现在有人在提倡“科学与文艺结婚”、“理论形象化”这些呼声，恰相符合，的确这还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在写作方面，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事实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本书的文体，也许对于科学，或文学双方都要变为罪人，也说不定，但我并不以“非驴非马”为耻。我感觉惭愧的是自己对理论还不深入，对文学的手段还太薄弱。我不以本书写作的缺项，对自己写作的态度就怀疑起来。

无疑的，这些习作仅仅还只提出了我对于“理论形象化”的主张的一种倾慕，离成功之路还远的很。在文章的形式上，尤其觉得没有利用够大众所熟习的形式，是一个不可原恕的罪过。因为所谓大众化的问题，并不是单凭学者的想象，不管大众目前的文化水准、接受性，而武断的创作的。我在这一方面，现在正在注意。在最近的将来，如果还要写理论的东西，我想，第一要做到真正的“形象化”，第二想试用“唱本”，“弹词”，“演义”，“故事”等形式，真的做到“街头”的人一看就能够通晓。我对于新的形

式的创造的了解，觉得不是单凭幻想，不是死板的模仿法布尔或伊林先生，或在苦雨斋欣赏卫生香豆腐，而是吸取各种最能活泼的表现内容的要素，通过实践，形成一种新文体。在当前国难期中，写作者站在唤起民众的意义上，写作的形式，我以为越接近大众，大众越熟识的越好。这是我个人看法。在街头讲话中，无疑的是没有做到的。

最后，我希望科学或文学方面的朋友们能够给我一些指示，同时也等待读者诸友更具体的意见，我愿虚心受教。这一册不成熟的东西就作为纪念《新生》而印出吧！

柳　湜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关于街头讲话

站在街头上说话的人，同蹲着听的群众，无论古今中外，大致都是一些穿短衫裤的朋友吧！真正的士绅名媛，在这扰攘的道途，是从来不大停留的。住在高楼的人，一向看不起的是街头人。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不准我一个人到街上去玩，因为怕我学坏。谁会教坏我呢？自然是这些街头人。据此类推，街头的谈话一定是不大能入正人、绅士之耳的。但街头实在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因为人多，所以热闹、有趣。我自小就心爱它，觉得它并不如大人所说的那样坏。后来，我长大了，能够自己翻读西洋史，才知道原来法国今日的文明，就要全然归功于这些街头人，而那长列的浓荫古道，的的确确就是法国文明的发祥地。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当时我想。

以后，我又在欧美历史中看见许多"高贵的人们"，在某些时候（大概是他们要群众的时候）也走下楼来，步入街头，拣一块空静场所，对群众说话。虽然，这些高贵的人们说的什么话，我已不大记得了，但街头人被人渐渐提高重视是无可疑的。至于当我看见一个革命者，或街头的人群自己在街头怒吼，也居然使楼上人颤栗起来，我简直魂飞室外，佩服到五体投地了。

这是我十三四岁以前的一点记忆。

随着时代的进步，街头上的人的知识自然也比昔日住大楼

的人还要丰富了。街头上的人，现在已另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面积就占住地球的六分之一。六分之五的街头人，虽然还未建造好自己的住屋，不免仍然流浪街头。但他们都已渐渐感觉到自己需要新屋子住了。如何去拆毁那些不合式的旧建筑？如何计划创造中的新工程？这两种巨大的工程，现在正被千千万万的心所吸住，成为全世界街头人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由这关心所造成的，是大众迫切地要求参加这拆毁与建筑房子的工程时一切地应备的知识。于是，素来被洋楼的学者所专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就一天天在街头生长起来，成为街谈巷议的极平常的大众的谈话的资料之一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还未能变为街头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同时街头人一天天急切的要求着它，也同样的是一件事实。“街头讲话”就是想按着目前街头人的需要，对于街头人应该知道的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方面，作一点随随便便的讲话。

首先我要向大家交代一句，我自己虽不是完全属于街头的人，但自己也没有自建的住宅。目前是住在我的主人的楼下，也极希望大家能有好房子住，我也能分得一间半间给我设榻。所以，我与街头人一样的心理在讲求拆毁与建造的一切知识。因此这里要谈的，虽然标出是社会科学，可是，我并不想将整套的“洋楼讲话”拿来当做礼物送给大家，也不想将外国“街头的话”原封原样当做是“我们自己的”，我不能如此做。我不能离开中国的街头的实践，去谈天说地。

因为“街头讲话”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工作，并且还是一种尝试，所以这里面要讲的还不是整套街头人应学习的系统知识，讲话的重心不能不专重在洗清街头人脑中的沉淀及不合色

彩的映片，对日常从街头所感觉到的一切现象作正确简明的科学的分析。同时在解释现象时，提出我们应记忆的科学的法则，使“感觉的知识”与理论融合为一。但决不就限于这一步而止。

我们学习拆毁与建造的原理固甚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事拆毁与建造，不是专在认识与解释一些现象上。自然，关于工程中的实践，也不是这里可以一概包括进去的，但我们不能忘记了它的联系，变成完全抽象的讲话。我认为这只要紧紧的握住中国大众的生活的实践，这一点，或者是今后讲话每一篇的最高原则吧！

这么一来，这种讲话自然不能避免名流学者所讥刺。或要认为“离经叛道”之作也未可知。但我自甘这种批评，我不妄想这些东西会被住在高楼的人们所重视，或意外的在大学讲坛上居然被人提及。不！我所期望的是，它真能是街头的东西，或近于是街头的东西，切切实实地替街头人解决了一些疑谜，增加了一些生活力。凡是街头的人都要看，想要，看后还要传看，认为真是他们的东西以外，尽管世人如何大骂，那都与我毫无关系。

但是，我对于来读这讲话的街头朋友有怎样的希望呢？我觉得，首先希望是大家从速从社会科学是难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不！社会科学并不难读。你们一定应注意说难读的话的人们，是否住在楼上？你要知道，只有住在高楼的人才会怕我们大家读懂了，要去毁坏他们的瓦屋，来自己造房子，所以特别散布一种疑阵。我现在举出一个故事，以破诸君的沉闷。

有一个当家和尚，在他出门前，一面交给一个徒弟一瓶白粉似的东西，一面说，你却不可打开，你如果吃下肚子，那马上就会毒死了。徒弟在师父走后，一个人在玩弄这瓶白粉。他仔细的

考察，觉得这白粉并不象毒药，反而有点象白糖。因为他一向相信师父的话，他在师父下山后半天，依然不敢打开来试试。一直等到深夜，师父还未归山，此时徒弟肚子也饿了。又想到那瓶象糖的白粉上来，因此，他就打开来尝，果然是一瓶白糖。原来是师父惟恐徒弟偷嘴才故意说了一回大谎。

说社会科学难懂，或故意把社会科学写得难懂，等于现在有许多人提倡文言，反对大众语似的，都与那位师父一样在说谎，我们却应摹仿那位徒弟，我们应自己去尝一尝啊！

最后，我还得交代一句，"街头讲话"虽然好象说《三国演义》似的，要说多久，连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它也是有章回的。每一次所说的，虽然有一定的线索，但每一回却都是独立的，这无妨"听官们"的不便。因为我深知道，我的书场既然设在街上，听客自然是一些没有安定生活的人，哪能希望每一听客，次次能到呢？我只要看了每次书场上人是满满的，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听官们不必顾虑到我以前没有听到前段，就不能听后段，固然，能全听到是好的，但今日街头人的生活的实践，却只能得到一点就是一点，连连场的听恐怕都不许可吧！

这就是本书场开张的交代了。

生活经是什么

自从前天我在大街上说出社会科学四个字来的时候，就有两位朋友不大高兴起来，好象批评似的说道："什么是社会科学，我们所要知道的是生活经。"不错，这批评一半是对的；但那位朋友误解的地方，就是他不知道我要说的正是"生活经"。社会科学正是一种"生活经"。不过，普通所谓"生活经"，大概是指个人生活的门路，社会科学这种"生活经"却是指一个社会生产集团，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大家的生活的门路罢了。"生活经"三个字因为我嫌它太不明不白，所以用了这四个很生疏的字。至于要说的内容完全可以包括生活经的意义的。

又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我们现在连饭都会没有吃了，哪里有闲工夫听你说东说西呢，我们要知道的是眼前的事，我们身外的事，我们哪能管得着呢？"

这话也有一半道理。我们要知道的是眼前的事。但眼前的事实在就太多了，太不容易知道了。而我要说的也正是眼前压在我们大家头上的事，我们不能不管的事，尤其连饭都会没有吃的人更不能不了解的事。这些道理，说来并不艰深，在外国已写成大众读的书了，但在中国却因文字太难，大家看了书就害怕，所以那位朋友听了说书以为就了不起了，一定是什么大道理，要住在高楼的人才能听懂似的，其实，我们要谈的还是摆在我们眼

前一些极平凡的事。

我们是天天在街头混混的人，每天所看到的事就不知道有多少。就说上海吧，上海的交通多方便，有汽车、电车、轮船、飞机，有无线电报、电话；上海的建筑多美丽，有二十四层的大楼、幽静富丽的别墅、广大清洁的公园、庄严华伟的纪念碑、塔、人像；上海的享乐场所多阔气，有剧场、舞场、有声电影、回力球、跑马、跑狗，有各地的小调的播音，令你心醉；说吃的罢，有大菜，有中菜，有……有……有……有……，真是说不尽的山珍海味，在等待你开尊口去叫唤。然而，我问你这一些现象就是上海吗，你或者要说，这还不对。上海虽然有这样的繁华，但同时也还有黄浦滩头整千数百无衣缺食的苦力，黑夜就躺在马路上，或藏在苏州河内秽水中的破烂的船室里。大马路仍有黄包车夫，拾烟头的瘪三，告地状的乞丐，工厂门外有的是失业的人群，荐头行内坐的是找事的大姐。夜晚上街头做的是人肉交易，黑心买卖。天天新闻上登的是罢工、怠业、捉捕、电刑、自杀、杀人、发狂、绑票、梅毒、肺病、红丸……等等等等的消息，然而，你把这些现象再加上去，那就是上海吗？仍不是的。

或者你要说，上海还有租界、洋人、兵舰、洋旗、水兵、洋行、银行、洋钞、洋娼等等，我还未说到的。即令我们统统算上，无限的排列起来，决不能说这就是上海，了解了上海，认识了上海。如果我们只知道了这一些碎片就算交关学问，那马路上的瘪三先生都要做上海博士了。这些事情只能说明上海社会一点性质。这犹如一个乡下姑娘从城市回到家乡后，别人问她在城里看了些什么？她就数她一个一干二净，自傲自己上过城了。

但这一切现象，我们细玩起来，都是人与人间的关系。譬如

洋大人与我们，阔人与穷人，老板与劳动者，房主与房客，娼妓与嫖客之间，都各有一种特定的关系，以上的万千的现象，又各有一种人与人间的相互影响，这些关系，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万千的关系，是彼此相关，象一张网一样联结得异常复杂。你就请一位细心的小姐，也不易一会儿理得清的。但他们之间，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解释，就是说有了娼妓制度，就必然有梅毒流行；有了私人开工厂的制度，就必然有资本家、劳动者、失业、罢工等等；有了帝国主义就必然有殖民地、战争、屠杀、租界、特权；有了不做事的阔人，就必然有忙得不得开交的苦力。这真是说不胜说，举不胜举的例子。

社会现象既然有一种这样的因果关系，那我们就不怕如何繁复，我们可以找到这一个茧子的丝头了。社会科学其所以比起乡下姑娘谈城市的热闹要高明，就是它不是讲一片片的闲话，它要理清茧头，找出因果的关系并说明这些现象的所以然的缘故。不独如此，它最重要的，还在告诉我们街头人，如何去改变一些于我们生活不利的现象，使我们生活开展，向上。你看这不是生活经是什么？不过，我已在前面说过，它不是站在个人着想的，个人的生活要包括在大家中去解决。

我们还要知道，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同时人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身，并不是什么灵怪，也完全是物质。所以我们的家，虽然乍看起来不过是社会，其实社会是在自然中，所以我们除了遇到许多社会现象外，又要遇到许多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我们也是天天感觉着的。这里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心理的各种现象，并且也相互的有牵涉。不过这是自然科学的“闲

话”，这里暂且不说它了。

但我们要知道，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因为人类所组成的社会是生在自然界中，人类的生存、营养就是靠劳力去采取自然界的物质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的明白。这是生活经上不能不提及的啊！

中国又有一句俗语，说靠“天”吃饭，“天”是什么呢？天并不是神，就是自然。就是说人类生存一半要靠自然，但要注意的是大半还要靠自己去改变自然，自己从自然中找东西吃，不能纯粹“靠天”吃饭。

人类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呢？这不是简单的几句话说得清白的，现在勉强的用上海的大马路打一个比喻。马路的地基是经济关系，在这马路上建有许多层的大建筑物，那就是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大马路地基发生了地震、变动，先施、永安等全部建筑也要坍倒改变。这道理不是一天所能说尽的，所谓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综合、统一。研究这全部的门路就是社会科学。这就是全部生活经的大体。我们要知道最近的事，同时不能不知道很远的事和很古的事。所以书也不能完全不读，更不能完全不听。因为很多的事，在今日的南京路，我们是看不到的、听不到的，我们仍不能不管它。以后我们就分开来一一解说吧！

生物的家

我们在以上的讲话中，曾经交代过，人一生下地来就是在社会里，同时社会是藏在自然的怀抱中，我们人的本身也就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不过，人这种东西，时常有两种癖性：一种由于生活的高压使他只知道一天天地过活下去，不敢多想事，昨天已经发生了什么，明天将要发生些什么，很难使他想起，凡与他的一天的生活自早到晚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就不容易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我们生在自然中，并不了解自然，这犹如鱼在水中，不知道水一样。在原始时代的人对自然没有正确的观念，现在我们乡下的祖父辈也大半是模糊混沌，他们就把那自己茅庐前后的山溪风月，当作宇宙（即自然，又称世界），真比井底青蛙无异。另一种是由于狭隘的社会生活的利害，使他不敢认清真理，反将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来人化自然，故意夸大了人性，以为宇宙是由一种特殊的人造的，人为"万物之灵"呀！"宇宙并不真的存在，只存在在人的头脑中"。他们说了许多鬼话，不是说自己的"法力无边"，创造了世界（即宇宙），就是说本来没有世界，或者有一个灵怪在那里主持世界，好象他们统治地下的仆人似的。他们闹得乌烟瘴气，夹七夹八，造成了一种统治仆人的宇宙观。他们在骨子里呢？也知道这是谎话。但这谎话却与自己确是有利益。

在我们的街头上，平日听见的是鬼话多过人话。现在天不下雨就设坛祈雨，七月半到了，大街小巷都在打醮，设盂兰会。南京路那样的洋场，也还留存了一个鬼气十足的虹庙，有不少的“善男信女”在那里许愿求财，希望中航空奖券。他们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对自然不了解的结果，都是那种统治仆人的宇宙观在那里发生力量，显它的魔力。

至于我们常在上海街头混混的人呢？我们的实生活却渐渐不相信这种欺人的宇宙观了。譬如在这样的炎天里，我们夜间总是躺在黄浦滩边的草地上的日子居多，在众星明朗的天空下，遥望天空，自己对于宇宙总不能不发生一点思想。我是常常自己对自己发出一些傻问的，我是谁呢？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子女的父亲。不错，我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不！我还是黄种人。由此，我更想到我是属于人类的一分子，人类又是属于动物的一分子，动物同时又属于生物世界的一员呀！我想到了这里，我就想到我现在躺着的黄浦滩，是中华民族的国土，是东亚的一个大都市，东亚呢？东亚是属于地球的一部分呀！

这时，天上的星在向我弄笑眼了。使我记起了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话，地球也是一颗小行星，我们是寄身在这一小行星上面的一件小生物啊。我们的家的这颗小星，也与忙人一样的在那里行动，她步着鸭蛋式的步子，在那里跟随着她的爱人太阳团团转。这太阳名叫恒星，她在恒星中却是一位最不出风头的小妹妹，因为宇宙象这样的恒星就不下千千万万，象孩子吹肥皂泡似的，一团团的浮在天空中。我们知道，天上这些“明星”们也与地下的“胡蝶”、“徐来”相似，是最出风头的。她们都很势派，都爱活动。我们看见她们都不是干干净净、孤零零的一个归一个，在天空中

旋舞，她们的周围，都各带着一大群噜噜哧哧的小东西，嘻皮笑脸的跟着转，向着众星所崇拜的仙子朝拜，毕竟是天上比人间热闹，伟大，使你到不能想象呀！这就是所谓宇宙大观。

我又记起了我那位朋友还告诉我。我们不要望着星星发呆啊！世间上最大的星球固然使我们惊叹，谁知最小的东西反会使我们觉得更出奇呢？任拿大的宇宙中任何一碎片来，那里面都包含了无数的秘密，包含了另一小的宇宙啊！一切的物质，拿肉眼看来，好象是连成一片似的，但在实际上，一切物质都是由无数极小的东西构成的。并且这些小东西，也与星球那些大东西一样的时时刻刻不断的在那里有规律的急速运动，形成了许多小的宇宙体系。这就是由分子原子和电子组成的一个宇宙系统，每一件物质是由许多分子构成的。分子是一个肉眼不能看清的东西，它的大小拿比喻来说，如果把一个针指套里面的水扩大到地球那样大，那物质中的分子的大就有足球大了。但这小的世界又是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构成的，这粒子名叫原子。譬如食盐的分子，就是由两个原子构成的。原子的种类，总共有九十二个。譬如自号为"万物之灵"的人；也不过是十四个原子构成的。但是原子并不是小的宇宙最小的东西，因为它还不过是一种包有几个粒子的空洞的空间球。这种最小的粒子名叫电子。电子在原子内，好象是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它绕着一种带阳电气的中心核运动。电子是一切万物的原料，万物的差异，亦不过这些小东西在那里作怪，他们因数量、配合等等不同的运动而呈出的形态罢了。这样说来，宇宙虽然伟大而又新奇，但并没有什么神怪可说。一切多是由这些小东西在运动，小东西形成较大的东西，一直形成到大到不可言的星星的世界，五花八门的物

质，千奇万怪的种类。人也不必自夸，本身不过也是宇宙一分子而已。不过，因为人类的属性，造成了社会，利用了自然，自己更向前发展，比其他生物要进步些，但是，这也好比孙悟空的筋斗，一翻虽翻得十万八千里，但到底还不能翻出如来的手掌。人也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

我想到这里，我仰望着天上的星辰，我想不到广大无涯的大宇宙里有什么主宰，有什么离开物质而存在的精神现象。更不是只存在在人类的头脑中，恰恰相反，它是在人类尚未来到地球以前，就是悠久的存在的，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同时，我们不能不存着惊叹的，是无论在小得不可开交的电子，到大到不可形容的星的世界，都是在一种规律的秩序中在运动，成了一种天然的法则。这法则是按着发生、发展、死灭的步调，进入更高级的新的历程，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无论是自然与社会现象中，都没有两样。同时我们看不出宇宙的“目的”。

这就是人类的家，同时是生物的家。

愿不愿由你

人类是生活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中，但这位“仁慈的”母亲的怀里，人类并不是她独生子。这位多子的母亲生性有点特别，她对于所有的子孙，一概都不姑息，也不偏袒某一个儿子。她完全“一视同仁”，让你自己去生长、发展，完全要你自己独立奋斗，任你生生死死。

母亲的家财虽然是无限的，但她并不传给某一个子孙，她要你自己去挣取，你的能力能取多少，她却从来不会拒绝，同时也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暗自给与过哪一个儿子。所以，有人又说，自然是“仁慈的”，同时又是“残忍的”。其实，这不过是譬喻的话，人间的母亲听了，不要心酸吧！

我们总算是胜利者，虽然在自然界中，我们也不过是由十四样原素构成的一件物质，在生物界中，侥幸的做到了动物；在动物中，又幸运的做了两脚直立，前面两脚变成了手的两脚兽。但这两脚兽，在今日的自然母亲的怀抱中，确确实实是顶呱呱的成功者。他已取得了他的母亲最大的财产。我们自己虽说不必过于夸大是“万物之灵”，却也不必过谦的否认自己努力的收获呀！

我们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过着今日这样的摩登生活的。最初人类与普通禽兽无异，饿了只知向母亲（自然界）的怀中寻现成的东西吃，冷了象绵羊似的大家聚着一起取暖，以维持自己的生

活，并不能生产什么新的东西。虽然，寻觅果实与鱼虾也要费大力气，也可说是一种最简单的生产方法，但因为没有改变自然物的原来的状态，实在还没有生出什么，产出什么。也谈不上现在所说的生产方法。回想我们的祖先的当年来到世间，既没有虎豹的锐牙利爪，又没有龟鳖的厚甲坚壳，孤零零在一个广大无涯的荒漠里，受着风霜雪日的欺凌，尝着虎豹豺狼的袭击，真要替他们捏一把冷汗，他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呢？

他们战胜这一切的方法是结合互助。许多人聚在一起劳动，比一个人的能力要大，这是不用说的。人类能够共同生活，所以他才能生存。但人类结合而互助是他的生物的根性，并不是先有了独立的个人，因为要对付野兽，才共同开会讨论，而后有意识的，由分而合的组成社会的。人决不是生在社会之外，决没有独立经营经济生活的可能。

诸君也许要说，鲁滨孙飘流荒岛也能生活了呀！我要告诉列位，那到底是小说家的空想，那位小说家在替初期资本主义鼓吹开发殖民地的冒险呀！即令退一步说，那小说里的鲁滨孙先生，他也是从文明世界里带了许多现代技术知识及猎枪、犬、小刀等生产工具到荒岛上的呀！他不是一个象我们原始的祖先那样孤单的人呀！

人类的生存竞争的工具，粗粗的说，就是人的共同生活。共同生活中，个人的劳动同时就是社会的劳动。从共同劳动中，自然一天天得着许多经验。他不独采取自然物，他慢慢还能学会了制作，譬如捉了鱼，还能把它制成鱼干，从以手捉捕，慢慢能利用网罟，于是禽兽每日用尽气力只足一饱肚腹，人类却渐渐有了多余，人类除了满足“饮食男女”的需要外，渐渐就发生比前更繁

复的需求，这种需要是由生产多了才惹起的。因为生产加多，同时需要也加多起来，又辗转的想法子去再求生产方法的进步。同时改变自已，一天天与禽兽的生活远离了。

这里关于近代人类生产方法的一切变革且按下慢表，却先提示一点人类的经济生活的来龙去脉。不过，要列位知道，我们现在都不是孤零零各人生活各人的，而是与我们的祖先一样，仍是在结合互助。我们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我们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可是同时，我这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离开了社会，就不会有人的存在，当然也不会有我、你、他，更不会有“街头讲话”呀！

社会呢？社会是刚才说的就是人类劳动的结合体。从我们的祖先的食物的寻求，果物的采集，以及狩猎渔捞，到目下我们将自己的力气论斤论两的卖给工厂主人去转动机器止，都是由各个个人加入了某一种生产关系劳作的呀！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被结合着，不过，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罢了。

我们的祖先最初的劳动，虽然是由各个人协力去做的，但只限于用自己的体力去采集或占有自然物，完全被自然环境所支配，并不敢向母亲（自然）顽皮。虽然如此，它却明明已现出一种社会的过程，即由集合的协力与集合的经济而决定这种过程。我们在这中间，我们不难想象我们祖先们之间已发生了种种的相互关系，这就可说是社会关系。

人类为了生活计，不能不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养料，要获得生活养料，不能不有一种经济行为（即取得生活养料的劳动），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不能单独去做的，所以不能不参加社会的生产，不能不与许多自己以外的个人发生关系。这完全是出于生活的追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不能不如此，它与个人的意志毫

无关系。于是所谓社会，才明确的被人意识到。人在生产过程中，天然的是在共同的劳动、相互的合作、直接间接的发生了千千万万关系，这关系叫做生产关系。综合这错综关系，便形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这是建筑人类万花缭乱的文化的基础，但这基础也是由着生产用具的进步，劳动努力的增加，劳动的对象（自然界的产物，原料及一切其他）不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改变。因此，社会也分出有许多名称不同的社会来，现在，在这里暂时都不去说它。

我最后要向大家说的，世上本来就没有万事不求人的人，也没有离世独立的人。列位都是生在社会中，并且是生在半殖民的中国现代社会中，你能不问当前的一切社会事情吗？不能的。愿不愿由你，它总是要影响你。在要求了解目前社会一切事件之前，说了上面一些闲话，或者不是完全无干系的事吧！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我们在前面交代了两件事：一是告诉了大家世界有多么大，人类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不要夸大，也不必自卑；二是告诉了大家，人类到底是一种最进步的动物，他赶上了原始时代一切的众兄弟（一切动物），独自艰辛的创造了一个社会，发展了今日的文明。

人就是这样的生在自然与社会中，以自然与社会做自己的环境。一切的个人都不能不受这两重环境的力量所支配。

就自然说，譬如现在的人类，因为住的地方不同，生理上就不得不有些差异，皮肤也就生出各种颜色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就有的已走入高级的文明的阶段的，也有还在半开化及野蛮的道路上。个人不能不受环境的决定。今日"最文明"的美国人与爱斯基摩人，在个人的本质上，并不是谁比谁天生的聪明，只是他们所生的环境不同，就生出天上地下的分别。个人，真正是非常的渺小，"愿不愿由你"，你总是环境的产物，你会顽皮，你总顽不过你所生存的自然与社会所给与你的限制。

但这不是说，自然与社会完全束缚你的手脚连动也不许一动，恰恰相反，人这种东西，一生下地来就是要奋斗的。自然母亲，社会父亲，虽然一向对自己的孩子不会姑息，并且还带一点冷酷，有时竟使你感觉孤零零的，一个人飘流在荒岛上似的，了

无办法。即就个人说，在今日这样炎凉惨酷，只有利害，缺乏热爱的社会里，个人英勇的突破坏的环境，创造了自己发展的条件的人，也正不少，这就是说，人类虽然不能跳出这二重支配，但人类是能自动的，有意识的一步一步去克服困难，人类对自然，不是以我去适应它，而是使自然来服侍我。人类渐渐的克服自然，其伟大惊人的成绩是值得夸耀的。

同时人类对于自己创造的社会，不断的用血肉去争得一天天的合理，更适于大家的生存，社会也就一步步的向前迈进，都是明白的事实。这又说明人类就是对社会也不是盲目的服从既成的一切，而是积极的向前奋斗，决不会停止在某一段落为满足。所以我们听了以上的两次讲话后，并不必灰心，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我们不管是如何受自然的限制，受社会的威胁，展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无限的前途。

这有什么证据呢？有的。

人类自从脱离了类人猿以后，人类在其经济协作中，慢慢的学会了能把采来的树枝加上一块石块，做成一把石斧。把树条子盘成弓，取树枝做成箭，磨石为利斧、刀等工具。自然这一切都是为劳动，是劳动的工具。这一开始，就改变自然对于人类的限制，人类每天狩猎所得就比虎豹每日所得要多，同时人类也改变了自己的性质，不再是人猿了。

人类自觉的变易工具，同时就是变化了劳动生产量，就是报复了自然的冷酷，他就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他们在劳动中，经验使他们知道，天天对于劳动工具加以改变，劳动生产量也就天天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也时时在改变。

这一改变又惹起了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我们知道，人对

自然的关系是劳动方法和其生产量(技术)，人与人的关系却是社会内协作及分工的方式。没有人造工具时，那时的社会里只会有共同拔树、采果、猎兽、捕鱼等简单的协作，并无分工。生产的东西自然不多，没有储蓄、交易。分配的方法也极简单，大家吃吃用用就完了，决没有人会藏起一条鱼，一只鹿，作为自己私产的。

等到人类中积聚的经验越多，必然要发生一种特别的工具来记忆这些经验，组织这些经验，于是由劳动生出了知识，知识帮助劳动，发展了生产技术。人类的劳动工具一进到能用许多犀利的铁器，农业手工艺的时代就一步步的到来，社会便必然的发生分工。分工，其实就是协作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社会进到比以前较高级的阶段，人类的生存是比昔日简单的协作、无储蓄的时代容易生存多了。

可是，这时社会的关系，也大大改变了。以前什么事都是大家做的，一同采果，一同狩猎，现在就职业上说，有了农夫、织女、铁匠、陶匠、管理者、军事家、学术专家等等数不清的系列。

同时，生产量这时增多了，自己消费不了，就发生了储蓄业，发生了交易，因为智力与体力分工的结果，那些生产的指挥者，渐渐已将大家协力生产的东西，认为是自己智力与指挥调度之结果，就将这些多余的生产物占有起来，当作自己的私产，以后更变本加厉，公然的用暴力取得他人的劳动结果，分配的方式更不是以前那样平等的了。

于是平面社会的广野上，是造了许多层的楼房，就有了一些高踞高楼的主人及在为这些主人劳动的奴隶。但是，虽然如此，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上，这仍然是一种进步的阶段。

自然，接着手工艺而来的是机器生产的时代。劳动工具不再是许多零散手工具而是将这些手工具组织了机器，更由动力转动起来，于是近代文明就开始了。自然，这是人类更进一步的阶段了，对于自然，渐渐堪称得支配自然，克服自然了。就人类的生存说，也比手工艺时代有了更适宜的条件与向上性。社会的分工的繁杂，令你没有方法把它一一排列出来。今日制一只缝衣针，就要经过几十道手续，经过几十人的手。一个医生，以前是什么病都诊的，现在不独分为内科，外科，即就外科中某一病的某一病菌说，都可成为一个单独的专家，以外也就不必说了。

生产物的增多，更非我们的祖宗梦想可及，你只要留心上海的烟囱，来来往往轮船火车的运载，就可推及一切。至于社会分配呢，诸位比我更要明白，占有工厂、机器、土地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支配一切，象我们这些街头上的人，只有出卖血汗，它的价格是论斤论两用铜子计算的。

人与人一切的关系也都与手工艺时代不同了，这里只认洋钱不认人，就是连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是如此。这不是我多说了，诸位闭着眼睛一想，诸君中说不定有一位昨天夜里回来，因为卖不掉自己的血汗不能预备家里今天的早饭米，被你自己的妻子大闹了一顿，这个事实不是最好的例子么？

是的，人类并不以现在的文明为满足，人类还向着电气化的前途迈进。这种更巨大的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已开始了。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劳动生产量大到全人类"各取所需"那样大，"自然"这时也将变为人类的仆役，人与人的关系也将天翻地覆的改变。人类社会才会现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兄弟的情睦，

再没有人支配人的事实了。大家同心合力去征服自然，展开人类的黄金时代。

人类的历史是向前进的，这就是我提出的证据。人类是不断的创造历史，改变历史。从来没有满足过。

虽然我们在某一阶段，我们不能超过这一阶段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每一时代的环，并往下推移下一环，无论站在我们个人，或大众的立场，对于当前的环境都要抱着打破现状，创造自己发展新社会的条件。

如何去打破一切难关呢？这要了解的东西还多得很，以后再说。这里，我们希望诸位的是不要"听天由命"，同时知道"事在人为"，我们确可改变一切，连伟大的自然都要它驯服起来，如海京伯训练野兽一样，使它替人类服务。

如果人类停止了劳动

人类社会是劳动的结合，如果全社会的人大家忽然有了一天发起懒筋，停止了劳动，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不用说，在生产技术很简单，只知到山林川泽去采些现成的东西充饥，不知制造的我们的祖宗的当日，采在手里，吃在口里，那确是够危险。一发懒筋，就是死命，而四五十人的小社会，登时就要灭亡。即就后来说，人类除两只手外，还能利用畜力、风力、水力并且有了简单的机械了，生产有了剩余，我们以为大家稍微发几天懒筋是没有关系的。其实不然，我们也常常看见因为这种社会的劳动组织不好，就发生社会的枯萎与死亡，不要说大家真的停止劳动了。

就是今日，象美国那样会生产的国家，象现在正在狂热的纺织业大罢工，已经闹到全美国鸡犬不宁了。这还只是一小部分衣着料工人向美国资本家开一点小玩笑呀！如果全世界的人，果真有一天大家都要发一次懒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全世界的生产机关，交通机关自然全停止了。象伦敦那样的城市，它码头上不再有粮食运到了，不到三天，恐怕全市就要连饼干糖果都要吃得一个精光。夜里自然也会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播唱，全变为一个黑暗而又死寂的世界。那时洋烛也许要卖到十金镑一枝也说不定。不，那时商人也发懒筋呀！你连买也会

买不着，只能过着黑暗日子。是的，没有灯还可以熬过，水是要喝的呵！那时自来水也自然断了，不要说人没有水喝会变为鱼上了岸一样的厄运，就你家的抽水马桶，没有水如何将那些黄灿灿的东西，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呢？那就够你麻烦了。

啊啊！我不必再想象了，那日子是不能延长的，一定不到一星期，剩余的东西，都吃光了。世界变得不成一个样子。如果大家不再高兴起来，要继续懒下去，那也没有例外，非把社会弄到灭亡不可。

这种事实是不会有的，我们不要怕天会掉下来打自己的脑袋。我们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如何使上回讲过的那种生产力的东西，能够好好的开大步走，我们却想过一点好生活，有个更进步的社会，决不会发懒筋的。

我们知道，社会的基础就是看我们有怎样的工具，有怎样使用工具的能力，能够运用一些什么样的原料，这些我们在以前已经交代过的。社会的变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能力并不是由于几个聪明人想象出来的，它是要受当时的技术，当地的环境所限制，譬如没有铁器的时代，煤虽与现在一样藏在地下，可是不是人类的燃料，更不能发明蒸气。人类不能依自己的意志随便选择一种最进步的生产力，它总只能按照某一时期，某一技术阶段所许可的，既有的生产力的状态着手去改造。人类对于生产力的创造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无意识的到有意识的，由徐缓得象骆驼步行沙漠到飞机御风而行的一日千里的飞跃。

随着生产力的变动，社会也同着变动，过去的人类社会曾经唱过一些什么拿手好戏呢？在上一次已经说过一点，不过那只

是从人类努力方面举出的例证，不是着重说明生产力。现在我们还得跟着以上说过的要更详的说一遍，就请生产力先生的引导来回顾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吧！

最初我们的祖先拿着树枝与石块作成的石斧跃出舞台时，这里的生产力是这样表示的："人"+"最简单的工具"，生产性质是只采取不制造，劳动生产量是"采在手里，吃在口里"，没有剩余。这时代，社会的评论家(即社会学者)把它叫做民族的原始共产制度，以母性为中心，经济关系是无剥削为特征；共同生活的范围呢？小得很，只有四五十人为一族。这是自然经济的时代，一切都是直接分配，没有交易，没有市场。

接着生产力进了一步，采取了"人+畜"+"工具+机械"的形式，生产的性质就变为原始的农业及畜牧了，这里"制造"已成了主要的，"采取"渐渐变为不重要的成分了。劳动生产量因而增加，除了男男女女都吃得肚子饱以外，剩余的东西渐渐发生了。

因为生产分工的结果，男性在经济上渐渐取得优势，氏族共产体便崩溃下来，旧的经济关系已被新的生产力所突破，于是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大家庭共产体的形成。这时共同生活的范围已扩大到三五百的人群，组成了村落或部落了。这是家庭的自然经济的时代，村社与村社之间已开始了物与物的交易了，但非经常的状态。

等到"人+畜+风水力"+"机械"这个公式代表生产力时，所谓封建国内自然经济的时代就登场了。这时农业畜牧业都比以前进步，新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剩余的生产品增多，原始的共产体就再不能维持了。舞台这时出现的是装作人君、儒牧(即

士大夫、官僚)、商人、农奴的各色的人物，这时一个人君的国度要统治数万的人。

生产品有了多余，劳动分工的发达，自然促起了交易经济出现，买卖成了经常的事业，市场也就正式成立起来。这时生产力进展到“手艺机械”，城市中的手艺技术大大的改良，自由手工业者及自由农民、小本商人，变为舞台的主角，所谓人君等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威势，数万人的大城市也建立起来。

在“人＋畜＋气力”＋“复杂的组合机械及机器的自动机”的这公式代表生产力时，所谓现代文明就揭开了序幕。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纯粹交易经济为特质的。

这一时代，大机器工业生产，疯狂的只为着赚钱，造出了连自己也不能知道是否可以贩卖出去的东西，名叫商品，无孔不入的遍布全世界各角落里。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其经济关系，诸位也很知道，它特别明显的把同是一样的人分做两种不同的人类，一种楼上人，即占有生产工具者，一种是街头人，即出卖劳力者。楼上与楼下虽然中间也还住有一层层的人口，但他们是可上可下，大致往上的少，跑下的多，所以在此地不必细分它，这时人类共同生活的范围就扩大到可惊了。首先将几千百万人组成所谓“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了世界市场，造成世界经济，统括了全人类。

我们是生在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生活，是我们以后要特别分开详细说的，在这时代以前的也许就略去不说，今后的，自然等到适宜的时候再详细说。

此时，我要告诉诸位的，就是我今日送给诸位的只是一些进窥社会秘密的锁钥，指示了过去人类的经济关系是如何的受着

生产力的规定，这些经济关系表现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即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及资本主义制。

不错，生产力的进展，虽然就是人类的进步，在原则上应该是每个人都无不为这一进步的目标努力的。其实不然。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二种抗争，楼上人因为他们已是支配的主人，所以总想维持那高高在上的势力，譬如秦始皇，他就想维持秦氏天下到万世不灭，他是旧的生产力的代言者。街头的人们，他们总是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想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他们主仆之间是一向认真，不仅睁睁眼睛，动手动脚，到了某时候还用真刀真枪厮打的，历史上满是这样的全武剧。由一个社会制度转为另一个社会制度时，从来没有和和平平过，总是经过一种很可怕的战争。

譬如现在的生产力已昭示了电化的道路了。今日私人经济制度内就不许你有实现的可能，现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度里，反在天天低减生产力，如妇女打胎一样，你说怪不怪呢？

反观历史，大致总是如此，然在胎内的孩子也总是要出生的。人类到今日虽然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劳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不劳动不得食”的话。结果，终究非大家劳动不可。如果人类果然全体停了劳动，那自然就是到了社会的末日。

从这里拆穿西洋镜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却说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大社会（即世界），头上戴了一个什么大名呢？大家都说惯了，它的荣名是资本主义。现在只有我们的北邻的五房兄弟那一对新分了家的小夫妻，名叫苏联的，过着另一种新生活外，其他房份的兄弟，还艰难的过着老的日子。

至于我们中华这一房份呢，说来惭愧，在昔日所谓封建的家道中，也曾当过家（即大社会，或称世界），荣耀过宗谱的，但因为百余年来子孙不争气，现在连比东邻的满房都比不上，天天还要受他们的闲气和欺侮，主要原因，就是人家都改用机器弄饭吃了，而我们仍是用些小手工具，做些小本生意，一天天穷得象个瘪三了。

近几十年来，众房兄弟都欺侮我们，他们仗着发了横财，已不认得大家原来都是骨肉了。我们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气就是八十多年，这中间我们拆穿了他们不少的西洋镜，觉得非自己建立国民经济起来，决不能报复他们这口鸟气。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气魄太小，资本的压力过大，一切企图都告失败了。我们社会弄得一天不如一天，所谓自己建立国民经济，只学了一点时髦，装饰了一下门面，造成了上海、天津、广州等数个摩登都市，教会

一部分人民吃巧克律糖罢了。

中国社会到现在还是头上戴着西洋博士呢帽，口里含着吕宋雪茄，身上披的却是花缎大袍，足踏的更是双梁缎履，见了人点头，又握手，并且还加上作揖弯腰，十足的表示资本主义还学得不象，一股半封建的酸味儿。这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详表。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各房的家况，他们的致富之道。我们之所以要将话拉扯到我们自己的家境，那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街头讲话"不能是空谈，如果事不干己，我们为啥要管人家的鸟事，在这里闲嚼舌呢？我们不客气的说，现在我们已将各房人家的西洋镜都拆穿了，最最阔气的大房的老英，二房的老美，三房的老法都只是外强中干，都要破产了，至于满房日本小子，他的得天已不很厚，更不用说，我们已看到我们已不能再走他们的路了。最有希望的现在似乎只有五房那对新夫妻，他们是创造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走什么道路呢？我们先应彻底明了各房的现象；尤其要先明了除开五房以外各房的真相。

既然，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各房致富之道，现代社会就是用这种建筑术构造的。虽然各房由它发了横财，又因它宣告破产了，我们却仍应研究它，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这话说来长，这犹如一个乡下老游过先施公司后，你问他先施公司是什么？他不能马上很正确的回答你的一样。虽然如此，资本主义是什么，不是不能答复的，不过请诸位不用性急，听我慢慢的道来吧！

现在你们也许一点也不觉奇怪，一个织布厂里，一天织成万千数匹布干什么？世间上怎能有那样一个家庭，一天能做这样多的衣裳穿？

你一定说，这有什么奇怪，他们是出卖的。老板开织布厂为

的是赚钱，他家里的少奶奶真不希罕这个呢！她们的衣料从来也不穿厂里的。

这话你对我说，我也不奇怪，你如果去问八十年前我们的祖宗，他就以为你说疯话。不错，现在生下地来两岁半的小孩子，就会叫妈拿钱去买糖果，就知道糖果是可以买来的。这话在八十年前又谁能相信？

那时代的孩子吃的东西大致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并不要买，也没有地方去买，大概这现象现在在穷乡僻壤中还存在。布匹、糖果，和千千万万说也说不清的衣食住行各类的东西，现在你就非买不能得到。

象我现在坐在亭子间里写“街头讲话”，精神写得倦了，想抽一枝雪茄，喝一口开水，都非拿铜板去买不可。现在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挂有几元几角几分牌子，标明价格。皮鞋是七块钱一双，跳舞丝袜是两元半一对，自来火是三个铜板一盒。这自然你不会奇怪，现在连人的身体劳力也挂上这种价格牌子了，你难道没听见过吗？买卖人口虽然现在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但事实上你花上一千八百仍可以买一个美貌如花的女子，供你享乐，妓女更明白的由货色的不同标出七块、十块、念元一夜的价格了。至于我们街头人出卖的呢？是劳力。二角洋钱可以买得一辆黄包车夫从靶子公园拉到先施公司的劳力，五角大洋可以买到你在纺织厂里做上十一小时的劳动。两三块大洋也可以买得一个作家写一千字的脑汁。这些标出价格出卖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不用我多说，在实生活中生活的诸君都习以为常的称它叫做“商品”、“商品”了。

不错，凡是出卖的东西都是商品。商品这东西都有主人的，

譬如，我们虽一无所有，却有劳力，我之出卖劳力与张三或李四，都得由我，我就可以自傲说，我也是主人呀！但是做了商品的主人，虽然也很荣耀，但也要这商品能卖得出去，如果布匹的主人不能将堆栈的货兜卖出去，那样多的布匹要它何用？我们满身的精力，如果卖不掉劳力，那精力也会无用了。布匹老板卖不掉布匹会闹得关门，将布匹烧掉或抛到海中去，我们卖不掉劳力会要“呜呼哀哉”、“闭眼大吉”。这都不是玩的，所以商品最重要的是流通，越流得快越好。

你也许在这里要说，商品这块砖头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殿堂的基础，在我们过去社会里又何尝没有呢？

我答道，这也不错，成为现在这样猖狂的这块砖头，确是在母体内早早就发生了。当我们的祖先不经常的用一条牛去换一匹布时，已经发生了它的雏形了。后来它一天天长大，变成用银子去交换，也渐渐经常了。但它的魔力在三四百年前还小的很，谁会想到它今日如此的猖狂呢？

不错，它成为资本主义殿堂的基石是与人类采用“人＋畜加汽力”＋“复杂的组合的机械及机器自动机”这公式同时开始的，它的发生却原是很久的呀！

我们知道，世间上并没有完全是没有母亲的新东西，同时一切的新东西也是会养孩子的，孩子并不就是祖父呀！资本主义的一切秘密就都包藏在这商品中，我们就从这基础部分开始去拆穿这西洋镜吧！

一盒火柴内藏着的秘密

在我的写字台上此时有一盒火柴，这火柴盒的盖上印有一只凤凰，还刻上“瑞典国凤凰牌”六字，这东西是瑞典国所制造的，现在贩卖到中国来了。它是一件商品，诸位还有疑问吗？

我知道，如果仅说它是一件商品，诸位也许点头无语，如果我说资本主义的一切秘密就都包藏在这盒火柴中，诸位恐怕就要怀疑起来，说不定要我拿出这秘密来给诸位看吧！

不错，说到那里，就要做到那里，不过诸位不宜心焦，要把商品内的秘密还它一个三清四白，是不容易的。

八十多年前有位名叫马克思的，就将这秘密写了三大本比《圣经》还厚的书，现在世界上的人、真的好好的读过这书一遍的还不很多。中国还有很多大学里专卖经济学的教授们连这书的名字还未曾听到过呢！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将这一部分的谈话拉得太长，免得诸位蹲着脚酸啊！但这秘密还是要从这盒火柴中拿出来的。

诸位，第一我要告诉你们的，这盒火柴是一件商品，同时又不是一件商品，你说这够不够奇怪呀！不奇怪就不成为秘密，没有秘密就使得我没有话说了。我说它是一件商品，因为我给了烟纸店老板三个铜板，他才把这盒火柴同我交换，我如果缺一个铜板呢？烟纸店的老板太太就要骂出“瘪三！你也配用火柴

吗?"

但是,我买到袋里了,现在我将它站在香烟盘上,一根一根消费,眼见得不到三天,都用光了,剩下的自来火杆子,堆满了一个香烟盘子,最后被娘姨倒到垃圾箱内去,于是连那凤凰的影子再也不能看见,一切就此完事。这盒火柴到了我的手里后,再也不能有外遇了。我当然也再无法去收回我花的那三个铜板。所以从进到我的袋里,就是说它已走出了流通界,好比女人走出了交际场,已嫁定了人,这时这盒火柴原来是叫做商品的,不再叫做商品了,它不过变为一种消费物,这犹如小姐嫁了人以后,一定要改称太太的。

在这里也许你们还能想到,当交换不发达的我们的祖先的时代,自耕自织,自给自用,那时就根本没有现代性质的这种商品。更说远点,在原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时代,就连梦也不能想到这二重人格的东西。再推到将来说,如果我们五房兄弟那种理想真的大家都采用了"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盒火柴,它也要把那三个铜板的徽章抛掉到爪哇国去。同时我也要少受烟纸店老板太太的闲气,岂不痛快!所以商品并不是一件东西中凝固了一种什么物质,故意要同我们穷鬼开心、为难,它不过身上赋有了一种交换的鬼魔。

机器发达了以后,生产扩大了,交换更扯大了,交通发达了以后,又再把交换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各角落里去,现在瑞典的火柴也走到我的香烟盘子上来了。于是,这商品身上赋着的魔鬼,就猖狂得空前无比,社会间人与人的劳动互助关系,在今日被魔鬼播弄得一点也看不明白了,谁还相信我们的祖先们,他们是如何的兄弟的情睦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拜倒在这商品之前,社

会就是市场，人情也有时价，我们都把商品作为我们的时代之神了。

但是，这商品之神并不能久安神位的，它的生命完全寄托在交换上，在交换存在的时代虽用得着它，这一风头期间一过，就会退下神位的，并且为时已不久了。

再回到这一盒火柴上来。我们仅知道这一盒火柴可以称它为商品，又可以称作消费物，这还不过露出了一点小小的秘密，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烟纸店老板要怕我没有火柴吸烟，而特意到瑞典替我们预备那许多火柴摆在货架子上呢？

也许你要答道："你在说疯话呀！烟纸店老板的太太又不是你的爱人，她那里关心你吸烟没有火柴这些鸟事，她的目的是赚钱呀！她哪里要直接到瑞典去，她是从大的批发店批发的，那大的批发店又是从上海的瑞中洋行批发的，瑞中洋行呢，它才从制造凤凰牌火柴的公司批发处大批的批发了，用大轮船运到世界各地的呀！那瑞典的火柴公司，才是真正供给你的火柴人啊！"

如果照这话推想起来，岂独烟纸店不是我的爱人，中外批发商、瑞典火柴公司的老板又哪能算作我的朋友，不过都是在打算我的荷包内的三个铜板罢了。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盒火柴能和几个铜板交换，同时它是用什么方法把它卖作几个铜板的呢？

一盒火柴之所以能够站到我的香烟盘子上来，是因为它有供我吸烟点灯之用，在我甘心情愿，我要用它。但烟纸店为什么肯接受这三个铜板，这不能不算一件奇事。

我们知道，在没有铜板以前，我们祖先是用一件衣去换五斗米的。现在不过把一方换了铜元。在我们的祖先那种交易中，我们看得更明白，一件衣能与五斗米交换，是除了因为甲需要米

不需要衣，而乙需要衣不需要米，衣米都有使用的关系，这是一层。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关系，不然这交易还不能成功，因为我们从没有见过人家用一条牛去换一枚针，用百块钱去换一条手帕。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价值的不相等，不能成交的。一件衣服与五斗米的成交，除了使用的关系外，就是他们的价值相等。现在烟纸店接受我的三个铜板，给我一盒火柴，按照交换的道理，必然是我这三个铜板中已含了一盒火柴的价值。这是一切商品中包含的秘密，没有这秘密，一盒火柴不能挂上商品的徽章，到市场上去招摇的。

然则，这“价值”又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不是要交换，我们一定要想到人类的字典中一定不会有这个名词。它也同商品一样是交换社会所特有的徽章。我们如果不管交换不交换来看一件物品时，我们只看见，除开物品的物质的构成要素外，就只有人花在制造这物品上的劳力。在共同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内，这劳动是人与人间彼此互助的，并没有论斤论两的必要。这其间，人与人的关系，十分明白清楚。如果把这种交换关系加上去，现在你拿了一匹布我牵了一头羊，在两人用途互易上都彼此愿意时，要计算的就是我花了好多劳力织这匹布，你花了好多的劳力养这头羊。如果相等，就成交大吉，否则，各人都掉着头走了。

不错，一切商品价值就是这样决定的。至于说到一双跳舞袜子挂上两块半洋的牌子，这两块半是价格，价格决定虽然还要受市场供给需要等影响，但最基本的是由价值去决定的。

一盒火柴的秘密，当然不只如此。以上所启示的秘密，不过是作为拆穿西洋镜的秘密的一片钥匙。

它的身分

一盒火柴中藏着有许多秘密，诸君听了已是吃惊了。其实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因为太平常了，往往反被人忽视，如果要过细追根起来，说不定要难住许多人。

现在的人，再也不会觉得一盒火柴卖三个铜板有什么奇怪，也不会对整千整万箱的火柴从轮船码头运进，又整千百的男女工人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走进本国人开的火柴厂内去工作等事，有什么值得惊异，自己拿五角钱做一天工还有什么怀疑呢？这些人人自问能懂的事，如果要反问起来，火柴为啥卖三个铜板一盒？为啥会有这许多火柴从外国运进呢？这整千百的男女工人早上为啥不晓得睡觉，要走到工厂中去？我们的精力为啥只卖五角钱一天呢？这些疑问，你们也许要说它是傻问，但不能说它问得没道理，要好好答复起来，都是很有兴趣的问题呀！

现在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若把我们的祖先从地下复活过来，他将会如何的吐出舌头，大叫“怪事怪事”啊！我们知道，一盒火柴出卖三个铜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事。在我们的祖先当日，自己制造的东西自己用，再用不完，也不过稍微有点多余和东邻西舍交换交换罢了。哪里会生产出这许多自己不要的东西来呢？一双手怎会造出这千千万万箱火柴呢？从那里招募这千百工人呢？

在现在你可说，这有什么新奇，工人是招来的，现在各地都闹着失业，莫说千百人一招即满，再来几个千百也不会没有人呀！要是在昔日，情形就不同了。那时，大半的人，不是有一小块土地耕种，就是手上还有一套手工具，造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能作主，除开自己用外，随便拿去换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可生活下去。那时，倘若真的有一个今日的工厂老板要招募一万工人，你说还有谁会去应征呢？是不会有的事。

今日的工人，其所以愿意到工厂工作，是因为早已失去了那小块土地，手上又没有那一套生产工具了。不然，谁肯把自己的力气卖给别人作牛马！所以现在火柴厂内千百的工人，你们问问他们是从那里来的？你会听到他说："先生！我没有田种了，没得吃才上城的呢？"或者他说："我以前是个手机织布匠呢，因为现在人家都爱穿机器织的布，我没有事做了，才来做火柴的。"

是的，这是极常见的事，但这对一盒火柴的出身是很大的一个要素。我们知道，天下如果没有劳力，哪里还会有商品，要想造出这千千万万盒的火柴的劳力，即要想使千百的工人走入工厂，就先要希望有千百农村破产的失业的人口的存在。不然，就无处找到这种劳动力。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好多工友们平日是梦也没有梦想到的，反倒以为我们一生下地来就是替老板造火柴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说穿了，诸君不是要叹一口重气道："原来如此！"

自然，火柴要想成为今日三个铜板一盒，不仅要有劳动力，也还要用机器呀！这一点，诸君是明明白白的。今日上海堆积如山的洋货，哪一样不是机器制造品呢？所以火柴卖的这样便

宜，是造出的货色比用手工具的时代多，本钱花得反比以前少，不然还有哪个傻子干这买卖！这里，就告诉了我们，机器代替了手工具的时代以后，才有这种廉价的火柴啊！这就是所谓生产力的发达啊！从英国有名的产业革命后，世间上对于巨大的机器生产品是不觉得可奇了。

说到这里，这盒火柴的秘密并未被我道尽呀！如果世间上尽是一些我这样会抽雪茄的人只知买火柴抽烟，去消费它，没有“大腹便便”、“肥头肥脑”的火柴公司老板，那还成世界吗？要看透这个秘密，我现在要拉你到市场上去走一转，请你去会一会一位叫做资本的先生吧！

市场上是做买卖的。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两种人，在做着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譬如一个农人到城市卖去一担白米得洋七元，他再用这七块钱买了衣料。这一种交换方式是：

货物——金钱——货物

另外有一种有钱人，他用了一百块钱，买了许多布匹，然后再转卖给别人，或者他用了这百块钱，用了几个织工，买了几件机械，一些原料，生产了五十匹布，再将这些布送到市场上来（他们自己到市场上来不来可不管），他们交换的方式就变为：

金钱——货物——金钱。

如果我们把以上二种方式拿来一比较，在第一方式中，农人卖米，不过是为了要买衣料，金钱不过是做了这卖与买间的媒介。在第二方式中，两个有钱人买入布匹，或为了制造布匹买了许多东西进来，但结果不过为了将布匹转卖给人。他们花钱，心在得钱，货物反只作了赚钱的一种媒介。

其次是，农人卖米，意在要替他的妻子、儿女买衣料，供家庭

消费。他注意的是布匹的应用。他起首是卖，落尾是买，结果，两手空空，荷包内连一个大都花光了。但那有钱的人倒不然，他起首是买，最后是卖，他完全不注意自已对买入的东西的应用不应用，他只注意那布匹能否有人要，交换得出去。所以，一买一卖后，最终钱仍回到他自己的手中。

还有，那个农人的钱是永远的消费掉了，但这位有钱的人一买一卖后，不独钱仍旧回来，而且回来的钱更生出了儿子，比原来有的多，你想，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傻子，以百块钱去买布匹，而又作百块钱卖出去的道理。所以他的钱必比起首时增多了。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农民买回这衣料后，交给他的老婆，一切买与卖就终止了。但那位有钱人则不然，他用了那循环增长的金钱，在那里循环着买或卖，他总不会停止那运动，因此他手里的钱，也就越滚越多，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

不用说，现在这里谈的火柴老板，无疑的就是第二方式中的人物，至于我呢，不过先卖了自己的稿子，然后去买火柴，刚刚是第一方式中的人物呀！在这市场上，我们遇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为买而卖的过程中可以生出比起首时更多价值的东西。这东西就名叫资本。

"资本"，粗粗的看来好象就是指钱，其实资本并不是物，它是代表一种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表现在一物之中。这比如金银并不就是货币，要等到受了一种法律的规定，多少分量的金定为一金元，七钱二分的银定为一银元以后，这时这金银方赋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质。这里也许还不能使大家弄清白，以后再谈吧！

总之，一盒火柴作为现代商品而登诸市场，不是简单的一回

事，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一盒火柴是一件商品，并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它是要有了以上各种关系才能走上市场的呀！它的身份是不平凡的呀！

下次，我要专门来解释一盒火柴为啥能有钱赚，这钱是赚得谁人的，阿猫的力气为啥只卖五角大洋一天？今天就在此带住了吧！

为啥一盒火柴会有钱赚

我常常傻想，为啥三个铜板卖出一盒火柴还会有钱赚呢？

我去问烟纸店的主人，他告诉我，他能答复我的，仅仅是批发价比门市要低一点，他赚的就是这差数。这答话粗粗的一想，并不值得再怀疑的，过细的一想，就不对了。

我想起我们的祖先用三块羊皮换得一匹锦绸的故事了。那时他们交换的虽然同是一件物品，可是标准仍是有的，那就是看每一件物品上每人花费去的劳力是不是相等的。如果这话是对的，交易上又都是规规矩矩的，那就应该是造火柴的人照原来花费的劳力的估价卖给批发商，批发商照原来的厂价卖给烟纸店，烟纸店再就原来的批发价卖给我了。如果要这样，那就没有今日的世界了。谁能空着肚皮去做这样"无意义"的空肚买卖呢！

是的，今日的火柴商人要在流通方面赚钱，按照等价交易，老少不欺的原则，他一定是要从厂主手里买到的火柴，比自己花费去的金钱的价值要更大；并且，这不是欺骗后来的，这要那火柴厂主甘心情愿让渡才行。大火柴商人赚的是这位厂主放让的这一部分价值的收回，但还不是全体，因为大火柴商人又要辗转批发给人，一级一级进到烟纸店，这盒火柴的运动才终止，一直到卖给我，这一群大小肥瘦的商人赚的钱，都不过是火柴制造人以低的价值故意出让，而这些得了便宜的商人，再就原价值卖

出去，扣除花费的本，而落到手内的一部分差数。这是非常的明白的。

但是，为啥这位火柴制造人，他会如此的恩惠给这一群大小商人呢？他这种以低价值让渡给人有什么经济意义呢？他是发了疯吗？

没有！瑞典火柴大王正是当今瑞典政治上牵线的聪明人，他怎会不明白呢！这里有一个秘密，不仅一盒火柴是如此，千奇百怪的一切商品都是如此，你懂了这秘密，你就不会发生以上的傻想头了。

原来火柴并不是那位大王自己动手造的。造火柴的是千千万万的没有生产工具的劳动者。他们的气力现在是被当作商品一般的出卖了。当这商品登场时，买方与卖方是如此这般的见面了。

买方说："你们出卖力气，不过是在养活你们自己同家人吧！你们一天要消耗多少，才能使你们的气力天天这样的挺干呢？"

一个卖方说："我一家五口，老婆也在主人的工厂作工，现在只有三口人吃白饭，有我二口子养。一天，一餐小米粥、二餐老米饭，一年，四季布衣各一套，就能够天天生出挺干的气力服侍主人呢！"

买方沉默了。他在肚内打起算盘来，他自己对自己道，这位汉子说的话倒还诚恳。不过，算盘是不能不打清的。三一三十一，啊啊！现在一百盒火柴的时价，可卖七角，五百盒可卖三圆五角。买原料用去二圆半，制造五百盒所消费的一切机器用具价值五角，如果现在花二角半买进这劳力，共计要消费三圆二角半。三圆五角减去三圆二角半，不错，还有二角半多余的，这交

易还可做，于是他就说：

“好吧，我就每天给你二角半！”

从此，千千万万的“二角半”，站在那位火柴大王所开的厂内，各种机器的旁边，替他在无昼无夜的生产连数也数不清的凤凰牌火柴，这些东西就象蝗虫般的飞到世界各地去了。

但秘密就在这里。原来我已说过，这种特殊的商品，是由造出气力的食粮等价值来决定大小的。二角半就可造出这气力，但是这气力并不只造出“二角半”。这是怎样说的呢？因为“二角半”买到的劳力是一整天的，但五个钟头就可以造出二百五十盒火柴，二百五十盒火柴就可多卖二角半，这二角半就算作出卖气力人的代价，其余还有五点钟，也同样可以生产二百五十盒火柴，也依然可赚到二角半，这二角半明明是多余的。

于是，火柴主人对于他的产业的计算是如此的：“我的生意经只在抓住这一点就够了。我要注意的是尽可能快的将这劳力所下的成本收回，二角半要五点钟，如果劳动力的主人再节省一点，如果只要二角时那不就于我更有利益吗？或者再把机器改良一点，譬如一架普通劈火柴杆的工具机，每天只能生产一千盒火柴杆子，现在换了一架新式机，却同时间可以生产一千五百盒，劳力的报酬都是二角半，但从前是需要五点钟才能抵补的，现在只需四点钟了。这就是说必要劳动的时间越缩短，越于自己有利益呀！”

同时，他又想道：“把机器转得更快点，工作场与劳动力配置得更合理些，利用了工人每一秒钟都不白花费了，这也可以将这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啊！”

他总在这些方面苦用心思。但是，他的荷包因此就一天天

高耸起来了。

现在话说回来，我以前不是已经说过，火柴商人他是以低的金钱的价值买进更大的商品价值的吗？不错，在这里，我也就找着答案了。原来那位火柴制造公司确是放让了一部分权利的。因为他要赚钱，就非将货快快的脱出不可，这些商人也就因此分得一点肥了。这肥也明明是出自那“二角半”的。

这还有什么奇怪吗？如果没有这“二角半”（这就是在学名上称作剩余价值的），也不会有今日的世界呀！

你还有什么傻的想法吗？

“你要装给我看”

昨天骑马将一个新买的香槟表掉坏了。回到家来就自己动手来修理，将表内一切机件拆成了一小堆，仔细的在检查损坏的地方。邻居的孩子，小苹倚在我的身旁看得有趣，她指着发条、柔丝、螺钉一样一样的问我是什么，我也只得就我所知道的答复她了。最后，她严重的问我道：“难道这一堆东西就算一个表吗？”

我说：“这一堆东西散放在桌子上，不能算一个表，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它是发条、柔丝、螺钉啊！如果把这些小东西按照以前一样装置起来，加上点油，它就再走了。那就算一个表了。”“你要装给我看！”她这命令我虽然不一定能照办得好，但不能不遵命照做的，不然这孩子就会认你在撒谎，表并不是由这些小东西配合起来的啊！幸喜我勉强的弄好了，这香槟表居然再滴打滴打的响起来，她也就笑了。

这一段小小的故事，使我想到了这几天我在街头“拆西洋镜”的把戏了。我不是已经把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大家庭（社会），所谓资本主义那个金灿灿的西洋镜，拆出几项重要的机件来把大家看过了吗？但，自然这是不够的。“这一小堆的东西”，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呀！所以我现在也要将这些“零件”，再重新配合起来，在一种“滴打滴打”的活的运动中，来再交代这西洋镜

的神奇。

构成资本主义这怪物身上的细胞的是商品。商品中的秘密，我又从一盒火柴内找到了。我们又在市场上，生产机关内会见了资本先生，碰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活的商品(劳动力)。在这件特殊商品的买卖中又发见了商品主人的聪明的发现，看清楚了为什么说瑞典火柴公司老板一直到我那弄堂前烟纸店的六麻子都一样高兴的在兜我的生意。

不错，分开来认识这些东西却对于拆穿资本主义西洋镜有万分的必要。但同时我早已知道，生产物采取商品的头衔招摇过市，在世界上没有今日的市场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有用一头羊换三匹布的事实存在，既然有了这事实，开始了交易，粗一点说，商品老早就有过的，商品内的秘密自然同时发生了。

当我们用手工具的时代，交易比羊换布更发达的时代，也就有过为卖而买的商人，他手上也有过叫作资本的东西，至于那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以前虽未有过，可是，在占有他人劳动力的这一点上，也并不怎样新奇，奴隶不仅被人占有他的劳力，连自己的身体也算作别人的财富，是一种私产。这样说来，这一些新奇的事物，原是老早以前就在旧事物中发生了的。这美丽的姑娘原来就是那丑老太婆的小姐呢。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如果把这一切关联扯拢来，就会发生另一种新的关系，由这新的关系再来认识这位美丽的小姐外，她已是一位时代的姑娘，再不是谁家碧玉了啊！

不错，商品是建造资本殿堂的砖石，但它不是象以前的旧建筑一样，偶然用一两块点缀点缀，现在是在这新的建筑中占着支配的地位了。商品在资本主义下，是变成了一般的、经常的、三岁

孩子也不会奇怪的事物，现社会就是一个庞大得令人不能想象大的商品体集的魔物呢！

现在我们仰首望了这魔物是一点用处没有的。商品这小东西其所以会有今日之猖狂，资本主义因此会诞生出来，却有一段很长的故事。不过这故事，在今日不能说它，迟日再说吧！

此刻要交代的是赶紧把以上拆下的各件东西好好排置起来。其实，这些零件并不能单独的存在，它是相互的联系中发生出来的。由劳动生产物变成商品是由于交换。"交换"目前看看是极平常的事，在原始时代"采在手里，吃在口里"那就不然了。要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达，生产量有了多余的时候，才会有偶然多余的东西同人家去交换。光只偶然交换了一点多余的东西也不能是资本主义的。

因为当十四世纪以前，法国的小手工艺家就开了许多小小铺子，在做它的小买卖。那时手工业的师父，自己个人或带了几个学徒，在生产着某种货物，虽然数量不多，也自然可算作商品，供给市场上的需要。这情形，在我们今日的中国，仍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比较是看得更清楚。那时如果有一个大野心的皮匠要梦想制造今日这样多的"拔佳"皮靴，人家一定说他发了狂。这是因为生产工具今昔完全不同了的原故。要有了现代的巨大迅速的机器，才能使这梦想实现。

单是有了这种好的现代机器，如果人与人间仍象原始时代一样的亲睦，机器变成了人类的奴隶，虽然能替我们生产出和空气一样多的东西，但也决不能有资本主义的商品这东西出现，自然不能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另有一部分人取得了一切生产的工具。

譬如，工厂、土地、矿山、铁道等等。另一部分人呢？再不许他们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了，他们一时失了生存的依靠，只好到城里，有生产工具的工厂内去做工。这就是说，伴着生产工具被人独占的侧边，一定有失去原来的生产工具的人，即劳动力从此与生产手段分离了。同时，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下，不单是生产物变成了商品，连劳动力也变成商品了。

这样的互相依存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才告成立。如果我们走进这生产圈去，我们登时看见以上拆下的机件，原来都在巧妙的运转，一个齿轮正套着一个齿轮，刚刚恰相配合。这与我们祖先那种以耕种为正业，随便做点小手工艺的生产圈完全两样了。以前开一个小小店铺，生产要顾前顾后，现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管它妈的，自由竞争啊！在同行中，在老板与老板间是谁的气魄大，谁就压倒谁。市场上是变成了无政府的状态，完全让自然法则去碰命，谁也不能有百分之百把握会赚钱或亏本。这里就埋藏了生产的社会性质和占有之资本主义形态间的矛盾了。

在这生产圈内，那些衣服破烂只会运转机器，或站在机器旁边加油的污秽的人群，一天天变成了社会中的大多数。在机器旁边，他们受了机器生产所给与的洗礼，他们认清了彼此的地位了。

由于生产的不合理，而发生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矛盾。由此再扩充的看社会其他的各方面，亦无不如此。不过，这不过是这西洋镜的零件合拢起来最简单最粗略的轮廓，至于我们眼前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这般简单的。这马上我们就要谈到的那獠牙血面的帝国主义哟！且让下回分解吧！

仅有小聪明造表

我们曾经把考究我们现代的社会经济底结构，比作拆穿西洋镜；同时还用过一个修表的穿插，说明我如何一件一件的拆散来看，又如何一件一件重新装置归原，说得头头是道，好象我自己就是一个造西洋镜、造表的人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譬喻，为要说明这个名叫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各种要素，相互间是如何的连系，如何的配合，在研究时，为了方便起见，先应从各方面看，所以首先把它分开，随后又应把它合拢。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构造真的同机械一样，有个什么样的人，在预先就同造表一样，把各种要素配合得那么精巧、机械，可以分开，可以合拢。

如果不从研究方法着眼，专就一个表的构造与资本主义的构造打一个比，人类这东西可以说仅仅有点小聪明造表，造社会的本事还不够，这是怎样说的呢？

就是人类造表时是有一定的计划，按照一定的物理的、机械的法则，一个齿轮与一个螺钉，到处都是很合理的配合的，用材非常经济，相互并无矛盾。人类造社会在过去可不能这样的有计划。原始自足的时代，那种打伙生产，打伙吃饭，虽然颇可说一句有计划，可是那是粗劣得很，幼稚得很，并不经济，打伙与自足的生活一过去，于是你种田，我织布，他养羊，各弄各的，各走

极端，其间一点没有商量，并不知道要把多少人种田，把多少人织布，把多少人养羊，一切都不管，让大家到一个市场上去交易去，让它自然的去碰运气。

田种得不够，让一部分人去饿死；布织得不够，让一部分人去冻死，这些事，谁管得着呢！

不过，在两百年以前，虽然人们白费了许多精力，做了许多傻事，可是那时到底大部分的人在耕田，就是织点布，养几头羊，也还是为着自己的需要，并不敢大量的生产。所以虽然无计划，也还没有闹出今日的大乱子，傻到象今日资本主义这般浪费呢！

资本主义这一两百年来的光华灿烂的文明，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但是你知道，这些文明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构造，乍看好象比一个表还要复杂、精致、合理。其实，它的构造到处都是漏洞、矛盾。不独不象造表一样精心，并且无计划，完全是儿戏，浪费物力。这些弱点就造成将来致自己的死命。现在我们且就它的主要的荒唐提出三言两句来说说吧！

是的，现代人是比古人聪明多多了，但对于自己所造成的今日的社会，却也实在愚蠢到不敢恭维。

我首先找一个最大的矛盾给你看。你说蠢不蠢，人类发明了机器，本来就可从此享福了，让这只不吃饭的奴隶去作事，自己落得大家和和气气过日子。机器发明了，机器把生产工具由个人的集在一起变成社会的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人类却不这样，竟让这摇钱树被极少数的人拿了去，作成个人的所有物。生产的东西固然可以养活社会，但个人却把它抱在怀中，死不肯放，弄得忙的忙过死，穷的穷过死，闲的闲得发愁，阔的阔得死人。把人类的感情弄得更糟了，彼此红脸对白脸，把历史涂得伤

心惨目，一千年以后的人，读了今日人类彼此的恩怨记，不要笑煞我们么？这是最大的不合理，说一句不好懂的科学话，这叫做“生产之社会性质，和占有之资本主义形态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由此矛盾而生出的傻事就多着呢！不独以上的矛盾永久不能调和，即同是握有生产工具的老板间，你也以为一定是和和气气的么？那才不是呢！他们除了对仆人板起那同一样的牛肉脸外，他们各造各的东西，大家喊着自由，你碰我，我碰你，你吃我，我吃你，你要发财，我就倒霉，反过来，你倒霉，却正是我的走红。你以为今日的福特先生，果真是象他的照片一样和善么？不见得。他的财产除开是他的雇用人替他创造的外，同时还牺牲无数的同业而后才有今日。这些老板集团间，狮子滚绣球似的，两百年来的竞争，好象大鱼吃小鱼，不知牺牲多少小鱼，但是大鱼与大鱼间的私利也就越发不能调和了，而在外表上却变为是“国”与“民族”的相争，这种恩怨，也是闹到山翻海覆，到死方能罢休的。不然，也就没有今日的戏看了。

有了生产工具，巨大的生产起来，固然可以发财，但造出来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与否，那只有天晓得。无计划的生产，完全不知道社会的需要，只是听天由命的让市场上自然的法则去碰命。所以资本主义总不免一时繁荣一下，等不到好久又要恐慌一次，一次恐慌，就加深一次矛盾，扩大一次矛盾。不弄到自己毁灭自己不止。

大鱼吃了小鱼，产业的规模就更大了。采用最新式的机器，更合理的管理了。这里就发生两种致命伤，使你没有法子解决。第一是本钱花在机器上的大了，人工减少，能够赚的利钱就逐渐

减少。这是一种不利。但这不过不利而已，少赚一点罢了。在另一方面，因为人越穷了，不能没有法子安插许多各方面破产的人，而且自已工厂也在减少人手呢。这种多余的气力(劳动力)，本来是有用的，现在排斥在街头，与垃圾一般，形成了长蛇阵，等你们开厂的人养活呢！你说不养他们又怎样？不能的，因为劳动力虽然是商品，但同时是活人呀！狗饿极了也会想法子乱咬的，何况人呢！

这病象现在是一天天看得明显了，今天不能说它。话分两头，现在要回到的是过去人类在大的方面的愚蠢。真是可悲可笑，人总是不受苦不知道留心的。回想当日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受饥受冻又哪里有以后的努力呢？几千年来不能够大家计划过日子，闹了这一段大错，在历史上占去不少的页数，真冤枉。不过，这几千年所做的傻事，渐渐使人清醒回头，有了现在的经验和伟大的生产力，再来打算打算过有计划的日子，也还不差。这话以后再表，紧接着我们要谈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正委屈在它的膝下的那只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

常百万的故事

幼小时，每听到家人说起常百万的故事，就张着小耳，睁着大眼在出奇，总是越听越有趣味，好象听《西游记》似的。常百万是谁呢？我到如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常，是当时我们县里最阔的财主，有百万的家产。

百万是多少呢？那时我也自然弄不明白，只晓是多，比任何人都多的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外祖父，百万到底是多少呢？他也好象不能回答实在是多少，他只说，有了百万就可"万事不求人"了。他又告诉了我，常百万这样的人，县里并没有好几个。我除了听了这些话之外，我还晓得的就是常百万有很多的田地、山场，镇上开有肉店、布店、酱园、砻坊，河里还有数十号帆船。他与官府有往来，新知县大老爷到任，就得首先下驾拜访他，他却不亲自回拜，只派儿子去答礼，如此这般势耀之类的事。

这故事近来是不大被人提及了。

现在的孩子张着小耳，睁着大眼在倾听的故事不再是常百万了。因为故乡的阔人辈出，百万已不是大不了的数目了。我又记得，有一年我从北京回家，十一岁的春妹就要我讲摩尔根的故事给她听，是的，现在支配世人心目的人物已经换了摩尔根、福特、三井这类名字了。

我当时是如何回答春妹的呢？我记得，我是十分狼狈的。因为要形容摩尔根这类阔人是不能拿百万千万，或田地、山场、肉店、布店去说明的。如果要举出摩尔根投下资本的事业的数字出来，不独会吓坏人家的孩子，就是自己也记不清楚，所以我也学了二十年前外祖父对付我的那一套方法，对她说了下面的一个故事：

"在美国的纽约，摩尔根办了一个大学，他自己是终身董事，他的养子，管家人，他的银行家也都当着董事。校长又是摩尔根的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他与摩尔根的牧师，摩尔根的医生，摩尔根的报纸都互相结托着。如果这位大学校长著了一本书，去教育美国国民，劝他们成为摩尔根的善良而又温顺的被雇用的人，那末，这本书就一定由摩尔根的印刷所出版，用摩尔根的国际纸公司的纸张。这个制造纸的都市就有摩尔根银行的地方分行，这分行中的一个董事，就是当地的教育局长，全部的视学员都是从摩尔根大学出身的人。教育局长、部员、视学、教员都加入了摩尔根人寿保险公司，学校教科书，也都是采用摩尔根大学师范部长所著的书。这些书就有摩尔根大学创办的教育杂志，摩尔根日报去称赞它。如果摩尔根当着理事的那个共和党，要把一个摩尔根的管家推荐为美国副大总统的候选人。于是就有摩尔根牧师向他祝福，摩尔根的新闻向他宣传，摩尔根的灌音公司忙着灌出这候选人演说的留声机片，摩尔根大学生忙着开同乐会，大家兴高采烈的喝着摩尔根饮料公司的柠檬水……"

"哟哟！吓死我了，摩尔根是个什么怪物呢？"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春妹是如此反诘我。

"你觉得奇怪吧！这不过就他在美国教育方面举出一个小

例子啊！他那里只有这点势派呢！因为太说大了你会不相信，所以只拣小的讲点你听。这就是今日世界的'常百万'呢！"

"我听见先生说，摩尔根是美国财阀的领袖，但不知他到底阔到怎样，照你刚才说来，美国简直是他个人的了，这还了得！"

"这话实在一点不假，今日的美国是世界上最阔的国家，全国的经济都操在五个大公司手里。这些公司的大老板象摩尔根先生这样出色的人物也就数不出多少个呢！在一九一二年末，美国财富就集中在一百多个金融大王手里，管理五百亿金元。现在这类大老板的集团的人数也就一天天的越发减少了，集中的财富当然还要超过这个巨大的数目。他们不独掌握了美国国民经济生活上最最重要的各种经济部门，它还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人的命运呢！"

我记得当时我还画了一张地图给她，说明由纽约华尔街（金融中心）这类巨头如何的把资本投到北、中、南三美洲去；如何的侵入欧洲；如何的又将他们的巨爪伸入远东的中国。我又告诉了她，这不独美国如此，老牌的英、德也无不一样，现在连东邻的小朋友日本也出了三井、三菱这类的东方摩尔根了。

这是新时代的阔人的故事。这些阔人现在不叫做财主，他们叫做金融资本家了。现在世界上真正的统治者不是别人，却是这四五百个摩尔根、三井先生之类的巨人了。这时代就被人称作金融资本时代。

这些巨灵是如何诞生的呢？我们回头望望，前面是有过交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洋镜，从英国出现的那次破天荒的产业革命后，世界就一天天变得万花缭乱了。占有了生产工具的人们，首先开工厂发财，狮子滚绣球的，有的越滚越大，有的被别

人兼并了。大鱼吃小鱼，大鱼大到无秤可称了。于是工厂老板同时开银行，银行老板兼而开工厂，把工厂扩大成了魔物，什么托拉斯、加尔特尔、辛狄克这些怪物就出现了。

是的，这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银行资本一部一部汇合起来，世间无水不东流，结果就都集中到这金融的大海了。并没有什么可怪的地方呀！

不过，到了今日世界的财富既然这样集中起来，资本先生的把戏也就快玩完了。这就是那些教书先生说的什么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尽头的一类的话头啊！

在常百万的故事中，我们听见了许多势派的排场，好不威风的气概，在那个时代里如何的成了时代的最崇拜的人物，我到现在还未忘记尽呢？但是，今日世界上的常百万的新的势派的排场又怎样呢？是的，这是有趣味的故事啊！上面举出的那一段还不是正文呀！好的在后面呢，下次再说吧！

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虫”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谈虎色变。我们在听《水浒》时，一听到武松打虎，我们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呢！虎是一个吃人的大虫，在古时确是人类的仇敌，它不知伤害了我们多少兄弟。不过，现在人类早征服它了。它虽性猛，人却能把它教成驯良了，它也可以同猴子一起玩起把戏来。现在，在文字中所用的“谈虎色变”，与“洪水猛兽”一样，不过是一个典故了。我们不仅谈虎不会色变，我们还敢到动物园去观赏这只大虫呢！

但是，现在世界上另有一只“大虫”，确是人类当前的大敌，它伤害今日的人类，为任何猛兽所未有，现在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都血斑斑的卧在它的巨爪下面了。这只“大虫”是谁呢？它不是一只真的具有血肉的兽，而是一种制度，它的乳名，我们已说过多次了，是资本主义，现在的大名，却就是我们天天喊的帝国主义那东西。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这已被人说得烂熟了。但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它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呢？今日的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已领教过多多了。这里要表出的却不是一件一件的我们的血的记忆，而是这只“大虫”为什么伤害人类的所以然了。

请诸位回忆一下，我这十多次的讲话中，到现在，刚刚可以

算一个段落，就是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作了一回骨骼的提示了。现代社会经济构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几个比你我聪明的人，从头脑里想出来的，它是过去人类社会经济构造的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从封建经济的母胎中长出的。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呢？

我们从商品谈起一步一步谈得不少了。资本主义从生到现在也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到上次谈话时，你们不是忽然听了一回今日的常百万的故事吗！这是一段需要的穿插。资本主义一天天成长，到它发现了世界上只归几个摩尔根之类的人们管理时，那也就是它的发展到了尽头时的最后形式了。所谓帝国主义呢？说一句笼统的话，它就是金融资本时代的一种政策。

诸君！请你记住：为富是不能仁的。我们家乡的常百万的生财之道，主要的是取之于农民，今日金融资本家生财之道，主要的是取之于劳动者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众的。不过，无论是常百万或摩尔根个人，我们对他们虽然不能相谅，但也决不是对人的。因为造成他们这类肥人到底是一种制度，不是他个人长得肥，比我们会想事的。所以，以下我们要详表的就不是这些先生的"起居注"了。

话说回来，我们要抓住的是这只"大虫"的骨骼。这可以从几方面说的。

我们先从"狮子滚绣球"、"大鱼吃小鱼"说起。这就是说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资本家之间大家尊重的是各弄各的，互不相干，叫做自由竞争；但是既然有了竞争，小资本总要吃亏的，这无用细说。在市场上，马上现出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费多大气力，大的越长越大起来，小的渐渐的不见了。

于是生产集中了，资本自然也集中了，由是而由竞争渐渐走到只有少数人的独占、专利了。这种专利的对面，是中小资本破产，无产的人就变得更穷酸，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构造的第一根骨头。

其次，工厂老板同时开银行，银行老板兼而营工厂、挖矿山，愈兼愈广，这一来，就替荷包里有钱的人更开了一条发财之路，世界上就造出摩尔根这类金人了。财神菩萨是最受人尊敬的，他也偏偏爱管人间大小一切公私的事。这里横竖吃过它的亏的人不少，不用详说。

我们要详说的是这只兽的第三根骨头。即帝国主义时代，不仅开工厂的人要把制造品运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去兜卖，同时还把资本移植到别国去。我们常常喊抵制洋货，这还只看到洋货倾销的害处，至于外国资本的害处，大家还不易看出。这很容易了解，放账是最有利息的，借了人家的钱，除了要付大的利息外，自己也就无形中比人小三分了。我们天天看见，个人欠账不能还钱，自己的女儿就不免要被债主拿来抵账，家内的器物更有被人拿去拍卖的危险。国家的借债也是一样，弱小一点的国家，它会受人的挟制，规定特殊的通商条约，攫取抵押品，干涉内政。这一切，我们似乎都很内行，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受人经济压迫的。不仅如此，中国国土以内，更还设有外国工厂，河里的轮船，天空的航空，陆上的铁道也多是与外人合办的。中国经济上受人榨取，那真是说不胜说呢！这一项与我们最有切肤之痛。

再其次，就要说到这些世界巨人争夺世界市场了。生产的东西多了，光光是国内，实在容纳不下。资本的积累过多了，也是要找新的投放地的。于是世界舞台上就发现了一团代表各种

民族或国家的巨人，指手画脚在计划如何的分割世界。大概在比较清平时，他们也手拉手的现出了几分亲热，彼此商议用和平一点的方法来分割弱小国家；一到分赃不匀，彼此利害十分对立时，就各自拿国家来自卫。一面用外交官的舌，一面用八寸口径的炮，几十年总要拚一次谁高过谁。一九一四年的大战，就是为争这些市场发生的。

最后，可惜得很。今日的地球已被这些巨人分光了。这不晓得是地球本来太小了，还是帝国主义这怪兽的魔力太大了？今日世界上的空地已被列强分尽了，如果再要分的话，除非把一九一八年分好的，又再来一次分配，再没有别的方法了。

是的，这一些都是资本主义必然达到的前途，并不足为怪。而帝国主义本身的矛盾也已决定了它的寿命了。现在全世界的经济的恐慌，政治的危机，社会的骚动，弱小民族的反抗，劳动大众之醒悟，已弄得许多世界的巨人寝食不安。

造成这种世界不安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必然的结果。这只大虫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但它现在已尽过了时代的使命了。这只大虫虽然比一只普通老虎来得凶恶，但今日人类已学会了的本事比武松还高。在今日社会生活的不安，不稳，无衣无食的状况里，人们自会团结起来，把这只大虫捉到笼子里去的。现在一切的条件渐渐的备具了，中华民族在这个转变中说不定是可以大出一次风头的呢。不过，最后诸位不要忘记，这只大虫目下还未捉进笼里去呢！它还有吃人的力量呀！我们应如何的走上景阳岗去？

从离地较近的谈起

"街头讲话"讲到了今日，据《大晚报》的批评，我们这里"常常揭发了很多的神秘的事情"，其实，并不真的是神秘，不过极平常的小事，往常没有人仔细的去追问，一旦挖树要盘根，就有点觉得神秘罢了。

譬如最近开明书店出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我就几乎有一大半问题不能答出。其实，一说出来又都是我早就知道了的。这就是同一样的道理。天下事，每每有些奇怪，有同一个道理，在大学讲堂上用难解的辞句说出来，就常被人尊重；在街头用粗糙的言词说出来，就不能认作道理，这是颇不公平的。街头讲话，虽是从针鼻孔里去窥天，但并不只看见针鼻孔那么大的一块天，我们是能看见天的全体的。

好了，以上说明了人类社会最最基本的部分，用起房子打比喻，就是把社会经济基础的部分，在一些极平常的小事中说过了。话虽说得不高明，并且太挂一漏万了，这一点要求听官们见谅，这是因为大家生活的忙促，街头到底不比学堂，不容我们高谈阔论的，只得简单些。还有呢，就是所谓"经济"这东西不大好懂的，我不敢天天来同诸位瞎缠，弄得大家无生无气。我要书场能热闹一点，我只得拣有趣味的多说，所以就在十来次中，草草的把大学堂要讲几年的东西，三言两句的就算说完了。

以下呢，我再用造房子比喻说，现在要讲的是地基上的建筑了。自然，当我说明这些上层建筑时，有时也还将涉及地基的，所以诸君尽管安心，就是以前听了我的话，还是不明不白的，也不打紧，以后婆婆妈妈，噜哩噜苏的地方还多着呢！

闲言少叙，书接上回。却说现代社会这一栋大建筑，比起上海邮政总局来真不知要大到好多倍，上海人跑到邮政局，要寻着汇兑处都不很容易，我们要谈什么上层建筑，这巨大的东西，我们从什么地方谈起呢？哈哈，我们姑且碰碰运气，从离地较近的政治来谈起罢！

一提到政治，诸君切不要慌张，以为这是大道理，不做官的人就不配谈，不能谈，不应谈，不敢谈的。我知道，诸君中一定有人反问我：“早几年前，中国许多做督军省长的人，在通电里都不是说过，‘我们是武人，不懂政治’的么？连督军不懂的东西，咱们街头人难道倒能懂得么？”哈哈！这可算是一句老话了，现在已不能适用，北伐以来，不是连军队中都设有什么政治部么？是教人民懂政治呀！也许你们还听了许多高人雅士说，“我们不管政治，政治与我没有多大兴趣”，这也是一句傻话。这类的高人雅士，以前在东三省就不少，他们现在换了一位大老板，弄得到处流血，鸡犬不安，子女为奴，生死不得，你不管政治，政治与你“没有多大兴趣”，那是无关的，但政治要管你，它对你却有兴趣，它现在却弄得你哭笑不得，生死不得，你怎么样呢？这样说来，可见得谈政治是不必一定要具有一种什么资格的，并且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的，你总不能不过问，一过问就多少要谈起来啊！

好的，你也许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会这样反问我：“谈就谈吧！你说了这半天，到底政治是一个啥东西呀！”朋友！万勿性

急，我如果象大学堂里一样的来解释这两个字，那用着五分钟就够了，不过那与诸君会完全无关痛痒啊！听了倒不如不听，要说得不同一点，又不容易；不过，我也可以先交代一句，它并没有啥神秘，只要我一说出来，你们就会大喝道："这些道理我是天天都在领教的！不过不象你们这些读书的人能说得这般的有条有理罢了！"

我是惯会从针鼻孔去窥世界的。还是先从手头的事情来说起吧！诸位大概都是来自田间不久的人，在我们乡村里，我知道，政治这两个字，连穿长衫的人都不轻易说出口的，但乡间并不是就没有政治，连农夫村妇也不是不懂政治，他们都在一种政治下生活着，也常常在田事忙了，冬天在火炉旁，夏天在天空下围在一起扯着乱谈，但那乱谈大半就是乡村的政治的谈话。

"金七长子到底枪毙了，我们地方上好多的人虽想救他一命，可是何局长(团防局)不肯，说他总不该同别人一起去抢米。"

"他只抢了七升米呢！何局长真心狠。"

"据说也不是何局长心狠，到是上头(即县里)的命令。"

"据说又在拉夫了，明天可不能上镇！"

"上镇去不上镇去！王排甲已到过这里了。我们这一村摊派六个人去。"

"要车水呢！稻子快要干死了，我又不能去！"

"那也由不得你哟！"

"李云生的娘这次死得太惨了，想不到辛苦了一世，七

个儿子都养大了，死了连板都买不起！”

“这也只怪得现在的日子太不是的了。有了儿子也没用了，李云生的兄弟也没有懒过，一年的收成不够纳税，这怪的谁呢？”

“他的钱借了没有呢？”

“那里，章四先生的印子钱是大一分，还要把云生的十四岁的女儿毛丫头去抵押。‘借了没有’！说得这样好容易！”

以上这些谈话不是在中国每一个乡村的草屋内都可以听到的吗？这些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了乡村中某一部分人，在管理另一部分人。没有饭吃要抢米就设有什么局，局长就要抓住你，枪毙你。受枪毙的又是一些什么人。有枪的人常常要打仗，要拉夫，被拉的又是一些什么人。辛苦一年，七个兄弟不能好好的替娘买三块板，弄得卖女儿还借不到大一分的印子钱，但同时另外有收租、放印子钱的人。

我们又看到，虽然是那般荒凉的乡村，却设有团防局、烟酒公卖局，这些小衙门，也有局长、绅士、团总、排甲等等大小官员。他们管理了一乡辛勤的人们。这些大小官员天天在那里“公事公办”的，他们确实不都是坏人，他们确也是在“替天行道”，替某一种政治制度在“行道”。

这例子已够明白了，它说明了那些谈话就是政治谈话。乡村那些小局就是小朝廷，那些局，枪，和局长、绅士、团丁等合起来就是一个起码的小政府，就是一种“强制机关”的小单位、小细胞。政治就是这些机关治理众人的事。把这无数的小细胞结合成一巨大的魔物时，就变得更复杂了，在大学堂里，把这魔物作成了一种专门科来研究，就叫做什么政治学。但是自有人类以

来，我们乡下就是如此的么？这些小细胞结成的魔物有一些什么秘密呢？这以后的话长，且待下回分解吧。

由“国际大饭店”说起

从国际大饭店回到家后，小苹就一五一十的对她母亲说，国际大饭店是一座如何高大得怕人的建筑，一席话又引起她祖母的说古了。

她从故乡草屋，山峰式的瓦屋，北京的宫殿，西藏的庙宇，目前住的小小洋房，先施、永安大楼，一直说到这二十二层的国际大饭店，如数家珍般的，说了各式各样的建筑，令人羡慕她的盐米到底吃得不少。她说，她活了六十多岁，在上海也住上了二十年，象这样高的建筑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由这饭店的高大，又扯到地基上来了。这位老太太又向大家说了一套什么样的房子要打什么样的地基，不然房子就不牢。她说房子总要与地基配合。这样大的房子，难怪它的地基要用那样粗大坚硬的树木，深深的打入土内呢！要是只建造七层洋房，自然地基也不必要那样坚固的。她说完后，大家也都叹服。

她这番话，使我想到现在我要谈的社会的建筑了。我记得在上一回的谈话里已吩咐过这样的一句，我们先从离地基最近的一种建筑开始，那就是名叫“政治”的。如果说国际大饭店这般的建筑是世界目前一般的建筑的话，那末，现在世界的政治建筑最一般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是的，就房子说，在今日的世界，洋房总算是最典型的了，但

它仍然是各式各样的，并不完全相同，那末在政治建筑方面是否也是一样的复杂呢？上海人今日看了国际大饭店觉得有点新奇，是中国房子老式的仍占着多数，所以乍看有点看不惯，但是，世界政治最一般的形态，自然就是所谓代议制、独裁制吧！世界的房子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可以说出世界政治也能说出各式各样的，象那位老太太一样么？我们在建筑学中，知道世界的房子的样子天天是在变动的，在改进的，房子造得象国际大饭店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变动，但是这样还不是最后的形式呀！在世界政治方面呢，这种变动可能说得出么？

这一些问题，我现在简单的说一句，我们都要把它好好的向诸位交代。但是，诸位不要只记得那位老太太说房子谈得有趣，也还应留心她说到的房子与地基的关系呀！这譬如真正打得巧妙，政治这样建筑也要与社会的基础是一致的。社会的基础就是经济关系，这老早我们就知道的。这种一致，犹如鸟雀身上只长一对翅膀，水牛头上一定要生一对长角似的，换过来，水牛身上长出一对翅膀，鸟头上长一对长角，那还能成么？

我们既然在房子的建筑中了解了什么建筑是打什么地基，工程师可以一种一种的背给你听；但是在政治制度（即政治建筑）方面呢？不错，政治学者也能告诉我们，人类从古到今，有过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代议制度，各种政治的建筑。如果我们从上面往下挖掘地基时，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在某种经济关系上，才能长出某种政治制度。现代的代议制度，不能建筑在封建经济的地基上，奴隶制度也不能早在氏族制度兴盛时发现。这几句话内里是藏着许多话的，等我有机会时再一一补说吧！

现在要问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到底是什么呢？有

人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注意呀！管理要是"人的事"，不是"人"，才是最高的理想。但是目前的政治都还没有做到这样，现在还是人管人的东西。

我们再来翻古吧！如果管理社会或管理人的，一定要用政治方法，那应该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现在这样政治了，人类也永远要有这样一种的政治了。其实管理社会，管理人，并不一定需要用政治的方法。以前在原始社会，只有直接的经济行为，并无政治，政治这东西，是可以追出它出生的辰光的。我们问什么时光人类才建造房子呢？据中国的传说是有巢氏始。什么辰光人类社会才有政治这种建筑呢？政治学者告诉我们，要社会上发生了不平等的现象以后，人与人间不能象以前一样打伙儿过活了，感情上失了和谐，就需要一种东西去协调它。这种东西，自然带有强制作用，由这个作用运用就成立了一种政治的系统。

自此戏剧开幕以后，台上的现象多着呢！国家、政府、政党、战争以及千千万万的现象都出现了。这些现象说来话长，是要个别表出的。

是的，政治是经济现象的集中表现，谁在这方面占有上风的人，谁就在政治上也就是最出风头的。所以政治上表现的不觉带着强制性，这道理浅显易明，我们只要看在今日世界政治上活动的人，谁不是很势派的肥头大老官呢！我们再回顾我们的社会一下，中国乡村统治的是些什么人？不是土豪劣绅吗？这秘密不必多说，横竖我们吃的亏总已是多过他人的，不是领教的很多了吗？

这样看来，所谓政治这样东西，只是人类社会史上，有了不平等的现象，才需要它的。以前没有过它，人类也能好好过生

活，以后呢，如果人类都能够平等了，自然，经济的管理，直接就会是社会的管理，社会各种组织的管理，都变为技术的管理，事物的管理，再也不是管理人的东西了。到那时，这种人对人的恶剧，也当然用不着了。

说到这里，我们回顾以上所用的比喻，我们知道，人类造房子是为了免除全人类风雨之苦，式样虽然因时代不同，房子总是永久存在的；至于政治这种建筑却是庇护一部分人的“风雨”的，所以它的存在没有房子一样的永久。然而它的复杂多样性是甚过房子的。

所以人类社会的政治基础，比那位老太太说的国际大饭店的地基，是更令人值得注意的。

三大悲剧

“人生好比作戏”，这是倒了霉不想活了的人说出的话，我们不能赞成。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生活的，挺起身子在尝着甜酸苦辣，不是装给别人看。至若说，政治好比作戏，那倒有一些相象了。

戏无论如何做到挺真，总还是假的。诸葛亮虽然装得挺象，那也不过是说戏，谁又真的看过诸葛亮。女京戏班子，最怕人上后台去窥视，因为在台前现身的天女，也许退装后，会现出满脸的大麻子来。台前台后，实在是完全不相同的。演员在台前越做的象戏中人，就是他真会做假，假做到了家。梅兰芳明明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上装就变得娇滴滴的仙女了。自古以来，政治上的名角色也莫不如此。不同的是演员玩的把戏是对看客，政治家玩的把戏是对全国的人民，各人手法的高低、大小的不同罢了。

爱拆西洋镜的人，他看完了台前戏，他还要上后台，听完了某一政党领袖的公开演说后，他还要想法子打听这位政党领袖的大老板是谁，并且偷到那位老板的秘密会客室去窥听他们事前的密议。于是，天下事只怕不做，一做就是你的老子娘偷人，结果也是会被人知道内幕的。更何况演员是有班有派的，做官也不过是傀儡戏，另有牵线的人。这样一来，不同的班派，不同

的牵线人之间的不和竞争，就好象“鞋子店里失火”，你揎我，我揎你，弄得丑声外扬，于是做假还归做假，真相终是要大白的。一旦外幕揭穿，傻子变成明白的一天，政治这种剧目就要更换了。于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演成了人类的政治的史剧。

在过去人类历史中，这种叫做政治的戏演过一些什么剧目呢？前回已经交代过，它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生活保持着同一的步调，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生活，才能唱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的戏来的。这不难按着经济生活的发展一代一代去回顾了。

人类踏上历史的时代，就是大家打伙儿过日子过得已经颇象样儿的时代，那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人与人间吃亏占便宜的现象还不会发生。所以在简单的生产中，只有极简单的怎样处置如何共同行猎，如何采取果食及一些幼稚的计划，“怎样管理人”的事还未曾想到了。有人虽然就把这种简单的处置事物，叫做最原始的政治，并叫它做“直接民权制度”，其实，真正的政治是还没有存在的。那时没有政府，没有政治制度，也没有所谓政权。一切的强制都不曾存在，人与人间并不需要玩一套你欺我骗的把戏的。

人类政治序幕一开始，演的是什么拿手好戏呢？那就是叫做奴隶制度的。奴隶制度在今日我们这些文明人看来，好象极不人道似的，我们的祖宗居然过过这一段时代，岂不是不大名誉么？其实，不然，人类由打伙儿生活变为奴隶制度，在生产上是演了一大革命，一大进步。因为生产上的进步起了分业，牧畜、农业、家内原始手工业也有了发展，这时人类的一天的劳动，能产出维持一天生活必要以上的东西，这一来造成了人的劳动力

有产生剩余的可能，于是发生了奴隶制度。奴隶是怎样发生的呢?它首先是发生在部落战争中。以前对于战争的俘虏是一律杀戮的，这时就把他们用之于耕作、森林、开垦的场地了。这时人与人间就分化为主人与奴隶了。这些作主人的人，这时虽然不必自己从事劳动，却不能不想方法来管理这些奴隶。因为奴隶同一样是人，比起其他动物来是难对付的。

所以在最古的希腊的雅典国家，就发明了一套管理的好方法，产生了什么议会、军队等组织。这时因为需要强制，所以设许多机关，要许多人来办公，这就是所谓政治了。在雅典最盛的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不过九万人(连小孩妇女全在内，成年男子不过两万人)，而男女奴隶却有三十六万五千人，被保护民(外来移民与释放的奴隶)为四万五千人。平均每个成年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替他们劳动，这就可见没有上面许多方法和机关是管不了他们的。

到罗马时代，奴隶制度就比希腊时代更进一步了。罗马市民只管政治，上层社会的物质生活全归奴隶供养，甚至于精神生活方面，在文学、音乐、美术，也多赖奴隶中的学者与艺术家来贡献。而罗马市民报答这些奴隶的是政治的虐待。他们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他们是能言的牲畜，在人类感情上说来，确要起一种不快之感。所以，政治的开幕剧，就是演了一出悲剧，以自由民与奴隶为其主要角色，政治这两个字，从此就染有一些人类的血迹了。

接着第二幕也仍然是悲剧，它的剧名叫做封建制度，虽然如此，它却依然是人类生产上演了一次革命，是生产力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农业经济强化的时代。这一幕戏是这样唱起来的：一方

面是掠夺耕地的军事飘泊的酋长支配权力绝对的强化，一面是农业本位的经济制度的固立，在政治上就需要一套封建的政治制度。这幕悲剧的主要角色却又编列成为一种楼梯式的等级了。在上的是贵族，贵族的头儿自然是王、皇帝，以下一层一层往下降，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都由王或皇帝这大老头儿手里得了一块土地了。每一个小老头儿又在自己这块小土内做土皇帝，做农奴、士、农、工、商的元首了。所以王或皇帝就是一个大地主儿。他以前或者是一个身体顶挺干的人，带了许多喽啰，以武力掠得了许多土地了。因为当时生产技术还没有梦想到用机器耕种，所以就一块一块的分给自己家庭里的子弟，就是贵族或是有战功的臣仆了。同时，军事领袖之外又形成了僧侣和儒士这一种人，去替战争终结后管理下层的人民，所以他们也是封建统治中一种最重要的角色。这以下有脱离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最最底下是农奴。这一种政治的装置，乍看起来自然是复杂极了，但仔细一看也简单得很，不过压迫的形式是采取一种金字塔式叠着罢了。主要被榨取的对象是农奴或农民，他们的血汗造了中世纪的黑暗的文明。

这个制度在中国到如今也还留有它的一些残余。中国内地如四川就有不少的捐税还是封建时代的，北方还有一些地方也还保有力役及许多的现物的封建征发。至于讲到以前中国做官的人的不讲法律，“我就是法律！”杀一个人算不了什么鸟事，那都是封建政治的特色。

我不想再搬古了。以下详细说的是接着这幕悲剧后，人类政治上第三幕更大的悲剧，那就是在欧洲闹了一二百年的现代政治。那种新式的“管理人”的残酷的悲剧哟！

总算是进了一步

恭贺诸位新禧！新的年头希望诸位有新的思想，新的生活！但是，在我们的书场上说来说去，总免不了是些诸葛亮的人物，三讨荆州的旧话。好“新”总是人的常情，为什么我还要来说旧话？就是凡事总有一个来历，要知道当前的新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总是由旧的长出来。如花美貌的小姐，她是那丑老太婆的女儿，要知道这位小姐的性情、嗜好，总还不能完全忽视她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这一点吧！不过听故事的人，自然爱的是小姐的罗曼斯，不愿多听老太婆过去的恋史，这是有理由的，这是一种现实思想，不能反对，所以本场去年年底的说书，就把人类几千年来玩的那一出叫做政治的傀儡戏，七扯八拉的说了一顿，对于过去的只就我们需要知道的，提一提就得了，要注意的还是现代。所以今年的开场白，就从现代政治开始，使诸位听了脑筋中也有一种新的印象，新的启示，进而引诸君去看新的东西（指政治）与新的她（政治）去恋爱、结婚。

闲言不叙，书接上回。我们现在要来细细的读“现代政治”这出名剧的戏考了。是的，我们知道，这是从资本主义经济那一种社会的地基打好后，才正式开演的。在戏考上大概是写着：“近世代议制国家”这一类的戏目的字眼吧！诸君听了这生疏的名词，不要害怕，暂时的让它去，听了正戏，这些名词以后自然会

熟识起来的。不过，这里要交代一句的，凡一出戏到了已经有了戏考，那戏的开演，一定是已经有了一点时间的，我们谈现代政治也是一样。我们虽把她做一个新的东西在新年来谈，其实这一幕戏最早开演的时间是远在十七、十八世纪，自然一直到她又快要收锣的现在止，也还要算在她的范围内。因此，我们谈新，实则还是话旧。

这戏是如何登场的呢？现在说出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明白，她的登场就是说明另外有一种老戏的退场，这一登一退，是人类用血换来的，并不是和和平平、揖让而登而退的呀！现代政治这新的戏剧登场，就是由立宪国家、民主国家代替了封建的专制国家的意思。

在过去，中国有过皇帝，皇帝号称天子，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地财宝都归他所有，他要你死，你就不得不死，所谓“唯我独尊”。在欧洲也有“朕即国家”的话。当时这个皇帝或王的怪物，确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魔鬼，你不能奈他何，当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束缚他，他说的话就是法律，违反了他的喜怒就是犯了法。他说，他是天老爷要他下凡来管理人们的。这一个时候，他这种无法无天的管理人，就是政治。这政治无非是把千千万万的农民或农奴压得驯驯服服，使他们还粮纳税，为各级的主子服役，如此罢了。所以这个时期称为专制时代。

近代代议制的国家出现，首先与专制主义不同的，在口头上是叫做一切人在法律上的平等。自然，这句话也要打一点折扣的，实则受法律平等保障的仍是属于少数人，大多数人仍不过只在纸上获得平等罢了。然而比起封建的专制主义来却有天大

的区别。

为什么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人类突然讲起法律来呢？这也是专制太厉害的一种反动，但这反动发而为一种运动，自然是由于社会生活经济起了变化。当时在农业经济内已孕育了的资本主义的要素，都市农村一天天对立了，许多工商业者变成了资本家。不久，亚美利加被发现了，亚非利加也通航了，还开辟了东印度及中国的市场。于是，更刺激了欧罗巴的生产交换的方法，蒸气与机械被采用了。这时资本家的羽毛长了起来，为了自己的个人的私利，为了生产与贸易的不能自由，为了封建诸侯的无法无天，他们自觉了原来自己本有权利的，不过被人家剥夺了。于是这些资本家就喊出"天赋人权"，说人生下地来，无论贫富都有生存的权利，谁也不能侵犯谁，他们发生了反叛思想。不久又把这反叛思想变成许多伟大的革命，其中最令人永久不能忘记，而又是最标本的是法国的大革命，这里恕我不能闲拉，有工夫的人，请自己去读法国大革命史吧！（神州国光社有一种最好的读本，是克鲁泡德金著的。）

不错，现在是一些商人和工业家登场了。这从台上的老板现在变成一大群人，并且彼此都是以兄弟相见的。不象以前一样，虽然也是一群人，却要把它排成楼梯似的，一层层的，最高只容一个皇帝在上，以下是自己的头把上一层的人坐，自己又坐在下层人的头上，叠这样的一种宝塔。你知道，彼此都称兄道弟，谁也大不过谁，这就只有大家坐着来讲理，自然也需要一套法律来互相规约。不过，这时上了台的工商业家，在台上到底比在台下不同，他登时看出在台上作戏实在也有些说不出的苦处。在台下可以尽量的攻击名角，越有人喝彩，可是在台上就要会做假，

越假自己的地位就越巩固，你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不是诸葛亮而偏要捧他呢？他唱得象，不错，因为他越象就越不是他本人了。

他们知道，在台上及后台的人总是少数，我们工商业家的人数，到底敌不过工农。"现在是咱们做戏把他们看了。说自由、平等、博爱以前是可以大喊特喊的，现在可不同了，注意：声音要放小点！谨防台下人要兑现啊！是的，咱们工商业家自己都是一家人，在我们伙子内自然这样办。自家事慢慢谈，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那些台下人呀！"所以在这些工商业家走上这舞台后，打出了代议制度的招牌来，实际上代议制的国家，仍不过是台上台后一群为它自己的利益，在那里作戏，而叫做公共事务的一种玩意儿。

所以在这代议制的国家下，虽然在统治的形式上有立宪君主国与民主共和国之分，在本质上并不会有什么差异。立宪的君主与共和国的总统，都是工商业家的傀儡。君主现在的权不是归于天授了，是由于某一些有财力的工商业者所赐与，戏，而叫它做这时候的天，就变成大龙洋了。

这样的戏从十七八世纪就在欧洲开幕了。它到现在虽然还在舞台上不断的演，可是，因为后台里的老板们的事业发达的情势不同，那戏的唱法也随着大同小异，而到现在竟是只留了一点形式上的过板之类的东西了。内容则好象时装展览会一样是花样翻新，千奇百出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戏剧与大皇帝时代的来比一比，这总算是进了一步，它虽然还是被少数人所操纵，到底比大皇帝个人为所欲为要强得多，何况它还供给了另一新的戏剧发生、成长的机会和条件呢！有人说，由它展开了近代文明的序幕，在相当的意义

内也不算夸大，这些台上的戏子们却实实在在都尽过一些使命，所演出的东西，有一些，在过去的，也实在是可“喊好”的。不过，前面已经交代过，我们自然不能把它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还应编排更新的，完全不分台上台下的喜剧。

为了这新的喜剧，我们却不可不来研究它，这新的喜剧的母亲。

毁掉那把交椅以后

一谈到看戏，总先得问问是什么班子，有些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戏总是人排演的，主要的还是在人的活动上。政治这种大戏，也自然是人的活动，不过是一个阶级在一种更大的场面上表演的活动罢了。我们前回说过，从十七世纪起，欧洲就发生了许多暴发的工商业家，他们对于那种叠宝塔式(皇帝，公，侯，伯，子，男，士庶，农奴)的封建的老戏生出了厌弃之心了。渐渐的他们领导了无数穷苦的人民，联合拆了一些王朝的金殿，于是旧戏就响了下台锣了。

是的，这在历史上就叫做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一批工商业家取得了这座冷清清空台后，自己继续排演的是什么呢？自然，不再是叠宝塔了。这时候走上台的都是一些东邻西舍的熟人，制袜老板约汉，纺纱老板曼斯，船厂老板马耳，钢铁老板佛特(这些名词都是假设的，实在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行)，其他无数无数老板们。他们挤满了这座平日不能走上的舞台了。大家忘情的在那里称兄道弟的打招呼、握手、吸淡巴菇，商议如何如何维持剧场秩序不乱，使台下人有戏看。

他们看了这许多人在台上七嘴八舌不成话儿，总得有点秩序才好，大家都感觉得，第一，我们不要被台下人轻视。因为他们走上台的辰光，有的耳上夹着的那一枝铅笔并未记得取下，有

的老板甚至手上还带着算盘、发票，这被台下人看见了，会疑心这新的班子只会做生意，不能唱出好的戏剧来的。如何是好！他们中最聪明的人就说："我们赶快到后台去，前台我们犯不着露面的。约汉先生！你就派你的账房留在这里，你老人家简直可以在家里享福，有啥事体解决不了的，就叫剧务主任到贵公馆请教就是。曼斯、马耳先生！你们将令郎们留在这里也就够了，他们都是新的戏剧家，还不会来一手顶呱呱的么？"这时，这位发言人就转问佛特先生道："老板！我们在这里已足代表你老人家了，还是早点回府安息吧！"原来他就是佛特老板的手下人。这样一来，接着声明我留谁代表我，他留谁代表他，又闹过一大回，这才把许多麻烦的交涉交代清楚了。

以后，台上果然看不见耳上还夹着一枝铅笔的怪模怪样的人物了。出现的人物一变而为头发梳得光光，胡须剪得齐齐，颈子挺直，适宜的配上大礼服，手套也是保持得洁白的，再配上黑油油的公文包，黄灿灿的司荻克，个个都有礼貌，人人皆有辩才，你就把诸葛亮从土里挖出来，他也会自知才屈舌短，不能有昔日舌战群儒的威力了。这一批人来到台前，对观众会作出各种各样的媚笑、撒娇、啼哭、发怒，会把死的说出活的来，会引出无数的大道理说明自己是如何的为了大家，如何不是为自己的老板，说许多谎，扯许多白。他总要把台下人弄得昏昏沉沉，痴痴癫癫，他们于是就放手替老板挣下一笔大钱来。至于他们在台后呢，就完全现出本来面目了，他们变成了一群各为着自己的主子的忠诚的奴仆。在那里狗咬狗，你争我夺，连甲倒乙，连乙倒丙；或者用尽鬼蜮伎俩，阴谋，险毒，残酷，陷害，台下无数人的命运就在这里决定。这一切不过为的老板的"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八

个大字。

是的，台前戏的出演固然决定于这后台了，固然由这些穿着礼服的角色扮演了，但我们要知道，这后台的人物，也多是许多老板们留着在这里代表自己的，真正的后台的后台是大老板们自己的公馆、会客室、卧室。这些在台前现身的大人先生们，大事也还不能自主的，所以他们在揭幕之前，更正确点说，在走到后台之前，先不得不到老板的公馆去，或者在会客室密议半天，或者被老板喊到卧室里去，在老板睡榻前，听老板吩咐，一听说不定就费去一个整夜。这里我们就知道，以前唱叠宝塔的戏，虽然大吵大闹，锣鼓喧天，到是比这“平起平坐”简单得多的。那时，这一座宝塔下，虽然是压着无数万的生灵，但是坐在宝塔上的人，确只一个人，他可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宝塔各层的人，也只是留声机似的，上头说什么，他也说什么，他们不敢违背上头的命令。这自然因为构成这宝塔的分子，比起“平起平坐”的代议制，绝对的矛盾虽然也是一样，但相对的矛盾，构成宝塔的分子的土地所有者间与构成代议制的自由生产、自由贩卖的工商业家间，那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前者只要人口不突然增得过大，不遭什么天灾，没有外敌侵入，大皇帝不太“无道”的话，大致上相对的矛盾是极小的，后者老板与老板间彼此利害不同，人人都想利用这政权来掩护、保育自己的产业，打击自己的同业者的竞争，这矛盾只有对共同的对手（即另一社会层劳动者），才能完全相一致，否则，都是红脸对白脸，除开大家来比比武艺的高低外，没有和平的可言的。会打算盘的人，计算是无孔不入的，俗话一句言，买卖占厘毫，他们那能过于慷慨呢！

因此，代议制这个场面，虽然由以上的一段话已可知道代议

是“代”谁人而“议”，但即令把这点暂时不谈，这个制度内部是会呈出如何的矛盾，这些矛盾会展开如何斗争的场面，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种基础上是建不起宝塔来的。

现在是任何工商业家也不想自己去坐金銮殿上的那把交椅了。他们不是把那把交椅毁掉，多换上数百议席，就是把一个傀儡坐上，同时添几张议席在他的旁边。因为做买卖的人的看法与土地所有者到底不同，他们不要什么虚荣、名分，他们只图利息的巨大。谁还愿意在那冷冰冰的深宫内院去坐那种冷板凳！

经约汉、曼斯、马耳、佛特等人一致的同意，先把金銮殿改成了议会，大家都很礼貌的道：“今后是兄弟们的世界了。兄弟们的事，坐着慢慢谈吧！不过，我们第一要注意台下人。至于以前唱宝塔戏的爵爷们，那倒不足重视了。”

他们想道：这里所议的虽然是如何去管理站在机器旁边的人群，如何分配市场，推销货品，买入原料，但是如果竟这样露骨的说，这些曾经参加捣毁宝塔，现在又为着自己生产商品的人群不会灰心、怨恨么？是的，这里要加一点润饰啊！于是他们将这会议堂前挂上一块国会的招牌，这就变得堂哉皇哉，一点生意气味似乎也没有了。并且还在议席中，也留下几席给台下最低级的人层坐坐，使他们在名义上也取得一样平等的参加国事的权利。由是，这里从各位老板送来的代表，济济一堂，就都号称国民的代表，并说是全国人民的喉舌。

这样一来，台前台后变得有点昏乱了。这时，真正的牵线的人物，站在戏台前的人，大致是看不到的。在外表上，如果约汉先生公司里一位董事，一旦被选举成为大总统了，约汉先生也仍以公民的资格，向这位总统祝贺，行三鞠躬礼，好象这位总统真

正是“国民之父”一样，与自己的买卖是连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这位总统呢，也只有回到老板的私家小书房后，才说：“老板，这次选举费虽然花了一百多万，但是老板在国外的生意到底得着一种新的保障了。现在又在同×国订下一种最惠国的条约了，使老板的贸易每年可以少付进口关税一两千万，并且还代老板找了一块新的原料产地了。哈哈！”显出特别的恭敬、谦虚。

所谓代议制这一种戏法，粗糙一点说大致就是这样的东西，不过，事实上约汉先生的代表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一个人，也并不一定就是他公司里的司账。我们知道，这里常常的是一团人，这一团人，实质上也不是仅仅代表约汉先生的，凡与约汉先生同利益的，他都可以代表。并且当十七八世纪这些工商业家与封建贵族斗争的时候，就产生了代表工商业家利益的一团一团的人。这些人就是以后的台前的人物。新的戏剧的班子，或称京派海派，但在政治上，则称为政党。约汉、曼斯、马耳、佛特，他们手下也许不仅是上面举出的一两个人而是一个所谓政党。这一点留在下次再说。

不是垃圾不成堆

我们不要在约汉、马耳、佛特这些先生的家里久打停了，离开他们的公馆吧！我们现在来看代表他们的意志的，出现到舞台（指政治舞台）前的人物何如？

是的，这里我可介绍的人物，就有史易斯、麦克登、波门波门、罗唐（无论用什么阿猫阿狗都好）诸先生。也许你要说，我介绍的人太少了，他们不过是代表几个班子，史易斯并不是以一个人的资格出现到舞台上的，他是一团人的代表者，麦克登、波门波门、罗唐诸位也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班子的领班，决不是孤家一人，所以我们看他们的言论同行动，切不要以为那是他个人在“主持公道”、“造福人群”，或者“违反众意”、“丧权辱国”。他们个人虽然也有智愚、勇怯的分别，但他们在台上的一举一动都是不由个人自主的，在出到台前，就先在班内决定好了的。

现在在这里交代一句，在政治舞台上，这种戏班的名称不叫班子，而叫做政党。一个国家，中央大戏院（政府）照例只准有一个，其他地方戏院（地方政府）在大体上也完全由中央这戏院所管，他们不过是一些分机关。至于戏班子呢，一向是不加限制的，在原则上可以随便组织，不过近几年来，也渐渐倾向归一个班子演连台戏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现出看客要上台扮戏，要演那台上和台下完全变得没有分别的新戏了。不过，这些是新

现象，还不很普遍，到以后再说吧！现在要谈的是一向最普遍的现象。

一个舞台，许多班子，这戏如何做法呢？这就容易想到要竞争了。这又会使我们想到，竞争的结果就是史易斯上台，波门波门退位，或者是麦克登同罗唐的合作了。不错，这种想法都是对的。你就拿法国来做例子吧！法国的内阁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在英、美、法甚至日本也可算在内，都有所谓在朝党（就是拿了政权的）和在野党（就是没有拿得政权的）的分别；不过，你也不要以为这种政治的戏班子那么容易组织，随便训练几个会跳会翻筋斗的小子，会做肉麻的调情的毛丫头，就可成立一个班子跑三江了。不！政治的戏班子的组织，完全要受到许多限制，说一句老实话，在那种唱叠宝塔的天官图的时代，现代英、法、美这种班子就组织不起来，这种新的班子（政党）的出生，也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弄得与“狗与狗”、“老虎与老虎”的关系都不如，“狗不吃狗”、“老虎不吃老虎”，但是“人要仇恨人”、“人要吃人”，一部分人不能不同别一部分人扭辫子，抓胸脯。为了我们制胜你们，或你们制胜我们，大家总是最关心的在那里打主意，等到这种想头更为明确了时，那在同一利害下的最觉悟的分子就团结起来，是的，“不是垃圾不成堆”，于是这些同一利害的“垃圾”（这里没有好坏的意思）的东西就“大成了堆”了。

在十七八世纪以前的各国工商业家就首先组织了这种堆（政党）与封建王侯在政治上相争，预备抢这家中央大舞台的公演权。这些工商班子，在未抢到公演权前，是一种台下捣乱分子，张着大喉咙打“通”！自然当时对于叠宝塔的戏，大家的不满意是一致的，大家想要扮演的戏大致也是一致的，所以现代政治

这种戏班子，确确实实是同这些工商业家一起长成起来的，换一句难懂一点的话说，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制度一起发生出来的。它是在政治上反映出来的东西。封建的生产制度，在政治上只需要叠宝塔的戏，在以自由竞争与剩余利润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政治上就需要代议制。前者的剧中人就只要有大皇帝、士大夫官僚家臣这类角色就够了，后者却不要这些东西，却是由史易斯等的班子才行。

所以，政治的班子，总是代表在经济上同一利害的人的东西。不过，这种班子的产生，是要等到这同利害的人群有了相当的觉悟，有了相当的反抗力量的时候才能产生的。在十七八世纪欧洲工商业家反封建贵族的时候，当时在经济上与封建贵族站在对立的，不仅是工商业家，还有农民和工人，可是他们并没有先工商业家组成政治的戏班子(政党)，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觉悟够，还没有力量，还想不到自己也上台来，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各国真正代表工人和农民而组成的戏班子(政党)就显然以自己的利益为立场，在台下打“通”！并且跃跃欲试的要上台来了。

这就是说，政党是代表一种经济条件相同的人群利益的东西。抢夺的目的物是中央大舞台的公演。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是一种矛盾的综合，所以在中央大舞台上所出现的现象，自然也是万分矛盾与复杂，在经济上要自由竞争，这里约汉、马耳等大老板，就不能完全倾心相见了。虽然在舞台上，对于某一些政策能够取得一致，但是生意人与生意人间，见面总不免是冤家，你赚了钱，就不免影响到我亏本，彼此间既然盲目的在竞争，怎能在这掩护自己的政治舞台上轻于

放让呢！因此，在同一老板之群内，就不能不另有班子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同属美国老板之群间，有民主党与共和党，英国有保守党与自由党，日本有政友会与民政党，其他各国亦多如此，就是这一个缘故。这也说明了约汉、马耳为了代表自己的一个小群团的利益，彼此的利害绝对没有完全消灭的可能，不得不又分出成为若干集团。这是由于“私有”，并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等经济法则所决定的。至于真正代表统一的生产之群的班子是否能存在呢？能的。那是由于另一个在经济上完全没有彼此利害不同的法则所决定，也只有这一群团才能产生一个统一的班子来。那就是无财产的大众所结成的政党。

在目前世界政治舞台，虽然已经分裂了，开创了新的戏剧，但最大的场面仍是由于约汉、马耳等等老板为牵线人而组成的班子，在台上、台下做好做丑的扮演，新的生产人群自己的班子，虽然一天天被人注意，重要起来，在现在大部分自然还是台下人。

是的，在今日世界政治舞台上，是由老板们组成的各色班子，东辕门走进，西辕门走出，好象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在外表上竟看不见约汉、马耳那些铜臭面相了。这就是工商老板们高过封建贵族的地方，因为他们手法高明，一些得罪人的事情总放在别人身上，自己装做什么事都不管，一心在做生意，安安适适在私家会客室内拉那些傀儡身上的线就得了。那冷冰冰的宝座，阴木林的“琼楼玉宇”，让罗斯福这类傻子去坐去，你说新奇不新奇！好的，这里我可以列出一个公式来，就是：工商业的大老板会客室⟶政党（戏班子）⟶议会⟶政府（前台）。

这些我们不必管它。但是，这些班子是怎样组成的呢？它

是某一经济条件下的人的集团中最觉悟的分子，是这集团的一部分，是这个集团的头脑，不是全体。这里自然并不是说这个头脑集团内不能包含其它集团中的分子，如雇用一种人做班子的"助手"，充当一个班子的"打手"、"清道队"之类的工作，都是可以的。

在一个毛儿班内，都有一定的班规，政党自然比毛儿班要认真，因为它要领导去抢公演权的。这里，它需要"一贯的意识与行动"，它有"主义作为信仰，有政纲作为行动的指标，有战术以布置敌我的力量，有政策指明对于各种问题解决的方案，运用策略以进行实际行动，提出口号作为号召"。简单一句话，一个政党有主义、政纲、政策、策略、口号一套有系统战术的理论与战术。

史易斯、麦克登、波门波门、罗唐诸先生就是这领班者，至于他们如何导演呢？这说来话长，且待下回分解吧！

政治上的狸猫换太子

我们已将史易斯、爱克登、波门波门、罗唐诸公民所领导的戏班子(政党),大概的说过了。实在在这政治的世界中,并不只有这几个班子,这犹如在今日经济世界中的老板们不仅是约汉、曼斯、马耳、佛特几位一样。但是,为了听书的人的方便起见,就暂且拿了他们来作例子,把关系弄得简单些,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妨害吧!

还要请听官们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这些戏班子的领导人过为重视了。这里的史易斯无论换什么阿猫阿狗的大名都可,我们要注意的倒是这班子。这班子代表什么人的意旨呢?这班子是用了谁的钱,在替谁唱戏呢?这些班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也有盛衰兴败等现象,这现象大致是随经济世界中老板的盛衰兴败而决定的。

这些话交代过了。再来看这些班子的拿手好戏吧!不过,政治舞台到底比天蟾舞台这类地方不同。因此,政治的班子所做的戏,一般的也与天蟾舞台中各名角们所做的戏有些两样。主要的是,政治的班子上台固然是做戏,下台也仍然是做戏,比起天蟾中的名角,到了后台就卸下衣冠,那是完全不同的。说一句更正确的话,政治的班子在台下活动要比台上多。因为台只一个,班子至少有名的也有两个。所以,政治的班子要想争到上台

去演自己班内排演的戏，可是不十分容易，非经过激烈的竞争不可。所以，有人说，看一个政治班子的戏剧，有时台下反比台上好看，他们更卖气力，有时上了台反做不出出色的花样来。这里，我们就应该附带提醒大家一句，上政治舞台去看热闹，也该先有一点这样的预备知识。

在政治舞台上，在清平时节，大致是由两三个班子在轮流转。上了台的班子，自然就是表示在经济世界中最有势力的某一群大老板对于另一群大老板的胜利。上得台的班子，自然是卖尽气力在唱戏，总想占着舞台不放手。但是在台上确比台下为难些，在台下，没有排演以前，你可以用卖狗皮膏药的流腔滑调去骗人，尽量发出不兑现的支票，以博得台下人来看戏，帮帮你的场子。所以，在观众中，对于史易斯、麦克登诸先生，总觉得他们未上台前，和蔼可亲，关心大家，好象兄弟一样，及到藉着他们做楼梯，踏着观众的头，跳上舞台后，他们的行动就会现出两样，这不是他们有心摆架子，是因为他们本来做的是空头生意，对于以前发出的支票没有兑现的能力，不得不对于以前捧过自己场的人，有些故意回避了。

在这时候，必然有好多台下人表示不满。打“通”声音在楼前楼后出现。你们要知道，这“打通”的人不仅是老实的观众，同时也就是那些与自己敌对的班子。他们一向是幸灾乐祸的，你唱踏了板，走了调，在他们正是高兴，他们于是转向观众道：“这样胡闹，成个什么样儿，倒不如等咱来。咱有的是嗓子，正确的板路，不会这样现丑。”于是，大家一个吆喝，台前幕布，就登时放下了。幕布上揭出的是休息十分钟几个大字。

幕，自然又接着高举了。台上一切如旧，只是换了一个班

子，这些名角就是刚才在台下怪声打“通”的人。观众对他首先是笑嬉嬉的，不到几小时又看出破绽来了。不满的空气，登时充满这戏院内。

这时，刚才被打“通”下台的班子，又变为在台下打他人的“通”的好手了。

这样一来一去，就叫做政党政治，上了台就叫做在朝党，在台下的，就叫做在野党。他们就是这样玩的。

这一两百年来欧洲政治舞台就是由于这些班子在那里做戏。

但你切不要以为史易斯上台，或是罗唐下台，在欧洲政治史上，这些变动就叫做革命，那是完全的错了。这犹如在过去的中国金銮殿上的交椅，今日由一个姓张的胖子占住了，明日换了一位姓李的瘦子，这朝代的更换，不能叫做革命一样。所谓革命，那是要根本翻台的，不仅要改变人物，同时还要改变台的装置。这说来话长，以后再表。

但是这些政治舞台上的变动，却不能完全轻视。今日的讲话，我们的主要点就在这些变动上。不过，这变动是有一定界限的，即以资本主义的发生成长一直到归天这全过程中为限，跳过这个过程，转到另一政治形态时，那时政治舞台上就会有另一种更新的戏剧出现，那就是叫做革命了。

至于目前要讲的，仍不是目前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新情况，还要回到过去一点，因为要看清现实的特殊现象，却不能不先查查戏考，认明一般的现象。

却说所谓代议制度，说来说去，就是由于上面所指出几个叫做政党的班子做单位。在那里代约汉、曼斯、马耳、佛特的议，外

表上虽然现出的是斯斯文文，冠冕堂皇，称做国事，其实骨子里不过是这几位老板的谈生意经，每一条议会的法案，每一项法律的明文，骨子内都是铜臭薰天，生财的大道理。

是的，因为现在的生意人是生产自由的，彼此都是兄弟，彼此也应该共同服从大家同意的生意经(国法)，自由竞争是应规规矩矩，守法守信的啊！生意人相互的竞争无已，这些吃了各个老板的小米与牛肉的雀子与雀子间的战斗也不会变为和缓的。不过，到底有一个限度，就是他们变来变去，虽然在这变动中，许多小老板牺牲了，小雀子死亡了，产生了一些大肚子、金菩萨、大雀子，在这些金人与大雀子间仍是互相火并，只有在对于台下一般“平庸”的观众，是一致的。所以这些班子的变动，可以不调换那一幕吃人血的布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同时，在表演技术方面，不论哪家的班子，也都善于撒谎、装做，使台下人越看越糊涂，越看越发昏，使你糊里糊涂捧他们的场，不由自主的喊好。因为无论哪一家班子，都不能不在上台前就取得观众，在上台后维持场子上的人满满的，这在用他们术语，叫做“民众拥护”；凡经过观众糊涂叫过好的剧目，他们就说这是民众的要求这样，他们是代表民众的意见和意志，是民众的代言者；这些讲生意的场所，就名叫“民意机关”，由这“民意机关”所选出的官员，就叫做“人民的公仆”；由这样的“民意”全套的运用起来，就叫做“民主政治”。

这就是近代政治舞台上，同“狸猫换太子”一样时髦透顶的剧目。

但这不是说，台下人就不能根据这“民主”的口实而组织代表真正台下人的班子，提出自己的剧目来的。这样的班子，在现

在各国不仅产生了，并且也一天天长大了，但这又是后话，现在不详表它。不过，我们知道，这些台下人的班子，他们代表的人是大多数，其力量自然是很大，它与这台上的少数人的利害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这样的班子要较和平的走上舞台，是事实上的不可能。在未走上台前，他们在台下光只白着眼睛着急么？不！他们就利用台下，或台上不重要的地位，去宣传自己的剧目，批评暴露别的班子的骗术，使看戏的人，头脑更加清醒。同时，他们并未忘记如何拆毁这座舞台，去建立合于自己剧目的舞台。

巴力门

一月二十九日，报纸上登载有一则伦敦路透社的电讯，是讲英国巴力门（国会）在讨论追加预算五百万镑，以充作新失业救济处的经费案的时候，演了一幕趣剧。现在我提到它，不是专来开心，引诸位笑一笑，是我们的书正讲到巴力门来了，既然现在世界上这最有名的巴力门，正演着最标本的趣剧，为何不停着脚去窥探一窥探呢！

这一天，这庄严的“大英帝国”的巴力门中，黑压压的坐满了代表约汉、马耳、波门波门、罗唐（但他们说是代表帝国的）等领班统率的虾兵蟹将，在那里讨论追加新失业救济处的经费五百万镑。人声哄哄，各自在心中打算，要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老板少出几个。但这时工党议员布恰南却恼怒了，他一向对于政府救济失业的办法是反对的。他认为是儿戏、欺骗，不是根本的办法。这时，他大骂首相麦唐诺道：

“野狐禅！猪！下流！恶徒！我们要用马箠去鞭打这忘了大众饥饿的东西，把他摈于公共生活以外。”

于是，全体议员愕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吐舌头，也有的现出得意的微笑的。

这时旁听席上骚扰起来了，许多赶着来听政府对于失业救济策的女子，听了政府只追加这一点点经费，已是悻悻不满了。

布恰南的话，正打中了她们的痛处，她们一时情不自禁的大声狂呼起来。

“打倒举国一致的政府！打倒饿毙婴儿者！”

一时秩序大乱，经过数分钟，这些示威的人才由警察一一逐出旁听席外。

听官！你们以为这是一件奇闻么？这一说出来不是有点损坏“大英帝国”，或麦唐诺先生的尊严么？决不要作这样想！巴力门中一向就是如此的。不过，这次这位布恰南先生，说话说得太爽直一点，这才引起全世界各报用特号字排出这段新闻来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写出一段家丑来，不要专门笑话人家吧！

巴力门，在中国也曾有过的。在下就亲自去旁听过，至于故事，那是比外国的更多的。中国的巴力门有人比作是一间私塾，议员就好象顽童，不仅象布恰南这样发脾气是平常事，就是拿墨盒子作手榴弹去打开政敌一两个脑袋也不算得希奇。我们以前不是常常在报上看见巴力门中把桌椅打翻了、痰盂摔碎了的新闻吗？后来不知是那一位天才才发明了，桌椅用螺丝钉钉牢，墨盒子也死装在桌子上，使你不能移动，然后天下才告太平，巴力门中才侥幸没闹出人命来。这一切都是百分之二百的真实的。我写出也全无一点坏意，这也与上面那一段英国巴力门的幽默相类似。这块地方虽然庄严是庄严极了，却并不如一般人的想象，以为这块地方真是和和平平的。

我们知道巴力门是现代政治三部曲（立法，行政，司法）中最基础的一部（立法）的活动场所。立法、行政、司法这三部曲，本来是不能分开的，不过现代的政治的戏剧家，偏要如此的分为三

部，以示互相牵制，可以减少某一方面的独断，把现代的所谓民治精神弄得更象样一点。其实，这也是一些门面话罢了。本质上，我们知道整个的政治权力既然归于某一些人了，在某一些人的势力下，来将这权力再分三部来执行，说这是可以免除少数人专横、操纵，这有谁能相信。并且自从这三权分开来执行后，除开在一些小的事件上，这三方面有些牵扯外，还不是大家一致的在唱三簧吗！你能看见一个巴力门是代表工农的，一个内阁是资本家的，一个司法机关是在替地主司法的么？不能的。

然而，如果从这三部曲的分离方面看起来，这巴力门无论如何是一个最重要的场面，它在这三部曲中虽然是演的三簧，却仍有它的特殊处、重要处。在行政方面看不见的凶猛、复杂、活泼的斗争场面，这里可以看见。全社会的各派势力的抗争及立法、行政、司法因分立而形成的矛盾，及所谓"民主"、"公意"的真面目是什么，这里一概都看得明明白白，现在还是回到旁听席上去望一望这大会场上的风光吧。

这里专就人物说，也就不象行政、司法方面那样单调。虽然大部分的议席是被许多工商业老板、银行老板、地皮老板等的代表或代表团占去了，他们是这会议的中心。但在这人海中，也居然还有一些真正的人民代表，挺然独立鸡群中，在那里为大多数人们抗争一切立法上的权利，在藉这庄严的殿堂，揭破这壁帐中的丑恶。虽然，也许他们所发的言是人微言轻的，然而他们一点儿也不退让，因为正义总是在他们身边的，所以从他们口中吐出来的言词，也常常使得同议席的人身流冷汗，弄得一些狐狸们赶快把尾巴往里收藏，也现出一些羞惭的面像呢！

这就是一幕哭笑不得的悲喜剧。

至于，这里面所反映的其他面像，真是无奇不有。老板与老板间的对立，在这里是脱尽外衣，以肉身相搏的。农业老板同工业老板在欧洲各国的巴力门都演过全武行的比赛。这是为了关税政策，农业老板要求保护关税，阻住外国粮食流入，维持自己的市场，独占的市商价格。反之，工业老板不然，他却主张自由贸易，不主张对外国来的农产品课税，因为他主张粮食跌价，工人易于生活一点，他就可以少给工人一些工钱。象这样利害不同的案子，无论哪一国的巴力门，天天都有。代表不同老板的政党，都无不卖尽气力，运用机警，善于口才的在那里舌战，这不是玩意啊！不是闲嚼舌啊！这一舌辩的结果，失败了，大之可使某一老板倾家荡产，小之也将被人占了上风去。胜利了不用说，大之是大发其财，独占一国一地之富，小之，也是造成一点发财的条件了。

在这代议制的名剧初上舞台的时候，巴力门是很出过风头的。平心说一句它在除作老板们的明争暗夺，将一切非法的行为加以合法的装饰以外，它也做了不少的改良大众生活的事业。至于到最近，它的权力虽然一天天小了，在有些国家甚至连这种装饰品都不要了，现在我们趁着这巴力门还在“大英帝国”等地方继续活跃，作了这一点探视，谅来不是白费了我们的时间吧！

闲话衙门

上次我们闲话巴力门的时候，颇引起了两位朋友的抬杠，甲听了英国巴力门的一位议员敢于那样大骂麦唐诺，就佩服的五体投地，称赞英国巴力门的权力不止，他说："这里真是英国的发电所，英国整个国家的活动都决定在这里了。"一面说，口里还发出"咄咄"的声音，表示他这样赞美还不够似的。

这一来，登时，就有乙出来抬杠了。他说："在巴力门听了两句激烈话你就以为了不得吗？你真有点神经过敏！这里面，激烈话是家常便饭，有得听的，这算什么？这类话，有的只是一些少数派的议员的'哓舌'，有的是一两个无党派的人的悲愤、牢骚，还有的是某一个政党想在某些方面打击其他政党，故意卖弄的俏，想博旁听席上人的喝彩，同时在第二天报纸上印出他的话来，使别个拥护他。骂人就变为一种宣传，一种阴谋，哪里是了不起呢！依我看，巴力门内玩的戏实在呒啥了不起，虽然政府的一行一动，在未做前似乎要交到巴力门来讨论，做了以后，又要到这里来报告，还要经这里批准，才发生效力，真的有点象个国家的发电所了。其实，这都是圈套，官样文章。实际上，拿了大权的是政府，你只能议，他却能行，你奈不何它，哼，你在大的事体上，敢不同意吗？不同意，政府可以解散议会，另选一班能被它御用的人来。这才是权力的中心呢。"

他们的话，到底谁是对的呢？

我说："他们的话都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过，现代政治的三部曲是在唱三簧，一个装傻子，一个不仅装傻，还要化装，装做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另一个人躲在后面作猫叫，你说，到底哪一个角色重要？这是说不出来的，只能说都重要。

现在甲乙二方是各站在一方说话的，所以不能说哪一方独对，独不对。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屡次说过的，不要专看这些现象，在这里抬杠，还应想到约翰、马耳这些牵线人，你应该知道这三部曲无论哪一部都是属于傀儡戏的。

不过，就这戏的排演的原则说，似乎巴力门的场面显出得更重要，从前在开锣的时候，它确实是这三簧的开始的一簧，不过到了现在，这一簧渐渐变得更无力量了。名叫"司法"那一簧本来是配角，不说它，成为真正主角的，目前就是乙说的只有名叫"行政"这一簧了。所以在演着"行政"的拿手好戏的场面的"政府"却不可不引大家到那里面去玩玩呢！

是的，参观这一场面是较复杂的。这里不是象巴力门那里简单，"行政"这戏的排演不是在一间屋子内，并且照例都不许人去旁听的。这一来，我们参观的方法，就只能"神游"了。

政府这机关诸君却不要神奇，我们用两个旧字说就是"衙门"。"衙门"门口照例挂有"闲人免入"的牌子，衙门里面做的事，就是管理人的事。用一个新名词说，是"统制"。在所谓民治政治的代议制度之下，这新式衙门内坐着的"大老爷"，从上到下都不能摆出有皇帝时代的臭架子，一概称作"人民的公仆"。这里面的大小官儿，因为要受其他二部曲的牵制，所以在形式上他们到这

机关来，也应经过无数层的转折，由许多阿斗去写选举票，好容易才能走进这张门。因为你的来历，一般阿斗都知道，所以，在骨子内虽然官总是官，同皇帝时代一样要比老百姓尊贵，可是，在面孔上总得谦虚一点。

不仅如此，现在有了巴力门了，在形式上，它总可以同你捣乱，你要想上这中央舞台，就得在巴力门中取得阿斗代表（实在应称老板的掮客）的多数，不然你确会站不稳，再则，这里的后台人多，意见时时不同，于是我们只见这里的人来来去去变动多端，也比由一个大皇帝作主不同。其他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与其他二簧合板，所以现代坐衙门的人，真有点不客易，动不动，就要触霉头，象英国首相麦唐诺那样圆滑，没有骨头的人，都要被人奚落为“野狐禅”，就可概见一切了。

关于这一部曲排演的场面，可以分作中央舞台（中央行政机关）和省、道、县舞台（地方行政机关）以及附属于舞台杂耍部门（行政谘询机关，如中央枢密院、各种行政委员会、地方参事会等）。不过，我们现在要参观的却是中央舞台这一家。因为观了泰山，就容易看天下的，要开开我们的眼界，还是上这家有拿手好戏的舞台去的好。

这里不表这中央衙门如何伟大富丽，要表的却是人物和人物的装扮的戏。

组成这一个中央行政机关的有两种形式，就是说这中央舞台的台务主任有两种资格的人来扮。一种是所谓“行政首长”，一种是“内阁”。再换句话说，有些国家管理着全国各机关的总工头是大总统——“王”，有些国家虽然上面也有个总统——“王”，可是他们是一个配象的“玉马”，不管闲事的，真正负责者是“内

阁”。内阁这东西，就有点象目前中国的行政院的东西。

内阁以下照例分为：内务，外交，军政（海陆空），财政，司法，交通，教育，农工商等等部门。内阁大概是一个内阁总理，在帝国或称首相，和许多阁员，或称大臣拚拢的。这些阁员或大臣，照例各人管着一部，但也有不管一部，完全是一个空头的光杆，只有在开会时，人家才知道有他。自然，这种人的配置，戏的配置，并不各国都一样，多少有些出入，这却无关大体，我们姑且“取大同舍小异”，大概各家中央舞台的人的扮装方面就不过如此罢了。

一个大麻子化了装，登时就可变作曹操，受人的敬畏，一个“公民”也是如此，只要坐到大总统或内阁大臣的交椅上，也就马上现出一种魔力来，受着世人的尊敬、恐怖或诅咒。虽然他们自己的登场也不过受了另一种人的牵线，可是，反转来，他们的手中又牵着一大把线头，千千万万阿斗们的命运都是由他们在玩弄。

啊啊！这一场面真是伟大热闹啊！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些什么剧目呢。这里的剧目是如何的在改变呢？

这里一切都由一国的经济方面的变动而变动，一切编上剧目的，都是为了经济方面，作为它的掩护而出现的。这颇有一点象我们乡村的“社戏”的作用，为了求神保佑农事才开演的。现代政治这玩意儿，就不过是工厂老板要保护他们的工厂、生意罢了。可是，他们求的不是“神”，是一种“权力”；不是缈茫中的不可知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握在手中的一种法宝，支配万人的工具。工具的全面是这三簧，但是光仗巴力门说空话是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的胜负就是坐上这舞台的交椅为定。

根据这个变动律，在政治上自然是形成得万花缭乱的。在这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较明亮的、巨大的剧目来，这就是民族问题、战争、国际纠纷，等等。这一切我们暂时不表它，还是等到下次再专门一件件来细谈吧！

至于这舞台上小的风浪，小小的改变，那是天天在进行中的，并且自从这幕现代剧开演以来，一向就是如此，巴力门总爱捣鬼，政府也会叫"解散你"，这些小小的变动在今日的新闻纸中，都是用巨大惊人的字载出，认为是当前的大变。自然这都不是和平进行的，是一连串的抗争，"长江后浪催前浪"，这一连串的抗争中，许多人成了牺牲者。这个舞台上部分的改组，台上班子换了一个小旦花脸等现象，刚刚与这一种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场面上某一老板退场某一小开登场一样。这些戏子的斗法，原不过是某一种反映罢了。

把话说回一句，这一场面要看的东西太多，内容也特别丰富，把它单独看起来，确比巴力门那么哓舌要实际，可是却不能同那二部曲分开来看，因为三簧合而成趣，三簧分就会变为不成话了。这是就整个民治主义的政治这出悲喜剧中，"政府"这一场面说的。

然而，虽然如此，这种在外表上叫做国事，而事实上却是少数人在做戏，但关于大众的福利与灾祸上是至有关切的，所以在经济生活上从事生产的人们，也在这种戏法中学会了要自己在经济上占上风，也非得取得这三部曲的支配权不可。在未拿到全部权力前，就是关于"政府"这一场面中，也决意派人去参加，但是他参加不是去捧场而是在上面去抚育自己。这与在巴力门

中，那鹤处鸡群似的人民代表一样，他们看来孤单得可怜，可是他们是后生，却是生气勃勃的。

冷　门

现代政治的第三部曲是司法。表演这部曲的场面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就是管理打官司的机关。普通人民的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机关，通常分作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等级。

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这一场面做的戏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执行法律的人就止于这几个头戴道师帽子的法官吗？执行法律的地方就止于这三级阴惨惨的五殿阎王大殿似的法院吗？不！属于这一系统的，就人说，连军队、警察、宪兵都包括在内，就组织说，还有牢狱及各种特别裁判所都在内。

有些朋友以为这一部曲没有什么看头，这一场面是一个冷门。谁愿意坐在冷冰冰的法院的旁听席上去听那些律师和法官的装腔作调呢？谁愿意到阴森森的大牢去欣赏囚人脚上奏出的“哗啦哗啦”的音乐呢？谁忍心到有些裁判所去看“坐老虎凳”、“上电刑”、“掉半边猪”、“灌辣椒水”、“跪火链”等刑罚呢？是的！讲到“幽默”、“开心”这一场面是不多的，这里没有喜剧，不过如果要看人间悲剧的话，在这个场面中那到有的是巨大、可惊的实事在表演，这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的一场面啊！

是的！我们现在要放冷静，我们在参观这个场面的时候，不必带着佛菩萨一样的慈悲心肠，也不要象女人一样眼眶内留不住眼泪，那些态度是完全无用的，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悲剧到底

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问清白它，这是今天本书场上要宣讲的中心呀。

说到这里，你们一定会记起包公案、彭公案这一类的故事来吧！这些故事，真说得够有趣，又够可怕，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故事，不是真的事实，但这故事中，除开象包公彭公那样的人是假造的、幻想的以外，它却把封建时代“我即法律”的那种野蛮皇帝系统下的官僚的凶恶相告诉我们了，它又把农业经济生产关系中，人与人固定在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下生活着的真情实态告诉我们了。

自然，包公案中可以看见的“司法”，与我们今日的这“文明戏”是比较野蛮的。但这里却告诉我们了，今日这“文明戏”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东西，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某一种时代，需要某一种的经济秩序，就生出某一种法律的规制，出现了某些执法的人，发生了某一样的案子罢了。“没有畜牧，没有某种程度的畜牧经济，当然没有畜牧法律，没有农业经济，当然没有农业法案；没有交换贸易，当然没有商法，没有航海，当然也没有航海法。”你们切不要看惯了法律在今日的制定权是属于巴力门，就以为真的是那些什么法学大家头脑子内想出来的把戏，那就会大上其当，因为那只不过是表面。

到了某种社会经济秩序需要某种法律时，法律就会产生出来了。它以“社会生活的规范”，“国家生活的规范”等的名称出现于世界。在大皇帝时代，大家都认“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做社会生活的规范，但很明显的，这种规范并不是人类经营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明明不是全般的人类，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不过被强制

在遵守了。不然，哪里会有包公案这类寄托于幻想的小说出现呢？

譬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这法律，在维持专制政治这一机构是必要的。要这样才能显得“君”的权力之高于一切，“君”的权力的集中。只有这一观念组织成了国家特有的观念时，这专制国家才能够巩固。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组成，有三种要素，除开“物质的机关”、“人的装置”外，就要算这“组织化了的观念”了。反过来说，如果这种观念动摇了，登时就会有危国本。排满的思想兴起，不是接着是清朝的沦亡么？人权的思潮蓬勃，不是就有君权的倾覆么？现在不是又到了一个阶级老实不客气的独裁的观念的时代，要代替所谓“民主”了么？

话说回头，再来看成为这三部名曲之一的这一曲吧！

这一曲自然不能例外的，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相一致的一种社会生活的规范曲。调子是唱得有点迷人，唱这曲的人与地方都要比以前各时代来得文明，讲理。但世间上甜的东西并不一定都合于滋养，美的音乐并不一定都合于音律，花言巧语有时内藏阴谋险奸，巧笑低眉，腹中或会另含利剑，一切的美丽时装，仍遮盖不过这麻大姐的尊貌。在这部名曲的本质上，依然是与过去“无法无天”的少数人在那里玩弄人类的命运，仍找不出根本不同的地方。

不过，它当然也有它的特点与进步性。它的制定是在上次玩过的巴力门中，这与大皇帝放的屁就是法律、讨好皇家的屁的、胡乱的惨无人道的那样执行者，这新的“文明戏”、新的戏子，就不可同日语了。这里在制定时就多少使一部分民众参加，执行中也多少受民众的监督，并且在名义上，“大总统”、“主席”也

是在所谓"万人在法律下一致平等"的待遇的(?)。

我们听见法官对犯人说:"我们是根据法律判你的罪，不是谁同你有冤有仇，你不服，依然可根据法律上诉的。"狱官对囚人说，"不是我要关你，是法院判了你的罪的。"

收捐人对农民说:"不缴租，抗税是犯了国法了。"

工厂老板对工人说:"我花了钱买到了你的劳力，我是依法可以自由使用啊!"

西家被东家欺侮，就怒说:"真的没有王法了吗?"

我借了你的钱没有还，你可依法起诉;一个女人有了外遇，她的丈夫可以依法提出离婚;你肚子饿了，跑到烧饼店去偷了一个烧饼，警察就依法带你到局去。啊啊!今日生活的各方面都是有法的，偶一不幸你就掉在这法网中去了。

这一个复杂美丽的网造得真是巧夺天工。它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无数的生灵，造这网的人自然是网不进的。果然有了它，一切都安静多了。

在这样法网下的国度，就有许多学者称颂为"法治国"。

造这网的机关，我们已经知道是巴力门，执行这玩意的地方和人是今日所参观的司法各场所，及那些穿制服、戴各种怪帽子、胡须留得有点特别、面像总是现出森冷之光的法官、狱吏、宪兵、警察等等人们。

至于失足掉到这网里来了的人呢?据统计专家的记载，失足的人都不是主持今日生产及与生产有关的老板和其家属们，而是一些在车间、农场的劳力者及其子女。换一句话说，掉在网里的人刚刚不是造网者，因为造这网的人，网就在他们的手上，自己是不会将它套在头上的。

“一个多么美丽的网啊！”造网的人有意的歌颂着，落到这网底深渊的人，才在黑暗中啼哭、忿怒！

这个冷门中唱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替老板们维持他们社会的秩序！

解一个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到了上海后，就有几个小朋友要我带他们去看。我却向他们提议，先到共舞台看一晚武生戏，第二晚再上影戏院，不然，就不肯作东道。他们都一齐答应了，但不知道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共舞台，我极留心他们的表情和对于戏的意见。我看见他们有时高兴得跳起来，很有趣似的，他们都说，做得好，打得妙，但他们只是笑，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完全觉得是在做戏。

在影戏院里，他们都不说话，只听见芳子、福生的呼吸都弄得有点急促似的，他们口中，常常吐出了“啊啊”之声来。我在休息十分钟的电光下，看见他们面上无一点笑容，芳子脸上明明还有一点发青。

“太可怕了罢？”我说。

“是的！”福生说，“‘一二八’正是这样的。”福生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一二八”时正是十岁，他的记忆是很新鲜的。

芳子没有看过“一二八”，好象还有点不相信这影片上映的是事实似的，她说：“如果这样，那太毒了。”她带着十分的不安与怀疑，把这张片子看完。

晚间，在餐桌上，我们谈话的材料自然就是战争了。

我问他们：“你们说罢：这两晚的戏，看得怎样。”

“共舞台没有什么意思！”他们一齐说。

“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那种兵对兵，将对将的打仗已过去了。我们现在看来，只能算作打架，不是打仗。现在的打仗应该是影片上映出的那样的才合事实。”福生说。

“不过，如果影片上映的是事实，那确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欧洲人为何要那样屠杀呢？”芳问。

我知道，现在我要同他们讲战争，已只能说近代的，过去“兵对兵，将对将”的时代的战争的意义也用不着再说了。

我说：“芳！影片上映出的确是事实，但那还不过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那时代的事实啊！现在的战争就更惨毒，更可怕了，如果把快要到来的第二次大战同这影片上映出来的一比较吧！恐怕你们又会感觉到这是在放过年的花炮呢！将来的大战是更进一步的有大规模组织的机械的屠杀呢？”

福生的哥哥是一个飞机师，虽然现在从事民运的和平工作，但是他是知道空军在今后战争中的力量的。他听了我那句“有大规模组织的机械的屠杀”说得太笼统，于是他也有点口痒了，他这时也笑嘻嘻的加入我们的谈话。他对于他的小弟妹们，详尽的描出将来的战争是着重于天空，是飞机与坦克、机关枪、毒气的结合，飞机与军舰潜水艇的结合的水陆空大战，“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说得十分动声动色，把桌上的人无论老小，都被感动了。在似懂非懂中，出奇，叹气，大家只顾听新闻，竟忘记把饭往喉内咽下。

芳子是不大高兴她哥哥再往下说去的。她因为心不在这些新的战争技术上，她奇怪的倒是为什么现在的人类，愈往文明

走了，反要这般狠心的屠杀。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的人民为了一件什么事就要这样狠心肠的相杀呢？"芳子这一问，几乎把她那驾飞机的哥哥都难住了。

"现在的战争是一个谜，人人都知道它可怕，但到和平久了，人又觉得太寂寞，所以又要打起来了。大概人类有种爱打的根性吧！"飞机师说。

"我不相信，"芳反对。她转向我道："杨先生！哥哥告诉了我们，将来的大战是怎样打的，你再告诉我们今日这种战争发生的根源，同消灭它的方法罢！"

"好的。近代的战争确是一个谜，但这谜却是人造的，并不见得不能解释。譬如第一次大战罢，据造谜语的人的说法，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英法俄方面的人就说德国人怎样野蛮，无人道，扰乱世界和平，在德国方面又反说英法俄国人好战成性，民族的残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弄得双方的人民'莫名其酱油。'普通的人也将欧战的原因仅归之于奥皇太子的被刺，好象那一场大屠杀就只为了这一点小事。德英法各国人民真的就好乱成性，竟傻到把自己的生命做儿戏，弄得全世界死了几千万人，牺牲了不可数的财富，几十年都转不过气来。其实，何尝是他们所说的呢？

"他们是在说谎。

"我们看一看当时俄德阵线上的双方士兵间，是在一种怎样的情状中呢？

"他们并不互相仇视。有时双方在火线上象兄弟一般的在谈话，他们都反对战事，要求和平，他们知道驱他们上战场的人

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于是他们互约两不伤害，并且德兵常将小刀向俄兵换得面包、牛肉，俄兵也常到德军战壕内去喝酒、谈天，这些事情常常发现。这就说明了，现在的战争，虽然动员的是一个国家的全国民，但主持这战争的，却仅仅是国家，代表这战争意志的不是全国民，也仅仅是国家。欧战哪里是德英法的人民要干的？要干的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政府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残忍戏呢？哈哈！还不是他们国家那几十百位银行、大工厂老板，大土地所有主的公爵爷儿们在那里牵引线吧！在今日世界各列强，不独战争，就是所谓和平也不是人们的公意，不过是那些老板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才一时要拿枪拿炮，一时婊子装正经的又念佛吃素起来，其实不关老百姓鸟事呀！真正的和平又是另一回事。”

我说到这里，福生抢着问道：

“欧战是这些老板要打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做生意不好，反要动武呢？”

“是的，”我说：“正是为了做生意呀！因为世界到了一九一四年，全地球的各角落里都变成这些做生意人的市场了。生意人中以英德两国为大买卖人。他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彼此要争做大哥。以前分割的市场，到那时已不合用，大家要求再分割了。他们为了推销商品、买入原料、投放资本等，你争我夺。到了不能运用合法的商业竞争的限度时，就只有诉之于真刀真枪、大炮毒气了。欧战就是以英德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正是为的做大买卖呀！这才是真的原因。”

“啊啊！”福生叹了一口长气后，他说：“那末，现在报上说什么一九三六年的危机，某国某国的准备战争，也大概还是这些老

板们，在生意做得不顺手时，一时要拿出来的那一套旧戏吧！”

“是的！新的战争的危机也自然还是以这些老板们作中心的。不过战争发动出来的形式并不见得是一样的。”我说。

芳子插嘴道：“什么形式我们不管它，总之，战争是可怕的，不人道的，我们总得反对它。”

“战争，是可怕的，不人道的，我们应该反对它。但是，并不是可以不管它的形式的。新的战争的危机可以取以下的三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火并，完全与欧战性质一样。第二种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譬如日本占领东北，沪战，最近察哈尔与外蒙边界日本的侵略战，以及东非的意阿战争等。第三种就是已大吹大擂了许多年的反苏的、制度与制度不同间的战争。因此，我们虽然反对一切不人道的屠杀，但在敌人已侵入自己的疆土，民族都要变为人家的奴役了，却不能因恐惧而不起来反抗，因战争的残忍而不敢作自卫的防御战，我们不能笼统的一概的反对的。”

“啊啊！我原意也是这样，不过我说不出这道理来。”芳子现出十分严肃的表情，表示她并不是怯懦的女子。

我安慰她道：“芳？我知道你是勇敢的女儿，这请你放心。不过，我想使你们彻底认清战争的性质，所以说了许多闲话。战争，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你是喜欢读历史的人，在西洋史上，一七八九到一八七一年代许多强国为了实现民主主义而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九一七——二二年苏联的内战和干涉战争，中国辛亥革命战争，以及沪战中上海的市民反抗，及目前东北的义勇军的游击战，东非阿比西尼亚的民族战争，都是属于进步的。在这些战争中，虽然同一样牺牲了无数的人命、财

富，但换得的是后代人的幸福，它把人类更推向一个进步的阶段了。

“所以，我们咒诅战争反对战争，并不怕战争，并不怕掀起和参加一种有意义、有代价的战争！消灭这种不人道的战争，创造永久的人类和平，恐怕也不能不再有一次更大牺牲的进步的战争吧！”

我说到这里那位飞机师哈哈大笑了。他道：“看不出一个文绉绉的书生，说出话来还要比一个武装同志惊人呢！”

这是一个故事。但这故事是把这政治现象之一的战争说得明明白白了。不晓得，在我们的书场上的听书人还有什么疑问不？

又在另一种人口里喊出了

好久不到镜家里去了，她问我为什么不来看她，我笑答道："恐怕惹起你们家周围的民族问题。"因为镜的家，二楼是住的白俄，楼底住的是木屐朋友，连她家是构成三个不同的民族。我要去看她，要经过楼底，通过二楼，有时一不留神将手碰到那位俄太太的门上时，吃不消那副干瘪的贵族脸。这还是小事。最大的是，一、二两层的洋人家都装有自备的电铃。镜家却没有，她又偏偏要住在三楼，使人张大喉咙呼唤她们也不听见，所以我不敢去麻烦她。

这是一段笑话，我们见面时常说的，不想，久而久之，据镜说，她的孩子辈竟受了这笑话的"毒"了，弄得他们对于民族问题的解释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起来。

镜要我去纠正他们，不然就要怪我。罚我三年不要见面。这可不是玩事，于是我答应了她，但不承认以前开玩笑是向孩子们撒了毒，恰恰相反，是给了孩子们对于民族认识的一点启发啊！

"随你说，"镜笑道，"横竖你要给孩子们把民族问题讲清白，他们都懂了，就完了。"

我于是把青、丙、苏三个小将拉到自己身边来，预备同他们开始谈判，琴小姐看了我们闹得有趣，也笑嘻嘻的加入了我们的

集团，谈话也就开始了。

我知道丙、苏在小学校内是听惯了民族危机、民族解放这类话头的，青年纪大一点，也许已经注意到一般世界民族问题了。琴是一个职业女子，她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自然所知道的是比一般学生多的。因此，我就想把讨论的内容弄宽一点，要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懂得，都有益。

我说："谁最小谁就先说话。"

"嘻嘻，那我就变为弱小民族了。"苏这句话引得大家大笑起来。琴在大家收住笑声时向苏道：

"苏！你在这屋内是一个弱小民族，这是开玩笑，我们中国民族对于帝国主义才真是弱小民族呢！"

"这谁不知道！所以我们学校里的先生常对我们说民族危机呀！"

"苏！你的先生告诉你过什么是民族，怎样的危机，如何克服这些危机么？"琴又问。

丙抢着答道："什么是民族却没有弄得清楚，因为民族这两个字我们自己都说惯了，成了口头禅，倒不好意思去问人，有一次，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提出这问题问先生，大家都觉得好笑。先生就说，'大家都懂了，为什么你一个人不懂呢？你看看你的面皮的颜色就知道了。'我那位同学不服气，他反驳先生：'为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人都是白皮肤又分成了多个民族呢？中国同日本，都是黄面皮，也不是一个民族呀！'先生知道自己弄错了，他说的是种族，不是民族，但他反恼羞成怒的说：'你比我知道的还要多，就请到台上来呀！我来做学生。'以后我们更不敢问了。"

青说："真正岂有此理！真的，这问题就连我读了两年中学也还弄不清白呢！"

琴微笑不作声，表示她到反懂得的意思。我道："现在我们关起门来说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又没有那样不讲理的先生，倒可先把什么是民族弄清楚呢。"

大家都同意。由琴姑先说。

"我知道得不多。但还能分出民族与种族的不同来。以前我们都以为民族这东西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后来晓得构成民族要有五个条件，缺一个不可，才知道这东西在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的社会中，原来还没有长大'成人'。"琴说。

丙道："你说什么话？中世纪以前没有民族存在吗？我们中国民族不就是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吗？"

青拦着丙道："丙弟！我们还是听琴姑先说出五个条件来，再来谈这个问题罢！"

"是的，"琴说，"把这五个条件说明了，这一个疑问也就解释清白了。构成民族的第一个条件是属于经济的。人要生存，总有一种经济生活，一种经济纽带。彼此不相往来的人们绝对成不了一个民族，两个不同经济纽带的人种，也不能成一个民族，中古以前四分五裂的大小王国不成一个民族。英吉利和北美洲同属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种，但因经济纽带不同，也不能成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这种纽带，但同时还要是有历史性的经常的；一时偶然的会合也不能形成一个民族。"

青插嘴道："我觉得有了你说的这一个条件就什么也够了，对不对。"

"不！"琴继续说，"那样就会变为机械的看法了。经济的条

件只能说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以外还要有共通的言语。语言的共同，自然是根源于经济上的连结，共同在一起的日子过得久产生出来的。日本的东部与朝鲜各有各的语言，所以也不是一个民族。”

“同讲一种话的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呀！英国与爱尔兰，挪威与丹麦能讲同样的话，为什么又不是一个民族呢？”青问。

“这就是我以上说的经济的连结不同。其他还有条件啊，这些条件是要合起来看的，不能拿一条来抬杠哟！现在让我把五个条件的其他几个一起说出来吧！语言相同外，还要住居于同一地域，英国人跑到美洲去了，虽然还说英语，只要经过经济上长期的发展，又会生出美国民族来的。此外就是根据这些在长期历史上产生出来人民集团，又自然而然发生了共通的文化，共通的心理，这一切融会综和起来，于是所谓民族这东西就出现了。”

丙听到这里，喜得跳起来道：“真的，我懂得了，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民族，是从氏族种族，分分合合而造成的，因为受了以上这五个条件的限制，所以在中古以前它尚未发育得够，是不是呢？”琴笑道：“对的，你聪明，”她转向苏道：“你能懂得么？”

“这有什么懂不得，氏族种族是民族的爸爸妈妈，凡是民族也都有它的爸爸妈妈的。”

“哈哈！”大家都笑了。青却反沉默不言，好象还有点疑问似的。这一来，屋内的空气由这一笑轻松了一下后，又复归于严肃。

最后，还是青提出他不懂这五个条件为什么会在现代社会中齐备起来，他道：“这是一回什么事呢？”

琴这时转向我道："杨先生，这要请你说话了。"

"好的，"我说，"这五个条件确不是容易齐备的。这里我要说一句你们听了会睁大眼睛的话，这要感谢资本主义，要是没有它，这些条件是不会齐全的，民族这东西，也还是长不出来呀！

"有人说，民族这东西是近代资本经济的产品，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那时世界还是封建的，不过有点衰老了。那时天下还是无数大小王侯，各人守着一小块土地，在称王作帝。弄得'床脚下打斧头，碍上碍下'，使经济不能发展。当时的革命的资产者，就喊出'民族统一运动'的口号，说什么'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法律'，他们反对封建的分割与压迫，他们要求'生产自由'、'买卖自由'、'海洋自由'、'一切民族同权'等，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就闹出天大的乱子，以后各国风起云涌。'民族统一'运动在各国都闹得热闹无比，所谓民族国家相继造成，于是'民族'这一个名词才变成现代人的口头禅呀！"

青道："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法律，那不很好吗？为什么现在强大的民族又要来欺负弱小的民族，不许它有一个政府，一个法律呢？"

"是的，这些是因为这句话没有完全实行，不能完全实行的缘故。因为喊出这口号的人是有产的老板们，当初对付封建王侯他能说出这句漂亮话，到了自己作主子就觉得生意经要紧，话要说圆滑些。他们用了偷天换日的手段，把他们生意经上的利益作为全民族的利益，只管资本市场的统一，哪里还记得其他民族要一个政府，一个法律呢！这时资本的压迫代替了封建的压迫就是了，以前是大王国压迫小王国，现在的世界是大民族压迫

小民族，宗主国压迫殖民地。你看英国那一个国家就强制把许多民族装在她的肚子内，作自己的养料，把自己长得胖胖的。

“他们用炮舰、轰炸机屠杀的方法维持他们大英、大美、大日本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支配权。他们对自己民族一面喊出‘同一民族的人都是兄弟’，一面到殖民地血腥的吸取高利润回本国，稍微抛出一点唾余给国内高贵的劳动者，于是，在这种场面上又喊出民族解放的口号了。这就是我们自己当前的生死问题，反帝与民族解放的课题。”

镜听到这里，她严肃的站立起来，她说：“今日我们当先要求我们民族绝对的自由、独立与解放，但自己解放了，却不要再压迫人了。”

“是的，现在提出这口号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所以今后这口号解作一切民族间的结合是绝对自愿，不能有丝毫压迫的。今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让民族的特殊性的自由发展，也就是使人类生活更丰富。废弃这一个名词的条件，这不过是它的前途的趋向，为时还长远呢。”我说完后，镜向我道：“你倘能象今日一样的热心，你可天天来玩，我们不罚你了。”苏牵着我的手，笑不肯放。

这一个故事，也就把今日闹得令人耳聋的“民族问题”是个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了。

扫台戏

旧戏中有所谓扫台戏，就是指那一晚唱到末了的那一出。在京班中，扫台戏每每也是压台戏，虽然唱了这一出，就完工了，但是唱工倒要讲究，大概这出就总是由最有本领的人出台的。

至于在汉班呢，就完全不同。扫台戏每每是杂耍、胡调。有戏瘾的人，照例看完正戏后，就拔步走了。留在戏场不动的就只是一些孩子，或看戏还不到家的老外。因此，扫台戏并不就一定是好戏。

幼小时，自然喜欢看扫台戏。记得每一次看戏，总是要看到看客纷纷回家，台面空空张着大口，才肯跟着大人回家的。这印象深深的刻在我的脑子里了。现在使我联想到目前世界舞台上正在出演的那出现代政治的悲剧来。

不错，"代议制度"的老调子唱到现在，已经唱得有些腻人了。那种三簧（三权分立）也全不适合目前的台面。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种只好说是武生戏，由一个有些本领的丑角登场，将旧日的"三簧"，改变成了"一人唱"（即由代议制变成了个人独裁）。围着这个丑角的，是一大群穿着破衣破裤，手拿旗竿子的小瘪三，盲目的让那个丑角乱跳乱舞。小瘪三们就千依百顺的高呼万岁，什么都是万岁，全不怕什么肉麻，也不顾以前的台步和板路了。所以，凡看惯了旧戏的人，实在又有点看不

上眼。

但是，这正合于我们汉班子的扫台戏的原则，收锣是要用杂耍的。同时在选择这一个丑角的原则上，的的确确，又合于京班扫台戏的原则的。因为能主演今日政治舞台的丑角的人，的确也是要有些呱呱的本领的。

我们不表莫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扫台的名角的本领，且说这套杂耍的戏考吧！

我们要告诉大家，现在的“一人唱”并不是真的回复到叠宝塔的玩意上去，要讲到这一套杂耍的来源，倒是由三簧中脱胎出来的。

请诸位再翻读翻读这两三百年来的政治戏考吧！

我们记得代议制度与叠宝塔的分别，是前者适合做买卖人的口味，后者只适合于土地贵族的。做买卖的人自从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时候，在当时，心中最烦恼、痛恨的是生意做得不自由，到处受着土地贵族腐败制度的监视。所以一时就把自由喊得遍天响，觉得政治这东西，如果不从那些只会剥削农民、昏天黑地过日子的地主手里夺过来，那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他们要求民权。但请小心一点，这民权的享受是有限制的，做买卖的人，心中有的是算盘，打算得清楚的是自己，在他们这一批老板以外的人是不能算进去。这已是分付过了的话。

也因老板这团人在当时各人的气魄小，人数众多，张三、李四、牛七、马八的目的都只在各人做各人的买卖，能赚得大龙洋。没有别人来麻烦你，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在老板这一伙子们，虽然生意竞争，常常红脸，但无可奈何的不得不平起平坐来讨论关于“大家”的事。这时，就自然要生出代议制度这种东西

来的。

有了这种要求，有了以上我们介绍过的那些精明的老板，如约汉、马耳、佛特、曼斯等等，以及他们家庭养出的班子，什么史易斯、麦克登、波门波门、罗唐诸傀儡班子，不管它的班名叫做“自由党”、“民主党”、“共和国”、“保守党”都好，他们在本质上全都一样，不过是按着生意经在演保护自己私利的戏罢了。

其所以要用“三簧”，那不过是老板间大家为了做此的“公道”，多来一点牵制就是，不是说“三簧”就可不作弊了的。

这种戏剧平安的出台，也还因为当时大家的生意都很兴隆，封建时代的社会，确实太穷了。在翻身一变而为资本主义时，生产出来的东西，倒不愁没有销路。那些替老板转车轮子的人呢，他们大都是在乡村失了土地，在小都市失了生产工具的小手工艺人，他们过去的生活实在同牛马差不多，现在虽然变成什么都没有的人了。但自己的气力能够自己作主卖出去，老板待人又比较和气，生活就一般说，比以前实在要好一点。大家的最低的生活没有了问题，气性也就和平，他们除了注意摇车轮子以外，就想不到工作以外的事了。

是的，“三簧”确也有它的妙用。在绅士与工人间，取消了不平等称呼，减少了过去许多臭架子，这确和缓人们的情绪不少。在法律也规定了名义上的一律平等，巴力门中也让大家进去看看，所以天下变得一时好象无事，政治舞台上唱的什么鸟戏，这些台下人还不大睬它。自然，那时台下人批判的能力也还是没有的。

可是，万事万物都是不断的在运动发展中。资本主义的好景也是不常的，这班平日只会推动车轮子的小孩子，经了几百年

的训练，也长得顽皮起来了。

在生意中，几百年来的变化，说起来真是可怕。“十年兴败几多人”，昨天张三是一个大厂主，不想一批营业失败，他就被李四打倒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斩旧人。”不知几多人被牺牲在这生意场中。如果我们把市场比作战场，这里是更要悲惨万倍的。

资本主义自从把世界各角落里都变成市场后，生意做得庞大，几乎不是一个平常人想象得到的。这种庞大的生产力，这样社会的生产，而主持这生产的人，都只是少数老板，这样大的事业，只是少数人的私产。弄得世界上肥胖的人，庞大得不成一个东西，饥饿的人，瘦得象一个饿鬼。老板们现在是一天天减少了。每一个国家里，真正的大老板就只留存几个，他们几个人就变成牵着一国的命运之神了。生产的东西虽多，因为买不起的人太多，也就变为没有人要，生意场中的竞争又越发激烈。这些人们现在比武的场面，是在国际间、制度间。

这里展开的角力的场面：

是国与国间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斗争，老板和转动车轮子的世界大众的斗争(即和世界革命、社会主义体系斗争)。

为了应付这广大的斗争，各国的大老板们无疑的都弄得有些焦头烂额，他们感觉旧的生意经已经不适用了。

“三簧”是不合用了。巴力门变成了多余的、烦琐的东西。自由、民权，徒然招惹了许多纷扰。罗唐之类的先生，也完全变为不合时宜的废料，应该把他丢到垃圾桶内去。

为了挽救这半去势的场面，为了多挣扎几天自己的生存，应该怎样办呢？戏总还是要唱的。老板们坚决的再组新的班子。

于是丑角登场，把过去的一些“民权”、“自由”的假面具完全取下。巴力门的大门上贴上封皮，一切人们嘴上加一把铁锁。法律变成了放屁，放屁反当作了法律。什么代议制，暂时收起来吧！

这新的班子登场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自己阶级内部，用武力统一起来。

把自己最亲信的子弟武装起来。

对顽皮的转车轮子的人，下了一道命令：“你要反对我，我就杀你这狗才。”

对新的戏班子（以下要专篇介绍的）和新舞台，预备再来一个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去消灭他。

极力制造战争，去抢夺别的国家的领土，再分割殖民地。

疯狂的提倡爱这丑角领导的国，提倡说谎，把小到针鼻孔大的事，夸大到天大，提倡“古玩”，标榜“变异”、“怪事怪物”、“盲从”。

为什么要来这一套杂耍呢？

这容易明白，狗急跳墙这句话，就代我们回答了。是的，这杂要是玩不长久的。新的喜剧已经诞生了。

新的时代的序幕

我们从一部政治戏考中看尽了数千年的“治乱兴亡”，“此起彼伏”。台上的戏不知换过多少，但仔细思量，这种政治制度的变更，无处不和新兴的阶级关系相配合。土地贵族的“天命”告终，接着就出现了资本家阶级。现在资本家阶级，又到了日暮穷途了，劳动大众就执着斧头镰刀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这些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又是受当时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变更决定的。某一个阶级在社会生产中出风头、占上风，在政治上它就是统治者，如果它还是刚刚长成的呢？那就要爆发革命。这个演变，虽然保守阶级总是把时间拉长，但是到了扫台的时候，也依旧不能不悄然走下台去。

人类的历史目下正进到一个大变动中。在这资本主义母亲的肚内孕育出来的那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现在已经到了跳出娘胎的时候了。社会的阶级形势呢？变成了代表新旧生产力的阶级的决斗。这个决斗，现在获得胜利的虽然还不过地球的六分之一，但是前途的胜负属于哪方，那是明白的可以看出的，并且时间也不久了。

在政治舞台上，目下是在唱新旧的对台。旧的用不着我来再表，就是上篇说过的扫台戏，至于新的呢？那倒不可不仔细来表白一番的。

新的戏剧自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动，但不要着忙，我们是可以把它弄清楚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一种管理人的工具，所以我把它比作做戏，做给被管理的人看的戏。但是，这些拿斧头镰刀的人走上舞台来了，他是否也象法国革命时代那些老板们一样气派呢？

那完全是两样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要取得这种管人的工具来保护自己的私利，他们的要求是要废除私有制度，废除人类对人类的剥削，铲除由这制度所生出的社会阶级。没有了阶级，自然没有再要这种管理人的东西了。他们要实现的是全体社会都成劳动平民，都成治者，他们要扩大人类历史所未曾有的兄弟情睦。

他们以后根本不要这种管理人的东西了。那时他们要管理的只是"物"，把电气化下的生产力扩大到最大限度，把生产按照社会消费的需要，作出一定的计划去进行。大家都是老板，谁不必占谁的便宜。每人只须按照统计局分配的劳动时间到大工厂、大农场、电气站、运输机关，以及各种间接生产部门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时指拨机器，或拿着铅笔在打主意或思考什么，其余的时间由你用到艺术、科学及各科娱乐生活方面去。那时的生产从"虽尽所能，没取所需"，通过"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阶段。生产品会庞大得使你现在不能想象。人类文化艺术，尤其是技术都会起飞的向前发展。人类不独没有人压人的现象，智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别也消除了。没有阶级，没有国家。那时人类才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博爱"，那里还要看今日这种野蛮的戏剧（政治）呢？

不过，这些节目，还是以后的话。在今日，这一个新的班子，

在客观上还不允许它演出节目的全部，现在还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目前喜剧的开始，我们只可以说，它在造成这些节目实现的前提条件，将一切可能性渐渐向现实性方面推移去。

这喜剧的第一幕，揭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强烈的光线下，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中，听见一片巨雷的吼声，看见无数的大众，手里拿着斧头镰刀，跳出舞台，高声喊出苏维埃万岁。以后看戏的人，就把这一幕戏叫它做苏维埃。

他们也象二百年前，资本家阶级拆毁大皇帝的金銮殿一样，他们也把整个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体系打得粉碎。他们以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公意，建立了真正大多数劳动大众的政权，就是叫做苏维埃的这东西。

空前没有的第一次，台上人与台下人有这样融和的笑声。台下人不象以前一样是看客，被戏法欺骗的人，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后台老板，台上的人，不过是由台下精选出来代表他们意志的公仆。台上的一举一动，做得对就喝彩，大家拥护，不对，登时就叫他下台。台务指挥又是属于一个最会代表大众意志，忠于大众的集团，这就是无产者的政党。

在形式，这一幕戏，也带有一点武生的气味，与那扫台戏也多少有些相象。不过，相象的只是形式的一部分。即这个政权是属于劳动大众，很不客气的打着劳动大众专政的旗帜，要压迫资产阶级。这与扫台戏本意是资产阶级专政，用警察军队去压迫劳动阶级，而在口头上还要说谎就诚实得多。劳动大众，因为自己是多数，为多数的利益，压迫那少数压迫多数的人，等于对付强盗一样，没有什么不道德，不心正。现在拿到政权，首先自然要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攻，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防止他们破坏

劳动大众国家的经济计划等。所以，这里一切都是真实，用不着什么戴假面具，画脸谱，装什么讨厌的腔调。

出台的角色，更是大大的不同。这里出台的是大众最能干的选手，这选手要好多有好多，并且每一个台下人，都有上台的机会，他的权力是大得吓人的。这比起扫台戏那样的丑角，那样不容易找丑角，丑角的威风只在警察的刀上，真是现出衰亡的阶级的可怜相，与新阶级是不可放在一起相比的。

至于在本质方面呢？

那有天大的不同。扫台戏是在作最后的阶级存在的挣扎，苏维埃的"全武行"是用阶级的力量消灭阶级。它只有对少数人，一时的强制性，不是要永远维持这种强制的。

所以这个新的政权，它的"全武行"的性质，不是它的特色，它的特色是渐渐的减少这"全武行"的色彩。这个转变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是用革命的手段，用政治的力，没收大资本家的一切产业，没收一切交通工具、矿业、银行，土地收归国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素，消灭资本主义及其他落后的经济要素，消灭剥削制度及阶级存在的基础。

同时将政权完全公开于一切辛勤的劳动大众，不分民族、性别、信仰怎样，对一切剥削者剥夺一切公权，并在政治活动中训练人民，使广大的人民参加政治，大量的培植新社会建设的组织者、选手，肃清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

在意识上，在改善物质生活，提高文化水准，参加实践的经济和政治的生活，各方面去克服和肃清旧社会意识的余毒，与一切妨害新社会建设的不正确的意识决斗。

在技术上，极力采用新的技术，提高技术水准，促成新的技术革命。

这个过渡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的渡桥。这个阶段的所谓政治，自然仍是阶级的，但同时是阶级的结束、政治的结束。这个时代政治的重心，在巩固革命胜利，争取以上各条件的胜利，造成新的剧目开演的条件，和转入第二幕第三幕的前途去。

这是新时代的序幕，是人类喜剧的开始。

现在这个序幕已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域取得完全的胜利了。

再向上一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书场上要讲的这部名叫“社会的结构”的大公案，讲到这里，现在要回头交代一句了。听官！我们好比游宝塔，现在是一层一层向上走，但是请你们特别留神，上得越高，你不要被外界的风景迷住才行。我们又好比在参观一个工厂，我们把锅炉房、动力机看过了，现在是站在工作机旁，我们看了许多小轮子在转，许多小工具在动，在做着各式各样你未想象过的工作。你或许要被它迷了，要惊叹这小轮子，小工具是如何的神秘。朋友！惊叹过后，你不要也停留在惊叹中，你应将你参观的全部回顾一下，把看过的动力机、传力机与现在工作机的关系联结起来，你要望着那比飞还迅速转动的皮带子啊！它把那看不见的动力带到各处了。

是的。譬喻不过是譬喻，不能顶真切的。人类社会这部构造图，自然不是机械的象一个简单的宝塔、一个新式工厂。我要交代的，只是要诸君在参观“社会建筑”时，不要忘了“社会基础”就好了。

以上我在社会基础的部分，谈过了“生产力的状态”和“经济的关系”了，虽然说的是有些弯弯曲曲，譬喻也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大约的轮廓是画出了的。在社会建筑谈话的开端，自然就是社会的制度，这一部分我特别用了许多篇幅，编成了好多的故

事，多方面的描画出所谓政治法律等影象，到新的时代的序幕止，勉强的将它作了一个结束。自然，一切都是说得不够的。

现在我们场子内要说的是什么呢？说得文雅一点，我们今后要讲的大题目是叫做“社会心理”。这里面又包括四个主题，就是“道德”、“风俗”、“宗教”、“艺术”。朋友！你不要听了这些洋里洋气的名词头痛，以为我在你们面前背诵西菜单子，救不了你们的饥肠。不！我要说的，倒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平凡的故事，你我他都不能不受它（社会心理）的影响和支配的。同时它也是我们的精神的粮食啊！

先来说道德吧！不要把“道德”看得那样下贱，以为是江亢虎独家出卖的膏药，也不要把“道德”看得怎样高贵，以为是要穿上长衫马褂，目不斜视的人才配讲的；也不要以为只有孔老二的“道德”才是真牌子的，以外一切皆伪货。这些话都留在下面再说。风俗，也是一样，不要以为它仅是专门研究风俗的学者才配谈的。不做和尚，不念经，不上礼拜堂，不禁止吃猪肉，不见得就不应该晓得什么是宗教吧！

艺术也是一样，虽然在现社会里，艺术是被一部分人占有了，连参观一次绘画展览，我们也轻容易不能做到。但我们在黄浦滩头，也看见过铜像，巨大的建筑。过年也要挂一两张木刻的故事画，虽说这些东西不见得全是好的艺术品，但不能说艺术与我们日常生活全无关系，因为这些东西都把社会心理的一方面映出了。

什么是社会心理呢？如果你要我拿给你看，那也不能难住我。我可以从上面指出的各方面，找出许多故事、新闻、书籍、雕刻、绘画、建筑等具体的表现物给你。你自然可以在这些东西

内，认出什么叫做社会心理。

但是，这种说法，也许还不很明白吧！这名词就够难懂。譬如就个人的心理说，有武人心理，奸商的心理，奴才的心理，小姐的心理，这是容易了解的。至若说，社会心理，因为社会不是个人，乍听起来不是很不顺耳吗？

这种不顺耳是不足怪的。但是我们只要把以上的许多次讲话回味回味，就会记起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我们老早就说过，人类这东西离开社会就不可了解了。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个体构成群，构成群体的士敏土是劳动，人类要共同劳动才能生活。在这共同劳动中，人类不断的发明和改进了物质的生产工具，演化了生产力的进展，创造了各种形态的经济关系，作为社会建筑的基石，在这基石上站住了与基石相配合的社会政治制度。

但是在这物质生产过程中，在没有差别的社会的阶段内，那种共同组织劳动时的副产物就是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就是物质生产的“精神工具”，也是组织劳动的手段。社会心理是指在每一个时代大众在观念上认为共同的、当然的“共心”。但是这种“共心”是如何造成的呢？它一部分是直接受经济关系的决定，同时它要通过社会政治制度。

因为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是常在流变中的，人类的头脑，社会的心，也一同在变化。无论在经济领域内，或政治舞台上，一切的现象，那能说永远不变呢？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所以，世间也就没有一好就永远好到底的事物，总是受着历史所限制的啊！

然而，这种无常倒也有趣。假如这个社会的心果然就是我

们原始祖先时代的，那就无异否认了社会的进化，那还有什么戏可唱呢！

不！无论从道德、风俗、宗教、艺术、科学等哪一方面去看，都可看出它一些时代的色彩，某一种颜色是反映某种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的。所以，把这些东西看做永远不变的人是守旧派，或者叫他顽固。

这些东西是如何在变化呢？我们在以下会详细表出的，这里还是用一个例子来作一个总的说明吧！

拿辛亥革命前后作例子。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心理与以后的社会心理自然是对立的。这无论从道德、风俗、宗教、艺术哪一方面都可举出若干例子来。但是这种对立自然不是有了辛亥革命才产生的，它老早就在旧的社会心理统制中存在着、潜伏着、抗争着。

起初，这种对抗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专制主义的淫威压服了一切，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支配了全国大众，即在社会心理方面也一样麻醉着人的头脑。使你忘记一切不平和痛苦，使你永远屈服在愚昧的残暴的淫威下，使你想不到"人权"和"自由"。不用说，那时的道德着重在尊卑名分上，以愚忠愚孝奴颜婢膝、忠君爱主为可贵，以仁慈恭顺为美德，片面的贞操观念，裹小脚、讨小老婆的风俗习惯，以及敬祖先和叠宝塔式的神的虚构与膜拜，宫廷消闲享乐的艺术等，在统治者大地主群的眼里是当然的、美好的、愿意的，并且是不得不如此的。

这与辛亥革命以后的，自然有牛头不对马嘴之感。所以目前尚残存的遗老、遗少们对于民国以来社会心理方面的现象要摇头看不惯，这都是不足怪的。

是的，这种社会心理的抗争，对立到什么时候才明白表面化呢？这当然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代表新的社会心理的人是整个革命群团及全国民众中醒悟的分子，他们除在用血作殊死的民族革命奋斗外，在观念领域里的肉搏，也不减于沙场上。慢慢的辛亥革命的火花燃烧着千千万万人的头脑，由历史造成的人类的顽固一天天被粉碎，于是在观念上被解放了，以后诞生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变革。

社会心理的分裂，瓦解，往往就是预告社会的暴风雨之将至，在新的经济关系与社会政治制度上需要的，又是一套与之相适的社会心理。

只有老旧的基础未完全倾覆前，旧的残余才有萌生、滋长、苟延、存在的可能。否则，人虽顽固，也受不了实践的洗荡，不得不放弃旧的观念的。自然，残余的观念与残余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一样，在现代社会中，总还是存在的。并且在观念方面，往往在社会变革的初期尚顽强的以反动的姿态出现，并不就同政治制度灭亡。这只要拿辛亥革命后，已经变为民国了，到今日还有江亢虎这类的人就可概一般了。

这是一个例子。不过说明本书场上以后还有不少的热闹的故事听，在那些故事中，你可窥测到各时代社会的心，也可帮助你了解当前一切社会现象，尤其是关于社会心理方面的。

行为的标准

人类对于自己不能了解，或没有了解的东西大概总觉得有些神秘吧！神秘这两个字，我想，最正确的纠缠，就是对于事物不能看清它的本质，不能还出它一个三清四白。一切事物，能够给它说出一个清水底子，那什么神秘也平凡了。

譬如，拿道德来说吧！

这里有甲乙丙丁四个人。甲在叹息“人心不古”，“道德沦亡”，欲谈救国，非先从维护道德不可。乙则听了大笑不止，觉得这是迂腐之论，他掉头不顾，并且耻言道德二字，以免自己身上带着一股酸气。丙、丁两人没有意见，只放出惊异的眼光注视甲、乙二方，叹为高论，非他们小民所能了解。

这四位先生，赞的称赞，反的反对，惊异的惊异，但是他们很明白的都对这东西有些神秘。这四位先生，刚刚是代表今日许多人对道德了解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坏处，就在他们没有了解道德的本质。

所以现在咱们在街头上来谈道德，并没有侮辱、看不起道德的意思，同时也不见得一谈道德，就会带上一股酸气。我们对于以上四位先生的态度，都不大满意，我们要谈的是把它的本质弄清楚，揭穿神秘，还它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不夹杂别的五颜七色；同时，我们也不带一点好恶，闹着什么意气，

一定要扯谎，弄歪，“指鹿为马”，或不屑谈它。

现在，先来说道德的起源及其产生吧！

这一个问题是够纠缠的。我们几百代的祖先恐怕对于这类问题都很少用过心思，不知在什么时候起，身体上生殖器的部分要用一块东西掩蔽起来，不能同最近的亲属发生性的行为；身体上要印刻一种花纹；死的人的尸体要把它埋葬；厌弃人肉，等等道德及习惯。我们的祖先，总是父传子，子又传孙，奉为“金科玉律”的，认为是既死的祖先及超人的精灵的训诫。谁还能问这些道德习惯的根源呢？

在当时，自然也是无能力来解释这些的。

后来，人类进化到较高的阶段时候，对于以上问题，渐渐觉得以前的解释有些不对。道德的信条，不是直接为神所给予的，神仅赋予人类某种道德的禀性。

到十七八世纪，又说，道德是一种本能，并且是与生俱来的。人类这东西，本质上就有一种道德观念，或有一种道德的情感。所以人类才有道德的行为。

说来说去，都是海里捉鱼，摸不着边际的话。但以上的看法，却有着它的一致性，就是把它看作一种超物质的，永常不变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解释什么我们要知道的。

揭开这些神秘的外衣吧！我们不要在认识以外去兜圈子。道德既然是社会心理的一方面，并暗示大家以行为的标准的，我们还得从人类生活中去找起源。

现在我们从我们的祖先过的那种简单的共同生活看起吧！

在原始的人类的群里，个体在经营共同生活，及合伙劳动

时，个体为了满足群的需要，所有个体与个体间必然要产生一种相互结合的关系，这种打伙的关系，就叫它作生产关系吧。要想保障这种关系，并使它延续不断，就需要一种较坚定的相互行动。如果个体要任意为所欲为，不受一种秩序和规律的拘束，那人类社会这东西，恐怕就不能想象了。当时人类还没有法律观念，对于遵守群体内所产生的因袭的约束，完全是出于自愿，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所以有人说，道德不过是从"人类所赖以栖息的经济关系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没有一种共同生活，也就没有产生这种行为范畴的结果的。这话很对。

实则，这种适应群体的行为，不仅在人类共同体中可以发见，就在动物团体中亦可找到很多的例子。这里让我来抄录一段动物学家勃烈门在非洲射猎猿的记事吧！

"当猎犬向前逼近，多数的老猿都自岩石而下，聚集在山谷中，以迎抗前面的敌人，将它们包围起来，发出极可恐惧的咆哮，露出极凶残的獠牙，并以手挝地，露出极残暴狞恶的目光，注视它们的敌人，致使素来好斗有勇气的猎犬，亦望之却走，显出畏怕的情形，奔向主人求援。我们不消说，重新鼓舞这些战士，激起它们厮杀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势已经变更了。那些得了胜利的猿们，已经向它们原来所预定的方向集合去了。当猎犬再行奋勇前进的时候，在山谷中只剩有少数的，并有一个将近半岁的幼猿，它看到猎犬，即行狂叫，急速的奔向一岩石上面，此岩石即为这些优胜的猿类所经营的。我们方在庆幸此次猎犬当可捕获此豸了。不料，结果不然，忽有一强壮的老猿，是很矜骄的，

并很庄重的毫无畏惧的表示，并不丝毫注意我们；自彼岸缓步而来，以近当敌犬，发出极锐利的眼光，注视它们，使它们完全受了它的影响，它自己遂从容不迫的攀登岩石，到了幼猿的面前，表示一种抚慰的态度，并且经过猎犬的近旁，引它回去，但是猎犬神色俱沮，莫敢奈何，只得任它通过。”（用寇罗氏引用语，章一贯译文）

这是何等新鲜动人的一幅图画呢！它已说明了就是在动物中，也有了这种“神的意志”“道德情感”呀！

这还有什么神秘呢？

人类的智慧当然高过猿，所以他们对于共同体里面诞生的因袭有效的道德，大家总是严格的去遵守。我们现在又可从今日尚存在世界各角落里的所谓野蛮民族中找出不少的例子。

就借用一点基督教徒和旅行者的笔记，以及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如《爱斯基摩》之类来看看吧。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野蛮民族的道德，有时往往高过白色人类，因为他们的行为的标准大多是因袭下来的，在一种不成文书的约束下，自己约束自己，否则，就要受其他分子的反对。有时我们看见他们处分不守约束的人，在我们这些号称文明人眼里，觉得是过火的，在他们并不如此。

是的，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性的生活中及一切社会的生活中都有一种不成文的行为的规范。这些东西的产生，自然都是顺着内部发展必然的结果，以适应共同结合、共同劳作的条件，而发现的某种互相的行为的形式。等到这种行动形成法则或习惯时，得到了大家的默认、遵守，就成了所谓道德。

在把道德看做是文明人的专有品，否认“野蛮人”有道德观

念，都是天大的错误。

这样说来，道德还有什么神秘么？"神的意志"在哪里？所谓道德的感情，也就不过是先从已有的生活条件发生了道德和习惯，然后才有道德与不道德的感情的。在没有发觉血亲间性交的弊害以前，在没有确立禁止血亲性交的约束以前，是不能有对血亲间性交行为发生道德与不道德的感情的，至于所谓道德的本能，那更是瞎扯了。

既然如此，那把道德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自然是不正确的了。弄清楚了道德的根源，我们就晓得人类社会生活有变化，这种行为的标准也就得随之而变化的。所以，我们对以上的那位甲先生，在喜欢叹着人心不古，道德沦亡，觉得他把道德看成偶像，作为宗教教条在迷信，本身是不懂什么叫道德。对乙先生完全讥笑道德，认谈道德的人就是老腐败，也是不懂道德！对于丙丁两先生那样只会看热闹，自己没有主张，也一样以为不可。

只有找到它的本质后，才能明白它的发展，以及我们当前的行为，什么是道德的，什么不是道德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类什么道德，不需要的又是一些什么。谁在卖弄道德的膏药，卖弄野人头，这一切让我一桩桩细表吧。

力 量 和 勇 敢

在上一次的闲话中，我们把道德的起源略为说过了。我们甚至在动物的故事中也发现了一种利群的行为，通常也就叫做道德的。不过是更原始的意义罢了。原始的人类在共同生活的群体中，所产生的那种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袭的行为的标准，更可在现在残存的所谓野蛮民族中得到证明。

如果把道德比做是一条长江，我们以上仅寻得它的发源处了。但是，这条川流不息的长江，流到现在，经过了一些什么变化呢？这倒又是我们要追问的。

确实，人类的生活有点象水样的会变，所谓这种利群的行为，这种叫做标准的行为，真有些象一九三三年的标准美人、标准西装、标准头发一样，到了今年又是陈货色了。现在我们且来话点“天宝遗事”吧！

拉发格在《英雄理想的形成》中，首先指出原始人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是力量和勇敢。一个有宽的肩臂，能打得过几个敌人，又有相当的战略、度量，并有说话的能力的人，就特别被大家所尊重。所以在野蛮和半开化时代的拉丁人，在文字方面就把身体的力量，勇敢和道德，造成了一个字。这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他们这样看重身体的劲健和勇敢呢？

因为当时群的生活的维护，是体力劳动，尤其因为要预备战

争。自然，这时候的战争的性质与目前的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得向前，大家都是战斗员。这就要有发达的身体，有最大的抵抗力，同时要有牺牲的精神，出死入生，身冒百难的勇敢。如果你打了败仗，作了俘虏，你就得受着疲劳、饥饿、拷问的刑罚，不能表示怯懦软弱。

所以当时最有道德的人，就是象黑旋风李逵那样的蛮汉子。可是，朋友们！这时候的道德是不容易讲的，不象现在什么道德会的人，只是嘴巴上的说得那样容易啊！

因此，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教育中，在体操课以外就再找不出什么叫做修身的东西。他们的教育是整个的身体和精神教育的统一。从儿童时起，身体方面受着自然的特别锻炼，使身体健壮，且同时用禁食的方法去习饥饿、鞭笞以练习耐苦。我们在读西洋史时，从前总觉得斯巴达的尚武，有点奇怪，实在也平常得很。这种教育制度（如果能说它是制度），也不过适合当时生产关系罢了。

在今日，我们可以在野蛮人种间，看出他们的勇敢健康胜过我们这些号称文明人的。同时，他们的道德观念，也确比文明人要强烈，这也仍然是我们祖先时代残余下来的一点遗迹。连今日的白种人的教士，也不能不承认野蛮人，在道德方面要高过我们。我们这些生长在温和、文明世界的人，简直没有他们那种热情去冒危难，去牺牲自己，为着群体。这使我们自己觉得惭愧。

什么是野蛮人半开化人认为不道德的东西呢？

是怯懦，是身体和精神的衰弱，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不备具劲健、力量和勇敢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

换一句话说，不道德的人就是对于群缺乏贡献能力，没有贡献能力的人。

这自然要发生一部分有特具体力和勇敢的人，受到大家特别的敬畏的事实。他们渐渐成了群体的指导者、首领。到了半开化时代，他们就是当时的贵族了。因为那时的经济生活渐渐进到安居一地，于是防卫那一块定居的土地便成了这一些有力有勇的人的独占的专利了。

在当时有了防卫祖国这种专利的人，自然也就具有一块土地的人。外来人，工商业者都没有这种权利的。对于这种防卫祖国的事禁止平民参加。这一来，勇敢这个德行，经了这发展就变为贵族群的特性，平民就只能安于怯懦以为美德了。在生理上，也就产生了两种结果。那种专事手艺劳动的人，把身体弄得很衰弱，智慧也减低了；至于这些贵族们则用“体操的锻炼，谐和的发展了贵族的身体，长得非常均匀”。

这些拥有生活于其上的土地的人，就是当时部族或氏族之一成员。

这种英雄的理想是如何诞生的呢？

无数的，也是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产物，适合当时经济关系与共同生活的条件的。

“半开化人，有操作的，只是饲养牲畜和经营最初步的农业。以外遂纵于抢劫与海盗的事情，来消耗他们太充分了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强劲之力，并且就用以占领他们所不知道和不能够有别的方法可以取得的财产。”

在当时，斯干底纳夫人，传说在播种做完以后，就乘船，到欧洲沿岸来打劫。“抢夺的职业，在那时不是可耻的，它反引导出光

荣来。”

这些英雄们一生拿着剑，生活是一种长期的战斗。有畜群和有收获的财产主人，手里总是不离武器，武器在当时是用它来完成公共生活的手段。因此要想象一个没有战士的品德的财产主人是一种梦话。要有了身体和精神的品德，方能取得财产，保守财产，所以当时道德品性与物质财富不独不是对立而是完全同一，甚至于在文字，也以一个字去代表两种意义。

自然，这种道德的观念也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这种造成战争和氏族共同体那种半开人的社会环境，要求这样一种行为的标准，“即伸展人类高贵的品质是身体劲健、力量和勇敢。其他如利己、虚伪、阴谋、放荡、欺骗、悲观、狠戾、堕落等观念，在那时没有存在的基础，是想象不到的。当时牺牲生命财产于生活共同体的忠诚，达到了至高的极限。”

这些行为的标准到什么时候就失掉作用了呢？

这就是在民族公共占有的可耕地的划分发生了不平等的变化，由于这个经济现象及所生的政治的变化，而在语言上也开始现出的精神的道德，与物质的财富之原始的联合了。人类的行为标准，就同一九三四年的时装一样再翻出一个新花样来。这到下回再分解。

十七世纪贵妇的恋爱

英雄的故事大家总是高兴听的。小蛮读完了上次的街头讲话的原稿后，就叹了一口长气。

"为什么?"我问他。

"我说人出生的时代有幸有不幸。譬如黑旋风李逵，在《水浒》的故事中，只是一名可爱的强盗，倘若生在今日，除开替阔人保镳外，也不过做一个苦力吧！不足道的。要是他生在几千年前，他不正是一个受众人崇拜的英雄，同时是一个最有道德、有财富的人呵！"

"啊！你倒想得周到，可见一切的东西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不过就道德说，我倒从来没有听得象你这样说过。"

"这也是书上是这样说的。"

自然，小蛮还要听我说下去，书场子上的人也还等着呢。现在就书接上回吧！

李逵的不幸的命运，在此处，实在不必多去为他个人叹气。我们既然悟出了道德的流变，就来看它的变化吧！

是的，近几天来.气候变暖了，大棉袄就有点穿不住，大家都换上夹的了，谁能六月炎天还穿上皮袄呢？衣服的变化是跟着气候转。道德的变化呢？我们已经说过，是跟着经济的现象及其所生的政治制度而转的。说出来，就平常得很，也不过等于换

季之类的事。

话说那氏族共同体内，随着生产用具进步，人口增加，家族与家族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外来人口混进等，渐渐使那种和平的共同体内发生了变化，土地慢慢的集中到某些家族手里去了。或者竟有的落到外来人占有状态中去，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土地的所有者，和一些失了占有财富的贵族。这一部分破落的人，一天天增多，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层。

更正确的说来，那时的社会除新生的这个破产的贵族层外，本来还有工匠、更穷苦奴隶，都是被压迫者。新生的富有者，凭着他们所占有的大量的财产，造成了他们的权力，他们利用了高利贷来夺取破落者的财富。这样一来，旧的经济关系就加速的在解体。

这些破产者，大多逃跑到靠海边的一些地方去，混在工匠、小商人间，渐渐把这些密集的人口的居留处，变成极热闹的城市了。商业工业活动的范围，渐渐推广了。这时发生了由商业工业和高利贷致富的平民社会层。这些致富的人就利用了同那些破落的贵族的同盟，向统治者威胁，取得了很多的权利，或者变作城市的主人了。这一来，你争我夺，在希腊的历史中有的是全武行。

这个变化，使得海上的剽劫和强掠，所谓海盗的产业也要宣告闭幕了。因为有了工商业的发达，城池也就变得十分坚固起来，并且那些较大的靠海边的城市，还创设了海上警察，专门捕盗。自然这种水上买卖，从此失掉了威灵，在工商业人的观念上，也就认为那是一种不正当的事业。

这些新的富人，从幼就没有习过武艺，再不会弄枪弄棒了。

他们会做的是守财，打算盘，于是持干戈以捍卫祖国的事，就不能不另觅一部分人去代替。好在这时李逵这样劲健的穷贵族有的是，雇佣兵这种东西就因此产生在雅典，他们军队的大部分，就养的是支薪的雇佣兵士。从此时起，钱这东西就显起威灵来。

财富的主人都变成一些文绉绉，脸上带些铜色的人了。所谓捍卫国家的武士，自己反没有尺寸土地。战争危险现在不归有土地的人负担了，战争所获得的利益却大部分要归有土地的人所有。

从幼小就磨练得一身本领的那些半开化的英雄们，本领尽管你好，你失了物质的财产，你那精神的品质也就不被人敬重了。这种经济的变动，使得物质的财富和精神的品质分家，"财富不再是德行的报酬，不再成为德行的标志了。"

个人财产关系的商品社会诞生了，适应这个经济现象又需要铸造一套与之相配合的道德。

财富，这时变成了人类活动的目的。财富的获得既不是勇敢、力量的代价，也再不是劳动节俭的报酬。在这些工商老板的心坎中，倒反而觉得利己、虚伪、阴谋、放荡和骗取，才是主要的德行。

这本来没有错误。他们对人、对己、想的、做的、梦里、白日都是如此。但这些老实话是只能放在心坎中的，在外表上却不能这样爽直。

他们看见要维持新社会秩序，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是的，有军队、警察、法律，但是，还不够，最好要大家自己驯服、安分，象以前英雄锻炼身子一样，有一股傻气，使他们今后热诚的对主人

服务。这是最高的品德，这股傻气也就变成治人者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了。

这些主人们，一方面心中虽视财如命，一方面却也要装做看不起财富的样子，觉得只有智慧才真可贵。要别人不要贪图世俗的富贵。他们一方面尽情在享受物质的荣华，但要人专过内心的生活，从实际世界之外去追求那看不见的永久不变的品德。他们对自己是绝对个人主义的，但他对人却提倡牺牲小我，总括一句话，他们是生意人，"自己付劣货于人，却要求别人银色十足的货币。"他们的言行矛盾刚刚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

据说十七世纪那些尊贵的太太们的恋爱是二重的。她们在理想方面，总希望有一个故事中那样温存，可以安慰自己灵魂的情人，及其精神的恋爱，但她还得在丈夫身上，图一个十足的身体的恋爱和物质的享乐。她们把生活分作：理想与实际，纯粹生活与非纯粹生活二方面。

工商老板们也确有点象十七世纪的贵妇人。假若要事业成功，自己的班子能玩得久一点，他们就不得不装点仁义道德，急公忘私。若要自己真的发财，哪里能离得利己、虚伪、阴谋、骗取呢。所以他们的道德实在是二重的，自己心坎中的话拿不出来，说不出口，但口头禅的那套华美的道德，却只送给别人，专要别人去实行。有人说，道德在生意人手中，就好比是一顶高帽子，商场上不好戴的，他们就专往别人头上戴。

头上戴了这顶帽子的人，有的也就莫名其酱油，但是那位制帽公司的推销员，就大卖其野人头，说这是从天上掉下的，他们要把你的精神引到物质之上去翱翔，使你在浓雾中发昏，忘记地下的一切，忘记自己肩上坐着人家的屁股。

“机会平等”，“独立性”，“不依赖”，“守契约”，“不偷盗”，“有钱买货”，“欠债还钱”，“拥护祖国”，“民族魂”……等等就变为昔日英雄眼里的“力量”、“勇敢”一样的品性。不过，这些东西只是片面的，内中的奥妙不容易明瞭，人家一旦明瞭了，就会有人喊出“世风日下”啊！

这些道理真是几千年前的李逵那样的英雄所梦想不到的。

可尊贵的傻气

据说道德这东西的可贵，是因为它本身带有一股“傻气”。这里，我得声明，“傻气”二字决不带有病态或愚呆的意思，只是作为过度的真诚解才对。因为道德不比法律，它之规范人的行为是在行为之前，不象法律裁制已发生的行为那样带有露骨的强制性。

这一个字又与中国的“良心”二字有关，这里所谓“良心”，大概又可解作内心的意思吧！道德总是在行为之前就诉之内心，觉得我对于这件事应做不应做，结果决定我应不应。在行为之后，一个人也常常感觉忏悔、自责，也就是这一个道理。

所以在原始时代，在那种共同生活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人总是只知为公，什么事都怕自已少做。抗敌，自然是抢着站在最前线去，打猎捕鱼也总是要自已做得比别人多，见了弱者病者也是无条件去怜悯的，觉得本来自已应该救济他。这种为公、勇敢、牺牲的精神，就是当时的社会心理的表现，也就是当时的道德。这时候的道德，可以说是没有欺伪的作用，完全是出于各人的自愿，是社会的。我们说过，这种时光过后，接着情形就不同了。这种行为的标准，适应着社会下层的基础，变做是一种管人“良心”的工具。就是道德变为片面的，你应该遵守，他却可以不在内。甲向乙说，“你要勤俭，淡泊，忠诚”，他自己却可以一生不做一点

事，奢侈，多欲，欺诈。他说："你要勇敢，为祖国出力，为祖国而战死"，他却在服兵役条件之外，不上火线。他说"你不要侵犯人家的财物"，他却可随便占有人家劳力创造的东西。但是在外表上，口头上，他很敬重勤俭、淡泊、忠诚、勇敢、牺牲这些美丽的道德。

现在日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正用了这一套法宝。这法宝的总名字，就是所谓"王道"。在"王道"的系统下，自然提倡忠君愚孝腐烂的道德了。日本知道专用武力是统治不了东北的，轰炸机下蛋，到底也不是办法，不能把东北全毁了啊！取东北是作殖民地，开发殖民地也还需要劳动啊！日本的兵力要管这广大的奴隶群是不可能的，所以她仍要玩傀儡戏，要你们自家管自家。这还不够，要你心悦诚服，心平气和的过日子啊！"你要忘了中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样，她才能取了东北，能统治东北。不然，东北统治的脆弱是不能想象的。

这不是更明白的例子么？

不过，欺骗的买卖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蒙蔽能够永远下去，那历史倒也简单了。社会心理虽然在一时由某甲这一群占了优势，支配了别人，但被支配的方面，却不见得没有自己的心理。在被压抑下，它仍在生长。矛盾是压不平，消灭不了的。

在道德方面，自然也一样，虽然有人误将颈上的枷当作项圈，可是素来就认得清清楚楚，不肯上当的人就不是没有。就是上了当的人，也终在生活中，有使他清楚的一日。一旦清楚，他就要起来毁去颈上的枷的。

是的，某乙这一群也有自己的心理，自己的道德，虽然在起初也许连自己也不十分肯定、明白，但是一旦到某甲这方面走下

风了，这时某乙的新道德就出风头起来，这就是所谓新东西是生长在旧东西中，新道德也是这样诞生的。

讲到目下的东北，别的不谈，单就道德方面说，也是极端尖锐的对立的。虽然一方面有郑孝胥之流在那里出卖民族的“灵魂”，大倡王道、复古的那一套奴才道德系统。但在东北大众方面，因为实践把他们送到民族抗争上，所以也极端醒悟，为了适应当前的战斗的实践，于是生出一套簇新的道德来，与旧的立于绝对对立。

我从东北抗日武装战士的口中，知道东北战斗的同胞的新道德的体系是建立在民族战斗上。一切行为的标准是集中在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抵抗一切的侵略，求民族生存这个主题。

因此，个人主义为基点的道德观念一概被弃置了。无抵抗、媚日的王道，固然为大众所唾弃，即个人主义家族主义的愚孝，在抗战中也是被排斥的。这里，只有适于集团的，抗战的精神与行为才能被人珍重。

这种新的心理与观念，这种新的信条，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激于热情的思想与行为，是由于东北的实践而诞生。

所以，若有人问到新道德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就是在实践中。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新道德的基础。自然，它的生长是战斗出来的，它在实践中引导万人在他代表的理想方面前进。譬如在东北，他们一面用武力与日本战与汉奸战，但同时在意识的领域内，也必然掀起极恶烈的战斗，在道德方面就必然引出新旧的战争。

这也不仅在中国，或东北这一个例子是如此。在全世界劳动者群中也诞生了所谓集团爱，兄弟情睦，反个人占有大家劳动

等思想，形成了他们的行为标准，在各领域中，我们也看见它的成长，与个人主义的旧道德相对抗。

是的，如果道德是一股“傻气”，则天下事大都成于傻子之手。我亲自听见一位东北的朋友说，“只有傻子现在方在抗日谈抗日”，是的，东北现在确有不少的傻子，所以中国还有望。我们确实需要有一股傻气，但这傻气是以十分的认识为前提的，不然就会变成别人的工具，转化为“聪明人”了。

目下全中国人的傻气是什么呢？东北同胞那种战斗的傻气是否就是我们现阶段需要的傻气？

这问题，我想给诸君自己去回答，好在中国的实践是摆在大家的眼前了。

目前，我们还需要一股傻气，你有了没有？

巷堂内的风波

巷堂内这几天忽然起了一阵宗教的纷争，我来说给诸君听听吧！乱子的开始是极平常的。因为天气渐渐的热，巷堂过道的两边，一到夜晚就自然集满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些终日忙碌，到晚才得片刻休息的生物，一有了这碰面的机会，总不免笑逐颜开，你一句、我一句的瞎七话八的。人总是会说话的动物，要想大家坐在一起，闭着双唇不动，大概比猫子看见鱼鲜不流口水一样的为难吧！

不知怎的，大家把话头集中到回民马大块头身上去了。据说，马大块头是很和气的人，平日是不大容易动气的。这一天，因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猪肉，首先他只说是教门的规矩，自己从小习惯了，也不要吃。这时就有烟纸店的小伙子阿三向他开玩笑，说猪肉如何好吃，最后还把一块猪肉皮送到他的嘴边说："你尝尝就知道。"弄得大家哄笑，于是他也就发了脾气，打了阿三，不想他的手硬，随便一动，他就不得不吃伤害官司，坐到大牢内去。

这风波并未因马大块头走后就告终止，许多回民不服气，无端的对教门以外的人产生敌意，同时这街头的舆论，也就天天离不了宗教的谈话了。

骂阿三的，并不仅是回民，裁缝店的张老太，她是念佛的人，

她也骂阿三轻薄，不应破坏别人的清规。老太婆的话是重复的，好象打开“话匣子”，天天是那一套。不想又引出基督教徒卖假金牙齿的何老板的抬杠。他说，阿三固然不该把肉皮那样不卫生的东西送到人家的嘴上，但回民不吃猪肉，明明是愚蠢无知。动手打人，更明明是野蛮。基督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一起送给人打”，那里象他这样不能忍耐。不想话未说完，只听得“劈”的一声，何老板脸上，不知从那方飞来了一个嘴巴，打得刺刺的。他翻身一看，后面站着的是万平，一位艺徒学生。他笑嘻嘻的道：“何老板，左边的打过了，右边呢？”不说犹可，一说，把何老板气得六窍生烟，揪着万平不肯放手，要同他父母讲道理去，这一段纠纷的结果，在下不想在这里细表。

现在要说的，从这一回事，又引出几位小姐们大骂基督教的欺骗。他们就拿何老板的话不兑现，作为证据，也很动人的听。这一来，天天晚上有热闹听，信佛的人骂吃基督教的人不要父母，作洋人的奸细，回民无理由的骂一切，基督教骂别的教都是迷信，学生就骂一切宗教都要不得。念阿弥陀佛是迷信，做礼拜也是迷信，不吃猪肉也是迷信，这样的弄成了混战。

自然，站在某种信仰的人就拥护某一教，排斥某一教。在一教中又分出了，我只信什么，不信什么。譬如，基督教中就有不少的派别，在我那一个衙堂内，有天主教、耶稣会，也还有其他名目；佛教中，也有各宗各派。就是不隶属某种宗教的人中，也不都是无神论者，有的信自己的祖先，有的信鬼，信狐，有的信命运，等等等等，说不尽说的复杂。真正的无神论者只有几个进步的学生、十几位在电气厂做工的青年工人和几个高级知识者。

“啊啊，我到今日才知道就在这样一个巷堂内，原来思想还

是这样复杂的！”芷说。

“可不是，这也就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方答。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些小的吵嘴了。历史上所谓宗教战争，虽然骨子里是经济的，但能打那宗教的旗帜，就是因为有许多不同的信仰存在，才有人去那样拚命啊！远的不讲，单就目前说，许多帝国主义都利用了世界弱小民族不同的宗教来互相残杀，以达到他们的侵略的目的。在欧洲的例子多得很，因为与我们关系较浅，不说它。就拿与我们关系很密切的说，譬如日本在中国各地煽动回民反对汉人，北平、上海都闹过民族纠纷，就可想宗教这东西一旦被利用，倒也不是好玩的。”罗说。

万平不知怎的这时也参加着说话了。他说：“宗教是鸦片、酒精。现在帝国主义正用得着呢！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遣队，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事。日本不独利用回教，也在利用佛教呢！

哼！英国鬼子隔天到我们厂里来传教一次，也都是何老板说的那一套。总是说些远远的鬼话，要我们将来进天国，却不让我们在地下活着。这些话，也明明是对厂主有用处，不然，厂里还肯每月花上数千块钱办教堂，请牧师么？”

“万平的话是对的，宗教是鸦片、酒精，它要叫你入迷，变成驯羊，供他们那些野心家的利用，我现在看穿了。任何宗教拆穿了西洋镜，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机器匠阿毛很气愤。

“哈哈！”罗说，“你们两位说的都对，一听了真高兴。我们平日少谈话，不想你们这样年青，又整天站在机器旁边的人，还有这般见识。我一向对于宗教也与你们所见略同，不过我们觉得反对宗教是可以的，却不能盲目的反对，要说出一个反对的理

由来。”

“这我们也不反对。”阿毛说，“我们反对宗教，只是从生活中体会得，就是上了那牧师的当，才感觉到。我们正是想更多知道一点，可惜，少读书，没法子多懂得。罗先生，你有时间的话，说一些给我们听听，好不？我们自然不会瞎反对，我们不信它，但我们要研究它。”

“了不起！”芷说，“你真是一个比大学生还懂事的人。是的，中国人现在确实有研究宗教的必要。不要误会，我不是提倡宗教，恰恰相反，我是要反对它。因为有人常常说：中国社会宗教的支配很稀薄，不象欧洲有那样固定的基督教；中国的佛教虽然势力很大，却给人信仰自由；孔夫子的道理，又不是宗教；这些似是而非的话，都要驳倒才行。宗教精神浸润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势力并不比人家弱，不过宗教与国家势力结合的方式要弱一点是事实。浸润到我们生活中的宗教精神，也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一样，是极端复杂的。这些看不见的酒精，不知弄坏了好多人的脑子。现在因为社会生活间的矛盾、纷争，也常引出观念方面的纷争。我想，如果大家来清算清算我们社会浸润的宗教思想，公正的把它说个清楚，至少是对大家有益处的。”

方这时也忍不住了。他说：“观念方面的争论，本是很需要的。如果说得大一点，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在观念上就得放弃一切腐坏我们民族势力的宗教思想。

并且，现在谈到民族解放，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要与帝国主义交手，就是在文化上，思想上也不能不与它肉搏。对于家内的落后的观念，封建残余的观念，也势必发生恶斗。

有人说，这与宗教联系不起啊！这是说谎。基督教与日本的佛教都成了侵略的工具，家内的佛教一切宗法的遗训及拜物的原始宗教精神，都与我们实际的生存奋斗有妨害。要生活上进、奋斗，马上就会碰到这些看不见的‘精灵’，谁说这些东西与我们无干呢！即就这一点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现代人，也非把脑子用科学的水去洗一次不可。”

“哈哈！”罗大笑道：“想不到由巷堂内一些幼稚的纷争，一直谈到这许多大道理上去了。好在天气还刚热，我们改日再继续谈吧！”

呒啥神奇

不管巷堂内的人声如何嘈杂，但谈话的人总是一团一团的。老太婆找着老太婆谈“因果报应”，孩子们找着孩子们唱《渔光曲》，老板们也聚在一块说当天市面上发生的事，真是常言道，“不是垃圾不成堆”，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阿毛在吃过晚饭以后，就约好万平和阿三，阿三腿上还带着伤，走路是一歪一歪的已没有以前那样活泼可爱了，但孩子总还是孩子，一听见阿毛说，隔壁方罗两先生昨晚同他们谈宗教，真是谈得有情有理，他也就兴致得很。他们一同来到方先生的门口，恰好方罗两位正在挥着扇子喊热，罗先生道：“今年天气真奇怪！还未过端午，就达到九十四度了，亭子间就已经坐不住。”

“哈哈！就在这下面坐坐就是，横竖有话说呢！”话未说完，方先生就看见阿毛领了一群的人，来到了自己的门前，除开平日常见的以外，还有三四位是不认识的，其中还有两个女孩子，也不是本巷内的人。不表方先生如何招待这一群人，只说他们相见寒暄已过，阿毛就单刀直入道：

“方先生，罗先生，昨晚的话实在谈得太好了。我们还想继续下去，现在就不说闲话吧！讲到宗教，我们做厂的一半就是无神论，但也还有人在信耶稣教，在求神拜佛。我们笑他们，但我们不能说服他们。我们不能够说出宗教的如何长、如何短的理

由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多知道了一点，能把一切的宗教的来龙去脉弄个明白，不是比平日那样蛮说蛮干，要好许多，使他们也会相信我们么？”

一位小姑娘插口道：“在我们小姊妹中几乎大多数都信基督教。她们因为都与教会有往来，在没有工做的时候，可以替教会做点针线，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她们也是满口的‘上帝’同‘主’了。但是在女外国人退还针线，要再做过，或不给她钱时，她们也曾想到‘啊啊！原来她们（外国人）口里说的全是谎啊！’”这一席话，把大家都引得注意了。说话的人却是阿毛的表妹，名叫三妹的。

罗先生这时就再也忍不住了。他说：

“你们这样热心追求真理，倒把我们这类书呆子愧死了。好的，话要说得爽快，你们随便问罢！横竖天气这样热，我们不能回房去做事，就天天来谈吧！”

三妹笑盈盈的说：“如果罗先生允许我随便的问，我倒要请问罗先生，既然宗教本来是说谎，为什么它能造出这样大的势力呢？”

“是的，因为你是近代的。你看了人家拿宗教来骗人，你才觉得它是说谎，若在过去，在古时候，在人类最初有宗教观念的时候，并没有人要拿宗教来利用，就不会说宗教是说谎。宗教这东西也是我们人类社会劳动的产物啊！并不是哪一个聪明人发明的。不过，现在正被一部分人利用了，在那里故意说谎，就好象是某一部分人故意恶意的造出的。”

“世界上的事物的发生成长总是有它的发生的根源的，并且也总是由简单的渐渐进到复杂的，现在要明瞭目前的宗教，还得

挖树盘根一直追到她那娘肚里去，先认清那简单的样子，罗先生是不是？”万平说。

“万平真了不起！”方插嘴说：“现在我们就从宗教的妈妈同爸爸开始恋爱谈起好吧！”

说得大家大笑了。

“方先生说的并不是笑话，宗教的爸爸和妈妈都是人，我们最古最古的祖先。”罗开始说下去。

“他们的定情是在劳动中。人类最初的生活是一小团一小团的打伙生活，是很艰难的。因为那时生产用的工具，非常幼稚，要在自然母亲的怀抱里讨一口饭来吃是不容易的。人开始就同自然争斗，但自然很残酷，自然现象是太繁杂，原始的人不能应付过来，受着的压迫是巨大的。这样一来，原始人不得不在这不可知的物前跪倒了，于是生出一种崇拜敬畏的共同的情绪来。在当时这样情绪，很有鼓励大家的勇气，从事劳动生产，成为劳动过程上有用的东西。

我说到这里，要回转头来补说几句解释宗教两个字的话。因为刚才说的原人对自然的敬畏的情绪，虽是宗教的情绪，可是那还是宗教的爸爸和妈妈定情的初期，还没有达到火热的阶段。

我们晓得，粗粗子说，宗教不外是对于某种不可知的‘物’或‘精神’的信仰罢了。从原始的拜物，崇拜鸟类、兽类、太阳、月亮、雷火、风及一切物的灵化，到只崇拜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不论形式怎样不同，总不过是什么‘精神’或‘灵魂’在那里作怪，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

不过，人类发生灵魂或精神的概念，虽在宗教的爸爸和妈妈定情的初期，就多少带有这味儿，但却还只有敬畏，并没有明白

表现出灵魂等概念。宗教是以灵魂为起源发达起来的。所以我说最原始的时代，在人类还未把身体分为肉体与灵魂两部分以前，不能算正式的恋爱期。所以它虽具有生儿子的可能性，却并未有生出这名叫宗教的儿子的事实。

宗教这孩子到什么时候才受胎呢？大概在人类社会确立了母权制或父权制的时代，才产生灵魂或精神的概念。

劳动在这时已渐渐分为两种不同的部类。在以前，小小一团内，大家打伙为生，做着同一性质的劳动。现在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劳动中发生了分业，一些人专门从事生产，一些人变为管理生产、指导生产。这后者自然变为是种族内年高有经验的人担任的。这样的发展下去，这些吃得盐米多的人，经验就越发多起来，就成为生产组织者、管理者、命令者、计划者；在他们手下劳动的人，就变得是听从命令者，命令计划的实行者。一方变成了意志者，他方是听从意志者。

这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

人类把在生产中习惯了的这种模型，拿来套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上，首先从自身开始。他发觉了人本来是两部的我构成的：一个是实在的，可捉摸的，又可看见的肉体；一个是空虚的，不可捉摸的，又看不见的精神。他们越想越觉得有趣。本来他们对于梦的不了解，现在找着解答了。他们梦见旅行，打猎，作战，梦见已死去的朋友，但一觉醒来他们仍然睡在一个地方，并未移动，于是就认为肉体的我外，还有一个精神的我。这个精神的我可以离开肉体去打猎、作战，因为'灵魂'比肉体可以来去自由，就以为灵魂高于肉体，灵魂是肉体的指导者，正如生产中有组织者一样，高于单纯的执行者。"

罗先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是这样的滑下去，好象在讲堂上说书一样，使得别人没有插话的余地。但他说到这里，不知怎的把话略为停住，聪明的三妹才得了一个机会打断了他的话头了。

“啊啊！我懂得了。后来人又把这个模型套在一切自然物上，以为一切自然物都有一个灵魂，于是以前对于自然敬畏的情绪，就更明白的带上宗教的色彩，以后多神教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是不是？”三妹笑嘻嘻的说。

阿三抢着道：“真是‘闻一知三’的小丫头，她居然抢着罗先生的话在教我们呢？”

“哈哈哈哈！”大家一阵笑声把这半天严肃的空气温软过来。方先生这时也从藤靠椅上站起身，踱着细碎的步子，将一张《大美晚报》当作扇子在扇，一面懒洋洋的道：“今晚总算不白过去了。宗教的爹爹妈妈的恋爱经，已被罗先生还出了最初的一段落。灵魂的来源找到后，再谈从这灵魂而化装出来的各色各样的宗教派别，就不发生什么困难的。”

阿毛接着道：“这里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指出了宗教的发生没啥神奇。人类脑筋这个东西，好比一个照像器，它不能摄出他不熟悉的，本来不存在的照片。宗教的发生，据罗先生所说的，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一种反映罢了。”

大家一面点头，一面去沉思什么，巷堂内这时变得静寂寂的，只有那水银般的月光，斜射在已入沉睡的家家的门户。

人 造 的 神

七点钟刚刚打过，三妹已吃完了夜饭，并且沐浴过了，她换上一件深蓝的英丹斯林布的旗袍，就同着两三个小姊妹们笑嘻嘻的预备出门去。

“唉唉！孩子忙了一天，你还让她赶夜班吗？”新从乡下来城的她的外祖父对着她的母亲说。

三妹抢着答道：

“哪里，有那样的日子就好了。这里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夜工了。我是去听说书呢！”

“啊啊！这里新开有闹子馆不成？”

“你不要听她的话，她这几天不知入了什么魔。以前散工后，就是看书。要她出门买一点东西，杀了她也是不肯的，这几天说是大森里内有位什么罗先生会说什么，等不到晚就要去了。平常的晚饭哪里有这样早呢！”三妹的母亲带着又得意，又忿怒的口气向她的父亲说。

“是的，青年人总比老人有希望，不要说我，就是连你现在也老了。我们做孩子时哪里知道要读书，要认识世界，现在是一切进步了，将来到底是他们的。”

这一对老父女还在不断的悠悠的谈东话西，三妹却在大森里内方宅门前手舞足蹈的说：

“咋晚阿毛说，人的脑筋好比一个照像器，它不能照到外界并不存在的景物，我昨晚想了一晚，越想越觉得不错。但是，我还想到，外界的景物，是时时在变化的。一年有春夏秋冬的不同，一日有日出、正午、黄昏、黑夜的分别，因此我们常常可以摄到新鲜的影片。同时，我们头脑里的映片，也不是完全能够把外界的物全部的摄到，同样要经过我们的选择。不过，我们脑内能够想出的东西总不能完全是空虚，即使我们的思想中有荒谬，那也可以找出这荒谬的根源的。”

阿毛笑道：“今天的书就由你作了一个开场了。我们就这般接下去吧！既然我们知道荒谬也有荒谬的根源，现在我们只要把这根源一桩桩的找出来，那也就不能不令人信服，登时觉得自己迷信可笑了。”

“是的，上次我们找到了那个一切宗教的种子，叫做‘灵魂’或‘精神’的东西，那是反映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由这关系而弄出的什么政治制度、社会秩序的。这个交代过了，为什么方先生上次还说出灵魂还可以化装呢？那就是刚才说的生产关系这一套东西常常在变化，这意思我懂的。但我的肚子内的货不多，不能把这些话说得更具体。”

阿三道：“你只知道自己弄斧忘了这里是‘班门’，我们还是请罗师父出马吧！”

“嘻嘻嘻嘻！”

“这里是罗宅，不是‘班门’呀。”罗先生笑说：“不过，你们总太自歉。其实你们说的，都比读过一二年哲学的大学生还高明。自然你们的材料少一点，这有什么打紧呢！说到灵魂的化装术，那真的比今日好莱坞的明星姑娘还要多出花样，说一千零一夜

也是说不尽的。现在我们要谈谈的倒是来检查检查人类头脑这东西吧！看看它过去所摄到的关于天上的影片吧！你看它是用什么做背影的。这也就是她的化装术的一部分了。你们随便说出几张来，我们好来讨论。”

三妹说：“我就常常听见那女外国人说，基督教是一神教，野蛮人的教才是多神教，现在我们不管基督教和什么文明、野蛮，倒想听听那位灵魂姑娘怎样一时化装为多神教，一时又化装为一神教的。”

“原始的宗教大概都是多神教。我们既然知道都是那位顽皮的姑娘在那里作怪，这也就不必把头昂着望天，尽可以到地下来找。”罗先生还继续说：“产生多神教的社会，大致是包含有两三个相互结合的弱小种族，各个种族各有各的长老、族长。这些老头儿们，分掌了社会生产各部门，同时在议事堂上，也摆上几把交椅，终天的在那里谈计划，处理、指挥经济政治社会的各种活动，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主张，在那里争吵。这些老头儿就是地下的支配者。”

三妹打断罗先生的话道：

“啊啊！我懂得了！多神教就是把地下这些老头儿的身上加上了一件灵魂的大衣，是不是？”

“对的，人们的头脑中这时想到天上一定也有几位象他们祖父那样长胡子的神，坐在天庭上玩把戏。最可笑的是，譬如地上有好多种族就有好多神化的祖先，好多种族神。当种族间是一样富裕的，这些神也变为一样的平等，称兄道弟，如果地下某一种族变得特别富裕，那富裕的种族神，在天上就当起主席来。甲共同社会的神，与乙共同社会的神也有时平等存在，如果我比你

强就排斥你。

在犹太圣书里，就说过，犹太人以前只崇拜唯一的种族神，对于其他种族神，民族神虽然不否认他们的存在，起初都看做比犹太神小，后来邻近犹太的种族富强起来，于是对于邻近的种族神发生了思慕的情绪，由一样的崇拜之心，一天天变得比崇拜自己种族神更敬意。这是很有趣味的。

后来许多种族统一成了一个民族，于是就出了一位大老头子的民族神，位置在一切种族神以上

拿中国的例子说，也就够味儿。我们乡下每一个小农村，有一位土地菩萨，土地菩萨的'上峰'，是城隍菩萨，城隍又有府城隍、省城隍之分，再上就是那位玉皇大帝。就这阶位说，刚刚与中国旧日的封建秩序相适合。

中国农村有排甲、团总，绅士以上是知县大老爷、知府老爷、督府、大皇帝这一套叠宝塔的戏。

地上与天上总是一致的。地上有了族长的分权，天上的神便也讲分权。地上有一个种族占优势，天上的神便也有一个特别来得神气。地上出现了一个统一国或君主政治，天上也开了一个君臣的局面。地上叠宝塔，天上的神也爱同样玩。不仅这样，地上的种族间和民族间要打仗，天上的神也要使刀使棒。地上政治经济方面发生许多专门家，天上也同样有许多专门神，他们执行天庭上的专门职责，甚至于人间有嫉妒、仇杀、吃醋，天上的神们间也常不和睦，地下大皇帝住的是'玉殿瑶阶'，天上也变为'琼楼玉宇'了。"

万平道："不说倒不注意这些，说出来真的觉得人类这脑子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处。人能够想到的事，大致也要是地下有

的，我在不知那本书上读到一句‘人只能按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情状制造出神来’，这话到今方才十分的明白。”

“你这话十分的对，由多神教进到一神教，其实这些话用不着再详细说了，那不过是一种演进。真正的一神教，是排斥一个唯一的主以外还有其他神的存在的，这是另外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上的发生的东西。严格的说，真正的一神教，它要到了经济上采的是‘个人自由发财主义’，解脱了一切封建宗法的束缚，及个性主义发生等等以后，才充分以唯一神的姿态表现出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神。

自然，这神就是上帝变为世界的唯一的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扩大到某一地方，这位上帝也就跟着飞到了。”

“这真有趣！”三妹说，“我还想到神的面目也是常常打扮不同的。不是各时代就有各时代的色相么？也是由于人造的。”

“可不是！”罗先生接着说，“真正的野蛮期，人不了解自然，以为万物都有灵魂，于是拜物，神的形象大致是禽兽。后来拜祖先，及多神教、等级教时，就是拜泥型木雕的东西，或者拜一张画相，几个什么字、符。以后慢慢隐去人形的面目，而代以‘仁’、‘慈’、‘爱’等等抽象观念。”

“照这样看来，推而到了相信物质以外还有一种什么不可知道的东西存在的人，与野蛮人比起来，也真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了’。”阿毛说。

“自然是的，有这种想法的人，他的脑子内就留有那位顽皮的灵魂姑娘来往的余地，她就可以在他的脑内作怪的。”方先生这时忽然插了这句嘴，使得大家都吃了一小惊，将眼由注视罗先生的面部移到方先生方面来了。方先生还继续道：

“今天你们又知道人的本领的大了。许多人以为人是神造的，今天却翻了一个身，到底谁是父亲，谁是儿子，现在弄得明明白白了。父亲向儿子去跪拜，不是最愚笨的事么？”

大家笑了。只有阿毛好象另有心事似的，他一面同大家一起站起身，预备回家去睡觉，一面郑重的道：

“现在父亲向儿子跪拜的又真是平常呢！我们终日生产，把许多人养活得胖胖了，我们养活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向你道，‘你是我养活的’，我们建筑了一栋大厦，但人们只知道是张大人一九三五年的亲自建造的别墅，忘了是千千百百的劳力的结果。这不一样是把因果倒置，一样是笑话么！”

三妹轻脚小步的跟在他的身后，软软的说，“你冷不？不要发气呢！大傻子！倒置的东西拿正就是了。”

神秘都是从赌场中来的

在工房里近日对于宗教的谈话更是开展了。这是因为三妹肚子内不能藏住她近来听到的许多新奇的知识。她同几个进步的小姊妹们热心的在商量："我们自已知道了，要赶紧告诉别人，如果把大家唤醒起来，她们不再相信'命运'，不再相信耶稣，那末，我们工人团结的力量就更会加强起来，生活抗争性也将更积极起来。"她们小鸟般的到处叫着。

可是，在同许多人谈话中，她们都遭受了许多反驳。有一天，她们正谈到由多神教变为一神教，说宗教如何如何的按照社会经济的演变而跟着演变，到了资本主义，宗教的形态就慢慢的隐去了人形的面目，而变为崇拜"仁"、"慈"、"爱"这等抽象的观念。小姊妹间就起了争论。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三妹说了一句，无产者应是无神论者，无产者是生长于高度技术里，对于自然界的疑谜可以用科学解决了。有一位小姊妹反驳道：

"如果科学真的可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既重科学，为什么还有宗教存在的余地呢？还让这一个鬼来烦扰人们的脑海呢？欧美各国的科学现在也不算不发达，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反不是无神论者。你说，宗教是上层阶级麻醉低级社会的，我固然相信，可是为什么外国资本家真正相信宗教的也不

少。我们厂里的经理，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你说他是假的，装给工人看的，我看那是太武断了。我明明还听见，欧战以后，英法美德上层阶级的人对于宗教的热情反比以前高兴多了，这又怎样解释呢？”

这一大篇的话，把一个活泼的三妹难住了。她不能答复出来，当日她打了一个败仗，就去找阿毛商量，阿毛所知道的，却也不能圆满答复，他说：

“三妹！我们所知道的还太少，并且太简单，太象口号一般的了。这是经不得人家来反攻的。我们索性把这个问题拿到罗方两先生处解决吧！”

这夜罗先生的大门前，现出比平日更紧张的形色，大家几乎都忘记了是在乘凉，只听见方先生指手划脚的说话，因为今晚这里不似平日那么悠闲的谈话，变为一种演说模样的形式了。罗先生又因昨夜着风，不能多说闲话，也低着头与大家一起在静听。

以下是方先生的话：

“你们要我今晚专讲资本主义和宗教这一段因缘，那是我很高兴的。我们中国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可是我们生在的世界是达到帝国主义的阶段，要谈宗教我们也应该对于当前的多知道一点。

你们中有人怀疑资本主义既然是重科学，科学是可以说明宇宙的一切现象的，为什么还要宗教干吗呢？

这怀疑是有理由的。

资本主义还能让宗教存在，不是因为对于自然现象了解不来，是对于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不能看得清白。资本

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种新的怪物，它的力量非常巨大，非个人的能力可以左右它。这怪物可以使某一个人尊荣，某一个国繁昌，某一个民族进步，同时也可以使某一个人倒霉、破灭，某一个国贫困、饥饿，某一个民族受到别民族的虐待、压迫，可以使一个人欢笑、跳跃，也可以使一个人啼哭、上吊。这新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命运之'神'。它的名字叫做'市场'。

说出来了不值半文钱，市场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不！这是一个赌博场啊！这个地方有的是令人不解的神秘。这一个地方存在一天，这神秘（即市场的盲目的法则）就要支配人们的头脑，它那一种不可抗的力就要支配每一个个人，使你'莫名其妙'，你得受它的愚弄。

一般人想来，诗人总算是最聪明的人吧！但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诗人，因为受了这个魔物（市场）的迷惑，他对于人生也就感觉是一个谜了。你听听他如何的去歌颂人生呢！

人生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赌博。

不幸的人们啊！

你尽去咒诅你的运命吧！

你们不要听了好笑，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一切神秘的感觉，大概都是从这种非组织的生产关系，到市场去赌博，这一根源出来的。资本社会因为人与人的关系，被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社会的因果性不明，使人的思想常常走到猜度、'不可知'等等幻想中去。

在这种基础上，自然还用得着宗教了。

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是建筑在剥削制度上的，这个制度也

使得这个制度的支持者不敢正视真理，不敢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去解释社会，不敢接受正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

因此，为了剥削者的私利，也觉得有维持这一神的'信仰'的必要，无神论真的占了优势，那不是开心的，被压迫者的心绪照例是浮躁的，怎能不要有一种'信仰'去缓和他们心境呢？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既重科学，为什么还有宗教存在的余地'的理由了。这里也就同时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下的宗教不是向一个泥塑木雕，或一个有羽毛、有长胡须的神跪拜，而只信仰一种抽象的观念，一个'不可知'的东西的缘故。

资本主义的科学家不是无神论者，资本家个人也有宗教迷信很重的。那也并不是奇怪。这也完全可用他们的社会阶级的观点去说明。资本主义的学者，对自然现象常常摆出科学家的面孔，一到社会方面来，就见了鬼。这类学者，一面用显微镜、试验管，一面圣诗念得很熟，在外表上看来，好象矛盾得好笑。实则他们一半是因为决定他们阶级的繁荣与枯萎的经济法则，使他们的头脑发昏，白昼见鬼，一半也是要故意留着这种麻醉剂骗骗人家的。

欧美社会在欧战后的宗教热情比起战前高，这话也只一半是事实，欧战后资本阶级的人，确确实实更加迷信了。他们不独比以前高兴上礼拜堂，也还现出什么'替鬼照相'等鬼把戏。资本家的家属也变得有些'阴阳怪气'，常常说出一些似人非人的话。这确是事实。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他们感到自己历史的戏唱到尽头了。第一次大战的结果，完全出了他们的望外，不独资本世界没有来一个新的繁荣，

而且连旧的天下反失去了六分之一了。日本、美国虽然在欧战中得了很多便宜，但是就整个资本世界说，一般都现出衰老态了。战后世界各国的紊乱，骚扰，革命，劳动进军，失业，恐慌，到目前止，在经济上转入肺病般的萧条，在政治上显出政权被夺的危机，社会阶级空前的对立，弄得资本阶级的先生们失掉自己一切自信了。人到了悲观绝望的时候，是会希望有一个全能的主打救他们的。所以现在在这阶级中，宗教又成了唯一安慰他们心灵的宝贝了。

在勤劳人这边，那完全相反。这一方面的话，我想留在下一次再说。现在还要附带说几句的，就是今日资本世界的统治者，除了安慰自己的灵魂外，也还死抓住这东西不放手，作为征服殖民地次殖民地思想落后的民众的武器，关于这一方面，那用不着我多说。你们比我知道的更多。

对不起得很，不知我这一番话，答复了诸位的疑问没有呢？”

方先生说到这里，大家的注意并没有移动过。只看见小姊妹们，脸上都现出微笑。大家沉默了两分钟，彼此对望着只是笑。最后还是三妹说道：

“方先生要是早几天这样对我们说一遍，我也不会把话输在别人手里呢！”

“现在我们都懂得了。我们不是要同三姊姊抬杠，我们不懂就不服，懂了，我们是服从真理的。”这是一位名叫小红说的。

“好了，我们都在学习理论，争论是应该有的，”阿毛说，“不过，我们谈宗教也谈得不少了，我们不是为了仅仅要知道什么是宗教，最要的是如何使人不相信宗教，不受别人的麻醉，我提议，

下次我们来讨论，我们在今日的中国，应该怎样来作反宗教的运动，反帝国主义的先锋呢？”

罗先生此时插嘴道：“你们的意见我很同意，不过我主张下次你们还应把宗教的将来，讨论一下，略为有一点对于宗教的将来的轮廓，然后对于我们今日反宗教的运动的讨论，有一些原则上的帮助，不知你们认为怎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并推定阿毛下次对宗教的将来作一个简短的报告。

怎样去说服他们的成见

好容易又等到星期六的傍晚了。这一天跑来听热闹的人比以前各次都要多。因为这日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所以人一到齐，阿毛就开始他的预定的报告了。

“我们在这一个月里，因为马大块头打了阿三，惹出了这一段谈宗教的因缘，得了罗方两先生的帮助，把这捞什子的宗教从它妈的肚子里谈起，说过它的发展，现在要讲到它的丧事了。这是不足怪的，一切东西都有它的发生、成长及灭亡的。

宗教这东西，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它不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你也不能望它早死。这就是前次方先生告诉我们，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面，为什么可以持续。因为资本主义还是一个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观点、生产关系及支配的利害，仍有让宗教穿着各种不同的衣裳出现的机会，它仍有活动的余地。

要宗教消灭，那只有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弄得非常容易明白，即生产关系由明白的意识的社会所统治，再不需要那赌场了。一些秘密也没有了，人对于自己的命运，能正确的把握得住，人与人间废除了剥削制度，世界上再没呻吟在痛苦、悲惨中的同类。一切科学知识的大门，向一切的人们开放，到了这时候，宗教的鬼魔就失掉潜入人们脑子内的力量了。

这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阶级社会完全死灭的时候。人类要到了这时，脑子才真的经过科学的水洗过。一切神、鬼、恶魔，或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什么‘不可知’的东西，才能真正一起扫清。

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宗教也是必然要死灭的，但我们不是一个机械论者、机会主义者，以为今日离它死期还远就轻视和宗教斗争，让他自生自灭。我们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仅仅以宗教是立脚于唯心论的观点而麻醉民众，所以我们要反对它。我们是在生产中的人，我们在实际的日常抗争中，就经验到了，我们要反对宗教是‘把宗教支配关系和民众的现实悲惨联在一块，去暴露宗教的存在的现实基础’。

因此，我们这一个月的谈话，不是学者式的研究什么宗教，也不是请求罗方两先生说明了一点宗教现象给我们听听就了事，我们主要的应该是脚踏实地如何在中国进行反宗教。要在我们工厂内，我们生活的周围，反基督教及一切可笑的迷信。

我的报告就是这样，这不过供了一点原则上的参考，并且都是书本上说的。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讨论，讨论出一个实际的办法来，现在就请大家说话吧！”

阿毛说到这里，双手摩擦着坐下。大家对于他的报告都现出满意的表情。这时，罗太太忽然从室内搬出了五六个大西瓜来，说：“天气这样热，大家吃了瓜再说下去罢！”弄得大家全笑了。

由这甜蜜的西瓜，把大家的喉咙润润过来，这一丛人，就变得更为活跃，只看见大家在那里抢说话的机会。自然，抢得首先

发言的权的又是那个顽皮、多嘴的三妹了。

“天啊！我快活极了。我们对于宗教有了这样多的知识，象我们这样的人，在理论上也就‘妈妈虎虎’够了的。但我觉得最困难是如何去说服人，如何对付那些有宗教迷的人？”

“哈哈！了不起。三妹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罗先生接着说：“我现在再说点苏联反宗教运动的消息，把你们做参考吧！

苏联自革命后，对于宗教斗争是非常注意的。为因旧俄时代宗教势力很大，人民受到的麻醉也最深，反革命派更借了宗教残余的势力想图旧势力的恢复，一刻也未松懈过。现在要进行与教会斗争那是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但是要与人民的顽固、陈见斗争，那可不是一件易事。

苏联的政府与政党，知道这一种斗争，要经过一个长的过程的，不能蛮干，蛮干会发生你想象不到的悲剧。

在法律上，他们仍主张信仰绝对自由，但同时也主张反宗教自由。

这里，一方面去限制教会的权力，使教会权力不得猖狂，不参加反革命行动，一方面就加足马力去摧毁这些旧信仰存在的条件。

起先，反宗教运动注意口头的说服，用革命中一切事实，去敲碎一切迷信。用浅显科学的谈话，去减退他们的成见。用科学实验及电影到处宣传，使他们对于迷信发生怀疑、动摇。

同时，提高一般文化水准，肃清文盲运动，使大众具有接近科学的机会，参加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生活的活动，使他们的观念渐渐的改变。

但是破除宗教的陈见的最大的巨力，还不是以上所举的某

一项，是由许多方面综合而成。新的经济的发展，与新的社会关系一天天使大众明白。

听说，自从集团农场的胜利后，俄国农民的旧意识，完全被电力发动机打得粉碎了。他们看到给他们生活改善的不是什么菩萨、上帝，而是自己的手里的这一架机器，及送这架机器把他们的政府，自己的运命是操在自己手里。

这样看来，迷信不是不能解放的，但不能象解绳子一样容易解除。我们要知道，下层的劳苦大众，虽然有无神论者，但同时也有对宗教信仰心很深或迷信的人。我们不要讨厌他们，这不是无缘故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的悲惨、痛苦、贫困、恐惧，而不能明白这样生活的因果关系及根由。在生活中，给与他们的印象太深，除非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时是不能性急的改变他们的观念的。所以说到破除迷信的话，三妹的话是很可以注意，因此也引起我这一大堆感想来了。”

“我也还想到一个例子。这是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当中，北伐军达到长江中部的一件事实。”方先生一面伸着腰一面说，“那时，农村中曾发生过化宗教运动，在湖南浏阳地方，因为做得太过火，没经过说服农民，就动手毁庙宇，打菩萨，结果弄成了农民起来反抗的悲剧。这都是我们的教训。”

阿三听到这里，急忙插嘴道：“啊哟！我若早听见这一些话，我也不会那样和马大块头开玩笑，叫他去坐大牢了。”

大家又笑了一阵。

“是的，”阿毛继续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训，很值得注意。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不容易去做，就不做它。我们更应该讨论出更合于我们的实践的方法，在苏联，根据着苏联革命的发展，以

一步一步的战胜宗教。在我们今日，就应该根据我们可能办到的做去。”

“我想我们今日还只能运用，用口去说服人家的一个方法。”万平说。

“你的话很对，其他的条件，还在创造，现在还谈不到。但是，即就‘说服’这一个方法说，也就够我们讨论了。”阿毛说。

三妹等得不耐烦了，她道：

“我们要具体讨论说服人家的方法了。在工厂中，我看，小姊妹间还容易说话，老太婆前就不易开口了。我想，我们要少谈理论，多谈事实。譬如我们要反对那个洋牧师，那是极容易的。因为中国女人，虽然迷信祖宗、神鬼，却素来看不起‘吃洋教’的，我们在反对洋厂主，一定要反对基督教。在这时我们却可不问这些老太婆的信仰，把她们一并拿拢来，造成一个广大的斗争，你们以为怎样呢？”

方先生马上答道，“可以的，在反对佛教时，你就可以利用孙传芳这次暗杀的事作例子。说明菩萨没有灵验，倘若菩萨有灵，为什么孙传芳没有一点感应呢。同时可以借此机会暴露佛教内部的腐败，变成了一切恶人的避难所。也可以利用日帝国主义现在正利用佛教、回教来侵略中国，愚弄中国民众等类的事作例子。只要说得动人，也可以打动人们的。不过，我们要避免直接和人冲突。他如果迷信很深，你要慢慢来，不要一开始就抬杠，他对你如果发生了忿怒或厌烦的心理，你的任何话，他都会听不进去。这是要注意的。”

阿毛道：“具体的方法在这里是讨论不尽的，我想，这类运动单靠一两人热心去做是没大用处的。我现在提议，今日到这里

来的人，我们先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无神论的细胞。今后我们一面还继续研究理论，一面经常讨论宣传的方法，各人按照他的生活圈子分别做去。不知大家以为怎样？”

“我们都一致的赞成。”

这一批生气勃勃的人，大家又讨论了半天，组织了一个破旧宗教的小团体，举出了负责的人，连马、方二先生也加入进去。

弄堂内的风波，虽然早归平静，但是一个更广大的风波，却爆发在无数人们的思想里。

少见多怪

天气是这样的坏，还是说个故事吧。

琴打开玲给她的到家信后，还没有读到一半就笑得前翻后仰了。

“玲回家就遇到了什么喜事？”

“喜事？到家第二天就触了一个大霉头。”她说完又是笑。

“什么事？这样好笑。”我一面问，我脑中就浮现着玲的影子。一个爱穿男子服装的女儿，一时扮作工人，穿工服，一时又是一个运动家，选手的打扮。说话，行动，也都不象一个“谁家碧玉”，不会做出一切“咿咿妖妖”的模样。总括一句，是有点任性，不大注意一般的习惯、风俗。现在来信使琴这样大笑，一定又是哪一个女子把她当做男子，不然，就是她的父亲不认识她了。我正在想着，琴反问我。

“你猜！真笑死人气死人呢？”

我猜不出这闷葫芦，我抢着信看。

哪知是玲回家的第二天，她同她的弟弟们一同散步，有说有笑，有时还忘形的大笑大跳，不料引起了警察先生的看不惯，上来干涉说：“这样子有关风化，要不得。”玲同他讲理，说不过，同走到局里，费了许多口舌，局里人也还说样子看不惯，白白的麻烦了个半钟头，气得眼睛冒火，叹气不止。

琴说："旧习惯旧风俗的根性，真不易改变，人的行为太不自由了。生在今日的社会，个人的行为就一定非按照一种旧的刻板的方式不可，你如果稍微有点不同，少见多怪，就要引起一些人们的怒视了。"

"可不是！所以有句老话说，'入国问俗'，'随乡入俗'了。"

"难道我们就只有屈服旧习惯不成？"

"那自然不是的，坏的风俗，不合时的风俗我们是应该反对的，从日常琐屑的生活里自觉的解放，创造新的习俗。但是，个人的行为总不能绝对自由的，新的风俗也是一种行为的标准呢！'移风易俗'，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阶级社会内部抗争的一个方面，哪里仅仅是触几次霉头，碰几次钉子呢，叹气更是无用了。

我们说太不自由，自然是对旧风俗说的，我们主张的新风俗，也无非是属于大众生活所要求的，已在旧风俗中慢慢长成起来的。那种在共同生活下，日积月累的样式，现在虽然不被旧社会的人一致赞许，事实上是诞生了。玲自然是一个对旧风俗的挑战者，我们又不是怪物，哪能独异于众呢！

对的！象玲这样的故事，也可算是反旧风俗的一张插画，虽然它不能算正面的抗争，但也不是偶然的。再过一两百年，如果有一位新时代的女孩子看了这一段故事，恐怕她的情绪会与我们两样吧！也许她要奇怪我们为什么听了玲的触霉头反觉好笑，不起来去打那个警察！这样的愚蠢的行为，她也要觉得惊奇吧！"

我们谈到这里，引起了小琴，国安的注意。小琴大概是因玲的事感觉得很有趣味，她说：

"将来的女孩子都要穿玲姑那样的短衣吗?"

她的母亲笑道:"孩子,将来的女孩子的衣服,一定还要比玲姑的衣服更好,更适合身体,适合工作,更美丽呢?"

"那是怎样的呢?"

"那要到那时才知道,现在还不能晓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那时候女子的服装既不会象今日上海的时装一样,这样商标式的花样翻新。女子也不会这样无意义的去模仿时髦。因为那时候,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与现在完全不同了。她与男子一样平等,自己不再是商品了,所以也用不着'勾心斗角',用各种时髦去讨男人的好。同时,只要有人对于新的样式更合卫生,更对于工作、美术上有价值,一旦被人发明出来,也不会有人'少见多怪','见了骆驼就说马瘇背',要无理的受到干涉,麻烦一两个钟点。"

国安把脸向我道:"风俗这东西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在学校里只听见先生说,我们要'移风易俗',我们对于风俗本身就不了解。过去的坏风俗,它是哪里来的,新风俗又是怎样产生的?新旧风俗的抗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说来是话长的。"我说,"讲到风俗。粗粗子一看,好象是千差万异的。出过远门的人,他就经历过不少的风俗。譬如,在中国南部各省旅行的人,汉人在一般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各地仍然各有不同的风俗。苗猺等族人的风俗就完全两样,北方与南方也有小异,蒙古与内部又有许多不同。周游一次世界,那所见所闻,真是'千奇百怪',不免令人骇异的。就是在电影上,我们也看见过不少关于风俗片子,这样一来,就不免使人觉得奇怪了。"

小琴说："正是呢。我看过《蛮女天堂》、《爱斯基摩》，那真够有趣的。"

"有趣！并且也令人觉得人这东西的奇怪呢！是不是？"

"哼！实在太奇怪了。"

"哈哈！我一定知道你会觉得奇怪。其实，如果你知道风俗的来源，那就会不觉得奇怪了。电影上摄的'野蛮人'的风俗，苗徭人的风俗，实在说来，我们的祖先也都有过。不过我们现在比他们进步了些，所以风俗就变得不同了。我们只要记得社会是一个劳动的共同体，人是一种不能离群的社会动物。个人的行为，不知不觉中要与社会的需要相配合，不能与共同生活存在的要求相违背。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生活，人就会生出一种什么样的风俗来，以维系当时的社会秩序，作为个人行为的榜样。不管它千差百异的风俗，如果按照经济的关系去看，那就简单无比，不足怪异。风俗这东西既是从经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动自然也是因着经济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不同和差异不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的一种反映罢了，并不是什么人种的质的差异啊！"

"所谓风俗的好坏，是不是就按着它合时代的需要不合时代的需要呢？"

"是的，过时的腐烂的风俗，自然是坏风俗。譬如目前中国残余的对妇女的封建的贞操，裹脚，讨小老婆，视家庭为国家的单位，家族观念甚过国家社会的观念，把主持政治的人看做民父母，以及一切士大夫的习尚迷信，迎神赛会，神秘治病，穿长衫马褂，等等，这些封建时代风俗习惯，早与时代不合了。这些东西虽然在当时也曾适合过社会需要，也算好的，现在不合时代需

要，并且变为妨害社会的发展，处处在替反动张目，所以它是坏的，要不得的。这是一个标准。

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看这风俗是不是适应大众生活的要求。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内，在经济上获得优胜的人们，在风俗方面他也是占上风的。他的一举一动，动辄就会有人去模仿的。今日中国的暴发户及许多士大夫的子弟，从外洋或租界也学了不少的时髦，在这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也形成了一种不三不四的风俗，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合于时代的要求呢？

不是的，我们并不要求这种殖民地的风俗，它与大众生活的要求，不仅隔得很远，明明还是有妨害的。它与封建的残余的习俗一样，同是消灭大众的团结的精神、反抗的情绪的。这一点，有特别注意的必要。

你问过去的坏风俗是哪里来的，大概你可以明白了吧！它是老了，不合用了，或者是极少数人，一时学的时髦，与大众生活无关。新的风俗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是适应大众生活的要求而渐渐形成的。它在整个大众生存斗争中，是负了一种战斗的任务。

是的，一切生存的斗争，都是残酷的。风俗这种东西约束人的力量，是尤其厉害。譬如农民，他明明是受压迫的，但他受旧风俗的支配，你就不容易说服他。所以风俗的斗争的场面是太广大了，它普遍在一切日常琐屑的生活间，一切的人们间，并且常常以一种更残酷的形式，发现在家庭骨肉间，父与子、母与女间。这样，乍看起来，好象是一种混战，看不清敌对的到底在什么地方，看不清这是一种意识的斗争，是社会阶层间争取生存的斗争的一方面。”

我说到这里，把话停下，两个孩子把两个眼睛睁得老大。大家把玲的信都忘记了。

在午餐中，琴又提到玲，因为平日桌上是常常看见她的，琴在不知不觉中说出。

“那样的环境下，她一定是过不来的。不久想又要回上海了。她再来时，如果听了我们今日由她而大谈特谈的风俗，她一定要大笑大跳吧！”

把戏弄穿了

闲言不叙，且说那阴沉的天气，到了正午却下起雨来。一阵秋雨，把许多活泼的孩子、野性的青年都关在屋子里了。

琴的会客室内，此时用完了午餐，大家对着秋雨，正愁着不知怎样去度过这星期日的下午。只有琴的母亲陆老太太反现出特别的兴致，因为今日若是一个清快的晴天，家内的什么人都要跑光的，那不是使她老人家一个人寂寞，现在大家聚在一起了，虽然没有冬日围炉的欢乐，但她觉得这种室内的谈话，也正宜于秋雨的长日，不是无情趣的。所以她极力用了她的诙谐，要把屋子内的人留住。因此，我吃过中饭后，也不便马上跑了。

谈来谈去，结果还是书归上传。因为国安、小琴还没有忘记，上午的谈话还是没有完结的。现在又加了芳小姐，她是对于社会科学素来有兴趣的人，因此，一谈就扯到风俗的历史的变迁上去了。

“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过着不同的经济生活，因此有不同的风俗。这是今日上午说过的。但是，最古的时候人类社会的风俗，我们可以推想得到么？”国安说。

芳不等别人回话，就接着说：

“最古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非常简单，人与人打伙在劳动，在求食，彼此间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分工还没有发现，

每个人做的事，大致都是同样简单、笨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个性不由你发展，同时也不会生出谁支配谁的现象来，适合于这种经济关系的行为的标准，我想，自然是所谓浑浑沌沌的。这也并不是推想，我们今日在‘野蛮’民族的记事中，也还可看出越是发展低级的民族，他们的风俗越来得朴素，越发觉得可爱。

风俗变成了被压者自己束缚自己的锁链，那倒是所谓‘文明社会’开始以后的事。即人类打伙生活拆开了，变成了一个男子带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组织了所谓家庭的东西。于是这些小小家庭，各人顾各人的在求食，在劳动，合起这些家庭来，成了一种叫做宗法社会的东西，这时人类悲剧就正式开幕了。”芳说到这里，就把眼睛注视着国安笑道：“这个悲剧是由男子揭幕的，以后的鬼世界完全由男子弄坏了。风俗吧！败坏风俗的完全都是由男子开始的。”

陆老太太笑得嘴都合不拢来，她道：“芳丫头的嘴真是越说越有刺了。世界是男子弄坏的，我虽是一个老太婆，也不便出来否认。不过，你何必望着国安，好象责备他一个人似的，那可不能不说一句公道话了。”

琴笑道：“芳丫头的话倒是真的。宗法社会开幕后，女人才真的够受了呢！宗法社会这名词，母亲也许没有听见过，但是这种社会的风俗，在中国今日有些地方仍还残存不少。这一个社会，因为经济生活以家庭为单位，人们眼睛也就只看见自己的家庭，最关心的人是父子兄弟夫妇。家长就是家庭的魔王，一国的魔王，妄称是天的儿子，管理人民的官吏，也自称百姓的父母来，完全以家庭做本位。这一套戏要想唱得平稳，这一个小朝廷，就不得不作威作福。我们今日只要回想回想‘五四’以前的中国家

庭，就够想象了。单就妇女说，完全是一种生子的机器。婚姻是由父母随便买卖的，女的对男的是绝对守贞操的，你没有养儿子，丈夫不仅可以另讨女人，还可以把你嫁卖，作为出卖的理由。此外打骂妻子，惩罚不贞，以及对于私生子的残酷的处置，真是说出来令人可怕。但是这些真正是野蛮风俗，却都是帮助过宗法社会的秩序的。”

陆老太太道：“什么社会不社会，我不知道，你说女人受苦，你们哪里配说呢！我到陆家来，那时，家庭的规矩哪里是现在的这样的。男女间莫说不能谈恋爱，同坐，同行，女人照例要守闺房，是不准抛头露面的。女子读书最多也只是书香人家的偶然一点点缀，在习惯上总是‘无才是德’，生儿育女倒是天职。这是一般的风俗。这时想来，真正做一个那时的女子，是去活受罪，但那时，倒惟恐自己做错了，怕人看不起，同时，也看不起犯了‘贞’、‘孝’等‘罪过’的女人。真是‘一朝时势，一朝人’，现在如果有人再要拿出这些风俗来欺骗人，就是我这样的老太婆也要起来反抗了。”陆太太叹了一口气。

芳道：“我们不要专谈宗法社会下的风俗可笑。我看封建制度下有些风俗现在看来也是可笑的。譬如读书人看不起劳动，看不起商人，中国儒家叫商人做市侩，那样讲究那一套臭身份，臭架子，臭门第，上下的界限分得很严，不独富人与穷人间有一套礼貌，不仅是你比我高一级，我就要向你陪笑、打恭，身体上也分为上下两部，洗澡都不能不先洗上部，后洗下部。反抗认为是最大的叛逆。城市中人看不起乡巴老，说是有泥土气，常常打趣他们。土豪劣绅，在乡村作威作福，俨然以土皇帝自居，而人民也羡慕这种强暴，认为光宗耀祖。这一切风俗，也都在今日的中

国还找得出一些来，凡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也都领教过的。要是在几十年前，谁还能想到这些风俗是不合理的，这是封建贵族为了维系他们的统治唱出的把戏呢！”

国安、小琴是“五四”时代以后的人，并且一向都是住在上海，所以对于以上的谈话，都是不投机的，他们想知道的，倒是属于现代社会的风俗方面的。

国安想把话扯到现代来，他向我道：“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不知应该怎样解说，因为它是比以前的风俗，在现在看来是进步的。”

陆老太太道：“不错，我也想听一听新时代风俗谈呢！”

“不！”我答道：“资本主义的风俗谈，倒不是新时代的风俗谈，资本主义的风俗谈，也几乎要算旧时代的风俗谈了。

谈起资本主义风俗，我们如果没有忘记它的基础是建立在私有和买卖制度上，那是最容易清楚没有的，就是这一时代的风俗要适合这‘买卖制度’。

做生意人注意的是生意兴隆，是利润，不管你乌龟王八出身，他对你一点架子都没有，一切交际都象在做买卖。他们在外表上都现出谦恭、礼貌，体贴顾主的样子，只有在算盘上不合适，他才会翻起一张牛肉脸来，所以这时代人们风习，在外表上都喜欢称兄道弟，握手接吻，不要那套揖让了，但是各人的心肠真是比冰还要冷，一切的交情、恩爱，都在算盘上。”

“这说得真可怕了。”陆老太太说。

“讲到人情，确是这样炎凉的。”琴说，“再就妇女说罢！资本主义的法律，虽反对人口买卖，但妇女出卖肉体依然采各种方式出现。在形式虽有卖淫、恋爱之分，在本质上也几乎都是在论斤

论两的讲生意。妇女也就变成了商品了。"

芳道："在资本主义下，妇女虽然得不到真的解放，但资本主义需要劳动力，因此妇女的体力与智力也一同送进市场，由此一部分妇女走出了家庭，生出了一种以依赖男子为耻的风尚，妇女觉悟着要求经济独立了。这种风尚倒是好的，因为从此以后，妇女就进一步直接和男子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了。"

琴道："自然，资本主义下的风俗习惯，也有你说的进步性，但是它的本意，却是完全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把妇女引入生产也不过是在利用妇女贱价的劳力。譬如资本主义反对奢侈浪费、嫖赌逍遥、一切荡浪行为，好象是没有什么话说的，实则资本家自己的浪费、荒唐已超过昔日的贵族，不过要工人安于贫苦，听话，好好的替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提倡运动、竞技、冒险，那不过是因为他们需要强健勇敢的干部。资本家提倡尚武爱国，那不过为准备争夺殖民地战争。这一大套道理，大众早在和资本斗争中看穿了。"

"所以这时代的习惯风俗已经不是新的了，所谓新的又是什么呢？"

芳道："新的习惯风俗是从今日大众生活方面生长出来的。大众在生产中发现了彼此间共同的利害，生出了患难相助、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睦，在进行对老板的抗争中，使大众在组织中团结起来。于是生出了许多新的风尚，这新的风俗的基点就是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刚刚是一个对立。"

"那么将来呢？"小琴问。

"将来吧！"芳说"人类一旦真的达到大同了，人类共同生活是基于互爱互助的。一切风俗习惯，自然变得极自然，活泼，毫

无强制的性质,个性自由发展,行动都合理性。一切愚昧、欺骗、成见等风俗都将消灭,那时,风俗就是道德,代替道德了。”

陆老太太道:“我们的芳小姐真不错,说得有条有理的,但不知新风俗要何时才能被一般人承认呢?”她说完后,眼睛盯视着我。

“老太太不要心焦吧!这种新的风俗已在世界各地萌芽了。在那个叫做罗逊人的国度里,现在已有了许多新气象,可惜今日我们再没有时间来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倒是和旧风俗奋斗啊!

在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上,我们也不能忽视风俗这个场面。我们大家努力吧!”

秋雨还在纷纷的下,大家的谈话略微有些倦意了。琴此时又想到了玲,她说,玲这时不知在做什么,不再恼了吧。

艺术是什么

这里是几封通讯，却对于艺术的了解是有一些帮助的，请列位朋友传观罢！这些信是我写给大众唱歌班的朋友的。

我说不出的高兴接到你们的来信。你们每天做上十小时以上的工厂生活，就是星期日一天，也不让它白白的空过去，自己组织了许多种研究班，这怎的不使别人感动！我尤其爱你们这一个大众唱歌班，我要向你们这些艺术同志致敬！

是的，将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将来的艺术也无疑的是属于你们的。

至于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自然乐于回答，现在且就我对于艺术的“一知半解”，贡献给诸君吧！

你们的同伴笑你们，说艺术是一种阔人的滥费，对于工人是一种有毒的麻醉剂，妨害你们斗争的情绪，在当前民族斗争中，是用不着什么艺术的，这自然是一种错误。就是那些把你们的唱歌叫做“穷开心”的人，也是对艺术十分的不了解的。现在你们几位想把艺术这门东西，弄它一个“青红皂白”，我想对于大家大概不是无益的吧！

艺术也和其他一切知识一样，有特权人家的，也有民间的，有对于大众确是一服毒药，也有正是壮健自己精神的粮食。有

一些歌，我们来唱，确实是一种精神的滥费，使我们心绪消沉，妨害民族斗争。但也有一些歌正是给我们精神上无限的鼓励，调整我们的情感，引起我们斗争的雄心的。这容易了解得很，我们只要拿几个大众熟悉的歌来比较比较，譬如《打牙牌》、《妹妹我爱你》、《毛毛雨》、《桃花江》，来和《新女性》、《开路先锋》、《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活路歌》对照看，这中间有多大的距离啊！我们就晓得，同是唱歌，哪一种歌是穷开心，哪一种歌却是非常严肃的。其他一切艺术，也就没有两样。画画、雕刻、文学、话剧、电影、跳舞，你们完全可以找出同样的一个对照。

再就我们所熟悉的例子来说吧！

有许多画，大家就看不懂，不要看。譬如中国的古画，那些山水虫鱼，隐士坐在竹林下下棋吃酒，或从外国学来的，涂得红红绿绿的洋画，画几个苹果，一幅风景，一个不穿衣裤的裸女，就是画得好，也与中国大众的生活隔离太远，那些东西只能挂在乡下皇宫似的地主的大厅内，或城市带着西洋风味的绅士的会客室里，作为一种摆设。那对于大众是无关的。不说这种大幅的画，就来谈谈年来最风行的漫画吧！丰子恺先生，想来大家都是熟悉的。他的漫话在日报、期刊上都可看见。但是可惜得很，那些闲适的小玩意，仍只能供一种雅人的赏玩，并不能作为斗争的艺术。我的眼界有限，在绘画方面，我还不能告诉你们，谁是大众的画家，不过在最近学生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许多描写斗争的作品，很值得注意。这些无名的作家，也许就是将来大众的作家吧！你们中如果有人高兴动动笔的，也不妨将你们的生活用线条画出来，那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啊！

我们在过旧历年总看见过一种木板印的《门神》、《财神》、《老鼠送亲》、《罗通扫北》等印画吧！那些东西叫做木刻，是中国画中最接近民众的一种。是的，那些东西是旧了。但是近年来这种东西又从外国传到中国来，现在各种杂志上都把它作为封面。其中也有些是很接近大众生活。这是用刀子在木头，石头上刻的。这一种木刻，在苏联也与其他艺术一样，都一贯的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口号下的作品。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描写与刺激，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旁观的艺术，仅仅客观的描写。

我们的眼福真不浅，最近苏联的版画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展览。我们看见了几百幅作品都充分的表现了苏联生动的现实，及新的人民与历史的景色。譬如工业建筑中的烟囱棚架，集体农民耕种着的田地，以及以尼泊尔江大发电水闸为题材的，都是配合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样的木刻，如果中国也能把它描写中国民族斗争，那不就变为了一种斗争的艺术么！

再说文学吧！诸位爱唱歌，也许还爱读诗，爱看小说的吧！在诗和小说中，这样的对照就更明显。今日流行的小说中，旧的章回小说不说它，就是新小说中，也明明有的在用恋爱、幻灭、梦呓、说谎、嗟声叹气的在麻醉我们的灵魂，引我们脱离现实，忘记苦恼。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有人严肃的写出生的斗争，民族的危难，并指示了我们的前途的。你们都读过的《八月的乡村》，那不就是一部斗争的书么？所以我们也不能笼统一句，因为文学说过谎，就否认文学的斗争的价值哟！

戏剧是用不着我说的，你们熟悉得很，你们工友中就有业余的戏剧社的组织。你们工人学校演的戏，我就看过，那完全是斗

争的。这次北平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最收效的是戏剧表演。他们对东北难胞、士兵演《打回老家去》，个个人都不禁流泪，有的竟放声痛哭起来，可见戏剧不仅是给人玩的。你们大概总看过《怒吼罢中国》、《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水银灯下》等戏吧！他们自然与《摩登夫人》、《西施》、《巧克力姑娘》、《孔雀夫人》是一个对照。

至于电影、跳舞等等艺术部门，也都一样，尤其是在电影，今日国片中已有不少反帝反封建的片子，他们也在艰难困苦中，尽过一点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

是的，我不再往下说了。话说回头，我要告诉大家的，艺术决不是一种精神的滥费。徐悲鸿先生说，“艺术是一国生活之表现，一国思想之符号”，这话有些真理。我们也需要艺术，我们需要一种作为解放民族的手段的斗争的艺术。

艺术这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并不是什么“高人雅士”，什么“天才”们独家的拿手戏。人这东西不论文明、野蛮，不论少年老年，他都有感情，每一个人一生总都要碰到许多喜怒哀乐的事，每一个人的生活总无不受喜、怒、哀、乐、爱、恶等感情所播弄，世间上没有一个吃了饭就什么事都不想了的人，世间上也没有一个对什么事都无感觉的人。有了一种感觉它总要求发泄，悲哀时就不禁长号，憎恶时就会发出怒吼，欢喜会跳起来，爱情会现出会心的微笑。是的，人类感觉是非常复杂精细的，并不只是很单纯的发现出来。

所谓艺术就不过把人类的感情，加了一种整理，表现在一种适当的形式中，或用音调，或用文字，或用线条颜色，或用运动，于是就有所谓音乐、文学、绘画、戏剧和跳舞。是的，艺术它负了

沟通人类彼此的感情，把一种人类彼此的感情社会化，它就做了这种感情社会化的工具。我们听了一个歌，常常被歌中所含蓄的一定的心理情绪所感染，所渗透，至于泣下，或兴奋。常常可以把一个人的情绪变成许多人的情绪，一个人可以把一种情绪传给其他许多人，影响其他许多人。这里已经是社会化了。曾经有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看了“三国”的戏，因痛恨曹操之奸，误把一个扮曹操的戏子杀死了。这笑话中，就告诉了我们艺术“传染”力量的伟大了。

是的，人类的情感并不是一个什么怪东西，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艺术也同样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和科学以及其他物质生产物是一样的。一切社会心理都是经济发展之结果，然而既已形成之后，又做了经济发展之助缘。艺术自然也是一样。这里的话长，以后再一一详说吧！

最后，我要特别告诉诸位的，我这里要强调的艺术是斗争的艺术，是把艺术作为解放民族和解放自己的工具，尤其是适应当前历史的要求，我们应该注意那些方面，这是我的通信与大学堂的讲义根本不同之点。

诸位！你们虽然是业余艺人，你们的认识却不能有错误，你们自己的责任却不能不认清楚，这是我首先要向诸位交代的。

什么时候就有“绮雅海”

在前一封信中，我“不三不四”的把艺术是个什么东西交代过了，但对不起得很，我不能说得更详细、动听。艺术方面的现象，在目前是这么繁复的，我说了那么一点，能有什么用处呢！

是的，我今日还要来把她的发生、发展，一直到当前“五花八门”的现象，指出一个大概。

我已说过，艺术既然是人类情感社会化的工具，那我们就不难想到，艺术这东西发生是很古的。因为人类社会一在地球上开幕，它的第一出戏就是大家打伙找食物，说一句现代的话，就是共同劳动。在这共同劳作中，彼此就生出一种统一心情的某种要求，表现这种要求的那就是最原始的艺术。譬如唱歌，在原始并不是为的娱乐，所谓“劳动歌”就是大家不知不觉从劳动之间发生的。它的作用在调节工作的节拍，使共同劳作的人群，互相适合歌中的音韵，就成了劳动组织的基础之一。所以当时的歌并不能知道谁是作者。

真正最原始的标准的劳动的声音，我们现在是无法晓得了，我们相信那一定不是陶行知先生写的《锄头歌》那般有意义。呼唤的声音，也不见得一定是“绮雅海，雅荷海”，但我们觉得在现在“苦力”的劳动声音中，仍可以想象出旧日的现象。歌是最原始的一种艺术，是从“绮雅海，雅荷海”（暂时假定古时也是这样

的声音）中发展出的。

与歌同时发生的还有舞，舞也是与实际的物质生活有直接的关系的。诸位！我不是说原始时代就有上海今日这样的舞场和舞女了。这与原始时代没有陶行知先生那样的作歌家一样。但原始人就有跳舞，并且不分老少、美丑，大家都会跳，也不要光滑的地板，也用不着买舞票。跳舞是原始人表演渔猎一类的劳动和战争，为某种实际工作之操练或复习，不是专门享乐的。

这不是瞎猜，在今日地球上还残存的所谓"野蛮"民族中，还可以找到参考的材料。你不相信吗？请你多看几张外国记土人生活的影片，就可以窥见一些影子。我可以介绍你去看《蛮女天堂》、《爱斯基摩》之类的片子。许多人在银幕下奇怪，为什么土人都高兴唱歌、跳舞呢？他们不知道，唱歌跳舞与物质生产的生活是如何的联结在一块的。由此我们去读我们古代传下来的诗歌，去研究现在民间流传的牧歌、小调，我们容易了解艺术是从劳动直接间接发生出来的。再就乐器说，中国旧式的大鼓、铜锣、手鼓、喇叭等等，本身都带着一点军事和宗教的气氛，可说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残迹。现在摩登的中国人，就觉得这些东西野蛮，不适于屋内奏演，这也对，因为它实在太不适合现代都市摩登小家庭的生活了。譬如，目前东非意大利侵阿战争，阿皇鸣鼓助战，那面鼓，就不觉得奇怪，在音乐中的意义也不要说就明白了。可是在意大利方面却找不出那样一面鼓，这就说明因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反映在音乐方面的也不同，音乐也就越与物质生产生活越现得隔远了。

再说到绘画吧！并不是自古就和现在一样，有斯斯文文的画家，有个人展览会，美术馆等玩意的。中国画家开什么"个

展”，那是从西洋学来的，以前中国画家是文人的副业，画得好，也只在熟人前传观，或供文人赏玩，并没有什么展览会。如果说到远古，那大概在人类发明陶器的时候，在装饰陶器时，就开始了的。图画与文字的起缘是同时的。文字发达的最初的一步就是人们为记取某事，分别事物而作的种种符号。原人将身体画一种花纹分别各自的部族、品位、年龄等，却与今日女人画眉毛仅仅美的观点不同，那就是文字最初发生的形式的一种。在劳动生活中的记数，往往在石块上把有形的物体画出。世界文字进化的历史，大概总是先经过一种图画，变为一种一半象形一半却要会意，慢慢才走到拼音字母的。中国这类豆腐干式的方块字，就是还没有走完文字发展到拼音的路，虽然对我们求知上是一个大障碍，但在我们今日谈它的根源时却给了我们许多方便，使我们容易了解它。

诸位好友！我说到这里要带住了。艺术的门类很繁，单就原始这个阶段说，说来话长，哪里是这几封短信写得完呢！这里我不过要告诉你们，艺术在原始时并不是闲人吃了饭没事做时，干来玩玩的，它无不与当时生产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自从人类生产的能力一天天大起来，自然她也一天天生长、丰富。不过，因为这人类一天天向上发展的生产能力是在一种榨取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社会各方面都起了分裂，连人的脑子也有些两样，在艺术方面就发生这样的现象，即占支配势力的艺术，已经失掉了以前那种朴素的与劳动直接结合的形态，一变而为上层的雅人消闲游戏的工具，和统治下层人口的灵魂的一种法宝了。以外在每一个时代也还有所谓民众艺术，即那些土老百姓在工作中及工作后唱的山歌、俚曲、社戏、跳舞之类，他们仍

与生产技术密切关联，与上流阶级的艺术相对立。不过，这些东西并不被社会重视，上流人士更看不起她，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既然被有钱的子弟所独占，自然目不识丁的人谈不上言艺术。所以统治一个时代的艺术总是每一时代的上流人的。

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把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拿来说她一个详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只能交代在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法，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就有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出现。封建时代的艺术，与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虽然在反映生产的榨取性这一基点上是相同的，但榨取的方式不同，所以艺术表现的姿态也不同，甚至在同一资本主义社会内，因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也现出不同的现象来的。

我在这封通信中就单把封建时代艺术来略谈一谈吧！

大概的说来，封建时代艺术的特色之一，就是对贵族皇帝歌功颂德，例如在埃及的一个国王的墓地上，就刻了下面的颂词：

> 你应当五体投地的颂扬国王啊！你应当铭心刻骨的颂扬国王啊！国王是生活在心境之中的，无所不知的神灵。……国王是光辉的太阳；他照耀两个世界，虽日月亦难与争光！他赐与两个世界以红花绿叶的彩衣，虽尼罗河水之力亦难与比伦；他使两个世界充满了生气与力量；他是一切生命之源泉。……王把衣我穿，王把饭我吃，王是万物的制造者，王是人类的祖先……请为王的圣名而奋斗吧！

你看！这是何等肉麻的在吹牛皮！这样墓志，在中国历史中，甚至于目前阔人的墓志上，还看得见，真是举不胜举。为什么要说这些大话呢？是要小百姓畏惧，不要造反，好好做奴才，

永远要恭敬对你的主人。是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其他如音乐、诗歌、戏剧，也无不是以服侍国王和贵族的东西。艺人，在这个时代，或者本身是奴隶，或者在外表上也是贵人，骨子里却脱不掉奴才的身份。中国过去就有这样一句谚语，"世上只有三门丑，王八、戏子、吹鼓手"，老婆偷人，自己做了乌龟，丑不丑，我们且不管它，为什么戏子，吹鼓手也丑呢？"戏子和吹鼓手"翻成现代语就是，戏剧家和音乐家，为什么这样被人看不起呢？因为在贵人的心眼中，这些东西叫做虫样的小本事，大人们是不屑做的，这是奴才的事，所以一向被人轻视，这话到如今还存在。

且说诗人罢！如李太白那样千载有名的大诗人，他也不免要侍立在皇帝膝前，对他的姨太太歌颂一些肉麻的话，以博美人一笑，使得"龙颜大悦"。以前凡做官的人家都养有一批清客，这些清客都是能诗善画，会下棋，也会弹琴，酒量比得过主人，牛皮可以连吹三昼夜。这些东西在主人的眼内是所谓调剂精神的姨太太，然而，不敬得很，这些人正多是那时代的艺术家。

封建时代艺术第二个特色，就是士大夫间闲适中的一种消遣。上流人士虽然对国王是奴才，对农民大众自己却又是主子。他们生活太好了，自己教育又受得不错，他们有一种较高级的精神生活。他们间虽然一部分做了大官，但也有一部分落魄的，所以在歌功颂德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诋毁君王的牢骚，纵谈女人的风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悲天悯人"的空话，或狂言妄语，气吞天地的豪放等现象，在艺术各种形式中都能够看到。这些调子，也构成封建时代艺术的一个支柱，并且还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柱。

这里，就不举例子了，以后说到中国目前的艺术现象时，再

补说去。但是，在这封通信的末尾，我要告诉大家，封建时代的艺术，并不是一无所取的。封建时代的艺术也有它很精彩的东西，在人类的文化上，自然有她的地位，不过，时代一变，她的意义就不同了。同时，在封建时代的艺术中，也确发生过伟大的作品，替大众说过话的。譬如大家熟知的，在封建的旧俄时代，就出了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那样的伟大的作品。总之，我们晓得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东西中生长出来的。封建艺术中，也自然有许多要素是构成了下次要谈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的要素的。

再谈吧！

私家花园和将来人类的花园

时代离我们越近，对于我们研究的兴趣也就越浓厚了。在资本主义刚刚踏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艺术方面也就有了极大变化。这些老板们在经济上渐渐的握有了优势，自己也就渐渐觉得自已的身份未必低于贵族，骨头也渐渐的变硬起来。他们对贵族的情绪不免有点激越。因为钱能通神，有了钱，生活也就过得不错，社会地位也就有了。所谓平民生活，到很有些诗意了。这时的老板们有的是满腔改造的热情，对世界是极端乐观的。因为他们在生意上的成功，使他们把个人的能力看得特别的大。在生意上，他们要求的是自由竞争，在全意识领域上出现的是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就叫出民权革命了。

资本主义初期的艺术作品，大概的说来，他们一方面在歌颂英雄美人，一方在描写他们理想的生活。所谓英雄自然是指他们这时代的成功者，所谓理想的生活，就无非要求推倒贵族，自己成为时代的主人后的写意的生活的意思。因为这时代是特别重视个人的，个人的力，企图，欲望，生活奋斗的活泼性，个人能出风头等都反映到艺术上来。譬如音乐上就有了独唱，文学上偏重个性的描写等，都可看出当时人的情绪。

等到这些老板们昔日的幻想成为事实了，他们已经成了社会的中枢，时代的主人以后，资本私有制度和无政府的社会的生

产、盲目的向市场碰运气的买卖，使社会一天天看出这种新制度的弊病来。是的，在以前，每个老板们都想凭着自己的魄力去打败市场上的敌手，自己成为唯一的胜利者的，可是，这只能是幻想，并不能全部靠得住。在新的制度下，一人变肥，不独要使万千人的挨饿，同时也要能有把自己的同伴吞得下的大口。这可不是一件易事。在这种你吃我、我吃你的世界下，人们的情绪也是觉得不大宁静的。在政治上有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出现，在艺术上也多注意到现实方面来，主张写实，成为了一种写实主义，去指摘社会的弊病，警告资产阶级，要他们小心一点，赶快起来打主意，补救这些漏洞。

破孔是补得了的不呢？

不！破孔是一天一天大的。资本主义这制度也是要衰老的，它越到残败之年，身上的细胞就一天天死灭。这是当前这个悲惨世界的现实，大家容易明白得很。生意越做得大，利钱变得越小，市场越推，市场越变越小，竞争越来越变得残酷，货物生产得越多，越堆在栈房内没有人要，阔人越变越阔，穷人就越变越多，大众生活越变越穷，人穷了的脾气就越变越坏。哈哈！工厂倒闭，工人反抗，同业间竞争，化为资本世界经济恐慌，罢工，革命，世界战争，弄得老板们什么问题都没法子解决，到了这关头，人们的情绪又是怎样呢？

这些老板们的家属，靠利息吃饭的人，以及在老板事业下混饭吃的高级干部们，他们的心情是非常不安与烦躁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最高妙的方法是让它去，不管它，或者把眼睛紧紧闭住，沉入过去的荣繁的回忆里去，或者想入非非，在期待一种什么力出来拯救他们一把。于是在最近代表旧世界的艺术的

思潮中，就发现颓废主义和神秘主义，天天在翻新花样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使自己逃心自然。同时或标榜以怜悯不幸的大众的温情主义以和缓革命情绪，或取美国式的利禄色欲主义，表现些个人钻营、幸运、希遇等以诱惑群众，使大众堕落，忘记生存斗争，或取意德式的燃着挑拨民族间的仇恨，盲目的鼓动爱国主义而制造人类的大屠杀。这一方面要具体的说，是要太多的篇幅的，现在且带住吧。总之，这种打补钉的艺术，他们因为感觉自己的地位溃烂，却更不敢看现实，怕分析现实，触到自己的伤处。他们为了欺骗自己的灵魂，或欺骗人家，他们都不能不逃到神秘的雾里去。

但是，诸位好友！我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嘴，资本主义的艺术主潮，虽然是由生机勃勃走到死气沉沉，象上面说的那般，但这不是说，这几百年来，就是最近几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度里就没有惊人的艺术作品、伟大的作家出现。我在前信中就说过，艺术有官家的，但同时也有民间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衰亡期中，各国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民间艺术的标准也提高了。在当前社会阶级两大对立下，民间的新艺术的嫩芽也日在长大，与旧的艺术更现出露骨的相抗的姿态。广大的作家群，他们中，除开少数的在为他们的老板在服役外，多数的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是属于上流社会层，可是他们的灵魂已同情“民间”这方面，有的竟代表大众的革命的情绪，走到大众阵线前在替“民间”说话，有的虽然还没有站到大众阵线中去，却有意识无意识的接近大众，变成了同路人了。

所以在当前世界各国的艺术园地，总是现出有两种主潮，这两种主潮在今日不仅是艺术园地的小纷争，而是意识的在执行

各自己对世界改造的历史的使命。在新兴的阵营内，如果那个国度的大众，在政治经济上还未取得支配地位以前，这一阵营内活跃的艺人，并不能就是劳动者。因为资本主义统治底下，劳动者大众为物质生活条件所限制，所以完全独立的劳动者的艺术尚难建立。这时，代表这新兴艺术运动的人是前进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正确的宇宙观、社会观的理论下，勤恳的在为未来的花园开垦，播下一些新的种子。

这些新的园丁在今日的工作是万分艰苦的，因为这种开拓工作已经被上流阶级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整个社会改革斗争的一部分。但它的作用在整个改造工程中，是非常主要的。它能舒畅大众刻苦斗争的精神，增长大众集团的协作习惯及能力，振作创造的情绪，虽然未来的花园并不能在今日马上实现，但有了这一种奠基，新花园开幕之期总是更近了的。

至于明日的花园是一种怎样的图样，明日花园的园丁的工作是向着什么方向？这里，我不想纯作抽象的理论的讨论，就拿今日正在从事新的社会建设的苏联的艺术建设来略谈一谈吧！

在二月二十二那天，上海曾举行过苏联版画展览会，我已说过，我们真饱了眼福不少。当日鲍格莫洛夫先生的演说，我以为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明艺术中主要的倾向只有两个：一个是实写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其他倾向都是从这两个倾向变化的。人类文化史上各个时代，就是由于有时是这一个主义支配，有时是那一个主义抬头。但在今日苏联，这二者均不占优势，也不是这两种倾向的性质兼收并蓄。他指出苏联艺术"新倾向的起因，为苏联生活与新社会秩序剧变。我们名这种倾向为社会

主义的写实主义。其起因为三种伟大的现象：一、大众文化程度急速提高；二、大众积极参加新社会秩序建设工作；三、艺术大众化。此种艺术得以反映千百万积极参加创造新社会工作的大众生活与思想，此种艺术对大众为公开，且为彼等所了解所欣赏。”他说：

“苏联艺术的新倾向乃伟大社会变化的结果。此等人物在旧制度下仅为统计材料，今日则成享受生活与艺术之新社会人员，此种倾向能在各方面反映人民生活，回忆大革命时代的英勇史迹，欣赏美丽风景与人体，欣赏工厂烟突与新工业建筑物，我们名它写实主义，即这个缘故。”他又说：

“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不仅为今日的写实主义，且亦为明日的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以新社会真正发展为基础，故敢作，且必须具有梦想。”他还引了拉狄克、高尔基在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家第一次大会时的话去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

拉狄克说，“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或艺术一般），其任务并非在表现世界，满足求知欲，或仅为人类的镜子。其任务乃在参加人类新文艺复兴的伟大斗争。”

高尔基说：“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肯定生活为一种行动，一种创造力量，其目的在使男女大众最可宝贵的个人能力不断的发展，征服自然，谋其健康与生长，谋取世人伟大的幸福，适应其不断增长的需要，并全般教养，以结合为人类美丽的一家。”

这些引用文句太沉闷了吧！然而，这是非常可宝贵的指示，明日花园的轮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理论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事实了。

诸位好友！艺术这东西从出生发展到现在和明日，我都约略的说过一点影子了。自然这是万分不够的，不过，在我们有些没有时间去过艺术生活的人，也只好晓得一点是一点，比完全不晓得，也许要好一点的。我最后还要告诉诸位，不论是属于哪一倾向的作品，即就文学说吧，有值得去一读的就很多。各种倾向中都有伟大的作品，他们很丰富的给了我们后人许多精致的经验，我们如果能够批判的去读它，它都对我们有益处，所谓接受前人的遗产，就是这个意思。但这只是交代一句，并不是要诸位都去欣赏。

至于我说了这些话，对于我们当前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我们要明白当前中国艺术界的复杂现象，就得先对于艺术有一个一般的概念，有了一个较正确的概念，再去分析现实，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才能规定自己的任务的。

太长了罢！再见！

怎样使它成为教育的工具

关于理论方面的问题，以上三封通信草草的把它答复了。但是诸位要求的知识不仅是理论的，不仅是拿了一片理论的钥匙去窥探艺术的王国，我们最最主要的目的是如何用艺术这种手段去改变我们生活着的人间世，去为目下我们的生活改善、民族解放去服务。

自然，这种话被上流人士听见是要笑掉牙齿的，但是这尽管不睬它。现在中国艺术界是明显的有一部分工作者自己退出了"象牙之塔"，决心站到街头上来，预备用自己的艺术，为这目标努力的。

这从整个民族斗争看来，是万分的重要。整齐全民族斗争的意识，艺术确是一个最好没有的手段，我们不能忽视它。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喊集中国力了，这种可以作为斗争的工具的艺术的力量，我们能够让一个一个的艺术工作者个人保有它，不拿出来运用么？不能的。

艺术是怎样的与民族解放斗争联在一起呢？

我现在可以告诉诸位，"一二·一六"以后的北平学生在"到民间去"的宣传中，很巧妙的运用了艺术，出了不少的艺术家，有着很可惊人的成绩。

我们知道，"唤起民众"，现在还不能单靠文字。因为中国有

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眼睛不能读字排成的东西。所以北平学生到了“民间”，不得不用演讲，唱歌，演戏，画画，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宣传国难。他们用打牙牌的小调子，编出“九一八”的历史，向大家唱。他们用戏剧表演《洋学生闹街》，去宣传当前学生的救亡运动，表演《打回老家去》，去对东北士兵宣传收复失地。用图画表出中国疆土的被侵略，日帝国主义的横蛮、残酷，虐待东北大众，以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态。这些东西，都博得群众喝彩，因为这样具体的表演，或画出把他们看，唱出把他们听，他们都能懂得。许多群众看了，听了，流下泪来，许多士兵“磨拳擦掌”，愿意牺牲自已前去杀敌，这些宣传是非常的成功的。艺术在这里已发生很大的作用了。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这次学生运动中，运用艺术的地方虽然成功，可是他们都不是平日专门弄艺术的人，自已的修养也未必够。我们想想，如果全国艺术工作者，能有意识的组织起来，集团的去研究今后艺术如何对大众服务，那将来的作用的巨大，谁还敢否认呢？

是的，在民族解放过程中，“唤起民众”是一件主要的工作，我们这些对于艺术有些兴趣的人应如何去努力呢！

现在，我很想来和诸位谈谈，我们自已的修养的问题。

诸位是业余的艺术的学生，诸位又是直接参加工业生产的人。你们对于一般的知识，认识都是超过一般大众的，并且都能运用文字。这些条件，在今日中国劳动者生活状况下，不是一般所能办得到的。诸位中有的爱音乐，有的爱话剧，于是组织了许多研究的单位，不断的学习，这不能不使我万分高兴。我可以对诸位说一句十分诚挚的话，象诸位这般的努力，一切进步的艺术

家都是愿意帮助诸位和诸位合作的。

至于如何修养呢？我以为诸位学习的机会要比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还要多。因为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他只能学到一点学院式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接近大众。现在单就唱歌说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民众音乐家，唱出民间疾苦，民族的危机，但在学院里只能学到一点理论，和几个世界的名曲。民间音乐要怎样才能变为斗争的艺术呢？虽然，我们不能不接受高级的乐理和名曲的启示，但主要的是深入民众去研究已有的民间音乐，去利用一切形式，一切可以作为斗争的材料。

这工作，在现在不是学者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诸位方面，如果有人好好指示，知道怎样做，做起来就不算一回什么事了。诸位中，有的是东南西北的人，操的方言总不下十几种，虽然目前都是工人，但过去也有种过田，做个生意，当过兵，走过江湖的。你们生活的丰富，真是谁也赶不上。平日大家的口中不是都要哼几句小调么？我们如果把各地方言中已有的民话，研究一回，把新的内容加上去，把那些没有意义或者在意识上是反动的东西，改变来宣传国难，说服大众，那就是最好没有的。因为这种声音是他们熟悉的。从这类熟悉的声音，传播救亡的种子，那是比较容易的。

可惜，今日的音乐家能注意到这方面的还很少。

因此，我们更要努力了。譬如《读书生活》上登出的那篇《国难记》，就是用唱本写的国难史，那是一种战斗的艺术品。你们中，如果把它用方言唱起来，用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唱成各种声音，那力量多么雄厚啊！四五年的国难，几十年的耻辱，在一

两个钟头就对人说尽了。那是最经济不过的。

倘若我们的无线电播音台、书场、游戏场等地方，都被我们的歌声所布满，我们工作时、游戏时也不知不觉哼出我们的歌声，就单就唱歌这个艺术的手段说，已尽过很大的斗争的作用了。

自然，艺术的领域还宽得很，不仅是唱歌而已。再说到戏剧吧！戏剧的作用比起唱歌来还要大。因为戏剧表现出来的，要比唱歌更具体，从戏剧得到的概念是更明确。你们自已有经验，用不着我说。不过，可惜得很，现在话剧运动还是几个进步的知识者的，象《怒吼吧中国》、《扬子江的暴风雨》之类的戏，就不能到工人区去演，门票买上一块钱，中国的话剧目前除开低级趣味的文明戏以外，还没有职业的剧人。你们业余剧团，也只能在纪念日偶然排演几出戏。单就上海市民说吧！许多学徒、店员、工人、苦力还是沉醉在游艺场所"大世界"、"天韵楼"、"先施乐园"等地方，每天买的门票，就比任何高级电影院还多。所谓低级趣味，目前正还统治着无数人们的"灵魂"，这些趣味中，是带有杀灭前进意识的毒素，而为封建意识说教的。

我们在报纸上，只看见有人在排演阮玲玉，排演孙传芳，却看不见有人排演殷汝耕的丑剧。这就看出这类低级趣味的艺人的堕落了。

这现象我们是要与它奋斗的，我们要用真正的艺术，并且是作为教育，作为斗争的艺术去代替他们，夺过他们的观众来。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达到呢？不是专家放大炮，说几句空话完事的。我们首先要抓住这"趣味"，旧的形式中抓住观众的所在是在那里？我们要研究一切低级趣味的艺术，分析他们构成的要素，批

判的去吸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去诱导群众。同时我们自然要把真正大众的艺术，贡献给大家。但我们不能不管大众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接受性，生硬的介绍一些他们消化不了的东西，所以我们介绍的卫生的粮食，并不一定用刀用叉，中国旧式的碗筷也可以应用的啊！

要使艺术成为教育的工具，绝对不能忽视民间已有的艺术，不能忽视大众的习惯和趣味，不然艺术终止于限制在有教养人的欣赏的范围内，在当前客观任务上，起不了什么积极的作用。

诸位朋友，我的话已经说得太长了。我非常的惭愧，也许以上说的都是外行话也说不定，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艺术的人。现在我不过就社会科学的视点，将艺术这东西的概念约略替大家解说一番罢了。诸位愿意以业余的时间来研究它，并且是同时负起了教育你们同伴的任务，这是万分正确的。朋友们！我们大家努力吧！

为了使我们书场上的时间经济，所以对于艺术就不想多说话，只把以上几封信给诸位看看，所谓艺术这东西的简单的轮廓，大致已经有了吧！下次我们要谈的是哲学。

哲学的踪迹

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某人爱发牢骚，某人爱管闲事，某人对于某一件事忿怒得跳起来，但也有人一点不关心，却站在旁边冷笑。我们也听见人说，“人心是不可测的”，“世间上没有一个东西比心还复杂”。我们也听见人家骂人，喜欢用阴险、古怪等字眼。这一些话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可以碰到。但很少人来追问怎样人这东西，这样古怪，碰到同一样的事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就拿昨日南京路上发生的事来说吧！英捕冲散上海市民爱国示威运动，打伤了好几个人。事后我就听到许多不同的意见。

大众对这件事，是一致的忿怒，对于示威运动是认为非常重要，并且要求再来一个大的示威运动答复它。

有些名流学者、教授，就觉得上海市民是多事，“喊几句口号有什么用”，犯不着去触怒捕房来干涉，爱国要爱在心里，要镇静！

还有一些人，竟在对英捕媚笑、喝彩，说：“打得好，还打得不够。”并且扬言道：“这又是什么人在那里捣乱。”

还有心中也同情被打者，也忿怒，但有涵养，恨在心里，他们伤心，但觉得“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也有些人完全不管这个事件的。

“我真不懂为什么人有这样多不同的心肝！”是的，“人的心肝”是异常复杂的。

再就这次全国学生爱国运动说吧！大众对北平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一致的敬佩，并且以同样的行动响应了。对于他们的艰苦斗争，每一件事，都有兴趣，并且马上就学习了。譬如四人手挽手一排的游行，与警察巷战的技术，制裁校内奸细，到民间去等，以及对当前北平的检举，都表示抗议、反对。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人学会了北平警察的用水龙、枪刺、皮鞭，用汉奸混入学生大众中去破坏、分化，用“救国不忘读书”的腐烂的调子去麻醉学生，用一切卑劣的方法去谋害爱国青年，自然对检举是同一样表示了最大的敬意的。

你们一定觉得这太奇怪了吧！

是的。太奇怪了。

再拿梅世钧的惨案说吧！日本工厂，无缘无故打死了一个中国工人，全上海的大众都忿怒达到沸点了。但也还有人代日本人辩护，说梅世钧本患有神经病，他的死是应该归他自己负责，不该错怪日本人。你说气不气呢？

这类例子，真可以举出无数。对国家大事，对别人，我们有这样不同的看法。至于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事呢！

譬如目前我们最大的威胁是失业问题。生活难已成了当前每一个辛勤的人，生死的难题了。我们即使对以上说的那些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但到了自己或家庭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你总不能不有一种感觉吧！是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为生活担心。但所感觉的也并不都是一样呀！

这我们自己经验到，有的人失业后完全陷入失望，对世界什么事都无兴味了，觉得世间上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生的趣味完全消蚀，一旦遇到一个什么刺激，或一种什么感触，结果是自杀了。这类事天天报上都有记载。

有的人，他把失业寄托在命运上去，人生的苦恼是命的不好，自己的倒霉是运气没有来，所以他虽然苦煞，也还不自杀。他们忍耐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敢"怨天尤人"。这类人，在我们朋友间很多。

也有遇到困难，不自杀，不消沉，也不相信命运的，他们在每一困难的当前去追究造成这困难的原因。譬如就失业说，他去分析这失业的现象，认识他及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工做的根源，要怎样才能有工做，自己应该怎样去奋斗。

这里，每一个人对于失业的问题就表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感想与态度了。

我们还可以发觉，不独对国家大事，对个人生活等切身的问题，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就是对自然，抬头看青天，他们的意见也是不能一致的。

我们的周围的熟人中，就有不少的人相信天上有一个主宰，空中有无数过往的神鬼精灵，他们统治着人间。我们的朋友中，就有不少的基督徒、佛教徒、回教徒，各种各样拜物教的人。他们对天跪拜，对泥塑木雕的东西跪拜，对一张纸符、一个牌位也跪拜，向这些东西求福、求寿，想靠这些东西消灾灭祸。

也有人不相信这些迷信。他们根据科学的知识，生活的实践，去解释自然界一切现象，知道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以外没有什么精灵鬼怪。他们都是无神论者。

如果我们肯闭目静思，把我们自己周围的人，一个一个去检查，在许多朋友或同伴的"灵魂"中去旅行一次，我们真要吃惊人的"心" 真是复杂得够，那五花八门的现象，真是够你研究啊！

总之，我们"日常思想"里面，是现出没有系统，非常杂乱、矛盾、散碎和怪样。但一个人决没有对世事全无感觉，完全不发表他的意见的。任你如何不管闲事，超然物外，就到山上去做和尚，或整天闭着一张口，不说一句话，你并不是对世界就没有表示态度。因为做和尚不开口的本身，也就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这态度也必定是根据某一种感想，某一种对世界的看法有紧密的关联的。

是的，所谓"心"的现象，乍看起来是复杂的，不易了解的，但是如果经过一番整理，找出这无数感想的一定的线索来，我们知道以上种种现象一点不足怪异。每一种感想中，一般"日常思想"中，都潜伏着一种哲学的根据。这些日常的思想，虽然是没有经过整理，是一些片断，不能说它是某一种哲学，但它确多少反映了一种哲学思想。

因此，我们对当前救亡运动，从无数不同的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大哲学思想的系统的轮廓来。

全国大众都是站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方面的，所以他们的感想和行动是积极的、斗争的、前进的。他们的哲学，必然是属于最进步，可以作为斗争的战术，行动的领导的这一系统内。

在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利害，惧怕斗争，从甘愿出卖民族的大汉奸仇视救亡运动起，到空口同情救亡运动而又回避救亡行动止，他们思想是消极的、卑怯的、腐烂的。他们的哲学必然

是属于腐败的，无力量的，只能作为一种粉饰自己行动的丑恶的脂粉，和麻醉一部份落伍的大众的奴才哲学这一系统内。

关于梅世钧的事件中，也明明看出这两大哲学系统所表现的形迹。

在失业这个问题上，那三种看法，每一种的根底里就表现了一种哲学思想。自杀的是表示了厌世主义的哲学思想，相信命运的是表示了宿命论的哲学思想，追寻失业的根源，去作有眼光，有计划的奋斗，谋大众解放的，是表示了现实主义与实践的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在对于自然认识这个问题上，明显的是表示了那唯心与唯物二大冤家在那里作怪；就是上面指出的进步的哲学和腐败的哲学，也无非是唯物唯心二大哲学思想系统在社会观，在中国实践上所表现的形态罢了。

不错，在日常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哲学思想的碎片。这些碎片，虽然并不就是哲学，但一切真理都在平凡中，我们从这些日常思想的碎片中，是可以发现哲学的踪迹的。至于哲学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暂且不要管她，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交代清楚的，就只一点，即哲学是一片打开认识的门的钥匙。我们有了一片这样的钥匙，我们的眼界就会宽广起来，我们头脑里面那纷乱如麻的思路，借着认识的力就可以理出一个系统，我们的行动，就可以按照我们应走的道路，很合理的行动。

她的气量

"哲学是一片打开认识的门的钥匙"。我们现在姑且假定这一个比喻没有一点语病吧！我们接着要问，我们要认识什么呢？我也知道，诸位一定马上可以答道，要认识世界，虽然诸位目前最迫切要知道的是人事，是如何进行生存的斗争，但我们总是生长在这世界中，认识"人事"并不是在这世界以外认识的，世界却包括了我们要认识的一切。这答话自然很对。

不过，这一片钥匙我真的可以交给诸位么！这却有点踌躇。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认识有限，交不出货，还有一个更大问题，就是如果诸位把这句话太机械的看了，向我要这一片钥匙，以为有了它，对于世界的认识，就全部完事，世界从此就没有新花样了，那我却要赶快声明，那样的一片钥匙，在今日的人类还没有，也永远没有。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有史以来已经六七千年了，史前期人类对于这奇异的世界，就不知道经过好多个千万寒暑，人类到今日止，虽然对这世界的了解已经很有可以自傲的成绩，但并不能说，我们都了解完了。宇宙（即世界）是无限，我们的认识也是无限，到今日止，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对宇宙的存在，我们可以认识它，一点不犹豫，我们也相信我们已有了打开这认识的门的很好的钥匙，但不认这片钥匙就真的象一片铁打的斯普林的钥匙一样，机械的无变动，完全相反。这钥匙的话，不过是一个

比喻，实则我们的认识发展，就连这比作认识的钥匙的东西也是在发展的。

要先了解了这个，我才敢大胆的向诸位道，我虽不敢说我能交这样的一片钥匙出来，但我可以告诉诸位如何去取得这片钥匙。

人类这东西，找求宇宙的"神秘"，到现在能找到一片名字叫做辩证法唯物论的钥匙是经过一个怎样的奋斗期呢？

在原始时期，人类在自然的怀抱中，找东西吃，天天与自然接触，久而久之，对自然渐渐有了一些认识。后来找东西吃的方法有了进步，人类渐渐对付自然的能力也大起来，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的形式也繁复了，于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工作，又使人类渐渐认识社会。不过，当时从各方面所得到的经验，虽然也不少，但因找东西吃的技术（即生产技术）还太低，传授过去的经验的是靠记忆，父传子，子传孙的，由肉口传下去，知识并没有分类，所以一切的知识都是混然一物。宗教、哲学和科学都连结在一块'你分不开它，虽然等到社会内部已经发生阶级了，社会内贵族阶级能一部分脱离劳动，在闲暇时上观天象，下察人事，但传授这些知识的人仍是那些带着鬼气的"巫"、"儒"那些东西。综合知识以成思想系统的还不是哲学。我们知道，哲学到了隔我们很近的中古时代，还在那里作宗教的婢女。宗教确是一切知识的母亲。

不过，这母亲的产子越多，儿子大了，也就渐渐闹起分家来。因为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有叫做科学这一个儿子独立起来。儿子又生儿子，于是成立各种科学。

所谓哲学这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女儿，她也象叫做科学的兄

弟一样，是渐渐独立起来，不过论年岁她还是一位姐姐。这位姐姐的气量是最大的，她把所有的知识，在一种最一般、最大量的、最普遍的思维的观点下，整理出来，弄成一个系统，联成一个有系统的总和。她与一切科学都有关系，但她仍有她一定的存在。她的科学兄弟并不能抢去她管理的那些事务。

哲学注意的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对于自然的解释，其次是对社会的解释，人的思维的解释，宇宙的本身是否存在呢？人类是否能够认识这位宇宙爸爸呢？我们的感觉对于宇宙的反映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什么是真理呢？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此外对于所谓道德、伦理等诸方面都可发出无数的疑问。

这些问题与任何一种专门科学，说来都有关系，但都不能在各种专门科学中特别加以探讨。我们对于任何科学要有正确的理解，也非得了解哲学不可，所以认识宇宙，虽然不单只靠哲学这一片钥匙，但这片钥匙实在来得太重要。因为认识之门，被这一片钥匙所打开的实在是最基本的一门了。

自从她独立门户后，是怎样成家立业的呢？

这要说得详细，在本书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子孙到现在已成了许多房份了，但我可以首先交代出她的家族发展并没有离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轨道。归根到底，哲学也要受社会生产力所规定。不过，哲学比起政治、法律来，要间接一点。譬如一条链环，哲学这一环，与经济这一环间，要多通过几个环子，不是直接相套着。

这一条链环的了解，大致是这样的，我们说某一时代的哲学，那与她直接套住的环子是某时某地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直

接规定一个时代的哲学的色彩。社会心理却是由阶级的位置及其一般的生存条件来规定。这些一般的生存条件，又由阶级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来规定，这与当时生产力的状态又是紧相连结一致的。这里你规定我，我规定你，联成了一环一环，与哲学相结合。

我们拿当前中国救亡运动中所表现的那一种腐败哲学系统来作一次检查吧！

譬如中国目前的腐败哲学是带着一种无力的、卑怯的、无耻的情绪，它不敢认真看现实，失掉了一切生的意义，只想苟且偷生，在空虚中、幻影中去回味腐烂的中国的骸骨，安于奴颜婢膝服侍民族大敌。我们觉得这个哲学系统非常奇怪吗？

不！我们如果直接考察产生这种哲学的心理，我们并不会怪异。它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乃是帝国主义最后阶段。殖民地再分割的大战前，殖民地大地主、买办、官僚阶级陷入了绝望的穷途，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既无力抵抗，又不能镇服国内大众的叛乱。他们失掉了争取一个时代主人的兴趣，找不出一条正常发展的道路。他们看了国内大众反叛的可畏，于是就生出"宁送友邦，不与家奴"的政治主张，自己甘愿以奴才自安。他们的感觉、心意、思想，不能不印上自私、卑怯、失望、怀古、无耻、空虚、苟安等印记。这些奴才的感觉、情绪、腐败的思想变成了一种杂烩，表现在他们的哲学中，它就赐与了这个哲学系统一种腐臭无比的气氛。

这一锅臭杂烩又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这是可悲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总溃崩中，半殖民地内经济上占上风的阶级，失掉了它的独立性，失掉了国民经济中主导的地

位。自然，这又是与国民经济总崩溃，使中国生产力发展停滞，苦闷的陷于半封建状态有着紧密的关联的。

这一个例子想来够明白了吧！今日的哲学的发展，出了“汗牛充栋”的文献，虽然一个专家也难把终身的时间读尽天下书，但以上的例子中所用的方法却可以运用到整个哲学思想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这方法可以在哲学实际发展过程中证实它的正确，可以由此明瞭她的发生、发展的全生命。

话分两头，在这一家门内，曾经热闹过一些什么呢？这一片启发认识之门的钥匙是怎样被人们一天天变为更有用的东西呢？

下面就要表出了。

最大的“口舌”

世界上最大的“口舌”，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哲学家门的热闹吧！这种官司已经打了几千年了，现在的是非曲直，虽然早有定评，可是因着社会生活的分野不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心理，决定了某些人的头脑存在着某些歪曲学派，仍不肯接受真理，要来和真理夹缠、对敌、互打，就是到了今日，也还有前天我们说过的许多那般怪模怪样的眼睛、头脑、言论和行动。

在今日，我们返观这一段悠久的抬杠，虽然夹七夹八，但也能找出一个头绪，这我是交代过的，不论你的话是“义正辞严”，或是“花言巧语”，也总脱不了唯心、唯物这两大派别。要在这两派外，找出一种中性的东西，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即使你穿着怎样新奇的衣裳出现。

譬如就宇宙的由来说吧！起先是人类的知识不够，他们对于宇宙的了解，只能根据一点感觉的经验，不能有科学的认识，对于宇宙的一切现象就不免有点乱猜。后来是人类在生活上有了利害的关系不同，就故意学会了来扯谎。中国人到现在还有人说，构成宇宙的是阴阳两种气，或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在宗教家就说宇宙是神造的，基督教并且扯出一个大谎，说上帝是怎样创造宇宙、开天辟地、造人，好象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人类从生产的经验中，发展了生产力，慢慢的促起了科

学的发达。科学发达后,《圣经》上的《创世记》显得实在太荒谬了。这时以前主张宇宙是物质,不是神造的人,对于唯物论的宇宙观就渐渐明确的得了保证,唯物论世界观渐渐建立起来了。但是唯物论的世界观并不就统一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有些人虽然接受科学知识,但他们并不完全改变对世界的观点。他们生活的利害逼迫他们陷于一种矛盾中。这时他们因为有了一些科学知识,觉得再说神话不免要令人冷齿,于是有的就变得更无赖,改口说,宇宙这东西,本来是不存在,不过是我们的心里想到它,它才在我们的心里发现,除开我们的心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宇宙不宇宙。他们只承认有一个万能的心,把心去代替了神;或者他们说,宇宙这东西是不能了解的,我们的眼睛、耳朵以及一切感觉器官都是靠不住的,用这些靠不住的照像机去摄影,我们怎能照住正确的影片呢?他们好象这话说得很科学似的。

等到科学更发展,唯物的世界观也更向前发展了,他们这些鬼话再被击碎后,他们对于自然现象,也再不能不运用科学的法则去解释。不独知道上帝那东西是靠不住的,宇宙间一切现象也不见得只存在在心里,确确实实在人类没有以前就有宇宙了。自己死亡后,宇宙也不见得会消灭,感觉的器官虽有缺陷,科学却供给了我们的机械用具,去补足器官的不足。宇宙不是不能认识的,并且,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人类生产力有了进步,利用自然越多,才有今日的世界。自己成了大财主,也多半靠了自己对宇宙的认识更丰富,不能说自己工厂发了财是上帝的意旨呀!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帮闲的学者和有些资本家间,它心中并不反对唯物的世界观,但他们每个星期日却仍然带着自己的家

属上礼拜堂。工厂办得越大，工厂内的礼拜堂也建筑得越堂皇，牧师越用得多，这一种矛盾可笑的现象是到处都有的，你以为这种矛盾是奇怪么？

不的。他们为的对付另一部分人，还用得着神秘的宇宙观。他们知道对自己的仆人是不能主张无神论的，如果自己的仆人，真的知道世间上本来没有什么主宰，他还安心把你当作主人么？这要谨防呀！

因此，礼拜堂内总是热闹的。你真的以为这些肥头大脑的人相信什么上帝么？要听那沙音的牧师读一世也读不完的《圣经》么？相信那些可笑的祈祷么？你以为他们没有信仰跑到礼拜堂来会感觉无聊或寂寞么？不！在牧师低着头默祷时，他们的眼睛是斜注在前排座位中某一位贵夫人，或某一位名媛的颈子上的。他们的灵魂是有所寄托的呀！不过不是那长胡须的基督，而是那小鸟一般的乖乖啊！我们再来看哲学家们讨论社会或人生的问题吧！在生产中发生了管理人、指挥者和被管理人、被指挥者以后，哲学家们便开始讨论人生问题、道德问题了。自然，这一方面的看法是要受他们对于宇宙的观念所影响、所规定的。

世界既然是一个神灵，一个不可知的东西，或一个心的玩意儿，客观的宇宙既然不认它存在，那末，在社会的观念上，自然就只认识有权，有势，有财富的人群，不承认有其他人群生存的权利了。天上的神是上帝，地下的神就是抢着了“王位”的统治者及其家属了。心既然支配一切，统治者也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支配全社会。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既然不会去究问它，社会运动的法则自然不能被他们所了解。因为他们主观的陈见已阻

止他们深刻的去了解真实。现在还是用几个例子来解释吧！

譬如现在有些人说，人类苦痛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制度，而在于产生这种制度的思想，所以要解除人类的苦痛，并不是改良与革命，而是真正的道德的恢复。

由此，对于中国民族当前的危难，他们就只知喊出道德救国的口号，中国今日的贫弱，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亡，要"复兴"民族，就首先要挽回道德不可。要妇女能够守贞操、死节，要小学生读经，要把少男少女都变成少年老成，一律穿长衫马褂，会对人下跪下拜，要江亢虎之流的人讲学，使整个中国文化界的空气弄得腐臭不堪，生人死绝，这才可以得救。他们不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求出中国社会贫弱的真正原因来，他们只悲自己的阶级没落的哀感，发出一些狂妄的梦呓。这样的思想，你看如何不构成腐败的亡国哲学呢？

再说到人生的看法吧！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回人生观的战论，他们胡乱的嚼了一回舌头，把人生离开实践的社会，架空的混战了一次，就是今日恐怕还是有人抽象的在追求人生的意义吧！

唯心论者对于人生的看法，自然不免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心意，现出阴阳怪气来。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罗马帝国崩溃时代，一位富裕的财主，同时又是哲学者塞内加，给他的朋友刘齐亚的信作例子。他对人生是怎样的感觉呢？

他那信上写道：

"你能有什么东西阻止你不死么？一切使你犹豫不决的享乐，你都一一尝过了。在这些享乐之中，你没有一样，是外行的。你饱尝一切美味，你领略过葡萄酒的滋味和蜂蜜的香甜；不管你

喝过一百瓶子或一千瓶子，这又有甚么分别？牡蛎虾仁，你同样是饱尝的。你的奢侈的生活，使你明年再没有什么新鲜的，没有尝过的东西可尝了。你到了这步境地，你还不能与这些东西分离么？你还能有什么可留恋呢？你留恋朋友呢？还是留恋家乡？难道你以为因了他们的缘故，就得再活一天吗？啊唷！假使你有力量时，太阳都要被你熄灭了哟！因为你做的事体没有什么是光明正大的。你还是承认吧！你所以好生恶死，……总是不忍离开肉铺，然而肉铺的一切滋味，你都是尝过的。”

这是一个饱食终日、昏庸老朽、失掉了一切生趣的寄生者的悲观主义者，他竟宣传死灭，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下宣战书时，不仅对世界观多采取唯物的观点，就是对人生也是充满着热望，对人生的意义也曾实际认真追求过。不过到了现在，因为社会经济的恐慌，资本的破灭，劳动者的革命的威胁，怀疑和悲观的情绪又笼罩着他们，对于人生意义自然也觉得乏味了。塞内加的话，也许对于今日德国好多资本家们反是很动听的吧！

总之，唯心唯物这两大论争，主张唯物的人总常常是一个代表新兴气象的阶级。资产阶级曾经对封建地主斗争中，用它作过武器，不过资产阶级到底被阶级观点所限制，他的唯物论始终不能彻底。他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主张唯物论，因为唯物论发展的技术科学，可以改进生产力，使自己的工业发展，多得些利润。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却还是唯心的，因为对仆人，对受剥削阶级是不能主张唯物的，他要用神秘去蒙蔽他们，模糊他们的人生观，和缓他们革命的情绪。

自然，几千年来唯心、唯物论的斗争，并不是如上面说的这

样简单，双方都出过不少的伟大的人物。唯心论大师黑格尔及辩证唯物论大师马克思、恩格斯、伊利契这些大名，我们每个人都该认识认识的。

不过，哲学上的斗争发展到辩证唯物论占着优势的现阶段，那是因为劳动阶级以将来主人的雄姿跳出了世界的缘故。这一阶级的人，他们没有两重人格，他们要创造的是没有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社会，大家都要做主人的，没有什么秘密要隐藏起来的必要。所以他们敢于面见真理，精心的去考察物质世界的辩证的公律，他们发现了整个宇宙是物质的辩证法的发展的。他们肯定：

“客观的世界是在主观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不是幻影；客观事物的种种变化，也是依照着它自己的性质变化的，并不是神灵的心意要它这样，它才这样。它的变化有一定的方式，这方式，科学家称为“法则”，一种事物的变化有一种法则，我们不能够随着自已的心意妄想将法则更动。我们要改变事物，只能利用这法则，随着这法则去推动事物，才能达到目的。”

劳动阶段目前在进行解放斗争中，就是以上面的新的哲学观点去作斗争的指针，去改造世界，同时去改造一切人的观念，使新的哲学更向前发展。

作为解放自己的战术

话说回头吧！我们这个书场上要详表的不是空谈这片打开认识的门的钥匙，也不仅仅要使大家了解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思想，更不只希望某些个人听了上面的话，把自己纷乱如麻的思路整理一番，使自己个人的行动更正确，就可说我们书场上没有白费力气。不！我们最最主要的是明瞭上面一切后，每个个人，都能接受一种为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战术的哲学。这哲学是实践地负起了当前救亡的任务，成为整个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的。

是的，现在全中国人分为两大阵营了：一方面是少数为了个人私利，甘心出卖民族利益，毒害自己兄弟的汉奸，一方面是绝对多数要抗敌自卫的大众。这两个阵线现在一天天对立得更厉害。不仅在行动上，就是在思想上，我们已经说过，也是彼此不能并存，成了二大哲学的对立了。

大众要打退敌人，自然同时要制裁有卖国嫌疑的一切汉奸，但肃奸不尽要检举奸人，同时要肃清奸人散布毒素，一切落后的思想。救亡阵线上的人，虽然一定是绝对多数，但多数中仍有不少的人还没有自觉，还受了过去腐败的哲学思想所毒害。所以，在整个救亡斗争中，思想的斗争，还是十分不能忽视。要大家自觉了，大家有了斗争的意识，才能发生斗争的行动，民族阵线才

能坚固。所以，在哲学上，中国目前也有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了。

当然，民族敌人和汉奸，就是在哲学思想上，对我们也是丝毫不会放松的。他们今日大家打成了一片，动员了一切腐烂的封建思想，捧出死了几千年的古尸作幌子，密谋杀灭中国民族意识。他们向大众的“灵魂”的袭击，是采取了种种方向，在种种形式上化装出现的。

“实行理论斗争，理解周围的现实上发生的事情，这是‘中国大众’在‘救亡斗争’上的必要的要素。理论，只有理论，对于运动给以确信与标定方向的力量，给以周围事变之内的联结的理解。因为理论，只有理论，帮助实践，不仅使我们理解中国大众现在必须怎样前进，并向何处前进，而且使我们能理解在近的将来必须怎样前进，并向何处前进。”

中国大众当前不能不和各种腐烂的思想作顽强的斗争。

首先，我们要反对投降的和平论，这一方面的论者，和敌人在大吹“大亚细亚主义”、“同种同文”、“共存共荣”、“维持东亚和平”等鬼话，借以扰乱大众的视线。这里的和平是我们不抵抗侵略，使敌人不花费侵略的资本，而让他称霸东亚，我们乖乖的作殖民地的奴隶。这种和平，如果是可能，也不是中国大众要讲的，因为在这和平下，我们所得到的是做奴隶。我们不反对和平，并且要求世界和平，但我们在和平下得到的要是自己能够生存，我们欢迎和任何以平等待我的国家及各国大众讲和平，不能和敌人讲和平。我们不能不揭破这种无耻的和平论。

我们要反对心理救国论。“爱国爱在心里”，不要行动。“只要人心不死，国就有为”了。他们以为今日的国难，完全是“人心

已死”的结果，所以他们提倡道德救国，标榜少数民族英雄，以为只要有了少数英雄，大家有了爱国的良心，“民族”就“复兴” 了。这些论者，巧妙的用“良心爱国”粉饰自己的回避爱国的行动，用少数英雄事业去代替了整个民族集体的行动，以取消对敌抵抗。

更进一步麻醉的，还有亡国的宿命论。他们早已高唱“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这是一种劫数。中国民族的劣质，现在到了非死亡不可的时期了。这种论调，和“民间” 残余的命运观联结一起，在落后的大众间，很起作用，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粉碎这种悲观论。

此外，还有一种在外表上似乎很动听的准备论。这种准备论，在原则上，装做主张抵抗，但他根据“唯武器主义”，觉得中国的武备不及敌人，目前不能和敌人言战，所以要长期准备，至少五十年，中国方可和敌人一战。他们用准备去掩饰屈辱，去为自己的投降政策辩护。

在严重的国难的课题下，一切的妖言鬼话都产生出来了。他们直接间接都在为民族的无耻作辩护，在那里有意无意的作侵略者意识的进攻的内应、先导者。

他们动员了一切的封建思想。他们把五四以后埋葬到十八层地狱下的死尸都弄返魂了。他们从帝国主义国家贩运了许多毒害殖民地及劳苦大众的灵药，和着中国尸骨，外面包上一层糖衣，用各种卖药郎中的谰言，劝一切身壮力强、知耻明辱的大众吞服。

这一群“灵魂”的奸徒，他们中间，无论在程度上有怎样的差异，但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不是圾垃不成堆，这一堆垃

圾就是构成今日腐败哲学的全系列。中国大众在"九一八"以后，四年以来沉着的反帝的实践，尤其是东北义勇军运动，"一二八"以后的全国学生运动所造成的救亡运动，把腐败哲学的无耻，谬妄完全揭露了。他们的理论已经不能为他们的行动辩护了。他们到了只有借刀剑之力，才能宣传他们的说教。

在另一方面，新的哲学思想，解放斗争的理论，却相反的现出空前没有的活跃。大家在行动中，要求理论的指示，在和别人作理论斗争中，强化了自己认识，展开了自己的理论。新的哲学现出统一了大众阵营的头脑最大限度的可能，在当前民族斗争的开展中，无疑的是一种领导行动的力量。

是的，民族的敌人和汉奸在中国目前还是支配的力量，大众中还有不少的人数没有自觉。腐败哲学思想虽然贫弱无聊，却得着刀剑的保护，安然存在。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力量，估计得太小。新的哲学虽然现出无限发展的前途，受着千万人拥护，但也不应以此自满。我们学习哲学，应怎样才算尽了我们实践的任务呢？

是去和一切腐败哲学斗争到落后大众中去说服他们的陈见、愚顽及所染的毒害，是教育自己，教育你的同伴。我们怎样教育自己和教育别人呢？

我们应建立战斗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应认清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辩证的规律性。我们应研究斗争中的战术和策略。

诸位朋友！我们这一席谈话，是太使诸位紧张了。但这不是我这书场上喜欢故作惊人之谈，实在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都太紧张了。我们来谈哲学，老实不客气的说，是缺乏学者

气氛的。我们太贫弱了，三句话不离生活，我们只好这样粗枝大叶的，象鲁智深似的大叫一顿，提醒提醒大家。至于要详细研究新哲学，那自然应该再到别的书场去。

赛恩斯先生

赛恩斯 Science(即科学)先生的大名,在“五四”运动以后,好象卓别麟一样,在中国是名盛过一时的。“五四” 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记起他老先生呢?这中间自然有段缘故。

原来中国在这八九十年来,穷困衰弱,就好象一个人害了贫弱症,天天在那里访医问药,一旦听得外国有了一位赛先生,他的的确确在欧美显过灵通,把许多昔日消瘦贫弱的国家,改变成了肥头大脑的胖子,这在病人的心理上,自然要感觉万分兴奋。在中国“五四”时代就有一位吴稚晖先生,特别把嗓子提高,喊出中国要欢迎赛恩斯先生。吴先生这一喊出,许多人就不禁同声喝彩起来,于是青年们开口闭口就离不掉“科学”、“不科学”等口头禅。

“你说得不科学”,“此不合科学之谈。”

“按科学的说法应该是怎样怎样。”

你将来预备学什么呢?

“我预备进理科,我觉得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

这些对话,在“五四” 以后随处都可听到。在现在呢!吴老先生还在力弱声嘶的喊“科工救国”,许多“科学家” 也在杂志上写自己的本领好大好大,只有他们才是救国的好汉。许多爱国之士,也劝青年人安心坐在实验室里,耳上带上皮套,不要听天

空敌机轰轰之声，分散了自己的研究和发明。赛恩斯先生虽然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五四”时代的英名了，却仍有人在那里捧他，大唱科学救国，以为中国要挽救没落的经济，也仍非请赛先生的教不可。

象这样的一位能救苦救难的赛先生，我想大家一定想认识认识他的。

赛先生到底是谁呢？我还得详细的介绍介绍。赛先生是吴稚晖先生开玩笑喊出的。赛先生并不真的是一个人，是指科学。科学这一个字，照英文的读法为赛恩斯，所以吴老先生也就把他喊作自己的朋友了。

诸位中，有许多人是在工厂生活的，你们最崇拜的人物不是那些管机器，指挥机器的工程师么？工程师为什么本领大，因为他懂得一点科学。科学这东西，确实在当前世界生产中，发生了最大的力量。就是诸位虽没有机会受专门的科学教育，但在机器旁边作了许多年的工，无疑的也就得了许多科学常识。至少，这一次书场上说的东西，比较什么艺术、哲学来，你们总会觉得较亲切，更听得入耳，容易了解些吧！

关于这位赛先生是否可以救中国目前的危难，我想到后面再说。这里，我们还是从他的身世说起吧！

是的，赛先生并不是一位神仙，他的年龄比起耶稣基督来，他不过是一位小弟弟。我们知道上古时候，一切知识都包括在宗教内，没有听见有什么科学。随后他又和他的姐姐哲学混在一块，并没有长大成为今日的赛先生。赛先生的冠年，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资本主义登场，赛先生才被世人敬重。不过，他虽然年龄不大，近两三百年来，确是风头十足，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扮

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知道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以后，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

我们还要知道，科学也不是从什么聪明人的脑里空想出来的把戏。“一切科学都是由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都是由社会的人对自然界的生存竞争的条件和需要中，由各种社会团体对社会的自然力，或对其他社会团体的生存竞争条件和需要中产生出来的。”这话说得有些难懂吧！是的，我不过希望大家摆脱今日许多长得肥头大脑的科学家那一副臭架子，以为今日的科学，都是由于他们个人的脑力想出来的，与当前的实际无关。所谓“纯粹科学”、“为科学而科学”那一套话，也不过因为分工的结果。他们坐在实验室内太久了，因此变成了井底蛙，看不见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状态及需要的关系。

实则，现在每一种科学，都可找出实际发展的根由来。譬如天文学的发生，并不是出于人类对宇宙好奇，而是由于农业耕作中，需要确定的季候，以及精确的划分时间，旅行荒郊或海洋时需要辨别方向。物理学则直接与物质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化学的发生是由于工业生产，特别是矿山的刺激。矿物学是由于生产中要利用矿物，并为生产的需要而来考究这些矿物才发生的。植物学起初只在于认识能供作人类食料的植物，然而才及于有用的植物，最后来才用来考究一切植物。动物学也由于需要认识动物的有用和有害的性质。地理和人种学则因商业和殖民地战争而发达。社会科学发生也完全与自然科学相同。政治经济学是随资本主义而发生，它起初不过是一种商人的科学，为满足资产阶级政策之需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

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完全是十九世纪以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运动所引起来的，决不是空想的乌托邦或什么理想的天堂。总括一句，不管科学越发展、越细分，不管社会的分工，使这些专门家看不见他的研究与实际的关联，但我们还是可以指明它与当时的生产力的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来的。所以他也不是单由什么几个聪明的人的脑子想出来的。

赛恩斯先生的身世，我们大概明白了。但为什么他要到资本主义的初期才能开始大出风头呢？这几乎用不着我们多说，人类过去几千年来对于宇宙现象及社会现象虽然从劳作中，获得了许多经验，科学虽然在这悠远的过去中，就萌了芽，可是要把过去的经验，或者说，认识的碎片，联结起来，求得各种现象的因果联系，整理一个系统，那倒不是一件易事。这要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科学不仅是限于意念的系统一方面，同时还有他的技术，即科学的物的装置，缺乏了器械、仪器、图表、书籍、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院等等设备，科学的发展不仅受到限制，且成为不可能了。

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一直到资本主义初期，才具备他生长的条件。这不是偶然的呀！

至于赛先生对于人类的功绩呢？

我们一点不夸张，今日的世界，与其说是由上帝创造的，还不如归功于赛先生了。资本主义的家庭，使赛先生壮大了。赛先生却也能够光宗耀祖，发展了资本主义文化。讲到他对于人类的贡献，这有今日万花缭乱的世界为证，真用不着我们哓舌，他是不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呢？

就整个人类说，因为有了他，对于自然的斗争才取得今日的

胜利，真不知打救了多少人的苦难，提高了多少人的生活。不幸的是，他的威力因为是凭借着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的，因此，不独他的能力被限制，同时因为由他造出的福利，完全被少数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弄到现在他变为资本阶级御用的东西，甚或畸形发展为榨取劳苦大众、屠杀劳苦大众的工具。在现象形态上，使许多粗心的人怀疑他老先生来了。

虽然，这完全不能责备赛先生。赛先生在今日的世界虽然现出一方面是功人，同时也似乎不免造了一些小过，但这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如果一定要找负责人，也不应找赛先生，而要归罪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我们自己。

赛先生的历史是值得一读的。不过，过去的还不是他最荣繁的一段，他那光华灿烂的时代，还在将来呢。

赛恩斯先生在苏联

赛恩斯先生虽然是资本主义的恩人，资本主义却太对不起他。资本主义的世界确是太小了，虽然能养育他，使他有了相当的生长，却不能让他充分的自由发展，弄到今日，资本世界竟"恩将仇报"，已对赛先生宣战了。

这是怎样说的呢？

在上篇略说赛先生的历史中，也曾提到，资本主义看重科学，并不是那些老板们在主观上，真的为了人类的幸福，在那里提高生产力，进行对自然的斗争。我可打赌，工厂老板们是连梦都没有象这样做过的。工厂老板们看重科学，是因为科学的发明，用到工业上去，可以使生产扩大，成本减轻，利润增大，和同业竞争起来，对自己有利。一切都是为了自私自利，老板们才肯接受科学上的某种发明，偷偷摸摸在小规模内实行的。但是这种接受性，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就是在资本主义方在自由竞争的阶段，不管这些老板们的动机怎样，在客观上，总算他们谁也不肯让谁，在那里抢先接受科学上的新发见，总是带着进步性的。

但是一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入独占阶段，情形就完全变化，这时代的大老板们，对科学上的发现，不独不敢接受他，并且怀着非常的敌视。因为垂死的资本主义，本身就不需要更大的生产力，他要求的是维持现状，甚或自己在那里破坏已经发展的生

产力。

科学既不断的发展，科学家们不断的有发现。一种新的发明，不久又被别种发明所代替了。工厂老板们哪里能容忍这些科学家们疯狂的捣乱呢？他们工厂中新近采用的方法，新的工厂的装置，是已费了一笔大资本的。说不定你明日又再来一种更新的发明，捣毁了他的计划，他哪能允许你。并且今日不象往年，生产进到独占，竞争减少了，出货已经找不到销路，再扩大了生产，不是自己在发疯么？

所以今日资本世界的发明家，要想把自己的发明立刻被老板们采用，那是少有的事。发明家常常遭到冷遇，甚至暗中被人谋害。幸运一点的，也不过被一个大老板暗中收买，使你的发明永远是一个秘密，不让旁人知道，如此终古而已。

科学这东西，到了今日，对于资本家们是再也没有什么兴趣的了，倒还不如宗教，还可以安慰安慰他们摇摇不定的心灵，给与他们一些灵感吧！

赛先生虽然在当前的资本世界里受到迫害，但对他的前途，并不能损害他的毫毛。资本家们虽然很有权力，但在历史中，毕竟不能过于夸大。赛先生不是现在已在另一个世界中，受到空前没有的欢迎么？

这世界就是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苏联。

因为，在这国度里，社会制度是完全改变了的，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工作将近完工，社会主义已贯通全线在前进。当前建设的工事中，是要求技术的改进，要求新的生产力无限制的发展，要求新的发明的竞赛，这里完全走着资本世界相反的道路。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私利妨害

赛先生的发展。这里的一切发明，不是谋私人利益的发明家创作出来的。这里的发明大都是集体的劳作，即使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贡献，也都由广大群众把它接受过来，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一切的发明，不论大小，都马上把它实行起来。“有计划的工作，代替了无政府的工作，交换经验，代替保守秘密，集体劳动代替了个人经营。”在这新的世界中，我们赛先生真是一日千里，“无挂无碍”的在那里展开他的“雄才大略”了。

同时，在这国度里，我们只看见赛先生在替人类造福，没有听见人再浩叹科学的功过了。因为在私有制度撤废的国度内，科学完全变为人对自然的斗争的武器，那种因被资本家们利用而现出的科学的罪恶也看不见了。

至于还未走上社会改革胜利道上的国度呢，赛先生自然还在苦闷中。不过，不要以为赛先生仅仅只可以做老板的帮助，同时要知道在大众的解放斗争中，赛先生也是可以作为大众的参谋的。说到这里，我们却要回想从“五四”到今日，我们中国许多人欢迎赛先生那个问题上去了。

关于欢迎赛先生，那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不欢迎赛先生难道反欢迎耶稣么？自然不会这样发疯的。

至于欢迎者的心中，是抱着一种什么期望呢？却不能不分辨。

有的人，把中国的贫弱，当前的国难，认作是中国科学不及他人的结果。要自强，救亡，只有提倡自然科学，只有科工才能“救亡”，“复兴”，那就是在做梦，说梦话。要赛先生目前到中国来，起死回生，那是过于期望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科学的发展要有相当的物质条件，不能仅凭希望。中国今日的贫弱，危难

不是在单纯的技术问题上，恰恰相反，中国今日要求的是在改变社会关系，这时不仅谈不上改造技术，没有改造技术的社会条件，而且这时来谈改造技术，明显的是把社会的改造弄到歪曲的道路上去，使大众斗争的意识模糊。这不仅无益于民族解放、社会改造，而且要妨害民族解放、社会改造。

"五四"以来那般狂热的高呼欢迎赛先生，为什么不发生一点反应呢？中国今日又喊出"科工救国"了，为什么完全无一点回声呢？这不是无原故的呀！

赛先生在今日这般可怜的中国社会状况下，是不能发生一般人预期的神通的，因为赛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不是一个上帝，今日中国高唱赛先生名字的人，却把他喊成耶稣基督了。

至于赛先生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就不能尽一点帮助的功用么？

那倒不然！社会科学明显的在今日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它是领导这个运动的理论的向导，是斗争的一种有力的战术，就是自然科学依然在这运动中，在某一些斗争的场合，仍用得着它，它仍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不是有了它，中国就能象受魔术的一样，一夜就变成功了。

正确估计起来，自然科学者在当前救亡工事中，能尽一些什么作用呢？要说得更具体啊！

我觉得《生活教育》第三卷第一期上，那一篇《国难教育方案实施办法草案》，"大学之部"，"关于理工学院"那一部分，颇可供给许多学习自然科学的朋友们去参考。现在我读给大家听罢！

"一、制造毒气，防毒器具，防空器具，救火器，军用品，战时用品。

二、研究变更平时工厂为战时工厂的问题。

三、修理铁路汽车，汽船，军舰，电话电线无线电，飞机及枪械。

四、架设轻便铁道，装置电话电线，装配汽车，飞机。

五、编制防毒常识防空常识等小册子。

六、测量地形及其他有关军事的工作，如战壕地窖的挖掘等。”

自然这里也许还说得不够，不过，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例子看时，自然科学在这些方面都用得着。但这里也同时告诉了我们，自然科学的作用在今日的中国不过在帮助我们和民族敌人抗战中，尽一点技术作用而已，不能比这更大。离开了这一种目的，空喊自然科学救中国那是万分荒谬的。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对于赛恩斯先生，是万分欢迎的。但他什么时候才能被我们邀请到家呢？那就是我们能有了一个能让他展布雄才的社会的时候。中国现在离技术改造的时候，恐怕还远吧！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技术是无法改造的。一切赛先生的忠实门徒们！你们目前的任务是在救亡中负起战斗的工兵的职责呀！我们大家一块去创造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吧！

柳湜论文选

《柳湜论文选》，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收文章三十三篇，本书选印九篇。

《布赖斯特条约》的教训

——丁文江、胡适、邓启、徐公达批判

一

七月二十一日丁文江先生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里发表了一篇《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的文章，接着胡适先生又在"星期论文"里续写了《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响应这一问题的讨论的，有邓启先生的《读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和徐公达先生的《论〈布赖斯特条约〉及其教训》二篇。后二文亦同样见《大公报》。丁、胡二先生的大文并经《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所转载，现在恐更传得很广了。这可说是北方论坛中最近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在全国论坛上，据笔者狭隘的见闻所及，好象还没有听得什么回响；然而，在朋友的谈话中，却屡屡有人提及了。自然，丁、胡二先生的伟论，无疑的对于国人认识当前的实践上是多少有些影响的，恐怕不仅是书生谈史吧！因此，也引起我读历史的兴趣，忍不住的想出来说几句话了。就留作我自己对于这一段史事的另一种看法，质之丁、胡、邓、徐四先生以为何如？

二

首先，对于这一段史事叙说几句。

话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革命取得第一天的胜利，就在那烽烟未熄，巷战还未完全停止中，彼得格勒的无线电台就向协约、同盟诸国及人民广播出无条件的一致休战的和平的呼吁。这和平呼吁中，具体的提出了不占地、不赔款、民族自决诸原则。在当时协约国对俄国这和平的呼声，痛恨入骨，自然没有回电；德国却因为自己已不能支持战争了，却想利用这建议去对付协约各国和瓦解协约国阵线，马上就回了一个赞成的电。于是俄德间的和议就告开始。

从十一月二十七日俄政府单独向德奥土布四国提议休战，经过无数曲折，到明年三月三日才签订了所谓《布赖斯特—立陶乌斯克条约》。

这条约与俄国提出的和平原则相反。赔款至十五万万元美金，割去的土地约占俄国全国的百分之三十，是所谓"绝大的委曲求和"。

这确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外交史的一页，这一段故事，现在写下来，不过费去这几行，在当时的俄国是惹起过严重的斗争的。左翼布哈林派还在那里主张革命战争，社会革命党诅骂签约是卖国，托洛茨基则主张"和而不签约"，但主持签字和议最力的领袖是列宁。列宁用尽了力气去说服他的同党，解释在当时要救得革命的胜利，不论出什么代价都应该，革命比任何其他的都重要。在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签订和约时，那些为一时激于感情的同志责问列宁：

"假如德国人不管我们签字不签字，仍然进攻莫斯科，那又怎样？"

"我们向东走，到乌拉尔山，再向德国表示我们愿意签字。有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超过乌拉尔山，再向东走。只要我们能一致团结，我们不妨去到堪察加。国际形势会有几十个变化，我们可以把乌拉尔—古士奈茨克的国境推广，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

最后他说服了大家，取得中政会多数通过。在那签字的一天，政府是在万分严肃中，向全国人民宣言。“我们为了救得革命的胜利，我们极端需要和平，现在在敌人枪刺上咬着牙齿的签上了这一和约。”这一屈辱的外交，自开始到签约从未秘密过，是公开在民众的眼前，经民众的讨论，获得民众的公意作成的。

三

丁文江先生从这一段故事中，想到自己了。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边境，有些象当时的俄国。他于是认为：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意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们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合作。我愿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胡适先生“因为丁先生叙述的那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的前一半。可惜丁先生不能每个星期为《大公报》作文，所以我今天提议来讲这故事的后半段。”胡先生与丁先生在这一段故事中所得的教训自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他们都主张退到“堪察加”去！不过胡先生说“在退到堪察加之前，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准备做”。同时胡先生还看出：

“苏俄的和平不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割地赔款的和约带

来的，是三年的巷战打出来的。苏俄的统一政权也是那三年巷战打出来的。”这一点是胡先生的补充。

邓启、徐公达两先生对于丁先生的意见都下了批评，在外表上看来好象是站在反丁先生的方面的。

邓先生的文章最精彩的一段是第四段。现在剪贴于后：

“国家对外决定大策，是不容人民轻于置议的。正常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未决定以前，尚得允许人民秘密条陈以备采择；非常时期的对外政策，则连人民秘密条陈的机会也不许有，只有一二个最高首领独裁独断决定一切。更何能允许任何政论家信口开河轻于评议？历史上无论任何国家对外的秘密政策，没有不是几十年后才显示出来的。诚以对外政策本来应该秘密，非常时期的对外政策尤其应该秘密。无论今日欧美各民主国家政党对国家的政纲政策如何公开，如何宣布，然而谈到真正国家对外的根本大策，恐怕也只有内阁总理知道，外交部长知道。此外别人都坐在闷葫芦里。非常时期的对外政策，恐怕外交部长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了。议会虽然能决定对外政策，但却不能知外交进展之‘机’，机的运用仍操在一二人手里。也可见外交需要秘密，需要独断。我不是个迷信独断的人，实在是事实应当如此。

我常对人说，一个政治家为国家决一大计，订一政策，至少须看到十年以后无大损失，才算政治家。列宁和德国签字，从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直到现在，十七年间再无损失，只有苏俄一天天恢复失地，决无德国得寸进尺的可能。这虽是一方面苏俄自身努力的关系，一方面德国遭受了空前打击的缘故，但究不能不归功于列宁有这种先见的眼光。列宁能看到这种国际形势的变

化，所以他可这样做，他是政治家。丁先生能看到在今后这十几年中，我们国家的努力能不能如同苏俄那样突飞猛进？国际形势的变化能不能如同欧战后那样快？从此我们国家的利权也能不能如同苏俄再无损失？丁先生能看清楚这些一切，敢担保，我也赞同丁先生可以这样做。”

至于徐先生呢？他说：“我认为《布赖斯特条约》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应以最大的决心维护我们的政权。”同时，“政权有它的政治经济的社会的之一定的内容和根据，又不是任何地方都具备的。”和“我则主张在维护现政权所在地的必要下，必须尽可能的抗战。”

四位先生也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大家都把这一历史的事件看做是一个英勇的作品，大家都推崇列宁，要我们的头等领袖去学他，学他“屈服”，学他“抗战”（？）。

四

是的，这一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照我个人读史的所得，却与以上四位先生的意见，都有些不同。

在发表我个人的愚见以前，我先要对于所谓历史的教训解说几句。

我不承认历史的教训是在模拟。历史的演进并不是循环的在那里转圈子。每一历史事件，都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产物，过程中的一环。它要严格的受时间、空间的规定，它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不是要我们去抄写，亦不可能由我们去抄写。因为历史是不断的在演变，我们珍贵历史的教训，是因为我们在事后考察过去比认识现在较为静态，容易明白。我们在一件史事中，可以看

出它的发生、发展，可以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启示我们如何去打开认识现实之门，去把握现实的一环，在这里，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白费时间，多兜圈子，却不是完全被动的叫你去做历史职，一句话说完，历史的教训是可贵的，但它有一定的限度，它只有历史的意义，它不能成为一切后人刻板的行为规律。

你如果非历史的去了解历史的教训，你会要闹出天大的笑话，铸成不可医治的大错。同时你会受奸人的欺骗，因为历史上就有不少的奸雄，自己以历史上的圣贤自居，夸大妄为。还有不少的奸雄，藉历史的事件去掩饰自己的丑态，掩护自己的所短。这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单就孔门的学生说，一直到现在，真的有些不敢恭维，夫子说的“王道”，不知事候过多少主子，现在不是还在做“事夷”的幌子么？

其次，在历史教训中，我们虽然不能忽视个人的作用，却不能把一历史事件看做是某某英雄个人的作品，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这是一种无理的夸大。我们应该把握历史的演变的动力，人的作用只能给予相对的注意。

五

如果依据以上的看法，再来读《布赖斯特条约》，估计它对于我们的历史的教训，那就自然与丁、胡诸先生的意见不能苟同了。

《布赖斯特条约》时代的俄国形势，与目前中国所处的环境，我们看不见共同的地方。这不独在原则上说，历史是演变的，我们再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国际环境，同时俄国社会政治当时的情势与政治上人的装置也与我们是完全两样的。丁先生所看到

的共同点，不过是“屈辱”“妥协”这表层上。这只能说是附会，不能说是真的读懂了历史者。何以故？因为丁先生只能看见德国侵俄那一表面的事实，看不见当时国际关系的激变，社会阶级的激变，全世界大众的厌战的心理，尤其是俄国农民的心理。总括一句，丁先生不看环境，只孤立的看见德国的大兵，逼得俄国不能不退让。这是“星期论文”诸公所共同的逻辑。因此，他只会见了大兵就屈服，随便的喊出“我们到堪察加去”，忘了还有一句“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

《布赖斯特条约》其所以不就是一般的卖国条约，不是机会主义的冒险政策，就是因为“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这不独是看清了客观形势，尤其透视过主观力量。因为认识了“国际形势会有几十个变化”，把握住了当前的一环，所以看见“已取得的革命胜利”在那时是高过一切。对德国的枪刺不会作悲观的判断，或狂妄的轻视。对革命的势力的能动的作用，看得百分重视。救了它，可以改变世界，失了它，一切就会完事。

我们的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配合是相同的吗？（关于当前中国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因限于篇幅，暂从略。）此其一。

其次，与第一有关联的，就是胡先生把“苦战”看得比“屈辱条约”高，似乎比丁先生高一筹。但是，这仍是书生读史，带上了一副形式理论的眼镜的结果。“苏俄的和平是三年苦战打出来的”，这是不错，但仍只有一部分是真理，因为如果不签《布赖斯特条约》，把那一点革命的嫩芽保护，增长，依照布哈林那样去作革命战争，那末，即令将来有同样的客观形势，缺少着主观能动的力量，苏俄统一的政权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恐怕只有绝对客观主义者才会作这样的希望吧！胡先生忽视这一前提，虽

就是较丁先生现出左的言论，那是完全无用的。胡先生把战斗只看做是开枪打仗，把外交看做另一个非战斗的东西。其实这样分开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布赖斯特条约》能与以后三年不屈不挠的战火相结合，所以它才取得历史上的意义。丁先生看不见战斗，所以只学会了叫屈，胡先生好象看不起“叫屈”，只向别人的决斗喝空彩，实则都没有读懂这一段历史。

但是，丁胡二先生（不，连邓徐先生也在内），最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布赖斯特条约》看成是列宁一个人的作品，是代表列宁一个人的意志的。他们那“英雄造时势”的伟见，在这里充分的表露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我们并不否认历史中人的作用，但不能过为夸大。列宁值得推尊，是一件事，这条约是否代表他一人的意志，又是一回事。

明白得很，这和约不能是代表一个人的意志的，不能是一个英雄头脑里空想出的东西。它是代表全俄人民的公意，即大家要求和平。我们不要以为当时苏俄政党中的意见分歧，开始时反对和约的人多过支持列宁意见的人，就认为列宁是少数，是由他一人的意志决定的。恰恰相反，多数少数，不能决于政党内一时讨论中议席的多少，而是决于谁是真正看出人民全体的要求、共同的意志，而确代表了人民公意的。列宁能深刻的观察人民的心，勇敢的代表千万人的公意，所以他的意见就变为绝对多数人的意见。列宁个人的伟大，值得推崇的就在此，不是他个人的独断，这里千万值得注意。

因为他能代表公意，代表真理，所以他能说服他的同志，在中政会决议和约时，足能取得多数通过。所以要学他，不是一件

易事，不是学他的皮毛，因为他那铁一般的坚定，在外表上看来似乎有些象独断，其实那完全是浅薄之见。

丁胡邓徐四先生都把列宁看成了一个英雄，一个神秘的人，是很不恰当的，《布赖斯特条约》虽然在他政治上和认识上都不愧为一件杰作，但这杰作作成的条件不是他个人的才力，他的善于空想的头脑，而是人民的公意。

总之，《布赖斯特和约》不论在签字时是通过一个人的手，但它是全俄人民的作品，因为如此，所以它的撕毁也是全俄人民之力才达到的。

如果也把列宁当作一个英雄看，那末，这一个英雄确实推动时世不小，但时势不是由他一个人造成的。此其三。

其四，是邓先生的妙论了。

第三节剪贴的那一段邓先生的文章，就完全是犯了以上的错误。邓先生不独把列宁看做一个目前德意式的"老头子"，而且曲解布赖斯特的条约是秘密在进行的。这完全颠倒着事实。"国家对外决定大策是不容人民轻于置议的"，这是完全反《布赖斯特条约》的话。他那样盲从一二个最高首领，把他们看得那样重要，神秘，说什么"订一政策，至少须看到十年以后无大损失"那样的拥护秘密外交，要几十年后才能公布，不独不许人民开口，连政论家也不能"轻于评议"，"人民秘密条陈的机会都不许有"。这一切都与这一段史事无关，与列宁更无干系。《布赖斯特条约》的史实，我在第一节中已略为提示过了。它不独一向未秘密过，并且是任人"评议"，一面签字，一面向人民宣言，邓先生那种言论，我想如果在读旧俄外交史，彼得大帝的雄图那一页时而发出，那是更适合的。可惜，他翻错了页子，用在这里是牛头

不对马嘴的。

邓先生说“列宁和德国签字,从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直到现在,十七年间再无损失,只看苏俄一天天恢复失地,决无德国得寸进尺的可能”,而“不能不归功他有这种先见之明”。这几句话,乍看起来,好象是对的,其实也不然。和约的伟大、远见,不过是奠定下以后十年建设的基础。这十年的成功,是全苏联人民的努力及全世界大众同情支持的结果,不是有了一个“老头子”,什么社会自然而至。这种夸张的神秘之衣我们不能不揭破,邓先生这样的读史,我认为非常危险,因为这不独犯着曲解史实,而所得的教训反成了强悍者压迫人民的藉口,于我们民族的前途,一点好处都没有。此其四。

最后,就要说到徐先生了。徐先生对于《布赖斯特条约》的认识,比较以上三位先生都高明一些,只是,除了上面已经指出徐先生也犯着的错误,及许多不重要的枝节特为从略外,徐先生所获的教训是所谓“维护我们的政权”,“在维护现政权所在地的必要下,必须尽可能的抗战”,这也不能说是读史有得。政权的内容,照徐先生的解释,已经离题很远了,这且不谈它。如照徐先生主张做去,虽然也主张抗战或者不即刻到堪察加去,也有误解徐先生主张放弃“我们的乌克兰”和已失去的东北,偏安一隅的意思。何况徐先生所得的教训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人民的公意,没有与整个中国民族的解放发生联系呢!

六

总括以上拉杂的话,我认为丁、胡等先生这次读史所得的成绩是非常可惜的。他们间虽有小异,实在在大体上是同一的。他

们的意见不独没有在布赖斯特的条约中，获得武装我们自己解放的教训，反而在有意无意中不是解除了我们自己一切反抗的武器，就是把问题拉到别一方面去；不独好象处处在替"屈辱"辩护，甚至同时惟恐屈辱不够，竟有些无耻的喊出"我们准备到堪察加（我们的云贵）去！"与汉奸同一口调，在替民族敌人作清道的服务。

《布赖斯特和约》对于我们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我希望读史的人自己再去下一番研究工夫，这里没有篇幅容我再继续写下去。现在简要指出数点，作为我个人的读史所得，以结束此篇。

一，《布赖斯特条约》的教训是它辉煌的运用辩证法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关系，社会阶级的分化及革命发展，正确的把握了当前的一个环子。

二，《布赖斯特条约》的教训是它充分的坚决实行对过右过左的意见，加以清算，而真诚的、教育的作出了可惊的天才的说服大众。

三，《布赖斯特条约》的教训是它前进的退让，是为了扩大主力加强主力，准备日后作更广大的殊死战的一时的休息，不是卑怯的屈辱在枪刺上。

四，《布赖斯特条约》的教训是它的进行采取公开的方式，更团结了全国民众拥护革命胜利，扩大革命的战争。

我们的《布赖斯特条约》作成的是什么呢？

《土地公有案大纲》探讨

甲　最近在报纸上看见山西阎锡山先生为了"消弭共祸"提出了一个《土地公有案大纲》，很惹起了我研究的兴趣，现在想完全站在理论探讨的立场上，来同你讨论讨论，不知你的兴趣怎样？

乙　自然很好。我近来对于阎先生的言论正在尽力搜集，想作一个系统的研究和批评，因为我觉得阎先生这个人，不仅是说说就算了的，他有权力，有实验的机会，如果他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不仅给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同时山西民众的生活马上就会受到坏影响，因此觉得虽然是作理论的批评，却也未必与实际无关。最近发表的《土地公有案大纲》，当然更为重要，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甲　是的。这个《土地公有案大纲》听说还要"呈请中央核准施行"呢！我想一定会惹起舆论界一番热闹了。这且不管它。不过就一般看，你以为这个《大纲》怎样？

乙　这说来话长。如果不管它的实现性，专就主张来说，无疑的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纲领。

甲　我看它确实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乙　不！"土地公有"的主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在理论上说，还是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在资本主义少年期中，资

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中，就有不少人主张土地公有，因为资本家要扩张国内市场，增加农民购买力，使农村资本主义化，和取得城市工业劳动力以反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主张解放农民的封建束缚。这一点也不足怪。不过，在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倒没有真的实现了"土地公有"政策的。这是因为有一个天大的矛盾，"土地公有"一旦实现，同时是对于私有财产一大威胁，会影响到工业老板的工厂里去的。所以在理论上尽管说"公有"，在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土地政策都不过是巴拿马特政策的模拟和抄写。譬如，旧俄一九〇五年以后的斯托黎宾政策，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之"计口授田"，现在阎先生之"公有案"，其实都不过大同小异罢了。

甲 照你说来，土地公有的主张，难道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吗？

乙 真正要使土地公有，那自然要要求改变整个的私有生产关系，真正土地公有的目的达到，也非得在另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下不可，但解决土地问题在性质上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

甲 啊啊！我懂得了。至于阎先生的主张，你说与巴拿马特政策是大同小异的，那是怎样说的呢？

乙 所谓大同，就是它所采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是和平的，收买的，不是没收的。所谓小异是因为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所以阎先生今日的主张，在外表上比起巴拿马特政策、斯托黎宾政策和"计口授田"等，都来得漂亮、进步。

甲 我是不懂理论的。你说的，我自然心服，因为你有了一套土地问题的理论。不过，我就事论事，阎先生对于中国经济的

改造，能注意到土地问题是它的焦点，却不能不说他有眼力，不能不折服他。

乙　这话我也同意。但他注意到什么是“焦点”是一个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一“焦点”又是一个问题啊！

甲　照你说，这《土地公有案大纲》就没有实现性么？

乙　我看没有。我对阎先生这种主张，也与对他的“物产证券”的主张一样，只认为是一种朴素而不能实现的理想，却不是有实现性的国策。阎先生整个的言行，在外表无疑的是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可惜离开实践很远。

甲　他这《大纲》最大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乙　据我看，他的最大的缺点是在把这一“社会的改革”，看做是在玩把戏。我们要了解，土地从私有到公有这一改变，是要经过一番死活的抗争的。保有土地的主人，他哪里肯将自己的摇钱树（土地）轻轻换一束无利公债票呢。阎先生那套“成己成物”的哲学，把个人的力量夸大得过大，以为有了他老阎，这一变革就变为一反掌的事。天下事哪里会有这般容易？难道阎先生竟忘记了他的“绥靖”主任是在替一些什么样人“绥靖”？“绥靖”的经费又是出自谁手呢？是的，这是说山西统治的性质似乎与阎先生的言论太相左了。所以现在好多人读了阎先生言论，不免惊惧起来。我以为目前其所以没有人急起来反对者，大概是目前还不过是言论，又加以阎先生拿“防共”为名，所以得着地主暂时的谅解吧！这谅解是有限度的，一旦这《公有案》见诸实行，真的侵犯了地主“神圣的权利”时，我想阎先生恐怕不免会被山西地主们目为“×匪”吧！这是就地主方面说。

甲　你的话虽对，如果阎先生能得到农民的拥护，我想，那

时虽然地主要出来反对，恐怕也没有办法了。

乙　哈哈，事情并不如想象的简单。你真的以为农民方面就会一致的起来拥护这种政策么？我告诉你，连这点也会是幻想。这一个土地公有案的结果之所以会悲观，就在它将来会变为大家埋怨的东西。这是怎样讲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代表农民所要求的，我们很明白的看到，在阎先生的眼内，"村籍农民"就是"村籍农民"，他没有看见这里面还有分化，这土地政策到底是以哪一农民层为基础的呢？看不明白。我相信真正的雇农贫农，即令在此新政策下，获得一片土地，但他们穷得没有耕田工具，没有肥料，他们负担不起照旧要付的田赋，他们仍旧是穷困，这一来，真正多数农民的生活并不能改善，生产状况向上更不要说了。因此，即令阎先生有一种神术对付地主，但在农民这一方面，我相信，阎先生的"公有案"只能在这运动开始时始有作用，一俟这运动展开后，这种带着菩萨心肠高高在上的"替万民谋福利"的土地案，必被农民敬而逃避。阎先生的主张，既然缺乏了这一社会基础，这一运动的主力，所以它不过是一套空洞的辞句了。

甲　经你这样一说，使我也想到要实行这样一个"土地案"，实在不是有了一个阎先生的山西政府就能办到，同时所谓村民大会也不能想象出是一种什么东西。据我所知道，今日乡村土劣的势力还是很大的，这种村民大会是否会被这些分子所利用？不然就恐怕非演成流血不可。总括一句，我觉得不独旧的政治机构不足以执行这样一个新土地案，即阎先生新创造的什么村民大会也不见得能尽它的职责。你看对不对？

乙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空想改革者的致命处。这是这公

有案最基本的漏洞。

甲　其次，我们来谈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土地这一个理想吧！这种无利公债是否被地主所接收是另一个问题，但不知所谓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劳动所得税等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如果没有实现的可能，作为这种公债的担保不是落了空么？那就是说这种公债不仅是无利，并且是一张废纸了。

乙　我却说这一切都是阎先生的幻想。这些繁重的税如果在一个产业发达的国家，也不能说完全办不到；但全部办到也就很难，或者说也远不可能。在中国今日的状况，或者说在山西经济状况下，那倒确实是办不到的。产业保护税包括"动产""不动产"。现在土地变为公有了，不动产不过剩了房屋之类的一部分。动产想来是包括工业的，今日中国幼稚，残败不堪的工业和企业者，怎经得起什么保护税？明显的这种保护税不过是封建性的东西，在名义上是保护产业，事实上是束缚和戕贼产业。并且今日整个经济破产，残余的产业税收入能得几何呢？其次，是"不劳动税"即令真的实行，请问今日全国几乎有一半人口要劳动而不可得，他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你真能向他们徵得"照耕农一份地平均所交之劳动所得税"吗？那太乐观了吧！其他如劳动所得、利息所得税，也都不容易实行。这一切我们还是就全国规模说的，至于就一乡村说，那我不知道这些税收，即令全部徵收在每一乡村能得几何，能抵土地价值万分之几呢？所以，这种无利公债完全可说是没有担保的，是一种空头期票。阎先生是一个事业家，他知道在现社会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大洋"，他没有的正是"大洋"，所以他非常憎恨"大洋"，于是他脑中就想出了许多空头支票来了。

甲　这样说来，阎先生的"土地案"在外表上看来好象带有很进步的色彩，骨子内还不及斯托黎宾政策甚远了。在一九〇五年以后，斯氏当政时，斯氏的土地政策虽是资本主义的，它的经济基础倒比阎氏的健全多了。

乙　那自然。以斯氏的政策结果都不过使俄国农民更贫困，那么，今日阎先生虽说了许多较进步的话，那有什么用呢？

甲　你对于以村为单位在分配，以前不事土地调查与清丈，有什么意见？

乙　不先从事什么调查与清丈，让农民去分配自己所熟识的土地，我倒很赞成。"一村的土地情形，村中人原即明白，不要调查，不要清丈，亦比政府派陌生人调查清丈几次为清楚"这倒确实是事实。不过，我不主张土地村有。更反对一村一村各自为政，村以上没有一种有机的组织，这不独在事实上行不通，即在理论上，也说不过去；我们只能说土地分配从村开始，不能说就归村有。阎先生说的什么"村近而国远，言村有，村人易知而易从，言国有，村人难谅而难从"，这话有点诡辩，同时有引入封建性分割方面去。我以为"言村有"村人未必"易知而易从"，我想真的"易知"而"易从"的恐怕倒是"农有"吧！

甲　这到是实在。还有，你对于"村中田地为合伙耕作者，即定为合伙农场"有什么意见？

乙　合伙农场大致是抄袭苏联的集体农场的意思吧！自然，这名词，在外表看来也是进步的。但合伙农场的内容要是改变生产方法方有意义。不然，仍用旧的生产方法，虽然集合许多人搭伙在一起，那有什么意义呢？若是也一样采用电犁机、化学肥料，这要有国内工业的先决条件才可，不然也就是过早的辞句

了。

甲　然这样看来，真的是阎先生一个人在那里做梦，他这《大纲》其他细目，那也就无容再细说了。

乙　主要的几点，以上确也够批评他老先生了。不过，我们也不要忽视他提出这一朴素的意见的社会条件与意义。虽然，这“公有案”在现实性上它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仍不是完全无意义；至少在引起国人注意到土地这方面来是不可忽略的。何况他这不全不备的《大纲》中，还包有一些进步的要素，和反映不少真正大众的意见呢？

甲　最后，我还另有一种意见，虽然这《大纲》如果见诸实行不免还要大大修改，但同时觉得这《大纲》也不妨让阎先生在山西试验试验看。我不是实用主义者，也赞成刚才我们的结论，但同时也觉得让他试验一次也无妨，这对于真正的贫苦农民大众总是害少而益多的。这不象“物产证券”。阎先生不是说过“在适当的期间将分地重行划分”的话么？土地分配既然恐怕非一次可了，那又何不让阎先生的提案作为一个过渡呢？

乙　你这意见我也不反对，不过这是批评这一《大纲》以外的话。我们的话是否就对也还是问题，不过，在理论的探讨上我们觉得如此罢了。我们再继续研究吧！

胡适的话不能代表中国大众的公意

——告日本劳苦大众

自从胡适博士在东京《日本评论》上发表了那篇《敬告日本国民》的文章后，接着又发表了《答室伏高信先生》的信，在四月十二日，胡适博士再在上海《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了《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副题是"告日本国民"。这些文章无疑的是已经或马上就会翻成日文，在日本报纸或期刊上登出的。日本的劳苦大众，在看到"告日本国民"这类触眼的标题后，总不免要生出一种紧张的情绪来细读这些文章吧！

我不知道，日本劳苦大众读了胡博士过去那几篇文章作何感想，但中国大众对那些言论是非常痛恨的，中国所有站在民族立场的期刊，都曾经对胡博士作过严重的批评，不承认博士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国民多数的意见"。最近中日的关系弄得更险恶，博士又以个人冒充代表"中国国民"的公意来"告日本国民"了。中国大众看了这篇文章，自然更加激愤，但我在激愤之外，却还加上一层担心，觉得这种言论对于日本劳苦大众了解中日关系的真相上，是一种妨害。因为这话是从中国人口里说出，而说这话的人又偏偏是在国际上一向有些声名的胡博士，如果日本大众真的相信博士的话，以为中国大众的公意真的荒谬至此，那不是对于我们两国大众相互的认识与了解上加上一层朦障么？

中国大众实在应该早就出来辨正。

可惜的很，中日两国大众，在帝国主义新闻统制下，在各种武断的宣传、无耻的歪曲与蒙蔽下，不独彼此很少发表各各自己真实意见的机会，即对于一项谣言，一种谬说，要出来辨正的机会也很少。

我敢于向日本大众说一句，无论中日的关系坏到如何的程度，中国大众决不会怪日本的劳苦的兄弟们，中国今日受日本的侵略，完全与日本劳苦大众无关，“冤有头，债有主”，中国大众对于友敌早已认得明白，不会幼稚得象胡博士一样，向你们诉怨把你们作为侵略我们的对象。同时，我们也能想象到日本的劳苦大众，对于我们，除兄弟的友爱外，不会有什么过不去。这在“一二八”时你们反对侵略的言论和行动，完全给我们以证明。在东北义勇军抗战中，你们士兵曾自动的供给义军以消息、枪械、子弹，也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难道我们还会有什么要仇恨么？是的，我们是没有仇恨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彼此间却不能说每个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一些误解，各种武断的宣传与歪曲的谬论，就一点对我们不起作用。不的，它们都尽了侵略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涂上了最污秽的颜色，损毁了我们兄弟情睦不小。我们为了人类的正义，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我们在今日的东亚所负的使命，我们是不应不想尽法子来突破这种阴险、毒恶的氛围的。

现在我首先要告诉日本的劳苦的兄弟们，中国今日的真相，并不如你们的政府所宣传的那般绝望，也不象胡博士说的那样不争气，那样感到无办法，那样翘首望着你们的政府来可怜我们。中国劳苦大众的意见与意志，完全与胡博士所说的相反，胡

博士的话，不独不能代表“中国国民的多数”，也不能代表中国的知识者。胡适的时代，在中国早已完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早超过“五四”的阶段了。他虽然厚颜的以“中国国民”代表人的资格，在国际论坛上发言，可是从他那喉头发出的可不是“中国国民”的声音呀！中国大众现在是以切齿的痛恨，对待一切的谰言的。

中国大众对自己民族的命运看得很明白，对当前国难的性质有深刻认识，对侵略者及国内汉奸已具有钢铁的决心，准备作民族解放的殊死战。总括一句，中国大众对自己的生死存亡，已有全盘打算，并自信有解决自己命运的力量。一切虚伪的“亲善”、“和平”、“合作”、“共存”、“共荣”等谰言与幻想，在中国大众的脑子内是找不到的。中国大众在今日决不希望或幻想和敌人谈什么“调整”，决不空想侵略者发什么大慈大悲的心肠，自动的停止侵略，虽然对于由暴力所造成的一切的“既成事实”，或屈辱的卖身契，决不承认，但也不希望有一种什么奇迹，使这一切民族的耻辱一昼夜就变得不存在了。我们相信的只是自己的力量，由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一切耻辱，收复一切的失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民族得着最后的解放。

在当前，中国大众对侵略者是谢绝一切“和平”的“诱惑”的，我们并不畏惧“带甲的拳头”，怀着“和平”的幻想。上那“貌美的、狡猾的诱惑”的大当的，那仅仅是中国民族内部极少数的“娼妇”，不是大多数的中国大众。中国大众决不象胡博士一样，不敢再谈东北四省，甘愿把东北四省作为礼物，来换取他那幻想中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缓和敌人更进一步的进攻。可是中国大众没有这幻想，决不能永远让敌人占住东北，决不想在这样耻辱的基础上，“树立”什么“崭新的关系”。

摆在我们当前的东亚局势，真是空前的严重啊！四年来，你们国家内的侵略者阶层在中国的劫掠，单就土地说是八百余万方里，比起近百年来清政府一个朝代总共丧失的国土，还要超过一百五十多万方里。这块新的劫夺地的面积，等于六个日本的疆土，这真是历史上空前的劫夺啊！至于中国大众的被屠杀，财产的被毁灭，生机的被断绝，那更不是用文字、言语可以形容其万一的，并且事实上比以上的统计还要严重千万倍，因为这种劫夺屠杀尚在发展啊！鲸吞整个中国的形势，一天天表面化了。所谓广田的三原则，事实上已在实现了。由这三原则展开的，不仅是中国的沦亡，同时是进而侵略与人无争的苏联，和燃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焰。人类最大的恐怖与屠杀，在今日的东亚，我们生存的国土内，无论哪一天都可以爆发的。

在这种局势下，在这些魔鬼杀神的魔杖下，"和平"还有希望吗？那只有不敢面见现实的人，才会发出胡博士的那种梦呓。我要告诉日本的劳苦的大众，中国大众经过这四年血的教训，已认清了自己的出路，现在正在努力准备的是汇合全民族的大众力量，发动一个伟大的民族武装自卫的战争，去粉碎一切侵略者，改造远东的历史。

这一点也不是我们的夸大。这种民族战争，事实上已经和侵略战争肩并肩的发生，并扩大了。这就是中国东北的义勇军及中国内部广大的大众各种形式的救亡运动。这些武装的、非武装的运动，无论遭受客观上如何的压迫、打击，事实上是一天天扩大了。中国今日的社会意识，已经达到了凝结成一个民族自卫的共心的火候，现实的残酷，已经打碎了许多人们的成见，除开少数"高等华人"和无耻的汉奸外，都走到一条战线上来，准

备流他自己最后一滴血的。全民族的神圣战争的爆发，也是迟早就要实现的事。我们都自信着。

至于我们的前途呢？我们一点不夸大的告诉日本的劳苦大众，我们一丝不怀疑、悲观，我们看出我们胜利的前途。

我们的这种自信，最先是在历史上的教训及在"一二八"战役中取得，现在在东北义勇军的壮大中，更增强了。那就是侵略战争终不能敌得过神圣的自卫战争。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决定战争前后胜败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问题。历史上革命与反革命战争，胜利的都是手拿着劣质的武器的人，而不是握有好武器的反动者。中国义勇军今日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为敌人优良的武器所压倒，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那样天才的运用"运动战"，使得敌人完全没有办法，那是由于战争的性质及人的归向而决定的。可惜，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说它。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今日中国大众部分的进行民族战争，就使得侵略者"疲于奔命"，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我们进行举国之战，哪里是日本的军力、财力办得到的事情呢？然而，这种战争就要到来了。

自然，我们不能讳言我们目前的艰困，不能把侵略者的力量估计得太小。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力量过为夸大，拒绝国际间的援助，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小圈子内。是的，我们尤其不能不对日本的劳苦大众，陈诉我们所受到的侵略与惨无人道的屠杀，并且要打通我们的障碍，实行切实的携手。我们首先就愿意并盼望我们两国的大众在当前东亚的一切事变前，认清现实，共同来谋取我们大家的解放。东亚的真正和平，东亚的一切纷争，只有我们两国的人民出来说话，才有解决的可能。调整中日的关系，

树立友好的基础，不能完成于侵略者与奴才之手，而是完成于我们两国大众诚意合作之手。

我们的陈诉却与胡适博士的"告日本国民"完全是两样的。他的胡言，是因为他在国内是看不见"人民"，在日本也看不见你们。他那受过实用主义训练过的眼睛，能看见的是你们国内侵略阶层的屠刀，和中国那一群无耻的绵羊，如此近视而已。事实完全与他说的两样，可惜的是中国民族斗争的消息，都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统制隔断了，而象胡适这类谰言，却能一字不改的送到你们的眼内。这是非常可痛可惧的事。这不独使得你们对我们生出悲观的情绪来，同时也隔断了全世界大众对我们的同情与援助呀！

可尊敬的日本劳苦的兄弟们！我写到这里，我心中生出无限的欣慰，我好象看见你们在明瞭中国今日的真相后，你们是如何的兴奋激越啊！是的，这不是幻想，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希望如果你们有机会读到这篇简短的辨正时，我要求你们广为告诉你的自己的兄弟姊妹们，中国今日的屈辱，绝不是劳苦大众所能容忍的，中国大众不会承认广田的三原则，不会忘记东北四省，中国大众当前正在准备伟大的全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国目前已有数十万为民族而战的武力，并且在东北已节节取得胜利了。你们不要轻信一切武断的宣传、无耻的嚼舌，在中国民族没有获得真的独立解放之前，中国大众不会幻想"调整"什么关系。象胡适这类的招摇，我敢向日本大众道：那完全与中国大众无关，他的时代早过去了。

如何通俗化

——编者作者读者合作

一

我们常常接到读者的来信，或朋友们的批评；说《读书生活》里的文章，还写得不好懂，不够通俗。他们说：

"没有进过学校的人，虽然认识几个字，还不能读。"

"刚读完千字课，或读完小学的人还不能读。"

"甚至进过中学，象我的太太那样的人，也还不能读。"

完了，有这样多个"不能读"，"不能读"，那能读的人自然还是几个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了。不用说，这与我们原来打算要做到的还差得太远！

二

"不要怕！我们更要努力做得通俗。"我们编辑部同人互相鼓励说。

我们向作家要求说：

"请你们要再写得好懂些。你们什么地方还写得太欧化，不好懂；请你们再改改。"

他们也着实出卖气力在求"通俗"，他们说，"我写这篇文章比替别的杂志写稿子多花费一倍功夫，可是通俗仍通俗不来，通

俗到底有什么标准呢？”

我们没有将标准给他们，更不能逼迫他们，不然有几栏就会没有法子印出东西来。

我们只有在自己担任的稿子上下工夫，结果仍然是听得到处“不能读”的声音。

三

这并不使我们灰心。我们预先就想得到的。这更不是通俗化碰了壁，这不过是做得不够。

我们平下心来，研究怎样可以减少一些“不能读”的声音，在暂时并不妄想这种声音完全消灭。

我们发觉，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所收的效果很小，是因为我们太孤独了，从事通俗写作的人还不多，社会对于它还冷视，对于我们的习作没有批评，我们自己方面也太散漫，各人弄各人的，没有聚在一起讨论过，批评过，这种个人主义的干法，哪里会有成功！我们看出今后补救的方法，首先要赶快把同意通俗化的作家找在一起来，认真的作有计划的讨论，不客气的批评，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发觉写东西的人，还需要与读东西的人合作。我们要不使人读不懂，先要明白他们读不懂的根源在哪里，不懂的是一些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来怎样磨炼自己手里这枝笔，用它去说服他们。

编者、作者、读者要实行合作。

四

本刊就预备照这样干起来。一方面尽量接受许多读者来信的意见，一方面破题儿第一次请了替本刊写文章的九位朋友，聚会过一次，这是说我们有困难大家来担，我们再不唱独脚戏儿。在这聚会中，我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说明了以上的意见。谁知不谈，大家没有话说；一谈，各人肚子里藏着的意见，都拿出来了。真正是个个谈风皆健，说我们为什么不早点聚拢来，讨论它一个三清四白呢！谁不想写得通俗一点呀！正是"英雄所见相同，"第一次一谈就谈出许多大道理来。

五

通俗化应不应该来做，已经共认不成问题了。生活逼起大家要求生活的知识，知识来源之一是读物。现在凡在生活中挣扎的到处都发现要求知识，要求自己起来说话。现在印出的书、刊物，却不能满足人望，而中国四方块字这种语言工具又不能适合大众自己发表意见。这种社会要求，就变为语言改革运动（拉丁化运动），现在再来一个通俗化运动，是适合客观的需要，有何足怪呢！

大家称善。

大家又指出：通俗化不是离开语言文字的改革运动（如拉丁化运动）而孤立的行动，它与整个语 言文字总 的运动是联系的，并且是这运动的一部分，通俗化不仅不反对文字的变革，它反是造成这改革更顺利的条件。

六

要讨论的中心是这“化”的问题，如何通俗化呢？

先问能不能通俗？

自然，这答复是肯定的。但同时也承认通俗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是在这限度内尽可能的做。这限度是什么呢？一是这四方块字写成的东西的普遍性有限，二是用口头语讲解高深和抽象的理论的通俗性也有限。

在前者我们的目标，似乎只能做到使写的东西，尽可能的合于口头语。

在后者我们的目标似乎只能做到简明化、具象化、趣味化这几方面。

通俗化决不是不可能。

根据以上的目标，我们认为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它决不反对高深学理的研究，决不把高深的理论化为庸俗，迁就低级；恰恰相反，它是在一面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一面代表着正确立场，使高深学理普遍化。在形式方面尽可能的去掉经院气，做到使大众易于接近。

简明化不是公式化，定义化。

具象化不能妨害科学的抽象的法则的理解，而且是文学与科学的结合，在说明抽象法则时，用具象的方式去表达。

趣味化，不是迎合低级趣味，而是注意用艺术的手腕，生活的情调去调和枯燥艰涩的知识。

七

通俗化的道理，说到这里，就暂且带住吧！

大家都承认，道理的懂得倒不是一件难事，怎样把这些原理原则变成事实，却不很容易。路标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到底还是在走路啊。

所以写作技术倒成了通俗化最主要的内容了。

现在且将已经有了的经验，略为谈谈吧！

八

一篇所谓通俗文字，虽然在文字形式上，篇幅短小，节段明白简短，造句短而合口头语，这一切固然都是重要的条件，但有了这些条件也不见得即是通俗易解。

这里自然主要的是内容，内容方面的接受性和题材的处理，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成人补习教育比儿童易于施教，就是成年人生活经验高过儿童，理解力甚过儿童。同一内容在成年人间也因生活不同生出理解力的差异。工人不关心土地问题，农民不关心罢工、怠工、工会组织等事。所以在这里就生出同一问题对于某些人是易于了解，某些人变为漠不相关了。上面说的我们那位朋友的夫人，是中学生，读不懂《读书生活》大概是因为她的生活环境不同，它对她失掉吸引力。这一点也自然成为普遍性的一种限制。

不过，遇了这种情形，我们先要明瞭接受性的矛盾的性质是怎样的，这种矛盾是上面指出的工农间的，那大概是相对的，可以从中国当前工农生活抗争的一致性去联系起来，消灭各自生

活圈内的偏见，是可能的。如果这矛盾发生于高贵的人们与低贱的人们间，那是绝对性的矛盾，那种偏见不能克服，我们不必去白费气力。

消灭这种相对性矛盾，就是扩大读者的普遍性，是构成通俗化内容的一要素。

九

处理一件题材，几乎与文艺创作相似，是一篇通俗文成功失败的关键。

要打破经院气、学术的摆场、课本讲义式的编排，这里要完全把理论融化过，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创作过程。虽然，在目前只有少数人在习作，没有很好的成绩可观，但也约可指出数点。

譬如，用文学的具象表现法，代替科学的叙述法。抽象理论与生活实践融合，作统一的对照前，可能放弃学术专门用语，注意生活上健康的幽默，已在一些习作中，博得读者欣然接受，现出一些创作方法上新的气象来了。

十

同时，在今日的习作中，也发现文学的表现法，有时容易紊乱主题，使读者不明一篇文章的主体何在，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这并不是说具象表现法不能说明抽象，而是过于偏重表现，而忘了科学的职责。有人对于今日科学理论用文学的手段来解说，认为既不是文学，也不是科学，骂为两不象，因此引起习作的人发生怀疑，这是应该首先克服的。

是的，这种新作风，也许真要被人看作两不象吧！其实说这话的人不是对于文学存着所谓纯文学的观点，就是对于科学板起庄严的脸孔，以为不是专家就不要出来献丑，因此，恐怕别人侵犯他们神圣的领域。通俗科学文体既是主张理论与文艺融合，自然老实可以承认，我们反对“闲人到此止步”的纯文学和纯粹科学的招牌，我们并不认为文学高过科学或科学高过文学，在这里我们不过不要忘了谈科学是自己主要任务，不要因为表现的方法紊乱了主旨，使抽象法则的了解反不明白。

同时对于趣味与所谓健康的幽默，在今日的习作中已收有相当的成功。因着明快，每每使读者忘记自己在读艰深的理论，这确是新作风的一个要素，但要谨防的是内容空虚，专求语句轻松，走入低级趣味的泥坑中去。

十一

至于用语方面呢？现在在习作中并无对内容方面同样的成绩。就今日新的习作说，都还没有做到口头语。不过，已感觉用方言写，就某一当地人说，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方言对于当地人的亲切性，好象在异乡听了乡音一样，分外动听。不过我们觉得在某一地方人这样去做当然可以，就一般说，我们主张还是应该以普通口头语为标准，“写”尽可能做到和“说”相近，不要十分谨严的顾到文章的格调，使“说”变成为不容易了解的“文”了。

在文字改革未实现前，要做到说话一样的写，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以为我们暂时不妨大家相约：

一，话的构造，力避外国语文法死的应用，没有变成中国人口头上应用的外来语汇，不得入文。（这里，我们得声

明，翻译世界名著和写高深学术文，我们并不反对外国语文法精密的运用。）

二，不用文言，古典，洋典，甚至今典。

三，少用新术语（已在口头上流传的不在内）。

四，用在口头上流传而尚未应用在文章中的一切活语。

五，不拘于文章的作法，创造大众语文体。

十二

已有的经验还是浅薄的，但浅薄是高深的阶梯，我们并不希望停止在以上的认识及技术的限度。

如何充实与展开呢？

这是大家的事，编者，作者，读者要大家合作。

好在现在已有更实践的人，在那里分解，审阅今日已有的习作了。我们盼望他们赶快有一个报告出来，提出具体的讨论。

我们希望所有同情通俗化的作者、读者，大家都发表一些意见，尤其对于《读书生活》请下最最严肃的批判。我们要求上进，要求“不能读”的声音减退。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做得成功的。

我们愿意接受一切的指教。

论科学小品文

读芥川龙子介的《点心序》，我觉得他把文人的那种茶余酒后的随笔，喻为"点心"，与鲁迅先生比作"小摆设"，都是绝好的"譬喻"，是恰当得无比的。"点心"，据芥川先生的解释"好象是指早餐前和午前午后的饭前小吃"。"点心"不能算正饭。吃"点心"的人大概是营养过多，消化不良好的人，他们在正餐时是不大多吃的，但爱随随便便的吃些"小吃"玩玩。能享这类幸福的人，在目前的世界大概是属于少数的人们吧，劳苦的人们只知饥餐渴饮，哪里会有闲情来吃着玩呢？虽然，有时在形式上，大众吃的只能是一个烧饼，似乎有点逼肖"小吃"，但他们是严肃的把它作为维持生命的粮食啊！所以象"点心"之类的小品文，无疑的也只能供雅人的客堂里的点缀，与大众是少有姻缘的。

但小品文并不全是"点心"，这犹如"点心"中也有维持人的生命的老饼一样，是可以作为大众的正食的。关于只能供雅人欣赏的小品文，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发达了，我不想再来谈它。至于可算作"生活的小品文"的呢，它还只在生长中。在这里我也没有打算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全面，因为那是太费事的，目前我想来谈一谈的，不过是作为这种生活的小品文内容之一的科学小品文罢了。

无疑的，现在写小品的作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来。也

许还会有人起来提出抗辩吧！科学重在说理，而说理的文字总是比较谨严的。小品文最宝贵的条件是轻松与明快，是不能用作说理之用的。并且科学重在系统的叙述，最怕割裂曲解，小品文既然不能拉长，如何能负起说明科学之用呢？如果勉强拿他来用，在科学方面是"画虎不成"，在文字方面则必象出了气的啤酒，清淡乏味，一定是双方不讨好的。

不错，乍看起来这种抗辩也似乎有他的理由，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这仍不免是就小品文而论小品文，就科学而论科学，没有与大众的实践生活发生关系，是抽象而又形式的一种看法。

首先，我来说明小品文是否可以说明科学。所谓科学小品文并不反对"大品"的科学文体的存在。但同时它自己也仍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科学小品文是科学与小品文在大众的实践生活的关联中去联姻的。目前大众需要科学知识，科学要求大众化。而大众实践的生活不许可有长闲的时间去从事科学研究，去读大本头的科学书。现在大众中，大部分非文盲的人，据我所知道的店员学徒的群中，他们求知的源泉是靠报屁股，他们在勤劳之余，只能吸取一些零碎的小品。这是目前报屁股发达的条件之一。但他们对于温文尔雅的"小摆设"是不感着兴趣的。他们需要，取得一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为了他们的实生活。可是，他们对于系统的知识不是不需要而是无力吸取，这譬如一个苦力需要烟草，但财力只能使他零枝的购买，他没有整盒整条的购买力。于是，烟纸店中就有开盒零卖的供给。我们现在也与这相似，大众在现状下接受科学的赐与只能是一点一滴的，我们自然也只能适应这种需要，不然科学大众化就会变为完全无意义的空谈。这里科学就与小品文发生着关联。现在要问的

只是，小品文是否可能传达这点点滴滴的真理呢？

我以为是可能的。有人把小品文视作只能言情不能说理，这犹之把科学文体看作只应谨严，不必轻松、明快一样，是一面的看法。小品文的内容，不仅可以统一言情与说理，而且是可以无所不包的。不过，他的特性是重在片断的缩写，不宜将主题混杂。科学文的谨严性，我们不否认，但轻松与明快同时是构成了解的条件。所谓谨严不是摆出森冷的面孔而是明晰、缜密，逻辑上的谨严并不反对显豁与趣味。在大众的读物中，趣味是显然可宝贵的要素。科学文字的拙劣，常常成为与大众隔离的条件。而小品文，在实质上却是一种最富轻松，明快与趣味的文体，可以调和科学上艰深的理解。

小品文如果与科学结婚，不仅小品文吸取了有生命的内容，同时科学也取得了艺术的表达手段，艺术的大众科学作品于是才能诞生。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大众所要求的。

以上大概足够答复怀疑科学小品文的抗辩者了吧？无疑的科学小品文不是有闲先生们的消遣品，也许是很粗制的东西，但它是大众日用品，大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工具。

在习作方面，我还想提出一点浅薄的意见。我希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与小品作家切实的取得合作，或者索性大家都来尝试地干一下。在题材方面，那是最自由不过的，只要与大众生活密切的保持关联，无论就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中，拣取一小片来描写都可以。真是“从苍蝇之微到宇宙之大”。但它的任务是纠正常识的错误，严正的科学的解说。不能歪曲，不应隐蔽。同时，他要放弃科学家的语言，极力采用大众常用的语汇。不要过于森严庄重，要平凡得使大众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大道理，而是说自己生活周围所熟习的闲话。还应加上一点幽默，尽量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

这里，我还可以指出写这类小品文的一种秘诀。这就是作者能抓住大众感觉知识方面的碎片。由他脑中旧有的映象去开展他的理解，诱导他进了科学之宫。至于幽默呢，这是使大众情绪轻松的要素，延长他的持久性，解放他的疲劳，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虽反对那种只惹人一笑，一笑后，什么都完了的幽默，我们却不反对在笑嘻嘻中去与真理握手。

我对于科学小品的一点浅薄的认识

一

大概在《太白》创刊前不久吧，子美曾同我谈到我在《新生》上头写的那些叫做"街头讲话"的东西，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用上一个"科学小品"的名词了。《太白》创刊时，又听得他说，《太白》想为"科学小品"另辟一栏，并且要我也写点文章去。于是《太白》创刊号上我就写了一篇名叫《论科学小品文》的短论，那篇东西发出后，我极希望的是有一点回应，无论赞成或反对都可以。如果赞成的话，就想听人家具体的给我一点写作的意见，使自己动笔时不致毫无把握。如果反对的话，也很想听一点反对的理由，假使小品文一定不能写科学时，那也好，我好早一点搁笔，免得白费力气，多闹笑话。但是没有，一点回声也没有。

我只得不怕丑的闹笑话，我仍执笔的写。不过这时比较以前觉得胆大点，就是在《太白》上已发现几个"科学小品"作家了。

在《新语林》秋季特大号（即第六期）拉稿到我时，我又写了一篇叫做《关于科学文的体裁》的文章，在那篇东西尾巴上，我写着进一步的希望："这一问题提出后，不仅是止于讨论，还望有几本真的大众科学的书籍出现。"自然，我极希望这一次有点回应。不想，连要来"讨论"的人也没有。我是过望了。

"大概这一问题是太小了，不值得人家的注意吧！"我这样

想！不！那也未必。这就是某教授在北方大骂海派时，同时牵到我写的“街头讲话”及《太白》上的那篇《认识论》了。这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而是一种封建的关系，他认识我。因此，偶尔要骂人时，就顺便把我带上。听说他很叹了不少口气，但话就确确实实只说出“浅薄”二字，没有下文。然而，在我却“受宠若惊”了。

我回敬了一篇叫做“浅薄”的小文，在《自由谈》上，很想借以引出他叹气以后的伟论，但是，结果只收到几个朋友打听某教授是谁的来信，不独某教授高论不曾引出，就是在上海也仍是冷清清的，并没有人要谈什么“科学小品”之类的话了。

不过，在几个常见面的朋友间，见面时，也有故意提到这一问题的，但都是象任白戈先生最近在《自由谈》上说过的一样，“目前还是一个尝试的期间，我们对于一般在杂志上所登载的科学小品文，应该有相当的宽容和大量。”陈望道先生就是一个宽容主义者，随便的登载了我的几篇稿子在《太白》上。可是，我在感谢这些先生鼓励的好意之余，也常感觉的是寂寞，因为我需要严肃的指示是比这慈祥的“宽容”更迫切的。

仍然没有。

一直到一月廿三日《自由谈》上悟兼先生的那篇《谈自然科学小品的内容》出世后，忽然这一问题引出了几个人的注意了。虽然仍是不很热闹，但对于“科学小品”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到底也都有了一点。对于这一问题或与之有关的文章，在《自由谈》上，我已能找到六篇，作者有悟兼、孟加、棱磨、伯韩、任白戈诸先生，在《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中又有一篇题名《科学小品和大众教育》的文章，作者是华道一先生，并且写明“书于北平”，这是很

可欣慰的，就是我已能听到北方对于这一问题的一点声音了。

以外，我的见闻有限，其他的就不知道。

然而，现在果真如华道一先生所说，“近来一般人的注意似乎已经不是科学小品值不值得提倡的问题，而是科学小品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了”么？不见得吧！

棱磨先生已经要出来替科学说话了。他不是在着急小品文写科学“也许反增加”科学的“朦胧”吗？科学小品文的用处，据他看来只能有在某一境界中“一瞥闪光”的作用，这是充满着神秘味儿的。什么时候才有“一瞥闪光”呢？这恐怕只有科学有了素养的人才知道。那末，这些科学小品变成了某一境界的东西后，自然不是属于大众的，恐怕比学袁中郎还要神秘些吧！

他巧妙的否定了“科学小品”生长和存在。

另外我又听到一位“系统学者”说，小品文写科学，不免流于支离破碎，失了科学的谨严与系统。不错，在一个学者眼里，自然要顾到的是系统，不谈科学则已，一谈岂能忽视系统呢？否则也许就不能成其为学者了罢！他用了“系统”这一堤防来巩固了科学的王国，否定了科学知识零贩出去，于是他们就更被人尊敬得莫测高深了。

所以科学小品的存在问题，到现在在许多人的眼内，到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在科学小品没有大批好的货色抛到市场上来，没有健全的理论，来说明这一文体的存在与发展，并正确指出写作的道路，我想，这一问题仍只会限于几个作家的事，说不定会让它自生自灭的吧！

因此，《自由谈》上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有扩大发展的必要。

二

任白戈先生说:"科学小品在这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我非常看重他这句话，可惜的是在他那篇《科学小品文的内容和形式》一文中,并没有将这不是"偶然"说清白。就整个《自由谈》上的几篇讨论说,对于什么是"科学小品"的概念似乎也还有点"朦胧",譬如悟兼先生的问题的提起到华道一先生的《科学小品和大众教育》上都是偏重自然科学的,其中有的也不过作为文学与科学浸透问题提出,而所谓科学,也明明指的是自然科学。这一来,在《自由谈》上所讨论的科学小品,就变为很狭隘的了。科学小品就是自然科学小品吗?

决不!

科学小品的内容,我在《论科学小品文》中已略为指出它要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种。但在现在看来,这种意见,虽然比起偏重自然科学来要完全一点,但仍是不够的,科学小品的内容,我想,它包括的东西还要大,即就狭义的说,它也应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的一种总称,如果再把它看宽一点,它就连时事小品,和现在正流行的所谓"大小言"、"社会相"、"时代镜"这类东西都可包括进去。不过,在我个人,至少是主张我之所谓狭义的,再不能狭到只谈自然科学了。

我不认为我这意见是偏见。我觉得，如果要把任先生说的"科学小品在这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这句话，还它一个三清四白,就得指出它的社会的根据来,否则会仍是"朦胧"的。光在自然科学门前兜圈子，会有人浩叹"一篇文字描写出燃烧着的炭、钙、氖的光是怎样不同是怎样麻烦的",会有人把科学小品这一

教育作用仅仅当作学校教科书的一种补充，这样一来，它的发生的基石就看不见了。因此，就越朦胧，只让少数作家写出些与大众生活毫无关系的作品就一切完事大吉。那所谓"不是偶然"是交代不出的。

因为自然科学不过是科学小品的一种类，并不是它的全体，并且目前社会客观的要求上，一般还不很明显。

这里要在大众实践生活的关联上，找出大众的要求来，实在有点困难。因为大众当前的生活奋斗，尚是人与人争的时代，大家生活上迫切感着需要的是了解在这种奋斗中的每一现象，因此对于包围他们自己以及社会的自然现象，比例起来，在这时感到的压迫要显得小些。他们对于某一社会现象都求有人替他作一点科学的解说，对于自然现象虽然有时也感觉需要了解，但到底不是天天浮在意识上，伸长颈子在等待解释的。所以在科学小品构成的原素说，虽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但在目前可以找出活鲜鲜的社会根据的是后二者。前者虽然是一种类，但在今日它占的比重要轻微些。

正因为《自由谈》上所强调讨论的是这一"冷门"，因此，任先生说的"不是偶然"在这些自然科学论者的眼内，或者总不免有些"朦胧"的吧！同时说不出社会的根据来，也确"不是偶然的"。

科学小品在当前应该是以描写式解说社会现象为其主体的了。即会偶然谈一只蚤，一个啄木鸟，我也以为它一定要通过一种现世的"社会感"的，听了啄木鸟的啄木之声，难道竟会联想不到日本最近对中国的侵略就叫做"啄木外交"吗？如果通过了这种"社会感"对于这一自然现象的描写，自然还是会被大众所接受的，还是有它的客观存在的。

科学小品最初的发生以及引人注意，到这一名词的提出，好象也是先见之于写社会科学和哲学两方面的。即就目前读者的接受性方面说，也是专注在这两方面的多。这也“不是偶然”的吧！这一问题的提起，以及有些作家意识的向这一面工作，而恰恰在大众语提出以后，怕也“不是偶然”的吧！

大家都想，都要，或者已经在那里说话了，才会要起来争得这说话的工具，改良或改变这说话的工具的。于是大众语才被提出。大家都在生活奋斗中遇到了许多险阻的高山、荆棘，才会唤起要生活，就得先取得开凿险阻的高山铲除沿途荆棘的工具。他们知道，他们一时不及办大的机器和炸药来开山辟路，但他们在准备这种完善的工具前，就先得找些手工具来，刀、斧、利剑都可以。所以他们一面争得这些小工具，但是，同时并不反对大机器，他们并要在某一天，把这些手工具拼拢来，组成一套有组织的完善的生活手段。于是科学知识的要求，最初以科学小品的形式提出了。

这就是在中国实践的社会要求上，所看出的科学小品文生存的依据。它不是少数人的好奇，故意来同袁中郎争天下，也不会被“朦胧”科学家或“系统论者”随便的所否定，它既有了这生存、发育的土壤，它总得要生长起来的。

然而，我们不能“靠天吃饭”，让这孩子自生自长，不好好的养育，意识的使它早日壮大，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此，在找出它的“爸爸”后，还要指示它的做人呀？

三

我现在也知道自己老是太性急了一点。目前拉长颈子等待

人家给教训，虽然这种谦虚很是可取，却未免太朴素了些。人家给你冷遇，自己觉得寂寞，这实在是不必的。因为叫做科学小品的货色，现在一共集起来，还不到几十篇吧！这几十篇的东西，虽然，有无数的人在那里诚恳的低下头来细嚼，但这些粗制品，是不大入一般科学家和文学家的眼的。而读这些东西的人，偏偏还不会多说话，他们只知道，与他们生活有关联的，他们一概就说"好"，否则，就是"不好"！要向他们受更多的意见是不可能的。

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对于某一种文体，要说出一个存在的理由和写作的方法来，自然先要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要有相当的货色使人研究，现在真的还是"尝试"的时代，就想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来引导这一写作的行动不也太过奢了么！

但一面写作，一面讨论也还是需要的。

如果我们抓住了科学小品的社会存在，理解了它的实践的内容，我们就不会把它的使命夸张得太大，但也不会把它看成一个零。科学小品是传达科学知识的一种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有了它，决不是就连科学实验室都不要了。不是"烧着的炭、钙、氖的光"一定要用文字来描写，不必到实验室去实验。不仅不是这样，即就用文字传达这一种手段说，它也只能算作科学文体的一种，也并不是有了科学小品文，就不再需要"科学大品文"了。至于它在小品文中，也不过是形成一种格调而已，决不会猖狂得要来做"科学统治"的梦的。

不管科学小品是以哪一种现象来做主题，就一般说，一篇好的科学小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首先就得向悟兼先生请教了。悟兼先生谈自然科学小品文的内容，原则上我很多能同意，但是我总觉得他的话说得太"绝

对”了一点。他说“相当于教科书上一课的科学小品是不必要的”就未免太过火了。我们把提倡科学小品的教育作用完全放在教科书的改良上，或作为学校教育之补充与延续固然未免是错误，但教科书以外的生活教育不见得与学校教育就没有一点同一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一篇好的科学小品，自然不能都写成一课教科书，但写成了一课好的教科书，并不能都否认它不必要，即就教育说，我们虽然应该强调科学小品着重的教育并不就是学校教育，它是比学校教育更广大的，但并不一定排斥“可到学校里去的人”也一同来受生活的教育。以外对于他所指出的“生物素描”、“适应季节”、“对于社会新近发生的事件”、“破除迷信”等，如果站在自然科学小品说话，我都觉得悟兼先生的话说得太绝对。我们说目前这类自然科学小品在社会客观的要求上占比重小些，或者他所指出的那十几篇文章中，有好多篇好象没有通过“社会感”而写得不够好，是可以的，但决不能说是“不必要”。那些文章仍然是科学小品，是科学小品初诞生时的制作，我想，除开完全否认自然科学小品外，以自然现象作题材的东西，总是以自然现象为主体的。所谓通过“社会感”，那也不过把它和生活设法联系起来，似乎仍不能超过自然现象解说的范围。至于悟兼先生在《自然科学小品文究竟要写些什么》一文中所列举的九项答案，我认为是太偏于方法论了。这应该是整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不是自然科学小品文所独负得了的，写自然科学小品文要有新的正确的方法，犹如写社会科学，哲学小品一样，是对的，至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决不即是它，而是活鲜鲜的自然现象的解说哟！同时，顺便说一句，我对于华道一先生把悟兼先生认为“不必要”而强调为“最必要的”，和仅仅“把书本上的知识应用

到生活里去"这样狭义教育作为科学小品的任务，好象把教育看成了只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把教育看成了一种抽象的东西等，都觉得不大妥当。

这是就以自然现象为对象说的。

至于以社会现象为对象的呢？这一面的文章还不多，很难得到批评的意见，不过我以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小品，应该是握住实生活中某一现象，加以科学的解说，本来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抽象而来的，现在却是相反，就是用着正确的理论去解释当前的事实，使大众从这具体的事例中，明白理解事物变化、运动等法则。譬如，我们要使大众了解什么叫做帝国主义，我们不死板板的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后的阶段；而在租界，某一不平等条约，"一二八"侵略战，白银外流，汇丰银行这次拍卖申新九厂，以及红头阿三打黄包车夫等等事实中，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性，把帝国主义的特质用具体的事体去表证它。那怕你表证出的只是一面，只要是主要的，那你的文章的内容总算把握住了；不过，你千万要防备因为说理，妨害了小品文的风度是轻快，但又不能过于白描事实，不给与法则的指示。这在《读书生活》第八期中允一评论茅盾先生《话匣子》中的两篇文章《大廉价》、《陌生人》是两篇好的科学小品，但是因为茅盾先生是文学家，所以如果就科学小品说，在法则方面也还指示得不够，是很正确的。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科学小品与整部的社会科学书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特别注意更新鲜活泼，今日刚发生的事做题材，不能象书本上可以用许多陈旧或公式化的以及很远很远的不熟习的外国例子等。还有，这里注重具象的故事式的表

现，但又不完全是故事；是表达社会知识整体的一碎片，但在这一碎片的表现中，又不能忘了全体；是尽可能通俗但又不能流为庸俗；是一件科学的零件，但同时要不忘了它的艺术的风度。

四

是的，我们不要忘了科学以下还接着有小品文三个字。小品文的特征，我想，虽然加上科学二字仍不会损害她的风度的，不然，就是你在所谓形式上遭到失败了。

小品文的条件自然不专在短小上。我以为它的特点是轻松明快，同时是文艺的。科学的文字一向是以谨严缜密著称，这里科学小品不比写整部科学书，用不着那样谨严；因为它的主题的单纯性，理论的具象化，法则的解说，注意在故事的过程的描写中，所以这里就内容说，虽然“重心是在科学方面”，可是这一内容并不妨害艺术形式的发展。

自然，在写作上，也会常常遇到困难的。我想，我们要发生的问题已不是所谓文学和科学浸透那样拢统的问题，而是在这浸透过程中那些麻烦的节目吧！

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涌现的，首先，我们就要感觉不易抓住一个适当的题材。因为这题材要有最大普遍性，方不流于“烦琐”，这不比编书，按着节目写下去就是的。

题材选好了，接着来的就是用什么形式表出呢？现在已发现的形式是“故事”、“对话”、清淡的散文等。这里所说的故事的结构，我与伯韩先生意见有些不同，他说“我们在这里，仍然不能不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而将科学贯串起来，所谓科学思想，便是在种种人物的活动之中表演着、暗示着”。我却不以为要过于

注意人物的描写。有时，反可以不必扮出什么角色来，这在伊林的童话里就看得相当明显，大概还只能注意事的发展吧。因为在这里暗示的成分要占得多些，我们只要那事态的发展，明白的写出，有一定的线索可寻，在这事态的描写中，把成为这一现象的本质指示出来就够了。我们并不必去注意这故事中的人物呀！

这一点，就是与文学完全不一致的地方。一篇文字故事，最怕的是说教式的，特别注意在故事的人物的个性等描写；这里恰恰相反，重视人的描写，一定要把暗示的重心扰乱了。关于这一点，还请伯韩先生赐教！

科学小品并不一定都要用故事的形式，这大概与题材有些关联吧！有一现象是特别好用故事形式表出的，甚或还可以将“物”或“动物”人化起来，有些题材却不能如此。这自然不能一概而论的。

除开主题与形式的相适性外，我还以为要顾到读者的接受性。我在《论科学小品文》中，曾经说过，我们要能“抓住大众感觉知觉方面的碎片，由他脑中旧有映象去开展他的理解”，这是就内容说的。在形式方面，我也以尽多用大众熟习的或易于接受的形式，甚或有时在无妨害内容中，采取一些说书人的江湖风味，也无不可的吧！

以外就要数到用词造句了。这虽有点近于老生常谈，然而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说过，我们要放弃科学家的语言，竭力少用甚或不用专门术语，尽可能的采用大众常用的话头去代替。我在习作中，曾经如此的试验过，但最近有些朋友又对我说：“你太迁就通俗，结果甚或反使概念朦胧。”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在不使

概念朦胧的限度内，还是值得注意的。

至于造句避免欧化，行文带上幽默，出语不要过于庄严、奇突，要做到活象大众自己在工作之余的闲谈，不觉“你的知识比我好”，不怕同你来接近，那时，才能算写到工夫，才配说一句，属于大众的生活小品。在目前，大众在精神上的贫乏也不好过物质上的时候，这科学小品，就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烧饼，暂时饱饱大众的肚子吧！

“乐成易而虑始难。”科学小品在社会上虽然有不少的宽厚长者在那里提倡与爱护，但开始在执笔试作的人，至少我个人是如此，是十分迫切期望有批评家严厉指摘的。我趁此“小品文和漫画”征稿的时候，拉杂说了这一大堆，又很想因此引起更有多人注意到这一问题，使这一问题更进一步具体的讨论到写作技术上去。

能不能再写的好懂些

《文学》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上论到了这样一个写作问题，很使我们这些文坛以外的人也感到一种娱快，因为“要求文字做得好懂”就是《文学》现在也“存心了”。的确，目下“好懂的文字仍旧还不很多，有些刊物虽然意识的向这方努力，还没有做到预期的目的，显出‘力不从心’的现象，也是事实”。是的，“说虽容易，要办到却不容易”，但“不容易”却也不是“能不能”。“能”是“能”的，不过，这工作本来有些艰难，不能变戏法似的一瞥眼就变成功的。

但如何写得好懂呢？

方先生提出：尽量避免术语，不要说支吾话，去博“炫博炫奇”一类的动机，习一点修辞学这几点。方先生的意见，在大致上我也同意的。不过，我也还有一些自己的意见，现在既然“文坛”上有人愿提出讨论，就也出来说几句外行话吧！

写得不好懂，我以为现在已不是什么观念上的问题了。即令你不“炫博炫奇”，“时时刻刻为读者设想，时时刻刻把着一种服务的精神”，也仍会不免有“力不从心”。观念改变了，如何改变这手法呢？主观的观念虽是作者从事通俗的前提，但前提树立了，如何达到所树的目的呢？目前讨论的重心，似乎在这里。

先就形式方面说吧！方先生主张“竭力保持日常语言的自

然"，"多用活字"这是对的，但这活字是不是要到修辞学中去找，我却不能不怀疑了。我不反对作者偶然去翻修辞学，使文字写得更合逻辑，但我觉得活的语言从修辞学中就学不到什么东西。我现在也冒充是"存心"要写的好懂些的"一个小学生"，经验告诉我的，活的语言好象不是坐在亭子间内可以获得，你要出外去，到各种生活群团间去，去同他们混，去窃取在他们口头上滑来滑去的用语。这里不仅是窃取他们一些单个的新鲜的词汇，你还要学习这些词汇的运用，如何把单个的词构成一句话。我非常的感觉兴趣的是：一个意思，甲乙两地方的人，有时用两种方式表达出来。譬如我们湖南人，偶然学了几个上海话头，虽然单词的摹仿是完全对的，说出来仍不成一句上海话，就是词的配合不同的缘故。因此这里正是所谓使白话成话的问题。说时易，做时难，要丰富我们的活词汇第一还得从口头中去找。

第二，要把不见口头应用的文言词汇赶快的丢掉。把"不可胜数"赶快改成"数不尽"，把"欣慰之至"赶快换作"喜欢极了"，就是方先生也不必再用"炫博炫奇"这类字句了。不要以为这是已经通用了的，可以借用。因为这些从文言中吸收来的词汇，对于没有文言修养的人仍是不能懂，在口头中既有它语可代替，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些残渣呢？

其次是专门术语，方先生的话是对的，要尽量"避免或冲淡"。但是怎样避免或冲淡呢？这就到了具体写作技术讨论上来了。在"无论属于什么学问部门的理论"方面，要想完全不用术语是很困难的。不过，少用或所谓冲淡，也确"决不是不可能的事"。譬如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证先把这一术语的内容完全托出，在这解说后，再把这术语拿出来，大概这就是所谓"冲淡"

吧！或者在解释某一现象的文字中，譬如如最近流行的科学小品，读者没有明了这术语的必要时，就用不着要搬什么术语出来，具体的明白了某一现象的解说就尽够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不得已时，非用几个术语的地方，附加注释，或如现在《读书生活》所用的办法，将每一篇文章中的术语，另辟名词浅释一栏，以为参考。

是的，个别的专门术语，固然是妨害读者的了解不少。但这不了解的克服，只要读者有能力翻翻新术语字典，大致的也就可以解决了。成为读者了解上最大的妨害的，是全篇词汇都能懂，但连起来却不知道说的什么，这就是那种欧化文体。我不反对高级的学术翻译书采用直译法所诞生的那种欧化文体，但我对于国人自著书，尤其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著作，不应用欧化文体；并且应尽量避免那种外国人的调子，用我们说话的腔调写出。这又牵扯到使白话文成话的这一句老话上来了。

能做到这一步，自然是很可贵的。但对于那些不常看文章的人，却还不见得就尽其能事了。依自己的经验，我发现用笔写的不如口说的使人好懂。每每一篇文章写得以为通俗了，他还不能懂，我改用口说时，他马上都了解了。我起初很奇怪，后来仔细的来检查，我口说的与笔写的有什么不同呢？最后我发觉了这区别了。笔写的是因为要合于文章的法则，所以每每讲到一只角，其他三只角就不说了，不然会破坏文章的法则，变为王婆婆的裹脚布，罗里罗苏；口说则不然，我可以一只角，一只角说，解释一个现象，我可以从正反两面去说，不怕罗苏，不顾什么文章的法则，我自由自在，用的也真真是口语。自从我得了这一教训后，我就把它应用到笔写的方面去。凡对于不易了解的地

方，总多用例子，一个又一个，在文章家看来虽然说太琐屑，罗里罗苏，但读者却能含笑领悟。我又从自己过去读书的经验中，更进一步了解初步读书人的心情；我记得，我读经济学原论时，最感兴趣的书是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后来听见朋友说，那书在文字上的缺项是有些重复，说的不免有些罗里罗苏。不错，这说为缺项的，正是在初学的人看成最可宝贵的地方。这不就是今日大众转而要求我们这些弄笔杆的人们去效法的么？

我不知道：这种多面的描写法，能否成为通俗文的一个条件呢？这里我得附笔声明的，所谓多面的描写，琐屑的、罗里罗苏的解说，自然不能混乱主题的要点，这犹如通俗尽可尽量通俗，但要避免庸俗一样。

这是专就形式方面，随便略为谈谈，至于内容呢，那说来话长，另外有机会再说吧！自然，形式与内容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因为方先生提出的也大多是关于形式方面的话，所以为了方便起见，也就先只说形式，不是故意要把它和内容分开来说的。

最后，希望"文学论坛"，继续扩大讨论到怎样写得好懂那些技术问题吧！

汉 奸 论

中国人好象对于“脸”特别看得重，一个人的美丑固然差不多就完全决定在“脸”上，人身攻击也特别喜欢暴露人家“脸”上的缺点，骂人的话中，有“不要脸”、“死脸”的语句，都是带着十分严重的意味的。相信相术的人，要把一个人的一生祸福，大部分就归到他的“脸子”生得好不好。

平常，我们夸奖某一个孩子，说他聪明，就说“真长的不错，一副聪明相”，如果看了一张强盗的相片呢，就说“你看！他长的真是‘凶神恶煞’的！”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近来，我们蓟密行政大员殷汝耕先生忽然摇身一变，当了汉奸，报纸上把他的“玉照”登出，就引起许多面相家来评长论短，我们听见不少这样的对话：

“你看，他这副尊容就是一个奸相，卖国贼、亡国奴的相！”

“我看他的眼睛最坏，不是正人的眼睛，头盖骨也特别奇怪。”

“下腭，腮，都是奸相，这个人整个的说，是缺乏正气。”

他们想把殷汝耕当汉奸的原因，从面相上去求解答。就是想从生理方面，去说明一个人的行为。

殷汝耕当汉奸是因为脸子生得不好，但是今日到处都有殷汝耕，这又怎样去解释呢？于是又有人从这里更引深一层，达到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论上去。“妖孽”是一个怪物，生长得与众不同。汉奸在太平的时候，没有，在乱世才多。这是说，乱世一切反常，天下每多奇事奇物。今年，气候有点异样，在湖南长沙，听说现在暖和得和春天一样，桃树开了花，杨柳发了叶；在华北就出了殷汝耕之类的宝贝，这不是天意么？

这是从“生理”进到“天数”去说明今年的汉奸的存在的。

与生理的说法，仍有一些关系的，是“一代不如一代论者”，就是说我们祖父的时代，天下最重气节，并没有出殷汝耕这样“不要脸”的东西出卖祖国，卖祖宗，现在官至中央特派大员，竟无耻到公开出卖国家，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一代不如一代了。

虽然，这里提出了道德，比较简单的谈面相要不同一点，可是父亲既然不及祖父，自己又不如父亲，儿子不及自己，孙子不及儿子，这是什么原故呢？这种退化，仍然会被还原到“生理”上去。所以这一派的论客与以上两种看法，实在仍然可说是出于一家门的。

这些看法，无疑的是庸俗的、错误的但是最一般的，我们在衰老的阶级，或低级的但不是前进的大众中，到处可以听见。因为是庸俗的，故一向被高等人士看不起，不屑去纠正它，反让这种谬误，在广大的人群间流布着。

首先我们要指出以上看法是如何的不对。

面相论者是太朴素了。以脸子定人的奸正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他们明明受了中国旧戏脸谱的影响，曹操是一个奸臣，有一副奸邪脸谱，就以为凡是奸人就一定必有一副奸相。其实，做戏是做戏，事实并不是如此。你说，殷汝耕是奸相，是你对他

已有汉奸的印象以后，是他已经当汉奸了，你才觉得。当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做众议院书记长，中国银行专员，交通航政司长，外交处长，国民革命军驻日特派员，上海市政府秘书，上海市府参事，蓟密行政督察大员的时候，他身上还穿着中华民国的礼服，你怎能看见他脸上有汉奸的颜色，在民国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要出卖冀东呢？

在事实上，我们反看见不少的人脸子生得漂漂亮亮，甚至皇太后看了都要爱怜的人，而恰恰是大奸细！

在戏场中，我们常常对于一个名角入迷，但是她或他下装后，那一副尊容既麻且丑，实在不敢多看。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他化了装，配着灯光把丑遮盖了。所以真正的汉奸，在他的奸谋还未揭穿，尚躲在什么“亲善”、“睦邻”、“提携”、“合作”等化装下，即令有一个狐狸尾巴，往往也是看不见的。

至于把汉奸作为“妖孽”论吗？那显见得是“不甚科学之谈”。我们，把一个殷汝耕送到解剖房去解剖，未必会发现出一根奸骨，一种奸细胞的。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话，它的真实性，真只有天晓得！

“一代不如一代”本身就有漏网。汉奸这东西，并不是不见经传的，并且今日的中国并不个个人都是汉奸，汉奸现在虽然为数很多，但一比起大众来，不过还是极微小的几个坏东西。既然“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孩子中有好的，又有坏的呢？

以上三种看法，第一种虽然浅薄，没有说出汉奸存在的本质来，但坏影响较少；第二三两种却是会引导人们走入悲观绝望，中国必亡的宿命论中去，他们不独没有说明什么，而且武断的用迷信、命运，去替汉奸的存在辩护，同时武断的对民族生存作绝

望的判断，否定我们民族生存的前途。

除开这三种看法外，还有一种最普遍的看法，是把汉奸的存在从他个人道德、学问去解释的。

照这样说，殷汝耕的背叛民族，应该是因为殷汝耕个人没有廉耻、无知等。

这也并不见得。殷汝耕是早稻田大学毕过业的，做过民国以来的大官，说他无知，是不可以的。至于说他无耻，没有道德呢，自然，从民族的道德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但是从他的家庭说，也许他对他的父母还是一个孝子！这种个人有没有道德，道德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怎样解释呢？

这种从个人出发去寻找汉奸存在的根由，无论是从个人生理或道德去找，我看，什么也都是找不着的。并且，这与我们现在要知道为什么目前中国特别多汉奸的缘因，相隔得太远。

到底汉奸的存在的真实的缘由在什么地方呢？

我以为这要从社会的原因去说明，从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危机的特点各方面去说明。个人的原因虽然也不能忽视，但不能把个人看做离开社会孤立的东西，不顾社会的原因。

所谓太平世界，没有强敌压境，就没有奸贼出现，乱世危亡的时候，总是奸贼辈出，这是有理由的。中国今日多汉奸，殷汝耕这狗才愿作人家的警犬，木头人，坐那冷清清的通县文庙的冷板凳，你难道只说是他的骨贱么？

我已说过，不是的。中国今日出了这些“妖孽”，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现在变化的太尖锐了。腐烂的社会层，虽然还在作最后的挣扎，可是他们的历史的使命实在走到了尽头。他们敏感着的社会危机给与他们的影响，是自己

作主来唱戏，已经没有可能。这时刚巧碰到民族敌人来侵，更把社会危机弄得激烈，你想属于这一社会层的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他们起先的感觉是非常冷淡，因为没有强邻来侵，自己也是要落水的。过后，他看见强邻的一个弱点，就是强邻虽然有飞机大炮新式的战术，但是今日殖民地的老百姓也并不是好欺的，如果真的起来反抗，象阿比西尼亚一样不怕死，那也不是好玩的。帝国主义到底不能把被侵略的地方，用“死光”照得一干二净，一个人也没有，一切生物都死灭。他们就觉得这里颇有文章可做。

因为他们同这位强邻，在平日本来是喝过香槟，有过交情的，他们双方把自己的利害想清之后，就觉得原来他们的利害并无什么冲突。

我们这些殷汝耕先生，正象在水中抓到了一块板子一样，哪里肯放手呢？侵略者自然早看清了这点，正乐得获得这一群不要训练、现成的警犬去作“清道先锋”，真是“英雄”碰了“英雄”，一谈就成了交情的。这就是今日汉奸之所以为汉奸的基础。

也许有人要反问我：照你的说法，大汉奸是可以说得过去，至于小汉奸呢，五角大洋零雇一天去作自治请愿的小奸孙呢？他们又是怎样与这位侵略者携手的？

是的，这一部分小奸孙是被生活压迫而去的。他们大概是属于流氓无产群，这一群人，在这社会大的变动中，本来站在历史圈外的。一向因为穷困，作了腐烂社会层的家犬，在那里倒拉时代的轮子，现在因为主子反叛了，他们也就跟着去服侍主子，

去做傀儡戏剧的配角。

所以，我们看见的汉奸，总是属于这两个阶层：大汉奸是属于昔日的高官贵人，小奸孙是属于无业的流氓。

真正的劳动大众，是从来在傀儡剧场看不见的。并且我们在东北和“一二八”战役中，也还看出小奸孙这一群人，并不都是甘心作贼，只要好好去开导他们，说服他们，他们一旦明白卖国的买卖的真相，也要立刻丢掉那件奴衣，马上站在大众之中来的，在“一二八”中，我们还亲自看见小奸孙在大众前悔恨自已受愚，并且宣誓说：“我要早知道卖国的利害，王八羔子去上他的当。”东北傀儡国的士兵也常常带枪到义勇军去。这次在天津扮请愿的把戏，穿上敢死队衣服的人，后来被民众劝导，也立刻脱下狗皮，不想无理由的“敢死了”，这就可见小奸孙并不真是卖国正犯，真正不可救药的民族的奸贼，只有象殷汝耕这类高官贵人的一部分。

至于今日汉奸为什么这般猖狂呢？这是因为汉奸没有受到制裁的缘故，是不抵抗侵略与敌人亲善提携的空气下助长的。我们看见阿比西尼亚的“阿奸”比中国少，是因为阿比西尼亚去抵抗强敌，使这些小鬼不敢明目张胆出现，同时他们民众是会用一根绳子，把“阿奸”的颈子一串串吊起来，好象吊鸭子似的吊死的，中国却对于汉奸过于优待了。

这里同时要附带说一句，我们也不能说，殷汝耕做了汉奸，是因为他那社会层的腐烂，即断定凡属于这一社会层的人，一定个个都是汉奸，倘若这样看法，那也是太机械了。这一社会层中，仍有不当汉奸的。因为这一层中人也有把个人利害看得更明白，民族的利害，民族的道德心使他站在大众一起来捍卫祖国

的。

这样看来，我们今日对于汉奸如毛的现象还有什么可怪呢？

我们是用不着悲观的。这既不是中国民族生理上的劣质、道德性的薄弱，也不能把这现象算作是民族前途没有救药了。我们要把这非常的现象寻出它的根由来，认识它是历史变动中必然的现象。

我认为最可惜的是我们看不清这现象，最可耻的是让这现象继续存在，不改变这现象。

我们痛恨汉奸，我们要起来肃清汉奸，我们主张杀殷汝耕这类东西的狗头，我们主张检举一切准汉奸，但同时更要造成一个使奸细不敢横行的场面，那就是大众团结成民族阵线，继阿比西尼亚的道路英勇的迈进。

施剑翘女士的愚孝

暗杀事件，虽然天天都有，却并不是每一暗杀事件，都可以成为“街谈巷议”的材料的。最近汪精卫氏被刺，这总算是一大事吧！在政治上虽然轰动一时，在“民间”却并不怎样传得宽。与之相反的，近日孙传芳的被人枪杀，在政治上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却成为“街谈巷议”的材料了。

这并不足怪。孙传芳这个人，对江浙人的印象是太深了。谁个人不知，那个人不晓呢？他是个军阀的头儿，当年挂着五省联帅的印，真是何等的在人民前显着威风！这印象也还未减退尽的。现在被人枪杀了，自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何况杀他的人是一个女子，并且还是一个为父报仇的孝女？这年头，女人做的事是特别引人注意的，孝女，那就更是难得了。以外，也因孙传芳是一只落水狗，谈话也较方便点，于是，这一消息，连不看报的人，也拿它作谈料了。

街谈巷议中，如何在“谈”这桩公案，“议”这桩公案呢？

有人说这是“报应”、“现世现报”，孙传芳过去杀人杀得太多了，他自然应被别人杀。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有人说施剑翘也做得太狠心，人家放下屠刀，念经依佛，不应该再杀他的。但是，施剑翘也情有可原，因为她是为父报仇，一片孝心，也值得人的敬重、钦佩。

有些人，在那里快意，因为孙传芳是一个军阀，过去杀人如麻，地皮也刮得太厉害了。不管“报应”不“报应”，杀了他，总还痛快。

也有人觉得“血溅佛堂”，这是对宗教一个大讽刺。这来得很痛快！菩萨不能把施剑翘的杀人的阴谋，由梦中报与孙居士，未免有失菩萨的体面，这够使菩萨难堪，吃菩萨饭的人，饭碗要动摇。

还有人高兴，这一来，揭破了这些落水狗披上的佛衣，使那些号称佛家子弟，没有地方逃避仇家了，因为居士林现在也不大安全了。

其余的，也有读了施剑翘的诗，在那里一唱三叹，听了她谈报仇的经过，称赞这位孝女的勇敢，多智才华的，差不多是一片同情她的声音。也有对这事件毫不关心的，他们以为这一件暗杀事件是件私事，被杀的只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了的人，要受法律制裁的也不过是一个女子，我们怎值得大惊小怪呢？

这是最广大的舆论。

我个人也承认这是一件私事，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同时，因为这件私事，现在变为“街谈巷议”了，它有影响社会的力量，却又不能不使我注意这些“街谈巷议”。

孙的死，没有什么可惜，我同情舆论；这件暗杀事件，是对宗教的一个讽刺，我也爱看这种讽刺剧；但这件私事给与社会影响的是“报应”之说，又会因这件事而在千百人头脑中出现。这一孝女，又将被许多人大捧特捧，变为复古派的一种有力的装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将把一切女子倒拖到愚孝的泥坑中去。

因此，我们对这桩公案似乎还应该说点什么似的。

说到孙死的因果关系，自然是有的，但他的被杀却不是“因果报应”。杀孙的人，虽是施剑翘，但造成这种暗杀的因是出于孙氏之手，即孙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杀过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如果把因果关系就是这样说了，那也会嫌太简单。我们要问为什么孙要杀施呢？这是不是施前世杀了孙，今世的“报应”呢？

这明明是鬼话。我们要追究这原因，只能从当日军阀间的矛盾中去看。我们看出，民国十四年的苏鲁战争，是军阀抢地盘的战争。苏鲁任何一方，没有谁比谁进步过什么，谈不到社会的意义，他们都是在做公开的强盗，同样半斤八两的在屠杀人民。当日他们在火拚中，谁能胜谁，谁就杀谁，这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施从滨打输了仗，被虏，杀了头，那是活该，反之，孙传芳被虏了，施从滨也许要把孙传芳杀头，这也是可以想到的。这里，我们看不出他们前世的仇恨，只看见地上的原因，他们被现制度造成了一种强人，强人与强人间一种不能不火拚的矛盾，施从滨就不幸死在这矛盾中。

是的，孙传芳的死，虽然再通过一种私仇的关系，比较施从滨要复杂一点，实际孙的死，也同样是死在这矛盾中，因为这私仇是织在这矛盾上的。这矛盾才可以说是这桩公案的因果性。不过，一般人也许看不到这样深远就是了。

讲到意义，不独施从滨的杀头，没有什么意义可说，就是孙传芳的被刺，在施剑翘的报仇观点说，也说不上什么社会意义，施剑翘不是为了孙传芳是一个军阀，曾经杀过多少人而去杀他的，只不过为了父亲被他杀了，她去杀了他，了却一段小小的“因

缘”罢了。（自然，我们也不赞成用暗杀的行为去对付一个恶人，这里不谈它。）

这种真的因果性，既然不容易被一般人找出，而孙传芳又恰巧是一个恶人，于是世俗的所谓“恶有恶报”的话，就投合一般迷信“因果报应”的人，这样一来，真相就更被掩蔽，迷信要利用这事实抬头了。

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施剑翘的报父仇的观念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然，可以说是基于骨肉的爱。但组成施剑翘去杀一个孙传芳就算作是报父仇，也是根源于施剑翘不能认清她父亲被杀头的真正的原因。她只看见杀她父亲头的是孙传芳个人。

什么东西阻止她不能看得更远些呢？

是她的阶级的观念。她出生的阶级把她束缚在盲目的狭隘的骨肉之爱的圈子里。所以她对于她的父亲的为人，不敢有什么社会估价，对于他的死，不追问社会的根源。这同一切善恶的标准，一味盲目去崇拜自己的父亲。

自然，促成她复仇的决心，也还明明是受了儒家的“愚孝”的教训的影响，不然，施虽有复仇的观念，不见得能“勇敢的”实行的。儒家倡“百行孝为先”，就是把“孝”一向夸大得很大，认为人类行为最高准则是孝父母。中国历史上，过去就有不少的愚孝的故事，都是用少年男女的鲜血做成的，确实装饰那封建制度的堂皇的门面不小，施剑翘是受过旧教育的人，她完全接受这一方面的意识了，她才能发生铁般的报仇的意志，只要报得父仇，也不管自己个人的幸福，甚至可以把结婚作为杀得仇人的条件，丈夫不能替自己杀得仇人，更进一步由自己亲手来做，可以牺牲家

庭，丈夫，儿女，不顾一切做去。她在报仇经过中，说及"闲阅《聊斋·商三官》一段，深深印入脑中，以为故事虽属假造，但事实非不可能。至昨日散放传单诗句中，第一句'父仇未敢片时忘'亦系抄袭《聊斋·于江》篇前句"等，就可看出她中旧的传说的毒不浅。是的，她这一次杀人，作诗、自首、入狱等等"英雄气概"，使我们也好象是去读宋明笔记小说。

但是，这确是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今日。我们对她这种"英勇"行为应该作怎样的社会的估价呢？

如果这种报父仇是美德，那也是属于过去时代的美德了。在今日找不出社会的意义，我们只觉得是时代的一种反常的事件。

如果施剑翘是一个时代的前进的女儿，我想，她一定会对这一愚行失笑吧！她如果认清了她的父亲，以及她的父亲的死，她要报的仇、杀的人，恐怕再不会是一个孙传芳吧！恐怕再不会一个人孤另另的玩着这种手枪的游戏吧！

这是对施女士不起的，我们为了爱护真理，为了现在许多尚活着的青年，看见女士所给他们的不良的教训，我们虽敬佩女士"英勇"，但我们不能不把女士的所为，客观的、真实的揭出在大家之前，并且要对大家说：我们今日并不要女士的这种愚孝的行为。

这一公案的舆论，我知道还是在展开的。恐怕正有不少的人，要利用施剑翘的行为来挽救已失势了的腐烂的伦理罢！是的，施剑翘又要作为另一种人倒拖时代车轮的幌子，是无疑的。同时，这一公案恰巧发生在今年，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吧！

让这种"奇事"继续发生么？

救亡的基本认识

《救亡的基本认识》，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收文章八篇，本书选印七篇。

前　言

这一本小册子所收的八篇文字都是讨论当前救亡的基本策略的问题。自然，这是我个人，根据我的理论的了解，对当前讨论得很热闹的民族联合战线，发表一点个人的私见。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权力和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有权力和义务对救亡的方策，说出我要说的话。至于我的看法，我说出的意见，是否正确，那不由我个人主观的判断，留给一切忠于民族的伙伴们去讨论吧！好在真理只有一个，救亡的真理，就是切合当前的实践，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救得中国不亡。我固然希望我的私见恰恰是合于当前的真理，如若不是，我自然也虚心愿意接受那唯一的真理。

是的，策略的讨论并不能忽视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策略的基础。实在说来，理论与策略并不能截然分开，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每每发现的斗争，在外表上是以策略的姿态出现的，看不见纯粹的理论争辩。这并不是离开了理论，单独的策略斗争，而是在实践中，理论是通过策略而实现的。所以，策略斗争，不仅就是理论的斗争，并且是最最实际的、具体的理论的斗争。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讨论中，不容许人把理论作为一种经典，不看做行动指针，离开了实践，变成了专唱高调，而妨害实践。这一种毛病，在今日讨论救亡的方策中明

显的有人无意识的犯着了，他们认不清策略的重要，认不清民族联合战线是救亡“策”，只拿了几个基本的原则，一套理论的公式，大呼大嚷，说这不对，那不对，右倾，左倾，结果弄得大家钻进了牛角尖，什么理论，行动，联合战线，一切都被葬送到坟墓中去了。

民族联合救亡的方策，现在方在讨论中，虽然它已获得广大的同胞的拥护了，但具体发展的道路一般人尚属模糊，事实上各阶层的救亡联合的行动也还没有开始啊！如何促进各阶层的同胞，以兄弟之情，大家携着手来御侮呢？

那就先得对这方策有彻底的了解。那末，这本小册子就作为对一切忠于民族的朋友们的一种参考意见而出版吧！

柳　湜　一九三六，八，廿九

把千万颗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

有人说，"理想总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譬如说，目前的学生爱国运动吧！ 就有人这样说，"我想在学生间总是一致的了，谁知，这是'理想'。'事实'呢？学生大众中，有真诚的，热情的，也有勉强的，冷淡的；有纯洁的为了民族，也还有卑污的为了少数个人；有有认识，同时又有斗争的精神与经验的，也有经不起斗争，易于屈服，败退的；学生这一条阵线，'理论'与'事实'就相隔这般远，以外还用得着说吗？"

这样的话，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听见了。

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

它的错误，就在把"理想"与"事实"分开。实在，他们说的"理想"，已经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理想，而是他个人头脑里的幻想。学生爱国运动，不是抽去了学生的社会层，及其所反映的现实而单纯的作一个抽象看的。

学生爱国运动，是实实在在、长短不齐的学生大众的一种共同的爱国行动，他们出生的社会层，原也就不是尽同的，即令同在一个阶层内，也因生活环境的差异处，有的获得前进意识了，有的仍落在后面，现实对于他们的反映，就有着很大的差异。你怎能把这一广大的群众，看做高矮完全一样，肥瘦并无差别的齐整呢？

大凡一种进步的运动，不论是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甚至是一种性质狭隘的运动，大队参加的人马并不能个个都是意识十分正确、分明，行动又英勇果敢的。也更不是有了这一批“上帝的选民”，才发生某一种运动；恰恰相反，一种广泛性质的运动的发生，大抵参加的人马，非常的复杂，对于运动的认识，都只有浮云般的一层轮廓，甚至仅仅不满现状这一点，造成了大家的联合，形成共同阵线，终极的目的是极为歧异的。

千万颗子弹，一时的由许多不同的枪管，打在同一的靶子上。

但打靶的人，有的为了社会、国家、民族，有的只为了小集团，有的或者为了他的主子，或个人的风头，爱人的欢笑；然而，只要运动在进展，许多方面的子弹，能够齐射到敌人身上，不管子弹是发自个人主义或集团主义的枪管，它一样能够制敌死命。这种运动，就叫做联合阵线。

自然，这种联合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它是许多矛盾的一种综合，并不能消灭各自的矛盾。在运动进行达到某一阶段，有的人要退伍、落荒、颓唐、叛变，都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只有运动前进，这些分子的退却、反叛，并不一定可悲。因为运动越到后来，队伍也越变得纯粹、精锐、庞大，真正意识的战士，也只有在这种行动中，才能培养出、锻炼出的。

所以，一种联合阵线，并不是截长补短，消灭内部一切的矛盾，而是一面合作，一面抗争。在进行共同行动中，进步的分子，不是把自己的主张放弃，反是一面以友谊的，甚至严厉的态度，进行内部的批判、暴露，说服一切幼稚的追随者。

以上这些原则，用在今日中国民族阵线的形成上，是很有意

义的，用在今日的学生运动上，正是对当前学生爱国运动一种对症的良药。

现在，且就学生运动来谈谈吧！

当前的民族危机，敌人新近的侵略，激发了普遍的救国高潮。在学生间，展开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是不足怪的。这一运动，虽然在整个民族阵线说，它不过是一个支队，但是这一个支队，应该如何整齐阵容，集中力量，形成更坚固的壁垒呢？这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第一就是对于这次学生运动的性质，发展的方向应该有一个彻底的明白（请参考《大众生活》第七期拙作：《新兴的学生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区别》）。

其次，就是关于这一运动的组织与动作。

在已有的行动中，我们根据一些私人的报告，知道许多学校在组织与动作方面，不免有许多缺憾。

第一，他们对于同学的意识的不齐一，就觉得有些悲观，这是前面已指出的错误。因此，他们看了内部矛盾不能调和，却不会运用联合阵线。前进一点的人，不是过于害怕那些惯于胡乱捣蛋的分子，不敢接近他们，就是太看他们不起，不屑与他们为伍，因此，在运动上，力量就形成分裂。

其次，忽略了争取一校的大多数的同学站到自己的主张方面来。常常把那部分平日只埋头读书，不管课本以外的人，不看在眼内。不想法子去说服他们，取得这一部分群众，使这一种分子，在客观上帮助了落后的方面。

因为如此，所以今日学生运动，仍不脱过去时代的少数人的活动，仍脱不了多少带一点英雄色彩，把工作安置在少数人的肩

上，使少数人疲劳过度，不能尽他所负的使命。大众缺乏活动的机会，新的干部也就不容易养育成功，这一战斗单位的力量，自然更加薄弱了。

在一个学校是如此，学校与学校间，甲地与乙地间，学生力量的配合上也都有这种现象。所以，今日各地学生蜂起的爱国救亡运动，虽然已滚起了全国高潮，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学生的阵容到现在止还是脆弱的。

这种缺憾，在运动开始时，虽然本来也很难免，不过，我们希望这缺憾早日加以克服。

这种缺憾应如何补救呢？

这就在今日主持一校，或学联的青年领袖们善于利用一校或一地的客观条件，尽量的做到在救国的目标下，动员每一个同学，集中各种力量，形成坚固的阵线。

一个领袖，应该有冷静的头脑，容人的心怀，握住当前的一环，去组织各种力量。你要使前进的同学更加前进，你要使不动的同学也向前进，你更要使落后的、扰乱的同学，至少在推动爱国运动上能尽一点作用。所以，你不能感情用事，你要敢于见好人，也敢于见坏人，敢于和志同道合的人倾谈，也敢于和心怀恶意的人雄辩。你不要把当前的合作，与终极的目的合为一谈，你不要因别人没有理想，就轻视他目前的力量。你应巧妙的去综合这许多力量，去组织这些人物。

自然，这组织工作不是完全由和平达到的。这里，也离不了斗争。只有在行动中你才能克服一切落后的主张，暴露它的虚假与欺诈。然而，这一切你先应使运动不停止的前进，时时造成运动前进的条件。而运动的前进，主要的是力量；联合阵线，就

是集中力量加强力量。尤其在真理尚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辰光，这种联合的力量，更为客观所需要。

全国学生大众们！今日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已经是变为知识者的运动了。在知识者的阵线内，无疑的学生做了中坚。诸君在今日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啊！目前学生运动方才开始，民族斗争的来日方长，如何去组织与领导这一神圣的事业呢？这是每一个学生及教育者应该虚心坦怀去考虑的问题呀！

学生大众们，集中你们自己的力量吧！造成自己领导的能力吧！接受前进的教师及社会教育者的进言吧！

各级教师及社会教育者们！站在学生一起吧！站在学生阵线前面吧！为了民族解放，为了教育青年，亲身去领导这一民族的，神圣的运动吧！

理想与事实并不是相离十万八千里的。我们今日共同的理想是民族解放；我们今日的事实在实现这一理想的最初步，反抗侵略、保卫国家土地完整。我们今日的理想是组成民族阵线；我们今日的事实是在实现这一理想，组织全阵线的一分野的学生大众。我们的理想是把学生阵线造成一个钢铁壁垒；我们今日的事实是在实现这一个理想，与各种认识不足及落后的学生分子斗争，整齐自己的阵容。在斗争过程中，有进步的现象，有落后的现象，有可教的人，有不象人的兽，这一切有什么奇怪？有什么值得悲观？怎样怀疑到理想与事实的不一致起来呢！

现在需要的是力量，集中各个力量，要把千万颗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

民族联合战线发展过程的私见

——上层联合战线与下层联合战线

中国目前最最基本的救亡政策是联合全民族的力量，结成一条民族战线，这已是最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真理了。近十个月以来，人民救亡的行动，逻辑的按照联合战线的原则前进，更使联合战线的理论的讨论，一天天开展，一天天深化了，这决不是偶然的。

联合战线的讨论开展而至今日，发生了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即中国今日的民族联合战线如何结成的问题。它的具体的内容，发展的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呢？许多人对这一个问题还在怀疑，许多人很慎重的不敢发言。大家似乎只有一个概念，联合战线一定是由两条战线结合而成的，即上层的联合战线与下层的联合战线的一种结合，后者为联合战线的基础。联合战线具体的内容是劳苦大众为中心的一种与上层分子的结合，它的发展过程是以下层联合战线的胜利推动上层分子来参加，这有事实为证，即今日法国的人民阵线的胜利。这一个概念，今日非常普遍的存在在无数人们的头脑里。

因此，最近许多人对沈章陶邹四先生发表的那篇《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最不满意的，就是他们只倡言要联合救亡，并且似乎只看见国内几部分实力，少谈下层联合战

线，根据以上的概念，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话说得还不具体，“无补”实践了。

关于沈章陶邹四先生的意见，这里我无暇详细发表自己的私见，且按下慢表吧！但是对于联合战线如何结成的问题，在我个人也是最关心的，我对于以上的概念有何感想呢？如果纯粹作抽象的研究，在原则上是不能发表相反的意见的，如果我们切合中国今日的实践，从民族联合战线，与法国反法西的联合战线不同的性质，两国不同的实践来说，我觉得以上的概念还有疑问，还嫌过于抽象。中国民族的联合战线的结合的道路，是应该按照自己的实践的。是的，我们要珍视人家的教训，但历史的发展并不能离开客观实践，不能由我们抄人家现成的路单。我想，问题既然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有自己的路可走的啊！

法国人民阵线的结成，据我所知道的，的确是由下层联合战线做起的，即反法西的战线，首先从工会开始。法国劳动群众在政治信仰上也与其他各国一样是人为的被分裂着，隶属于几个不同的政党的。这些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党彼此对立着，工会与工会自然也对立着。劳动群众运动也与其他资本国家一样一向不能统一。现在因为反法西虽然有了同一合作的要求了，但是这种联合是如何作成的呢？

首先是法国最前进的政党，在总的政治上，确立了最正确最实际的反法西的政策，在原则上建立了联合的基础，在劳动群众间，工会中最先实现起来，动员自己工会的人参加别的工会所号召的一切日常抗争中去，英勇的站在抗争的最前线，在许多抗争中坚定不屈的精神与行动使其他工会群众深深受到感动。这些

群众对于新参加的不屈不挠的同伴，生出了非常的信赖与敬意，粉碎了昔日所受到的许多麻醉的教育。在抗争中，自己工会领袖的动摇，他们又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在无数次抗争中，他们间过去的隔膜是一天天打破了。他们发现了相互的兄弟情睦。因此，对于这些英勇坚定的同伴的政治信仰，以前是歧视的，隔膜的，现在觉得也平常，亲近了，许多落后工会的群众因此对于共同反法西的要求的信念更坚定起来，他们督促，逼迫他们工会的领袖改变昔日的观念来和前进工会接近，接受联合主张。由这些行动使得各工会内部都起了一些改变，渐渐的，渐渐的，彼此建立了反法西共同行动同盟，产生了共同行动纲领。在言论方面，各种工会机关报纸，也完全改变了昔日的态度，集中在联合反法西的焦点上，但各自的政治主张，不独仍旧保持了独立性，并且因为通过共同反法西的行动的实践性，更使自己主张得到实现。

由于工会联合的胜利促起政党间的联合，一切不同信仰，但与法西站在对立的一切个人，也由一环一环起使彼此接近了。以前，譬如甲党是最前进的，它和较前进的乙党以及落后的丙、丁各党都是各自隔离一定的距离的，现在因为甲和乙联合，引起丙和甲也接近，丁也跟着走向前来握手了。个人间更是如此，以前丁看了甲就头痛，觉得异类，但是他相信乙还可够朋友，现在因乙和甲做了朋友，也改变对甲的观念，这样由无数的线的牵引，使许多利害不同，信仰各别的集团和个人，在一种共同对敌中，互相携手起来。

法国人民阵线取得伟大的胜利，确实是以下层联合战线成功，下层的联合战线作成了人民阵线的基础，由下而发展到上

层，到全国社会各领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还有它的客观条件，但如果此处把客观条件不论，专就主观能动的方面来考察，我们不能不夸耀，法国前进大众的先见，英勇和艺术的组织的能力。它作出世界反法西阵线最优秀的作品。

但是，这一个优秀作品我们是否可以仿制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社会吧，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工会联合战线做起点呢？

我看不出这一种可能性。中国社会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上民主性的薄弱。人民失掉了一切民权，工人群众，只准有形式的衙门式的组织，真正代表自己意志的组织不允许你存在。固然，由于世界革命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旧俄覆灭，苏联诞生的影响，使得中国工人运动蓬勃过，并且过去作出了许多光耀世界的事业，说明了中国工人大众是民族解放的最大力量；但正因着工人的自觉和革命的威胁，使工会组织更不能存在，民权自由的限度，就当前事实言，不独不能高比法国，也几乎不能比拟日本。中国工人这一阶层当前生活的悲惨，如果具体的描写出来，恐怕要使世界人士吃惊，认为是天下的奇闻吧！是的，不平，愤怒，反日的民族的情绪是非常普遍的，反抗的行动，也很普遍，去岁一年的工潮，也几乎超过了一九三五年，但大半是自发的、绝望的抗争，部分的孤立的苦斗，我们不能错认这是工会在那里运动。我想，大家总不能闭煞眼睛，不承认当前中国工人群众组织的艰苦吧！

形式的工会是与真正的下层群众，在积极意义上是无多大关系的，它本身是统治工人的机关。固然，我们中国工人间没有

法国那样复杂的政治派别，可说是好的现象，但却根本不许你有政治主张，有组织。你有了主张与组织，也就构成犯罪，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民族联合战线，要想先从这里诞生出来，恐怕会是空想吧？

谁提出这种主张来呢？形式的工会是不会的，它要的是独自的统治，用不着和别人联合，并且又有谁敢于向它提出共同行动呢？形式的工会以外，原来不许第二个工会存在的。当然，下层群众中自觉的，有民族意识的分子是不少的，并且他们坚决勇敢也高过其他社会层的人，但是中国人的爱国的前进思想只能蕴藏在心里，就是好友间也不能剖心相见。这许多个别的分子，在非常的环境下被人监视着，你能提出什么来呢？自己没有法国前进工会的地位，人家也不能以平等待你，来和你谈什么联合阵线了。

再说到农民吧！在民族抗争中，无数的中国农民也是主力之一。中国农民这几年的反日抗争，义勇军运动也处处表现他的光荣历史，就全国说，农民间是更缺乏组织的。中国今日的民族联合战线，也决不是由农民方面提出的，农民目前要求的是组织，并不是一个组织与另一不同政治主张的组织谈联合。

如果说到下层联合战线，我想不能不是指工农大众了。我并不反对中国民族战线也有下层联合战线，工人统一抗日救亡的行动，工农统一救亡的行动，工农大众构成民族战线的基础（因为工农占全民族最大多数），可是，中国民族联合战线结成的过程，我却看不出可走法国人民阵线的道路，中国民族联合战线发展的道路，我以为不能看得太机械，中国今日社会的实践，决定了它自己的发展。

这一发展的形势现在是否可以看出呢？

自然可以看出，因为民族联合战线的结成的过程可以说早开始了。我和几个朋友有这样一种理解，觉得我们这里的发展路线，不是自下而上，也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民族的联合战线的性质，因为不带那样严肃的阶级性，所以它的发展形式可以现出另一种姿态。

去岁"一二九"运动以后的事实告诉我们，联合救亡这一政策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政党单独提出来的，而是代表了全民族每一个人的要求，通过千万知识者的口而喊出了。广大的学生救亡运动，首先取得了法国工人在人民阵线开始约莫相似的地位。"一二九"以后的运动，又喊起了无数的知识者，知识者在这救亡运动中，几乎无条件的接受联合战线这一正确的政策，虽然，大家对这政策的了解，不免还有许多怀疑，或不同的意见，但对这一政策的了解渐渐深入是一天天可以看出的。以上说的沈章陶邹四位先生发表的高见，更是正确的反映了这一政策发展的过程。他们的意见，如果站在一个政党的立场，用政党的偏见去看，自然要感觉不彻底，不充实，也许还觉得太作好人，太幻想了。但作为一个联合战线的发起人，按着知识者今日在救亡运动中的任务，那末，他们那篇文章说不定将来要成为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件呢。

是的，中国民族联合战线，发展过程的起点，我们看出是落在知识者层间，知识分子成了这一政策的发起人、号召者。不过，我们不能说他是民族联合战线的基础、主力，因为这是要受它的社会层的属性所限制的。这一个起点，却非常重要，它指示了我们向前发展的道路。无可否认的，到今日止，联合战线全过程最

初的阶段还未完成，当前不过在意识方面，获得相当广大的影响罢了。这一最初的阶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

扩大对民族联合战线的了解。

促成政治上各种不同派别的人，放弃过去成见，相互接近；尤其重要的是尊重一切既存的政治权力（包括军事实力），停止内战，开始联合抗日救亡的谈判。争取爱国自由：言论，集会，组织等最低限度民权的绝对自由。

在这一阶段胜利上，展开民众爱国组织，将广大的劳动同胞的抗日救亡的意志统一起来，将工农两大民族主力，结成一条所谓下层联合战线，开始武装民众，建立全国抗日政权，统一抗日武装，达到正式和敌人进行民族战争。

即令神圣的民族战争已经开始了，并不能说联合战线的使命终了，因为联合战线下并没有消灭内部的矛盾，联合战线也并不是静止的或机械的在运动，它是时时刻刻在改编、变化中。在过程中，中途退伍，变节，旧的参加者死亡，新的战斗员成长，这里量质的改变，是会以非常的严肃的姿态出现的，这并不是什么不能了解的事啊！

决定联合战线往后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推移，保障民族战争的持久性，顽强性，一直到最后打败敌人，取得民族解放真正的胜利，这要靠什么力量呢？这正是现在有许多人已经说过的，要靠下层联合战线的巩固．只有下层联合战线取得广大的胜利，才能确实的把握住。

总之，关于中国民族联合战线缔结的过程的了解，我以为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即民族联合战线开始的活动者不是工会员，而是醒觉的爱国的知识者，他们以发起人的资格，举着联合救亡的

大旗，号召民族的联合救亡运动，争取爱国自由，争取下层联合战线生存、发展的条件，建立、巩固下层战线，配合上层战线，进而下层战线以主力的资格去推移战线前进，一直达到最后胜利。

中国民族联合战线的过程为什么不能走法国人民阵线同样的路呢？开始就从下层做起不更彻底么？我的答复是：这话是说的最漂亮的，可惜中国缺少那样的条件，我们既不是幻想家，我们无法模仿呀，中国的政治的民主性的薄弱，中国革命的威胁，中国工人政党过去现在和政府的对立，不仅在政见上，并且化为事实的政权与武装的对立，彼此进行连年的持久战争，这一种事实，是开世界史上没有的先例啊。大家的感情弄得很坏，恐怕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吧！因此，劳苦大众的自由的被剥夺，说话就犯嫌疑，即令你是出于爱国真诚，你说出的话人家也难以见信，这样要来谈联合，恐怕是最困难的吧！知识者却不然，他一向保持中立，他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本来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联合战线既不是一个阶级的政策，由他们的口中说出，大家都相信不是什么人在后面把持，利用，他们的话，大家最听得入耳，这些优先条件，中国工会会员是没有的。

这样发展的形式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也是由于中国今日社会的条件决定的，并不是一种幻想。自然，这种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抗争过程。天下事决没有不劳而获的呀！同时，我要附笔申述的，就是我们并不要机械的理解这一个过程，尤其不应把假定的阶段等类的话，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东西，在开始第一阶段中，在形式上好象我们只注意上层联合战线的建立，但我们决不反对下层运动，相反的是在创造下层运动的发展条件，我们主张

各党各派合作，自然也包含最大的中国下层政党在内，就不能说，我们忽视了劳苦大众。同时我以上说的下层联合战线当前缺乏发展的条件，并不是说就不能发展，要等到条件够了才运动，恰恰相反，我的话是就全过程说的，至于就各个方面说，我们并不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就不活动，不过，我们不能把全过程发展的正确的一环忽视了，使救亡运动在狭的笼里窒毙。

因此，我个人对于沈先生等的那篇文章，觉得发表得真巧妙，使我生出无限的兴趣。刚刚在这时候发表了，这是何等的灵活的反映了联合战线第一阶段中的实践呀！

这一阶段到今日止方在发展中，联合战线当前最实际的任务也就在如何完成这一阶段的工作上。我们不能满足一切美丽动人的辞句，我们不应经典的去理解历史的教训。至于法国人民阵线我们可以效法的是些什么呢？是它的活动的艺术，工作的方式。

在当前，我们走的还是第一段路，并且不易走的道路啊！历史分派给我们这些知识者先走了。

我们怎样展开新的运动，使这一段艰难的路程缩短呢？

民族危机一天天严重了，我们要限期完成这段工事，民族的联合战线由中国提出一个辉煌答案来吧，发展的道路是摆在我们眼前了。

联合战线下的理论斗争

联合战线这一个口号，在民族新的危机之下被人提出，无疑地是万分正确的。这一个口号是民族救亡阵线组织的最高原则，只有这一个口号正确的运用了，民族阵线才会从意识的过程进入实践的斗争，民族阵线才会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条有力的战线。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也只有这一口号百分之百的实现了，举国之战才能形成。这一个口号的提出，在救亡运动的阶段中实在有着划时代的斗争的意义。

是的，我们要感激“一二九”的运动，把这一个口号反映在中国论坛上了。“一二九”以后全国各种定期刊物上大致的都讨论到这一个问题了。就是在下也曾对这一个问题写过几篇文章，发表过一点私见，不过，截至目前止，据我个人狭窄的见闻所及，对于这一个问题的讨论还是感觉万分不够的，并且一般的持论，不免多偏于表面的解释这一口号，说明这一个口号的意义，对于这一口号实践的斗争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上，还缺乏更深入的讨论，我们不能不认为这还是论坛上的一个缺憾。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否认这一个口号已在千千万万人的头脑中和行动上发生力量了，但在整个的救亡运动的配置上，我们却不能否认我们运用这一口号还不够，甚至太拙劣，不灵活，致发生自己的行动妨害了联合战线。“到底在联合战线下，我们应

该怎样行动呢?”这类问题已经有几位在实践的运动中的朋友和我讨论到了。这确是这一口号由宣传进入实行中应该讨论的问题;同时要阐明联合战线的斗争的意义,我以为,也只有在这一口号的运用中去解释,才能得到更明确更现实的意义。

我曾用“把千万颗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去形容联合战线,最基本的说明了打枪的人不必站在一个立场,联合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它是许多矛盾的一种综合,并不必消灭各自的矛盾”。在当前中国民族的危机下,不甘作亡国奴的人,并不限于某一个社会层,虽然劳动大众是主力,但其他各社会层,即令是民族资产者和地主,他那社会层虽然不免带着非民族性,但那阶层中的个人并不是个个都没有民族意识的。我们要扩大民族的抵抗力,是尽可能的动员每一个不愿作奴隶的人,形成一条广大的战线。

然而,问题就同时来了,这一些人,虽然在救亡的意识上是一致的,但救亡的方法上并不见得能完全一致。因为他们各自生活着的社会层既然不同,他们的利害仍然会使他们生出不同的主张的,联合战线不是建立在消灭各自所代表社会矛盾的幻想的基础上,同时也不能建立在空洞的爱国的概念上,联合战线真实的基础是建立在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策略与战术上。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策略与战术,因为在当前救亡这一目标是容易被大家所认识,但策略与战术却很不容易为大家所领会。救亡运动的实践的斗争是正确运用其策略与战术。一个参加救亡运动的集团或个人,如果不能接受最能实践的策略与战术,他就在客观上妨害了运动,间接的帮助了敌人。联合战线的巩固,就是在战斗的策略与战术上,争得最大可能的绝对多数参加者的拥护

与执行上。因为联合战线可以说是战斗的同盟，但同盟作战大家是应该服从整个阵线指挥者，按照当时敌人及自己的力的对比及其他一切客观形势而作出的战术的。仅仅目标相同而游离了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不能结成联合战线，因为没有统一的策略与战术就不足言战，不能成立联合阵线。

联合战线我们应该在一种动的状态上考察，矛盾而又一致中考察。这一战线是时时在改编，在变化的；这一战线参加者是许多不同观念和利害的人在共同利害上一时的结合。联合战线只存在在作战中，彼此的一致中，离开了“战”，就说不上联合。

那末，在联合战线下，我们对于盟友应该取怎样的态度呢？在联合战线之下，我们还有不有理论斗争的必要呢？

一般误解联合战线的人，以为我们既然共同站在一起了，我们盟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斗争的；战争既然高过一切，还谈什么理论不理论呢？

这一种意见，乍听起来是十分动听，实则是似是而非的。我在以前说过，联合战线绝对不就是消灭了阵线内部的矛盾，并且联合战线本身也就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存续着。盟友间的斗争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策略与战术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斗争的过程。联合战线内部可以说是全赖这种斗争而生存、发展的；策略与战术的争辩必然为战线内部中心问题。正确的策略与战术决不是单凭一个伟大的人物所发现，而是生长于实践的斗争中。所以，因着联合而惧怕内部斗争而回避应有的斗争，不独不是对联合战线有利，而是对于共同的神圣的战争一种不忠实。因为我们所要争取的共同的胜利，是要凭最正确的策略与战术的，我们

畏惧为真理(指策略)而战,我们就不能取得为真理而战(指共同对敌的战争)的胜利。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事。

但是,战线内部的斗争却有一定的限制,那就是因为内部斗争应集中在策略与战术上。在联合战线之下的理论斗争,它必然是通过策略与战术,而采用最实践的姿态。本来策略上的斗争在本质上也显明就是理论的斗争,因为策略的正确与否也每每为理论所规定。不过,策略并不能全部的反映他的理论,因为策略所表现的到底还嫌限于一个时间,一种形势;主张某一种正确的策略的人并不能反转来说,其他的理论都正确。因此,理论斗争也仍然存在,并不能因策略的斗争,而可以取消理论的斗争;在联合战线下,策略与战术的斗争虽然占主要的地位,理论的斗争虽然大半采策略斗争的形式,但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理论斗争了。不过,这里千万要注意,这种理论斗争不要妨害联合的破裂,这里的斗争,要特别谨慎,不要因为"纯粹"理论的斗争而影响共同的作战,分散了联合的情绪,给与敌人一种分化利用的机会。

联合战线之下的理论斗争,应该是针对那理论直接间接妨害当前的策略与战术为前提,不是作纯粹的理论的斗争。甚至在这时,我们可以和缓抽象的争辩,不批评他人,不作理论上的敌对;代表正确理论的团体和个人,应该抱教育者的态度正面的去说服他人和传播真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人,不是直接打击他的思想和理论。我们应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联合的行动在进展,不要丝毫滥费不必要费的精力,我们要把我们的斗争用到更适当的场所。

联合战线下的理论斗争是取同伴的态度的。我们要鼓励

人，说服人，与对敌人理论斗争的态度有别，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在共同作战，我们的斗争是为的我们对于共同的使命能尽最大的任务，不能象对敌人一样，可以给与无情的打击，粉碎。

但这决不是说，在联合战线之下，不能作理论斗争，或不要理论斗争；恰恰相反，理论斗争是需要的，但这斗争的形态应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与斗争结合的形势上。

无疑的，在当前救亡运动中，联合战线的运用，在这一方面也没有做到这一地步，这是一个弱点。尤其在整个民族救亡战线尚未形成之前，在意识的领域内，不能应用联合战线这一原则，客观上反生出对联合战线组成上一种反作用，在意识上反现出一种分裂，不能合作的情绪，阻碍联合战线的建立，无形的给与了敌人一种利用或分化的机会，这是当前特别令人惊惧的事实，马上应该起来纠正的。

我以为，当前文化领域的一切理论斗争，要马上接受和运用这一个政治的口号，把它作为文化的现阶段上理论斗争的一个最高原则。正确的理论，一定是能领导实践的行动，为行动的指标的。离开了当前实际的任务，纵令如何操着进步的调子，那终不过卖弄卖弄风情罢了。那是对于自己的任务不忠实。

当前理论斗争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对于敌人和同伴应该取着什么态度呢？我们应怎样检阅目前的一切论战，认清论战的性质，而将我们斗争用到更适当的场合上去呢？这一切的课题，已经放在每一个负责任底文化人的肩上了。

联合战线在文化界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前最主要的内容是抗日反汉奸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战争的进行，是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组成民族阵线，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或某一部分民族英雄单独来负担的。此外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了。

由这一个最高的政治的原则所指示我们的，是文化上也需要一个联合战线，这和政治的联合战线相同，是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一切清醒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造成一个联合战线。它的战斗的任务是统一和集中文化的力量，造成一个民族自卫的精神的堡垒。一方面它要担负对侵略者和汉奸反民族的文化侵略战线作殊死战，一方面要整齐大众斗争的意识，动员一切不想当亡国奴的大众的"灵魂"，配合着政治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忽视了这一面，很容易走到单纯的军事冒险，民族斗争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文化方面如果不接受这一政治的最高原则，巧妙的统一内部，也决不足发挥政治的要求，不足担负起精神的堡垒的职责。

现在中国文化界内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切文化工作者对于联合战线这一战斗的口号有了一些什么反映呢？

侵略者和汉奸反民族的文化侵略战线，是以联合的步调傲然取着攻势的；至于民族的文化联合的自卫的壁垒，无数的还在创造的途中，现在现出的现象还是取着散漫的、各自的游击方式，无力的在那里单独对敌人作战。文化界内部还不免有着各自的意见的歧异，忘了保卫民族这一主要的前提，在那里私斗，客观上分散了自己的力量，给了文化敌人进攻的许多便利。

至于广大的文化工作者这一方面呢？ 全文化界今日的现象，已够说明他们的态度了。对于联合战线，有的虽然接受了，但还运用得不够，或者运用得机械了；有的还在那里徘徊，也还有人忘不了私斗，很冷视它，以为文化界内部是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可言的。

这是当前中国文化界非常危险的现象。

每一个忠实的文化工作人员，大概都承认中国文化当前的危机和整个的中国民族一样，敌人的势力在目前都要压迫我们，并且都是取着攻势的。在文化侵略上，文化的内奸出卖中国民族灵魂的无耻，往往还超过政治内奸出卖领土，因为前者断送民族的前途往往更大过后者，虽然这两种汉奸原是出于一家门的，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分。

我们打开眼睛看现实吧！

东北四省的奴化，已无民族文化可言，到最近连河北战区也在内，语言文字也不能自由发展了，侵略者的语言成为必修科目，学校课本均加修改，以消灭民族意识为他们的原则。东北今日不仅看不见国内稀有的几种前进刊物，就连庸俗的日报刊物也是绝对看不见的。东北今日的留日学生，他们的待遇听说比朝鲜人还不如，集会、结社、言论都是不能自由的。在今日华北，

尤其是冀察政委会统治的底下，已有人喊出实施国难教育的困难了。至于提倡王道，尊孔，读经，存文，叫女人回厨房去，不准人民过问政治，则不独是我们的敌人的文化政策，在我们的国内，也是有人正在那里一唱一和，以统一的步调在执行的。为了敦睦邦交，我们说话的限度已缩到只能谈天气了。出版界只能翻印古书，日报变了无消息可看，杂志动辄遭停邮、封闭，甚至连苦笑都得留神，幽默讽刺的插画也有遭警告的危险。至于因文字或说话不慎而入狱、迫害的事，更成了家常便饭，敌人可以直接下命令禁止我们言抗日，刊物上现在要勉强说几句话，就不能不到处都是电网，文化工作人员是最爱自由的，可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自由，现在是尽被剥夺了。

这不是对任何一个个人的危害，这是对全民族灵魂的危害。不独是我们个人不能容忍的现象，也更是民族生存上不能容忍的现象。

可惜的是：在这样的强敌当前，我们的文化工作人员还没有结成一条自卫战线；我们眼见我们自己的友人，各个的被敌人击破，而不想法子来自谋团结。

这种现象是再不能让它继续存在的。

我们应该怎样来了解这联合阵线呢？

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我们这些号称文化工作的人，大致都是小所有阶层的人，我们意识上还保留着许多士大夫时代气习的渣滓，特别容易闹脾气，弄小心眼儿。在大事上不注意，却忘不了一己的私仇私怨，把立场分得太严肃，常常夸大了次要的对立，让共同的敌人站在一边狞笑，结果弄得文化界只看见一种混战状态，很少了解在共同的问题上，一时的用统一的行动来解决

一个实际问题。这也许是所谓文人心直，不懂得政策的运用吧！

譬如在目前的中国文化界，一切文化人除开那部分在那里作文化汉奸的人外，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对立不是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的对立，不是生之严肃与生之浪漫的人对立，不是学术上某一宗派与某一宗派的对立，不是幽默不幽默的对立，不是文化市场上分割的对立，更不是私人间有了什么不痛快的那种对立。这些对立我们虽不否认其中有一个根本不能调和的一点，那对于世界的态度，对于中国将往何处去，各人不免在自己的肚子内已有主张，什么人也不能相强，绝对不会一致的，但在某一场合，在民族存亡的这一场合，却不能说就不能综合以上所有的对立而成一种共同的行动的。联合战线，并不就要消灭各自的根本信念，联合战线反是为了利于自己的存在的一种共同行动。

在当前合作的条件简单得很，你主张对敌作战呢？还是投降？ 你让民族（自然也包括自己）灭亡呢？ 还是要求它的生存？

这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每一个知识者不难了解的。

现在是行动的问题了。

如何巧妙的去进行这种联合的阵线呢？

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当前的救亡工作中，只有大家在救亡的行动上，在对侵略者汉奸布置的反动文化阵线一种共同防卫和反攻，我们彼此间才能放弃一切次要的对立，变成一条阵线上的朋友。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了并且感觉到我们应该有一个联合战线的必要，我们既然站在一起来，就是过去红脸对白脸的闹过一些什么鸟气的，现在也就应该一笔勾销。不妨彼此心平气和的，从新做一个好朋友。自己还没有参加进来的，也应该马上走

进来。自己已参加进来了，我们对于许多在门外的徘徊者，应该善意的去邀请、督促、批评、引导，不可意气用事的，操之过激，促成他悲观、消极或到反动阵营中去。

我们对于可能作同一阵线的盟友，要格外宽容，我们除了对付当前敌人的策略与行动一点不能丝毫忽视外，对于其他的一切均可暂时放松，在意识方面的斗争，也宜取友谊的批判，同志般的说服，不要把阵线内部的斗争弄得过于尖锐，妨害了共同作战的情绪。

对于一切幼稚的言论和行动足以妨碍联合阵线的组织的，或妨害盟友的，我们一概要加以制止、纠正。每一个文化单位或不同的宗派、团体的内部先应该统一自己意见，制裁内部幼稚的行动。

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知识者，尤其是所谓有身分有地位的人，我们觉得应该先丢掉一切成见、架子、难为情、偏见、顽固等，对待同一条路的朋友。自己勇敢的站到斗争的前面去，领导后进，我们不要怕人家过去对你怎样，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只要当前的行动是正确的，"事实胜雄辩"，我们怕什么人言呢？

真理总是在多数一边的。多数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全中国大众无论在沉潜中或怒吼中，站在救亡一方面来的总是绝对多数，汉奸在对比中，只占极少数的几个，在文化界，情形也恰恰一样，我们能永远自己无组织的让敌人来一个个消灭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钢铁般的文化堡垒么？

不的！我们能够建立！

一切有"良心"的文化人、知识者都有起来保卫中国文化的

职责。

我们要消灭目前的无组织状态，用文化的联合战线保卫中国文化，完成文化上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

再论联合战线在文化界

在四个月以前，我在《大众生活》上写过一篇《联合战线在文化界》，现在回溯这几个月中国情势的变化，无疑的联合战线已在各方面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在文化界方面，譬如最近上海文艺家协会、著作人协会的相继成立，舞台联合战线的号召，全国学运的统一，均表现出联合战线在文化领域内已经比四个月前有了进展。现在公开出来反对联合战线的文化人，除开“别有用心”的极少数人外，是没有了的。联合战线这一新的救亡政策，算是已被文化人接受了。

因为这一新的救亡政策在一般的了解方面尚甚贫弱，所以反映在文化界也不能两样。 当前联合战线在文化领域内的发展，不免仅仅是偏于形式方面的，就是在“大义”上“说服”了一些人，做到了形式的联合，至于联合的“战”并未好好的做到。联合战线在这一领域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怎样联合进行思想抗争？怎样肃清宗派的见地？怎样纠正过去狭隘的工作方式，制造新的工作方式？这一些问题，有的刚刚才被人提出或想到，有的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

我们还不能说联合战线在文化界真的已取得了胜利。我们今日的成就，还只能说仅仅创造了一点它的发展条件。怎样在今日的条件上去发展它，那就是当前最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如此，

我就感觉到在四个月前写的那篇文章，现在有加以补充的必要了。

自然，我所看到的也还是属于个人的私见，未必会是甚么“高论”，好在在今日联合战线下，我们彼此间的说话是更自由了一些的，姑且写出来，作为大家讨论的参考吧！

我记得有人说过，在文化上的分歧，有时比政治上还复杂得多，文化界的战氛，有时超过政海的险恶。这话如果过细思量，也不能说它说得过火。文化的领域是属于整个意识的全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反映在意识的领域内，形成复杂错纵的现象是不足怪的。文化界的分歧，文化人间的对立，不必从理论去说明它，只要你在文化界内混过一些日子的人，一说起来，总不免要觉得头痛吧！现在由于民族的危机给与大家生存的威胁，促成了在救亡自救上发生了同一，但是要组织它，把许多不同的见解的人，造成一条联合战线，这不能说不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这决不是杯酒联欢的方式可以达到的。

联合战线最基本一点是在“战”上，不仅仅在形式的联合。形式的联合也是联不起来的，要“战”才能把无数个别的单位发生有机的关系，才能在行动上联起来。但是怎样“战”呢？在文化的任务上是进行思想的抗争，是当前政治的要求通过全意识领域内的思想抗争。我们抗争的对象是代表敌人政治要求的民族敌人和汉奸的思想理论和一切落后的意识，有帮助敌人或阻碍民族解放的思想的东西。是的，“战”不是某一宗派单独负担的，是联合的“战”，这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这战线内既然是由许多矛盾综合成的，我们的战略呢？是否要我们内部一部分人牺牲尽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完全接受一种最前进的立场和意见呢？

还是各自的立场和意见仍可以保留住？如果说，你要参加联合战线，你就得首先放弃一切，完全接受最前进的一切，那必然就有许多人不要进来，同时那也说不上是联合战线了。如果各自仍保留他的立场、意见，那枪法就会呈出多样的状态，要怎样才不致乱枪法呢？

无疑的，是有许多人在怀疑。打开窗子说亮话，有许多人不放心，怕自己受人家利用，怕联合战线只是某一党派的一种阴谋。他在原则上不反对，但他不能不慎重。也许你今日召集他来聚餐，他来，但他在吃饭时，他就不免要低声的在桌子角边和他的至友咬耳朵，问这聚会主持的是一些什么人，有不有其他的作用，他在打听消息，这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中国政治上一向是用阴谋来作战术的，这种阴影反映到文化，甚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提防的心是可谅的。但问题在怎样才使人能相信呢？

这绝不是用语言说得清的事，怎样表明今日的联合战线没有什么党派的利用，没有阴谋，完全出于大家的真诚合作呢？联合战线如果在某一领域内没有极具体的内容。单说放弃成见，反对宗派主义，对人要宽容些，那都是抽象的名词，不能说服人的。何况文化领域的复杂性，就不容你卖弄辞句！你越说，人家越要怀疑到你有什么阴谋。

这里你拿出你的赤心来都没有用处，要的是有使人不疑的事实，我们文化领域内，各种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宗派的人到底怎样联合作战。所谓放弃成见，互相宽容，反对宗派主义，不必在口里唱，要用在行动中去，要把联合战线的内容弄得十分具体、明确，大家心中都明明白白，知道没有什么阴谋在后面，各

人都愿意战，在那里战，并且尽自己的能力在那里战，那才能说一声联合战线在文化界真的得到了胜利。

那末，这具体的内容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离开文化界的现实而高谈什么联合战线；这内容也完全由文化界的现实所规定。联合战线的建立，不应该再走狭隘的找自己朋友来参加的路，而是要把大门打开，把全文化界所有的集团和个人，即一切不想当亡国奴汉奸的文化人都欢迎进来。意识斗争不比军事行动，要等什么动员令，在文化方面，对敌人和汉奸的意识斗争是早已有了的。现在要意识的建立联合战线，那不过把这些零散的战斗组织起来，扩大起来，作出更有效的战斗的计划，统一最基本的战术，同时战友间建立一种更友好的关系，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了联合对付当前的大敌，我们内部暂时宣告休战，或是在不妨害联合作战的原则下，作友谊的批判。联合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不是由任何阶层、党派所操纵、包办。我们对于参加战线的人，只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他要救亡，他愿意把他的能力献到争取民族生存上面去，但我们无权力要他放弃他的出生的社会层，他的政治的主张，他的独立的信仰，来归依我们。我们也无理由去计算他的能力的大小，因为太渺小而忽视他们，把联合战线内的分子理想化、抽象化，以为要和我们联合，一定都要和自己一样高矮和最前进的分子一样能干，以为参加到联合战线里来了，就完全失掉自己的独立性、自由，事事要受到限制，要唱一样的歌，写文章要用一样的题材，标榜一样的主义，把各自的文化职业兴趣、修养等的特殊性都要放弃，要把许多活泼的人弄成了一个机械，不如是，就不是一个忠实的战友，我们就要裁制他，如果要是这样，这

哪里是什么联合战线？哪里有谈联合战线的可能呢？

联合战线的真义是要发挥各自的能力呀！是要不放弃一分可以用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抗战上来的能力在抗争以外呀！每一个盟友在主要策略下要服从盟约这是对的。在战斗方面却是要各自发挥他的能力为它的特色。举一个例来说吧。

譬如我们对于“走私”应该怎样发挥我们文化的任务呢。

一个财政学者他尽可以站在国库的收入，国家的预算平衡上去反对它。

一个法理家，他尽可以法理的立场，发挥敌人破坏我们的海关是违犯了神圣的法权。

一个民族资产主义的学者，他可以站在中国民族工业的立场，说它破坏我们的民族工业的理由去反对它。

一个纯粹的爱国民众，他从中国主权，从敌人这种用政治优势进行经济侵略的理由去反对它。

没有什么专门知识的人，他或从道德上、国格上反对这种强盗行为，甚至有人说这会把我们应付外债的基础动摇了，也似乎在这时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至于哪一种反对才是对的，这里我们不应管它，我们虽然在对这一问题，应该有最正确的意见，最有力的反抗，但我们同时不能不有这许多，虽系偏于一面，但仍有一部真理存在的意见。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反抗之声，相反的，我们要扩大这种反抗之声，使每一个人都起来反抗，都对这一个问题说话，你只看见某一面，你就说某一面的话，你只能代表某一部分人说话，只要这问题是关系大众的，就由你说去。我们要各阶层，各党派的人都说话，都起来反对，这反对才能变为

更有力量，这声音才能变为怒吼。大家看见各人都在说自己心坎中的话，没有人出来阻住你，他自然愿意多说，更说得有劲，不会怀疑有人操纵，有什么阴谋。这样各方面的，不齐一的抗战，混合起来，才会成为真的广大的联合战线，才是真的联合战线的实践的内容，联合战线才不是一句空话。

再就文学方面说吧。

我们可以在这时候向一切作家们提出一个最实践的写作的倾向。但不是要强迫每一个作家都皈依到一个主义上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作家的生活的环境不同，他只能写他熟悉的东西，你要个个人都把笔来写“走私”，写“义勇军”，那会产生张资平写革命小说的笑话。在创作上相当的自由还是要给与他的。同时我们要知道，现在许多不同倾向的作家还能够存在，是他们的作品还有人要看，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还有一部分人只能接受他们的东西；太前进的东西，还没有说服他们。前进的见解还要通过这些中间的东西，才能打破他们的成见，才能达到他们的脑子中去。我们空口来反对这类作品那是无用的。联合战线其所以要在文艺方面运用，就因为我们的倾向本来就不能一致，也并不暂时的强求一致，是在一种策略下，在救亡自救上求一致。

那我们要怎样运用呢？

就是也象以上对于“走私”的看法一样，只要你在写作上多少反映了现实，或是前进的写实，能够正确的指引方向，激发大众的情绪参加到抗争中来，或仅做到暴露使大众对现实的不满，要求改造；或还不能谈暴露，只是挖苦几句，打趣一场，使读者对现实不安起来；或者对现实虽然没有多的接触，但不麻醉青年，

不替敌人和汉奸意识说教，这也可以使读者不走入邪道，这些不同程度的作品，我们似乎都无理由反对它，一定幻想它能够一致，并且在文艺园地也只有在这样宽容下，肃清了宗派的狭隘的偏见，让它自由发展，它才能正确的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全面，才会丰富起来。自然，一种最前进的向导的倾向是要的。但你不能孤军抗战，你不能妨害别人的发展，应该配合这一切的力量，形成更大的部队，也只有做到这地步，文艺方面的联合战线，才能结成。

其他文化领域，我想也大略如此；要这样，联合战线在文化界方能开展、深入。联合战线的内容，才能使一切的人明白，一切怀疑、观望、畏缩、不怀好意的心情，才能洗尽。

这是不是用话说得清的呢？我已经说过，那是不可能的。这要在行动上做给人看。我们用不着一点手段，一点虚假，我们要求的是最大范围每一个文化集团和个人都来参加，并且是自告奋勇的来参加，是在防地已经分好，前线上已有战事了，不过为了取得各战野意识的联络的一种结合啊！

如果我以上对于联合战线了解的话是不错的，那末，基于以上的内容，我们对于过去的文化工作就得加一番检讨，作一个自我批评，每一个文化人，似乎都应诚恳的来反省一下，找出过去自己的缺点。所谓宗派观念，关门主义，不容人，对不应该怀疑的朋友怀疑，我们在新的抗争前，都应该赶快去掉，我们不能让一点残余，妨害了我们工作的开展。在联合战线新的开展前，大家要虚心的来讨论新的工作方式，学习一切新的工作，展开全意识领域的文化斗争。

当前文化运动的工作方式的问题

无论一种什么运动，当这运动在进展中，最最重要的实践的问题之一是工作方式的问题。工作方式的正确与否，往往影响这运动的开展或停滞。一个实践的运动者，在运动中，无不经常的检阅自己的工作的方式，使它合于工作进展的阶段和地方的实际状况，活泼的把运动推向前进，忽视了这一方面，他的工作无形的就与实践分离，成了工作的机械的执行者。

但工作方式的问题是不就是一个工作的技术的问题呢？

这并不！

工作的方式是受运动的任务与政策决定的，任务指示了运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政策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执行我们的任务和达到我们的目的。工作的方式的问题是发生在这政策的运用中。固然，这里包含有一部技术的问题，不！说得更正确些，这是一种艺术，是一个艺术的问题。不过，这种艺术，并不单是由于天才的创作，而是对这运动的任务与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属于技术的部分，只不过灵巧运用中极小限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工作方式的问题看做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问题。

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吧。我们来考察文化运动现阶段中的工作方式的问题。

当前的文化运动的工作方式是受着什么所规定的呢？

这里，我们还不得不追问中国文化运动的总任务这一个问题。这是容易答复的，我们这里所谈的中国文化运动，是鲜明的以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为目的的，我们毫不踌躇的承认，它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运动。这与“复兴民族”的复古运动，抽象的“文化建设”和所谓纯粹学术运动，为民族的点缀与粉饰等的一切少数人的所谓文化运动完全不相干，我们这里指的文化运动，是属于大众的实践的民族解放抗争在文化方面所分担的问题。

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民族解放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发动民族自卫战争，保卫领土完整，挽救危亡。自然这一个任务也就是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但是怎样达到这任务的实现呢？这就是当前亿万人正在大声的疾呼，各阶层的个人和群团彼此放弃过去政治上的思想、宗派、成见、私利，大家合力，造成一条钢铁的民族联合战线，共同的挽救危亡。这一种呼声现在已经在大众中获得空前无比的响应，并且在事实上已取得部分的实现了。这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现在已证明它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已经认明，只有这一个正确的政策，联合战线在全国规模之下实现了，汉奸们才能不再强奸人民的公意，民族自卫战争方可在全国规模之下进行，民族敌人的侵略才能被我们所击退，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才能够实现。是的，这一个政策，是中国当前新的形势下，实现民族自卫战争口号最基本的政策，最具体的办法，并且它要求我们系统的运用和民族抗争各方面联系起来。所以，无疑的，这一个政策在文化运动方面，同样的是最基本的政策，运动最具体的办法。它对于文化工作的方式的问题，有着决定的作用。

在今日中国政治的新形势下，文化运动要求运用新的政策，在新的文化的政策下，要求有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运动的作风。

新的工作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我以为它不再是和平的文化运动了，不再是限于极少数上层文化人躲在"文化"这一个圈子内一种狭隘的运动了。过去的文化运动，即全是认清了自己的任务，站在最前进的立场，尽过相当的职责，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它的工作方式是非常狭窄的。无论在文化的任何部门内，文化的活动总还是属于少数所谓文人的，文化活动最多也只做到接触着大众，并没有深入大众。

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上，对于文化两字总没有完全排去它的神秘性。人们的眼睛大抵都集注在几个大城市上，齐射在少数知名的人物上。所谓文化中心，就是由这一部分文化人群集的地方，装饰的热闹的部分。过去最前进的文化活动，也无疑的多在这些热闹的所在。一般人一谈到中国的内地或边陲的文化问题，我不禁摇头叹息，因为这些地方一切都比较各大城市落后，自然文化也落后。过去的文化运动，严格的说来，并未成为全国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因为过去的运动是取着自然发生、发展的方向，没有在一定的政策下，有计划的推行的文化中心与内地及边陲取得紧密的联络。运动的形态完全是采自由主义的，主持者是属于最少数的高级文化工作者或名流、偶像。

这种工作方式到今日是完全无用了的。因为今日运动的内容已不是为文化而文化那样虚弱，或只触到大众那种浮面的运动了。今日文化运动是配合着政治的实践的内容，最最当前的抗争的任务是"唤起民众"，形成民族联合战线，达到民族自卫战争；是一种更具体的意识的运动。它不会专在热闹市场赶热闹，

它不会单付托在上层的几个文化人身上。它将是一种广大的集团行动，一切知识者的一种集体的行动。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去岁“一二·一六”以后的学生团的运动中就开始萌芽了。

“一二·一六”以后这种严肃的时代告诉了中国知识者，他们是中国民族解放抗争中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这一来，使文化运动的范围扩大，参加人增多，新的运动无疑的是号召全知识者群每一个人动员起来的，它把文化运动限于少数文化职业者那一道狭的墙壁粉碎了。同时，这里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一二·一六”还告诉了我们，文化的活动者，不仅是做一个宣传者，同时他也是一个组织者。一个文化领域的战士，应该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士，工作在文化方面，不是一个文化的老前辈，以第三者的身分，附带的来赞助民族抗争的。这更把文化运动的主力不仅在数量上加以无限的扩大，同时在质量上也有着本质的改变。

这样奠下了新的文化运动（或大众文化运动）的基础。

新的工作的方式，在当前是一个迫切要求我们了解的问题。因为目前客观的困难，还不能使新的文化运动有顺利发展的条件，目前还是一个过渡阶段；尤其在工作方式方面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正需要学习一切新的工作方式。

我们记得，今日的工作不能忘记是在联合战线政策下进行的。关于联合战线运用在文化各领域内和处理一切战线内部间发生的问题，我想另外专写一篇文章来谈，这里要谈的是更一般及组织上的问题。

我以为目前工作方式在实际上已有一点轮廓了，在纵的方面，即各大城市已多有了文化界救国会的组织（不论它是如何脆

弱，甚至还是官民合办的），这种组织大概都是包含了许多文化单位，形成一种综合的组织的，事实上它是一个较大的地方的指导部。与这组织并行发展，还未加入这系统的，或者派生的文化的细胞组织，各地都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这一切自发的组织，在当前客观的困难下都是必然的现象。这种实践，告诉了我们，纵的发展，要与横的发展并行。我们尤其要加强各地细胞组织的产生的号召，使文化落后的部分，也自己自动起来，不抱着等待什么人来代他们组织的态度，鼓励各角落的知识者，认识汉字而要救亡的人，不管认识深浅，都要他们组织起来。一切集中在都市的高级的文化工作者，大中学生都应该马上推动自己的家乡的朋友、家属、学生等，用各种名义组织起来，切实的帮助他们，供给他们需要的书报；尤其是在文化上有地位的、已经获得家乡信仰的人，应利用各种关系，或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或回乡演讲，或用通信去号召崇拜你的人，叫他们自动的起来，并广大的来号召。这必然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工作的进行，可以取下面几种方式，一种是由各地文化界救国会有系统的号召全体会员切实的执行，作为小组经常工作之一，一种是利用同乡会的方式，有组织的执行，一种是让个别执行，抱着劝教的真诚，去说服每一个在组织以外的人，叫他这样做去。

对于当地的细胞组织，在文化领域内，实在比起农村要容易。这里社会关系很多，或通过职业关系，家属戚友，只要认真去做，没有不成功的。

在纵的方面，我们也不能丝毫忽视，各地已有的文化界救国会，我们要求快把它弄健全、巩固，官民合办的组织也应该马上转变为真正代表人民公意的，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因为没有一个

健全的领导组织，下层的薄弱的部分就无法发挥它的作用，甚至于因为没有工作，无形就消灭了。一切没有加入组织的细胞，就无法与其他细胞联系，受到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也因此不能生长和扩大。横的组织不能取得联系，就不容易存在，不独不容易把他们拉入抗争中来，同时也不容易对付汉奸的打击。

总之：纵横这两条道路，目下都一样的重要，并且在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在发展了。整个的文化运动就将是由这无数的细胞，一团一团行动，渐渐成为全国建立一个整个的运动体。不过，我们的工作方式，即就组织说，据我收到的材料，并不都是正确的在执行联合战线的。我们目下还不免犯着过于谨慎的病，有些地方走到狭隘的角落里去了。

我们应正确的，天才的运用联合战线，在文化运动的组织上，我们无权拒绝任何不甘为亡国奴的知识者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不应悬着一个什么认识的标准，过于对人家的历史加以苛责，我们应放宽大些，只问他现在是否能做我们的朋友，即令他在意识上是落后的，但只要他在救亡上要前进，都吸收到组织里来，我们在组织上教育他们。是的，在组织上，我们仅仅有权拒绝汉奸，或已被我们怀疑的人。

我们要活泼的运用组织，在一切名义下，一切的性质下，把广大的知识者组织起来，尽管在外表上，与救亡运动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或者纯是一种娱乐一种纯粹学术性质，甚至宗教，都无不可以。因为我们可以在这类名义下，集合他们，会见他们，取得说服他们的机会，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带到救亡运动中来，使他们行动起来。

我们还要按照各地实际状况，另有我们灵活的工作方式。在

今日的华北与华中、华南或在外国的侨胞间，工作的方式就不能一样。在华北无论在组织与宣传方面，都应具体集中在天天在变化的华北事变上，怎样和日本以及汉奸直接抗战上，那组织是更当显出是战斗的，并且可以号召文化人到义勇军中去，文化的组织，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不取单独存在的形式，它将天然的附在军事性质的组织中去。在华中、华南就不同，这里文化的组织自然有它的独立性，在教育与组织方面比起华北来暂时的比较和缓(但这里也决不是和平的文化运动)。即就华中华南说，也因地方的实践不同，前者应该多注意汉奸的一言一动，揭破汉奸的理论与麻醉，在后者即负有推动反日反汉奸的作用。在华侨区域，那更不过在拥护祖国的意义上而宣传、组织罢了。

实践的不同而工作的方式不同，这是没有方法一一表出的。前面举的例子，自然还嫌过于简单，不过把它当作一个例子看待罢了，这不是处理一个实际问题。关于在某种条件下面应该有怎样工作方式的问题，那留在以后在专篇中去讨论吧！

总括的说，我们当前文化工作在这新的形势下要求诞生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自然不是由天上掉下来，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且现在已萌芽了。我以为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要求我获得这种武器，因此不揣冒昧的先提出了我个人的私见，以求教于全国文化界的前进。

我希望新的文化运动在新的工作方式下获得飞跃的前进！

一个特殊环境的救亡运动

几个青年朋友最近常和我讨论到所谓实践的问题，他们都是虚心学习理论的人，他们感到"实践是难"！是的，实践比起关起门来读几部书本子，那真是难而又难了。然而，可惜的是光光去读书本子却不是学习理论之道，理论离开了实践，那也就变为经院里的东西了。

这"难"的感觉，"难"的关头，是会降临到一切勇于生之抗争的人们的面前的。我们不要惧怕它，这是参加到抗争中来的最实际的教育啊！并且我们还要知道，这种难关是永远打不完的，真的这比起关公破五关斩六将还要难，因为实践的发展是连续无止境的，并不是简单只有五个关口、六位看关大员，打完了就一切大吉呀。正因为此，人类历史的丰富，人生意义的伟大，也就是在这里了。

我们且就当前救亡运动的实践说吧！救亡不仅是一个人的认识的问题，最最重要的是实践，是有救亡的行动。现在有许多青年朋友也正为这实践的问题在那里苦闷，不获解决。早一年来我看见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愿意抛弃学校、家庭，甚至爱人，到东北去，最近两个月又有中国中部青年朋友幻想到西南来：他们在找献身民族的路。固然，我们对于他们个人行为，除敬意外，我们有什么话说呢？至于说到要救亡就必然要离乡别井，要找

一个用武之地才算参加实践，那就大错特错了。那是把救亡运动限于极狭隘的范围、极少数人的身上，他们忽视了救亡是全中国人的运动，应该有孔都入。凡有中国人的空间，都应该有救亡运动，献身救亡运动，虽然北上抗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即在天涯地角，他生活着的故乡中，也不是没有机会的。这种了解，现在一天天普遍了，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在我这特殊环境中是否应有救亡运动呢？这运动应取何种方式，怎样开展？

譬如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环境，这一个地方的社会基础完全是属于甲的，而统治者却是属于乙。但这乙在当前救亡运动的策略，并不是我们就要打击的对象，因为我们目前集中在和丙抗战。自然，在乙的统治下自由是不大多的，虽然，你的救亡实践并不直接对着乙，乙的心中却很不能自安，他不能容忍自己管理着的人也有独立的人格，发挥与自己不同的主张，他看不惯群众抗争的姿态。你不服从他，他自然可以板起面孔对你。

这里，甲民族的人将怎样自处呢？他们原是独立的人，是有热情的，并且就空间说，他们现在与祖国并没有隔离，他们眼看见祖国蓬蓬勃勃的救亡运动能不动心么？

于是"最前进"的青年间就起了争论了，不用说，这是需要而且必然的。实践的这一课登时展开在这一环境的每一个青年之前了。

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听取朋友们的意见，据说，有人主张这一环境内不应该有抗争，这里是抗战的后防地，我们应该把这里作为训练"子弟"的场所，要实践吧！我们可以办"自己的刊物"，可以做些环境容许的事。相反的，有人却主张有抗争，反对什么后防，对前派的意见完全怀疑，不赞成的态度，主张有国内一般

的救亡组织，有经常的工作，如贴标语示威等。

有人问我道，这两种意见哪一种是顶对的？

我总以为这里的问题最主要的实在不是有不有救亡运动，要不要抗争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这特殊环境深切的了解和运动方式的问题。没有抗争的环境，并不是说就没有抗争的活动。不过，这时活动的方式取着合于环境的条件罢了。我们不是纯粹的客观主义者，我们不能因着客观的压力，就放弃了我们的理想。张着眼睛，等候有利于己的条件到来。伊利契说得好："我们要把握现实的一环"，创造有利于自己向前发展的条件，自己要是一个能动主义者，不是观望者。所以，一个特殊环境有不有抗争，那简直是多余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明白答复，我当然要说"有的"。

但我不同意不管什么环境，都采同一的运动方式。我觉得有许多人对于抗争的了解，实在太浮面。现在有好些人，受了过去中国革命一部分不良传统的影响，把抗争只当做是非法的行动。因为行动完全是非法的，所以不能不有忌避，不能不把门紧闭起来，防敌人的窥伺，结果弄得自己的世界非常狭隘，对于客观环境只能认识大体，对于每一具体的事变，常常不能精确的了解客观力量，误把主观力量夸大，变成了不依照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决定运动方式。做不通，也要做，不做即反动，于是变为蛮干，同时也是盲干，因为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性的不了解，所以他认识的地方并不是具体的地方，只是抽象的地方，抽掉了各自的特殊性，变为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因此也都可以采同一的工作方式，所谓灵活的运动方式，就无法实现，与所谓合法的方式，根本对立起来，不能成为联结的运动。

这种传统为什么在事实的打击中不灭亡呢？

这是因为客观太残酷，在大压力下，许多人根本不能生存了，在不顾性命的关头，人总容易走到极端去，接受了这一个传统，在英勇光辉下，象蛾扑火一样，自己消亡了自己。这样前仆后继的继续这种错误。

这种影响，自然也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救亡运动各领域了。这是我早已说过的。

这里，我说出的这些话，并不是对哪一方面的朋友特意的指摘，不！我是根据一些朋友的传言，作一种假定，如果真的有上面指出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和两方面的意见，那末，我们要做个不偏不袒，真正站在正确的方面说几句话，应该怎样说呢？

现在不要再谈有没有抗争这类的问题吧！我们大家心平气和的来分析环境，估量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有更多的了解呀！我们要把握这具体的环境，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展开我们的活动。不要再把合法和非法对立得太机械，要把它联系起来。合法不是无条件的妥协，而是在一种相安的条件下，培养自己的力量，不要看不起它，轻视它，要把它作为抗争的另一形态；同时非法呢？这是抗争必然要发现的形态，如果抗争要处处合法，那就没有发展可言了。那合法也就变为无条件的妥协，那是可耻的。

我既对于这一个特殊环境的客主两方面，都没有深刻的考察，我自然不配提出最实际的运动方式，但是，就原则说，却也不是不能说几句话的。

我以为这样环境的运动方式应该要独特的发挥它的艺术。

据我所知道的一点而论，这边的主观力量还是很微弱的。因为这地方的特殊性，形成了许多复杂的现象。有最前进的青年，也有未老先腐的少年，其他污七八糟的人和不知不觉的人所在皆是。就一般文化看来，我们就约略可以了然了。 救亡运动是要叫大众起来干的，绝不是最少数进步的分子，用过去的活动方式，抛到街头，让人屠戮，而结果也就什么完事。在此刻似乎争取大多数人到救亡运动中来是唯一中心要求，不是做几个可歌可泣的行动宣传，博国人的欢情而止。

无疑的，要实现这种要求是一种艰难而又沉痛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如此环境下要求实现的呀！我们的人，既然连成群成团都不准许，那我们怎样办呢？

这里我们可以尽量利用此间所谓民主精神，一切合法的方式去进行。不要成大群，就采用小群的方式。不准用的字，我们就尽量避免，可以避免的忌讳、冲突，一切避免开来，好在目前抗争的对象不是他老大哥，那到底比较好做。是的，这里也还可利用这位老大哥和我们仇家的不睦，使他有时得放松一点。为何争取大众呢？在今日最主要的方式恐怕还是“教育”吧！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广大的国难教育运动，说服他们的成见和不关心，打开大家的眼睛，我们要有计划，认清大众的接受性，用各种不同程度和教育方式去教育人。自然，这一教育的内容不是“《圣经》和英文”，也不仅是读书识字，是一种“知即传人”为原则的普泛的宣传国难教育运动，这里教育方式可以采各种各样的形态，同时在教育运动中注意组织。不能成群成团，就采五人团之类的小细胞形态吧！广大的，无缝不入的生长了千万救亡小菌，这些东西越扩大，自己的羽毛是丰厚了些，管你的人的脾气也自然会变好

些的。顺利的条件，不是希望谁的恩惠给与，也不是几千英雄打天下般轻容易取得的，这只有争得广大的群众才有可能。

在自己的力量还不够时，我不主张轻容易发动什么冒险行动，如示威。至于散发救国宣传品，固然也没有不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些东西到底能收好大的效果。如果大众还是茫然，你们又不作更深入的谈话，那末，这些欧化文字写的东西会生什么功用呢？如果把这些行动，机械运用，只管自己有工作，不管这些东西拿出去对群众的影响，对自己活动有无妨碍，这是明明应该反对的。

救亡要有热情、勇敢，但也要冷静、忍耐。我们是否就是永远的准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呢？我们应反对这些，我们到了主客条件适宜于作大的行动时，我们决不应畏缩、顾忌。

我们需要文字教育，但要落后的人、胆怯的人都敢看，看得到，坐在电车上可看，蹲在毛坑上可看，不好写在报上的，就用口补充，要使人人明白我们的行动不超过爱国，因为是爱国，什么事都可公开，公开了，大家都放心，管理我们的人，虽然心中不舒服，拿不出非法的可作证据，落后的人，觉得你们不过如是，又看见你们并不偷偷摸摸，鬼头鬼脑，面上也没有英雄气概，也安心和你谈天，做朋友。

我们不要求急效，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不要只看见合法和非法的对立，看不见它的统一，不要把和平和斗争看成势不两立的对抗。不！它们在一种过程中是可以统一的。

现在不是空谈的时候了。不能不大家放弃成见，我们不要图嘴巴上占上风，我们要在行动中获实证。实践是最残酷的，只要把握住了它的人，才能驾御他，改变现实。

啊啊！我能说的话也就只能尽于此了。我到底自己是个局外人，也许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也说不定，我虚心接受实践中的朋友们赐教，因为现有朋友和我讨论到此，也就不避羞惭的敢于自暴其浅薄了。

我希望实践中的一切朋友们紧紧的握着手，以兄弟的情谊讨论新的运动方式，创造新的抗争艺术。

注：这篇文章原题是《香港没有救亡运动吗？》因为写这篇东西时，身在香港，有许多话不便说出，故用了"一个特殊环境"的话，现在附笔在此声明。——淈

实　践　论

《实践论》，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前言

这一个小册子可以说是《救亡的基本认识》的一个姊妹篇。我们对于救亡有了最基本的理论与策略的认识以后，并不能说我们救亡工作就一帆风顺了。在救亡的实践中还会发生许多问题，说不定我们还要犯许多错误，还有许多困难一时不容易克服。我们时时会感觉自己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们越往实践中去。越会感觉我们要多学习！

这里收的八篇文字，自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私见，但却不是坐在亭子间里空想中写出来的，每一篇文字都是针对着当前实践中已发生的问题，受着朋友们督促，逼得我动手写下来的。虽然，我也知道我这几篇文字，并没有什么大道理，但自己在写出后却感着一种说不出的自慰，因为我所要说的话，倒是恰如心想的说出了。

在文字的内容与形式方面，我在这几篇东西中，尽量在求避免公式主义。我一想到实践抗争中的艰辛，我觉得我应该把文字写得更亲切动人，使忙于抗争中的朋友们读到这些东西不觉得过于枯燥，读不终篇，就要昏然入睡了。

然而，这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实践的抗争中，问题还多着呢！我们要学习的还多着哟！这几篇小文章就作为我对实践中的一切朋友们的一种随便的恳谈吧！如果有人从这些文章中，能

得到什么，那我可不敢居功，那是因为实践启示了他们，真正引导他们认清抗争中的一切的，还是他们在实践中的艰苦抗争呀！

柳　湜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于上海

实 践 论

在这国难一天天严重的关头，一个人的社会的评价，往往是依据他的实践为标准的。这时，大家在无形中默认着：“行动高于一切。”你把你的能力，用在共同的抗争上去，你能获得社会的赞同，你离开了实践，逃避实践，你要遭社会的冷视或唾弃。

自然，这是一种真理。在敌人毁灭你共同的生存依据前退避，什么都被毁灭了，你一个人也不能独存，在民族奴化中，保不住民族的文化，保不住什么更崇高的东西。这时一切民族的精华都表现在抗争中，也保藏在抗争中。

民族的危机的威胁每一个人，扰乱每一个人的心房，使每一个人都考虑到自己如何实践的问题。

热情的青年人容易确定自己态度，虽然实践要受到社会层的根性所限制，但青年人仍少顾忌。他们看重的是实践的最有效的方面，所以青年人喜从军，参加到最前线的工作上去。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学生丢掉学士招牌，好象草鞋一样，到黄浦从军，这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今日青年心理上表现的是直接加入战斗，比起一九二五年来，要普遍万倍，坚定万倍，但因环境的困难，他们正在对这一个问题苦闷，不容易得到解决。

有的青年沉痛的喊出，“找不到死所，——为民族而死的死

所，”他们四方八面在找能领导他们的人，他们准备把自己最后的一滴血，都用到争取民族生存上去。

许多职业青年，都不安于他们的职业，想当兵去。有一位在洋货店的青年朋友告诉我，他的店里贩卖的货，恰恰就是走私来的仇货，他曾对老板反对过，无效，并且遭了老板的威吓，他气得发狂；甚至发生了他要放一把火，把这个店烧成灰烬才甘心，气得生病了。

苦闷！苦闷！普遍的是苦闷！广大的青年们要求如何参加到实践的抗争中去！他们到处乱跑，找机会。他们写给最进步的刊物道：“你们的话我听够了，都懂了，我们要的是行动，怎样行动。空头的话不要说了吧！先生！”

他们看不惯缺乏热情的人，他们冷视一切不能参加到最实践的方面去的人。他再忍耐不住，不能等待了。

这种观念，不知不觉的占着一种支配的势力。就进步的方面说，它也有促进许多踌躕不定、退避现实的人，也不得不来考虑自己怎样参加实践这一个问题的作用。但在相反的方面，他们把实践的了解陷入极狭隘的牛角尖去。好多人误把实践看做是限于狭隘的直接和敌人抗争，误把最前进的社会层的分子的实践作为各社会层的实践标准，误把一个社会层的各个人的发展看做齐一，这样一来，妨害了全国民的联合御敌，阻止了许多可以前进的人站着不动，站在抗争外面。这种狭隘的实践观，无疑的是不了解全国民联合御敌当前这一最高的政治原则。它的本身是反实践的，在哲学上，它是一种机械论，它将妨害全国民联合御敌这一最高原则在全国规模之下取得胜利。

那末，正确的实践观又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的眼睛要看广

一点，要确确实实看在现实的中国，不能单是一种理想，同时要放弃偏狭的宗派性。正确的实践观，是从一种广大的范围，综合而又流动的发展中去了解的。我们要考虑到他的社会层的限制性，他的个人的了解的程度，不能一定强他怎样，强不能为能，因为参加实际抗争是应该自愿的。我们只能看他能参加实践的限度，让他发展，不是说，他只能写文章，不对，一定要拿枪，写文章就不算参加实践，不够。全国联合御敌的原则，是要全国民，按照各人的可能，把自已的最大能力运用到这实践来。实践也无非由千千万万不同的人，有的在战场上，有的在生产中，有的不过动动笔杆，甚至还是在作一只歌，讲一回书，但只要这些方面都反映了国难，都可说他尽了一部分责任，尽了多少，这是不必去问的。固然，我们极盼望大家都尽大的职责，但我们不应拒绝人家尽小的职责，阻止这些慢步走的人，骂他们落伍，看不起他，丢掉他。

是的，社会层的不同，不能作同一的希望，这一社会层能尽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多，是不应生出更大的幻想的。

同一社会层中的个人呢？自然，有最进步的，也有最落后的，你要他多做事，你也应该用教育和说服的法子去做，不是把实践的圈子画得太小，使人不敢进去。

全国民的联合阵线，主要的是不使一个人不能参加到实践的抗争中来，但不作每一个社会层，个人都尽同样的力量解释，他们要把各种各色的人，千长百短的人，都统一到抗争中来，要他们各人拿出各人的能力、特长出来，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就让他自己发展吧。

因此，每一个中国国民，要参加救亡，并不要个个当兵，个个

把职业丢掉，不许人家办杂志、写文章，把实践弄成这样狭仄，不打仗，就不实践，离开了实践。一个真正实践的人并不是这样。他是按照他的生活的环境，在他那范围内，去参加的，只要在他的环境可能内，去参加直接或间接的工作，他都可说是参加了实践，没有离开实践。

至于一个作家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作战，简直没有到过战场，但他根据战士的通讯，报纸的记载，他在远远的后防的书斋，在创作一篇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只要这作家与前线的战士同站在一个意识上，他的写作依然是一种实践的工作，这位作家依然没有离开实践，他仍是一个实践的参加者，不过战斗的领域不同罢了。我们不能浅薄的、肤面的解释实践，以为一个地理学家，必定要把地球各角落都跑光，他才配画一个地图，没有跑遍世界的人，就不能成地理学家了。

可惜得很，现在确实有不少的人有了这种误解了。乍看起来，他是最前进的，实在他反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消灭了一切进步的作用，在分散团结救亡的力量。

这现象，尤其普遍的表现在智识者方面。去岁学生运动中，进步的学生，就因这认识的错误，有把许多中立或读死书的学生当作汉奸看待，或认为无希望不理他们，让他们逃开现实。

在文化界方面，也有许多人还因袭了士大夫的偏狭性，对于自己的伴侣一点不宽容。你说我离开了实践，我骂你陷入了泥坑，专门在小事上斗气，互相不肯让步，弄得风波起伏不定，一团糟，变成了混战的局面。到底谁是实践的呢？结果是不易说，因为即令你在意识上是前进的，或者你在行动上也做得比人高，如果你忽视了帮助你的朋友前进，参加到实践的方面来，那你的进步

的努力也要被这消极的拒绝所取消了。

这不仅是一个宽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对于实践了解的问题。

幼 稚 病

也许是因为自己生得太瘦了吧！常常容易被朋友们疑心我害着了什么病。来到南方，的确不假，身体常常不大安适，体重也轻了五磅了，朋友见面更离不了要问："你不大合水土么？又瘦了。"我常常被这种过于好意的关心弄得不安，因为自己本来没有什么病，而偏要被人误解自己是一个病人，我不大高兴。我怨恨自己不能长得胖团团的，使人一看，知道自己是很健康。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瘦子是不容易发胖的，这与穷人不能马上变为阔人一样，我的要被人们的误解大概是不能免的命运吧！我只得退一步想，也好，人家的关心，也还是可感的。我可以多多注意卫生，注意健康！

由自己的这种怕病的心理，想到现在一般人的口头上骂人最流行的所谓"幼稚病"上去了。这一种病症，从名词上看起来，好象是年轻的人最容易害的，我想，如果一个健康的青年，也象我生得瘦一样，硬被朋友怀疑他害着一个这种病症时，他也一定要感着几分不安吧！而年纪轻轻，正和我生得瘦一样，是不能马上改造的，胡须要它一晚长起来，还要它变白，那到底是不可能的事呀！

不过，我虽然不高兴人疑心我有病，但如果自己真的病了，那倒是很听医生的话的。譬如我颈子上的那小块顽癣，虽然不

是大病，但总不能不说是病。我非常的注意它。左医不好，右医也不好，最近有个朋友要我用阿墨林，我就忍痛用阿墨林，不好，最后有一个医生告诉我，“污愈露”要比阿墨林好，我马上就改了“污愈露”。我极力要知道这一个病的性质，并且马上想医好它。

这“幼稚病”呢？虽然不是生理上的病，却比生理上的病来得更危险，生理上的病，最大限度的危险，不过丧了自己一条命或传染给少数的人罢了，但这认识上的病，却可以断送一个民族的前途。真的害了这种病症的人，为了民族前途的健康起见，我想，大概也会心平气和，很殷勤的去找医生来医治吧！至于因为自已是青年，而被人“善意”的怀疑，虽然不免感觉几分委屈不安，但如果在大处着想，我倒以为反是自已一个反省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气忿的。

既然“幼稚病”、“幼稚病”已经成为口头禅了，一定是有这一种病症的存在无疑。虽然我们不应该随便开口乱道，疑神疑鬼的去替别人下诊断，但作为一种认识病来讨论它，想来那倒是极迫切需要的吧！

通常所谓认识上的幼稚病，如果照字面说，那是没有多大危险性的，一种单纯的幼稚，那容易被人觉察，孩子的行为，大人并不真的去认真它。幼稚病变为了一种危险症，是它在外表上显出的病象并不一定幼稚而实际上是非常幼稚。所以有人称它为“左倾”幼稚病，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一种。

这种病我个人虽把它列入认识病的一种，但它发生确常常是在行动中，正因为这样，它比普通认识病更恶性，它是一种内脏病，它隐藏在实践过程中，起了一种自戕自毁的作用。

这种病，在过去人类的历史上大致是不断的存在过的，今日中国救亡实践的过程中，自然也有它的芳踪。今日我们发现的病象，是有些人以各式各样的面貌，各式各样的方法在反对联合救亡战线，破坏、自毁救亡伟业。

我们常听见许多美丽的高调：说联合战线是大众向特权者投降乞和，说联合战线一定要用什么主义做基础，只有工人农人才能参加联合战线，我们在各种集会中，也听见许多人在喊不需要的口号，伤害联合战线的战友间感情的口号和超过时代的演说。我们看见有些人还在那里拒绝人走进战线来，紧紧把住战场的入口，或者打开一扇边门，严行身体检查，只偷偷的放进少数中间人进来。我们也看见许多宗派在自己阵营内做忙于“安内”的工作，对于“攘外”反看不见。我们也看见有人处处在那里用阴谋、诡诈对人，用怀疑的冷眼看朋友。我们也看见有的人，什么事都不干，只沉溺在空想中，去研究什么领导权，将来，什么什么悠远的事情。

本来在大马路都可以说的话，有的人一定要躲在密室里去说，本来是应该在广大的大众前公开进行的事，有的人一定要在地下偷偷摸摸的干。本来天下的人有长子有矮子，有的人偏偏看不惯这些，要把矮子强迫拉长，或把长子的头截断，一定要改得和自己一样高矮。本来一切子弹都可以打到一个靶子上去，有的人却要追问你打的动机，动机不对，就不许你瞄准。是的，这种病象是说不胜说的。一句话说完，他们都是离开中国实践说话，专门玩弄高调，美丽的辞句，有意无意的在自毁救亡的伟业，客观上变成了敌人有力的清道夫的先遣队。

自然，这种病症不是偶然的，我们看了许多最伤心、最可痛

的现象，但我们不能灰心、气愤，而是要冷静的求出这病症的真实基础，赶快去医治它，不让这病症发展。

这病症的基础是什么呢？

第一，是对中国现实只认识一个抽象，没有认识具体的中国。这病症就发生在认识的公式主义上。因为认识的只是一个公式，只能把这公式套在现实上，他看不见实践内的矛盾和联结，看不见事变的发展和阶段，看不见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新形势下，应该有适合这新形势的策略，去改变当前的现象。一切的幼稚病都是看不清实践，理论离开了实践，中国今日的幼稚病，也根源在这里。

第二，中国今日的幼稚病又是中国过去革命中的一种不良的传统的派生物。中国革命有着可以夸耀世界的传统，也有着不良的传统。这种影响在不知不觉间分赠给许多人们了。即令你在过去还是一个孩子，你与这传统过去没有什么因缘，在不知不觉中，你仍接受他的影响。这就是今日偏狭、阴谋、包办、机械、空洞、公式等的来源。这种不良的传统，不知不觉被许多无个人政治欲求，纯粹爱国青年运用了，可是他不能帮助今日的运动，恰恰相反，它变成一种病症的重要因素了。

第三，它发生在大压力下的一种反叛的情绪上。这四年以来，中国受到敌人的侵略，我国在外交上的无限制的屈辱、退让，对人民极端的压抑，造成了普遍不可遏制的民族怒潮，大家都得不到一个宣泄的机会了。反映在救亡运动中，不免有人只图宣泄自己的情绪，一时走到偏激，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绪，正确的运用自己的情绪。于是，理智对于这些人失掉作用了，在一种激越场合，这些人不知不觉喊出了不需要、不合适的口号了。

第四，它确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的一种反映，中国今日政治上的分裂，政治小派别，社会小的派别分裂的状态，恐怕真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吧！在救亡运动中，我们常常看见许多小团体的宗派性很不容易克服，甚至根本并非政治的意见不同，不过因各自小团体间起纷争罢了。这确带有相当的封建性。它与今日政治小派别的分裂，并非政治意见不同，完全是人的问题一样，确有些象同出一个家门。起初我是觉得非常怀疑的，仔细的从社会整个发展来考察，知道这并非偶然的现象。

第五，那是很可怕的奸细作用啊！奸细虽然一向是小白脸，现在却一天天进步了，他在面孔上也涂起红来。他们为了要破坏爱国运动，他们知道单从外面来打击那是不够的，他们于是进一步自己走到运动中来。自然，他们不能不把面孔改变一点，不得不打扮得很英雄，调子也不能不提得比一般人都高点。要这样，他们才能深深的打入运动的里层，进攻你的心房。可惜的是，现在有许多纯洁的青年，自己作了某一种奸细的傀儡，仍以为自己是忠于民族，站在救亡的最前线，一点还不自知，反恶狠狠的怒视自己沉着应战的战友。这是非常痛心，万分严重的现象啊！

以上是今日幼稚病发生的根源，在这些根源中主要的当然是属于第一项，“认识不清”可以包括一切，至于第二、三、四呢，那也是不能不具体指出特别加以注意的，第五项的严重性，那不独我们要大胆指出，还应大家彼此张着号筒，大声疾呼呀！

我们既然知道这一病症是从一些什么地基上发生的，那我们要诊断一个人的病，要如何下药开方，那就不十分困难了。

我们的“污愈露”呢?

说来说去,根本的是一个大家对现实的中国的认识问题,这方面的话,我在别的地方说得很多,不想在这里来重复。怎样培养自己的基本理论,怎样去探讨目前中国的新形势,怎样从实践的行动中去展开你的认识界限,这一切等于医生叫病者讲卫生一样,是在平日用工夫,或病后调养时的注意,在病的危急中是无机会多谈的。

目前注意的是治标的方法,要如何赶走这病魔,如何防御自己不受传染呢?

我以为,我们对话越说得漂亮的人,越要注意,越要冷静一些,马上检查你的左右吧!检查你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吧!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标准:一切合于联合救亡战线的言论、行动,为我们的标准。现在救了中国再说。一切大道理如果超过救中国,我们暂时不要领教它,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如果说出来的话超过合乎当前救亡的实践,我们从不疑心他是故意和我们捣鬼,破坏大家的工作,我们也应该敬而远他,他要唱高调,说梦话,让他个人到喜马拉雅山上去说吧,不要扰乱大家,如果发觉真是汉奸就要说服或制裁他们。这是防御的唯一妙法。

至于对于过去传统下来的那些影响,我们要赶快丢掉它,丢掉它的方法是我们在自己新的工作中,去创造新的工作方式。

我们要约束自己的感情,不要被情感扰乱了,自己变成了情感的俘虏。民族解放工程是一个长久艰苦的过程,不能单凭一时热情。一篇激烈演说,几句激烈口号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求的是把这热情化为长久的决斗,不动摇,不灰心的持久性。只有

这样，才不会浮躁，才不会生出幼稚的急性病。

要如何才能消灭人与人间小派别的分裂呢？那也只有在救亡的行动中，从自己做起。别的小组织存在，我们对它宽容一点，自己切忌为个人利益而有小组织，切忌和别人作这种无意义的对抗。在工作中去消灭这些封建的宗派性。我们应该绝对避免“内战”，反对“内战”，自己不参加阵线内部敌对的斗争，我们暂时只注意一个主要的敌人，只顾到和这主敌作战。人家无理由的挑战，一概不答复，我们不在争得口头上的胜利，我们要求的是事实上的胜利，是在救亡工作中尽了比别人更大的力量，用这事实去回击这些内战的黩武者。

最后大定不要忽视了汉奸，驱逐这些“红萝葡”。

病，是大家都怕的。无论谁都不高兴自己有病，但一个健康的人，不能不有一点医药的常识，不能不相信医生的话，现在这一种认识的病是非常的猖狂了。不论已害着和未害着的人，不能不注意啊！

为了民族生长的健康，我们要极迅速的消灭它——这幼稚病。

“清一色的公式主义”

十五六年前，关于写文章，是颇用过一点功的。我做孩子的时代，自然学习的是古文。由小学而至中学毕业，主要的功课，可说都用在模仿古文上。从用“人生于世”、“人生于天地之间”那种烂调起，到写出一篇较通顺的文言文止，都在寻求“作文之道”。但我并未获得写文章的秘密。

到了中学毕业那年，文章是自谓可以夸耀朋辈了。但有一天，碰见了一位名士，他却浇了我一盆冷水。他说，“你还未到家，你的文章是你的小聪明，但你并不真的懂古文。”后来我向他“问道”，他却告诉了我许多做古文的秘密。

他说“做文章没有什么神秘，只要学会几套公式。譬如学唐宋文，就要严守唐宋文的公式。如果是韵文呢？你不独语句用典要象唐宋人，要唐宋人用过的字，你才能用。就是在音韵方面，你也得注意，不能用汉魏人的韵，派头，选辞，气势，一切都要象唐宋文。你的文章写得不好，是字句无来历，头上学两汉，脚下学唐宋，两手则在摹仿明清，肚子甚至又受了梁启超的《新民业报》、章士钊的《甲寅》等文体的影响，所以弄得不古不今，不男不女，所以不成东西。”

我翻然大悟，一年后，我居然能写出一篇纯粹的仿古文来了。我送给他看，他道：“这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文章就是这么一

个东西，说穿了就不值半文铜钱。”后来他还告诉我，怎样写应用文，做公文、尺牍、挽联、祭文等公式，不过，惭愧得很，我到这时却改写白话了，这些公式我至今还未真的学会。

等到我自已多读了些古书后，就觉得那位名士并不真的高明，他并不真的懂得什么古文，他懂得的只是公式，公式只学会了古人说话派头，并没有懂得唐宋文与两汉文自成一体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古文的价值是在什么地方？他把内容与形式完全看成了两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读古代的文献觉得其味无穷，读了一篇摹古的公式就觉得恶心呢？

公式是一种烂调，是一种文字的游戏，它没有具体的内容。这样的文章，一定没有林语堂先生所尊重的“性灵”，没有血肉，是一种装腔作态，极不自然的文字。

这是古之公式主义，它的基础是摹古，古之公式主义者死抱住的是自已最心爱的一部古书，或某一家的文体，去死学那文字的形式。不能跳出那圈套的实在不配谈古文。

从旧的公式主义又使我联想到今之公式主义上来。

在新文学方面据说已有公式主义的毛病，茅盾先生也约略的提过了，不过，我不大懂文学，我不敢来瞎谈，我现在感觉到的是纯文学以外，我们也发现不少的“人生于世”、“人生于天地之间”的调子和各色各样的摩登公式，这在杂志文体内、实在占有很大的势力，我们几乎看出已成“清一色”的现象了。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有趣，他说“今日这样多的杂志，你不必都看，你能将同一性质的文章每样选读一篇，你就等于读遍全国杂志了。至于纪念日的文章，你不必读全篇，你只要把那尾巴上附着的部分，叫做‘今年的任务’看完就够了，以外东西，因为也

许你早在五年前就读过，实在不必再费时间了。”

他告诉我们：写国际文章有一个公式，那就是只要记清两个世界的对立，资本世界相互对立中，主要对立是什么，次要的又是什么，在欧洲怎样，在太平洋又怎样？还要记得每篇文章要从“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恐慌”说起，慢慢说到资本世界由经济恐慌进入政治的危机，政权向左右两极化，革命的威胁，归结到今日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这是内容。

在文字方面，要多用“阶段”、“恐慌”、“危机”、“革命”、“必然的现象”、“斗争”、“清道夫”、“××主义”等字眼，同时在外国杂志报纸上找几个统计数字夹在里面。文体呢？有些好象外国文（指译文的意思）就合式了。

“你不信么？”他说，“那我可以拿几种杂志你自己看，我们可以找出十种杂志，讨论同一问题的文章来比较比较，你除开可以看见这公式以外，能找到还有一点别的东西，我请你吃冰冻西瓜。”他又笑道：“不仅同一时间的文章是这样千篇一律的调子，就是时间隔了几年，如果排字工人要和你开一个玩笑，把一篇几年前的文章误排进去，大概读者也不会觉得不合‘摩登’吧！因为在国际的总的形势，在未完全改变以前，这公式仍不会感觉过时的。”

他似乎胜利了，他继续说，“现在最流行的又有一套叫做救亡的文体，这一个公式，应用最广，不独写国际政治文，经济论文的人要用它，就是一篇文学论文，一封情书，一支恋歌，也都得用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文章中，大多是这样开头：从‘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敌人的侵略，是一天天加紧，并吞了东北四省，事实上又占据了华北，现在又图进窥华中，华南。无耻汉奸的出

卖民族利益，节节退让屈辱，使中华民族一天天沦入完全殖民地化。接着就来一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应该怎样怎样，最后是结着一串口号。在说话的态度，你不能现出半点笑容，要多用‘抗战’，‘国防’，‘汉奸’，“联合战线”之类的字眼，不然，就不能算合于救亡文体。

一切都是公式化，报纸的通讯，有一定的格式，明明是记山东农村经济的，福建人就疑惑他是记福建，湖南人疑惑他写湖南。虽然，在中国农村一般方面是有些相同的，但是山东与福建、湖南的农村总各有它的特殊性，各有它的具体的不同事情的发生，你能看出一点不同的影子么？

哈哈！你老哥编的《读书生活》，那生活纪录，不也感觉缺乏各自生活的特点么？我就看不出各职业层的不同生活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只看见一个共同的贫困、苦恼、受压迫、抗争的稀薄的影子。

再放开眼睛一点，无论是‘短论’、‘随笔’、‘散文’，今日存在的一切文章，都可以找到它一个公式。所以我说今日中国真是公式主义的中国，‘清一色的公式主义’，只有我们才有资格说。”

这位朋友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刻毒，但他指出的事实，却不能够否认它。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了。今日一个刊物的编者，他会感觉到来稿的苦闷，太公式化了，同时自己也确不大爱读别人编的刊物，至多也只打开来翻翻，选几段看看，其他的似乎无须再读了。因为说来说去，总离不了是那一套，是想得到的。今日一般刊物上，真正有充实的内容，而又有细致的写法，不落公式的俗套的文章，实在不能说多。这不能说是一个完全

关于文体本身的问题呀！

新的公式主义与旧的公式主义不同点，是在新的公式主义是只抱住几个抽象的原则，不是在死板摹仿文字上。关于文体虽然受欧化、日本化的影响甚大，但它并不是造成新的公式主义的基础。因为今日公式主义正与苏联在文艺界中发现的现象大致相同，在苏联，“文艺的公式主义是发生于作家或艺术家对于他所表现的人生有不尽了然的时候，而这不尽了然，则起因于作家或艺术家的与现实生活隔离，不成为急剧进展的人生中的活动分子而只成为观察者。”

在我们这里（文艺方面除外），我们的作家是对于今日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变动，还有“不尽了然”之处，大众只认识了抽象的（不作空想解，是具体的抽象或原则的意思）世界与中国，只把握住了这一个大阶段（这还是就进步的说法），在一个阶段内，关于每一事变之内的联结的理解，那复杂错纵的矛盾的斗争与推移，都不能“尽了然”。因此，一个写作者，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也就不能更深刻，更具体，发出来的言论也不免只会说些原则的话了。自然，这里也可以说是：“作家与现实生活隔离”，作家对理论还欠深入，同时实际的经验不丰富，不是这急剧变动的时代中的活动分子；只是一个拿着笔的观察者。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这一半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变动率，对于具体的现实，不易把握，和过去理论的工作做得太不够，一半也因“写作条件太坏了，生炒热卖，在所不免”。

尤其因为后者的关系，现在一般杂志文章的来源（文学创作在外），上焉者是公开的偷窃外国杂志，略为改头换面，变成自家

的货色，不仅内容整套的搬来，甚至就连文字的形式，也还保有外国文的风度。是的，真的能保有外国杂志文的风度也是好的，但不能，因为外国文一改变成中国的方块字，因语法的不同，文体也变成四不象了。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既无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合乎中国大众容易接近的形式，公式主义是十分彻底的。

下焉者，辗转来偷窃国内稍有微名的杂志，同样略为改头换面，变成自家的货色。今日那些摹仿的冒牌杂志、官办杂志，以及内地的报纸附刊之流，就是这些货色，于是，我们对文化界内今日的言论，真的有那位朋友同一的感慨了。

我也和茅盾先生有同一感觉，我毫无讥笑或看不起别人一丝一毫的意思，因为自己也还是拿笔写东西的人，自己写的东西，多少也还是犯了公式主义的错误的。我们对于今日这"清一色的公式主义"的现象，虽然也感觉"前进意识的""和有毒的"言论尚是"一与二之比"的现在，"即使是犯公式主义错误，也比没有全好"。但与文艺领域内情形却不同，因为理论的领域与实践的言论，它是直接指导行动的，不象文艺至多只指示一点方向。指导行动，就要先了解具体的实践，现实发展的每一环子，了解关于事变周围的关系。在那里允许你单作公式的说明么？这一方面的公式主义，无疑的，在某种场合，它会发生很大的反作用，妨害现实的发展。它变成了一种超实践的空论，即令辞句很华美，结果是做了装饰旧社会残余势力秽污不洁的那堆垃圾的"摆设"。

所以，今日我们应该起来和公式主义奋斗，提出肃清公式主义，它的本身并不是公式主义。苏联的清算公式主义，不过给与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不是公式的模仿它，而是我们有极迫切

的实践的要求的。

是的，我们也不能止于“自欺的安心”，说说就算了。我们要准备长期奋斗。

真能懂古文的人，并不甘于模仿一家之言，而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文体，一个真的实践的理论者、言论家、作者，他的嘴上并不常常流出标语、口号，也无暇光去说原则的话。固然，以上那位朋友指出的那些调子、选辞、用语、原则，并不见得在一篇有充实内容的文章上，就不能用，譬如就国际政治说，那些原则，用语，用在拉狄克的文章中，不独不恶心，而是最不可少的要素，因为拉狄克的文章另有他的丰富内容与严整的文体在。口号也不是不可喊的，但有一定的场所，同时，不仅是喊，最重要的还在有更具体实现这口号的行动。

今日的写文章就是用笔说话，是说给现在的人听的，不比太史公写《史记》，是为的传之将来，也不比我幼小时学古文，为的是“交卷”，讨先生和父母的好，现在我们要向谁讨好呢？是要向大众讨好，他听了你的话，不会胡涂，也不会觉得高不可攀，你能启示他认识，指导他的行动。

最后，我还得申述一句，今日的公式主义，要肃清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今日公式主义的内容是偏于原则，譬如单就国际论文说吧！原则是太空洞，但正确的原则也并不是可以忽视的。现在我们要克服公式主义，是把这些原则具体的应用到实践中去，不单停留在原则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发展。

谁也是愿意自己有发展的。如何克服这公式主义呢？第一是与现实生活不隔离，做一个急剧进展的人生中的活动分子。第二是学习——理论与实践。第三是从今以后不说你不十分了解的

话。自己常常批评自己，也接受人家的批评。第四不要懒，不要再偷别人的东西。

“太狭隘了”

初到南方，自然对于南方的印象是肤浅的，我没有勇气厚着脸皮说我的印象，目前就不说什么吧。一个《读书生活》的记者的我，这次漫游南中国，虽然现在方才开始我的旅程，但对于《读书生活》在我足迹所到的地方，我都能看见它，我不能不生出深刻的印象。在香港、九龙无论哪一个报摊，不论是占有一个街角或是摆在地下，都有着它的一席地。这是何等的使我愉快！何等的慰我旅途的寂寞呢！因为它，我知道，在旅途中并不是真的孤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原来我还有百千个不相识的朋友，在精神上，已经是融成一片了。

大概不仅是因为自己过于寂寞吧，我怀着一种希望，我想有一个机会，会会这边的许多不相识的朋友。自然，这只是一个希望，这机会虽然不完全是不可能，但可能也确实不多的。我缺少交游，又不能操粤语，怎能接近这边的朋友呢？但是，我总在等待这机会，我非常重视这机会，我想亲自从南中国青年的口中，探得他们对于《读书生活》的意见，以便将来带归，供我们编辑部的同人的参考。因此，更把《读书生活》的内容，弄得更合于广大读者的要求。

几日来，我要感谢此间的几个朋友，我也略为会得几个《读书生活》的读者，听见一些比较是新的意见。我发生了许多感

想，现在就写出来作为第一次通信吧。

“《读书生活》的销场，在香港九龙还不能算大，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说，是不应该这样的”，一位朋友这样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大”呢？我追问他，他的答复除开推销的方法还不够好、定价太贵以外，还有一段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就是它的内容还太狭隘，还没有做到一切自学的人都感到兴味。因为读《读书生活》的人，目前还是限于比较已有自觉的青年，没有自觉，还在转变中的人还不能接近它。它似乎只注意到自觉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以外还有更广大的群众，没有诱导他们自觉，没有替这些人解决问题，没有了解他们的生活，扩大我们编辑的眼界，把内容弄得更广大，更合于大家的口味。

我听了这番话，吃了一惊。我们负编辑责任的人，不能不认错。我这几天都想到这一个问题，今早一下床来，对着霏霏的细雨，我发生了许多感想。

“还太狭隘”，这四个字可以给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无限玩味。不单指我们的刊物而言，今日一切的文化工作部门都是这样。我们都“太狭隘”。在原则上固然我们应该做到最最正确代表前进的意识，散布新时代的种子，但不能看见接受我们播种的人就笑，就以此满足，对于不能接受，甚至冷视或反感的人就让他去，使我们和更广大的人群间生出一条鸿沟，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这小的天地内。这实在是不可容恕的过错。

我们要求大众自觉，应该是解作：我们不许有人落后。我们对于已接受我们的播种的朋友，固然值得高兴，我们应该使他们再继续前进，但工作的重心，工作的最大意义，还在如何争得不觉悟的人觉悟，落后的人前进。这是最艰辛的工作，并且是目前

最急迫的。

现在单拿《读书生活》说吧！

《读书生活》是指导大众生活认识的刊物。我们帮助人的地方很多。我们不必过于自谦，许多有了一点自觉的人，读了《读书生活》以后，更加前进，这有事实为证。可是，没有一点认识的人，就不容易接近它，这也有事实为证，我那位朋友的话就可以惊醒我们。

我们一向在编辑方面忽视了社会的黑暗面，对各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各社会阶层间文化程度及因袭的传统没有深刻的具体的认识，对各种各样生活型了解不够。我们多凭主观（虽然在时代意义上也算是客观）的把要给人家的东西，清一色的呈出了。虽然我们呈献给大众的是卫生的粮食，可是对于不卫生的东西的批评，及怎样劝大家讲卫生，改变不卫生的习惯，这方面注意得太少了。弄成了这卫生与不卫生的人们间，生出了一道墙壁，这就是目前《读书生活》及一切刊物不能"深入民众"的一个主因。

打开这道墙壁吧！放弃狭隘的观点吧！放宽视些！

《读书生活》应该做到更是大众的。在编辑方面，当前我们要求它改变作风。无论在理论的与纪述的方面，都应该放阔大一些。要公开来讨论各种生活，各种更平凡、更一般的问题。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象，实实在在过着什么生活，在什么因袭的传统与陈见下，不要将他们抽象化观念化了。我觉得我们要放弃我们是在教育某一阶层的这种观念，我们要切合当前国难教育，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很广大的国难教育，我们是在教育一切的人。《读书生活》应变为各种社会层的人都要读的东西，它能走进工

厂、商店、农村，甚至闺房、富第，它应该是已自觉的人的朋友，更是未自觉的人的导师。不要仅是博得少数人的欢声，而使多数人见而生惧或漠不关心。它应该放弃后母的心肠，平等的对待一切孩子，我们在当前民族的统一战线下，我们不能让哪一个孩子落伍，哪一个阶层的分子站在民族抗争以外，我们不能放弃一丝一毫的民族力量，这原则要用到教育上去，一切文化工作方面去。

如果以上的话是对的，那末，除开内容外，《读书生活》中就连用语选题，以及一切派头，最好能做到使最不怀好感、最异己的人（自然汉奸除外）也能看得入眼，觉得我们是在忠诚的从事国难教育，使一切胆小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份危险刊物，一切沉于低级情调的人，觉得这里面也有讨论到他们的问题，使各级学生都要争读它，争到这刊物上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要这样，这刊物才算做到极实际，适合大众的要求，才能普遍到各角落里去，真的"深入民众"。同时也就避免了许多客观上的麻烦、误解，使这刊物的影响与销路同时因而扩大。

是的，这还是关于原则的话，要做到并不是很容易，但也并非完全不能办到。我这几天来，天天在想它，想上海的一切刊物，想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一点点所谓文化工作，我满身都流着愧汗（香港的气候并还没有到要流汗的程度），一句话，做得都不很实际。我在反省之余，就不禁把这样要说的话胡乱的道出了。不知道对与不对，请你们判断。不过，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感觉，是相当珍重的，我想，这次南游，即令一无所获，我能对自己以前的工作，有这一番自检，我也微笑了。

我希望你们能把这封通讯在《读书生活》上公开出来，使我

有对一切刊物编辑人请教的机会，也盼望各地读者对我这番浅见加以批评和指示。

用新的尺度看人

昨日韬奋先生告诉我，说有一位青年和他谈话，谈到了我，因为我到过电影院，觉得很为可惜。我听了，虽然觉得这位朋友太简单了一点，看电影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我却也确实感觉几分惭愧，因为他太真挚得可爱了。不过，我现在既不是在写忏悔录，也不便在这里多啰嗦，个人的缺点也只好由自己去改正吧！现在我要讲的却是由那位直友所引起我想到的怎样估量别人的一个问题。

我过去的眼睛实在带有很高度的偏见。在我眼内，觉得世间上并没有一个完人，甚至感觉没有一个好人，可以和自己做朋友。就是自己呢？也有些看不起。有时，我竟否认世间一切，颇有一些虚无思想。在二十岁时，我确曾孤独过，对世界有些厌恶之心。我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才把我这虚无思想洗淡。我很自知，我到最近也还没有一个完全公正的胸怀，我还是有些偏见，我看人，还带有成见，我心中还有一个公式，一柄私家尺度，不合我的尺度的人，还不能认作自己的朋友。

我虽然不是一个人间的孤独者，但我认识的人实在有限，我的生活周围的圈子，平心静气想来，不是狭小得很么？口里有时也不免随俗的喊出大众，在自己的职业上，有时也很以为自己写的东西颇接近了大众，自己是以大众为对象而写作的，我是生活

在大众中，但是清夜一觉醒来，仔细一想，真是不免满身是汗，惭愧得无地缝可逃。如果中国大众，果真只是我所接触的人，那不是在说天大的谎么？

我明明还是在狭的笼里，我比井底青蛙能看到的世界宽几何呢？

是的，我要生活在大众中，我要做大众中的一员，但是，那不是关着大门，在自己私家屋子里，与二三家人、七八良友，结为帮口，作一场白天梦的呀！

我们不能忘记，在自己生活的圈子外，还有广大的人群，可以作为自己的良友的广大人群存在；尤其在今日，为了自己的存在，民族的存在，我们更应多认识些人，多多认识我们全民族救亡阵线内的战友。

过去，我被那柄私家尺度，不知把多少人和自己分开了、隔绝了。我冷淡了、丢弃了许多朋友。凡思想上不合自己的意的，生活、习惯、知识、职业、社会层与自己不同的，我不要接近他们。我不高兴看见天下有长子，也有矮子，有前进的人，也有落后的人。我脑中的人类是一个抽象，不是具体的人类。我不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具体的个人。因此，自己变为真正的孤独者了，只会在幻想中打滚，在极狭隘的圈子内，认识可怜的自己的左右，而竟把这微小的人口，当作大众。

在生之抗争中，我渐渐醒觉起来，觉得世界并不如过去自己想象中的一样。我那柄不公正的量人的尺度，应该先折断它，我们应该有一柄新的、公正的尺度。

这一柄尺度就叫做救亡的公尺吧！它的用处只是估量一切人是否能够站在救亡阵线内来，是否有作为阵线内的一份子的

可能，这一尺度上，并不刻上分寸，不求我比你高几分、几寸。

思想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层不同，性别不同，生活、习惯、职业不同，认识不同，高矮的不同，一切发展的不同，我们都不管它，问的是你能不能参加救亡阵线，你要不要救亡？

你要，你要参加救亡阵线，都合和我们做朋友的资格，我们都可以做朋友。固然我们高兴人家的前进，对前进的朋友致最大敬意，但在今日，我们并不能眼睛这样狭隘，只看见还是少数的前进的分子。

今日量人的标准，是言论、行动合于救亡的实践。"前进"的分子，如果是在"关起门来做皇帝"，对自己的"穛伙"说些不着边际的梦话，虽然话说得最"前进"，最动听，而且美丽、堂皇，与当前实践完全不相干，甚或妨害实践，那不独我们不能相信他，我并且要向大家说一句老实话，我们要提防他别有怀抱，因为最前进的分子，在实践过程中，他是把握住了实践，推动实践前进的，他不会说出超过实践允许的话，不会光发空头支票，不会专门卖弄美丽堂皇的辞句，不会排斥同路人，阻止人家也走向前，甚或争夺前进的道路，学着清朝大官出门，先叫自己的喽啰清道，要断绝交通，不许别人走路。

至于本来走得很慢的呢？只要他的方向不错，在那里走，或刚刚踏上第一步，都一样值得欣慰，我们反要向他们拍掌，鼓励他们前进，自己迎上前去，慰劳他们，兄弟一般亲爱的引他们向前。

我觉得，除开不合着我们这柄公正的救亡尺度的人外，我们无权力排斥任何人做朋友，但在朋友中，我重复的说一句，我们固然对前进的友人致最大敬意，但自己不要专被言辞所欺骗，因

为一个最前进的人，在实践过程中，是埋藏在大众中忠恳的做平凡的工作，不会借“前进”的幌子，招摇过市的，真理总在平凡中。真正的英雄事业，是切合实践的事业，真正的英雄，是正确执行了实践的任务的人，他不会故意做作骇人听闻的事业，以欺世盗名。

因此，我的交友之道也是在平凡中。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在当前的阶段，也颇以交纳不折不扣的平凡人为满足，我不想对人求得更多些，虽然，我很敬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人。

在生之抗争中，我发现这柄量人的尺度了。我非常的高兴。虽然我对于自己万分甘愿接受一切直友的指摘，小心谨慎的去改正自己的缺点，但自己却极端不愿意再保有狭隘的偏见，不能容人，把自己束缚在紧闭着大门的高堂里。

我想用这种信念去结交广大的朋友，是的，我不能老死在狭的笼里了。否则，我想，我永远不能接近大众，我只能在幻想中，自己欺骗自己，自己与实践隔离，达到灭亡。

在汉奸化装术一天天进步的今日，我要认识真正的朋友，不为奸人所骗，所卖，似乎也只能投在更广大的平凡人中去。“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今日我们唱的是救亡之曲；“阳春白雪”之音，即令是最高的艺术，也只好暂时做做俗人，不去听它，因为这里以适合战鼓的拍节为必要呀！

关于态度

离开上海的前夜，野荒好象有许多话要和我说似的。起初，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这半年来，相聚在一起是很难得的，现正必要各自分飞了。人总是人，总不免受到离情的感染吧！不过她今日的态度，完全与平日不同，一切明快、大胆、顽皮、孩子的天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变成一个庄严而又拘谨的人，沉默着，又明显的告诉我，她要说话的表情，这倒使我感着非常的惊异与不安来。她改变得太多了。

我问她为什么想说话又不说话，她低着头在笑，还不肯直说，后来被我逼得她没有办法了，她才故意避开眼光看我，严肃的道：

"没有别的，我希望你到香港后，在那边，对人的态度要好一点，尤其对于低级的同事们要多体谅人家一点。"她这时，将友谊的眼光直射着我，等候我马上的答复。

我想，我有什么话说呢，"啊啊！"我点着头，我记得她说这话已经不止一次了。

到香港不到一个月，在她的来信中，又一次的提到"对人的态度"的话，同时也还接到一个十年的老友的来信，要我注意"对人的态度"的问题，从这些方面联系起来，我对于自己对人的态度不得不怀疑起来，我在十分闲散中，我总想到这一个问题。

是的，自己离开学校生活已快十年了，这十年中，实在身经千磨百难，尝尽了人间的酸咸苦辣，什么样的人我没看过？什么亏我没吃过呢？讲到世故一点，我应该是一个世故老人了。然而，我学到的仍有限，我还不能深通世故，甚至还不能求得许多朋友们的谅解。

我虚心的回忆我对于朋友和一切与我交接过的人的态度。我想我一生没有欺骗过人，没有隐藏过人家的善处，但我不能把话放在心中不说，不能心口弄得不一致，如果他是我认为人生道上的同伴呢，我不会顾忌什么，有话要说就直爽的说，我不能容忍人家的过失，一定要批评，我最看不起的人，是口里说得漂亮，而行事完全相反的人。我不会转弯子，有时也许过于热情，不会装笑脸，面像有时不大和平、好看。同时，我自己不会藏拙，我有意见，即令知道是浅薄的，我仍要说出，写出。但问题是客观上需要不需要，如果需要呢？我认为，在高深的话、高深的文章还没有发现以前，浅薄的东西也还是需要的。我有点戆，有点象上海人说的"硬碰硬"，你硬罢，我还要比你硬一点，我从来没有对于论敌或仇人放过一丝一毫，我有时心中宽大得真是"海阔天空"，有时的确在弄"小心眼儿"。我对年纪比自己轻的人或我尊敬的人一样虚心有礼，我没有高傲过，我对于伪善者、阴谋家，却从来不知道天下有一个什么礼字，带住吧！其他的一切就可以不说了。把这一些综合起来，就变成了我的对人态度。

这种对人的态度是否没有毛病呢？

如果说是没有的话，野蕻和我那位老友就不会一再忠告了。如果单单把自己对人的态度，作一种反省，我就找不出自己的毛病来，毛病是存在的，到底存在什么地方呢？我虚心的在追

求它。

结果我发觉了。不仅发觉了自己的毛病，还发觉“对人的态度”这一个问题，并不仅是关系个人与个人间的私事，值不得谈它，恰恰相反。在今日联合救亡战线下，人与人间的关系，是在一种新的编排中，从这里面发生的问题，真是多而又多啊！这一个问题，在今日的意义下，已经变为一个值得提出公开讨论的问题了。

我们先从主观方面说吧！

我们在今日的做人虽不能做到人人满意，也不应该过于世故，看了别人，都哈哈大笑，不管是非，一概点头道好，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毫无人性，完全是在登场做戏，但对于自己的周围所接触的人能避免人家的误解，也总以做到最大限度为好。我们似乎不应因为自己的态度不好，使人拒绝你的善言，阻碍你的事业，这是万分值不得的。所以，即就个人处世而论，要注意对人的态度，并不是腐迂之谈。这类谏言，是应该在正确的考虑之下接纳的。

但是单说一个要注意是不够的呀！即就我个人说吧！我何尝没注意过，而事实上，我还是失败了。

因为我还太主观了。在常识的谈话中，我们常听见人说，对人的态度，是决定于某人的生性，生来性硬，对人不免喜欢硬碰硬的，生来性柔，对人多乐意马马虎虎。大概这就是指一个人的个性吧！我自问个性很强，所以我的对人也常不免受到这种影响，那是无疑，不过，单凭个性任情，那并不是真的获得做人之道。这样纯主观的对人，自然没有不失败的。

中国今日复杂的社会，生出复杂的人的头脑来，复杂的社会

意识，影响每一个个人，即就同在一条道路的同伴说吧！那每个分子的发展也是绝对不能完全齐一的。一个最前进的集团里，也仍可找出某一个分子保有最落后的某一部分意识来。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奇迹啊！我们对于这一群人，就不能机械的拿出一个共同的态度来对他们。譬如他犯了过错，你要指摘他，批评他，有能接受的也有不能接受的，有的人，他乐于在真理下低头，有的人，虽然明明晓得自己有些不对，他对你无情的指摘，有些吃不消，他于是和你固意别扭，离开了真理，变成对人的问题。我们常看见一件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到了一个态度不好的人的手里，只会越弄越糟，固然，这种不管是非，专看人家的态度来和你无赖是不对的，是小所有者的劣根性，但你骂他一千句，对于事实上会有什么好处呢？天下既有这类的人，你要与这些人在生活上发生接触，你就不得不注意这些，这还只就一个团体说。至于整个的社会，五花八门的现象，红黄蓝白的人物，你的应对那就更不是抱一个"我生来如此"的态度可以过得去的。

原则要用在具体的现实上，不是容易的呀！抽象的谈对人的态度易，具体的去应对人难。这你要了解对方，分析对方的社会阶层、教育、习惯、个性。你还要约束你的情绪保有相当的冷静，并能灵活的、耐心的与人周旋，这是一种艺术啊！

并且我们对于某一人的态度，也不能是固定的，我们要从他的发展中，随时改变我们的态度。一个思想落后的青年，起先，我们诱导他，等到他往前进一些了，我们也许变为对他反严厉些，更加紧督促他，等到他已完全是志同道合的同伴了，我们甚或用不着客气，对他或者更苛责一些。一个以前不同道路的人，我们甚或不免红脸对白脸，不能弄在一起，譬如在今日联合战线

之下，那就完全不同，只要他有站到战线上来的可能，我们就不应再对他有敌意，拒绝他的向善。

这一方面真是学不尽的乖啊！我过去这十年来，是学得太少了，我还不过是一个"生性如此"的硬汉，所以我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许多人。（我现在要对许多无心中被我得罪了的朋友致歉啊！）是的，自己是无心的，对人是善意的，尤其如此，我的过错更大，为什么不有心一点，使一切可以为善的人谅解呢？

个人成功失败事小，在今日联合战线缔结的过程当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就不是小事、私事了。今日我们还看见许多不容人的面孔，"生性如此"的气派，狭隘、小心眼的心肠，武断、家长式的教训，看不起人的眼色，不管对方的一切公式主义的态度。这一切，明显发现在各领域内，甚或在同一救亡的阵营内，也不能例外。现在有些不必要的，非政治的论争，小团体的互相倾轧、仇视，个人与个人间的误解、猜忌、怀疑以及许多由对人的态度演出的悲剧，谈起来真是"令亲者痛，仇者所快"的现象，我们如果追求它的根源，亦无非对人的态度生出的而已。

在主观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的自责与改变啊！

至于在客观方面呢？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方面呢？我倒觉得不要太注意它。我个人根本就不大注意人家对我的态度，我问的是人家对不对。我曾经看见许多在意识上已经是动摇了的人，对他的政治信仰已经不忠实了，他却借口某一个人的态度问题作为自己反动的自饰，我非常的鄙弃他们。我也觉得，我们不应该过于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脸色，或态度的强硬，甚至不大礼貌这些小节上。我常常这样理解，这是他的个性，老实说，我高兴一个人当面因出于误解而骂我，我不高兴那种脸上摆着笑容，

而心里却很深沉的人。我最不高兴听见，那个人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而当面反恭维自己。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使他失掉“人格”了。

在主张方面，我高兴别人有主张，强硬一点都没有关系，我最怕人家没主张，又不接受正确的主张。我高兴别人和我争论，争论时，吵闹一点也不妨，或者在忘形中，对我做着“老虎脸子”，甚或误骂一句“国骂”，失手打了一下，也许我那时也还他一拳，但两人决不会变冤仇，我一定在第二天去拜访他，再来争论我们未解决的主题。

我根本反对把别人的态度的问题看得什么了不起，不管真理不真理，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专来看重别人的态度。我常常对一个态度很好而站在虚伪方面的人抬杠，我在抬杠中，一点不敬重他的笑容、修养，我心中自语道："这是奸相"啊！我不上你的当，我更不惜作“老虎脸子”。

这里，自然有时因为一时陷于感情用事，心里觉得难过的事，也是常常有的。我慢慢让气平息，一到脑子冷静了些，我去回想我所遭遇的事，我所碰到的人。如果果然发觉是自己错了，别人是对的，我无不听从，或者公开向他认错，或者事实上接受他的话，在行动上答复他。对于他的态度，我不久就忘记了。

是的，世间上，完全的人不容易找的。有能力一点的人，常常有些“霸道”，只要他的“霸道”不是武断，就让他一点吧！好在他是对的，也许自己的进步，完全就在他那难看的脸色上，因为怕第二次再受到那样难堪的脸色，于是马上自己改变了，这不正应感谢他么？同时，我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夜里睡觉前，一定要把日间接触的人的一言一动，都来一番回忆，不容忍别人多

闭一次眼睛，那不是天下顶麻烦的事和最无味的生活么？

这对于在今日联合战线下，遭受着别人善意的难堪的人，大概也还有用处吧！为了救亡而遭受了别人的无礼或不应有的态度，虽然在事实上是不应该，但如果自己是一个真的忠于民族的战士，那又何伤于我呢？我们不能专记这些小节，而使救亡伟业受到丝毫影响啊！

原谅别人一点吧！你只应自己去对人时，更特别注意一些，那才是真正的一个战士的态度。

如果太委屈了呢，自己个人躲在什么地方流一回眼泪，也没有关系，索性使心头轻松轻松，但不能也意气用事，坏了大事。

这也许可说是新的世故吧！但这是当前我们大家要学习的，不是个人的私事呀！

现在又要离开香港了，我不知道我的缺点改变了没有，这要请问《生活日报》的同事们！

杂 志 论

——联合战线在“杂志界”

一 先说几句引言

好久以前，就想写一篇漫谈杂志的文字，但因自己天天过的也还是编辑杂志的生活，一想到，光只口里会说，连自己参加编辑的杂志，都不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实行，那不会闹出自相矛盾的笑话么？几次动笔来写，终于没有写好。

这次暑期，借着朋友的相邀，来到香港玩玩，本来想，换换趣味，不谈这类问题，使自己吸收一点另外的空气，不想，在许多朋友的无所不谈中，接触得最多的又偏偏是这类问题，一位新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更是兴致很浓，他对国内杂志的出版，抱着非常的关心。不错，这些杂志是给了国外侨胞许多了解国内的材料，至少从这里可以听见中国大众一部分的声音。

有一次，他忽然生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中国今日出了六七百种的杂志，没有人写出一篇杂志论来，这真是一件奇事。这不是一个很有文章可做的题目么？”我当时心中颇动了一动。跟着有一个朋友说：“这样多的东西，谁有时间都去看呢？并且要全部买一份，也要花大的本钱。”他笑笑道：“有能力做这篇东西的人，现在恐怕只有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先生吧！”我们大家听了也笑了一笑，但并没全部同意他的意见。在发行和营业上

来论，今日中国出版的杂志，张静庐先生的经验最多，他的意见自然值得我们宝贵，我们真的也希望张先生能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但是，如果站在整个文化立场来论它，那到非他所宜。这是要跳出营业，甚或跳出某一个杂志编辑的狭隘范围来观察的，那才能看到全部，得出正确的结论。

因为我的多嘴，我的话说得最多，大家就笑道："还是让你来写吧！"这使我想到我过去的计划，我那篇未完的文字，把我的兴致又引起来了。我在一种惶惑中，羞愧的接受了这种笑谈中的付托。

自然，我来写这篇"有文章可做"的文章，还是不适当的，来漫谈一下，把过去要写的东西写出，那到没有什么不可以。好在现在我在事实上，暂时在休息，没有编什么东西，眼光是可以看远一点的。至于一定要用杂志论的题目呢？那确实有些羞愧，恐怕要名实不一致吧！

我也和那位朋友所说的一样，我并没有时间和金钱去买中国今日出版的全部杂志。一本本去读它；同时我还没有那样的兴致。我还怀疑，是否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本百科辞书的知识，能读懂全部的东西，作出正确的批判呢？大概不会有吧！即令真的有的话，他对于现阶段中国文化的了解的程度，也还是一个问题，他有了读懂全部杂志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如果对于现阶段的文化不了解，那这篇论文也还是做不成功的。在我觉得能写这篇文章的人，到不要他全部去读，问题的重心似乎不在全部读上。

按照生活书店《经售全国杂志一览表》上，全国杂志大致分为二十一类。即："一般读物"，"国际·外交·时事"，"社会科学·

政治·法律"，"经济·统计"，"工商·金融"，"军事·交通"，"自然科学·理工"，"化学·电工"，"工艺·工程"，"农村社会·农业·畜牧"，"医药·卫生"，"妇女·家庭"，"教育·体育"，"语文学"，"读书指导目录索引"，"文艺·小品文"，"书报"，"电影·音乐·摄影""学术研究"，"史地"，"儿童读物"。

这种分类自然有许多不合理，重复，凌乱，这是按照营业分的，不过这里与我们全无关系，我们并不注重这些对不对上。我开出这张"一览表"来，仅仅是要使大家看看今日的中国出版的杂志大概有些什么。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还缺些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叫人赶快补足，也不是抽象的站在某一专门科学的立场上，来检讨某一种刊物的内容的正确不正确，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完全是在另一个方面。

我们要问：在中国文化现阶段上，这些出版物尽了一些什么作用，怎样使它尽更大的作用，它的配置当不当，如何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杂志出版者，尽可能做到有计划，编辑者的方针对不对，作家的态度对不对，如何在杂志出版、编辑、撰文上，最大限度执行联合战线这一救亡政策，使中国的杂志出版，负起现阶段的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中应负的使命。

这才是本文的真正的目的。

二　这六七百种杂志怎样产生的，它干了些什么？

目前这六七百种杂志无疑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生产的，为什么中国近年来会有这大量的杂志生产呢？自然，这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有人说，这是中国出版界没落前的反常状态，出版界因为

经济的不景气和出版的不自由弄得无路可走了。大的书店象商务、中华就单靠翻印古书和代政府印票子在维持残局，中等书局也只跟着他们走，但是因为资本有限，不能印大部头的古书，于是就把仅有的资本投到印一折八扣书方面去。兜印票子的生意，那却不是每一个书店可以抢到的。一般专出版新书的书店，尤其因为文学书禁得厉害，再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大家都赶不要本钱的路走，都来出杂志。这些话，虽然有几分对的，但却不能说明今日大量生产杂志的原因。

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今日出版界没落的事实，许多书店在靠花花绿绿的杂志装饰门面，书店老板在利用"不要本钱"，来代人发行杂志，也是事实。但这是极少数的书店，现在大半的杂志，并不是由书店出的，尤其不是大书店出的；因为出杂志，虽然不要大的本钱，却并没有大的利息，不能单靠杂志维持营业，书店老板并不十分高兴干这买卖。

出版这许多杂志的发行家是些什么人呢？

作家个人，学术团体，作家或学术团体与书店合作，书店，政府办的或受政府津贴由书店或个人出名等五种人。

在发行种类上，由作家或个人，由学术团体自己发行或由作家与书店合作的，这类杂志，现在要占绝对多数，这些杂志内容一般都比较充实，销数有的是居杂志发行的权威，他们大半是靠读者来维持开支，完全是以文化为立场的。在发行种类上也占相当地位的，那是政府主办或受津贴的杂志，销数甚微，真正"书店杂志"，除开商务、中华、开明各有一种以外，可以说没有，有的只是些投机杂志，如画报、影刊之类，文艺杂志虽然也有"书店杂志"，但总不能维持长久，所以不列入"书店杂志"以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前思想斗争的激烈．人民要说话，无论如何环境困难都要说话，同时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有话来对付民众，自己不能不出来说话。因此形成了杂志的两极运动，蓬勃的现象。这里也表现了中国大众更关心实践，大家对于实际的问题都在注意，读杂志比读整本书的要求来得大。这才是中国今日大量产生杂志的真原因，是国难一天天严重，民众醒悟与社会抗争的扩大的正确的反映。

至于问到他们过去尽了一些什么作用呢？

这二十二种类的杂志，真正尽过推动时代的进步作用的那就觉得未免太少了。画报、影刊，他们在过去只在供少数暴发户的家庭消遣，专门技术杂志，各大学的所谓纯学术杂志，他们都看不见中国现实，或者只局限于技术，或者还在搬古董，他们还在作为学问而学问的幻梦。这些东西是滥费纸张印工，并没人要读。作家杂志，也有的只在作文人的笔谈，避及现实，有的完全是贩运洋八股，有的虽然也装作不忘现实，但自视很高，自己站在云端里说话。有的是专为和人家闹意气的，除骂人外，不管其他。除开这一些，那真的尽过时代职责的就有限得很了，相反的倾向的东西那更不必说它。

是的，虽然是“有限得很”，也还是足慰的事。我们现在且把那位新自国外回来的朋友的话，介绍出来，作为对这些负过时代任务的杂志的一个总评吧！

从“一二九”到现在，中国一切新型的杂志，那位朋友大概都看过一些。譬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知识》，《第一线》，《动向》，《客观》，《妇女大众》，《读书生活》，《妇女生活》，《生活知识》，《海燕》，《永生》，《时代论坛》等等，他都有一两期，并且《大

众生活》,《世界知识》,《永生》,《读书生活》都是接续看的。他对于“一二九”以后两三个月以来这些杂志有一个共同的感想，就是觉得这些东西,虽然都反映了实践,可是他们间很少注意到各自保存自己的特点,把实践很活泼的从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变成了大家在唱同一个调子,失去了文化多方面在教育大众的作用,并且也觉得太单调了。

他还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他说:“这些刊物都只注意到一部分已有一些觉悟的群众，深恐自己的论调赶不上群众的要求,大家都不顾一切,激昂慷慨的在说话，没有想到没有觉悟的民众并不是少数,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并不就在明天,我们工作为日还长，我们要更沉着一些，要把更广大的人作为我们的对象,要我们的刊物能走遍各地。我们各自要保持自己的特点,我们要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性质、调子的刊物,多面的去接近大众,长期的去教育他们。不要专门变为已有一些觉悟的人的刊物,只图一时的痛快。”

这一番话很感动了我。我不知道其他的杂志主持人，编者看了作何感想，我认为这里恰恰指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缺点的中心,我个人是接受这种指摘的。

因为在编辑上犯了公式主义,打先锋的错误,所以联合救亡战线,在这里不能取得成功,刊物的联络，只能狭隘的找自己的朋友,我们和绝对多数的刊物的距离一天天隔离。因此,我们这些刊物变成了孤军抗战,单独的受到狂风暴雨的打击,在邮禁及地方当局的扣留等待遇下，刊物能达到的区域更是一天天的缩小范围,即令不遭禁令停刊，也会因销路锐减而不能支持营业,传闻将要停刊的《××××》，就是为了经济的原因。我们看了

过去许多有着一时令名的刊物，今日都成了“抗日英雄”，从出版界“退隐”，真正要不胜感慨了。

在发行的配置上，我们也可以找出许多的缺点。同一性质的新刊物的诞生太多，结果是弄得人力分散，发生稿荒，经济力脆弱等现象。作家为了应付各方的写稿，不能不发生粗制滥造，有一个写国际文章的朋友，以同一题材写了四篇文章，应付了四个杂志，其他一个刊物还问他要稿子，他弄得头痛发昏。这里不独没有减弱无政府生产状态，还紊乱了过去发行系统，减弱了自己的力量，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忽视的问题。

在一般撰稿方面，除已经提过的“粗制滥造”以外，不免太偏于热情，欠沉着的态度，不免流入公式的滥调，欠具体、细致的文章，今日我们平心静气的读过去的一切文章，不免令人感觉空虚、单调，我想，只要自己是虚心的作者，谅来不会否认这事实吧！

在杂志出版、编辑、撰稿三者的联系，过去即令做到了一些，那也不过在形式上成功了一部分，离联合战线的胜利的道途还相差很远。

总之我们反观过去，如果从上面这般严格的说来，我们的缺项真是太多，不过，我们自然不能认为这是我们全部的失败，许多错误的造成，也有其造成的原因存在，并且过去所尽的任务，在相当的作用上正是非常光荣的，为了要使今后杂志的出版取着康庄的大道前进，我们因此要追咎过去的缺点，我写到这里，作为一个杂志编辑人的自己真是不胜汗颜了。

三 几个概念

不管我们过去有怎样的缺点，但杂志在过去的救亡运动与大众文化运动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尽过相当的作用，那是毫无疑问的。在今后，我相信，它的地位和作用还不会改变。但我们怎样使它在救亡运动与文化运动上起更大的作用呢？

这确是本文最中心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有要求大家对当前提出联合战线这一救亡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因为只有对这一政策有普遍的了解，系统的在各领域应用后，我们的救亡才会变为广大的全民的行动，在杂志界，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自然只有充分的正确的运用这一政策。这是最最基本的一点。

其次，我们要求大家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作更深刻的了解。因为我们要想在民族解放运动尽言论和教育的职责，我们不独要了解民族解放运动的全轮廓，并且要把握这一运动发展的实践的每一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到今日止还是在艰难困苦的阶段中，前途无疑的还是斗争的连续，全部的胜利决不就是明日。我们不能单凭主观的希望，忽视斗争的阶段，而失沉着应战的态度，只在抽象的鼓励上，作祝祷式的言论。

因此，我们要认明具体的中国，不是幻想中的中国。我们要认清中国社会复杂的性质，中国大众认识的不平衡发展的事实。我们要求今后的文化运动是配合着这不平衡的状态，广大而又深入的教育大众。不要只看见少数进步的分子，把更广大的群众丢掉不顾，把运动自己束缚在极狭隘的范围内。固然，我们要使较前进的分子更往前进，但我们最最重要的还要使落后

的人走向前来，使落伍者不断的走向前来，大家都前进。我们这里不能再容许公式主义的存在，把实践的文化运动的多面性，弄成死板板的公式，无实践内容的东西。

我们还要反对那种看不起文化的不正确的倾向。他们把文化运动看做是“和平运动”，以为民族斗争，用不着什么文化运动，或者把文化运动机械的分为“和平的文化运动和斗争的文化运动”，以为“斗争的文化运动”，一定是要满口的“斗争”、“斗争”方是对的，否则，就变成了“和平的运动”，因此要反对它。这完全是形式主义者的看法。文化运动的斗争性，不在外貌而在内容，离开了实践，“和平”的教育，我们要反对，离开了实践，而空喊斗争，我们也要反对。因为不合实践都不是真的斗争的东西。文化运动有它特有的立场，它的任务是在进行思想的斗争，但它并不要包办一切，统治全部民族解放的战野。文化活动的方式，虽然在今日我们不应忽视民族解放斗争中战术的训练，但并不就因此而不需要一切基本的教育，在外表上好象是和平的教育。今日我们固然要反对复古的文化运动，但也要反对幼稚的、超现实的文化运动。

一个杂志的主持者、编辑人，或撰稿人，似乎都应具以上的概念，才能在今日这激变的文化界站得住足，才能不被复古的恶魔所吞食，才能不被幼稚的倾向所动摇，杂志界同人才能在救亡运动中尽它最大可能的职责。

四　怎样调整无政府生产

我们怎样来“调整”今日杂志的发行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呢？

我们并不幻想做到完全消灭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因为这是

在今日社会关系下所不许可的。我们应多给人自由生产，并鼓励有更大的生产。但我觉得“调整”今日不健全的状态仍是需要的，并且在今日作家发行的杂志占着相当的数目，要使生产弄得更适合实践的需要，发行有系统些，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第一，我想，大家不要眼睛都注意在上海，把发行的区域弄大一点。固然，上海在今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上海出版，可以有许多方便，并且可以把全国读者作为对象，发行一定更广大。但就文化的意义说，今日中国实在更需要有地方的杂志。今日杂志内容一般的空虚，就因为大家把读者对象弄得太广大，很难有独特的特点。譬如现在华中、华北、华南，都缺少有地方性、有丰富内容的杂志。我常常想，倘若在这几个区域，各办一种象以前《大众生活》那种综合的周刊，能确确实实反映地方文化的特点，按当地青年的文化程度，替当地青年解决一切他们要求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一定可以争得广大的读者。就经济说，出一种周刊，如果开支不大，稿费即按千字三元计，有了七八千份的销数，也可以顾到开支，这实在是今日杂志发行路线的一条新道。倘能办到，它可以调整今日发行的不平衡的现象。

第二，各种杂志千万要注意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对象是些什么人，发挥自己的特点。林语堂先生曾慨叹中国没有好的杂志文读，在以前的《人间世》上，特别介绍外国杂志文，我们很同感，为什么中国不会有好的杂志文呢？原因自然不只一个，可是中国杂志发行人没有固定自己对象是些什么人，是主要原因，因此应该说些什么入情入理的话，编辑先生就未想过。只是随便去找作家，拉稿子，失掉了特殊性。所以往往同一个稿子，在

许多杂志上都可登出。杂志文从此就失掉“灵魂”了。

我想——又是想，如果每一个杂志都注意自己的对象，自己的特点，尽量去发挥自己的特点，说它想说的话，那话一定说得动听、真切。譬如一个高级的专谈国际问题的杂志，尽可以专向国际知识及研究材料，尽可能的方面深化，吸住爱好这一部分的读者就得了，不必更野心的去夺其他杂志的读者。以高级公职员为对象，以趣味为目的的杂志，尽可专谈趣味，不必要天下人都如此，也不必宣传趣味高于一切，在公职员外不必一定要再想找其他的读者。这不过是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总之，每一种杂志，以发挥它的特性为原则。

这里，绝对不应该专门模仿，看了王麻子的生意好，马上来它一个汪麻子、万麻子，这不独不合文化分工的原则，并且这也不会取得广大的读者。今日市面上模仿的杂志很不少，内容的性质大致相同，甚至连分栏、标题、封面的式样完全相同，但模仿的东西，大致因质的贫弱，总难通过读者的眼睛，出不上几期，就看不到它的踪迹了。我希望作家的杂志中，如果自问某几种杂志的性质，对象既然全相同，到不如节省经济，集中人力，来它一个合并运动，那到是调整这紊乱的发行上一个最良的办法。

第三，许多不同种类的杂志，一面各自注意各自的特点，发挥它的特点，一面要在救亡上，互相结合起来，形成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不是要大家放弃了特点，同说一样的话语，而是同一政治要求，通过你的特点，去反映它。反映的程度，虽然越反映得多越好，但不一定要和矮子为难，违反生理的把他拉长。譬如，你谈趣味，你就在趣味中去讽刺黑暗吧！能刺得看的人有些痛，

因而得到觉悟，固然更好，只能使他不安也可以。你在这以外，不能反映得更多，也可以，只要你把讽刺用到反映现实上来，尽你最大的可能。一种消闲的画报吧！也希望能多印出几张现实的照片、图画，使丑恶的现实、民族的危机和千千万万同胞所遭受的亡国惨痛，这些影像，带到阔人的会客室中去，也就尽了相当的作用了。音乐杂志能不忘民众的歌咏，多介绍大众的歌曲，戏剧杂志能多介绍国难剧本，技术杂志能与现实联系，也就颇可说一声满人意了。

至于政治、经济的杂志呢？不管属于任何学派，在学理上固然有真伪之分，那另是一个问题，但当前只要在救亡的一点上，各自发挥自己的主张，只要于救国有益，一样尽了救亡之责；其他学术杂志，亦无不如此。我们这里也要有最大的宽容，我们要尽可能的动员每一丝一毫力量，在救亡的言论上。要这样才是联合战线在杂志界的系统的运用。联合战线在言论界，不应先悬出一种什么标准，不合这标准，就认它是汉奸，那是所谓狭隘主义，关闭救亡的大门。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把救亡的大门打开不许有谁包办！我们要扩大杂志在言论界的地位，我们要让每个杂志都说话。我们现在也要象政治上一样，不分宗派、思想、政治主张的如何不同，只要你不作替侵略者汉奸的文化宣传，我们都认为是同盟者，都可以结成联合战线。

自然，思想的斗争、学术的辩论、策略的论战，这里还是不免的，但除开是站在汉奸立场外，我们应该采取友谊的争辩，用真理说服的态度，使真理更接近于广大的大众。这样一来，我们因为基于救亡的共同要求上，也就把发行业务上的无政府状态真正的“调整”了。

五　为编者作者进半言

对于编辑方针和作家撰文的态度方面，似乎在这里还要略为进言。现在且提出几个要点来，以供大家的讨论吧！

关于编辑的方针，在上面实在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还要赘说的是，一个杂志编者应把握客观实践的发展，灵活的在自己刊物的特点上反映出来。注意到读者对象的接受性，沉着的教育大众，不要因为空气的狂热，自己失掉“理性”，不知不觉变成了公式主义者，离开了读者。其次，要注意到你的刊物能走到全国为最高原则，要注意环境。不能不顾到环境，不要抱着打先锋的主义，只图一时的痛快，弄得刊物的短命，或发行范围不广，这在今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是要我们屈服环境，不想法子冲破环境，自己变成一个绝对客观主义者。恰恰相反，我们要冲破环境，扩大说话的限度，但不是单靠自己的笔，我们凭借的力量是广大的读者，只有一个刊物在群众中发生了广大的影响，我们的言论，才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压迫者才有所畏惧。要争取言论自由，固然有许多法子，但决不是采一时泄愤，或投机的方式可以达到，而最基本的恐怕是在大众中造成了深厚的力量后才有胜利的。

注意啊！我们不能向地下发展！爱国言论，救亡教育是要公开给各阶层的大众的。谁敢要我们不爱国，谁敢要人民不救亡！我们不要忘了一切在白日中进行，对万千人说话，我们不怕人听见，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人们，什么也不秘密、不隐藏，我们爱国、救亡，在敌人面前也不否认、不隐藏。

编者与作者也应该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编者不得作者的合

作，是唱不出好戏来的。作者如果不了解以上的意义与原则，那也一定写不出适合一个刊物性质的好东西来。作者的撰文，不仅由他的能力来决定，还要看他如何反映实践。现在有一个危机，就是有一部分读者特别“前进”（？）要求作者的是写得更痛快，作者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不知不觉中那枝笔写下来的东西就特别尖锐，这原来不是坏的现象，不过，这一来，不是妨害了这个刊物的存在，就是那高的调子只能适合极少数人快意，不能为更广大的读者所能接受，因此，反减少教育的作用了。还有，就是过于把调子提高，在客观上妨害联合战线的建立，这都是过去的事实。我们在过去常听见人说：

“某甲又在什么刊物上放了一个大炮了。哈哈！”

“某乙真说得痛快！”

“我写了一篇东西，拿到某某刊物去了，看它肯不肯登出。”

“他的胆子太小，竟把我的文章退回。”

我们要知道，一篇文章的作用，重在影响别人，专能快意不是我们的目的，作者故意提高调子去难一个受到环境的限制的编者，更失了合作之道，与今日文化运动的步调是不合的。

还有，那就是粗制滥造的问题。今日中国杂志文的内容的空虚，文体的枯燥无味与公式化，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大半的原因是作者生活的艰难，写文章的人太少，因而产生出这样的结果。现在我们到处听见找不到写文章的人的声音了。于是少数知名的作者，定货压集，难于应付。这确是今日一个不好的现象。这一面，我们希望编者注意对新作者的提拔、培植，也希望今日著作人协会及文艺家协会或个人尽一点对后进作者教育的义务，使这畸形的现象慢慢克服。

使可读的杂志文在不久的中国杂志上跳跃出来，把中国的杂志在质的方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去。

这是要求发行人、编者、作家三方面的合作。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杂志在不久的将来，仍然是占文化运动很重要的地位的，它是否能克尽比过去更大的职责，这完全看我们如何努力。我这一篇拉杂的话的提出，不过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的意见对不对，自然还望大家的批评，现在就搁笔等候朋友们的见教吧！

国难与文化

《国难与文化》，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黑白丛书社出版。

几月来的感想

近半年来，个人的感想真是太多了。半年来的世界，半年来的中国，真所谓“变化多端”，世界与中国都在惊涛骇浪中，没有一刻宁静过。由这巨吼的涛声里，我感觉的是什么呢？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自我醒觉的要求，我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生活着的这所谓文化的环境，都生出了一种重新估量与认识的感想，对于过去我有着无限的感怀与自责，我强烈的要求检讨过去，与更进一步的认明现在与将来。

这一种感想，我也从许多友人的感喟中感觉到，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神经过敏，几乎也是与我同一生活内容的一切友人的共同的心怀。我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了一种自喜，我想道，这也许就是中国民族自我醒觉的要求的一种反映吧。果如此，这原是新生之前必然有的现象啊！

我没有时间来漫谈个人身心的感触与变化，这里我要谈的只是半年来我在这所谓文化环境里所看到听到感到的事物。记得我最早对于当前文化事业的一些不满，自然是属于一种杂感，我所接触到的文化部门，我所看到的一些具体事例，我怀疑，我不满，因此也逼得自己说了不少的话。有时，也因别人的感到，别人的怀疑和批评，因此引起我去考察，而把我的怀疑和不满越加扩大。譬如去岁我在香港时，就因和朋友们的闲谈中，谈到了

许多问题，我发生了许多感慨，在《生活日报》的“周报”里，我写了不少的文章(现均收在《实践论》中)，后来回到上海，才知道，那些文章也很引了一些朋友们的注意。在文化许多部门中，我们一天天碰到有人在对空想的或机械的观点、公式主义，过去那种传统的偏狭性以及旧的工作方式表示不满；渐渐的，大家都觉得照着这样的现状弄下去，不是办法，普泛的存在着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要求改造的心理。我们真的到处都听到不满的声音了。

在最近数月中，各种刊物上常看见批评当前文化的文字，这决不是偶然的。我尤其对于蒋弗华先生的《青年思想独立定言》，和由炯之先生提出的“反差不多运动”，觉得非常的值得注意。虽然蒋先生对于当前的思想运动也仅仅在消极方面痛下了许多切实的批评，对于青年喊出“思想独立”、“尊重知识”，并没有告诉我们过去的思想运动的错误在那里，当前的思想运动应该怎样，但仍旧有它的价值存在，至少蒋先生已对当前思想运动提出改革的口号来了。至于炯之先生对文艺作家喊出“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就是“反差不多”运动，这不过是反对文艺中的公式主义的意思，这一种批评自然也有他的意义，绝不因炯之先生把文艺上的“差不多”的毛病一概归到“前进”的作家，把自己除外，就认为他指出的毛病不值得我们注意。这两篇文章，至少是说明了到处对于当前文化现象都在表示不满，并且直接由于文化人口中喊出了。

是的，我们今日听到的还多半是消极的批评，积极的对于中国文化运动的规划我们几乎还没有听到。我回想过去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文章，现在翻开再读时，也觉得指摘的地方多过建议，

并且是单就一个一个问题而说的话，很少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问题，作一全盘的考虑。直到今日止，我们虽然也读到了陈伯达先生提出的《论新启蒙运动》，可是陈先生也仅仅在这时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一个问题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只算是开了一个头，就没有下文了。此外艾思奇先生在去岁《生活星期刊》的"双十特辑"里，也谈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但因篇幅的关系，艾先生也并未能将中国文化问题的各方面都讨论到，主要的仅仅告诉了我们今日需要的文化运动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虽然，这些意见都是很宝贵的，但就问题的全面说，这些意见还只能当作讨论的材料，并未给我们对整个问题，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

越到近来，由于许多实际的问题，由于许多文化人对当前万花缭乱的现实现象，感到混沌不清，那种自我醒觉的要求更普泛的在许多人的脑中滋长了，我亲自从一个文化的友人的口中听到他愤慨的问："我们过去到底干了一些什么？"这问题很打动了我，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的是有许多人在等待着的。我们要解决了这一个问题，我们才能正确的觅得今后的方向，决定今后的步伐。

在过去这一个问题，自然也颇广泛的被人谈论过，但正确的答案并未做出来。检讨过去是等于清算烂账，是一件繁重工作，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作出的。我和几个朋友在几次的聚谈中，觉得在我们开始清算过去之前，我们还要多做一点准备工作，甚至于对文化运动是什么，思想运动是什么，这些概念都非重新加以确定不可，不然单从枝枝节节上讨论问题，仍不能找出这笔烂账的线索来。我们在把这些基本的概念认明了后，我们来看过去，

来检讨这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化运动所走的道程，所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它的传统给我们今日实际的文化事业又是怎样的影响，今日中国文化运动的病症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来对今后的规划，作一番积极的建议。可惜的是朋友们的聚会不常，我们除开在讨论基本概念时，彼此交换了许多意见外，我们只留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轮廓，在无可如何中，我来把这一繁重的问题作了一回全部的考察，我知道，我没这样的能力来胜任这种工作，不过，既然自己有这种感觉，而又得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和鼓励，因此也不害羞的将我研究的结论写下来，在这统一救国的声浪震动全国的今日，文化在救国中的任务自然是构成了一个重要部分，那末，这些不成熟的浅见，就作为我个人的一种私见而提出吧！如果由这些浅见能引起全国文化界诸先进的注意，那自然是我意外的荣幸了。

中国文化往何处去？这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怎样来认识它呢？单止不满是不够的。

什么是思想运动与文化运动

我常常感到一个在实际运动中的人，因为无数具体的问题堆集在他的脑子内，很少有机会使他想到原则上的问题，因此他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常常看轻理论，譬如，我要对一个在实际文化运动中的人提出“什么是文化运动”来问他，他一定要把眼睛睁得老大向你道：“老柳：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来和你谈这样的问题”，他以为这一个问题是老早就解决了的，用不着再谈，这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

但一个从事实际的文化工作者，一定非对运动本身有明确的了解不可。当前中国文化运动上的许多纠纷，混乱，归结到最后，也还可达到最根本的认识问题上去。所以，现在虽然明明知道许多人都忙，也许不大高兴来讨论什么原则吧！但我仍觉得在检讨中国文化运动实际的问题以前，首先还有专就与一切具体问题有关的理论的回顾的必要。我要重新向大家提出，“什么是文化运动”一个问题来。

我们听了这一个问题后，如果我们原是有了初步社会科学知识的人，一定脑中会记起：社会的构造是由下层基础和上部建筑合成的，下层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上部建筑却又可分为上部建筑一和上部建筑二，一是政治法制的生活过程，二是社会意识诸形态的过程。平日我们所谓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会的上部

建筑二，所以我们说文化斗争就是意识斗争，因为这一斗争的战野是属于意识的范围。某一特定社会的文化既是某一特定社会经济的产物，为什么文化还有什么运动与斗争呢？这是因为上部建筑相互间原来都互有影响，并且对经济基础也有影响，生活的物质条件虽是主要原因，但意识的部分对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可以发生相反的第二义的作用，因此意识斗争不仅也是促成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一种力量，并且这力量往往变为一种新社会秩序到来的引导。我们又知道，社会结构下层基础，上部建筑，这些名词，在这里并不是代表着静止的意思，社会的结构也不能想象为某一特定的社会，就是某一特定社会纯粹的姿态，一点不夹杂过去时代的残渣，而是极复杂的因素构成的；作为特定社会的标志的，不过是就其主导的力而说的罢了。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这东西，抽出了人的要素，就会变为完全不可想象的事，人类过去的历史，就是人类全部社会斗争的纪录，社会斗争包括人类的一切斗争，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等。更正确的说，文化斗争是属于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思想斗争又是属于文化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斗争，虽总合起来，都是社会斗争，但各自有各自一定的领域，文化斗争虽也就是一种政治形式的斗争，但文化斗争并不就是政治斗争，它不能代替全部的政治斗争，犹之思想斗争虽是文化斗争的精髓，但思想斗争却只占文化斗争的一部分，思想斗争仍有它自己的领域，不能代替文化斗争。我们要能不将这些斗争的领域混乱，我们才能认明各自的特殊任务，才能规定各领域内最最实际而又正确的方向。

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文化运动，但我在以上说过，文化运动是一种意识斗争，文化斗争的精髓是思想斗争，文化斗争与思想

斗争的差别，不过在文化斗争的范围比思想斗争来得大，文化斗争可以说是思想斗争具体化，或是思想斗争在整个意识领域的活动。所以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文化运动总是带着一种思想的运动，我们要了解文化运动是什么，就不能不先明白思想运动是什么，以及思想运动在历史发展中的许多特点。

第一，从性质说，思想斗争在全部社会斗争中，它并不是社会最根本的斗争，它是属于上层的斗争，它的斗争方式并不象政治经济斗争的直接，虽然这一斗争的发生仍根据一定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并为经济政治所决定，但它的发生并不是在政治上已有明白的要求后，恰恰相反，它是在政治斗争明朗化以前，它就以一种思潮而出现，且对政治具有一种领导作用。所以我们常说意识斗争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当一种思潮出现时，原看不出革命的形势，而这思潮里却带来了革命的种子，包含有新政治形态的影子，因为这斗争的方式不象政治经济那样直接，所以思想斗争每每现出它的恒久性、散漫性。因为社会的变革并不能单由思想斗争所完成，思想斗争不过引导出以后的政治的决斗。所以在政治斗争没有获得胜利前，自然它未完成它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任务完成以后，为了巩固这新的社会秩序，肃清旧社会意识的残余，也仍是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它的使命仍未终结。所以我们看见思想斗争的持久性，并不象政治斗争的多变化，富散漫性。因为思想斗争在未变为广大的社会思潮，带着明确的政治要求以前，这一斗争的出现，起初不过由极少数先进的知识者，反映群众的要求，天才的提出，并不一开始就是群众斗争。一种思想变为思潮，那是因为这思想实际的反映了群众的要求，而确实代表了无数人们脑中的憧憬，说出无数人们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这

些话，马上再反映到群众身上，而变为群众的广大的思潮，形成运动。在开始，在一两个哲学家的辩论中，几个文学家的写作中，少数人对于宗教的不满发出要求改造的言论中，是还看不到这原是群众的要求，这就是斗争的起点呢。所以在思想斗争上，也缺乏政治斗争的规律性，而现出散漫的现象。我们今日回顾某一国家一时期的社会思想的发展史，我们常常看见，在社会斗争未白热化以前，那些思想上的斗士，他并不自觉自己是在领导一种革命，他不过觉得从他的良心、正义、真实方面，要那样说话罢了。

第二，从斗争的对象说，思想斗争的对象是思想本身，不能超过它的斗争的范围，如果超过思想范围，它就不能发挥它的效果。思想斗争在一定的阶段上，它是针对着一定的保守的腐烂的思想体系，是在意识的领域内，击破群众的成见和愚蒙，启发他们新的思想。这种斗争是无所不入的深入群众，在广大的意识范围内展开的，不能把它过于束缚在狭隘的政治任务内，使运动的范围缩小，变成思想运动代替了政治运动，结果反妨害了思想本身的斗争。

第三，从斗争的内容说，思想斗争的内容必定是从群众实际的要求中产生出来，这些群众的要求，自然又基于当时政治经济的条件所育成的。思想斗争的内容不仅是思想体系间抽象的理论的斗争，同时，最最主要的是一个个的具体的实践的问题。因为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所碰到的是一个个的问题，要求解答，一般并不注意到思想体系的问题，所以思想斗争，最怕的是仅仅做了高级的体系之争，而忽视日常更深入的实际思想斗争。实际的思想斗争，每每具体化为各种文化部门中的斗争，或化为政治理

论的斗争。

第四，从斗争的效果说，思想斗争的效果由于斗争性质不同，也与政治斗争不相同。它是比较政治斗争少动摇性，比较稳固。在政治斗争中，一政党被另一政党者击败，党内必然陷入紊乱，群众失去了领导，那失败之象马上现出，在军事斗争中，军事解体，可以达到无法恢复，完全惨败。但思想斗争却不然，它的胜利，固然不能象政治或军事的胜利是那么一种肯定和突变的现象，但也不如政治军事那样容易遭受打击。在社会斗争过程中，思想斗争是最顽强一道火线。统治思想虽然利用权力的高压，取得思想的支配权，阻碍新思想的发展，但它无法消灭新思想的发展。思想斗争力的估量，很难单凭数量来看，因为一个思想家出现在思想阵线上，虽是一个个人，但他却代表广大的群众，因此，统治者常不敢轻于打击一个手无寸铁的思想家，却敢随便用刀去取一个政敌的头。在某一时期，思想斗争在表面上是被镇压，或宣告失败了，在事实上或反惹起更大的反抗，在暗中正在制造具有更大威力的炸弹。

第五，从斗争的方法说，思想斗争比其他斗争更适于游击战。因为由以上的性质，我们知道这一斗争的特点不在于速战、歼灭战，因为在思想斗争上，我们不能有军事的战术，我们仅仅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想来统治群众的头脑，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你要说服群众是要把你的思想融化在你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的解答中，你要在每一个大小问题上，都尽了你的思想斗争，你才能支配他。

在思想斗争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找出以上的特点，但是，我们要了解当前的思想斗争，单单把握了这几个特点远不够，

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去检讨在历史进入近阶段中，思想斗争的特质。

我们不否认以上的特点，在了解当前思想斗争时，仍有需要，但人类历史发展到今日，社会的变革变得这样明白之后，思想斗争所采的形态，已比历史上所出现的要减少了它的迟缓性、散漫性，而转向一种有组织的前哨战了。同时它带着更强烈的政治的面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今日两个世界的对立，变为实际的事实，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已被事实所证明，这一现实的存在，改变了人类的头脑，促成思想斗争实践化（政治化）。这里维持旧社会秩序与创造新秩序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命运都看得明明白白。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不似历史上那样一拉长动辄数十百年，因为在今日属于解放的思想系统早已完成，这一思想系统因为是代表实践的真理，它实际上在领导现实生活的斗争，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在思想斗争的进程上，我们常常碰到乍看仿佛不能明白的现象，其实是必然发现的一种飞跃。在旧的思想体系中，这时它为抵抗这新的思潮，几乎把所有能够动员的死尸都搬出来。所以在今日的思想斗争中，我们看见意、德、日本强制的思想统治，我们看见苏联极力在清算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成二大对立的意识斗争，双方都在强调着。这种斗争在世界各角落里开展，而且其残酷的程度也不减军事的斗争。

思想的斗争在今日已明明白白变为政治斗争一顽强的分野，它适应着政治上的新要求，而以一种新形态出现，这是当前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

我们在说明思想斗争的本质以后，我们现在来答复什么是

文化运动，那已没有什么困难了。文化运动，前面已经说过，它是扩大的思想运动，是思想运动在各意识领域中的实践。我们既然把握住了今日思想运动的中心，思想运动的许多特点，那末，这些特点也同样反映在文化运动上。文化运动离不开以一种思想运动作中心，文化运动离不开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文化运动不应该变为政治口号的尾巴，不应该象政治一样，太富策略的变动性。所以文化斗争应配合着政治斗争，不是说，文化跟随着政治的每一变动，而必需改变它的内容，而是文化斗争不应落在政治以后，说得更正确些，文化斗争应该在政治的前面，替政治开辟道路。文化斗争有它特殊任务，它并不就是政治斗争的本身，它不能代替政治斗争，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文化斗争超过了自己的任务，那末，它的效果也就变为薄弱，它不但不能有助于政治的开展，相反的，它会减弱政治斗争的力量。一种新的政治形势，如果没有新的文化相掩护，这一形势是不易开展，甚或不能支持的，因为这一政治不能取得广大的群众支持，则这一政治的基础的脆弱，必然影响它的存在。

在文化运动中，自然也有它的策略，尤其在今日的文化运动，是变为较有组织的一种意识运动了；但策略是在文化运动以内的，随着整个现实的不同，文化上应采取效能最大的方向，而并不是把文化运动去机械的配合政治的策略，把它本身变为一种策略。

这许多问题是否已经为每一个参加实际文化工作的人所想到了呢？

从五四运动到今日

"过去我们到底干了一些什么呢?"在我们讨论当前文化运动实践的诸问题以前,我们来作一鸟瞰吧。

全部中国文化史的考察,不是这里所能办到的事,也不是我们当前极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里想探讨的是辛亥革命到今日这一阶段里的文化运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到底干了一些什么?"

从上节我们知道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的文化,中国这几十年的文化运动自然是指基于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上层运动,一种意识斗争。我们今日的考察,虽然暂时假定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但辛亥革命是一种政治的变革,我们想到这一革命的成功,不能不再追溯到这一革命的意识的阶段去,不能不想到戊戌政变前后,想到辛亥革命前夜,在文化上所发生的许多现象,不然我们也会不能了解辛亥革命,不能了解以后这几十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一长时期的中国文化的斗争,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及政治演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虽然本身就是一个繁重的问题,到今日止,"论战"也似乎还未结束,但大体的轮廓我们是弄清楚了的。

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自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

它的内部起了极其庞杂的变化。这一老大的封建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光临就开始解体了。“资本主义虽以自己的模型改变世界”，但中国这几十年来并没有将自己的原形完全脱变，穿上资本主义的衣裳，一直到今日止，中国仍停留在半殖民地的状况中，虽然半殖民地并不是一种特别社会形式，可是它在今日却具有特别的发展状态。这里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极矛盾极不平衡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的间隔，沿海各省经济和腹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历史上未有先例的奇观，从社会经济的要素说，这里有资本主义的，有封建的，甚或还保有更原始的，在同一时代肩并肩的存在着。旧的要素虽然不断的在没落崩溃中，但新的要素却无能取得支配的地位，代替旧的腐败物。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已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的阶段的缘故，帝国主义虽然用炮舰轰碎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种子，却无意扫荡封建的存续物，恰恰相反，它在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幼儿成长，维持封建的残余，造成它的殖民地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虽然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但经不得一点风吹雨打，就枯萎下去。虽然在现象形态上，中国是一天天现代化，中国经济部门，确也带着资本主义的装束，譬如近几年的所谓中国经济建设以及目前农民银行的发展，好象这是资本主义又在抬头，并且渐渐扩大到农村去，中国一天天在资本主义化了；实则中国民族资本早已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在那里苟延残喘。当前的所谓经济建设不是在替帝国主义布置大战，扩大商品市场，发展交通线，就是做了一些不足轻重粉饰太平的点缀，农民银行的扩大，也不能看作正常的农村投资，仅仅是高利贷采取了一种有组织的形式罢了。

中国社会经济决不因这些微末的变化而改变它那半封建性质。

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中国政治的演变吧。清朝统治的倒坏只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动摇的表现，却不是毁坏。辛亥革命表面上虽然造成了共和民主政体，实际并未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艾思奇先生说这次革命"只能看做从稳定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社会之解体的一种过程"，是有理由的。辛亥革命虽然带有市民层的民主革命性质，却是非常脆弱的、稀薄的。辛亥革命的结果没有完成民主的任务，而一变为军阀割据的局面，"从整个的封建社会，变而为分崩离析的封建社会"，决不能简单归之于负担了这一历史任务的人所用的策略的错误，或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不该让位给袁世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内战是封建组织解体的成果，也是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封建残余势力的证据，国际帝国主义争夺其势力圈的反映。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不能走上民主的正轨，不是无原故的。这二十五年来中国政治的演变，实在看不出本质上有什么大的差异，虽然这中间有着宣统复辟的失败，中国国民革命的兴起，值得我们的注意。复辟的失败只能说明中国再不能回复到集权式的封建社会去，国民革命虽然在执行辛亥革命未竟之业，但到今日止，诚如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云，"革命尚未成功"。今日我们无可讳言的国内还有封建割据的形式存在，政治并不见清明，离民主的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二十几年来的中国政治复杂的现象，我们都知道不是出于偶然，一切都可从中国社会经济中找到根据。中国脆弱的市民层一直到今日没有壮大起来，担负了他正常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虽然略带一点革命性，但政权在政治倒坏中，就仍复归到地主阶层之手，这二十五年中，民族资本虽然也参加过国

民革命最光荣的历史，但因顾虑太多，终不能不和封建残余的势力和帝国主义妥协，只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三位一体的政治的参加者，不能唱出独立的戏来。

这就是中国社会"上部建筑一"的一点轮廓。

由这样的地基上孕育出来的中国文化，它的发展形式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状态来，我们且先来看看所谓辛亥革命的意识阶段吧。

严格的说来，辛亥革命的意识阶段是做得太不充分的，虽然我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几次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出中国社会上部的意识形态起了动摇，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于世界已有了另一种观念，再不是闭关以前那么妄自尊大了。随着帝国主义商品带来的也有着资本主义的文化，这是必然的现象。在思想方面，自由思想也乘机的输入，严复的翻译，《新民丛报》等的出版，都可说是中国近代思想运动上最初资本主义型的新思想之具体的表现。不过，这一时期反映在士大夫思想上的并不是扬弃旧思想，而完全无条件接受自由思想，而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上，有条件的接受人家的物质文明，所谓"船坚炮利"、"生计之学"，其他忠君孝亲、礼义廉耻、旧的风俗、道德、制度、法律、文艺、美术无一不在维持它，文化所出现的是半迎半拒的折衷的态度。虽然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思想中确也反映了一点新的东西，但并不能说就是当时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思想上明白的出现，因为康氏的《大同书》，到底还是同出于儒家的空想写出来的东西。戊戌政变虽然是中国意识的自觉更明白的表现，但结果是失败的。这一切运动仍止限于几个出身士大夫的上层思想家，这些先觉的叫喊并未获得广大群众的呼应，广大的群众仍在

做着“真命天子”的迷梦。

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虽然以新的姿态出现，但当时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并没有多少，当时许多留学生同情革命也多半不是接受孙中山先生伟大的民族思想，而只是赞成狭隘的种族革命。孙先生自己说过“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窃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没，几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之党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而已。迄于庚子，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这一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能了解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人是如何的少，至于会党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也不过在“反清复明”（虽然中山先生已不主张复明）的意义上。“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大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众，……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太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动念矣”，这确是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得到了一部分影响，但这些士林中人，以自己出身地主阶层之故，一开始对“平均地权”就并无兴趣，同情革命，只是当时清廷腐烂之象已现，一种由不满感而要求的改革而已，至于改革的图样，在他们的脑中并不十分明确。这在这一革命流产后，中山先生自己的话里说得明明白白：“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余主张的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里我们看出辛亥革命运动的最大缺点之一是意识上的工作做得太贫弱。政治革命中缺少了

文化斗争的一面。革命的主义不独始终没有得到群众的反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并且也没有说服自己的党人。革命党的行动更只是在狭隘的排满这一口号下，与一部分流氓无产阶层相结合，在军事投机下进行恐怖政策、盲动政策。革命是在清廷自腐与外患日亟的时机里诞生的。所以革命一旦成功，革命的胜利即无法保障，革命即告流产。

这一段历史，我个人尚有新鲜的记忆，当革命的前夜，我虽然仅仅是一个刚入小学的儿童，脑中却充满着革命的传奇。当时黄克强先生是儿童脑中的新英雄，他在湖南现过身手的，我们都听见说过。我们当时对革命的印象是暗杀、放手枪、掷炸弹、杀满洲人、运动军队叛变。我们当时也看见过革命党人，听见他们说话，但绝对没有听见他们除开某月某日起事之类的言论外，还有什么意识的宣传。一种与政治相配合的文化运动自然更不能想象了。

是的，我们不能说辛亥革命完全没有经过一个思想引导的过程，但在意识上所反映的现象，正与中国社会发展形式特点相同，是由于半封建性所决定了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自由的思想对于中国终只是一种输入品，没有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根成长，少数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新思想，在辛亥革命时代，没有扩大为广大的民族思潮，所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不独与群众相隔太远，就是自己的同志也同样隔得很远。因为革命在另一形式下早熟了，超过社会发展的速度，使中国文化史上，几乎可说空了这一阶段的记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少了这一段过程，使辛亥革命抽去了真正的民主性，这未满足月早离母胎的婴儿，生是生下地了，可是一出世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东西。

这一段空白终于有了五四运动来填补它。中国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实在到五四运动才成为一种运动。这一崭新的文化运动是中国民族自我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第一次以群众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人比拟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实在不能说他过当。但是中国这一文艺复兴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生的呢？

谁都知道，这是中国乘着欧洲大战，帝国主义一时无暇兼顾远东的侵略，中国从受资本主义薰染的地位进而养成了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本这时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缓中，因此抬头，它在这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中表现了它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力的面貌。这一刺激在中国社会意识上就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同于过去的戊戌政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地方，就在这一运动是普泛的反映了中等社会层在实际生活中的要求。这一运动中，"反对日本"、"打倒卖国贼"的群众的爱国运动的意义，我们固然不能忽视它，但我们觉得它那最大的意义还不在此，而是在对于"中古的"传统思想，全部起了怀疑，公开的宣告了反叛。那时中等社会层的青年间有的是怀疑，有的是许多在自己是不能解决而又必要求解决的问题，在苦闷中等答案。这些要求反映到当时运动中去，我们就看出这一运动的多面性、复杂性，和那蓬蓬勃勃的状态。的确，"打倒孔家店"、"个性的解放"、家庭婚姻问题、提倡白话文，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都获得广大群众的响应，因为这一切正是大家要求解决的问题，这里只要有人一提出就全国风靡，成为了一种广大的思潮，大家的思想都在要求解放，对于旧社会意识，都恨不得一脚踢开，但是大家

把这一热情散发后，不免就会自觉道，那末我们要吸取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的粮食呢？

当时虽然已请出了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在哲学思想与世界文学艺术诸方面都有人出来介绍，以应国人的饥荒，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并不会因对"孔家店"捣毁了一扇门墙就宣告死灭，"野火烧未尽，春来草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似乎红极一时，可惜的是我们这暴发户的根底太浅，他们也就无能发展他们的威力。外来思想、文化的介绍，又因自己无选择能力，无批判的介绍，所以显得非常的庞杂，弄成了一时混乱，使人感觉万花缭乱，无所适从。如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能够继续突飞猛进，文化上这时所现出的饥不择食的现象，原系一种过渡性质，并不能说是坏的现象，可惜的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高潮期，也就是抛物线的顶点，接着来的大战终结后，国际帝国主义更以残酷的侵略君临中国，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线从此往下降落，一蹶不振。这反映到中国文化运动上，是这一运动不能更向前深入，扩大，打"孔家店"虽然动摇过孔教，却并未真的将一切封建意识彻底的批判，科学精神虽然被人提起了，并且反对过迷信与独断，但所谓科学方法到后来最大的用处只留在"整理国故"，一切社会问题虽被提出，但都没有能力提出改革的意见，甚至连解释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广大的青年要求解决的问题，可说仍然未动。不过，比起五四以前的情形，却大不相同，过去是混沌不清，现在是自觉得痛苦，而尚找不出根源与解决的方法。外来思想与文化也因时间太短，不能深入。社会组织的幼弱、不健全，而现出文化发展的短促和不坚定性，一种新思想、新文化，一介绍到中国来，热了一个时期，必然就冷下去，内部封建

意识不断的复活，外来思想不能深入民众，变为自己的东西，结果是这伟大的运动仍害着早熟病，未老即萎缩下去。

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并未有充分完成它的任务，东方精神文明的呼声又复高唱入云，不独自己家里玄学鬼都复归宫殿，并且在外面还招了救兵，请来了泰戈尔，动员了杜里舒，同时又请教了柏格森，从这时起，我们看出中国思想运动所走的道路的特点来了。中国的思想运动已经不再走着缓慢的步伐。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内容是极复杂的，虽然它只以极简单的形式表现。欧洲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史，在今日的中国不许你有这许多时光，它只给你五六年短促的一瞥，就过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本书第二节中已略说过了，这里用不着多说。

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五年的国民革命这一段时间中，一方面可以说是文化运动的退潮期。但中国思想运动却不因封建思想的复活而停止向前跃进。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在这以后的发展是急激的向破灭开展，民族资本的枯萎，农村的破产，全国各社会层的民众赤贫化，这一时期，中国自我觉醒已由五四时代中等阶层而扩大到工农群众。更加上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一天天加大，世界革命的动乱席卷全世界，俄国革命由胜利而日趋巩固，中国群众这时已感到现在自身感觉的问题已不是五四时代提出的什么赛先生、德先生，更不是胡适先生所谈的实用主义和好人政府之类的答案可以解决得了。“历史的法则已显露于全世界人民之前”，“中国人民的命运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命运在同一前途上看见同一曙光了”。从生活的艰辛与世界思潮的激荡、时势的转变，使中国思想运动的过程缩短、早熟，使中国文化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更加激烈。新的社会科学，科学的社会主义

的思潮，渐渐在中国抬头。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新青年》杂志，它不仅在“五四”阶段中尽了它的向封建意识反叛领导的作用，同时它也对新社会科学思潮的介绍，尽过相当的启蒙之责。

接着一九二五年的国民革命到来了，国民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再兴，是辛亥革命的延续。这一革命爆发于一九二五年，并不是当着民族资本主义的高潮期，恰恰相反，它是在高潮以后。民族资本阶层参加这一运动，我们似乎只可说由于他们一种失败后的反抗。这一种反抗为什么能支持这一伟大的运动呢？我们晓得单靠这一脆弱阶层的反抗情绪是支持不了这一运动的，这一革命能够爆发出来，是因为这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普泛的有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要求，工农群众已变为反帝反封建最大的力量了，这里产生了一种为“民主”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的阶层间联合的行动。因此这一运动无论在意识上、政略上、军事上都高过辛亥革命，它完全是以一种近代的革命运动的姿态出现。自然，中国在一九二五年能爆发出这一运动来却不能不追溯到五四运动，它把中国中等社会层的意识解放过来，以后社会科学的启蒙运动，它指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是经过相当的意识阶段而形成的革命运动，决不是象辛亥革命那样潦草作成的。

然而，革命又第二次的流产了。现在回忆过去，我们真是不胜其感慨。一九二五年的国民革命在文化运动的方面是否配合着当时的政治形势呢？

从事后看来，那是相隔很远的，那时文化运动明明的落在政治运动以后。因为政治的演变过速，文化运动实在追赶不上去。那时从事政治运动的个人或政党，即令不忽视文化运动，在事实

上也只把文化运动当作一种补充物。许多政治上的负责人，多数就不了解什么是文化运动。所谓文化运动配合着政治的行动，并不是文化的任务直接的由政策所规定，而是文化自身直接从群众实际的要求上反映政治。那时却不是这样，文化变为简单的标语、口号、公式的宣传，文化失了本身的任务。现在想来，那样一个掀天动地的革命，应该有一个怎样大的文化运动来配合呢！事实上却没有。这一伟大的斗争场面，根本上只有军事的应战，而不能将反封建反帝的狂潮，在社会各阶层充分地扩大开来。因为没有实践的按照群众的要求，按照中国当时群众的复杂的意识，在那发展顺利的政治条件下，艰苦的去展开五四运动，完成“五四”未完之业，使文化运动在多方面开展，促成各阶层从四面八方来拥护革命，守卫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但那时代却有人错误的喊出，“五四”时代过去了，把那一段未完之业从中截断，他们的眼睛只注意到社会意识中一部分前进分子，就错把他们认为大众，于是更广大的群众，更广大的黑暗面反被忽略过去了。

因为文化限于几个政治口号的圈子内，那些不易接受政治宣传的群众，就无法使他们对于革命发生兴趣，即令有些群众因生活上的要求走到革命中来，但他的意识里却保有封建的残余物，并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这是需要有教育的，而当时的教育并不能满足人望。结果是弄得一切都不实际，一切枯燥无味。在政治和思想上产生出一种特别的机械论，这种机械论到不是受哲学上的机械论的影响，因为哲学上的机械论派，他们到底还有它的哲学观点，国民革命时代所产生的机械论，却是无理论，官僚主义中的产物。我们回忆当时在政治上，上层规定中层的任

务，中层规定下层的工作。下层只是按照上层的指导，盲目的在执行，真如机械的转动。那时代真是“通告”“宣言”的时代，我们常常看见各种民众组织，一开会要宣读半天的通告、宣言、上级的指令，但到会的人有的正是目不识丁，对于你所宣读的欧化文章，比起《四书》《五经》还要费解，因为怕人骂为反革命也只好枯燥的听下去。至于在思想上呢，这种流毒至今还存，许多青年常不肯自己去用心思，对于自己信仰的某人的言论或“左”的东西，总认为一概是对的，自己这样无批判的接受，而同时又这样向人注入，如果人家要现出一点考虑，就骂这人思想落伍，不足与谈。这样一来，反束缚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不能不在过速度的发展中转变。总之，一九二五——二七年国民革命的流产的原因很多，原不是在这里要清算的，但当时没有与之配合的文化运动，使革命陷于脆弱、孤立、狭隘，因此促成革命失败的一个因素，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肯定的。

一九二七年以后，革命的热浪过去，无数人们陷入幻灭中，人一到了冷静的时候，无数的疑问就会袭来：过去这几年我们到底干了一回什么事？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呢？大家的脑子里都现出一种清算过去和了解现实的要求来。在政治上复归旧的轨道中，意识形态领域内却不似行动上一样保守着沉寂。从一九二八年后，文化领域内倒也现出一种新的活跃的姿态来。

这时大家因为要求解答革命的流产这一个问题，转而来追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于是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问题成为必先解决的前提。我们知道，要解答这一个问题，是要有相当的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因此由这一客观的要求，刺激了新社会科学的运动，大量的社会科学译作，尤其是新经济学哲学的翻译书，一时在出

版界呈出了空前的景气。并且这时的介绍也比"五四"时要进一步，大致也都争着介绍属于物观的这一派。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几年中，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潮，在中国思想上卷起了很大的浪涛，由于理论的学习，而进到社会问题的讨论，由社会性质的论战，进到史的唯物论在较大范围应用的尝试(如文学，社会问题，日常生活)。这一时期，总算是这早熟的中国思想运动回归到深化自己，填补过去的缺项的阶段。这原是一个应有的阶段，尤其在革命流产后，我们在"仍须努力"的前提下，应该把这一文化的空隙赶快填满，并为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布置一个更广大的运动。可惜的是这一种思想运动是在极忙迫的时间中，极险阻的环境里生长的，它在发生时，也就因为忙迫和自己根基薄弱的缘故，本身上带来了许多弱点，就是介绍方面仍不能用最严格的批判的态度，作有系统的介绍，新学术思想的介绍变成了一种营业的投机，形成一种非常纷乱浅薄的现象，收到粗制滥造的恶果。由辩证法唯物论里，也同时把伪唯物论中的机械论、观念论介绍过来。这些东西给某些在政治上有阴谋的人所利用，用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去，于是在同一唯物论名义的阵线内，出现了许多时装的汉奸。在同一实践问题中，得出了许多有害的结论，所谓新的思想的壁垒中又起了很大的分化。

是的，我们还不要忘记，在辩证法唯物论的潮流高涨时，肩并肩的还存在着一切形态的观念论，他们一齐动员起来在对抗这新思潮：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概。这对抗是不能用压力就压得下去的，压力反造成对立的尖锐，使中国文化上现出一种非常奇突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上所形成的壁垒各自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两极之间，形成了无文化的现象。文化上造成了这样

的局势，虽然是由于近代思想运动发展的早熟性、短促性，以及客观上的压力激成的结果，但这结果必然促起广大的民族文化阵线向狭隘的道路的发展，广大的群众不能跟着上来，必然丢了一切落后的群众，使他们和自己隔离，这是非常的不幸的。这一狭隘的观念，也是在这一阶段中养育起来。

总之，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文化运动依然没有继承“五四”的余业，将“五四”的精神在新的阶段中发挥出来，新社会科学的运动，虽然可说是继承《新青年》以后，将它发扬光大，可是这一发扬，仅仅注意到这复杂社会意识中极少数的前进分子，这样一种前进分子的运动，不能就说是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文化运动。现在姑且不说这一运动的内容到底怎样，但这一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我们不能不说它在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多少是失败了。

那就是“五四”留下的工作还未完成，对于封建意识还未批判的说服，对于外来的思想还未融化贯通，各阶层人的头脑还未让它充分自由的解放，未将全民族群众的意欲、要求，一齐反映到文化上来，使文化运动变为活泼的反映每一个时期实践的各阶层的要求，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恰恰相反，它走的是狭隘的道路。

当前文化运动中的病症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转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时期，广大领土的丧失，傀儡的分离运动，武装走私等等，已使中国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的影响，国民经济加速度的在灭亡中，社会因此更形骚乱不安，政治上也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状态。由这民族新的危机所造成的现实，自然要影响到全国每一个国民的意识上，使每一个国民无论贫富都不得不在这危难前，考虑自身的生存与民族的关系，对于民族的安危，更不能不关心了。这一现实，奠下了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基础，同时现实昭告了我们，我们社会内部如果再行分裂，必遭灭亡，要想生存，只有联合造成民族阵线，实行全民族抗战，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照理讲，这一种广大的国民心理，在文化上应该很快的就反映出来，这时出现一个比"五四"、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时代更广大更深化的全民族的文化运动，不是不能想象的事，因为我们当前摆着的命运，是生与死的问题，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大战揭幕以前，文化方面应该怎样来布置这一伟大的决斗呢！中国文化运动经过了以上几个时期，现在并不是以前那么贫弱啊！

但是，在文化上的反映是非常不够的。固然我们不能否认，从"九一八"以后，文化各部门，已多少都反映了国难，发出了救

亡图存的呼声，到前岁，"一二九"以后，救亡的呼声响遍了全国，形成了全国的高潮，并且明白的提出了停止内战，全民族各社会层，不分你我，各释前嫌，共同联合起而救亡，这一种广大的呼声，确也曾对于这一年来中国的和平统一运动，尽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全国学生英勇的救国运动，冒着血肉与一切搏战，也都不是白白消耗的，但如果就这一新的政治形势，从整个文化阵线说，那就实在不能配合。全民族统一的文化运动，中国民族解放现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到目前止实在还在酝酿时期。

这几年来，文化运动为什么不能展开为一种广大的运动呢？这已是许多从事实际运动中的人自己感到的问题。我知道，许多人一定要答道，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运动中的阻碍太多了，过去我们还不受够打击吗？如果仅是这样的原因，那真把运动的主权力量估计得太小了。阻力虽能使运动的进展一时现出缓慢，反过来说，运动更能粉碎阻力，开辟自己进展的条件的。现在运动的不能进展，除开客观的原因外，一定还有主观上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把它检举出来。

第一，我觉得我们大家过去对于文化运动本身的认识上还有问题，文化运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它的对象、内容、效果、方法又是怎样？我们一向很少想到。因此，我们只能继续过去文化运动上许多传统的观念，老的工作方式，对于运动真实的任务一向模糊。因此，在这新的时期中，不能正确的看清自己的实践，只是机械的去把过去的传统不分正确与错误，失时与合时的在重复的执行。关于这，我们可以指出无数的事例。譬如近一年多来，文化运动犯了超文化的病症，文化运动常常现出包办其他一切运动，代替其他的运动的倾向。因为运动的性质

扩大了，结果是反把文化的特殊任务从运动中抽出，变为只有一种简单的救国的呼号，看不出文化实践的工作在哪里。因此，接着犯的就是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机械的观点。不从自己本身上反映出当前群众具体的救亡的要求，配合新的政治的要求，促进新的政治形势的开展，而反把文化作为政治的尾巴，把一九二五年代的错误同样在这里重演，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变为文化直接由政策决定，使文化失了它的发展的独立性。这样一来，文化运动变为直接的政治运动，不仅本身易于遭受客观的打击，同时因为新政治形势并未成熟，自己变为完全手无寸铁的孤军冒险。这种超文化，无文化的文化运动，结果是离开了意识的领域的斗争，自然不能蜂起全国大众的人民支持自己的行动，扩大运动，这都由于对于文化运动本身了解不足之故，这对于"一二九"以后的运动上，发生了很大的决定作用。

第二，因为对于文化运动本身了解不够，因此，大家的眼睛都只看见眼前的事物，忘记了文化运动本身的实践，忘记了文化运动不能单作政治的投机。我们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过去在文化运动上走了一些什么路，还有什么没有走，要继续走，这些问题，因为大家脑子太热，一时想不起来。我们还中了一九二五年代的毒，以为"五四"时代真的过去了，我们今日可以不管过去，我们要走什么路，就走好了。殊不知中国过去文化上许多早熟的现象，已使自己的生长不健全，中国社会意识的复杂完全不如我们想象的简单，虽然前进意识已否定了"五四"时代，但同时"五四"时代并没有死，它仍为今日大多数人所要求。今日的中国，在民族是要求全民族的解放，在意识领域，在全民族的头脑，我们也要求全体的解放，不是要叫一切落后的人都来接受最前

进的意识，而是要求按照他出生的社会层自由发展。我们要使大家从封建意识解放出来，不管它向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或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我们要这样，才能使今日的文化运动、思想运动，变为真正广大的运动，那全民族的每一个分子才能掀动起来，那末，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继续过去文化运动所走的路程，凡是过去没有走的路，还要补走的路，我们要在这时期来补充，我们只有纠正了过去几个时代运动中的缺点，我们才能扩大今日的运动，充实这一运动的内容。然而不幸得很这一点完全被我们忽视了。所以在这两年来，我们虽然听见有人慨叹中国文化的空虚、贫弱，文化部门的寂寞、消沉，但没有人提出具体的内容来。

第三，我们受过去不良的传统影响太深，在这最近一年来，我们虽然已看见许多人在观念上似乎已动摇了，但在行动中仍脱不了旧的传统的支配，这很阻碍了新的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我现在且指出几件较严重的来说说。

譬如运动内的偏狭性，虽然我们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时，已认明了我们不能再有分裂，应赶快完成和平的统一，结为民族阵线，并且我们自己提出了“民族”高于一切，不计前嫌，夙怨，只要他不是敌人的奸细，都可以站到一块来。虽然这些政治的口号并不能一时都发生效力，虽然社会各阶层的成见，不见得一时即可消灭，但是在代表全民族的文化阵线上，应该怎样大胆、诚意的来执行文化领域以内的联合呢！自然，在形式上过去是已经做了一些的，譬如在一般著作人方面和文艺作家方面等等，并且对于所谓中间人也能容忍一些了。但是许多人仍不能

忘记过去的对立，不是自己的朋友。总不想叫他到自己方面来，同时自己也不想参加到别人的团体中去。暗中仍然保持一种分裂状态。有人说，这还是过去的关门主义，不过，现在比较不同的是变为半开门了。这种狭隘的观点，自然会把运动收缩在一个框子内，自己能看见的人物，也不过是自己的周围的一些。因此，这一定要发生出许多幻想来，不是误将自己周围这些小众看作大众，就是无端的白昼见鬼，疑东疑西。是的，关了大门，是不会有新鲜空气的，因为在门内无事可做，自己家内就吵起嘴来。我们在这一年多来，所看见的全文化领域的现象是，所谓进步的人看不起落后的人，看不见落后的人，后退的人不容忍前进的人，中间人变成一面骂东，一面骂西的疯子。自然各人都在一个框子内，不是在框子内作大众梦，就是在框子内谋防守与破坏，不然就是喝茶，打趣，骂，风雅，如是而已；甚至在同一框子内也发生内战。这一种狭隘的观点不丢掉，文化运动是不能开展的。

此外，我们所受到不良的传统是公式主义。公式主义现在几乎是一切文化部门中共同的现象，并且已有不少的人注意到了。公式主义的来源是发生在理论与实践分离。中国文化部门普遍的发生这一现象，我们晓得这不是哪一部门的病症，而是中国文化运动与当前中国实践不相一致，中国文化运动内容的空虚，没有实际内容的结果。这也皆由我们过去根底的薄弱，我们的生活不充实，与现实隔离。我们对于世界与中国的认识，都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我们所学习的理论只是书本子上的概念，没有与中国实践结合，在中国实践上没有起什么作用，所以反映到我们的文化各部门，到处都现出“差不多”的现象，令人觉

得单调、贫乏、抽象、厌烦。譬如近一两年号称杂志年，实则真不过"同一性质的刊物一出再出，同一内容的文章一投再投"，量的方面虽有增加，质的方面并无多大进步。其他表现在文学、电影、漫画、音乐方面，也很为明显，我们感觉今日真是公式的世界，我们除公式外，几乎看不见具体的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文化，文化变成了公式的说教，自然，它在意识斗争里不能起大作用，因为我们要说服群众是替群众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影响他的意识，离开了生活，单独的以某一教条相训示，是没有作用的。

给我们很大影响的还有中国式的机械观点。即死守过去的传统，死抱着过去一套老方式、老法门，不管时移世变，总唱着那一套老调子，演着那一套老把戏。这一种旧成见变成了一种新顽固，它在新的运动中，时时在牵制运动，它与旧顽固一样是一切改革的大敌人，要说服这一种成见是不大容易的，它今日仍占相当的势力。

其他我们还可以指出一种封建的残余物，一种庸俗商业化，前者就是文化人中存在的帮口，后者是年来文化领域的商业投机，他们都间接的影响新的运动的开展。

文化界内一向号称多事，文化领域内的纠纷，譬如就文坛说，就常常变为混战。每一次论战发生，虽然外表上现出是一种意识斗争，但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常常是人的问题。因此斗争不能用真理去说服。真理不能成为解决纷争的标准，因此问题总是越扯越糟，结果常常不得要领而罢，或是纠纷无限制的延长。在同一阵线中，也不免"以牙还牙"，勇于"安内"的伟业。这对于群众的影响是怎样呢？群众常常难于判断曲直，站在一边

气闷，或者大家走开，离开你们的领导，使得群众更和自己疏远。这种帮口，是一切团体和组织中的结核病，它是封建的残余物，更是统一救国组织上的大敌，在今日反封建意识中，如果不把它清出去，它会起内的腐蚀作用。

至于商业的投机，那是最近一年多来特有的现象，它表现最明显的地方是出版界。年来出版界竞争得非常厉害，不仅“同一性质的刊物一出再出”，甚或连刊物的形式，标题也完全模仿。今年的丛书运动又是一样，看了人家出什么，他也来模仿一套，大家红着脸来做生意，眼睛看见的是销路，哪管文化不文化，譬如通俗运动，这两年来，对于文化上的贡献是不可否认它的功绩的，但弄得近来，它变成了吸收顾客的招牌，意在迎合市场，多找顾客，通俗化通过商业竞争的结果，一定要向庸俗化堕落。

以上我所检举出来几种病症，只不过信手写来，但中国当前文化运动如果满身带着这样多的痼疾，却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为什么“九一八”以后我们的运动不能开展呢，这问题大概用不着再解答了吧。

这也就是从“五四”到今日止，中国文化运动全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过去所干的大概也就只这一点点，不满足么？自然不满足。但不满足不是看不起它，不重视它，我们十分珍重过去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经验，因为这一切是创造新的文化运动发展的条件。

中国文化运动新阶段的浅见

"我们要求中国民族的新生!"这是大家的期望，不仅哪一个个人是如此。

我不承认中国民族已趋于垂老或衰亡，我也不浮夸过去的繁荣与伟大，我更实践的体会得今日民族的危机，是临到了生与死的交界线，但我仍坚信中国民族不会灭亡，中国民族的存亡是决定在我们自己，我们在这危难中并看出中国民族的新生。

这不是我个人的幻想，这新生的曙光已从"九一八"昏暗的阴云中一天天明亮了。到了今日，这光亮不独在全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并且反映到中国的政治上，反映到和平统一上。我不是一个对世事这样容易满足的人，我并不会把当前政治上的一线微光，看做月亮，但我重视这光，因为它可以是新生的起点。我们不能否认目前中国社会、中国政治都转到了一个新的形势，这一个形势不仅在"九一八"以后这几年中没有，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九一八"这一阶段中也没有的。我们可以说分裂了的中国，又复现出了团结为一的希望，这是什么造成的呢？是国难，是全民族内各阶层的人民普遍的受到生与死的威胁，在生死关头考虑后一种民族的自觉。我们不能不结合为一，抵抗侵略，否则我们只有全体灭亡。这一种自觉经过这五六年的敌人的鞭笞，无限耻辱酸苦的日子中，现在算是放出了一

道微光来了。

是的，我们要保住着这稀有的光，这微弱的火种，并且要使这星星之火，烧遍太平洋岸，使一切侵略的敌骑绝迹，但这不是单从希望，希望少数民族英雄，或政治上有良心的人，不要再走错路，而是要把这人民的愿望，这尚是微弱的光，扩大到全民族每一个国民的脑中去，使这愿望在每一个人的脑中发生反应，生出坚定的信念，造成一种强固的民族意识。大家举起火炬来，将这光亮燃烧开来，要这样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点光，不被阴云所掩蔽，不被盗贼所偷取。自然，我也不是说，我们就忽视这微弱的光，反转来等待万千的火炬，一切都不能等待，我们在政治上一点不应松懈政治上的统一运动，民主的要素加强，和实际的抵抗侵略的行为以及巩固国防，但在意识的领域内，更一丝一毫也不能迟疑的要布置一个空前广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崭新的广大的民族解放的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不能再落到政治以后，做政治的尾巴，今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决不能缺少文化斗争的一面。今后的文化斗争不独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前卫。今日民族的自卫行动，不仅只维持现状，维持这半奴隶的生活，而是由自卫而解除一切束缚，改善民族生活状况。今日中国民族的解放，不再是象欧西过去的民主革命一样，重步帝国主义的后尘，自己也走到他日侵略别人的前途去，而是彻底执行民主的理想，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我们的前途非常广大，但我们的工作也非常艰困。这伟大的行动，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去指引，要有伟大的文化运动作它的前导，今日我们不仅在客观上有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要求，就是在条件方面也可说具备了。

今日也再不容我们空谈什么“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文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欧化的资本主义文化?”“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抗的文化?”“国防的文化?”……等等。这一切离开中国实践的问话，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它。新的文化运动，并不是不管过去，离开过去，再来要一套新花样，新的文化运动仍是继承过去，从旧的中间发展出来的。这一个新的运动只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新阶段，这阶段是由中国社会实践的内容所决定，这一新的阶段，我们应该叫它什么，“新启蒙运动”，“爱国主义”？……我们暂时也都可以不管它，我们所要认明的只是它的特点，它与过去的有什么不同处。

我们在本篇开首就说过，今日中国社会与政治上都有了一种新形势，所谓新的文化阶段，自然可说就是这一新形势下的文化的阵容，反映这一阶段的中国实践的文化运动而已。但这一种说法，决不是把文化运动单看做政治的尾巴，以为文化运动完全由政策所决定，恰恰相反，我这里所谓反映实践，反映政治上的要求，不是直接的反映政治，而是从广大的群众方面反映群众的要求，文化运动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有它的本身任务，新的文化阶段，最最紧要的是要纠正过去对文化运动不正确的观点。我们先要从解放自己这一观念开始，不然，我们根本就不能了解今日的运动。

我们单只抽象的说明了文化运动的概念还不够，我们要求的是实践，什么是今日的实践呢？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走了一些什么路，我们怎样来继续。其次就是商讨我们现在要走的路。现在我们的文化任务，在上面已经约略提到，是彻底解放我们全民族同胞的头脑，使大家明了国难及自己的前途，

并且共同来解决国难，创造自己的前途。解放！是的，解放！彻底的解放！这是我们当前的口号。我们全国同胞的脑子，大多数还是被封建意识所束缚，少数青年又被另一套“美丽”的或虚幻的模式所昏迷，无数的人正徬徨十字街头，变成了完全的虚无主义。今日中国的思想阵线，真的左派并不真的是大多数，真的新式的右派，更是少数的少数，最大多数的是可左可右的老百姓，他们还在封建意识的残梦里。今日中国出现的思想斗争，如果单从数量来说，那只是少数和少数的斗争，大多数人并未参加。辛亥革命，老百姓大致都在梦里，五四运动只解放了几个中等社会的青年男女，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国民革命，那影响虽然比较很大，但被解放了的范围也仅及于都市的一部分工人和国民军经过地带少数的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当前的国难也仅使直接被侵略地的同胞脑子起了很大的变化，其他各省的同胞的印象还不够深刻。封建意识还是支配大多数人的思想和习惯。过去的文化运动并未掀起过真正可算得全国民思想的波浪来，并未好好的负起过教育民众的责任。“五四”是比较有收获的，因为它真的算是一种多方面的解放运动，可惜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它的使命，许多人却瞎喊“五四”时代早过去了，中国的思想运动变为一种跳远，中间一段一段跳过去，现出许多早熟的不健全的现象。文化上所表现的是有左翼文化、右翼文化，分得日益明显，却没有中间的文化，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正到了如此的对立么？文化运动可以让它这样发展下去么！不能，一千个不能！我们现在社会的要求不允许我们在文化上造成这样的分裂，同时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本身上，也不允许我们这样畸形发展，历史决定我们的早熟性，我们虽然不能违反历史的进程，但我们却

不能让自己不健全，不能不赶快补充我们跳过的过程。我们今日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要综合过去文化上的一切阶段，补充过去未完成的工事，发展过去的工事。今日的运动，不是丢了过去，而是扩大范围，在形式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再来一个新的五四运动。这运动是彻底的来解放全民族的思想，对封建意识大清除。

所谓彻底的解放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在当前的阶段，我以为不应提出什么思想的标准，既不需要左的口号，也用不着右的口号。我们尽可让思想自由发展，如果一定要有一个限制，就是只要合于"民主"的，不管什么思想都得让它存在，让它自由发展。我在这一点与蒋弗华先生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中的主张大略相近，不过，我注意到的不仅限于青年。是的，我们要求思想解放，但不提出用什么来代替，这里要有绝对的自由。我们要使一个人对腐烂的思想动摇、舍弃，但我们并不希望他盲目的来相信什么，我们希望他在动摇后，能自由的用脑，自己去想，他是属于哪一社会层的人，他要哪样想，就哪样想。我们不必干涉，也无法干涉，因此我们今后的文化运动，不仅要有比"五四"时代更大的范围，还要比"五四"时代有更多的自由。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民思想活跃起来，我们即令在某些地方要纠正它，要与无数人的封建意识相斗争，那也要先使他们的脑子活动才行。

所以，今日在中国思想运动上，绝对不允许有什么统治，你个人脑子爱红，爱白，我们可以不管，也让你自由，但绝不允许你用红白作统治的标帜，不能让红白束缚人家的思想的解放，要这样，思想运动才能活泼，充实，中国民族的"灵魂"才能再生。但

怎样来把过去这一畸形的发展拿转过来呢？这自然要费一番力气，但如果不克服过去的许多成见，那思想解放的前途是很可悲的。

文化运动是思想运动在文化各部门具体的表现，思想要求自由，文化上过去的偏见是不能让它继续存在的。文化运动中既然也要自由，文化统治当然是不合理的说法了。文化阵线这一个名词，在自由的空气下，只是民族阵线在文化方面对外的名词，在对内的意义上，虽然也可说是与汉奸文化阵线立于对立，但汉奸既成为汉奸，已经不是民族的东西了。其他的意义，就仅在民族阵线内部一种分野上。文化阵线内部应该包括全民族各社会层的文化活动，是一种极端综合丰富的复杂体。在这一阶段，它是被民族自卫与解放这一生与死的共同利害关系所结合。在这一结合中，最高的共同盟约应该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咱们一致对外，抢救危亡，咱们兄弟间其他一切绝对自由。

这一复杂体中，不是包含了无数的矛盾么？这自然是事实，我们无法否认。因为社会本身有矛盾，思想上有矛盾，反映在文化领域也自有矛盾。矛盾是真实的反映，但我们不要怕矛盾，因为怕也无用，这是客观的事实。但当前我们的意识内既然以民族意识看做第一位，其他的矛盾，虽然存在并不是不能共同相处的事。有矛盾自然也有斗争，但这时的斗争既然以不能妨害共同的结合为原则，又不主张谁来统制，那是尽可让它自由存在，没有关系的，我们尽可放心。

要在这一种基调上，才能建立真正全民族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虽然也具有相当的自由，但不是一种意识的运动，至少在运动开始时，是没有看见运动发展的全貌的。今日的运动既然是

综合了“五四”、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以后的社会科学运动、“一二九”以后的救国运动，它是一种醒觉的民族的自觉运动，是一种继续并扩大以上各阶段的未完成的工作，同时在当前政治的新形势下，反映着广大群众的新要求为任务的，所以这是一种比任何阶段都是一种更高级的运动。

更具体一点说，这一运动要包括这样的思想的内容：

一、接受“五四”时代“怀疑”的精神，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作全面有系统的批评，深入的研究中国现存的复杂的社会意识。

二、阐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尤其是当前日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孔教”，和佛教。

三、补救过去中国思想运动早熟病，有系统的介绍近代思想，深化世界文化的介绍。

四、特别清算中国今日的伪唯物论的思想。

五、清算过去文化运动各阶段的错误、传统和当前残存的一切不良的影响。

六、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

七、培养独立思想的精神。

要这样，今日的运动才能变为广大而有内容的运动。民族斗争要变为全民族的动员，非有一个深入全民族的广大的文化运动不可。这运动将怎样开展呢。

首先是文化人、领导这一运动的知识者群或集团自己要经过一番思想解放，我们对过去要有自觉、自责，我们才能看清现实，才能丢掉过去的一切不良的传统、成见，接受这一阶段的新的任务和创造适合新的运动的工作方式。

现在大家都应为民族而谦虚一点，大家看清今日的中国，看看我们过去的工作，自己检查自己的团体、阵营和自己一番吧。我们过去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我们不能欺骗自己啊！我们更不能欺骗历史，历史对于一个不忠实的集团或个人是最无情的。

事实总是事实，我们违背了历史对于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要被历史所抛弃的啊！

我觉得，首先，文化领域内也要停止内战。我已说过，今日的文化阵线只应该在对外的意义上发展，再不应该把力量滥用在对销自己的力量上。要停止一切"此时此地"不需要的斗争，要撤废一切束缚自由的文化统治，更不能丧心病狂的专事破坏，不图建设。我们大家要有这样一种反省。我们自己要不乱用一分力量除开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耻于滥费一分力量为自己个人或少数的集团。我们在这政治复归统一之时，文化领域内要特别提倡宽容，宽容，第三个还是宽容。过去一切的纷争，红脸，成见，和惨痛的事实，一概将它丢掉吧！我们不必注重形式上的什么杯酒联欢，而应很自然的各自停止一切不需要的对立，让大家各自本着各自的能力为民族服役吧。

我们将过去一切不需要的滥费现在转到另一方向去。当前运动的范围是非常广大啊！决不是少数个人或集团可以包办得了的。我们尽可以各自拿出自己的长处来，为中国文化的花园培植一点花木罢，即令自己没有栽花的能力，就作些灌溉、剪草的工作也可以。国难期间绝不能看作只有战争、流血，只应谈到国防，以外的生活就可以完全不顾它。决不！我们为民族抗争，是为了争生存，要生存就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文化。虽然在民族解放过程期中，民族战争高于一切，我们在文化方面也应动

员，配合着战争，但不能看得太机械，认为这时代除喊口号或用作宣传以外，不要其他文化、一切文化人都应放下工作。一九二五年时代有些地方曾经犯过轻视知识的错误，那就是把文化看得太狭隘，现在我们不能再那样。哪怕在战时，我们一样需要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等研究工作，一样需要电影、报纸、出版等等事业。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决不因有外敌，而现出轻浮，对于文化失去沉潜的努力。上一节中我们检举出过去两年文化界内许多病症，那些病症的根源，也大半都是发生于国人把国难与文化的关系看得太机械、太浮面，所以发生那许多病症。现在我们要纠正那些错误，绝不仅是把他们检举出来，单用理论来说服，而是要铲除那些病症发生的基础。如果我们大家把胸襟扩大一点，把国难与文化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白费力气用在不需要的内争上，让大家自由，各尽所能，重视自己的本身工作，我想，文化的内容，自然会呈出复杂、多面、生气勃勃的现象来，不会感觉单调、空洞；大家都肯从事深刻的研究，公式主义不会发生；各自都肯致力真理的追求，门户之见，帮口之争，也无法逃过真理的审判，允其存在。因为大家分工得当，致力更专，文化上的投机现象，粗制滥造的作品一定因此少见。

再说到团结吧。文化阵线的团结并不单靠形式的集会、签名，主要的是要有工作。我们要集中的是力，不仅是几个人，集合一群无文化工作的“文化”人，那结合是等于没有结合。如果我们真的尊重文化，准许大家自由，各有一长的人，谁会不肯贡献出他的一长来呢！是的，救国是大家的事，用不着虚伪，谈不到冷淡，自然也无需客气，过于谦虚，救国的大门应向每一个人打开，你是中国人（汉奸除外），你应该进来，没有人有拒绝你入门，

向你索门券之理，不必拉拉扯扯，偷偷摸摸，也无须惊惊惶惶，徘徊不定。

我们认清了文化的任务，把眼睛望着群众，用自己的特殊文化手段，忠诚的把群众的要求表现出来，只要是当前存在的事实，你不必论它美丑，都可以把它表现出来。我们要求的是真实，我们要求的是具体，我们要服役群众的，不仅是宣传一般的国难，主要的是替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意识的斗争不单止表现在长篇大论的文章上，同时应该表现在一段谈话中、通信里，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也不论什么形式。总之，意识斗争范围非常广泛，不能拘于一定的形式，摆出文化权威的面目来。

这样一方从横的方面扩大我们的工作范围，从纵的方面深化我们的工作，我们真要感到我们当前工作繁重，人手不够，哪里还有人排斥人，发生无谓纠纷的闲情逸致呢。

一切新的工作方式，也只有在工作的实践中才能产生，空喊创造新的工作方式是没有用场的。其他一切话，实在也用不着多谈，现在我们最严重的关键，还在认清自己，文化人的自我醒觉。新的运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突然有一队文化选手从那里跳出，新的运动仍要由旧的人出来导演，新的运动的开展仍然属诸昔日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们。

中国今日的实践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文化阶段。这一要求当前是课于全国从事实际文化工作的人们的身上了。

如何把握住当前新的形势呢？

如何把握住当前文化发展最实践的任务呢？

如何检举过去运动中的错误，纠正过去的错误呢？

如何突破当前的苦闷，展开新的运动呢？

《回乡杂记》及其他



《怎样自学社会科学》自序

本书分上下二篇。如果严格说来都是写得不充分的。上篇在文字构成上，我采用了几个实际的问题作为学习的出发点，由是而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社会科学，怎样学习社会科学，最后仍复回到展在我们当前要研究的实际问题上去。笔者的目的不过欲给读者一个学习的概念罢了。但因限于篇幅，不能写的详细，尤其是关于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的一节，说得特别不够，不通俗。

下篇的书目，虽然本本都经过一番考虑，才将它列入的，但因选书困难，这部分做得十分不能如意。第一，这里面所选的书并没有几本可称为大众的读物，并且仍有不少的书译笔甚坏，并且也欠忠实，非独不是通俗书，实在不易读懂。第二，所选书籍的数量太庞大了，会使读者见了生畏。第三，附录内部所列的书，也有几本在观点上还不正确的。研究与浏览的书目部分，更是搜集得不全，没有做到批判的介绍。但笔者却也有另一种意见，除开关于第一点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缺憾（中国此时尚无大众的社会科学书籍）外，所选书籍庞大却是故意的，因为我的目的并不要读者本本都读，这已在书目内说明了。附录的用意，是专替不能觅得上面所开的书籍时，另找其他一种去代替的意思，这至少比较找不到某本书就不读要好，研究与浏览书目部分在引

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去读，不是要读者把它当作经典，无条件的接受。

此书上篇，经温枯琴先生看过并贡献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也曾经他一度改写，虽然以后又由我改作了，但我在此不得不向他致谢。关于书目部分，有几本书是援用了柯柏年提要语，一字未改，这一来是柯氏提要既甚适当，无再改作必要，二来也因自己人事过忙，无暇再写。关于这一部分及研究与浏览书目我拟在再版时，加以补充，或者另辑社会科学名著提要及读法一书，单独出版。

关于社会科学大众化，目下实在还差得甚远，作者今后甚愿在这方向更加努力，从事通俗编著。至于本书所提示的研究方法及所举的书目，如有错误的地方，我极望有人严重的指出。

一九三四，三，二十

附：编者序言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孰重?"我们以为这二者的相互关系是不可分开的，至于我们为什么把这一篇《怎样自学社会科学》列为本丛书的第一种，却是另有一点理由，应首先说明一下：

社会科学是说明人与人间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自然科学则为研究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与其现象之分析，这两种科学是如一柄刀的两面，不能轻此而重彼。我们相信一个社会科学者若是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他不能有正确的宇宙观、社会观，他会成为观念论者，而不能融会宇宙的真理；一个自然科学者若对社会科学的中心要义不能有深刻的体认，那也是同样的要碰到——研究失其意义，运用失其目标的危险，最大的成功只会变成一个

机械唯物论者，他的成就是无补于社会人类的。

中国目前的社会，是受了一种“内”“外”的二重束缚，因此不易发展，一切科学都是一样的缺乏发展的条件，但在这扫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工程中，这两种科学都是十二万分的迫切需要的。我们按着自己的能力与客观的环境，为便利读者学习起见，乃试以这本书首先问世，接着的有文学、哲学等二三种，借观读者的兴趣，以增指导的经验。在这时期中我们将竭力研究自然科学的自学方法及其实验工具、材料等问题的解决。《怎样自学自然科学》的内容大纲，已在请人起草中，希望能于六七月间与读者见面。关于自然科学在现环境中自学的困难以及我们的愿望，容在该篇序中再说，此地无详叙的必要了。

论到中国社会科学运动，虽然在早几年已经热闹过一时，可是不久也就低落下来了。并且这一运动并未成一意识的运动。我们只要从出版方面去观察，就可知道。诚如本书作者所云：中国社会科学运动还未越过翻译的阶段。即就翻译说也是杂乱无系统的无政府的生产的。在一般社会科学者的眼内大半并无大众的影子，自然谈不到将社会科学通俗化，而产生以大众程度为对象的读物，普及大众中去了。

本丛书编制自然是一种意识的行动，本书是按照我们的对象而特为他们写出的。不过，本书的作者不可避免的要遇到一种困难，就是提起大众研究的情绪较易，介绍读物为难。这是本书作者在自序中也说过了的。

但是本书仍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从来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人，总是作抽象的叙说而已，却不能象本书一样从实际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出发，结果仍复回到实际问题中去，作者对于理论的理解是这般现实的严肃的态度，是很可取法的。

第二，作者对于未受良好教养的人们不独很富同情，并且也很有较深的了解。作者能按照他们的实践，用真实的话，谆谆的鼓励他们去自学社会科学，其中说到有些理论或为受高等教育者所不能理解的，反而在“低级”的人群中可以得到认识，这是何等的使人兴奋！

第三，对于读社会科学书的顺序，作者提出了一个辉煌的实例，这无疑的是给大众最良的影响。因为社会科学素称为硬性的读物，初学的人是不易找到兴味的，而作者根据他自己多年教学的经验，先引人去读社会科学者、革命家传记，使一般不惯硬性读物的读者不致望而生畏。不独如此，一

个青年被引导到一个革命家、科学者的伟大的人格之前，使他自己人格有一对照机会，这将会发生如何的兴感呢？这至少可以增加一位学习者研究的决心。在读完传记后，作者顺序的提出通史、革命史、社会问题、社会运动、社会学说、社会主义等，都系逻辑的排列，是最实际研究顺序。这一点我认为最最值得介绍的。

第四，书目也值得特别提上一提的。这里面的书作者几乎全部都精读过。关于提要与读法，有许多篇是写得很不错的，这一部分虽因作者的生活环境未能本本做到一样，即就目前的成绩说，仍是对于读者有很大的帮助的。

第五，作者对于学问的态度也还应顺便说及。作者是一个极端客观的人，对于同时代各种学说都能平等的一体看待，并且都不敢作过低的评价是很可取的。本书篇末殿以三民主义的研究，不是随便的态度而是具有下面的理由的。依作者的意见，要了解中国实践，固应从中国实际出发，却先要具一般社会科学原理的知识，不然会无从着手。所以，本书的编制是先从原理介绍进而深入关于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书籍。作者对于原理的介绍全部以科学的视点为尺度，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完全一无成见的全部罗列，让读者去自决，这是完全公正的。

以三民主义为研究的综合，编者认为非常的可慰。依编者意见，三民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一个中国现代思想的体系，不有较深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不能深刻的理解的。由是，此书出世后，对于大众将来了解三民主义上的帮助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书也有其他的缺憾，作者在自序中已说过了，无用编者絮絮。至于作者因事实与环境所赋予的困难而不能做到作者原定的计划，我们自能相谅。同时本书的读者对于本书内任何一点，有不明了处，请直接函问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我们愿意详细答复或转请作者代为解答。

最后，本书下篇书目部分，承有几位朋友建议了若干极有价值的材料，于此应致十二分的谢忱，而章乃器先生于百忙中负责的为本书校阅二次，杨幼炯先生为本书“三民主义研究之部的书目”精校一遍，尤应郑重的道谢。

李公朴　一九三四，五，一

（原载《怎样自学社会科学》）

认 识 论

“女人是不能了解的，女人最爱说谎话，譬如她明明爱你，她或者反表示冷淡，她本爱吃咖啡，她故意要说可可，使你不可捉摸。她象一条蛇，你是不能抓住她的，你如果一不慎重，误将她同你玩笑为爱你，那你不免要被她咬一口呀！”平一见面总爱发挥他对女人的不可知论。

清却是他的反对论者，他也爱谈女人，但他的认识论是肯定的。“女人并不是不可知的东西，男女间的爱也没有一点神秘，但没有神秘并不就不可爱，反是更现实的。男子的爱女人，正如女人的爱男子一样，骨子里我们不能否认它藏有动物的本能，但因人类的本能发展为智慧了，男女的性关系到底不就是动物的性关系，是更高级的性爱的表现，所以又不能把女人或男子看成只是一种性的工具；同时，男女间也不能否认这最高的表现，否则就会变为爱的玄学了。女人大概都比男子更现实，更知道享乐的，你专花呀、爱呀的扰嚷，你不给她‘最后的礼物’，她是会马上逃走的。”

平听得有点不耐了，他打断清的话道：

“这与认识女人有啥关系？”

“这是两性间的认识论的根本命题呀！”

“你说女子知道享乐我是相信的，她们最爱拿男子寻开心，

等到你献上'最后的礼物'时，那就与你说的完全相反，她逃了，或者她还要回头唾你一口吐沫，作出一个鬼脸呢！"

"朋友！这话是不正确的。不过，这里你不应忽视'最后的礼物'送出的时间呀！你应先知道男子对于女子现实的认识的路程，这'最后的礼物'的送出应选在她正张着手臂等待你的时间呀！你不能心急，不能忽视这艰难路程中每一个链和环，在各个瞬间，为要维持链的全体，并且坚决准备推移到下一个环，就不能不用全力去抓住那个链子的特殊的环。"

"你这话，我就不懂，什么路程？又是什么链和环？"

"这些都是比喻，让我慢慢来解释。认识女人确是不容易的，我们认识她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不过是专就外表的美而言，整个的了解，到底不能一见就倾心的。在这一个长的时间中，从起点到终点，我把它比作一条路，又比作一条链子。我们的认识呢，是实际的一步步去走这条路，去数这条链子的环，不是自己不行动，坐在书斋里等红娘发痴的。我们多走了一步路程，多知道一点沿途景物，本来认作'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谁知前面倒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你要这样殷勤的才能走入天下女儿的心。链子和环的比喻也是再妙不过的。链子是由许多环串成的，你要一环一环去数，你才能把握全体，了解女人也是一样，你左手抓住了一个环固然不能放松，你同时还要把右手伸出去抓住下一个环呀！在某一个环中，你知道她一些新的东西，但你并不就认识她，你要由许多环的连续，才能了解她的全体。但是，这也还不能尽其意呀！因为我们的认识的本身也时时是在变动的，说不定就是自己的太太，把一条恋爱的链子上的环都摩得银样雪白了，不能说我不认识她了吧？其实呢，

老爷太太双方就在'最后的礼物互赠'后，也不能说，彼此认识终止了。因为他们双方都在变动，在认识上仍有新的发展。不过，这不必去详说它。

我知道，专门用比喻是会感觉乏味的。男女间的认识路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最初大概是男女间一种直接的敏锐的感觉，觉得这位小姐风姿不俗，两眼多情，对人大方，性情和善，如此而已。这一切都是直接在会面或交谈中感觉到的。这不过是认识路程一段，不能说我所感觉到的就是某小姐。但这些感觉是会使你发生思想的，你会不知不觉的想知道她这样，知道她那样，她的程度怎样，思想进步不？有不有'飞洋伞'呢？没有，那是好的。但是，她喜欢社交，她的周围有一些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甚至于你同她在酒吧间里小吃的时候，你会装作礼貌要她点菜，故意逼她开出菜单来，以探知她是否书法秀丽。你会利用各种机会，从多方面去侦探她，比福尔摩斯还要细心百倍，你会把她同自己对比起来，身体，思想，性情，学问，嗜好，是否完全相合？如果我们成了'一对'，生活又会怎样？到了这种时候，显然跟以前不过直觉得她美不美，彼此漠不相关是不同了，这已由对对象的直觉的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度的理解的阶段，这也就是中了爱神的箭，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这时你会用你由感觉、知觉和表象方面所得来的材料，作你对于她的理解（就是理论的理解）。

是的，男女的爱中不会停止在这一阶段的。有了高度的理解，必然要进到的是恋爱的实践，进到要实现'辗转反侧'好多年了的、平日蕴藏在头脑里的东西。说一句哲学的话，这就叫做'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

这就是一个男子对于一个女子认识的全路程。自然，反过来，女子也同样是如此的去认识男子的。”

“平！女人不是不能了解的。你可以放心了吧！？”我插断了清的话向平大笑了。

“清到底是恋爱专家，我们自甘拜倒下风了。”平也说。

“不过，我刚才还未说到在某一阶段中，你才能献上你的‘最后的礼物’给未来的嫂嫂呀！”清在笑平了。

忽然，我们从邻室里听见一位女子的声音，半笑半怒的且说且走出来了，原来是平的表妹芳。她道：

“你们爱听他的贫嘴，你们以为他真会了解女人么？你们问他，他的爱人在那里？他这一番话，我是听厌了的，他是哲学教员，平日讲‘认识论’，学生老是睡觉，他不自安起来，才想了许多闲话，拿女人来开味的。什么甘拜‘下风’‘上风？’”芳说后也大笑。

我被芳的启示，觉得清的话不仅可以用到男女身上。

（原载《太白》一九三四年第一卷第二期）

“狗口里吐不出象牙来”

虽然没有一个人买了或者要买航空奖券，但住宅中的人，有时在闲谈中总不知不觉的要扯到它。譬如我们的二房东太太吧！当人家向她敲一点小竹杠时，她一定很幽默的答道：“好的！今天就买航空奖券去。”实在她是不会去破那一块钞的。

有一天，我换上一件新大衣走下楼来。就有一位房客问我，这件不见经传的大衣花了多少钱呢？我故意说，这是在吴淞路买的，只花去二十支洋。站在旁边的一位西装房客叹道：“真便宜！如果我中了航空奖券，我也一定要去买一件。我真的天天要去跑吴淞路了。”他这话登时就引起了另一个人同他抬杠，说他说这话是表示了太没有出息，他说“如果你中了五十万的头彩，还用得着你天天跑吴淞路么？你可大拿架子坐在家里，用电话去叫洋服店到家来，替你量衣呀！”他这话把在座的人都说笑了。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裁缝，所以他关于阔人的衣着是比较别的人更内行的。但那位西装瘪三并不服气，他也要难一难这裁缝了。他说，“你有出息，你中了五十万又怎样呢？我问你！”裁缝登时答道，“我中了五十万吗？哈！哈！首先就要自己买一架缝衣机器，租一间亭子间，专门接人家的活做，不做人家的伙计了。同时也还要请二房东太太吃一次炒栗子。”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把全屋内的人笑得前翻后仰了。

"真是一样没有出息,"房东太太说,"老话一句言,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你说人家说得那么刻毒,不想你自己又在闹笑话了。你想,你有了五十万,你还做裁缝么?就使你还想做,你也要到南京路去大开店了,还住什么亭子间,买一架缝衣机器,请人吃什么炒栗子呢!"大家也一同笑了。

"二太太,我到要请教你,如果你中了五十万呢?"另一位房客说。

"我吗?我第一就答应替你们修抽水马桶,后门上改装一把'斯布林'锁,三楼的晒台上装一个铅皮屋顶,把住三楼的做厨房,以外要买一把大水壶,免得一天替你们上老虎灶几十次,那时,我早晚只替你们买两次水,夜里十点钟就睡,同时,脚上要买一双皮鞋,免得雨天上街打湿脚。就是这样了。"

"我的天!"已有几位房客笑得转不过气来了,一位充私家汽车夫的房客说:

"原来如此,二太太,不要见气,你也犯了裁缝一样的无出息了。你就没有想到,你中了五十万,会自己建造大洋房子住,就不再当二房东了,你那里还会再替人家买开水,跑湿路呢?"

大家又是一阵笑。但这时就有人提议,凡在屋内的人,都要说"自己中了五十万将怎样",结果是要汽车夫接着说,他想了一会,用手摸摸头,扯了一扯汗衫道:"我中了五十万,一定要到ABC去定制几件白净的汗衫,头上也要洒无敌牌生发油了。我还想买一个口琴。"

"该死的东西!"二楼家内的娘姨这时也加入赶热闹了,她也忍不住的笑着骂道:"你这东西不仅是无出息,而且也太……"她的话未说完,就被二房东太太拦住,她指着汽车夫向众人道:"他

要穿白衬衫，洒生发油，买口琴作什么，现在不说它，总之，他中了五十万还预备当汽车夫就是无出息了。现在不管他了，王妈！轮着你说吧！”

“我没有话说，我提议，让你家乡下送蛋来的那个人说吧！”

“我……我……我……我没有说，”乡下人红着脸说。

“不要紧，乡下人！你中了五十万将要如何过呢？”裁缝说着，大家都伸长颈子望着乡下人发笑。

“……买……买……”

“买什么呀！”

“……买田！”

“还有呢？我……我要打一根金……金扁担！”

“哈哈哈哈！”

“真是狗口里吐不出象牙来！”不大开口的房东老太太也笑得捧腹的骂了起来。于是这一场笑剧发展至此就告了一个终结，等到最后轮到我时，我道：“用不着说了，老太太已经说得好，狗口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这并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你过的是什么生活，你头脑中就止想到一些什么事。没有钱又要穿西装就会常常想到吴淞路了。在一个裁缝店里当伙计，受苦，就会想如何的独立做活，常常得了二房东许多好处，就想到有钱时要做一点东道，因为手中一向没有多的余钱，东道也就不能想到上馆子那类上去了。因为我们住宅内的人大家是爱吃栗子的，他就说出炒栗子来，虽然听了觉得好笑，却是很有道理的。你们如果要强着我说，我说出来不免也是一场大笑，因为我的口里吐出来的也只能是我的生活所熟习的话啊！”

那位西装瘪三接着道："林先生的话真是说得有理，想起二房东太太的话来，也无非二太太平日想的就是如何有钱时修抽水马桶，装锁，买水壶这类的事。"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汽车夫为什么说要穿白衬衫，洒生发油吧！"张妈笑着继续说："这也不过因为他要送女主人上跳舞场，回力球场，女主人常常骂他衬衫穿得不干不净，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他为了要讨太太的好，也不能不常常想到这些，至于买口琴，我想，大概是车子停在跳舞厅前，听了厅内爵士音乐而发生的豪兴吧！"

（原载《太白》一九三五年第一卷第八期）

怎样自学经济学

——读经济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

近几年来，经济学在中国忽然成为一种很时髦的科学了。研究经济学的人确也渐渐的多起来，并不限制在大学学经济科的少数人了，中国有了不少的翻译书，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著作了。自然，这不是中国一国的现象，这现象也决不是偶然的。就中国这几年的现象说，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线索：大概是因一九二七年后，一般人对于中国当前的许多实际问题更要求彻底的了解，因为工具不够，急忙赶着作一点基本理论的研究，于是社会科学抬头了。经济学就同新的哲学同时被大家特别"恋爱"起来，现在检查这几年的历史，虽然在中国这种基本的理论依然还是如此的贫弱和不普遍，但也仍然不能否认它的进步，譬如商店的学徒店员现在居然能够由自学的方法得到相当的社会科学知识的人，据我所知道的是一天天的加多，象我们目前这样的经济学的讨论，在十年前，我敢说就是在大学生间也是找不到读者的。现在在店员学徒中得到了。这一切大概都可用中国当前实践的要求去说明它吧！

所以近几年来许多人们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确实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了。但严格的说，大多数的人，还是脱不了在作关于纯粹理论的研究而没有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的问题联系起来。

现在不是有许多青年口头上能说出一些新经济学上的词句，能背诵两条原理原则么？可是，他们的研究也就止于理论的范围了。他们的理论也是止于外国书本上说过的，至于把这些理论在中国实践中去继续发展，用这些理论去解决中国当前实际问题，是很少见到的。不是有意或无意的在回避现实，就是机械的粗糙的在附会现实，结果仍然回到观念的理解方面去。关于回避现实的现象，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用不着举出谁来，关于粗糙的机械的附会则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就无遗漏的暴露了。

关于有意回避现实的研究者我们不必管他，至于所谓无意而实在与现实背离了的，我们却不能不加以注意，这些无意离开实践的人，大致对于当前的实践也还有一种朦胧之感的。因为朦胧不清之故，所以虽主观上抱着为实践而学习理论，读经济原理的书，但他却只能止于狭义经济学的范围，以为我们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的诸关系"就尽其能事了。所以他们即令对于狭义的经济学有些研究，在客观上对于中国社会也有些贡献，但也只能限于极小的限度，没有与中国实践的要求相配合。

中国目前的经济是极复杂的历史形态和经济成分错综交编着的一幅图画，我们的国内从原始氏族制度到财政资本止，大概可说应有尽有吧！构成这复杂的纲的自然有资本主义的形态，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封建的残余、奴隶制、原始的氏族组织和单纯的商品经济。本来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纯粹的封建制度都是不存在的。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的经济都是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的交编生存，不过中国目前当这世界经济大变动的时代，其形态之复杂错综更非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有的现

象罢了。

因此，要把中国的实践作为我们研究的前提，把理论与实践相配合。为着切实的积极的认识资本主义，为着研究与帝国主义斗争，为着中国国民经济正确的解放及其前途，我们停留在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框子内，仅仅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独是不够，并且也是不可能的。

是的，我们的国民经济还落后，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我国较其他国家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又因为中国当前是遇着一个非常的时代，中国国民经济又不能走英日各先进国的旧路了，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世界经济的激变中必然要呈现它的飞跃的形态了，于是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公有经济的形态都对我们有研究的必要。

这里由时代的给与我们的任务是研究三种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过渡时期及社会公有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研究它们的各自的发展和由一形态到另一形态的过渡。不独要研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顺次更迭着的诸社会阶段底经济法则，研究这种发展中的矛盾与运动，并且还应该研究这三个过程联系在交错发展所形成的现象与本质。这方是在理论上我们应尽的最实践的职责。

无疑问的，这一点，在许多研究者一向是没有好好做到的。不仅没有人好好的克尽了树立我们实践过程中的最实践的理论，甚至连感觉都没有感觉到。因此，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与意义一向不甚明白，研究的范围也多不超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结果是有意无意的成为纯粹的理论的研究了。

什么是为认识现实而研究呢？这就是说要把目前中国的实

践与理论相联系，从中国的实践中去使理论具体化，去充实理论，造成中国国民经济解放的理论的根据。是的，这里我们研究的中心刚刚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及其形态的转变与运动，刚刚是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不过，这里更应加重一句的，我们研究的重心不仅是历史中诸社会阶段的经济法则，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发展的动力和由一形态转到另一形态非徐缓的转变等等实践的问题。

我们就停留在这研究与理解这些经济法则的阶段么？不能的。苟如此，我们仍只在理论上兜圈子，健全的理论仍不能建立起来的。我们不仅要解释现象，我们最重要的乃在改变现象，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改造中国国民经济，到达点仍是在这改造上，不过出发点与到达点的不同之点，就是后者是把前者具体化了。真正中国国民经济理论只有在实际的破坏与建设中才能形成，一切离开这些实际的问题而作出抽象的研究，姑无论它如何深刻，姑无论它对于中国的实践有相当的贡献，都没有脱下解释理论的衣裳。所以在这里就同时意味到有无在理论上或实际的参加这一破坏与建设工程就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了。

说到这里，也许你要反诘我道："象我们这些穷小子想获得一点经济学的知识不过为了生活中认识一些片断的现象罢了，象以上说的这些大道理，哪里是我们能负担得起呢？"我以为不然，有许多大道理，不一定在书本中方可获得，在生产中辛勤的人，他们的了解有时要超过"读者破万卷"的人了，即就你个人说吧！你现在的社会科学的常识不是已超过一个在大学法科的学生了么？至于说到创造历史的工程，今日的文明难道不就是由于无数亿万辛勤者们所手创造的么？

这不用怀疑，以上的大道理并不是我们要好为高论，以“欺世骇俗”，而是当前历史的使命，姑无论在理论与实践哪一方面我们都觉得这担子是有点太重了，但是我们仍只得来扛它。不错，我们要把“脸朝着实践”，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

（原载《新生》一九三五年第二卷第一期）

《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弁言

在我把这一本小书编完后，我对于本书的题名颇发生怀疑了，这样十几封不三不四的通信凑成的东西，配称为《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么？我想：这名字是太堂皇了，我很有几分不安。然而，这书名是丛书主编人早定下了的，现在似乎不容易由我擅自更改。这怎么办呢？我在搁笔凝思中，不禁生出一种滑稽的感觉来，我嘲笑自己道：好吧！就让这美丽的羊头做着招告吧！

记得还是两年前，我和一位初中程度的族妹，讨论过半年的政治经济学，彼此通了不少的信。这一件事，我一向不曾忘记，因为这一年多来，我又常接到许多青年朋友关于这一方面问难的信，而问题的中心，却都是我们曾经谈到过的。我常常想，如果我能把那些通信整理出来，印成一册小书，倒可以省了许多写信的时间，也许对于初入政治经济学大门的友人是一种帮助吧。但因人事过忙，很少得到一个编辑这书的机会，去夏仲实兄派我写这本书，我就登时想到，这是一个时机，特地去信要回来了那些原信，这使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什么我这般记得我们间的这一段讨论呢？这是因为我在这三四年来，深切的感到：空谈读书方法，到底抵不过和人实际讨论中的亲切，一个由自学中的人提出的问题，比你替他想象出来的问题要实际。过去这十几封通信，现在看来，原说不上有什

么存留的价值，但它确是出于一个自学的少女手中提出的问题，而这些解答，确帮助她打开了许多疑难，是一件事实。因为这一个缘故，我开始来整理这些旧稿了。

现在收到这里的信计十三封，内容已有许多增减，介绍的书籍几乎大半变换了，一切新材料也尽可能的加入，文字有许多篇完全改写过，时间完全改为现在，比起原信来，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了，但问题的要点，以及讨论情绪，则依旧完全保存，就是文字中的穿插，以及当时博得她的欢笑，提起过她的研究兴趣的地方，也丝毫没有损毁，我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些小节呢？我为人很重感情，我觉得好友间讨论学问比教室里不同，就是好友间的友情成分比较师生间不同。这些通信中是充满了另一种气氛的，我在改写这些旧稿时，她的活泼的姿态，聪明的眼睛，顽皮的神情，依然活跃在我眼前，好象写初稿时一样，这里有一种轻快的感觉，我记得当我动笔给她写每一封信时，我的面上总常带着微笑，同时她也曾亲自对我说过，她读时也常是笑不离面的。这一笑，很帮助了她对于真理的接近，因此我要把这一笑转献给一切在自学中的朋友们了。

这些东西对于大家有什么用呢？这很难说，因为这本书中很少的话，是我自己的意见，不过就别人说得对的话，用我的口再说出来罢了。哪敢说是什么著作呢！至于我自己，倒很以此自安，因为门外挂的虽是羊头，但自己并不要卖狗肉，我无一丝毫卖弄什么的意思，只是记录自己一段和人讨论自学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而已。如果这时你也正在自学政治经济学，感到“学海无边”，无人指引，随便拿来看看，那也许还适宜吧！如果在这中间，还能得到一个正确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摸到一点门径，

而象我那位舍妹一样，居然能进而读完三大本《资本论》，那我更要雀跃了。我也就只有这一点期望。

我还要重复说，门外挂的虽是羊头，但因为自己的胆子究竟不大，不敢叫人过于相信招告，来上自己的当，因此在此招告下，来添这一小段自白，也许可以减轻本书的封面上所加的这样一个“羊头”的罪名吧！

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于上海

（原载《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

生活书店一九四五年版）

回乡杂记

一　十　年

日子真的过得太快，我在外面流浪到今年要喊十年了。十年，在一个渺小的个人不能算是一段短的时光，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我的一生又还剩有多少十年呢？我每次接到故乡友人的来信，说到“我们阔别十年了，应该谋一次聚首”的话，我真暗然神伤，弄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每次我也总被引起了无限的乡情。

故乡，啊啊！故乡！她对我是不即不离的一个影子。说我留恋故乡罢！现在我的生活的根已移植在外面了，骨肉的凋零，今日尚存的不过几人，亲戚呢？唉唉！经过了这十年的变化，人情若水，彼此的关系都不免淡薄、忘记。能挑拨我的感情的，除骨肉外，只有几个受过多灾多难的朋友了。他们尚未忘记我，我也没有忘记他们，但在今日生存的艰苦中，虽然彼此记忆，但彼此也都不能相顾，在这样的情况下，故乡对于我可以说是无多大关系了。

说我不留恋故乡吧！那怎么可以！我不能想象骨肉间想望我的眼泪，不忍读勤姊每次给我的手书，我不能不对故乡关怀我的师友动情，不能不对儿时，少年时代的生活生出一种回恋。故乡，故乡，我承认我对她的一切都在关心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不能摆脱自已的乡土观念。我爱听乡音，我爱吃故乡的小

茶，我爱那种比四川味另具风情的辛辣。我的生活习惯、嗜好中，任我怎样外省化，我终是一个湖南蛮子，湖南人总有湖南人的气概，湖南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好是坏另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不管它，我要说的，我既具有这些特点，那就使我不能不对故乡生出"仿佛的恋"来。更何况在这乡土上，我原与许多人发生了社会的关系，在这关系中，又织成骨肉、亲戚、师友的情网。这里曾演出了多少的悲喜剧，欢情，悲痛，狂笑，眼泪，哪一幕能使我忘记，那一件又不使我生出回忆呢！这样说来，我又怎能说我完全能与故乡断绝了一切关系！

在这十年岁月中，我虽没有做过回乡的梦，故乡的关系确也一天天淡薄下来，但乡情并未因之死灭；尤其在近年来，到过湖南的人，甲赞湖南进步，乙骂湖南黑暗，自己很想有闲时回到湖南看一看，到底这十年来湖南变成了怎样，顺便也使骨肉间团聚几日，朋友们痛醉一场，温温旧情，谈谈往事，也许这也是我这样平凡的人的生活中一大快事吧！这种心愿，久蓄心头。一直到三月下旬，才由鸿的催促，在贫困中，也带笑的走上归途，作了一回千里外的旅行。我真的回到了故乡了。

匆匆一月，象飞虫似的我和鸿又飞出故乡来。一月的旅程中，所见所闻，到也颇不寂寞，在倦游、醉酒、痛谈、伤感、兴奋、欢笑之余，也曾留下了一些零碎的印象。自然，我并不过于珍贵它们，我非诗人，我更缺乏描写三湘景物的妙笔，我不能将这些印象，组成美丽的文字，图画，但我仍为了个人的偏爱，仍欲使这些印象不淡漠下去，写成了几十节小文。如果说，在个人偏爱之外，还找什么意义时，勉强些说，在谈情、感慨、纪事、纪游之中，也许能窥见一点湖南的真实吧！不过，果如是，那也只是一点

影子。

过去的十年是过去了，我的十年自然与这些小文章完全无关系，湖南的十年呢，那也应该用大文章来写，这些小文章却只是十年不归的游子小住乡园中一点一滴感怀而已。然而，我却想到了今后的十年！啊！渺小的个人生命中漫长的十年，历史过程中的一瞬的十年。

二　黄浦江心

回到船上已经是午夜了。我们在白天已将船位定好，并且将行李早就送到船上，再上岸来去看朋友，并赴西兄的晚餐，在冰处一谈，就不觉过了十二时。现在象回家似的走到船间，将行李打开，也把舱房略为整理了一番，准备早点休息。大概我们都有些兴奋吧，谁也不感觉要睡，鸿揭开了窗帘，一心的在贪看江上高挂着的下弦残月，好象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想说的。我想她作长途旅行这还是第一次，并且也是第一次的离开父母，虽然我们这次旅行，预计的时间本来很短，但在她总是离乡别井，对着这凄冷的江心，银样的波光，总不免要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离怀来的。我因为受不了过于沉默的空气的压迫，故意来扰乱她的凝思，我说：

"你在想什么？"

"哼！不想什么！"她回过头来，笑盈盈的说："你看，多美！黄浦江的夜景我从没有这样仔细赏玩过，只是太冷寂了一点。"

"所以我们要谈话，不然不更冷寂么？"

"不！船上已够吵了。我们在水上生活这还是第一次，不要只贪睡眠，完全变为俗物吧！"

“好一个雅人！想不到你在偷窃江干的夜色，我原来还误作你在想家呢？”

“傻瓜！一个月的别离算什么！我正在高兴呢！我们到底动身了。从明早起，我一步步向着你的家乡走去，你那些热情的朋友见了你会发狂呢！”

“已失去的人，现在又回来了。”

“是的，至少对于你的骨肉、最好的朋友是如此。实在离家太久了，十年不回去走一转是太没道理的。”

我们接着又把旅行的计划重新谈了一遍，茶房送上一壶浓浓的红茶来，我们开怀的喝了一杯，问起船开的时间，原来要到次日早上九十点钟，我们是被他们骗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原来可以在家中过夜的，不必早就蛇屈在这一个搁楼似的舱房里。鸿却不以我的话为然，她以为能在黄浦江心过一夜也不易得。上海白日的吵闹，紧张，想不到到了午夜也还会有这般冷静。她对着静的上海好象另外生出一种爱慕了。这种静默是适宜于凝思、幻想的，我登时也又想到了这次旅行，在我们这样的穷人，终年忙碌，哪里想到能抽出一月的时光，能凑到这笔买舟之资呢？我们何尝不需要休息，不需要旅行？我们并非铜筋铁骨，不需要“夜”的安息！我们的头脑正需要营养，我们正需要多作内地旅行，多与广大的人群接触，终年坐在这十里洋场的亭子间内，玩弄一些原理原则，这正是目前写作上公式主义的来源。中国一切都在变动中，我们单知道在变动，是不够的，我们要了解这变动的每一姿态，在中心社会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各个具体的现象，以及这变动的推移、变化。这就需要作者有极实践的生活体验，我想到这里，不知不觉的叹道：“我们的物质条件是太差

了。"

"你又在想什么?"鸿带着报复的口气质问我。

"不想什么了。你听吧!现在就是船上也沉寂了,安息了吧。"这时我们除开听到船上的起重机还在机械的运动的声音外,什么人的声息都听不见。不知在什么时候,我们已忘记了上海,忘记了一切。

等到我们一觉醒来,只听见轮桨打水声,响成一片,原来船已快出黄浦江口,吴淞已在眼前。

三　在长江上

船上连续四日夜的生活,在鸿是平生的第一次,我也九年没有作这种旅行了。我们在行前就决定了这四日的生活。因为恐怕船上无聊,她已准备了旅行中读的书,我除带了几种书报外,还预备在船上写些文章,找人谈话,多睡觉,多幻想。因为几年来的生活,甚至连幻想的时间也剥夺去了。

所以在船过镇江后,我们就向茶房要来了一个茶儿,权作我们的书案。我与鸿在第二三日,总常轮流在写。她写了不少的信给母亲、姊姊、朋友,报告她江上的生活,我在四日内仅仅只写了五千余字,没有实现预定写一万字的计划。

水上的生活,据我的经验,海行宜于高卧、幻想,在长江的旅行,却不然。第一,长江的沿岸景物,常常引诱我们走出舱室;第二,长江轮总隔不了几小时要靠码头。船抵码头,总有一番纷扰,要打断你的沉思,惊破你的好梦的。尤其在这次旅行中,在船靠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时,我总带着一种异样的感触。这些地方都是我的旧游地,但有的隔别了十年,有的也相违了五载。

她们都给我深刻的印象。在我的流浪生涯中，都是我的漂泊地，同时也是我的第二、第三、第四故乡，我不能忘记这些地方，正如不能忘记我的生涯中许多往事一样。我这几日被这些地方的刺激弄得有些“婆婆妈妈”的酸态了。鸿每听了我那生活中的受难，常感动得要流下泪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她能看见这些地方，自谓不虚此行。

鸿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对长江沿岸山光水色尤表现极端的羡慕，她是海滨的女儿，一向是没有看过多山的。虽然长江的下游的沿岸并没有三峡的奇观，却仍拜倒于远近翠绿红紫的山峦影下。我们早起看日出，傍晚观落霞，当船过每一码头时，我们总要谈些地理上的常识和风景、掌故，她每过了一省，总要天真的拍手笑道，“我到安徽了！”“我到江西了！”“我到湖北了。”

找人谈话的机会这次很少成功，这大概是因为有鸿在身边的缘故，别人都似在回避和我接近。长江船上不在寒暑期间，旅客中最多的大概是些中小商人。我既不带上一个买卖人的面相，人家觉得和我无甚可谈，也不无原因。我想到了这里我只得陪笑向人攀谈，但谈话的范围，总束缚在极小的圈子内不易展开。我们从几位小商人的口中，知道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营业所得税、营业会计制度，因为中国中小商业经营，大半用的还是老式簿记，关于每年实际的赢亏，通常并无正确的簿据，现在政府要抽收所得税了，他们不仅对税收关心，也同时想到会计制度上来。其中只有一位江西人向我谈起东北军、西安事变及国民大会选举法，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直接涉及到政治上来。从我的耳里听到的，也仍是和十年前船上照例可以听到的谈天，大抵是谈年成，谈官司，谈生活的困苦。这次在这些外，听得最多的是

禁烟。但是这些谈话的人，口里或正在抽着正在“严禁”中的大烟。

这样的日子三四天是容易混过去的。我们就在一个黄昏之后，踏上了万家灯火的汉口了。

四 汉口之夜

从三北码头，我们沿着江岸向江汉关方面走着。我们预备徒步走到扬子江饭店去。我想在一步一步中，去寻觅十年前我的足迹，鸿呢，这是她出省后第一次的着陆，自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巴不得徒步去摄取汉口的第一印象。只苦了C，他今日为了生活忙了整天，又到码头接了我们两次，已够疲劳了，偏偏为了休养了四天的我们，现在不得不也跟着我们奔走，并且好象是责任似的作了我们的向导和招待。

在半明半暗的柏油路上，行人并不如过去的多，汽车的往来更是寥寥无几，一切都显出凄凉、萧索。我们用着散步的步子三个人在路心徐缓的漫步。我们的脚踏着沙砾上发出沙沙的音响，分外听得明明白白。C大概是感到我们太沉默了吧，他笑向着鸿：

“汉口怎样！你说有些象上海不？”

“很好！这条路有点象外滩。”鸿答。

“哼！上海哪里能我们这样安闲走路呢？我们用这样的步子在外滩走，早被汽车压死了。”我插着说，接着我忍不住向C道：

“汉口真的变得这样冷寂么？”

“今年听说还是热闹的，不过自然比不得民国十三四年，这

地方从民国十七年后就萧条起，接连“匪祸”、兵灾、水灾以及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这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就是一年年萧条下来，去年因为年成稍微好点，工商业略有起色，但昔日繁荣的光辉到底看不见了。”他接着更热心的告诉鸿，在他当学生的时候，每年寒暑假总要经过汉口的，那时汉口是如何繁荣，街头是如何的热闹，好象在为中国国民经济的萎缩长叹。他说完又转向我道：“路还没有忘记吧，那就是江汉关，不过这条马路因为外面筑了这条防水堤变得有些认不清了吧。”

我正在对着沿江岸的高地生疑，怎样也记不起这是什么玩意儿，被他这一说，我才翻然记起，这些东西过去原是没有的，这是近年为了防水才修筑起来的。

过江汉关，我忽然记起了仲述，心登时沉重起来。仲述！仲述！八年后的今日我路过江汉关前，你却离开我们八个寒暑了。我今日在此临风悼你，哭你，这又是谁能想到的事！

为了隐藏我心头的悲痛，我不想将我的心事告诉他人，我的心遥向长江对我的故人致了民族敬礼，我不敢抬头看江汉关上的钟楼，就随着C转入了江汉路。

这条所谓汉口的南京路在霓红灯光下的确比十年前装饰得摩登、阔气，可是每一个店家的门前，除看热闹的闲人外，我很少看到是他们的主顾，汉口的夜市似乎也不及十年前了。

是夜留宿扬子江饭店，与C畅谈了两个钟头。在麻将的喧吵、弦索的哀音及臭虫的夹攻中度过了这寂寞的夜。

五　反　刍

我们要感谢粤汉通车，这次我们三等客人竟然能享受卧车

了。因为归乡心切，鸿又于昨宵夜游中受凉，有些发热，不宜久住旅馆中，我们遂决定在汉不再停留，武汉风光，等到回归时，有缘再去领受吧！我们即于过汉之次日午后六点钟就跑上了长武车。

鸿一上车就拥衾高卧，但距开车时间还有两小时。我只有徘徊徐家棚的附近，看一看武昌一隅的人民的生活，偷窃一些久不听到的乡音，并想在这些人丛的谈话中，领略一丝一毫近年来华中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情况。我带着异常的机警性在人群中来来往往，注意着一切人们的谈吐和脸上的表情。

车站附近一排市集，都是以三等旅客为顾主的吃食店，杂货店有八分钱一餐的饭可吃，并且湖南人设的小饭店很多，他们在店招上特别标出湖南，或某县、某县的字样，大致在招引他们的同乡吧。据一位常走这条路的同乡旅客说，他们的生意很不坏，他带着一半感伤，一半幽默的向我道，“湖南人在外面混得好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哈哈！现在轮到了他们，这大概也是一种运数吧！”我也只有报以苦笑的点头。

但我们的身旁有一位江西的旅客插嘴道：“你们不要太客气，据我看湖南人在外面混得好的倒不少。不过，世界太不对了。譬如南昌，近六七年是还兴旺的，但到了近年，‘剿匪’军走后，生意也冷淡下去，市面简直不行了。现在湖南到弄得很不错，粤汉通车后，你们贵省的地价就涨上两三倍，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有的涨到十倍了呢！‘气数’已由江西转到了湖南。”他说完了又是叹气，把眼睛注视我们。

我心中想道：老表（湖南人和江西人间常惯用老表的称呼）！这一切都不关气数不气数，南昌的几年兴旺，不是正常的国民经

济的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匪祸”而使有钱的地主集中到省会来，又加上百多万军队的消费，一时南昌的消费市面现出繁荣，这是不足怪的，但南昌不到几年又消沉下去，那不过是消费力的缩小，人民的穷困，缺乏购买力的缘故，这是中国各地共同的现象，国民经济枯萎下人民生活的惨状，那与气数无关，更不是江西的地气转到了湖南。然而这些话我又怎能对这一位小商人说得明白！

我又从他们的口中，知道武昌的市容已改旧观，可是市面到并不因市容改观而显得热闹，这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表层的所谓经济建设是怎样贫弱的啊！

车在八点钟就开驶了。车的颠簸与昔日的情形仿佛相似，但速度大加。在风驰电掣中，鸿好象睡在摇篮里，时醒时睡，车过新堤，她已出了一身大汗，热渐渐退去，人也清新起来。我则一夜时起时卧，但两眼整夜未曾合拢过。十年的回忆一幕一幕兜上心来。啊啊！十年！十年！现在是一分钟一分钟近家园了。故乡是变成怎样？果如一般称诵者那般乐观么？明天我能会见十年不见的D，或者还能见到勤姊等，他们将怎样接待我呢？

明天！明天！明天含有什么变化？

我好象一个少女初次投到恋人的怀中的情怯，满身的血液在沸腾，我在这万分不宁中，坐待着天明。

车到长沙东站时，我又象一个失了慈母的羔羊，一旦找到了慈母一样，我急情的要向她的怀中投去，我要尽情的痛哭一场，以诉我这十年离别家园的惨痛。但是，我向何处投掷我的身体！我的慈母在哪里呢？

六　第一个印象

我不知怎样来记我踏入长沙时的第一印象，因为我们的感情太复杂了，倒不知要从何处记起。我们是在早餐过后九点多钟到达东站的。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在那天上午到家，D、勤都以为我要到六日才到，楷更连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回来，我们间已经多年失掉通信的机会了。所以，欢迎我们的归来的，可以说只有清晨的冷风，和车站上的苦力。然而，这样倒比在哄哄的欢迎行列中更自由，更清醒，我们可以静心的去观察沿途的一切，由第一眼光所能摄到的一切。

车站倒还是旧样子，秩序却比以前好多了，我自言自语说，我们走出月台，这时我才听到完全纯粹的长沙话，啊啊！这是我十年没有听到的乡音，纯粹无杂的乡音啊！当我和脚夫谈判搬运行李时，我发觉我的南腔北调已不为乡人所了解，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好在行李的运费，站上都有定章，我们将行李交给挑夫，自己就坐到人力车上，向D家去。

由车站到小学宫街这段路，已改变得不少了。车过羊风拐角使我吃了一惊，啊啊！原来这就是羊风拐角，要不是那块道标仍然存在，一会儿我是摸不着途径了的。沿途到处都看到过去狭隘不平的石街，大半改成了两辆人力车可以平行的平坦的石路，同时我也看见十年前没有的马路或较近代的建筑了。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感到怎样兴趣，我所极端注意的是街上来往的行人，特别是青年男女学生。

我凝视着他们的面上的表情和一举一动。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些青年已不象我做孩子时代的活泼。他们很缺乏一种活力，

一种少年时代蓬蓬勃勃奔放的力。他们的脸上很少看到天真的笑容，好象都有一种什么隐衷，被什么限制了他们青春的发展似的。那些成群结队、布服无饰的女学生，本来是很可爱的，然而看去却很可怜，她们就活象是一群在恶姑下的童养媳，但是谁又是她们的婆婆呢？

至于其他来往的行人呢？坐在自备人力车上的人，大致面容上都表现非常自足，叮当的车铃声，说明他们是治人阶级，他们似乎是无甚希求了。

以外的一切面相都是营养不全，生活艰难，得过且过的表情。但是这与我在苏州所感到的苏州人，好象都睡眠不足，白日现出那种昏颓的面相又是两样，南方蛮子的横气，在那无表情的表情中，仍然透露出来。不过，他们总共同感着一种什么苦痛似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已不能自由的发泄在外啊！

鸿在车上就告诉我，“为什么在外面的湖南人大半都很神气，在湖南反现出这样无精神呢？尤其是女学生，我没有看见一个生得阿杨（我们在上海的湖南女友）那样的？”

我用沉默答复了她。这沉默是带上了何等浓重的哀感啊！我想鸿已体会到了。当时，我仍希望这是我的眼睛有病，我的神经过敏啊！我极力压下由这第一印象所发生的复杂的情感，装着万分高兴的走到了D的家。

七 市 容

“外表我们也要看看！”

这是D、H对鸿很客气的说了“你是上海人，来到湖南，没有什么可看，外间一切传说湖南的建设，那都不过是些外表”的话

以后，我们同时回答他们的话。

“我们这次回到长沙是玩，看朋友。我们没有带上任何偏见，眼睛是很客观的，心绪是极度和平，我们走的步子也是轻快的。我们不会过于看重外表，但也决不忽视外表。我们想知道的，是具体的故乡，好坏可不管它。因为我们不要破坏这玩的原则，所以我们并无过大的奢望，真想在半个月内做什么调查的工作，我们所希望的是随缘认识一枝一叶，一个眼睛，一只耳朵，如此就算满足。”

我们在D宅真的没有坐到两点钟，就鸟一般的飞出去，我想先带鸿到长沙的南京路上去观光观光市容。

街市的改变，这已不足引起我的惊奇，在上海时，早有同乡对我说过，并且在“第一印象”里，已经反映过，现在已成第二次印象了。然鸿却在路上和我讨论，“为什么湖南让街，能够做得这样普遍，而进步的苏州、无锡反落后呢？”我当时想到的理由是：“苏、无在江苏的地理上并不象今日的长沙在中国的重要。长沙在华中一天天增高了地位，粤汉通车，以外再加上几千里公路，长沙市必然将一天天变为更大的市场，长沙街市改变有它的经济的理由。同时长沙是省会，做官人要面子，也不无关系。”一路说来，那小小长沙到也经不得我们几步，我们已由小学宫街，穿过喻家巷、文星桥、又一村、府正街，来到长沙的南京路（八角亭）一带了。

我们相约今日只看看大概，不特别留心某部分。鸿要跑书店，我也坚持迟一两天专门来看它。

这条南京路上，确还保持了昔日的拥挤，叮叮当当的包车，似比过去更多，商店门面也多趋摩登化了。店牌上多装有霓虹

灯字，有的虽在白天，也学上海一样，映着红、蓝的光。昔日几家老店大致都还存在，绸缎店的伙计，仍然油头滑面，身着绸衣缎鞋，在假扮下江的小白脸。至于生意呢？照我那天看，除开"九如"外，都是冷清清的。

以后我们就逛马路，马路在十年前在市内几乎可说是没有的，我们一气走完了中山路，一般印象倒不甚坏，不过，心上总有一种悲哀，觉得长沙还是贫困，阔人的钱现在大致都放到土地买卖的投机上。其他的工业并未发展，市容的改变带着一种强颜的苦笑。所以即令把街让宽改为马路，马路两旁也和武昌一样不能一时变为热闹市场，不能有现代化的大商店树立。旧的南京路固然因市内马路的开辟、市场的变动而现出萧条，但是新的南京路呢？这不仅是修筑了一条路的问题，这主要的是要一般老百姓袋里有钱，要老百姓有钱，首先要他们有事做，他们才能有购买力，人民有了购买力，投机的商人自然要来市场争利的，市场也因此荣繁了。

我并不反对人家的强颜作笑，我这里看出的是长沙的虚弱，单就市容说，她并不健康，她极迫切的需要营养与补剂。

然而，我同时也看出她还是在艰难中生长。长沙还是年轻。

八　跑，看，谈

要认识湖南，要看它在这十年有多大的进步，自然不能单靠眼睛，并且我们这次回来是玩，也不能使眼睛过于疲劳，专看严肃的东西，因为我们又决定在"跑"、"看"以外，还找人"谈"。但无论是"跑"，是"看"，是"谈"，我们决定都在玩中，我们要在学校没

有准备人家来参观时，踏进学校，要在喝酒品茗、忘己忘人的境界、彼此以真情相见中，偶然向人提出一两句关于湖南政治、建设、文化的话，使他忘记官腔，忘记顾忌，偶然也说一两句真话，如果我们要知道朋友的生活、境遇，那也再好不要直接提出问题，多聚首几次，到他家里跑两回，游一回名胜，吃一次馆子，在这些碰头中，他的一举一动就告诉你，他是怎样去生活，生活是处于一种什么境遇中。

我们本来没有调查某一方面的目的，所以我们谈吐极端自由，碰到了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谈什么话。人真是环境的产物，时间的鞭子对于人真是无情，昔日几乎朝夕相处的朋友，经了这十年风霜，变化也真的来得可怕。实在说来，这原也不足怪，一切均在流变中，在十年间生理上的变化，不仅小孩子成了少年，少年人长成了大汉，大汉又白了头发弯了腰，瘦子变胖，胖子变瘦，这还是有形的变化，身体内肉眼看不见的变化还不在内。人不仅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他还是社会的人。十年湖南的多故，甚过历史上几个世纪，他们生活其中，思想见解、习惯、智慧也无不受到影响。我们在接触中，在感情上、感觉中虽不免也一时陷入悲观，一时发出长叹，感情无定，但经过了上面一番理智的滤清，我对于自己也不禁失笑，我的修养到底还未到家。

是的，我应更冷静的去看一切现象，更热情的接近一切的人。聪明的D常用讽刺的语气批评一切，对一切都不在乎的样子，这我了解他的心情，但他看了我的傻头傻脑，十年来还依然如故，我也知道他真的能了解我。我们两人对于现实，热情原无不同，期望也非各别，不同的只是环境不同，十年来湖南的环境使他不能不变得更聪明，否则他会被淘汰，仍然会拿那十八块钱

一月，养活不了他的妻子。我呢？因为一直到去年年底，我还是无挂无碍的一个人，并且这五年来生活环境到底比他“自由”些，我还能傻，还能作傻子，对现实还能从正面看去。

从许多我所接触的人物中，我看清了那柄叫做社会的刀斧是何等的锐利啊！它一点不留情的在一切人们的面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面相。聪明、愚蠢、自私、愤懑、安逸、懦怯、傻相、阴郁、欺诈、无情等等面具，任凭如何钢铁似的人物，你非自己拣一个带上不可。我从许多人的接谈、言笑中，证明了我在第一印象中所摄得的影片，尚是正确的。

然而，我一些也不失望，因为我并没有过大的希望。我用了同样的热情，去接近了许多人，我丝毫不感到嫌厌，我要求的正是这真实，要看明这一切，那才正是看见了湖南人今日现实的生涯。

九　三　愿

到处听到地价高涨的音浪，由于粤汉路通车，由于四千四百零八华里公路的通车，引起了湖南地价高涨，由两倍三倍猛进到十倍十几倍。现在又因浙赣铁路快与粤汉接轨，湘黔、湘桂两路已在拟筑或建筑中，沿着这些交通线的土地都高贵起来。以时在过去，尤其在“匪乱”的时代，湖南的田地有一个时期是没有人敢问津的，但这时代是早过去了。现在土地的买卖变成了一种投机。土著的有钱人固然争买土地，外省游资亦跑进了洞庭湖，大量投进在这赌博内。为什么会引起土地的投机呢？自然，大半是因湖南今日的交通进步，增进了湖南在经济上的地位，稍微有些见解的人，都在预卜明日的湖南的商业一定有番繁荣，根据

上海地价发展的史实，不难想到这是一桩比航空奖券更有把握的发财之道，荷包里有了钱，难道这还不是千载一时让它抛出的时会吗？并且，不仅有以上的缘由，使人入迷，还因正在风传中的国防计划，湖南正是一个中心，在世界战云弥漫的今日，人皆为中国东南海岸线地带危，但这里是联结华中华南的重心，联络西北华北的交通安全线的心瓣，钱放在土里，安全无比，有钱人，谁听了这话，不心花怒放，笑逐颜开。这样一来，弄得外省的阔人，好象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似的，他们感觉这里是他们的希望，光明，生命！在湖南的人呢，只要祖上有福留下了一些不毛之地，也许睡了一晚就成了富翁，如果袋里更有余资，那是近水楼台，取之较易。这些希望，造成了一种赌博的空气，比事实的投机还高过百倍。现在长沙家家户户，日常的谈话中，不离这位黑色姑娘（指土地），由于这位姑娘的赐与而一夜变成了阔人的故事，那正所在皆是，继续流传在无数人们的口头，这姑娘的魔力真风动了一时，扰乱了无数人的魂梦。许多人改富了，许多人含着微笑，等候自己的好日子快来，更有许多深谋远虑的人，在苦心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是否有一天会实现，自然，他们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永远不能实现。

我初到家园的两日，我觉得这些中等阶层的人在发疯，但仔细想了一番之后，这也没什么稀奇。我们大家过去都太穷了，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发财，年年新年内互相祝贺："恭喜发财"，每每变为了对自己的一种嘲讽。买航空奖券又仅有二十五万分之一的机会，对于当前地价的转变，那不是天给良缘，还是什么呢？

因此我了解那些高谈地价者的心情，即令他手上并无分文而自己的地位又不过是二三十元一月的自由职业者，他仍爱谈，

并且眼里常放出一道热光，显出一股愚而又可怜的欣慕，我也毫不责怪他的荒唐。这一变动是要直接间接反映到这一社会层人的意识里去的啊！

我还亲自碰到一位投机家对我说，他希望的只有三桩事。

第一，世界战争再缓十年。

第二，湘省的铁道、公路系统早日完成。

第三，不实行平均地权。

他问我的意见怎样，我笑答他："我也希望你的希望中前两项能够实现。"他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也笑了。这可以代表一般长沙中等社会层的心理。

循着交通线是买地，出现了许多新的地皮商人。同时在全省的田价，也高涨平均半倍。有钱人买田的兴趣也甚浓厚。据一位熟习农村情况的朋友告诉我，土地集中的现象在粤汉通车几月中，表现得最明显。这话也许不足尽信，恐怕他看见的只是一部分的特殊现象，未必粤汉通车就这般快的影响。但我接谈过的人很多，有农民银行乡村工作人员，有乡村区长，小学教员，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们在各种谈话中，都听出湖南农村的土地确在各种方式下集中。虽然我接触的范围还不广，并且也没有实在的数字，但我却承认在个别的谈话中，能窥到一些倾向。我们还能相信到这倾向一定开展，封建的基础的小农一天天必定趋向灭亡。

十 有一架机器

路过乡村，我偶然远远的望见一家草屋的泥土墙壁上，贴有一张纸条，写了一行字，但上面几个小字，已看不清白，只望见下

面三个大字是合作社。这很使我生出兴趣，知道那位在农民银行做乡村工作的友人对我谈到的湖南合作事业，确实并未夸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这种组织的机关了。

据说这种组织对于"救济"农村，很收了些效。到底收了多大的效呢？他是做部分工作的人，也苦于不能具体答复。我从几个朋友随便的谈话中，知道这是农民银行农村放款的基础。原来农民银行放款，并不直接放给农民，一概放到合作社。合作社对银行负全责，合作社员不仅个人对社负各人的责任，且要负连环的责任，即一个社员不守信用，大家分担还款。现在合作社的用处大概还只做到借钱一项。利息是银行以八厘给社，社以九厘到一分二不等放给个人。社员借款额普通约二十元，也间或有到七八十元的不等。有了这些社，银行放款才方便、安全。

这种组织在湖南各县也还不普遍，但有了的成绩都不错。我因为没有时间去详细调查社的组织状况，我感兴趣的倒是农民对于这合作社得到的好处的一方面。但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他们可以不再受到高利贷剥削，可以借到钱。"

我说："借到这一点点钱又能做些什么呢？"

"唉唉！你不晓得农村的苦况，在过去农民向哪里能借到二十块钱？二十块钱呀！二十块钱在农民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自然，我们现在还谈不到改良农作物，农事经营，目前只能救死。这看来是一点点小惠，但有些农民实受到恩惠不小。到处已经听到歌功诵德呢！"

"啊啊！"

这位朋友还感慨的说道："在这年头，要人施小惠也不易，这种放款故然在本意也在帮助农民，虽然力量不大，功用也仅和缓

和缓一时的贫乏，但也还有积极意义，不能否认。至于公营的抵押，即由公家来开当铺，当农产品，利钱高到与下江当铺差不多，贫人也还在歌诵它的恩惠呢！你不晓得，现在乡村贫困到什么程度，没有钱的人，能到哪里借得分文。唉唉！就是这样当铺全省也不过四家呢！”

“啊啊！还有什么救济策没有呢？”

“这些都刚开始，还没有完全实现呢！不过，现在农民银行一天天在扩大，一切都似乎有办法了。”

“农民银行有多大资本？有气魄充分救济农民吗？”

“它有一架机器？哈哈！”

“什么机器？”

“印票子的机器！我是说它有发行权呢！有了权力印票子，不是就有办法了么？哈哈！至于目前这样放款给合作社，也不仅农民银行一家，听说上海各银行存集的资本不是无处流通么？现在看了湖南、江西的放款安全也都争着将资金向农村流，你没有注意到么？现在在湖南放款给农村的银行除‘农民’外还有两家，他们分区在‘试验’呢。这就是农村的救济。”

十一　还在将来吧？

承K的介绍，我获得几次的机会和粤汉路局及公路局方面的人接谈，我受教的地方不少。我久想知道一点粤汉公路通车以来，沿线的人民生活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他们的答话，开首总表示“那是一言难尽的”，接着他们告诉我的，大致是些劳动者失业的话。

最有趣的是粤汉路，据说粤汉全线通车的一天，苦力失业的

连家属约在十万人以上。过去湘粤运输的一部分，是借着这些苦力的肩腿的。有几万苦力过去总是从衡阳等处挑一担米出去，到广东换一挑盐回来，生活到也还过得去。现在盐米都改了车运，已用不着他们了。同时旧日的湘粤道上，现在也变为冷冷清清，昔日几里一座茶亭、饭铺，现在也都关门大吉，茶亭、饭桌边劳动者和老板娘的罗曼司已变成了中古骑士的佳话。这一切苦命的人，正合某君的比喻，真象"北风扫落叶"，被这时代的风刮去他们世代生活的依据，而逃亡无所了。

公路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因为全省公路十六线，通省外者计九线，即通湖北二线，江西三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各一线。通省内者计七线，即潭武、常桃、津醴、泮石、攸来、鲁永、茶浣线，共长四千余里，这里通过了无数的穷乡僻壤，影响苦力的生活自然更大，不过，一般的情形比铁道要和缓些，因为汽车运输的费用到底还大，运输的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苦力用处也还有，不过，因着劳力的竞卖，生活更比以前苦上万倍了。

这种命运降临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恐怕他们连梦也没有想到吧！

自然，我们没有理由为了怜惜他们而反对交通线的开辟。但是，我想知道，由于粤汉公路的刺激，又替湖南人开了一些什么生活的门路呢？我们不难回忆，帝俄时代的铁路发展很引起了许多有关的工业繁荣过，使得农村资本化的过程加速，扩大了国内工业品市场，对于帝俄时代的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它替当时的俄国人开了不少的生路（虽然那生活的范围还太小，还要发生俄国革命）。这一段历史是否也可以在我们这里重新出现呢？

事实告诉我们的，那完全两样。公路虽然并不能完全否认它有经济的意义，但建筑的本意，却是在军事，“工路是用人民的血筑成功的”(某公路员语)，完工后，它在经济意义上非常稀薄，本来二十条公路的价值才抵得住一条铁路，何况在地理上它又是本非经济的。这就可以相信某公路员的话是对的，他说：

“现在公路运输收入还完全在客运上，货运收入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话刚与二十五年度公路营业收入统计表上的数字，大抵一致。货运所占的比例这样小，对于内地手工业的生产流通，几乎说不上有什么大影响。

粤汉通车自然它与整个中国经济都有影响，尤其是华中。听说现在的中国进口出口货的一部分已改由此道了。将来的变化那正是无限，这里暂不谈它，但我们也仍能看出它没有脱除中国半殖民地性质。在这路的建筑过程中，因为材料等都购自外国，沿线并未刺激与它相关的事业发展。因为中国关税并没有做到真正自主，中国出口并未能与进口相抵，这条路的经济意义固然很大，但在今日还是比较更与英国有利益些。这样重要的交通线上，却看不出帝俄时代透露给于民族事业的作用。

“还在将来吧！

我也希望如此。然而目前直接受到生存威胁的人们，都无法子容纳他们，不是对于自已的一种讽刺么？

十二、炊烟还支配着长沙的天空

在湖南，传播得很广的有这样一首三字歪“诗”：

樊造纸，

刘国货，

何酒精，

张广播。

这首“诗”是讲的什么呢？是讥刺湖南这几年中的实业。樊、刘、何、张是四个人，他们经营了这四项“生意”，结果都失败了。

不过，我对于这样的讥刺并不感觉兴趣。我并不因了这讥刺“诗”就不想看其他一切工业状况了。

可惜我没有机会跑得更远些，看看今日的株州、衡州，跑跑新经营的矿山。我的探访仅凭了一双耳朵，大致是听来的。

谈到新兴工业，就是在工业界中的友人，也有两派意见。有乐观派与怀疑派。乐观派的人告诉我，湖南正在工业化中，他的证据是公私已有大规模的建设湖南的计划，株州的将来不独为湖南工业中心，也将为中国重工业中心。怀疑派的人不大相信计划，他们说，“在今日还不能过于乐观，计划只是写在纸上的；甚至他们对于圈地筑厂等等事实，也还在怀疑，“它会建筑得起来么？工厂建筑起来了，真的会开工么？”

我对这两派友人都没有下批评。我却在一天上午同着T到雨花亭去，无意中看见中央电气厂、中央电磁厂都圈有很大的土地，并且一部分厂房已快建造好了，觉得乐观朋友的话，也并不都是虚假，我心中登时想道：“可惜不能跑远一点，多看看这些现象。”

雨花亭一带烧砖厂到处可以看见，这是以前看不见的。但我并不吃惊，湖南在这几年来大兴土木，确是空前之举。让街，几乎把长沙的房子重新翻造三分之一，这要费多少材料，人力。“园”（即别墅并不一定有花木），“园”，“园”，到处都是私人的

“园”，这些私人的“园”的数目多至不可胜数。据几位新近也造了一个“园”的友人说，湖南做阔人较易，只要手中略有些钱，就可以建造起来，少则七八千元多到万余元，也就将就过去，至于要起得洋式，用钢骨水泥，那自然例外。这些建筑就构成了烧砖厂存在的基础，不！还有木料、瓦、水泥、一切建筑材料等等。

但大兴土木并不能看做就是产业的发展。由这一刺激所引起的建筑材料业的繁荣，那也有一定的限度，不能看了各地堆着红砖过于乐观。市容整理虽带了一点现代都市的性质，“园”的多只是说明地主老爷上了城，和地皮新贵登了场，许多中等社会层的朋友们混得好了一点。

湖南第一纱厂早已全部开工，听说第二纱厂又在建筑中，过去几个常年关门的黑铅炼厂等屋上，现在亦冒着黑烟，这是很可庆幸的，但站在天心阁上一望，炊烟还是支配着长沙的天空，长沙仍是一个贫弱的城。

“你看，湖南是否在向着资本主义化呢？”一位朋友逼着要我作答。我说：

“你这问话还太早了一点，我还不能找到答案呢；以后再谈吧！”

十三　好运道

人对于好运总是微笑。要是眼前的事实，才相信它是真实，这是人这东西的脾气。譬如中国在五四时代提倡的赛恩斯先生，因为他老先生在事实上并未给中国人的好运，他的本事在当时没有人看见，不是事实，所以倡言者虽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人总是对他冷视，不相信他有什么本事。

不仅一般常人这样，即在国内外学过实用科学的人，因都闲着无用，他们大半不会去怪社会，而怪自己的老子，不该把他送进工科，或研究化学、农业等，或者根本就看不起什么赛先生。及他府上的子孙，至于父母妻子，邻里乡党呢，那更觉得你学这些是傻瓜，学了许多洋里洋派有什么用呢？

世界真是多变，现在在湖南人的观念中也起了一些奇怪的变化。他们虽然没有听过赛先生的大名，也不知道赛先生府上的底细，他们却羡慕人家的子弟学工科、农科。在日常谈话中，我尝听见一位老太婆对邻人夸奖自己的孙儿是一个工程师，邻客太太也说，她要把她的大儿子学电气工程，二儿子学农科，三儿子学化学。她们都异口同声的在慨叹做官太苦太危险，尤其对于党官做不得。那位太太举出了几十个例子，证明了宦海风涛的可怕：没有真是非，求人太苦，太忍心害理，也不一定发财。她们的话虽不尽能代表多数人的心理，但也决不是偶然的。这在十年前，我们决不能听到。为什么这些老太婆忽然看得起洋里洋派的孙子了呢？

因为他们现在有事做，工钱拿得大，不必巴结上司，硬碰硬的可以拿大钱回家，并且事情长久，换了上司，换不了他。在这四五年来，湖南修了几千里的公路，筑了一大段铁道，四处大兴土木，这里不知需要多少懂得一点ABC的科学人才。省内高工、乙种工业学校、艺徒学校出身的人，平日别人看了是废料的，现在也被提出去，作了专门家、技师、助手。以外还请了许多吃过海水或洋鬼子到了湖南来。这一批人，是不能单靠八行书的，要有些实在的能力。于是有了这些本事的人，一时供不应求，大走好运，连父母妻子也就另眼相看了。

什么是赛恩斯，固然大家并不明白，但要把自己的子弟学“实科”，这变为一般做父母的愿望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湖南有那样提倡读经、打太极拳的空气，湖南还不会重演一次“拳匪”之乱的缘因吧！

我因此想道，提倡科学，决不是空口说白话可能奏效的，社会有了需要，人们对于科学的观念自然会得变起来，当前的事实不就是一个最好没有的例子么？这一段铁路，四千余里公路，几家建筑，已比写千本科学劝世文强。

人总得生存。生存就得有饭吃。找饭吃的方法，能够有平安可靠之途，谁也不想存幸进之心，低首下心于人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政治上要肃清贪污，在社会中要打破封建的结合，那也要靠经济走上现代化的道途。老太婆夸奖她那工程师的孙子那是值得玩味的啊！

然而，好运是否能长呢？我在许多人的高兴中，不得不为这些幸运者担心！

十四　他们是怎样活着的呢？

我非常的注意今日湖南中等社会层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属于所谓知识者的，他们的生活比起十年前来更充实些么？他们是怎样在那里活的？我这样自问自己。

这答案，我知道不能由谁来作出，这还得由自己的眼耳心去摄取、体会。我在这十余日中感觉最惊异的，是普遍的现出沉闷。这沉闷似乎并不是一种新的不满，受了一种新的刺激的结果，而是由于时日长久变成了一种麻痹状态的慢性病，当事者个人已经并不感到它。同时我又看出这种麻痹状态也并不是出于完全

的无知、愚昧，而是一种大疲惫后的体乏身虚。我对于这种普遍的沉闷，心中落下的许多眼泪，在这样沉闷下生活着的人，要有多大的忍耐力呢？

敏感的鸿问过我："在上海的湖南人在文化方面很是活跃，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活力，一种湖南人特有的气质，为什么在长沙的知识者反看不出，反现出这样的萎靡呢？"

我一时不知用什么话答复她。我要她多多留心，多多去考察湖南知识者的生活。真的，这里使我发生了无限的感慨。湖南今日物质建设，我们不能否认它有事实摆在眼前，但精神的建设，却恰恰成了一个反面，两两相抵，我非常觉得不合算盘，精神上的颓丧，萎缩，那可怕的普遍的沉闷，是不能用区区物质去补偿的。

今日统治着全知识者的意识的是平安与享乐。平安解释是维持现状，不多管"闲事"，用节省去度那艰苦的生涯，用笑颜、不在乎去和一切人们厮混，回避现实中的一切是非曲直，而以"今天天气哈哈哈"出之。"今日哲学"的道理很被大家所了解，于是享乐之风很甚。长沙的生活程度较低，所以在一个未失业的知识者，只要抱着今日主义，到也没有什么日子不能过去。长沙现在戏院、食馆、娱乐场所林立，虽然这是全省大地主集中省城的结果，但受了中等社会层的人的"今日哲学"的推波逐浪，不能说没有原因。我尝见一位每月收入仅三十元的小公务员，他每夜必雀战十二圈，每周必吃李合盛（长沙有名的牛肉馆）两次，亦可谓"晓得过日子"了。

做事（为了要吃饭）享乐以外，无所谓精神生活，即令是一个教育者也无例外，他们完全不看书报。许多人的家里几乎没有

订任何一份报纸(最多订本埠报一份)，难找出一本杂志，有之，至多是一本半年前的《东方杂志》。其他的书籍，则仅属于他家少爷小姐学校课本，几十年前自己读过的旧书，新的添置除会考全书、中学生会考、文官考试汇编之类的东西外，就是一折八扣的章回小说，张恨水、张资平这些人的大作。所以他们对国内新出版的杂志、书籍、作家的名字，大半都没有听见过。因此他们的精神非常和平，同时永远不会发生新的问题，想到新的问题，过去许多历史上的风涛是早随着历史过去了。目前是在现状中随波逐流，自己对一切已无是非之念，"横直是一样"，不错，管它妈妈的，何必为了什么幻梦自苦呢？是的，湖南人已无什么梦想了。

不，梦想也还是有的，那就是怎样发财。我们常在知识者群中听到这样的对话：

"某人现在弄得好了。"

"某甲的地赚了钱，某乙又造了房子。"

"你看地价还会涨吗？"

其他所谓知识也者，无论新旧，不问古今，他们都无兴趣了。天下兴亡，也大半不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对于这些东西认为完全是傻子的事，他们很"满足"了。

这些人就是湖南今日文化的主持者，万千青年的导师，也就是社会的中坚。

这种精神上的平静无事，是十年长期磨练所造成，但驯服到这样的程度，大非我踏入湖南前所能想到。他们都睡得很甜，我怎样来打扰人呢？

我很为那些患着不眠症的少数青年人同情，他们是太寂寞

了些。

十五　锦标的教育

有一个朋友很诚挚的对我说，“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是完了！”我听了虽不禁起了遍身的寒冷，半天为之不欢，但我却希望比我们年青的人没有“完”，湖南尚有可畏的青年，能够负担来日大难的青年。

青年原是赋有希望的，但要他成为社会的栋梁，却要加以社会的教育。湖南的教育在量的方面说来，恐怕很无愧于人吧，至于质的方面呢？我虽不敢妄加断语，若单就我这半月耳目所及，我不能不抱着几分不安。我普遍的感觉是教育的形式重于本质，知识又重过生活。这原也是全国教育今日一般犯着的毛病，不过在湖南的今日那就特别显得这毛病害得严重。

我从青年自己口中，知道他们最苦恼的是会考制度，谈到会考，孩子们的活泼气就登时没有了。小学毕业后要考中学也成为少年的一个难关，有些专门卖弄学校招牌的教育家，在招考学生的时候，故意将标准提高，或者本来只有五十名额的，他取一百名，慢慢地来洗扫，等到毕业至多也不到五十人，这样表示自己认真，可以多拿到教育厅一些津贴。什么初中招考一百个名额，报名应考者竟达四千左右。入了学校，每月有考，学校还在提倡班的比赛，以外还有最有名的全省会考，你名列前茅真是光学校而耀家庭，你可以受到人间一时的宠誉；落选呢，师长不欢，父母含怒，自己也觉得毫无意趣，失掉了做人的光彩。一般少男少女的心，弄得过度紧张，失去了青春的活泼，他们整天的生活不送在讲堂上，就死抱住一册会考指南读。考期一近，真是学校

家庭为之肃然，自己更有些三魂不安，与我们祖父时代上科场时有过之无不及。因之，青年身体的健康大受影响，一位医生告诉我，肺病今日在青年间比十年前要加多数倍，且时发生功课不好而自杀的悲剧，至于由这考风所育成青年的幸进心，虚名心，那都不说它了。

学校当局在文不能取胜于人时，就来讲武。他们好象京戏班子里教学徒一样在锻炼田径赛选手（现在又加了太极拳）。目的依然是在自己的学生能拿出一些拿手好戏来，取得全省竞赛中的锦标。至于哪个学校出了几个文武全才的角色，那就会轰动一时，名扬全省。这样的学校当局也就摇身一变，而为天字第一号的教育家了。

青年的生活完全被大人所忽视，青年修养的标准仍是过去那一套学古圣贤的法宝，至于如何做现代人的道理，今日世界的知识，青年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不独没有替学生想到，还要尽力防止学生自己活动。一位青年告诉我，学校现在又恢复了旧日的管理制度，防范学生甚严。学生除安分接受学校给与的那些文武本事外，你连动也不能许你自由一下，并且科目繁重，一个中材生要能对付功课，一天忙到黑也再没有余力了。

这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湖南今日的青年的面上那样缺乏天真的表情，活泼的姿态的缘故啊！

他们是否会被那些“完了”的人也弄“完”呢？我这样自言自语望着长沙市上来来往往的青年，掉下了同情的泪来！

十六 论内地刊物

在上海时，我记得也常承故乡不相识的少年们寄赠过我一

些出版物，譬如《湘流》吧，我一共也收到过两三期。我对于故乡少年寄赠的东西是从未轻轻放过的，我每次都要细读它。因为我已做过少年，我少年时代也曾有过发表欲，我很重视少年朋友们的意见。这次归来，我在跑了两三次书店之后，心中总是怀疑，我没有找到长沙少年自办的刊物。我想，长沙真的就这般寂寞么？长沙的少年真的就被那些"完了"的人弄"完"了么？我心中很不相信，不！决不！我坚决相信沙漠下必埋有清泉，地心内必藏有怒火。不过，一个别了十年，等于外来的过客，一时不易觅得罢了。

偶然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谈天，无目的的又扯到长沙的出版物方面，果然，我找到了几本长沙青年自已发行的刊物，证明了我的信念不虚。计我在朋友处找到的刊物有《集纳》四期，《今日评论》三期，《读卖周报》二期。听说还有一种文学刊物名叫《路》的，我未有找着。我如获至宝般的从朋友家中带回，在夜深人静中笑吟吟的一本本来翻读，我一时好象面对着无数故乡兄弟，彼此在诉说心中的积郁一般。

首先我吃了一惊，这些东西能够编印得这样出色，那是出我意外的，长沙印刷的进步已超过我的想象很远。啊啊！这里还有木刻，美术字也够好，这一切外观，拿到上海书摊上，也不会想到是内地几个青年出的。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很满意了。

至于内容呢？就以上这三种刊物说，我除感觉没有内地刊物的特点以外，一般可说都不差。不用说，在文章方面同样犯了上海一般刊物的公式主义，思想虽系代表着进步的，但仍陷于狭隘的观点，在理论方面有与实践不融贯的毛病。文字上，一般也都有些欧化的缺点。这是我读了它们后，马上共通感到的。

后来曾与一个朋友又谈到这一个问题，我就对他说出以下的意见：

“具体些说吧，譬如《今日评论》创刊号上的《赫拉克里特及其哲学思想》，第三期上的《希腊哲学发生的原因》，我就觉得不适于这样的小型刊物登载。不独它在字数占的篇幅太多，在性质上，即就思想说，我们应该更现实一些。编者似乎应该记得《今日评论》每期仅仅十六开的八面的小东西，我们每篇的文章似乎不能超过一千字，我们讨论问题，应该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事。

这类综合性质的东西，内地自然也需要，但我们需要具有内地的特点；全国性质的东西，还是让上海来出吧。我们要节省精力。什么是湖南的特点呢？

湖南今日是在非常的变化中，这里无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在激变中。在这变化中，我们的生活都要受到影响，我们不应忽视社会上、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具体的事实，青年人生在今日，自身也自然有许多问题、许多感想，要提出来、说出来。

这样针对着自己而写的文章，在以上三种刊物上是太少了。我们不要单说大话，单从大事着眼，我们要注意身边的小事小问题，此时此地发生的一切的问题，要启发全省的青年，敢于打开眼睛来看它，注意它，共同对它发表意见，就是谈理论，也应由问题入手，在问题中，夹入理论的解释。

不要看不起人，不要离开广大的人群唱高调，目前办刊物的毛病，就是界限太窄，自己注意的只是极少数的人，看不见更大的人群的存在。所以做文章的人，说来说去，也觉得无意味，因为找不出问题来，也就没什么可说了。”

我记得当我发表了以上一大堆意见时，我那位朋友首先表示同意，他还希望有机会能将我的意见，转达给那些刊物的编者们，我在欣慰之余，对故乡的青年，更怀着无穷的热望。我极盼在不久的将来，长沙青年的出版物有新的作风出来。

十七 谈地方日报

"湖南确实需要有一份比较好的日报"，到长沙几天，我就这样感觉，在长沙找《申报》看很不易找到，即令找到，也会使你过于没有兴趣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共场所偶然看到它，天啊！还是我过九江时那天的，已经相隔七天了。在上海早上在床上看惯了报的人，初回到内地，每天早上总觉得还有一件什么事没有做，人异常无聊，多过几天，人就变为昏昏然，对于世界就渐渐隔膜起来。

我这种呻吟声不知是在无意中被T听见了，抑或是天然凑巧，T告诉我，他有一位友人H，正拟筹办一个象样的日报，听见我回来了，想请我到他家谈谈。希望我能说出一些意见，这很使我兴奋起来。我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他，并且连声说：

"湖南确实需要有一份比较好的日报。"

我们在一个春雨连绵的上午到H家里痛谈了三四个钟头。H系快人，我们彼此相见并无什么客套。一见面，就谈到办报。是的，我谈到办报是特别起劲的，一谈可以纵谈整天。这大概是今日的报纸太无可观，因此使得阅报的人特别多牢骚吧。

我觉得湖南极需要有一种站在人民立场的报纸，经济方面完全靠营业维持，不望什么津贴，要超乎一切政派，不受任何诱惑，在法令许可的言论自由的限度内，发挥内地新闻事业的特

色。这些意见，大概H都很同意，但他是一个极实际的人，他马上告诉我他的计划，从经济一直说到营业、编辑。当谈到编辑方针时，他特别征求我的意见。

我提出了内地报纸的几个特点。第一，国际新闻注意系统化，国内政治经济新闻，也应相当的注意到系统，使读者容易摸清头尾。这里，新闻应与专论、名词解释、照片、地图相配合，略带点教育不常看报的人看报的意思。第二，要抓住湖南今日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抓住每一变化中的特质，作为这一个报纸的特点。政治方面，因为说话不易，到可少谈。举例说，譬如粤汉通车后，湖南在经济上起了什么变化，我们对于经济的消息应有极详细的调查与记载，用通讯或专论各种形式登出。我们不仅为了自己的生活有研究的必要，同时这些材料可以供全国经济社会学者的研究，可以诱致国内外的资金向湖南的事业投资，发展湖南的产业。广东有几家报纸专门着重广东各属的地方新闻，都是为南洋侨胞而设的，我们也应有一种真能记载湖南社会经济实况的报纸，供全国人研究。

其次，譬如说公路吧。外省人就不大明白湖南的公路，有人想找些材料研究它，也极不容易，我们也应对于公路通车后的经济意义与军事意义有实际的研究，切实注意这些交通线发展中的事实。

再其次，如社会以及文化吧。我们要有详细的报道，极实际的研究版、文艺版，培植地方作家，扩大对于当前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的讨论、研究。

我们完全要依靠自力，靠脚踏实地在湖南生活的人用苦干的精神去做，不能多希望外力。名流学者不能对我们有多大用

处，有之，也不过给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些参考。

我们办一种报纸，如果顾到以上的原则，确是出得有特点，同时文字大半能改用白话，言论能主持公论，附刊实际，有趣味，能多给人需要的知识，我相信一定有销路。粤汉公路各交通线，是湖南报纸今后新的市场，将来湖南的交通越发展，每天出进湖南的人何止万计，这一大批的过客，就是我们最好的对象。可惜现在长沙的报人缺乏这种眼光罢了。

我们都在非常的兴奋中，H说，他有几个朋友，一定要办起来，我们越发觉得欣快，我回家时，对鸿说："今天过得很痛快"，她说"你太爱故乡了"，不错，我爱我的故乡，我希望我的故乡人的精神生活日益开展，在下次回到故乡时，我也能享受坐在床上看这份理想的报的清福。

我在离别长沙之夜，当H、T来到船上话别时，我特为祝勉他们的计划成功。

十八 城防线

是在一个热闷异常的上午，我们在烈日下跟着T去参观城防线。城防线这一个名词是我取的，在T的口里就叫要塞。它是由障碍物、电网、碉堡、交通壕几部工程所构成，位于长沙城的周围十余里外，巩卫长沙城的城防。……

站在山岗上，一眼远远的望去，那四方形的碉堡，数百步脚有一个，好象警察的岗位似的，雄武的站立着。电网是位于碉堡前，护卫碉堡。在远望碉堡时，这一道防线并不能看得清白，只有站在碉堡旁，那十字交叉的木架，架上多齿的铁丝网，总觉得阴森可畏。在电网前的障碍物，因为不是作战时，是不布置的。

交通壕是联结碉堡与碉堡间的关系，和交通运输之用。壕内略将身体弯曲，即可畅行，壕宽五尺到一丈不等，它紧位于碉堡后方。

碉堡大小不等，有一半埋在地中，一半露出的，但大半都系全部露在外面。一眼看去，它不过是一个由砖头石块筑成的石屋，周围有枪眼炮眼，并不如何可畏。内部分上下二层，有楼梯上下，楼面亦如住房一样，铺着很平滑的地板。沿着枪眼，有踏脚处，四面设木板钉成的长凳，作一圆形。一堡大致驻兵一排一连。除步枪外，都配有一两架机关枪，如果是炮堡，则装有炮座。……

这里有位士兵用着好奇的眼光问我道，"你们在外面为什要到湖南看碉堡，我们的国防线你们看到过没有？那碉堡是怎样筑成的？"

我们只有相对默然，我应该用怎样的话来答复这位爱国的士兵呢？原来我们还只有城防线，我们的国防线又在哪里？我为了不使他失望，说道："在远东有个国家，叫苏联，在国防线上也采用了坚固的碉堡线的防卫，据报上的记载，他们都是埋藏在土内，外面是不大看得清白的，数目很密，坚固无比。我们将来的国防线也非那样建筑不可，好在你们都有经验了。"

他有些茫然不解，但听到我说他有经验时，知道我是在恭维他，他谦逊了一番，我们就谢别了他，跑上了我们来时坐的人力车。

一路上，闷热的南风吹得人有些昏昏要睡，我记起了D的话，在这城防线内，现在也还被阔人看做是永远的天堂，一道电网之隔，地价相差一两倍。我忽然想到电网以外的人，完全无防

卫的人。这城防以外完全无防卫的国，这天堂能永远安宁么？

十九　湖南往何处去？

在离湘的前一夜，许多朋友都有些黯然，在灯昏夜静中，Y再忍不住这沉默了。他眼睛放着光的向我道：

“你久离湘，这次回来看一切自然都比较看得清楚，你说湖南到底变成了怎样？她再会变成怎样？你想到这点没有呢？”

“我正想着，正想着她的将来？”

“有人说湖南已走上资本主义道途，等到中国铁道系统成功后，株州就会变为芝加哥，又有人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永远无望的。你想，到底哪一说是对的。”

我沉默了好久，因为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来，最后我说：

“这问题不容易答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的关系的束缚，不能使自己发展到独立的国民经济道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湖南因着交通线的开辟，经济也处处发生了变化，有了发展，并且还在向前发展，这也是一种事实。湖南的经济如果继续向前发展，能否突破帝国主义的支配，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能看了目前就乐观，说它马上就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就死板的肯定，中国经济不能有一点发展，闭煞眼睛来否认当前的事实。”

“我也正是这样想的，你说湖南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发展限度呢？”

“这又是一个难题。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兴趣，值得全国

学者研究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世界战争可以再缓和几年，给我们一些时间，如果中国一方面能好好的利用外资，一方面能把买办资本转变成为民族资本，好好保护民族资本，使国内游资都集中到产业上来，做我们生长的资源，如果在政治上能够更清平些，上下更团结得巩固，注意到建设，而建设又的确有一定的程序，中国国民经济之一环的湖南经济还是有发展的。不过，发展的限度能够怎样，那是一个问题。那是属于全民族的。"

"你是不是说，在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现象下，湖南还有发展的可能。这种发展是不是完全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呢？"

"我绝不轻视这种发展，也不这样悲观。要使这种发展，变为民族独立复兴的条件，亦不完全是幻想。那只要中国政治上能够看清世界情势，坚定自己对世界的和平的主张，反抗侵略，力图自主，国内经济的发展，即令是不平衡的，也在社会经济性质上要起作用。"

"照你说来，湖南很是有前途的！"

"路本是人走开的，就中国说也并不是没前途，问题只看我们怎么样走法。"

"关于建设的程序，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光只修筑道路是不够的，我在谈公路时，也曾谈到了。现在应注意的自然是重工业，这不仅是国防的意义，这也是发展轻工业的条件，当前我们还要生产生产工具。至于轻工业，有了重工业的发展，那它自然也会跟着发展的。"

"不过，还留有一农村问题，农村破产不救济，那工业也是建立不起来的吧！"

“自然，在现在，外有强敌当前，我们只求权宜的解决，以救目前，因此关于中国农村的救济能切实实行，那也可以和缓和缓现状，譬如新修正的‘土地法’如果能够不是纸上空文，农民银行对农村的放款范围更扩大些，并减低利息等，都对于农民多少有些好处。我们也不要弹高调了。”

“是的，但望低调能够不仅只是弹，而能见诸实行。”

“哈哈，我们这些人除弹弹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就在这般悠悠的叙谈中，不知到什么时候又另换上了一个问题。

二十　给故乡少年

阔别十年，今日归来，自己已到了中年了。我带着青年时代那颗赤热的心，重与故乡的一切相见，故乡已不是以前的故乡，儿时的伴侣，此时都生出了胡子，十年前只知嬉游的小弟妹们而今已变成了少年。一切的人物、环境均有着显明的变化。是前进呢还是后退？这用不着我来说它，你们生活在此一定比我半月来所感觉的要深刻。总之：一切是变了，变了，现在正还在不断的变化中。

我爱惜我的幼年，因此我情不自禁的关心到今日尚是少年的诸位的生活。这数年来，我间常也收到故乡未见过面的青年友人给我的信件，我常感觉无限的光荣。这次归来，短住家园，也曾新交过一两个朋友，由他们的口中，知道艰辛的时代中，锻炼出不少的有为的青年。时代到底进展，今日的青年已有不少的人走过了昔日青年的道路，这是非常可慰的。

不过，时代是太艰苦了。我们离黎明的时期还有一段长长

的路程。中国社会又这般复杂，湖南且当着激变的中心。一切现实是要反映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头脑里来的，少年少年！我们对此时代的严肃已够我们忍受了。我们将怎样来加强主观的自己的力量？怎样来认清客观的现实？怎样来在这困窘中学习生活？你们亦曾详细考虑没有？

今日的中国人大半还在酣梦中，今日中国的少年，清醒的人自然还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不能仅把眼睛看了自己，看了自己狭小的周围。我们要看得广大些。中国人不大多数都打开眼睛，国事不可为；少年人不大多数打开眼睛，中国的第二代无希望。一切的自由平等，不问是民族的，抑或个人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切都靠大多数人来争，一切的希望，美爱，不问是社会的抑或个人，不会不经过苦斗得实现。历史的过程是最残酷的，它不由你贪便宜取曲径，只有不怕攀登险阻道途的人，才许你走到你要到达的目的地。少年朋友们！不要错把前路估计得太便宜，太易走了。

不错，今日湖南的文化空气过于沉闷，知识者群的人尤其消沉，你们的教育也太偏于形式、机械，整个的成人层对知识是不感觉兴趣了，对人生更不敢正视，全社会意识是萎靡，是昏沉，是自私，是保守。总之，湖南的物质建设是倾向于近代化，而精神现象却是向古代倒退。这是我在这十几天到处所感觉到的。

这一切无疑的要阻止生命的跃进。朋友们！当我看了读经，太极拳，考试，锦标，这一切玩意儿，我真不知为大家怎样的担心。

我要重复的向你们说，时代是太艰苦了。你们今日成了沙漠中的清泉，黑夜中的萤火，大家各自珍重吧！天明还有些时

候呢！

恨我无缘和大家一聚，不！我们实在又何必相聚呢！我已从大家在戏剧、出版的天才的创作中，取得了你们的认识了。

小住家园，愧无所赠，愿大家实在的生活，虚心的学习，强硬的奋斗。就写了这几行字留别吧！

（原载《认识月刊》一九三七年第一、二期）

小百姓怎样救国呢？

以前的人，以为国家的事体是应该归官老爷管的，老百姓只要还粮纳税，听老爷的吩咐就得了，国家大事，不必管。民国以来，虽然在上头做官的人，不自称大老爷了，国家的事体，也要老百姓来管，但真正的老百姓，却仍然只管自己吃饭睡觉，不大理会国家的事体。

近十多年来，有些老百姓觉悟了，知道自己的日子过不好，也大半是因为国家弄得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自己才受苦，要想把自己的日子弄得好过一些，却不能再不管国家的大事。到了最近，绥远打起仗来，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很兴奋，觉得这一个战争，不是平日的内战，而与自己有些关系。人人在关心，有些人更兴奋得不安心做事，睡不着觉，心中想道，绥远的将士能够在冰天雪地打仗，自己这般无用么？

“我也是中国人，我要救国。”许多人这样自己对自己说。

怎样救国呢？

许多人又这样想：“我要有机会到绥远去，一定也扛枪参加到队伍里去。”

“我要有钱就把我所有的钱，捐出给国家，作为战费。”

没有机会，又没有钱的人呢？

他们不知道怎样救国才好。北平学生到农村向老百姓报告

绥远战争，叫他们也起来救国，有一些老百姓就说："死是不怕的，但我们既不能到绥远去，又没有钱捐出，你叫我如何救法？"

可见现在不懂得怎样救国的人还多。

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怎样的救法。

自然，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上前线去，不能叫自己肚子还吃不饱的人捐出粮食来。救国不是这样简单的。国，确是要每一个人都来救，但救法并不单是当兵，出钱。

打仗的时候，耕田的人还要耕田，织布的人还要织布，教小孩子的还要上讲堂，开火车轮船的人还要开车，开船，办报的还要出报。我们七十二行的人，还要照常工作。光只工作，就不救国么？

不是的。救国并不是叫大家都不吃饭，不穿衣，不讨老婆，不教孩子。前线打仗只能让一部分人去干，后防的人，仍应照常工作。我们要分工，每一个人总得分一份儿，各人干各人的，就是爱国了。

各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不能干一样的工作，我们应就自己的能力、地位、社会关系等等尽我们的力气。士（即读书人）农工商或七十二行的人，各有各的干法。能力大的人多干一点，能力小的人，少干一点，就是害了病，不能干的人，是要他的心，天天想到国家，记起前线有人在为国家抗战，他的心到了他也就尽了做一个国民的责任了。

救国工作到处都可做，什么地方都可做，并且不必等人教你怎样做才做，你可以随时随地，自己自动的动手做。譬如利用业余的时间，和人谈天，唤醒还没有醒觉的人，你唤醒了一个人，就

给了国家一个战士，一分力量。或者你调查了一件仇货，叫大家都不买，你就保存了国家一分金钱。你举发了一个汉奸，就给了敌人直接的一个打击。你无论贡献什么，不管是一分一毫的力量，都是可宝贵的，一样的是救国。

要全国人都这样动起来，那就叫做全国总动员，要全国人真的都动员起来，才能打敌人。

（原载《大家看》一九三八年第一卷第三期）

乡村宣传工作方式之一例

一

废历新年，我因事回到了我的故乡长沙，在东、西乡都住上了四五天。虽然我下乡是为了个人的私事，但同时确也想借这机会看看故乡的救亡工作，所以我在这八九天，总尽可能的利用机会，和各方面的人接触。自然，我得到了不少的材料，也生出了一些感想。在长沙城，我碰见不少青年友人，和我讨论乡村工作问题，还有一个流动宣传团，特别提出乡村宣传工作方式问题来，很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惜，因为自己有编务在身，不能久留长沙，所以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机会参加讨论，心中万分感到遗恨。回到汉口后，和朋友们见面时，总也不免被人追问，"湖南的救亡工作怎样"，"长沙乡下怎样"等等问题，我自然也不能不答曰，怎样怎样，实在所答也没有真的把自己要说的话都说出。这一来是问的人多，不胜其答复，还有些人虽然提出这些问题来问，却是不准备要听你的详细回答的。

但我却始终没有忘记我在故乡的那几日，那几日中所闻所见，尤其我没有忘记那几位热心乡村宣传工作的朋友，我想，我应将我在长沙乡下所看到的乡村宣传工作，我所不满意的几点，都写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我以为，这在当前是万分需要的。那末，就借了这篇短文作为我对乡村宣传工作方式的浅

见吧！

二

走出环城马路，到了长沙近郊，我就用了最大注意去看沿公路所贴的标语，并在贴有壁报的茶店，特为停步细读，同时我更留心往来的乡人对这些东西有什么反应，我也设法去和农民攀谈，希望听到他们对于抗战的意见，我想从农民口中，探知一些这里宣传所起的作用，如果有缺点，缺点是在什么地方。

给我第一个印象的，就是到处张贴的"逃避兵役就是汉奸"的那一个标语，我觉得这标语还值得商量，在政治动员还没有做到足够时，这不会过于刺激农民，惹起他们的恶感么？我也对其他标语发生了怀疑，我疑心这里有许多标语，农民会看不懂的。

我又站到一张壁报下面了。这是刚贴上去不久的，照理在刚贴的一天，一定是有人来看的，并且现在正是乡下过年，也不会没有时间，可惜，在那泥墙下，除站着我这一个过路人外，只有两个孩子在旁边游戏，这明明是大家不感到兴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一小半是因为这里离城很近，消息比较容易得到，壁报上的材料又太少，引不起人的注意，一大半是因壁报体裁的问题。那张壁报是专电式的，新闻提要式的东西。看了七八条新闻题目，你并不能知道底细，这哪里能引人注意呢！我一连看了两三处，还有一处比较好点，就是专电以外，还有几篇言论，但文字完全是欧化体的，在乡下人的眼中，就变成看不进眼了。这些东西有什么反应呢？

感谢废历新年，我能有机会和乡下各色各样人接触，从乡镇

的统治者、绅士、区长、甲长、三家村先生到朴素诚实的农民，厨房里的老太婆，他们也很关心到战争，见面第一句总是问：

"你老人家看呢，仗该不会打到我们这地方来吧！"

这问题是不容易答复他们的，但我在头两天，总想尽法子听他们的话，每当话说开来，他们总是众口同声表示怕过军队，怕抽丁（即抽壮丁），对于学生下乡劝募公债，劝人当兵，很冷淡，略带不高兴，他们对于"逃避兵役就是汉奸"的标语，真的有了反感，大家很气愤，我听了好多人在说，"过去，皇家也没有这法律，不当兵就是汉奸，这从哪里说起来的呢？做秦桧、毛延寿的不是老百姓呢！"懂得一点"古"的这样说。

听的人自然同情，感到痛快，并且还有人这样说：

"这都是那些学生说的鬼话！"

"他们自己又不当兵！"

"怎么抽得到有钱人家里去呢！"

"这日子不能过了！"

我听了这些话，心都凉了，但我并不觉得奇怪，并不为这些现象悲观，因为在我看来，这也是必然的。我在七八天中，听到农民的谈话，百分之九十是谈谷米卖不出去，卖不出价，镇上市面不好，捐税繁重，只有谈到抽丁、拉夫、拉船，或听见长沙被空袭的炸弹声，或河里拉船打死了人，才谈起战争。

这里，啊啊！远的仅离长沙六十里，近的仅仅二十八里，真正的大众对于当前的抗战是非常模糊的，这离全民动员的距离还远得很，这里也与长沙市区一样，完全没有战时空气。从这里所反映出的那一点点的口头宣传，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有两个家庭，因为自己的子女在镇上"做宣传"（乡下人语），

被父母知道，各人打了一顿，女的下期决定不许再进学校，学生每次在镇上演讲，听的人据说除小学生、游手好闲、看热闹的人外，真正的农民是非常少的。一个比较进步的青年农民（我的亲戚）告诉我，他怎样听不懂宣传人说的话，他向我问了许多问题，大致都是听了好多次"宣传"时听来的，但他并没有懂得那些话的什么意思。

自然，这不过是举的一两个例子，是我碰到的一部分现象，这并不能说这是长沙乡下全部的现象，同时我更不否认长沙乡下的宣传工作仍尽了相当的任务，不过，虽然这是一两个例子，却同时是事实，在着重宣传方式的意义上，我们将这例子而加以探讨，这不独不是小题大做，而在研究宣传艺术方面，是有些益处的。

三

在长沙城，我曾将所见情形和一位素富民众工作经验的友人细谈过。他说，"这种现象是极普遍的。提到湖南，外来人总过于乐观。他们总认湖南民众有革命的传统，湖南民众容易起来，但他们忽视了在另一面，湖南民众脑中还保留了十年来的恐怖，农民提到要他们组织，就联想到过去农民协会，杀头，坐牢上去了，有些过去的干部也因对当前时局缺乏认识，不敢再出来。因此，目前在乡下工作的人，只是一部分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仅凭一片爱国热心的本地青年、学生和外来的学生。因此，他们不能十分明了湖南乡村的实况，不能灵活的去作宣传，他们只能凭他们自己在书报上看的一些东西，原封原样的去传达给农民，因此发生你所看见的现象。"这位朋友说到这里，他慨叹道，"十年

来不仅把过去的干部消耗尽了，同时十年的教育也不知毒害了好多青年，现在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这确是一段经验之谈，对于湖南救亡运动的同志们是值得注意的。不过，我在这里不想把问题扯得太大了，我所注意的是宣传方式。在目前湖南乡村，是否就没有工作环境呢！决不是的，是否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就不能下乡工作呢？也不然！譬如在我这八九天的乡村生活中，随便的接触，我已感到我们还是可以尽一些宣传的任务的。

跑到乡村来，我就感到当前刊物所尽的宣传任务还甚薄弱。明显的，有一些刊物，即令销路很大，但旧的商业的发行路线，使这些刊物并不能深入农村，它所达到的范围仅仅在几个大的城市，几个较进步一点的干部。一般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如果只是拿了这些刊物上的东西，传达到农民大众中去，那是甚不合适的。我可以说，现在中国还没有一种真正能适合大众的读物。这些刊物，只是适合干部读的东西，到农村宣传，那完全要改变另一套东西，即用各种通俗方式正确反映了这些刊物上的主张，这一种工作，真值得一切做乡村工作的友人学习。

我以为，一切宣传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有人来肯听（如果是戏剧、漫画，就要有人来看），能吸人来听，听的人，容易懂，易于接受。这自然，你要说他比较熟识的东西，他平常关心的东西，不是与他生活上无关系的东西，更不是完全听了莫名其妙的东西，至少你要从这些方面，引诱他听得下去。

据我这次在乡下八九天来说，我在随便的谈话中，就发现自己很说服了几个人。我在开初所碰到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对战争怀疑、害怕，想图避免兵役，想苟安，但我在他们谈话中，知道他

们实在是不明白事实，和受了乡镇上那些穿长衫的人的毒害，不是他们不积极，真的怕死。乡下穿长衫的先生们，他们的知识落后，顽固，迷信，他们一切的知识，都是由耳朵听来的，不是道听途说，就是随心忆造，胡说乱道；这些人，把这次战争，说得过于可怕，把日本的兵器，说成了比《七剑十三侠》上的宝贝还新奇。譬如我在乡下的那一天，恰巧碰了长沙城遭受空袭，离城五六十里听了轰炸的声音，当时镇上人心即现出浮动，到处是成堆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在谈论。你以为他们是怎样谈论的呢？其中就有人说出："敌人的炸弹，每一个至少也有一两千斤，最重的也有五千斤的，譬如我们这一个镇上，半个弹就完了。""会掷弹人，可以百发百中，"还有人高声叹道："长沙完了！""唉唉！这是遭劫啊！大数难逃！"于是在大家惊慌中，众口一声的说："这完全要靠菩萨。"在这时，已有人念出阿弥陀佛了。

我站在他们身边，真是啼笑皆非。一个邻人劝我道，"你还是不要再出门了，出门太险呢！"

我笑道："不妨事！我这几个月碰得很多，单凭飞机轰炸，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于是在谈我的经历中，把他们所谈的那些谎言，巧妙的一一加以纠正，并告诉他们，敌人怎样炸保定，炸萧山，掷了千数弹，在保定、萧山，每一个地方也不过死几十个人。"象我们这一个镇，不仅一个弹炸不光，十个弹也不见得能炸一半，会掷弹的人，也决不能百发百中。"同时也略为说明飞机的构造，怎样掷弹法，炸弹的大小，日本空军的力量，我们自己的空军的力量，高射炮、高射机关枪的作用，最后说到碰到敌人空袭，我们应该怎样。

说得大家脸上一阵一阵由惧怕而微笑，由悲观而乐观起来，

他们中，不独是一般农民相信我的话，就连在二十分钟以前说那些可怕的话的人，也改变了。

许多次数的谈话中，我都得到相当的效果，多少动摇了他们的一些偏见，从这些谈话中有下面几项经验，是可以作为乡村宣传工作的参考的。

第一，对乡下人谈话，切忌整套整套的向他们灌输，最好利用每一个机会，很琐屑、片段的谈。

第二，要从他们熟识的、要听的事件谈起，要与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

第三，要具体，不能说抽象的话，最好用说故事的方式，加油加酱，增加趣味。

第四，自己不要装腔作调，好象是在对无知的人说道，而是对兄弟邻人般的，亲切的闲谈，土腔土调的说。

第五，说得投机时，如果他们提出问题来，要有办法答复。

第六，要注意乡村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接受性，不宜在一次即抱过大的奢望，要能够忍耐些，艰苦工作。

这自然都是老生常谈，现在略为记出，就作为我答复那位流动宣传团的友人的一点浅见吧！因为篇幅有限，我不想再写下去，我却希望一切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友人，能具体的提出一个一个的问题来，我们当在本刊作更详细的讨论。从实践中，提高宣传的艺术！

（原载《全民周刊》一九三八年第十三期）

在抗战中怎样学习中山先生的全部遗教

——为中山先生第十三周年祭作

一 怀念先生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我们别了先生不觉又是十三周年。人总是有回忆的，这十三年中，中国风云变化，人们的记忆里总不免有了许多伤痛的痕迹，然而我们一想到先生，一遇到这三月十二日，我想，不管思想、信仰如何不同的青年，只要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的，总不能不追忆先生，思念先生。

任现实是如何艰险，阴暗，中国革命的青年从未误解过先生，从未对先生的主义、遗教，发生过根本的怀疑。我尝碰到一位在极艰苦中受难的青年诚挚的问我道："你想，倘若中山先生在世，中国是否是今日的样子？我们是否还有这一番的受难呢？"他自己的答案，是"决不会如此！"先生对于青年的信仰是如此的深厚的。

我还记得，民十三四在北平的友人，虽在十年以后，一谈到北平的生活，总不由得不联想到先生那次北上，那漫天大雪天安门前的恭迎，三月十二日前对先生疾病的关心，三月十二日上午

十时我们接到先生的哀耗，学校宣告停课的丧钟，当时我们情绪的紧张，沉默的致哀，以及北平万千青年恭候在铁狮子胡同前，热情的等候与先生的遗容作最后的一面，以后先生的身体由协和而移到中央公园，中央公园追悼的盛况，以后由公园而移西山，这一中国空前的哀悼与执拂的行列，啊啊！这一连串的记忆，永远是在当时在平的青年的心里的。多少少男少女流下了泪来，多少少男少女从那天以后就开始读先生的书，多少少男少女就在中央公园追悼会公开征求国民党员的名册上，坚毅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归依了先生，作了国民党员。这是说明了什么呢？

这是说明了先生革命的人格的伟大，先生的主义的实践性，三民主义所包含的中国革命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是中国革命的精髓，这是一切思想、信仰不同的青年，不能否认，不能不一致的拥护的。

我们只有这样了解，才能解释中国青年对先生那般热情的原因。然而，在这十三年中，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中，多少青年在三月十二这天，在受苦受难中，私自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这在今日回想起来，是一件伤心的往事。但是抗战爆发后，把这一切伤心的往事都结束了。

今日我们全民族是在空前没有的团结中，中国民族已在日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进攻中，形成了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统一战线下，发动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十年的历史道程，今日仍旧回到先生所指示的道路上来，这是今年我们做国民的人万分兴奋、欢呼的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对日战争，现在高于一切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改善战争状况，支持长期抗战。当这艰难困苦的

今日，我们纪念先生，不能不心平气和来研究先生的遗教，以及先生所指示的一切革命的方略。我们除开用最大的忠诚与勤恳来学习先生的遗教，发扬先生的学说，同时忠实的执行先生的遗教与指示的革命方略，以挽救目前的危机，不能算作先生忠实的信徒，或了解先生、敬仰先生的国民。

展开先生遗教的学习啊！宣扬先生的革命学说啊！实行先生的革命主义啊！我们今日全国民众要为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

二 全部遗教的几个特点

先生的遗教所包括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提到遗教的继承与发扬，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今日，我们在军事纷纭中，应该从何处开始呢？

我们至少应对先生的全部遗教有下面的认识。

第一，我们要了解先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先生的学说、主义是产生在中国近百年社会的发展的阶段中，先生一生是以实践第一，不是象那些纯粹学究一样，只专心于自己学说的体系的建立。研究先生的学说与主义的人，如果不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去理解先生，不从中国革命中去理解先生，而将先生的学说与主义作为一部经典来看，那永远也不会理解先生，反而只有曲解先生全部遗教并与革命乖离。

第二，因为先生是以实践第一，而中国革命最最基本的要求，先生天才的发觉到是这三个，即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先生将这基本要求，发扬成一种救国主义。先生绝对没有

把他的理论凝固成一个不变的体系，来束缚、限制三民主义的发展。恰恰相反，从先生学说与主义发展的程序看，是从单纯反满复汉的思想，反专制的民主的思想，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改革的思想，渐渐发展为现代民族主义，比资本主义各国的民主制度更高度的民权主义，同时充分带着社会主义性的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普遍性，三民主义内容的丰富，是因为先生能够吸取中外古今改革社会理论的精华，先生不排拒外来思想，同时也不盲目的固守着中国历史的传统，所以先生一生从不拒绝世界新的思潮，但决不只是贩运洋货。一切新旧的东西，到了先生的脑内，就融汇贯通，成为先生思想发展的原料。因此，先生的学说与主义，是时刻在发展中。所以，我们要理解先生的学说与主义，要站在先生这种革命的发展的观点看，才不会误解先生。如果将先生的遗教，固定在先生的某一阶段，那完全是违反了先生的本意的。

第三，先生对于三民主义一向不是当作三个无关联的东西，这是因为先生认清，中国革命这三个主题，有着必然的联系，单单解决某一问题，是不能达到解决的。在辛亥革命以后，先生认为革命失败，是因为当时握着政权的袁氏，以及当时的党人，不能了解先生民权、民生主义的意义，没有实现民权与民生主义，先生即说革命是失败了。所以先生一向是反对自己的党人将三民主义分割来看，随便采取某一部分，丢掉某一部分的。我们研究三民主义，特别要注意它的联系。

第四，因为先生是实践第一，所以研究三民主义外，必须同时注意到先生革命的政策。在先生的革命政策中，最辉煌最天才的指示了我们，中国革命的力量，在主观方面是民族内部结成一条民族战线，在客观方面，配合世界爱好和平，不侵略中国的国

家、民族和人民，结成亲密互助的关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一认识下，先生手定了容共，工农，联俄三大革命政策，及对国内弱小民族的政策。研究三民主义如果将先生的革命政策割裂开来，那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的。

三　民族统一战线下共同救国的问题

真理永远是不会湮没的，今日全国力量又复团结一致，而国共两党第二次的作了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一次的全国团结，虽然是十年以来破天荒的事，但不是新的事，这条路仍不过是先生过去所指示的。我们历史的条件，决定我们非走这条路，我们的民族即不能自存，这是中国革命力的泉源。

据八个月来抗战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独心服先生指示这一条路的目光远大，气量宏阔；同时它真正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唯一真理，我们当前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一点，就在这里。我们看得明明白白，我们有了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才能起而抗战，但是，因为我们的统一尚不巩固，历史还留了许多渣子，在妨碍这两大车轮的进展，所以我们在抗战的第一时期中，不能不受到相当的挫折，并且一直到今日，这些渣子还在阻碍，延缓战局全面的改善，这是万分值得我们警惕的。当前战争要求各集团间捐除一切历史上的仇恨，而彻底接受先生的革命政策，将民族统一战线，作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达到真正的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而进行全面全民族的战争。这是打开当前的难局，改变战争状况，支持长期抗战，达到最后取得胜利的前提。

怎样才能使民族统一战线达到巩固与扩大呢？我们做国民

的人，仍然心服先生的指示，希望国共两大党切实合作，在这一阶段中，要做到共同救国，在抗战胜利后，仍盼共同建国。

我们在先生的遗教中，完全看出这种希望的可能。先就共同救国来说吧！

是的，这已经是当前的事实。但是在一年以前，这一种可能，是很少人相信的，许多人恐怕连梦也没有梦到会有今日的吧。我已经在前面说过这不是偶然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国共两党不离开中国革命的实践，历史终究决定了国共两党携手共进的。这八个月的抗战，已经暴露了我们各部分的弱点，在抗战中，也在许多政策上缓慢的改革了不少，国共两党，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出一天天更接近了。抗战越是延续下去，我们自家的弱点也越看得清白，改革的要求自然也越迫切，改革方式与速度，也会愈发明快、迅速。

好在现在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是争取先生的三民主义及革命的政策彻底的实现。

我们在抗战中已深刻的认识，目前是民族战争，民族的利害自然高于一切，所以要把国内阶层的利害放到次位上去，大家合力先抢救中国。但这一个全面全民族的抗战的遂行，并不能丝毫忽视民主自由、民生改善两个问题，因为要动员广大群众，不能不改善群众最低限度之生活，不能不给群众充分的爱国自由。这种要求，已经在抗战中表现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在太原失守以后的山西，民众动员比以前容易，为什么今日第五战区民众比起京沪战区过去的民众积极，就是因为今日的山西和第五战区实现了三民主义之一部分。由于历史教训，实践要求，我们相信今日坚持抗战的人，不问国民党、共产党或无任何党籍的人总没

有不希望战局改善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实现三民主义斗争，本是国民党人的天责，在共产党方面，既认明当前阶段救国唯一途径也是实现三民主义，那在理论上原说不上再有什么磨擦，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今日只有联合向日寇和国内残余的封建势力与汉奸斗争，没有自己内部再消耗自己的力量的理由。

过去的经验已经昭示我们，只有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全民族的力量才能集中起来，要有了这一种巨力，我们才能转败为胜，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同时国共两党的结合才能进一步的巩固。现在的时机是万分迫切啊！国共两党明达之士，一切其他的党派与爱国民众，我们在中山先生的十三周年的祭日，大家合力来争取先生伟大的遗教的实现吧！

四　民族统一战线下共同建国问题

是的，现在一般人对于民族统一战线还有一种怀疑，以为大家在患难中共同救国，也许可以没有问题，等到驱逐日寇出中国后，那时大家又怎样呢？所谓统一战线下的建国问题，就被人怀疑了。在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是否也可以找出统一建国的理论的根据呢？

这一个问题原是比较远的问题，在今日空口来推测将来，似乎不是必需。但在巩固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念，这种怀疑是必需克服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否仅仅是这一个阶段中的东西？仅仅只有这一短促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过程中，是否还不免于一次流血斗争呢？

无疑的，这要用理论来说明，单单由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集团宣布自己的忠诚，那是不够的。

依据我个人对中山先生全部遗教的认识，再远观世界经济政治情形的发展，与乎中日战争结束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可能想到的情况，民众的要求，进而推断中国来日的建国问题，我们可以确认，新中国的建国问题可以在统一战线下完成，有它的理论的根据。

第一，我们不要把三民主义作为静止的、不发展的东西来看，我们要从三民主义的发生发展中，认明了三民主义的特性。中山先生自己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依据中国革命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所以三民主义及其建国方略，是适合这一革命阶段的东西，但是中山先生是否就没有更高的理想了呢？不！中山先生的最后的理想是世界大同，他主张"天下为公"，所以他对共产主义绝对不象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敌视它，恰恰相反，他反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理想，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先生容共、工农、联苏的主张，就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中。这在先生的遗教中，有明白根据。如果中国社会经济能达到社会主义阶段，中山先生又在世时，我相信他不独不会出来反对，反过来，会由他自己的天才的手进而领导社会的改革。本来三民主义进一步的发展，民生主义的延长，就是社会主义的阶段，这是不难了解的。所以那些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将三民主义限于救国阶段的人，那是根本不了解先生伟大的遗教，而反将先生的遗教限于一个狭小的历史阶段。所以如果中国在抗战达到胜利的终结时，就是社会经济的要求，有转向非资本主义的新国家之建立，三民主义的信徒，自然没有反对的理论根据与必要，那时久共患难的各政党，共同起来建造新的国家，这决不是幻想。

第二，我们要了解中国抗战胜利的终结决不是短时期可以期望到来的，所以我们说长期抗战。长期抗战的终结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想象，是打败了敌人，同时自己一定也是疲惫不堪，国内经济的破坏，物质的毁灭，一定比起俄国革命时期还要艰苦。那时虽然世界的环境，也许比俄国革命时代要好，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更达到另一高级的阶段，也许世界其他国家，如日本已发生了无产者革命，我们在这环境中，也许可以得到俄国革命时期更大的外援。但是，我们的建设，那总是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我们重整国民经济，应该再走什么道路？似乎不会成什么问题，那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必然撤退，我国民族资产的力量亦必变得甚微，私人资本势力决没有能力来复兴中国，事实上，一切主要的经济骨干，是要用国家的力量去完成的。这时个人资本的力量在国民经济的力量的对比既微，我们相信那时各政党对于经济建设的问题，不会生出如何的差异，因为这时真的大家都变为小贫、赤贫了。既没有大的资本势力，封建残余的势力又早在抗战中灭亡，买办资本势力亦因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撤退而不存在，而国际经济情势又正转入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国在这时，各政党间是不会怎样坚持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将阶级的利益提高到民族利益之上的，并且统一战线的中心是国共两党，国共两党在自己的主义上既有其共同之点，在此建国的关头，不仅没有分裂的可能与必要，在政治上，很有可能达到在与残余的帝国主义或封建资本势力的斗争上，取得更亲密的合作，这也不完全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民众，我们可能想象到他们的政治水准一定提到相当高度了。这时，如果一个阶级要为了少数人

的私益，而引起国内战争，屠杀民族战线中多年共同艰苦抗战的盟友，必定要遭受民众的反对、唾弃，群众的力量一定能够制裁这时的好乱者。这时人民因疲于久战，一定普泛的表现厌战的心理，因此内战亦不允许发生起来。

基此，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在民族统一战线下不能共同建国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认定民族统一战线只是一个短促时期的东西了。

总之：我们对于抗战前途是乐观的，这在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已指出了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一切可能。但是怎样将这些可能变为现实呢？那我们首先要接受中山先生的"实践第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中山先生的遗教普泛的、系统的在抗战中实现！

（原载《全民周刊》一九三八年第一卷第十四期）

长期抗战中关于学术研究诸问题

——在一个读书会演讲

这里要谈的几点，都是诸位同学事先提出的，所以这一个演讲不能说是很有系统的，但却是很实际的，因为这里要谈的话，也都是大家想知道的，现在就照诸位提出的问题逐项来和诸位讨论吧。

一　在抗战中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

抗战期中，我们应不应埋头研究？应不应还留在研究室、实验室、书斋、学校？现在有人号召知识分子到前线、敌人后方去服务，如果是对的话，我们这些留在后方埋头研究的人，是不是一种耻辱？关于学术的研究是否应该摆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去做？这许多问题，诸君正在苦闷着。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回答呢？

这要看我们对所谓学术作怎样的了解？抱的是什么样的研究态度？对抗战本身的了解又是怎样？

如果我们已认识清楚了今次的抗战是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并且是持久战争，我们不是一个"唯军事论者"，不是一个"速胜论者"，那我们一定不会忽视抗战中文化的一面，不会看不起所谓学术，不会将"学术"与抗战截然分开，作为孤立的东西来看，

也不会生出抗战期中无文化，不需要学术研究，一切"文事"暂时都丢掉茅厕里去，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再谈。自然，这一切的疑问，不能与抗战分开，抽象的提出来求解答。"抗战期中，我们应不应埋头研究？"这答案可以有两个。

如果是为了加强抗战的力量，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独应该埋头苦干，并且应该比平时更加劲些，如果你是在那里作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式的幻梦，完全与抗战和中国文化无关，甚至只是空空消耗人力物力，这种埋头研究，我们不独不赞成，并且是应该反对的。我们对于留在研究室、实验室、书斋、学校的看法，也完全一样，首先我们要看这研究室、实验室研究的是些什么，我们在书斋里干些什么，在学校里读些什么，我们自己抱着怎样的目的与怎样的研究态度。

现在有人号召知识分子到前方和敌人的后方去服务与我们的所谓埋头研究并不矛盾。我们赞成埋头研究是为了抗战，为了中国文化，我们住研究室、实验室、书斋、学校的目的也如此。因为我们今日是全面抗战，所以我们主张文化人不要离开岗位，要站在自己的岗位参加抗战，使文化人在抗战中发生更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反对文化人那种感情的投笔从戎的论调，但我们同时也赞成并鼓励文化人到前方或敌人后方去工作。这并不矛盾，因我们并不把研究与实践看成是对立的分离，并不把研究室、实验室、书斋、学校的门，看成是与抗战隔了一道铁桥。一个化学家在实验室研究毒气，在学校教育学生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前方急迫的需要这种专家去，他即应该放弃他的工作到前方去，一个最有名的考古家、文学家，一个最高学府的学生，在敌兵临城下，到了非大家参加巷战不可的时候，他们应该放下自己的

研究，持枪加入战斗，或参加搬运石子、布置阵地的那种平凡的工作。反之，在战争并不急迫的需要这些专家、学生都来参加到直接斗争的时候，他们应该仍去研究室、实验室、学校。我们不能同意有些人的见解，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特殊阶层，应该留在后方，打仗应该是另一部分人的事，或自己把身分看得很高，觉得在战争中牺牲了，甚为可惜，借此逃避国民的责任。我们对于研究室、实验室、学校、书斋，都不应将它神秘化，要把它看做同样是一个抗战的单位。在国家需要我们去研究室时，我们去研究室，需要我们上前线时，到前线去，学校的铁门，学者的身分等，均不能限制我们，不能把我们束在高楼上或故纸堆中。这样一来，我想，留在后方学习的人，一定不会感到是"一种耻辱"，这种感觉的发生是因为自己的研究已离开实践太远时，才能发生的。

最后，我得顺便说明，在今日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有这种条件的人是不多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研究室、实验室，过于夸大，尤不可即看作一切知识者都要回到实验室和书斋中去，尤不应有什么号召，今日我们要号召的还是要知识分子多多到前方去工作。在后方一切研究室、实验室、学校、书斋里的人，不应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要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态度，紧张严肃的情绪。

二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哪样对于抗战最重要？

到底在抗战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哪一样最重要？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几年就已经屡次的有人提过了。我们一向就听见有人提倡"科学救国"，这我们并不反对，我们不反对，是因为

救国的确需要科学，但我们反对只要科学，不要"抗战"那种唯科学救国论。救国需要科学，在今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重要，我们要认识整个抗战的全过程，认识敌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及其变动，认识今日国际一切复杂的事象，认识我们的前途以及争取胜利的每一阶段，每一步骤，我们都要社会科学知识。同时，我们要创造现代化的新的部队，建立国防经济、军事工业，我们的军事中需许多新的各种类的干部，我们也需要自然科学。今日一个懂得社会科学的人，也应该有一点自然科学的常识，一个工程师、化学家、机械师同时也应有最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并且非懂得不可。今日有人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以为自然科学才是最实际帮助战争的，社会科学是"空洞"，"学了一点，就只会捣乱，"那是不正确的。我以为这一个问题不必强调某一方面。就事实说，今日中国在战争中，有了新的需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自然会有相当的发达，同时，也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将更往前发展。不过就发展的条件说，自然科学需要更良好的物质条件，在研究上要受到许多的限制，社会科学只要有书本子，同时配合着实践，那是更易于发展的。并且在今日，组织战争，比属于战争中的技术更重要，技术人才我们可以利用客乡，自己一时不够，可以补救，领导和组织战争，却不能不是自己，不能不有正确的知识。

在座诸位中听说有的已经是技术家，有的是学自然科学的人，我以为，大家对于这问题的态度，不是要问明白了孰重孰轻以后，再决定自己研究的方面，而是依据自己的条件、兴趣，决定自己的研究。已经是学自然科学的人，不必因社会科学重要而改行，同时自己是学经济的、哲学的，也没有理由一定去改进电

汽机械科。我们奉劝大家是，学自然科学的人，一定要读社会科学书，学社会科学的人，也一定要懂得初浅的自然科学常识，彼此都不应互相排斥。如果单就认识说，我们今日实在不应忽视深化、普化社会科学的运动。

三　研究的材料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一般的话用不着在这里多说，大家既然都有了相当的素养，这一问题是自己能够处理的。诸位中有人提出今日要提高自己的研究有二难：一是缺乏高深的书籍，譬如许多世界名著中国还无全译本，外国书也不易买到。二是中国的材料也缺少，因为我们社会素来缺乏统计、调查等，就无从着手。自然，这是有理的，但这决不是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就根本不能工作。抗战一年余，摆在我们眼前的都是很好的材料，抗战提供了供我们研究的极丰富材料，可惜，我们还未好好的去利用它。

现在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吧，抗战一年多，把中国社会各部分都暴露得更明白了。这就给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等方面许多的方便，如果你对于社会科学有了相当的素养，你就可以任便选一个部门，供你专门研究。你可以从自己的实地考察，各战地记者的通讯，各报纸、刊物的记载关于全国各地地方政治机构的情况，作一系统的研究，或单独作保甲制度、兵役动员、地方自治等问题的研究，你可以从各宣传队、部队、难民等等的报告、记载、口述中，研究各地的风俗、习惯，你可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研究中国怎样进一步的巩固今后的团结，从战争的发展中，无论军事方面关于战略、战术的认

识的发展，或政治方面民主力量的发展，以及一般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变动和发展，每一方面都可作为独立的研究，都可分别作许多独立问题的研究。再一年余的舆论中，还包含着许多不正确的言论，社会上还有一些不利于抗战的歪曲理论在流传，这些东西，还未能好好的批判的说服与扫除，这正需要有人去努力研究、批判的。可以说，今日我们并不缺乏材料，只要我们勤于收集，细心研究，正确的处理，那是不愁没有事做的。并且这都是当前亟需要做的工作，都是与抗战有决定影响的。

在今日我们大家的物质条件自然都感到不够，但我们要想方法去克服它。最后，我还要重复的说一句，我们是在学习中，但我们会在学习中自己成长起来！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五号）

关于政治研究

“政治”这一课对于中国人民，就是在今日也还是一种新的功课。

大多数的人，在过去是一向不问政治的，老百姓只管还粮、纳税，其他一切是素不闻问的，虽然政治仍要过问他。老百姓的脑中，虽然无政治这一个名词明确的概念，但对于“公堂”、打屁股、公差（现在换了区署，什么所，法警，区丁之类）这些东西是非常熟习的。中国老百姓没有政治生活，所以只有政治恐怖。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是无抵抗主义，是消极的逃避。所以在老百姓这一个名词中，就带有着“好人”的意思。

过去的士大夫间，有一种不得志的士，也多少采了老百姓的“政治哲学”。他们不满意实际的政治，看实际政治不起，自己暂不做官（也许是无官可做），却喜欢骂骂做官的人，或寄情于诗酒、考据、古玩、山水、声色之间，以名士终其身。

这是封建时代中国老百姓和知识者对政治的态度，他们都有一种理想，是希望尧舜复生或有一个好的真命天子出现。这是封建时代专制政治压迫下人民无力反抗，奴役久了必然发生的意识形态。

中国到了今日还是一个所谓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所以这种意识的残余也仍旧存在。在老百姓方面也还有人在痛苦中希望

真命天子出现，或痛感"一代不如一代"，对地方的土劣，坏的区乡保甲，只有忍受，很少反抗。在知识者中，自然那是比起士大夫来要进步多了，但也残存着对政治的消极的态度。民国以来，有许多知识者就宣言不做官，大家对于官，总感到那是一种专门打人屁股或刮地皮的特别的人做的事，对于实际政治，总不怀着好感。

有些在外国或国内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出来的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官，那他也一定对实际政治表示无甚兴趣，他可以教学生政治原理，却避免与实际政治发生关系。自己做了官呢，对于朋友也常表示自己态度消极，不愿多谈实际政治。最有趣的是一个在实际政治中的人物，他除老实做官以外，就不大发表政见，不大肯说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实际政治总是越弄越坏。

自然，中国社会这十几年来有了非常的跃进，社会的斗争已经改变了人们(尤其是知识者、青年)对政治的观念不少，今日的青年，大多读过一两册政治原理、政治常识，对于中国革命抱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参加到实际的斗争中来了。但是过去对于政治观念的残余，也仍在影响着他们。那就是：自己有一套政治的理想，自己也对实现这种理想有最大的热心，但对眼前的实际政治表示无甚兴趣，因为实际政治与自己的理想相隔太远，觉得灰心。所以青年间，常常有一种毛病，自己虽爱谈政治，也有一种政治生活，但是每每不很实际，因为他们束缚在小的生活圈子内，形成了狭隘的观念，在这狭隘的观念里，那种士大夫残存的旧观念"孤高自赏"，就仍旧能发生作用。

自从抗战展开后，自然全国人对于政治的观念又有改变了，青年们直接参加到实际政治生活的人已是空前的加多。在许多

民众团体、训练班中，都在注意政治的一课，或在自己的训练班内有政治一门，但仍有不少同学，只喜欢读书，而对当前的许多实际的政治问题并不十分关心。

有一位友人告诉我，有不少的青年自己组织的教育团体，对于理论的学习的兴味非常浓厚，也爱听人家的实际政治报告，但一到讨论实际政治的问题时，大家发言的就少起来，或者发言人的主张就每每过于高调，不切实际。他的结论是现在有不少的青年，是专心读书和到处打听消息，他们的理想与实践还未好好配合起来，这大概是很正确的。这种事实反映在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民众团体方面的关心不够，以及当前许多问题，青年没有引起最大的兴趣，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证明我那位朋友的结论是正确的。这还是因为对于实际政治采消极态度的缘故。

这当然不能责备今日的青年人，这种现象并不是无根据的，这是因为我们对于所谓民主政治的生活太生疏了。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更多一点认识，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史，有一点研究，或者象今日有许多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友人一样，多跑一些地方，多多接近你连想象也未想象得到的现实，你会了解为什么今日的实际政治怎样会与我们的理想相隔如此之远。

一年余的抗战，的确提高了我们对政治的关心，今后随着战争持久，一般人对于政治的关心也将扩大，那是无疑问的。不过，这仅只就客观的条件说，我们怎样加深自己的学习呢！那是我们在主观上要努力的。

我们要求今日每一个中国青年要学习政治科学，至少要读一些必要读的政治科学书，要明白世界政治的大势，中国政治的大势，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全部过程有一个正确的轮廓的认识，

对中国抗战有坚定的信念。但这还不够，我们自己一定要是这伟大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参加者，一个能忍受一切艰难险阻的实际的战士。我们不能还带有一丝毫过去的、一切新旧名士的气氛，只有牢骚，回避实践，或只有理想，而不能把握住当前最实际的一环。

所谓实际的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绝不是少数人单凭他们的主观要造成这种模样，而是有它的存在的基础。张伯伦今日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与侵略者妥协，造成英国政治上最不光荣的一页，是有英国社会的根据，英国各阶级间力的对比上，保守党的死硬派所代表的阶级力量还占着支配的势力。在法国也是一样，人民战线虽然真正的代表人民的公意，但在法国阶级势力力的对比中，在今日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仍不免达拉第胜利，完全走上与法国利害相反的道路。但这决不是说，英法当前的实际政治就断送了英法，就永远黑暗下去，他们国内的阶级力量是在急激的变动的，张伯伦、达拉第不过是作为某一时期英法阶级对比中某一阶级的代表而演出罢了。总之，任何一国的实际政治，都是有它自己的根据。一个政治学的学生，不仅要具有政治科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最最重要的是能把握住每一历史时代、每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特点。

研究实际政治是一件非常有兴趣的事，也是最易引起我们的感情使我們感到头痛的事。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的实际政治，除开具有丰富的政治知识的条件外，还要有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忍耐力，最冷静的头脑，最细致、明敏的分析能力。

今日中国的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是复杂。我们从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来了解中国政治上许多基本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形态和它的不平衡的发展率，它表现的许多特点，它与帝国主义经济的关系的诸方面去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力量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的力量的比重及其推移变化。我们要从中国民族解放史中，去认识这些力量的演变。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今日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今日的复杂性为世界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没有。这样复杂的中国社会经济，自然在政治上会形成无限的复杂性。这没有什么奇怪，中国政治上的一切现象，我们都可能找到它存在的根据。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去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史的演变，每一较大事变的历史意义，去研究中国下层政治的结构，各地方的特殊性，残余封建势力所表现的各种具体的形态。总括一句，我们要从全面来了解今日中国政治的结构和特点。

第二，是非常的变动。自从全面抗战开展以来，中国政治上所表现的虽然将反帝（当前是日寇）提到第一位，但在抗战中，同时将反封建统一在反帝中，一年四个月以来，中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还赶不上抗战的要求，但这一年余封建势力的摧毁、暴露，是赶过了任何时代。为了适应全民族解放战争的要求，我们第一次的形成了全国统一与团结，我们认识了中国今日只有彻底实现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才足以动员全国民众进行持久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为了战争的进行，帮助战争顺利的发展，我们在政治上已提出要求加强和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建立民意机关，肃清贪污，培养新的政治干部，保障抗战中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并且一年以来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至

少是在部分的实现了。抗战不仅指示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并且空前的紧迫的在推动政治的改造。

第三，是全民的性质。政治本来是一阶层压迫他阶层的工具，但在今日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利害已降到了次位，民族利害提到了第一位。民族统一是今日政治上最高的原则。这不仅是抗战中中国各社会层一时的一种结合而是在抗战建国中长期的结合，因此政治上具备高度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条件。

第四，是全民族人民对政治空前的关心与参加实际的政治。这是抗战的赐与，一年余已将千千万万平日不管世事的人都关心政治了，并且自己都参加实际政治工作，抗战不仅提高了人民的自觉，并且给了人民参加政治的一个机会，这是改善当前政治机构，使政治走上高度民主的一种动力。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八年第三十一号）

评林语堂《日本必败论》

"中国必胜论"这类题目，现在似乎已被人做得有些近于烂调了。林语堂先生从中国必胜的另一方面来写出《日本必败论》(见《宇宙风》第七十三期专载)，的确是取题新颖，不落"俗套"。

一口气将林先生的文章读完，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欣快的。林先生在这一年多以来，的确是进步不少。我想到，抗战真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它的影响之大，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得要影响到你头上来的。林先生能选择这样的题材，写出这般动人的文章，来助长国人抗战的情绪，这的确不是偶然的，同时也真的应该为林先生新的作风称贺。

我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想到一定有许多人也和我一样，看了这一名篇的题目，一定要买《宇宙风》来读，接着就想到，林先生这篇文章，一定很合许多人的口味，一定有相当的影响的。我想到这里，也就对于这篇文章不禁有些苛责处，对于林先生也就采着十分友谊的严肃态度，觉得我不能不指出这篇文章中还包含了一些不甚正确的部分，这些部分，在客观上也许会引起林先生意想不到的反作用来。

林先生指出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的弱点，我可以说，都是对的，我们非常敬佩林先生肯细心搜集国际、国内的许多材料，尤其是那些很少趣味的数字，并且这些部分，确有

不少是很可珍贵的。林先生这篇文章主要的缺点，是在林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态度，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仍是用所谓“智者”、“预言”家的态度写的，当我读了第一节总论时，我就不禁想到世界各国的许多大战预言家，如威尔斯之流的人们来。虽然林先生比他们要高明，他用了许多真凭实据的数字，并且这是论自己祖国生存有关的问题，不仅是象预言家们一样，只说些警世骇俗，或轻快、聪明的话，对于这张支票的兑现与否，与他自己无关。但是，虽然如此，林先生这篇文章仍不是站在严格的科学立场写的，那不能不说是事实。我们是否应该拿科学来吓林先生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为了指出这篇文章某一些部分不免要发生不好的影响，那就不能不就科学的立场，向林先生指出，并向林先生和读者们求教的。

根据科学来分析中日战争，我们虽然能得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但科学能指出的只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根据和一切可能性，并不能象江湖的预言家一样预言日本必于何年何月“经济崩溃”、“内阁改组”、“求和”，并且预先拟出“和议条件”来。而林先生刚刚相反，关于“总论”中首先作出那样肯定的冒头语，“民二十七年冬，日本经济必然崩溃，……内阁改组，变式求和”。……怎样怎样，使全篇本来有精彩的文字，弄得江湖气味非常浓厚，不能不认为是非常可惜。这种不科学的预言，首先对于人们的印象是怎样呢？不是觉得林先生带有“半仙”的“仙”味，就会减少读者对于林先生以下文字的信任。这还是小事。

这种预言日本过早的“必败”，对于持久抗战论是一种否定，那是非常对于我们的认识有妨害的。中日两国当前的战争，决不是林先生看得那样简单的。我们固然不应扫自己的志气，长

敌人的威风，但也不应过于轻敌。日本的经济崩溃、政治危机，虽然随着战争的持久，一天一天会表现尖锐、溃烂的趋势，但我们无理由断定"民二十七冬"最后"约二十八年春夏间"，即在不久的半年中，日本一定会"必败"。今日我们正当着日本疯狂的进攻的紧急关头，也正是我们更进一步进入更艰难困苦的关头，我们需要的是更坚定的意志，卓绝的忍耐力，最高的积极性，无限英勇的奋斗，以求一步一步打开难局，不是在求一种什么神迹来打救自己。如果今日的国人，果然相信林先生的话，林先生的话真的能给人以包票，那会使大家陷于宿命论，坐待日本自己死亡，如果林先生的预言不应，那岂不糟糕之至！虽然，我们能够相信，就是连林先生自己也不会相信这预言一定的会应验，不过是文人行文上一种固意的夸大，这在一篇小说中，或"智者"不负责任的狂言里，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此"日本必败论"，在今日祖国这样危急的时候，却是不允许的。

其次，林先生的预言里，说到日本破产以后，一定要求"第三者出而调停"，由"第三者"用"经济、外交的压力"，最后使日本屈服，这种预言也是带有危险性的。这不仅是"外力决定中国论"者的机械观，同时也会助长那些幻想某某国家出面进行"调解"的中途妥协论者的气焰。中日战争的过程中，虽然我们要争取许多外援，压迫日本，但最后的决定仍是我们自己能战胜日本，不能是还未达到胜负之分，由第三国中途调停妥协的。中日战争的结局，也不能拿日俄战争相比拟。

我们也不能同意，林先生所说的，"此次战争唯一确定结果是两败俱伤"。我们承认我们即令是胜利的结束，中国在物质上也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但这"伤"只是为了换取民族解放的代价，

原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即令不幸一时失败（我们相信我们不会有这前途），那也不过将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拉长，并不是中日战争的永久结局。这“伤”，也仍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日本方面，中国胜，日本固然真的会“伤”；日本胜，虽然日本已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决不能说“日本亦败”。日本战胜了中国，它不会倒下去，反而是奠下了征服世界的基础。不然，横竖胜负，都与日本不利，那我们又何必争一时的长短呢！

至于关于“和议条件”，我们不想再多说了，因为在今日实在还言之过早。林先生所拟出之原则，很巧妙的与广田三原则“针锋相对”，在我，也只觉得怪有趣的。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也许林先生和林先生的友人一定要笑骂我道“你真是一个蠢子，不懂得一点文人的幽默，要来抬这一回多事的杠”。我并不反对幽默，不过在这样严肃的题目下，是不能离开科学而“幽默”的。

虽然如此，林先生这篇文章仍值得大家读一读，因为这篇文章中，除开林先生的态度和用的分析方法以及一两处地方还有商量的余地外，其他各部分实在有不少精粹的见解，我们不应将它抹煞。

最后，我更希望林先生将这一个题目扩大写成一本较大的著作，用严肃的科学态度，博采实际的材料，证明日本的必败，这是国人非常欢迎的。我们且等着吧。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八年第三十二号）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为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而作

一

苏联是中国的好朋友，这一句话在今日几乎全中国人都能相信。中国许多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知道世间有一个俄国（老百姓不会说苏联），俄国人不侵略别人。中国有许多老百姓特别认识俄国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两湖的农民在千万人以上认识俄国人，民间传统的是俄国人比他们平日看见的外国传教师有一点不同，俄国人没有臭架子，亲密，看得起中国人。今日在更大区域的老百姓亲眼看见俄国飞机师，民间更广泛的流传，俄国现在的确在帮助我们，他们可以用故事说出来。我们常常从老百姓口中听见："我们有了俄国帮忙，是一定能打赢鬼子的"，他们说这话时，眼睛里还放出了一种乐观的光芒。

虽然如此，但中国老百姓并不真的都能了解中苏两国的关系，中国的论坛上，对于中苏两国的关系也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见解。譬如有人将中苏关系看做与中英、中德的关系一样，只是一时的利害的结合，除开眼前的利害外，并无什么其他的分别。有人只凭自己的主观，不管今日的国际环境，一味的希望苏联出兵，或单独执行国联的制裁案，希望人家这样那样。有人将中国今日

的民族战争，看做是替人家（指苏联）受难，吃苦头，因此责苏联备至，有人硬说苏联今日帮助我们“不积极”的原因是因为苏联不满中国的内政，有人则谓今日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她应该走中国路线，跟中国跑，现在出兵正是时候了。自然，还有许多看法、许多意见。对于这些意见，中国人民虽然大半并未加以附和，只是少数人这样看法、这样说法，不过，对于苏联到今日还不出兵，却不无疑虑。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句谚语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向”，为什么苏联还不拔出那把侠义的刀来呢？

为要答复苏联为什么到今日还不出兵助战，为要剖析、纠正以上对中苏关系认识上许多错误，为要正确了解中苏关系及其前途，我们不能不有更深刻的研究。我们研究中苏关系不能离开中国革命的立场，不能不从两国革命的关联中去求解答。

这是认识中苏关系的基点。

二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苏联十月革命是有着密切关联的，这两个革命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代，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史上的一个根本转变。十月革命是带着世界性质的革命的，它不仅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心，宗主国里动摇了帝国主义，它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及其周围地带，展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一个新时代，树立了一个世界革命运动强大和公开的中心，组织了全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统一的革命战线。世界无产者与弱小民族共同携手反对帝国主义以谋各自的解放基础建立以后，经济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因此得到了自己解放的灯塔，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和比重，提高

了自己的勇气和决心。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也走到了另一新的阶段。

这两支革命的巨流的汇合，是世界革命的总的力量。在革命行程中，任何一方面的得失，都是关系这总的力量的消长，因此，在今日，全世界的无产者莫不关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同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民众，也无不时刻关心各先进国的无产者的革命运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先进国的无产者、全世界的国际主义者，以及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给以同情与援助，那不仅是不足为怪的事，并且也正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自己的责任。

一个国际主义者或国家（如苏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援助那是无条件的，除开这一民族运动是变成法西斯的工具或加强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只要这一民族革命运动是在削弱、破坏和消磨帝国主义，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一个国际主义者对于这一革命运动的援助，是不问这一个运动中有不有无产者参加，有不有共和国的政纲，换一句话说，他对于这一国家的内政不独不会加以干涉，也无干涉的必要与理由。

我们要认明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总的形势，以及帝国主义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我们才能了解中苏两国间颇不平常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在中英、中德间所能找得到的。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基于一种革命的联系，只要中苏两国各不放弃革命的立场，这一基础就不会受到动摇。至于在实际国际政治中，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相互间的友爱的表现取着什么形式，那是另一问题。譬如就当前说，苏联应否出兵援助中国的

问题，不是原则的问题，不是基于苏联一己的利害的问题，而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出兵是否于世界和平，太平洋集体安全，中国抗战有利或有害的问题。所以，我们更不应因某一时期我们两国所表现友爱方式的问题，而看不见我们友爱的基点，或生出什么误解来。中苏两国的关系，离开了这一基点，是不会了解它的实质与发展前途的。

三

中苏两国间这一革命的联结在中国革命实际运动中有什么表现呢？这只要回顾一下中国最近阶段的革命史，就能看到中国革命所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中苏两国的友谊的进步。十月革命是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提到了更醒觉的阶段，这有事实为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宣言，取消帝俄时代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张援助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从这一宣言始，中苏两国就作了最初战友的握手，中国人民对于"俄国"的观念从此一新了。

中国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对于十月革命是抱着无限同情与欣喜的。他那敏锐眼光，已认识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属于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他对苏联怀着的好感，是比当时任何人都深入的。一九二一年苏联召集了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当时国民党亦派人参加，这次大会上讨论了远东各弱小民族与殖民地革命诸问题，并确定了方针。自然这次大会与中国以后的革命有很大的影响。中山先生在致蒋先生的信中，曾经指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师，断无成就"，认中国革命必须是"俄派之革命"。伟大的三民主义无

疑的也因世界革命之浪潮而充实了它的内容，三大政策之确立，一九二三——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更将中国革命划了一个新纪元，中苏的关系也跟着进了一大步。中山先生是在大革命的浪头前就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在临死时尚不忘中苏两国这一个革命的联结，在他致苏联中央执委会的遗书中，写出：

>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这是中山先生指给我们的中苏关系。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国民党领导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革命中，正确的执行了中山先生的指示，同时在这一革命中，苏联也正未负中山先生的所托，对中国革命给了很大的人力物力的帮助，这一段历史，还是很新鲜的，不必更多说了。

自从中国展开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后，中苏的关系马上又表示了这一革命联结的进步。中苏互不侵犯公约的订立，苏联对中国公理、正义的声援，较其他各国更大的人力物力的帮助，这都是当前的事实，并且中苏的关系，还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苏两国的关系，在这伟大的人类解放的历史工作中，一定不会负中山先生的遗教，将一天天达到更进步的合作的阶段，那是无问题的。

至于十月革命给与中国工人、农民、知识者的影响，中国整

个文化，思想诸方面的影响，那更是来得巨大。十月革命提高了中国劳动者醒觉的程度或速度，提示了中国农民解放的道路，并引导中国农民大众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大道。中国的知识者，在十月革命的兴奋与影响下，他首先作出了“五四”光荣的杰作，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锻炼成为较任何国家的中下层中等阶级更富斗争的精神。

中国整个文化与思想方面，我们也能找出直接间接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如中国的唯物论的思潮，文艺创作方面，都能找出具体的证据来，可惜在这里已无篇幅说它。总之我们在抗战建国中，要接受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建国的教训的地方还正多，我们相信中苏两国这一革命的联结是将长存的，我们且用着英勇的抗战来加强我们的这一联结吧。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八年第三十四号）

不可忽视的汪派叛逆的卖国理论

汪派叛逆的叛国是中国抗战中的一件最大的阴谋案。汪派叛逆的本质虽然和北洋军阀、官僚等等余孽之投降敌寇，没有什么不同，同是属于中国社会中最腐化最堕落的阶层的代表，同是只顾个人利禄而不顾国家民族存亡的人，但这一大叛国案却和王克敏之流的附逆仍有它的差别。

王逆等的附逆，一般的说，他们只是个别的卖身投靠，认贼作父，虽然他们也败坏了中国民族的气节与道德，但他们对民族的危害是较小的。汪派叛逆是一个小派别，这一阴谋是有组织的，有较长的历史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比那些叛逆更要高一些，最大不同处，就是汪派叛逆是另有它的一套卖国的理论的。

有人说，幸喜这位东方佛兰哥，他手中没有军队，所以他不能做出比王克敏之流不同的戏来。这固然说得不错，但这一位半殖民地的佛兰哥的手里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宝。汪派叛逆出卖自己的资本是什么呢？

他没有军队，在政治上也无决定的力量，单只他个人一点点历史和地位，敌人未必重视他。但他们却找到了一种使敌人对他不能不重视的武器，就是他们有一套卖国的理论，用这理论去瓦解中国抗战的意志和中国抗战的阵营，来培植自己在中国政

治上的势力，配合敌人军事的进攻，以达到自己的阴谋。

汪派叛逆大半都是政客兼文人，汪逆个人一向是以雄辩家兼政治家文人自居的，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过去都曾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过。其他如林柏生、李圣五等也能拿起笔瞎凑几句，或开口乱说几句的人。这群丑类，偏偏又在政治上有相当高的地位作为他们的掩护，并且抓住了几个重要的宣传机关，自然他们更容易进行宣传上的阴谋。

因为他们这一群丑类的出身是相同的，兴趣、臭味也无不相投，汪逆数十年的政治史，不能不说是完全失败的，这反映到他们的意识上，也不能不是悲观的。这一派人，本来就成了中国最落后、腐化阶层的代表了。在"九一八"以后，中国历史显然要转入另一新的阶段，但他们却早已没有民族的朝气，不敢用正眼来看现实了。

从"九一八"到"七七"，成为中国历史斗争的中心的有两种倾向，即民族抗战与妥协投降。这两种倾向，无疑的前者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扩大。汪派叛逆自然是代表后一倾向，在开始是比较单纯的民族悲观论者、不抵抗主义者、三日亡国论者，反对前一倾向，阻止和扑灭前一倾向的发展。在政治上，汪逆及其党徒是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和断送华北许多利益的主持者或参加者，是压迫一切爱国运动的刽子手。由于抗战倾向的扩大，敌人进攻加紧，这一小派更意识着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了，他们一天天意识的变为中国社会中这一最腐化与没落阶层的组织者，民族失败主义理论的组织者，同时在政治上正式勾结日寇（汪逆在作外长的时候，唐有壬与高宗武即为汪逆勾结日寇的助手，汪与喜多、须磨等人，在此时已有更密切的关系，现在支持汪逆之影佐

大佐，即当时与高、唐等有密切关系的人），勾结德意，在理论上也偷窃法西斯理论与方法，渐渐完成他们卖国理论的系统，进行意识的叛国叛党。

这一时期，汪派叛逆阴谋的特点，是反对抗战，阻止抗战的爆发，反对西安事变和平的解决，并欲利用西安事变，以达到个人政治的阴谋，反对国内的统一，用反共的阴谋阻止国内团结，利用民族落后阶层的意识，成为民族失败主义理论的组织者，这一大阴谋案的组织者。

"七七"到汪派叛逆出走这一时期，汪派在表面上是采取两面派。这一时期是汪派最尽忠于日寇，在抗战阵营中进行了最大阴谋的时期，也是帮助敌人最大的时期，是今日公开叛国发展成长的时期。

汪派叛逆以汪逆为首，在这时期中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失败主义的宣传，利用了军事上的挫折，国际间沉闷的局势，战局变化中发生的困难，人民流离痛苦的事实，少数没落阶层的人们的悲观绝望的心理，他们用夸大军事上的失利，夸大困难，歪曲事实，利用社会各阶层间尚残存的成见、偏狭性，煽动各方面人的感情，用各种诡辩方法，进行对抗战前途发出悲叹，诋毁抗战，以动摇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松懈全民族全面动员，以阻止抗战的发展，阴谋抗战的结束或中断。他们利用了自已的地位，利用了许多没落了的文人，利用了几种日报和期刊，对抗战全局，对内政、外交、军事、民运都树立一种亡国论，汪、陶两逆，一时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将全国的视听，造成了大的混乱，我们现在回想三个月以前的舆论界，尚不能忘记那时许多人在高呼"阵线外交破产"，要走"德意路线"，诋毁游击战，诋毁民主，以及无数对抗战

抱悲观的论调，无数挑拨离间的谰言，社会上，经常流布的时冷时热的"和平"空气。汪派叛逆在这一时期影响国人心理是很大，所散布的毒素是相当广大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太慢，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太多，那我们不能不想到汪派叛逆之阻碍与破坏的作用。

是的，我们指出了汪派叛逆以上的阴谋，自然还不很够，我们不能将汪派的阴谋单单只是限于思想上、意识上的犯罪。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汪案阴谋的特点，是凭借它的亡国论去瓦解、腐蚀中国人民的意志，拆散中国抗战阵营，以配合敌人进攻，达到自己政治的目的，不惜中国沦亡。亡国论不过是犯罪行为的一面，是构成出卖国家民族的资本。这是汪派叛逆大阴谋案的特点。

汪派叛逆自从艳电发布后，无疑的在政治上他是失败了。艳电是汪逆错误估计中国抗战的力量、国际、敌方的形势和条件下作出的失败的作品，艳电对抗战全局没有发生影响，从艳电到今日，汪派叛逆所走的路，所要走的路那更是穷途末路了。虽然这一叛案并未结束，但它的前途是可以预测的。

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对于汪派叛逆就不再需要国家给以制裁，任他们逍遥法外，对叛逆案可以因制裁个人而认问题即告解决，我们对于这一阴谋案的严重性可以不给以最大注意了。

检举汪派叛逆的理论，肃清汪派理论与肃清汪派余孽有同样的重要，甚或更为重要。汪逆现出原身后，他的政治生命完了，可是他的理论，在国内没落阶层的人中，在受了汪派叛逆过去麻醉的人中，还是依然存在，活着。如果不将这些民族失败主义的余渣肃清，不将汪派叛逆与肃奸运动联成一起，我们不能说

我们对这一叛逆案作了最适当的处置。即令汪逆走上了断头台，这一民族失败主义的鬼魂还是要在抗战中起作用的。

所以在当前，研究与分析汪派叛逆的"理论"，指出他们反动性，已成为检举叛党，肃清一切民族失败主义，彻底实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之一重要部分。

以下，我们要对汪派叛逆的理论研究提出一点意见了。

研究汪派叛逆的理论，不要忽视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汪派叛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方法上都是采取无赖的诡辩论。这一种诡辩论，固然逃不出逻辑的批判，却容易迷惑一切无逻辑训练，无逻辑头脑的人。所以诡辩论也常常博得一些无思想的人的同情，很觉得动听。一直到今日，社会中还有人无意识地替汪逆辩护，说汪的话也许另有道理，对不对虽然有问题，但他决不会当汉奸，也有人为他的"雄才""善辩"可惜，其实，这些人多少都受了汪逆平日诡辩术的欺骗。

所谓诡辩术就是要从没有道理说出道理来，这在今日就成为一切反动言论共通的方法，诡辩术有些什么特点呢？拿最近汪逆的言论作例子，就是：

第一，避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抽象的谈问题。譬如我们反对目前中国向日本投降求和，说今日言和平就是汉奸，这本来是无可辩驳的了。但他却把和平二字从一切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抽出来，专门从"和平"这一名词来夹缠，他说："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子，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爱信义汉奸'了。"（见汪逆《复华侨某君书》）他们又一再说："历史上无不和之战"，"读遍总理遗教，固未尝见只许永远战不

许任何和之训示"，"和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征服（指征服日本）的结果，来得畅快"，这样不着边际正是诡辩论者避开正面的迎战而用"无赖口吻，催眠法术"（吴敬恒语）使对方无可如何，使头脑简单的人，也认他们的话在原则上是无问题的，汪派叛逆就是用了这法宝，借以遮盖他们"主和"主张是汉奸的行为。

第二，变更前提。如汪逆曾说："如果日本定要灭亡中国，我们除了战下去，更无他法。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见《复华侨某君书》）这样一来，可以欺骗一般认识不清的人，更发糊涂起来，以为日本真的不要灭亡中国而是中国的主战派的好战。

第三，无赖抵赖。如汪逆说主和不是他一人，并将国防最高会议记录披露，想用这一文件证明主和者大有人在，借以掩盖自己卖国，用这方法，拖人下水，以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念，这是流氓的手段。

第四，虚构事实。如汪逆在泄露文件中，随时添加伪造部分，这一点，吴敬恒先生已有揭发，又汪逆去年在重庆，常常造出许多统计数字、情报，说中国财政已到山穷水尽，苏联如何破坏国际联盟对意制裁，苏联飞机的质如何比意大利的不好等等，使听的人，以为他既有凭有据，有文件、情报、数字证明，难道还会假吗？他是最高国防会议的副主席啊！

第五，造成一种怀疑的心理或谣言。如汪派叛逆尽量设法造成一种空气，说艳电是与政府有关系，是一种双簧，以毁坏政府的信誉，引起民众的怀疑。

第六，侧面打击与暗示。如陈逆璧君说："我们要达到目的，先要造成把和战问题，公开讨论，至少要使和的问题与战的问题，能同样让大家自由讨论。"胡逆兰成又说，"和战大计均应诉之人民，元首不过执行之而已"，"民主集权为中华民国之基本精神，民主贵乎言论自由"，他们想从侧面攻击政府或元首。又于"举一个例"的末尾，轻描淡写的写出"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以这种有毒的暗示去动摇人心。

第七，装作好汉，装做不懂。如对理屈的地方装做不懂，那例子不胜其举；装好汉的地方亦很多，如《复华侨某君书》中，有"我从二十多岁投身革命以来，就不曾替自己打算过，何况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着国破家亡，我哪里还有这些闲心来替自己打算"，"我亦何能免于危险，但你须知道，这是我所不顾的"，"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后，……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等等。

第八，似是而非与惺惺作态。如汪逆将"转移阵地"，"变更战略"，"已无战略上之价值"，"已予敌以重创，战略上之目的已达，无固守之必要"等字样，痛加诋毁，引人对于军事一时挫折的悲观，这与《一年间》剧本中那个悲观主义的明扬的话，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明扬到死时却有了醒悟，汪逆是固为引诱人民对抗战的失望的。又如陈逆璧君"常常嗟叹，战争中人民如何痛苦"，俨然一位积世老婆婆(吴敬恒先生语)，用惺惺作态，以巧辩言"和"是另有苦衷，为了欺骗人民。

以上不过略为举出几个例子，说明汪派叛逆的诡辩论的特点，从他们全部言论中，大致还可抽出一些原则来。总之，有了以上几项原则，大致已可说明他们的叛国论是一种如何无耻的妖

言，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是如何的在毒害一般纯洁的灵魂啊，这是值得我们详细去分析、检查和消毒的。

汪派叛逆的理论，在过去是成为一切民族失败主义论的中坚，他们的诡辩论也多被许多无知与无聊的文人所袭用，所以对于这一无赖的“逻辑”的批判，在今日也还是需要的。

我们要用最严正的方法，无情的揭发这一逆党的阴谋，扫荡汪派叛逆的理论，这是今日正需要的肃奸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第六十六号）

高尔基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

——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而作

“我，俄国人，正和你一样，为了那种理想的胜利而斗争；不管这些理想在什么地方得到胜利，我和你都为之而幸福。我庆贺你的工作的成功，一切公正的人们都关心这个工作，都对你这位中国的赫尔古利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力量无比的英雄）表示注意、高兴和惊奇。”

这是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之次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尔基写给中山先生那封有历史意义的信中的第一段。从这封信开始，高尔基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即结成不可分开的联系。可惜得很，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到今日的最高峰，迫近民族解放成功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位良友，伟大的政治的文学家，革命的导师，已不能亲眼看见这伟大的斗争了。高尔基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逝世的，今年的六月十八日，已经是他逝世的第三周年，我们在这满天烽火的血的斗争中遇到了这人类永不能忘的六月十八日，我们首先不能不想到他给中山先生的这封信，他关心中国的革命，他的伟大的作品与中国文艺的联系，他的精神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联系，尤其对于今日中国文艺界在革命战争中的实践的斗争的联系。

关于高尔基的生平，他的作品，以及他被法西斯的凶手谋害

而死的公愤，我不想在这里多说。因为关于前者，国内文艺工作者已有不少的记述、论著，关于后者，我们今日已经采用斗争来消灭这人类的公敌（法西斯强盗及其帮凶），已不是单纯的在文字上表示公愤了。我们今日不能忘记我们这位导师的是他的革命精神与当前中国文艺运动的联系这一点。我们要怎样接受、学习高尔基的精神，加强扩大、中国文艺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提高中国文艺工作者为抗战的服役的热情，巩固与加强当前文艺实践的斗争。

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倘若一个战争爆发了，要加害于我所赖以生活和为之工作的阶级的时候，我也愿意加入它的军队去当一名兵士。……因为苏联工人阶级的伟大和正直的目的也就是我的理想的目的、我的义务。"

高尔基对于俄国革命，不，对于整个的人类解放运动，都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和同情者。

这样的一个战争在中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当前日寇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加害于全中国民族的生存。高尔基以上的话正指示我们，中国民族抵抗侵略的革命战争的伟大和正直的目的，也正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全中国的人民的理想的目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全民族成员的义务。

的确，高尔基这种精神，在中国文艺工作者中继承着，或者说同样保有着，二十多个月来，我们中国已经有不少的老作家参加了前方的工作，或真的"去当一名兵士"。在前方，敌人占领区域的后方，诞生了无数的新作者，全国文艺作家更形成全国性的抗敌组织。

然而在今天，我们怀想到高尔基的地方还很多着。神圣的

民族战争在创造中国新的历史，将历史的车轮作空前的飞转。战争不仅震动这一个老大国家每一角落，也改变了全国复杂阶层的生活思想。从战争中诞生了无数新的东西，也暴露了批判了一切陈旧、腐烂的渣子。每一天中，在前线、被敌统治区域、我们的大后方不知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件，这就是中国民族伟大的争取生存的历史的碎片，是值得中国文艺工作者去记录的；描写表扬一切的进步，坚决与一切落后斗争，抱着“敌人不肯投降，那就消灭他”的决心。

战争中产生了无数新的作家，第一次动手写通讯的人，他们有的是热情，因为他们自己正在斗争中，但他们还缺乏艺术的手段，缺乏写作技术，他们不会剪裁、润饰。这需要我们的老作家，象高尔基一样的热情，诚恳的去帮助、教育他们。这种要求现在已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

中国广大的民众还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对于通俗读物的要求了，同样，前线数百万的士兵，要求我们作家多多供给故事，供给战壕读物，也盼望战壕中能经常有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多有人加入军队“去当一名兵士”。

高尔基是苏联的光辉，全人类的光辉，我们纪念他是发扬他的精神在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不只是纪念的仪式，或空洞的文字。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第七十五号）

寄战斗中的老乡

日来在情绪上，不免有些不宁，我承认这是人情之常，我有感情，我不能不对故乡表示怀念，故乡今日既然被敌人选择为当前第一进攻目标了，故乡的战争不能不最吸住我的注意。每天打开报纸，“桥头驿”“金井”“福临铺”等等地名，虽然对我已有了十年隔别的生疏，但在今日却特别的引起了我儿时的回忆，这些地名在我并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是何等亲切与自己的童年生活相结合啊！然而现在是正陷于火焰中。

早在武汉撤退不久时，故乡青年友人的来信中几乎一致的表示故乡在准备一切，迎接战斗，这我并不怀疑，敌人必取长沙，我乡人必起而抵抗，我承认，日寇不会毫无牺牲而能足踏三湘七泽的一寸土地的，过去有人曾严重的指出长沙大火的失策，也有人认为那只是执行者一时的错误，就在这错误行动中也就说明湘人的性格，这性格，也几乎各省人都承认，湖南人肯蛮干，倔强，不易屈服，固然无理性的蛮干并不是可取的，但这种反抗精神，却不可厚非，我们在今日更要发扬它。

湖南人怎么具有这种特性，这不是今日在这里所能详细谈的，但我们要指出，这是因为湖南人具有一个优良的革命传统。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即受到民族思潮的激荡，受了“维新”之赐，以后湖南人总是站在民主斗争方面反对军阀，大革命时代湖南更

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之一。这次抗战中，湖南人在全国军队中，更占有重要的比重，这不是没来由的，它的根源我们不能从革命传统以外去寻找。

那末，今天我们要发扬自己的优点，那就非重视过去历次革命过程中一切经验与教训不可。如果我们能在今日唤起大革命时代湖南人的热情，发扬过去所播的种子，我们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决不会是妄言，今后三湘七泽，我们有得和敌人相周旋啊！

我们是不能屈服的，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自己，如何动员一切民力，恢复过去农民组织，发扬过去民众武装基础：准备游击啊！长期战啊！游击根据地啊！利用一切山岳地带，动员每一个人，使全湘怒吼起来，三千万同胞团结起来。

长沙外围英勇的歼灭战已感动了旅外的一切湘人，但我们除遥寄敬礼与慰劳之外，还不得不指出，这不是战斗的终结，我们更加要准备一切力量，“敌人来，就消灭它。”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第九十一号）

吊蔡孑民先生

"啊，怎样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

啊，怎样一颗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

为祖国的自由和进步战斗了一生的伟大的先驱者，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领导者、教育家、学术权威的蔡孑民先生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了。

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悲恸的噩耗，凡受到过近二十余年来新文化光辉照耀过的人，直接间接受到过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所抚育过的人，不论他现在的思想立场怎样，他怎能不怀念先生，敬慕先生，而认先生今日的死是中国文化上无可比拟的损失，是中国新兴的学术运动的前途最大的不幸。然而，这损失现在只有由后死者去补偿了。

最近不久以前，我们还谈到先生，彼此交换了先生最近生活状况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先生在抗战中未能直接领导当前文化运动是一件非常遗恨的事。大家都说，我们不能离开先生，少了先生；今日中国文化上，思想上，我们都需要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那种忠于真理、酷爱自由、学术公开等等进步态度。一切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都相信，只有先生过去办北大时的领导方式，五四运动时代的领导方式，才能发扬中国文化，提高中国学术水准，使中国文化运动配合当前中国历史实践的要求，成为一

种民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领导当前神圣的民族解放运动。

今天，大家都在追忆五四以后多年时期中那种生机、活泼、自由的北平的学术环境。北大其时是北平文化运动的首脑，也是全国的文化的心脏。那里对于学术研究，有着完全自由空气。当代名师硕学无不包罗尽致，无学术上之偏见，无政治信仰的排拒，先生曾对人说，“有人说北大是五花八门，但我并不以为病，因为只有五花八门，才能成其为大。”（大意如此，非先生原语）这是何等对学术研究的宽容与鼓励，先生办北大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忠于真理，要求进步。这在五四时代，北大新旧派人物的斗争中，先生是站在真理与进步的一面，这就可以看见先生对学术思想是如何宽容，但又是如何对反动阵营的不妥协的精神。

在先生这种精神下，中国文化才能获得今日之生长，虽然，一直到今日止，我们旧有的文化，一切历史的典籍，还未能科学的加以整理与研究，世界各国一切优良的学术典籍尚未做到系统的翻译，我们文化园地，还甚荒芜、贫弱，但能有今日这一点贫弱的幼芽，也是不易得的，这也无疑的是受先生之赐，受先生的智慧之光所照耀的。

这一传统现在是应该由后死者来继承了。我们要用发扬文化、提高中国学术水准的斗争来纪念先生，要高举“真理，自由，进步”的旗帜来发扬先生对学术思想运动那种辉煌的作风。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第一一三号）

牢记先烈遗言

——为纪念黄花岗革命先烈

黄花岗的故事，是在我的儿童时代最爱听的一个，虽然，这已是到了民国的时代了。黄花岗的故事，在湖南传得很广，现在想来，那完全是由于有黄克强先生参加的缘故。黄先生是湖南人，同时是几次在故乡起义失败而得保全性命的英雄。在湖南就有不少的黄先生的故事和传说。记得在我们那一个小学校里，就有和黄先生过去同在一个学校教过书的人，也还有秘密同黄先生干过革命工作的。因此，只要是有黄先生参加的事，就无疑义的容易传到很远，并且说得有声有色。

我们学校的地理先生，谈到广州，自然，要将黄花岗表扬一番，虽然他并未到过广州，历史先生一扯到黄花岗的故事就更多。我自己到现在还记忆甚清的，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位喻培伦先生，他在就义时，曾对清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是杀不了的。"

我们的历史先生，就用了历史上几个例子，向我们证明过。虽然，我们那时都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哪能真的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经他千番百次的说，我们也将他的话记熟了，那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将世间的书烧尽、将天下读书人杀光，清代的文字狱的结果亦然，这就是说，"学术是杀不了的"，至

于“革命尤其是杀不了的”，那我们却比较容易了解。因为清朝末年，杀党人的恐怖，在自己家乡，就在民国后也还谈虎变色。同学中，有父亲就是党人的，也有叔父是党人的，每人都有自己家庭的故事，常听母亲们说，在民国前，家乡每一个地方，总常传出某人是党人，某人是党人。虽然被清吏逮捕，酷刑，屠杀，甚至牵累家族，弄得身死家破，的确为数不少，但总是越杀越多，越杀得多，人越不怕死。我们虽然用惊异的眼光在倾听这些可怕的故事，觉得清朝官吏太傻，太残酷，但相信，这是事实，先生的话完全是对的。

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的时代，中学里的先生们对汤芗铭、张敬尧“杀学术”、“杀革命”的事实，就引用喻培伦先烈这句名言来安慰我们。我们在那时，用自己眼睛亲看汤、张两氏屠杀国民党人，而那些被屠杀的人，刚刚是自己最敬佩最信仰的人，我们的愤怒那是无法遏止的。我们也真的才相信，天下果真的有这样黑暗时代，有这些无人性的刽子手。

在那时，“学术的被杀”的事，那更直接压在我们自己的头上。学校里接到教育厅的命令要恢复读经，校长一面流泪，一面安慰我们说，要我们忍受一点，说这样反动的日子是不能久的，一面也要我们在修身课本外买一部《论语》。学生一切集会是禁止的，“张四帅”(张敬尧之弟)还召集全省中学学生训话，大骂：“妈的巴子，大帅对你们不坏，你们还闹什么？妈的巴子，还不赶快滚回去读书吧！如果我再查出你们走出学校一步，你当心你的脑袋瓜子。”当时我们数千人一致声泪俱下，大喊“打倒张敬尧”，准备一齐枪毙，结果反得到他的几句安慰，他自己不好意思地走下了台。

这些印象到今日还清楚得很。历史总是向前进步的，先烈的话是被历史证明了。清朝是灭亡了，汤芗铭张敬尧是灭亡了。黄花岗上是长留着解放的血花的。

（原载《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第一一五号）

从鲁迅先生论章太炎忽而想到

鲁迅先生对于章太炎先生的评价是很值得我们细细玩味的。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鲁迅先生又告诉我们，太炎先生与高尔基的不同处是：“太炎先生虽先前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高尔基始终是“战斗的作家”，“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太炎先生却早离开革命的实践，“仅止于高妙的幻想”，“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这就是他们的差别，是极深刻的持论，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真正的知道太炎先生的人。

如果我们用鲁迅先生评价太炎先生的话来看他自己，那也是正确的。鲁迅先生的业绩，我们也可以说，是不仅留在文学，

鲁迅先生在中国也正如高尔基在苏联一样，“生受崇敬，死备哀荣”，但不一定是因为每个中国青年都深刻的了解先生的作品。在先生逝世之日，我就亲自看见不少的市民、孩子走向先生的遗容前致敬，他们大半是认字还不很多，不要说读先生的作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也就是因为先生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先生是一个战斗的作家，却又从未“退居于宁静”的生活过，自然，未“失却实地”不“仅垂空文”。我想，世人今日对先生的杂文甚至比先生创作更爱传诵，那也正是因为先生的杂文更直接映出实践的斗争，容易被人接受的缘故。反对先生的杂文，低估先生杂文价值，或说先生“好管闲事”的人，正暴露了自己“失却实地”，与革命远离。

我们也常听见人们称颂鲁迅先生的做人的态度，或者说，先生的人格，几乎就是先生的敌人也不能非议。

“这是先生的伟大处，是先生取得广大的人们崇敬的缘故，不是一个普通作家所可比得。”自然，这话是极对的。但先生做人的态度其所以值得称颂，也正是先生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先生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种宁静的作家的圈子里。

这不仅我们对于鲁迅先生如此，即在今日的活人中，我们平日最敬仰的人，也一定是他的生活态度至为感动我们的人，而不一定是学者、博士。我们或者也能说得很肯定的，一个人如果“退居于宁静”的生活，或本来就是居于凝固的生活中，即令他在口头上也说漂亮的词句，标榜什么主义与学说，那他大概是不会成长壮大的吧；反之，从实践的斗争的血泊中，从朴素坚实的人们中，我们相信一定是可以生长出象高尔基之类的巨人来的。

但这绝对没有看轻理论、卑视学术的意思。在今日象毛泽

东先生在一篇文章论“学习”一节中所指出的，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是完全正确的。有人问我：“毛先生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这不有点过火么？”

我答道：“不过火的，不过你要注意他是严重的指出‘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如果单说，中国只要有一两百个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子的人，就将是等于打倒一个帝国主义，那在我也要和他抬起杠来。”

如何才能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呢？这要读书，但也要不“失却实地”，如何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呢？那大概不会是居于凝固或“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生活的人用幻想所能达到的吧！

我们崇敬鲁迅先生，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是一个在生活态度上极为感动我们的人，同时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

（原载《读书月报》一九三九年第一卷第二期）

论中国化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化”是中国学术运动在现阶段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当前新的学术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故这口号也是对于中国文化全面活动有效的。这一个口号的提出，在表面看起来，好象只是针对着我们过去对于外来的学术思想尤其是辩证唯物论，因不能融化而提出的一种纠正，一种号召，只是对于当前的所谓洋八股、教条主义的一种批判，是属于消极的意义。如果单止这样的来了解这一个口号，那是不很适当的。

“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我们要从当前的政治实践所反映于文化的要求，反映于新的学术运动上找它的根据。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奠下了抗战建国基础，树立了我们对于胜利的前途的信心，提高了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的热情，但同时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文化在今日的战斗任务不仅是负起提高民族意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同时要提高中国新的文化，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故前者，在文化上表现为一般文化水准提高，文化的普遍化、大众化，后者是提高新文化的质，提出新学术运动的必需。抗战二十个月以来，大众文化运动有了空前的开展，同时也一天天要求一般认识的深化。要求学习理论，提高理论，迎接世界新的思想，研究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对过去文化运

动的批判，学术运动的批判，这是说明什么呢？这是说明，新的文化运动正向着另一新阶段迈进，这一新的文化运动，自然不能割断历史，它是从五四运动通过大革命，抗战前后，各个时期而继续发展下来的，正如今日的抗战，在政治上是继承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各个阶段，是各个阶段的一个总结，在文化上也无疑的是各个文化阶段的一个总结，今日的抗战需要有全面全民族的动员在各社会层精诚团结之下进行，同时亦要求有一个新的、更高度的文化运动配合这一政治的要求，而领导这一民族的神圣战争与建国事业。

因为我们今日的战争是属于进步的战争，我们民族在今日是属于有朝气的民族，是真理的代表者，故中国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亦无疑的是迎接世界一切进步的思想，一切前进的文化与科学，我们不象衰老的帝国主义一样，不敢面见真理，立于真理的反面，把自己束缚在种族的狭隘的观点内，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是要吸收世界文化一切优良的成果来丰富自己、武装自己，创造中国新文化。根据吸收世界文化这一点，我们提出"中国化"的口号来，是有它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是说明我们要求进步，但并未忘记"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并不是"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见鲁迅《文化偏至论》）的那种盲目西化论、奴化论者，我们知道真理是具体的，一切外来的优良的思想、学术，要通过自己民族，与民众的血肉相联结，它才能发扬光大，变为自己的文化，它才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教条，它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变为中国革命指导的理论。因此，"中国化"这一口号，在新文化发展的今日不仅有提出的必要，就是它被提

出也不是偶然的。所以，它决不仅限于纠正过去我们对于外来文化的不融化，纠正我们在学习上、学术上许多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给我们以一种警惕，而是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

二 “中国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们当前要求的是要把我们的眼睛注视今天的中国历史的运动。我们要了解当前运动的特点。我们要懂得中国的全部，至少我们要一天比一天的懂得更多些，我们要研究抗战建国过程中一切新的东西，过程的全面及其发展。这我们一方面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一切优良的传统，但同时我们不能拒绝一切进步的文化，我们要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一切进步的文化，融化它，通过民众的特点，历史的条件，中国抗战建国过程中的一切具体问题，把它变为我们自己的灵魂，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里是具有反“洋八股”、反“空洞抽象”以及各式的教条主义的重大意义的。

但“中国化”的口号与国粹主义那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化”决不就是要求大家“抱残守阙”，决不与今日复古的倾向有丝毫的姻缘，同时它也决不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中国化”是反对这些国粹主义、文化的排外主义与文化偏颇论、中西文化对立论的。“中国化”也不是叫人回到“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的旧道上去，也不是象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某些社会科学者机械的运用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似的，作了一些肤浅的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的游戏。我们

最大的不同处，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我们没有抱着中国文化是主体、世界文化只是客体，没有将各民族文化看作是绝对的对立，我们不排斥外来文化，并承认世界文化的交流乃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无条件的“抨击旧物”甚至“割断自己历史”，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好的民族的传统，批判的接受民族优良的传统，但不是无所分别的一些陈腐残渣兼留并蓄，我们不反对整理国故，甚至承认“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相当的功绩，但“中国化”不是主张仍和过去那样无方法，或用错误的方法去整理国故，研究历史。我们主张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一切的问题。但反对过去一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历史的运动，空洞的抽象的调头，或故意滥用科学方法去歪曲中国历史以达到自己不纯正的政治目的。同时我们反对高谈阔论什么主义学说或玩弄一切新名词，我们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与洋八股、公式主义，犹如反对顽固的国粹派以及复古的倾向一样。

“中国化”是建设新中国文化的一个口号，是配合着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历史的任务而提出的，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学术的，同时是战斗的。它是综和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今日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为它的任务。这是它的内容。但在今日它首先被提出的是在新学术运动方面。

三 中国化与学术运动的全领域

新学术运动是发生在中国抗战的形势下，新的环境，将学习理论提到了重要地位，学习理论成了抗战胜利的条件。这是新学术运动在今日发生的根据，也就是“中国化”口号首先在这里被提出的缘故。“中国化”在学术运动上不是某一部门的口号，它是贯通全学术领域的。

中国学术无疑的因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及中国社会的特点的限制，具有它的特点，它本身的贫弱性；但因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以中国的学术运动的发展并不是追随西欧民主革命时代学术运动所走的旧道，它有它的新轨道、新的速率以及更丰富的内容。中国今日学术运动是继承“五四”之后现代中国文化运动的一种总结，这里无疑的是采取孙中山先生所指示的“迎头赶上”的精神，有条件的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因此“中国化”这一口号要成为各学术部门研究的总方针，学习和写作的最实践的态度。

用例子来说，“中国化”这一口号，哲学上应该是一面接受辩证唯物论，一面用辩证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哲学，当前最最紧迫的任务是批判近十多年从外介绍过来的思想、学说，订正其误谬，纠正过去无目的、无认识、无选择的介绍所带来的许多不良的影响，如布哈林、布格唐诺夫、德波林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同时更作有计划有选择的介绍。但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人们去研究中国哲学，当前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派别，鼓励人们从事中国哲学的习作，鼓励一切有中国旧学根基的人学习和接受正确的方

法论，同时加强对当前一切武断、无知、落后的思想作顽强的斗争。

在政治学上，我们首先要配合当前中国实践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但不是停止在西欧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而是遵着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所指示的理论道程，再加上最近世界上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思想与政治制度。这不是单单介绍某派政治学说，或完全模仿英美，抄袭人家的学说，而是创造新的中国政治学，它不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适合中国的特点，配合当前民主斗争。这一政治理论应是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建设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准则。

在经济学上，是接受世界上最进步的经济学说、正确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研究抗战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运动法则，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诸法则。我们要建设中国经济学，它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原理。在这一领域内，近数年来，关于进步的经济理论的介绍，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但是不够，而且只是开始。今后我们更要在中国化的口号下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同时自然要对于违反历史阶段、歪曲中国历史、反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派思想作强硬斗争。因为这是建设新中国经济基础的理论部分。中国新的经济理论的树立对于中国抗战建国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历史的领域内，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工作还未开始。新史学在中国还是张白纸，我们的历史知识，真幼稚得可怜。说来惭愧，今日的中国人并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对于自己数千年来的历史，它的发展法则，它的民族特点，大半还是个谜。中国历史是不能理解么？不！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是中国文

字以及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所造成的种种阻碍，使我们不易着手研究。这在今日，还是开荒的工作。我们晓得没有历史知识，我们是不能理解实际运动，是不能建立正确的指导民族解放的斗争路线的，是不能负起抗战建国的任务的。“中国化”口号在这里，其所以不是叫人重走“整理国故”的旧路就是因为它要扬弃“整理国故”时代那些学者们所抱的纯粹学术态度和古老的方法，而是在接受新的历史唯物论去从事新的开拓的缘故。

“中国化”这一口号在科学方面也仍是有效的。这不是说，我们要将自然科学一切法则推翻，而建立中国的神秘的自然科学，恰恰相反，我们对于科学的尊严，对于真理的尊严是不会幼稚的要来干犯的。我们这里提出中国化，是要我们的自然科学家，把眼睛看到中国，看到中国现实，将科学通过中国的实践，为中国民族解放服役，为抗战建国服役，在抗战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应该是帮助战争，为战争动员，集中研究战时的一切科学的和技术的问题，对于建国事业提出科学的方案来，这就需要中国自己建立起自己的战斗科学，不单纯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那一套法宝，而是真正为人类，为中国民族服役的斗争的真理。

文学方面，我们提出“中国化”，那不仅是反对文字上的无原则的“欧化”，文化上的洋八股，而是要求今日的文学工作者，深刻了解中国历史的现阶段，具体的注意到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和民族形式，根据自己民族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民族特点，根据抗战建国过程中所需要的文学运动，在实践的宣传、教育中发展创作。这里自然包括批判的接受旧的文学传统、旧的文学形式，将新的内容与根深蒂固的和年代久远的民众嗜好和习惯相联结，创造新的文学，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的

文学。

是的,“中国化”是贯通着学术任何一部门的,这里只略举出几方面来作例子。我们已看出这一个口号在当前学术运动中的重大意义。

新的学术运动无疑的将形成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这一轴心的发展,一定能领导新文化运动向全面的开展,将中国文化更向前推行,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

(原载《读书月报》一九三九年第一卷第三期)

《社会学常识》序

本书不能算是一本完全的社会学，因为我在本书所讲到的，仅仅社会学的一部分，其他如社会学的起源、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我有的完全未说到，有的略而不详，对于研究的方法论，也只注意到自己的运用，并没有特别提出研究，请读者们注意。我现在要向本书读者声明的，这不是我的疏忽，而是我故意要这样做法。

理由之一是本书篇幅太小，社会学的材料，如果要全部放入，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故意要把过多的材料堆集起来，那全书会变为一种社会学公式，那会更不易读懂。

因此，我极端注意“常识”二字，力求解说简单，但要说得具体、浅近，与日常生活有关联。虽然，在本书内，我并未将这些预定计划办到，但我在取材方面却时时想到，我不必拿更多的东西给读者，我要做到拿出的东西，大家能受用。我不必太顾到什么科学的系统，我要顾到的是大家真的看了能对社会有些新的见解。

这是我单单取社会结构这一部分作为本书全部内容的理由。

我看，问题自然不在材料方面，是在写得到底象不象常识，这我很惭愧，我晓得，我还写得有些难懂，有些草率。

读者在自学中，看见了本书后，如有机会，我希望他能接着去读一两本有系统的历史的唯物论。

（原载《社会学常识》，上海中华书局一九四九年五月版）

我们这一代正需要的精神

韬奋先生的精神是今天我们正需要的精神，它包含着实际主义的工作作风和为大众服务的高度热情两个成份。这种精神引导他，能在近二十年中国最激烈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创造了坚固的阵地，锻炼出那样坚强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争取工作、永不退却的顽强性，无限的热情与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这使他在革命的出版业、新闻事业，放出异彩，使他成为这一时代知识青年的导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可贵的。我们今天要接受他的，正是这份中国稀有的遗产。

一　创造阵地，坚持岗位

韬奋先生因为是个实际主义者，在他走进社会斗争中，首先是争取阵地，创造阵地。他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取得一定的阵地，自己不会站稳脚，是不能和敌人长期斗争的。从《生活》周刊出发，他找到了他的岗位，开始创造自己的阵地，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经营生活书店。由"一个小小过街楼"，发展到全国总支店五十余处。自然这不仅是他一人之力，他自己说，这是因为读者和作家和他合作，书店工作人员辛劳血汗，是一种集体创造，但他是唯一的组织者，主帅。除开他自己常常称道的，他左右那

支"小小的军队"外,政府是不会给他帮助的;反之,给他的是压迫。其他阔人是不会赞助他的,他也从未作此打算。韬奋先生能够坚持舆论的岗位至二十年,书店是他的基础。《生活》周刊停刊,《新生》出世;《新生》查禁,《大众生活》出现了;《大众生活》遭难,《永生》又生(《新生》、《永生》二刊,名义上非他主编,实际一脉相承);《永生》虽未永生,《生活日报》发刊;日报自停,《生活星期刊》继出;《生活星期刊》短命,"八一三"的炮火,又打出了《抵抗》(又名《抗战》三日刊),发展而为《全民抗战》。及至《全民抗战》被击破,虽出走香港,又复打出《大众生活》之旗。这一方面,虽然说明他如何坚持岗位,令人钦敬,但亦说明他有雄厚的力量,有远见。他那样辛勤为书店工作,是有远大的眼光的。这种实际精神,不是短视的人所能看到的。

生活书店不仅是他个人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物质基础,也同时是抗战前期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物质基础(虽然不是唯一的)。生活书店成了一切前进出版、发行的中心。生活书店出版进步刊物,实际上当时在全国杂志界居于领导地位。通过这些刊物,团结了作家、读者,起了伟大的宣传组织作用,维持住很多前进作家简单的物质生活(卖稿生活),使他们能在反"文化围剿"中顽强的作战。它变成和革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在救国运动中,生活书店直接起了支柱的作用。韬奋先生参加救国会运动,是带着他那支"小小军队"的。救国会运动,主要是靠宣传、号召,这又不得不归功韬奋先生他为大家所创造的这种优良条件。

二　为群众，对群众负责

韬奋先生创造阵地，是为的服务于广大群众。这自然经过了一定的发展过程。在他编《生活》周刊之初，那服务的对象还是一个狭小的圈子（职业修养指导），但实际生活中的矛盾，由千万读者反映到这位青年编者的眼前，使他突破那狭小范围，一步步接近广大的群众。

他的岗位是杂志编者，服务的对象首先是读者。他主编的刊物，其中最大发行额达二十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他前后拥有百万读者，他和读者的关系之密切为其他刊物所未有。他的刊物，素以读者通讯为特色。《大众生活》时代，有一月收到读者来信达一万件，平均起来，他每日能收到读者来信一百封，他是如何处理这庞大的工作呢？他说："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有五、六个同事全天为着信件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然而，他感到"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要"用全副精神答复"，是"一种责任"，不答复是"无理由"，他工作到"深夜还舍不得走"。编辑部的收发信件，有一只卡片箱，好象一个小图书馆一样，那里藏有广大读者的通讯处。生活书店发行网之宽，事业成功的秘密，就是韬奋先生在十余年中有了这样的卡片箱，他是以这种工作为"无上荣幸"的。

他这样艰辛的创造，对于自己的事业是应该视同自己的生命的；不错，他爱护他的事业重于自己的生命，但一旦受到"黑暗势力"的压迫，逼迫他改变立场时，他可以马上无保留的表示，宁让事业灭亡，不能离开群众，背叛群众。他一生有三个大关键，表示了他"忠肝义胆"（对群众），就是《生活》周刊时代，他被压迫

出国，没有妥协；“七君子案”，他未妥协；三九年四〇年初，国民党封闭全国生活书店，只剩重庆一处，并压迫生活书店应和正中等官家书店合并，压迫他加入国民党，他毅然拒绝，愤然辞去参政会那虚伪的议席，表示抗议，离开祖国。这些事都系大家所共知，用不着详说。然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能办到的。他那种“为大众谋福利”，和大众融成一片，替大众负责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

三　争取工作，永不退却

韬奋先生的实际精神还表现在任何环境坚持工作和争取工作上；抗战初期，他将生活书店多年的蓄积，全部用之扩大业务，东扯西拉，发展事业及刊物。同时，他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参议会后，从不放过发言的机会，也不作过高的幻想，他曾经说过：“别人请客，我是把自己当作主人的。”参政会上他是一个雄辩家，一个被顽固分子认为“最可怕的人物”。三九年以后，环境变得更坏了，发言的限度，几被剥夺净尽了。《全民抗战》是不易维持的。记得三九年下半年，每期二万八千字，常被审查老爷们抽掉大半，社论有时更写至三次，有时从审查处跑回来气得脸皮发青，但从未说过“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全民抗战》的存在，永不“自动撤退阵地”，因为敌人正是希望我们不战而退的，“全抗”一直由他坚持到他不能不离开重庆。

四　热情，不知疲倦的工作

热情、天真、可接近的朋友，这是凡见过他面的人一致称道的。他对工作，对群众服务，那样大的热情，上面已略提过了。他

对人，那样天真坦白，不少和他接近过的人，都曾体验到。这里我想说一个故事：在三八年，我们从汉口迁到重庆，因为《全民抗战》还是三日刊，迁川期中，要保证不停一期，那就不得不坐飞机。我们带了大批稿子，读者来信，跑到机场，我们最担心的是检查，到了机场，马上有两位宪兵来找我们，向我们敬礼，说是我们的读者。韬奋先生初不相信，以为是假的。这两位宪兵看见我们冷淡，有一位一面请我们喝汽水，一面流下泪来，说：你们不要怀疑我们是坏人，我们是大夏学生，永远跟你韬奋先生走的。韬奋先生当时改变了态度，马上含泪和他们握手，安慰他们，向他们道歉，如象对最亲近的朋友一般，天真的问道：你们是否接到我们走的报告？那位青年面上发赤，说他们奉到上级指示，在我们买到机票的第二天，他们正在担心不知谁那天值日，想不到今天我们就走（提前了三天），刚刚轮到他们，所以可以少了检查的麻烦。后来我们平安的上了飞机，在飞机上，韬奋先生兴奋的手舞足蹈，说："我们的辛苦不白费，到处有我们的人。"并说，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只要看这一代青年的心就可保证，其对人热情如此。

至于他一生不知疲倦的工作，那有他一生事业可证，这里就不多述了。

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虽然我这里说出的只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也足以说明那是如何稀少可贵的精神啊！韬奋先生一生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向真理，为中国人民大众服务二十年，虽然他最接近的还是中国知识青年，一小部分工人，未能更广大的做到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限制，不足为先生病。

中国知识青年要不做空头革命家，要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面向群众，那你就得学习韬奋先生的精神，你才能和群众结合，更好的为大众服务。

韬奋先生精神不死！

（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

韬奋逝世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以“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这一庄严、肃穆、沉重的辞句开始的。我想，凡是亲身经历过近数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人，当我们展读这一伟大的人民宪章，一开头，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一切革命先烈油然生敬，就不能不回忆到和自己一道共过艰危而今已不在人世的战友们。他们的形象会一个一个浮现出来。在我的回忆中，最鲜明的出现了韬奋先生。

韬奋去世到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是十年了。十年，就个人的生命说是不能算很短的，但在历史上，那不过是瞬间。过去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并发展了一百多年先烈们的理想，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优越的制度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过渡时期，即“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是以无限光荣和自豪来对待中国人民第一部宪法的，这并不足奇怪；宪法草案是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经验，体现了中国六亿人民，包括一切先烈的崇高愿望的。我们对于一切以生命贡献给人民解放事业而又未能亲自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烈们，这一部宪法的诞生就是对他们最高的纪念，对韬奋先

生说，也是如此。我们还有比这更崇高的纪念没有呢？我想，那是没有的。

当前全国亿万人民正在热烈地讨论宪法草案，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宪法通过以后充分实现宪法作一切准备。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时期应该准备什么呢？我想韬奋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就正确地回答我们。韬奋先生的精神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中，仍然是活着的，仍然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有着鼓舞作用的。纪念韬奋逝世十周年，就是，要追忆韬奋先生，学习和继续韬奋先生所走的道路。

今天的青年对韬奋这一个名字是已经生疏起来了，这不足奇怪，时间已经过了十年了。但抗日战争的前夜，抗日战争期中，这一个名字对当时每一个进步青年都是熟悉的，他是青年的朋友、导师。他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思想准备上，有了巨大贡献的人，他办的刊物、书店教育了中国青年、中国人民。什么是我们要继承他的精神呢？

我想，首先是他的政治的纯洁性。他的一生是一尘不染的。在他生前，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是非常尊重的，他是依靠党的，自觉地受党的政策指导的，是和党员一起工作的。凡是他自己的意见与党的意见不一致时，最后总是接受了党的意见。在一切关键问题上，如《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的前夜，正遇着西安事变。当他听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时，《生活日报》就立即采取了党的政策方针，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就是最突出例子。以后，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等四人发布呼吁团结救亡的小册子，在讨论中，也是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同意正确的意见的。抗日战争中，他参加参政会，一直到他辞去参政员，政治态度一贯

是鲜明的，他坚决地站在人民立场。至于他平日的言论，尤其是他主编的刊物的每一期的社论和主要论文，凡是属于原则问题的，他没有不征求党的意见的。他在临终以前，遗嘱申请入党，他的言行是始终一致的。记得我们接到他的遗嘱时，在延安的同志们无不感动的声泪俱下。韬奋先生由民主思想逐步走到社会主义，追随党、依靠党的思想，的确是一般知识分子中很少见的人物。这种精神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仍然应该大大发扬吗？

其次，我们要学习他对事业的热爱和忘我劳动的精神。

凡同他共过事的人，无不对他的事业心，对他的忘我劳动态度表示敬佩。他晚年虽然参加政治活动，但他的主要业务是主编刊物，办书店。无论受到何种残酷的压迫，决不灰心丧志。我和他共事五年中，是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不说别的，即就文稿审查一项说，如果没有绝大的忍耐是谁也忍受不了的。记得《全民抗战》每一期稿子，平均总有四分之一被蒋帮禁止刊载，多的二分之一被扣，每一期，他和我轮流跑蒋帮审查机关或国民党中宣部。有时和这些人谈判到四五小时。回到家来，还要忙于改写，或换其他文稿。但他从不表示消极。他主编的刊物，也从不脱期。中国期刊发行史上，除开大革命时期的《向导》以外，只有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在全中国能发行到十六万份。他主编的其他名义的刊物，也总是占当时全国销数的第一位。

其次，我们要学习他的群众观点。自然，他当时能接触的群众还是青年学生，中、小知识分子，店员学徒，家庭妇女；工人，农民的接触那是少的。在他的编辑部的业务中，最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处理读者来信，他对读者来信的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常令

人惊异。不仅有问必答，而且每封回信都要写得整整齐齐，不能写草字，最后，都要由他亲笔签名。内容复杂的，在回信前要经过讨论，社内不能答复的，必请专人回答。不管什么性质的要求，都要设法满足，负责答复。记得曾有内地一位女性读者，就要结婚了，托他打听一种衣料，条件是既要便宜，又要好看，还要代她调查时装裁剪样式，等等。他看了哈哈大笑，但马上叫人到市上去办，把料子找齐，连同时装样式等等一并寄去。由于他这样为读者服务，以后我们知道，这位女读者在她结婚后，凡是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总要订一份。过去生活书店是合作社组织，没有大资本，但是营业扩大很快。当时蒋帮总疑心共产党有津贴，殊不知生活书店就是有了几箱读者的姓名地址卡片，出了读者最需要的进步书刊，得到广大读者的自发的支持，才发展起来的。我们目前许多机关都有"人民来信"，我们是否都按韬奋的精神处理的呢？我在《人民教育》编辑部中就常常指出，我们通联科的工作要学习韬奋对读者来信的精神。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是缺乏这种精神的。

其次，韬奋先生和共产党员生活在一起是极为友爱的。当时在他的事业中——书店，编辑部，都有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民党蒋帮经常向他提出警告，有时提出名单来恐吓他。他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们。在非常紧迫时期，他只好把受到逮捕威胁的同事偷偷地送走。

韬奋先生的一生，在一九四四年中共中央唁电中已有正确的估价，用不着重复了。韬奋先生生活和斗争的那些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先生一生的辛勤劳动是有报酬的，当前公布的宪法草案，就包括了先生的一部分劳动在内。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祖

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的。今天纪念死者，不是哀悼，而是要发挥先生的精神，把它继承下来，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原载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

——学习韬奋的编辑工作经验

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典范。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是他逝世十八周年。韬奋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为编辑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韬奋有十六年编辑经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一九二六——一九三三年，主编《生活周刊》；后一个时期是一九三五——一九四一年，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全民抗战》和一九四一年又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

在前一个时期，他对“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出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不断地“向前进书报上求锁钥，无时不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他亲身到了苏联，也到英、法、美、德等国看了一番。最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走向了革命。

在后一个时期，他自觉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明确地走上了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道路。

至于编辑经验，他从办《生活周刊》起就开始积累起来。这一时期，最为宝贵的经验是他善于从群众中去发现问题，注意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企图在编辑工作方面找一条新的道路。

他从“每天差不多用全个半天时间来看读者来信”中，接触了广大读者向他反映的各种各类问题。他常常工作到午夜，不知疲乏。一想到自己“和无数万读者的联系”，他就好象自己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好象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乃至感到无上荣幸”。他对群众发生了深厚感情，不知不觉地做了读者的知心朋友。自然，读者更信任他，把他当成了亲人，以至有人“把不敢对母亲说的话，也向他倾吐”了。

很自然地，他把和群众的关系在工作上固定下来：一是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读者来信，开辟了有名的“信箱”；二是由他“用全副精神”，直接回答读者的来信；三是建立接见读者制度，热情地亲自接见来访的人；四是代办读者委托事件，从代办书报，到代购衣料和鞋子，代聘律师等等。这些在刊物范围以外的事，他看作是读者信任他，为了朋友，也“义不容辞”。这种服务精神，自然很感动了人。群众支持了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最重要的还在编辑工作方面。他养成了时时、处处、事事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打算的作风。每一期刊物的内容，每一篇社论、专文，每一类文章的长短，语法的结构，版面的布置，图画，印刷，校对，出版日期和定价等等，无不为读者打算，总要尽可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和要求。

到了《大众生活》的时候，他找到办好一个刊物更为重要而且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了。那就是刊物找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群众走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同时，把刊物的对象大大扩大，使之面向千千万万的爱国群

众，尤其是把对象重点放在当时对现实不满而对革命尚处中间状态的人，或对“救国有心，救国无门”的爱国青年。这在党还没有在大城市公开以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韬奋的经验一旦和伟大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步步前进，系统化，最后形成了一条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

这是一个总的轮廓。

作为一个革命编辑者的品质，韬奋具备得很完全。他十几年坚持了自己的岗位，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一心一意，专心专志，贯彻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编辑工作从来是全面掌握，彻底了解并深入工作的各个环节，真可以说是专深专透。

以下谈十个问题。

一，组稿是在方针决定之后第一个具体环节，是已确定的轮廓计划具体化。在韬奋的经验中，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重要战役。它的实质是党的政策主张和当前形势结合、和群众结合的过程。这一个环节要求深刻地掌握党的观点，把党的主张用群众能够接受的语言，生动活泼地表达出来。他总是呕尽心血，先在编辑部中反复酝酿，然后又召集他所信赖的几个好友进行座谈。参加的人有固定的几位，也有临时邀请客串的。这也是编委会。这个会上，彼此先交换情况，然后热烈地讨论一周宣传的主题。韬奋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思想，有什么想法，就提出什么。他唯一的要求，是理解得深透、具体。这样的讨论，常常明确了许多观点，彼此受益。每每讨论到主题明确的阶段，每期文章的题目就出来了。韬奋一直保持主动，他提出的结论，常常十分中肯。这是因为他比谁都准备得多，比谁更了解读者的情况。题目大致定

下以后，就当场分配写文章的任务，谁写那一篇，另一篇约谁写适当。这样的编委会的特点，就是思想性强，讨论中心问题的本质方面多，讨论展得很开，无拘无束，纵情畅谈。会上实际上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集体领导一个刊物的作风。韬奋在各个不同时期出版的刊物，每一期的内容没有不经过集体讨论的，他写的社论也没有不征求别人意见的。这一个环节，他总抓得很紧、很准，不流于形式。

二，接着的一个环节是定稿。特点是保持主动，原则性坚定。定稿是指已写好的稿子在编辑部进行传阅、研究，最后确定用与不用。这包括编辑部自己写的和特约的稿子。韬奋从来没有把特约稿，看作是定稿；从作家取来的稿子不经研究就付排的事，从未有过。他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者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不用。在这方面，我不知什么叫做情面，不知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

他坚决反对为了保持每期固定的页数，而随便拼凑稿子，不顾质量的那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反对只注意所谓主要文章，或名人的文章，而轻视其他的文章的片面性。他说："读者的要求不一，有的喜欢这一部分，有的喜欢那一部分。"他说他自己看报纸、杂志，也是找自己要看的看。

他对每一期的文章，包括补白在内，决不轻轻放过。这一环节，一般在文字加工以前就算结束。但如遇时局变化需要发表另外的文章，或者新收到一篇精采的稿子，他会乐得"好象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即令已付排了，也不惜抽去一些稿子，换上新的稿子，宁肯花费双份排版费，也在所不惜。

三，韬奋对于文章有他的见解，有自己的风格。他的出发点也是为群众。他说："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他主张："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是为了"这样的文章给与读者的益处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许多探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部门的知识。"

他首先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说："一篇小言论，只数百字，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的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他一生写的文章，大都是短篇。成本的著作，章节也分得很细，每节篇幅都短。他的言论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胡愈之曾为此作过研究，认为韬奋的文章主要特点是"只想要大家一般都看得懂，读得懂"，"说大众的话"，"不无病呻吟"，"不无的放矢"，"自然丰润富裕"，自成文风。

他主编的刊物反映了这种文风，不合这种文风的虽然也有，但到底是少数。篇幅太长的、欧化语气过重的、不易为读者读懂的文章，则完全没有。任何人的文章，在定稿后，必在编辑部作文字加工。他常说，"这才真是编辑工作"。一篇文章全段、整行、整句删去的事是常有的，完全改写或大大删节的事也有。最麻烦的是将长句子变为短句子，删去用得不恰当的形容词。至于改正笔误，校正引文、数目字和标点符号，则无不要求精细入微，是从来不放松一点的。

四，韬奋对刊物的内容和格式（形式）坚持统一的观点。他提倡创造精神，认为内容和格式都要表现其个性和特点。他说，“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刊物就没有“个性和特点”。他主编的刊物，正如他所说的，“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刊物的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上海出版的《生活星期刊》，采用八开本，在编排上有所创造，就是编排的例子。《大众生活》是韬奋风格发展到高峰的例子。单就《大众生活》的封面说，它就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不仅它采取了套色照片，印得精美鲜明，为当时期刊所少见，而且它巧妙地配合了刊物的内容。这个刊物第六、七、八、九期连续报道“一二九”运动，封面前后内外四版用照片组合，报道了北平学生示威运动和各地响应的全貌。照片包括示威行列，战斗雄姿，警察射水，特务捉人，医院养伤，血衣短棒，令人感到亲历其境。照片是费了极大代价取得的，也是经过专家精选、修剪和巧妙编排的。这样的封面发挥了激动人心的政治作用。还有几张照片也值得一提，如用“国人皆曰可杀”的标题，把殷汝耕等照片在刊物上示众，把国民党中枢衮衮诸公悠闲静适的玉照和日本海军在中国海岸耀武扬威的演习对照编排，也收到比文字更有力的宣传效果。用照片并不稀奇，这里表现不平常的是这些照片变成了利刃。

韬奋一贯在刊物上很恰当地利用插图，这也是他的风格的一种表现。插图有很多种类。时事必附地图，增强文字的效果。抗战以前的《国难地图》，抗战中的《战争发展图》，都曾驰誉一时。其他如《图画世界》、《时事漫画》、《社会漫画》，都受到读者

最大欢迎。韬奋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设计、审稿、制版等过程的工作细节的。

五，主编深入印刷所也是一件突出事情。韬奋在《生活周刊》时就常常到印刷所去，在《生活日报》时更是"坐镇"印刷所。他看着工人排字、拼版、改版，直到版子铸好上机，发动机转动。后来在《全民抗战》的时候，他有时也还到印刷所看看。和一般人到印刷所单看校样不同，他去的目的是包括校正版样，检查各栏布置、标题字体、行列、图画和广告等等。常常要改变版样，甚至一改再改。如遇文字排得不匀，广告地位不够，或一行起头是一个标点符号等等，就必须减去或增加一些字，有时也有压缩几行文字或增加几行文字的事。这非主要编辑下厂就不易办好。要是工人不肯改，除另加排版费外，就只有自己动手。因此，他在编辑部中也学会了一些拼版、改版的技术。为什么他这样严格要求呢？他说："我最怕读者接了这一本刊物，一翻开就感到头痛。"他要求给读者一个良好印象，"如同一个人的衣服穿得整齐一些一样"。

六，不许刊物上有一个错字。他在追记《生活周刊》时说："校样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聚精会神，就和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他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他在后期虽然看校样少了，但出版后，他总要全部看一遍。如果没有或极少错字，他就笑容满面；否则，就愁眉不展。他办的刊物是错字很少的，严重的错误就没有发生过。

七，韬奋办的刊物从来没有脱过期。《全民抗战》从汉口迁

重庆，他宁让编辑人员坐飞机，也决不使刊物脱期一天。他坐飞机到达重庆，当夜即到印刷所看校样。三日刊没有误期一天，大家都感到惊异。其实没有一点秘密，有决心，有充分准备，有负责的制度，就能办到。韬奋曾说，伦敦《泰晤士报》八十年没有脱过期，有一次报馆失火，也照常出报，人家能办得到，为什么我们办不到呢？他竟办到了。胡耐秋在回忆中指出：《全民抗战》迁渝后，每期要把纸型航寄汉口。纸型一定要交客运机方能当天到达。有一次，误交货运机，韬奋知道后，大为气愤，在办公室坐立不安，指责那位同事没有责任感。他说："不知道读者是多么急切需要知道时局变化，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他们得到一本刊物是多么不容易。"责任感之深，见于言表，谁也为之感动。

八，搞好管理，精打细算，自力更生，永远节约，也是韬奋的一条好经验。韬奋一生办了那么多刊物，办了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分支店的生活书店。自己没有资金，也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投资，完全凭他善于"理财"的革命精神创造出来。据陈家荣的回忆，在《生活周刊》时，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因《生活周刊》揭发了他的贪污腐化，愿挪出十万元来投资，遭了韬奋严词拒绝。陈济棠、白崇禧也有过同样企图。到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国民党中央也阴谋用投资消灭生活书店，均未得逞。虽然资金缺乏，他也没有向党求援，因为他知道，革命事业在当时只能依靠群众支持和自力更生，这不仅可以避免给敌人以口实，而且是办一切革命事业的根本路线。从《生活周刊》起，他就一直是以刊物养刊物，以刊物助书店发展，以书店支援刊物。一切精打细算，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生活星期刊》以后，编辑部从来不过四、五人。《生活日报》的编辑部也不过十多人，既要编报纸，还要编一

个三万字的星期刊。人员少，主要为了节省开支。尽量减低成本，是中心的一环。以《大众生活》为例，它的定价是三分，经过批发出去，打六或七扣，每本可收回一分八厘或二分一厘。当时，成本已压低到九厘左右（成本包括造货、工资、稿费和杂费），所以每一期还有九厘左右的利润，可以用它再生产和扩大事业。为了达到以刊物养刊物的目的，他在这方面，不知呕了多少心血。生活书店的积累正如韬奋所说，"是由全体同事在这十几年中流血汗，绞脑汁，劳瘁心力，忍饥耐寒，对于国内外读者竭诚服务的一片丹心赤诚凝结而成的。"韬奋的事业所以经得起打击，决不是偶然的。

九，他把读者来信不当作负担，而看作是自己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接近群众的手段。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在这里，只谈他处理来信。读者每一封来信都经过他自已和编辑部同事细心阅读。来信要经过登记、分类。复信要先提要点，或由他"口授大意"，然后起草；起草后要经过指定的人审阅、修正，然后用特制的信笺，发下抄写，字要写得清楚；最后由他亲自签名发出。遇到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则请专家代复；专家代复了，仍要经过审阅；凡答得潦草的，还要再答过。对有怀疑的问题，他亲自找朋友求教。张友渔在回忆中就提到，韬奋在一九四一年，为了一个读者来信问关于苏联选举法，曾"不惮从九龙渡海到香港和我来商量"，很使他感动。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读者有连续来信商讨一个同样问题的，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一再解释，一直要使读者明白。碰到一个重大问题，读者接到回信后不再来信了，他也曾主动写信，问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他的复信稿，现在有极小一部分收到《韬奋文集》第一卷中。其他还有不少也有保留价值。

处理读者来信的同时，又从读者来信中搜集读者反映的问题和意见，辑成资料。刊物上许多文章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找出来的。

十，韬奋十分重视资料和档案工作，他的编辑部虽然说不上有完善的资料，但为了写文章而准备材料是很认真的。他个人和编辑部中的人，都保有一定的个人的资料，如金仲华就保有较完善的国际资料。

至于档案，只谈一件事。韬奋保有十多年读者的通讯处，的确做得出色。他把不知多少万人作出了卡片，装在特制的卡片橱内，层层排列，井井有条。读者地址变动，卡片上也随着改变。这一个卡片橱，对于生活书店说，是一个宝橱。它对书店的发行、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韬奋的经验自然不限于以上这一些，其他如对国民党长期的斗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原稿审查，反审查，反邮禁等等），在这里没有谈到。就是以上谈到的，由于我没有找到韬奋各个时期主编的全部刊物和著作，所以我也仅能谈到一些要点。韬奋的经验是十分生动丰富的，我以为要接受这一部分遗产，还要进一步研究韬奋的东西，并且最好根据他编的刊物，谈出他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些具体问题上，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许多细节，最后作出比较全面的总结。

（原载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写在《柳湜文集》的后面

胡　绳

我和柳湜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六年。但是在认识他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了。一九三四年冬，他和艾思奇同志编辑的《读书生活》杂志创刊。那时我在北平，是个大学一年级学生。这个在当时出版界中以一种完全新的风格出现的杂志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它的经常撰稿人，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有汉夫(写国际问题)、征农(写文艺评论)、吴敏(写经济问题)、高士其(写科学小品)，还有曹伯韩、廖庶谦、陈楚云等。两位编者写的文章最多，艾思奇主要写哲学方面的文章，柳湜写的方面较广，时局、社会动态、青年生活都是他文章的题材。

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北，又侵入华北，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是国民党统治者对日本侵略势力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坚持反共内战，施行反人民的法西斯高压政策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退出南方根据地进行艰苦的长征的时候。那时，在国民党书报审查制度下，连抗日两个字都不能见于公开报刊上面。一大堆问题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能不能避免亡国的命运？中国能不能有个光明的前途？由于看不到民族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而产生的愤懑、苦恼、不安、恐慌交织在一切善良的爱国的中国人民的心头。

正在这个时候，上海的一些实际上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党组织在许多方面，也在文艺文化战线方面，联合党外的革命者做了许多工作。运用公开出版的书刊，通过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大至世界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小至个人遭遇问题)，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传播给群众，是他们所进行的出色的工作之一。《读书生活》杂志在开辟这一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离开北京的学校到上海。由于给《读书生活》投稿而逐渐同这个出版社(这时已建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辛勤的工作者认识了。至今我还能记得在斜桥弄的一间既做发行工作又作编辑室用的简陋房子里同柳湜谈话的情景。柳湜除了编辑《读书生活》外，还在别的刊物上写文章，出版了一些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书，如《街头讲话》。

国民党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已经被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起的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所打破。柳湜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参加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但在这一时期，我和柳湜的接触还不很多。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柳湜主办《全民周刊》，邀我参加工作。这虽然是个周刊，但编辑人员除了主编以外，就是我；不久默涵来了，共有三个人。我们在江汉路联保里租了楼上的三间西厢房，其中一间柳湜夫妇住，还有两间是相通的，可说是一大间，一半由我同默涵住，另一半摆了两张桌子，就算是杂志的办公室。

夏天的武汉是有名的"火炉"。联保里又处于汉口闹市。《全民周刊》出版期间正赶上夏天。柳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写稿子，编刊物。联保里的北端有个商人办的小印刷厂，由它承印我们的周刊。每星期出版前，包括主编在内的全体人员——三个人

都挤在这个小印刷厂里看校样，直到付印。

由于工作生活在一起，逐渐相知较深。但是刊物每周出版一期，再加上别的工作，够我们忙的了。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议论的事够多的了。我没有听到过柳湜谈论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他比我大十岁，坐过牢，受过生活的磨难。他的勤劳的工作作风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我这个参加斗争生活不久的青年以很深的印象。我是把他看作老师的。这时我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湖北省委宣传部的何伟同志经常来同我们联系。

《全民周刊》出版了几个月后，和韬奋主编的《抗战周刊》合并成为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沦陷前不久，《全民抗战》随生活书店迁往重庆。柳湜也到重庆去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也辗转到了重庆，又和柳湜会见了。他这时仍和韬奋合作主编《全民抗战》(已改为周刊)。在柳湜的鼓励下，我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不久，柳湜到延安去了。我一直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多年和他没有个人间的联系。

我和柳湜再见之时，已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北京刚解放不久，他担任市教育局局长。一天，我们偶然遇见，他邀我到他寓所坐坐。在他的卧室里，我们长谈起来，一直到深夜。分别了这么多年，可以谈的话题当然很多。那天我们谈的是全国胜利后的形势；他谈了开展教育工作方面的许多设想。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间的长谈也就只是这一次。此后，由于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各忙自己的事，见到的机会也很少。在他政治上受到不应有的委屈后，我没有能见到他，谈一谈，这是我至

今想到就不能不感到深深遗憾的。

十年动乱中，不记得什么时候，听到了柳湜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沉重的痛苦压到了我的心头。我不忍设想，但又仿佛看到满脸流血的柳湜以湖南人的倔强性格喊道：我不是叛徒。

是的，柳湜同志是经受过许多苦难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

现在柳树滋同志把他父亲的遗著认真地选编出来，我以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柳湜同志一生写了很多文章，在抗战初期，在延安期间，在建国后，他都有许多著作。但我想，他的著作生涯最光彩的一段还是在抗战以前的几年间。这里，我要回过来谈一下那几年柳湜所参与其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上海有的刊物提出过“新启蒙运动”这样的口号。近来看到有一本叙述那个时期的历史的书，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初版中写过“新启蒙运动”，但在七九年的修改本中删去了这一段，并声明删去这一段，“不只是因为这次运动发起者中有陈伯达其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次运动刚发起不久尚未真正展开，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实际上并没有能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我认为，不再使用这个当时虽曾提出但不久就不再使用的“新启蒙运动”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应当承认，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几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确是进行了一次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称之为一个运动也未尝不可，但这运动并不始于“新启蒙运动”口号的提出，也不需要称之为新启蒙运动。

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的筹备时期就开始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马克思主义宣

传工作没有停顿，反而是向前发展了。为了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驳斥种种取消和歪曲中国革命的谬论，都需要理论武器。党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除翻译了不少马列主义基本著作外，还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读本、论文等。但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严重地染上了后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八股的气味。到了一九三四年左右，为适应抗日救亡的形势而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同志们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的认识，但是他们针对现实的形势，针对读者群众提出的问题，从读者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并使用读者能够接受的形式，帮助读者逐步地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一个联系实际的，又是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对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宣传来说，确是别开生面。这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代表刊物，除了柳湜、艾思奇编的《读书生活》外，还可以举出徐步、沙千里主编的《生活知识》（被查禁后改名《新知识》、《新学识》，它一直出版到一九三八年在武汉的时候），还可以提到比《读书生活》还早一点创刊的薛暮桥等编的《中国农村》，钱亦石、金仲华等编的《世界知识》等等。这几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大量的青年在这时候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柳湜是在当时有成效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当然，现在看来，无论是柳湜还是其他作者那时所写的东西不免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中，不仅不能忘记他们在那时期的工作，而且我们至今仍可以

从他们的业迹中学到一些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验。

听到《柳湜文集》将要出版，引起了我的一些追忆和联想。把这些追忆和联想写出来，当然不足以表达柳湜同志的一生和他的全部工作，好在这些已有本书的“前言”作了全面的介绍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

封面题字：舒　同

ISBN 7-108-00117-0/G·15　定价 9.00 元